『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

上册

中国人民解放军
国防大学
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

“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

上　　册

中国人民解放军
国　防　大　学 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

1988年10月·北京

说　　明

根据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精神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问题、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课教学及研究的需要，我们编印了《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1949年10月至1985年9月)共十四册(序号19—32)。本书为"文化大革命"时期资料(上<25>、中<26>、下<27>三册)。

所收文件资料，有的公开发表，有的内部发表使用过，汇编时，保持了文件的原貌，未作改动，如需引用，请查对原文。本资料只供内部教学和研究参考，不得翻印。

为反映历史发展的逻辑，便于从历史事件的相互联系上研究问题，所有资料都按时间顺序编排。

本书编辑委员会由段浩然、张天荣、何理、肖甡、胡庆云、林蕴晖、李兴仁、丛进、王年一、郭占波、李浚组成，负责整个资料的编审。

本书由王年一选编。

刘星星负责编辑工作。

徐胜华、郑又晨、刘星星具体经办承印。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

一九八八年十月

目 录

一九六六年

一九六七年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通　　知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五年九月至十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文件，彭真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这个提纲的主要错误如下：

（一）这个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这个提纲，不是鼓舞全党放手发动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继续冲锋前进，而是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这个提纲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二）这个提纲违背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当报刊上刚刚涉及吴晗《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竟然提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他们又在各种场合宣称，对吴晗的批判，不准谈要害问题，不准涉及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问题，不准谈吴晗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彭

真有意造谣，对许多人说，主席认为对吴晗的批判可以在两个月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后再谈政治问题。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纳入资产阶级经常宣扬的所谓"纯学术"讨论。很明显，这是反对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而要突出资产阶级的政治。

（三）提纲特别强调所谓"放"，但是却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抹煞放的阶级内容。毛泽东同志正是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指出，"**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又说，"**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这个提纲却把"放"同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揭露对立起来。它的所谓"放"，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只许资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是包庇吴晗这一类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个提纲的所谓"放"，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

（四）在我们开始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们用这个口号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根本否认真理的阶级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五）提纲说，"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这种对学术不分阶级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错误的。无产阶级在学术上所掌握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地超过了和压倒了资产阶级。提纲的提法，表现了作者吹捧和抬高资产阶级的所谓"学术权威"，仇视和压制我们在学术界的一批代表无产阶级的、战斗的新生力量。

（六）**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在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中建立和不断发展起来的。但这个提纲却强调"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这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破，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立，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针锋相对的，是同我们在文化战线上进行大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斗争背道而驰的，是不准无产阶级革命。

(七) 提纲提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又说"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究竟什么是"学阀"？谁是"学阀"？难道无产阶级不要专政，不要压倒资产阶级？难道无产阶级的学术不要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学术？难道无产阶级学术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学术，就是"学阀"？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八) 提纲的作者们别有用心，故意把水搅浑，混淆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的目标，提出要对"坚定的左派"进行"整风"。他们这样急急忙忙抛出这个提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整无产阶级左派。他们专门收集左派的材料，寻找各种借口打击左派，还想借"整风"的名义进一步打击左派，妄图瓦解左派的队伍。他们公然抗拒毛主席明确提出要保护左派，支持左派，强调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的方针。另一方面，他们却把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者、叛徒封成"坚定的左派"，加以包庇。他们用这种手法，企图长资产阶级右派的志气，灭无产阶级左派的威风。他们对无产阶级充满了恨，对资产阶级充满了爱。这就是提纲作者们的资产阶级的博爱观。

(九) 正当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一场新的激烈斗争刚刚开始，而且许多方面、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始参加斗争，**或者虽然已经开始了斗争，但是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提纲却反复强调斗争中要所谓"有领导"、要"谨慎"、要"慎重"、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这些都是要给无产阶级左派划许多框框，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要给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一句话，迫不及待地要刹车，来一个反攻倒算。提纲的作者们对于无产阶级左派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文章，已经发表的，他们极端怀恨，还没有发表的，他们加以扣压。**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十) 当前的斗争，是执行还是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文化革命的路线的问题。但提纲却说，"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指'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道路"。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早已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给我们无产阶级开辟了道路。提纲却认为毛泽东思想还没有给我们开辟道路，而要重新开辟道路。提纲是企图打着"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这个旗帜作为幌子，开辟一条同毛泽东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

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个通知，可以连同中央今年二月十二日发出的错误文件，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请他们展开讨论，究竟那一个文件是错误的，那一个文件是正确的，他们自己的认识如何，有那些成绩、有那些错误。

(原载 1967 年 5 月 17 日《人民日报》)

〔原件附件〕　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一九六五年九月至十月间

毛主席早就觉察到吴晗的问题，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问题。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主席在中央常委会议上（有各大区同志参加），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问彭真同志，吴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彭真同志回避问题的实质，只回答说，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这件事直到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以前，彭真同志对康生等同志都没有说过。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彭真同志在文化部召集的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多次指名攻击毛主席。他还说“在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的，管你是党中央的主席也好”。他还用“错误人人有份”的口号来打击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

两天后，陆定一同志也在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大反斯大林。

十一月十日

上海市委根据毛主席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指示，加紧准备了批判吴晗的文章。《文汇报》于十一月十日发表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指出，《海瑞罢官》鼓吹“单干风”、“翻案风”，是毒草。

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六日

上海《解放日报》、浙江《浙江日报》、山东《大众日报》、江苏《新华日报》、福建《福

建日报》、安徽《安徽日报》、江西《江西日报》先后都转载了姚文。

十一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

北京各报刊，在十八天内，都未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各报刊多次请示是否可以转载，彭真同志和中宣部都不让转载。彭真同志还在许多场合，责备上海市委发表姚文元同志文章不打招呼，"党性到那里去了"。

姚文发表后，《北京日报》社长范瑾同志曾两次询问《文汇报》负责同志，摸姚文元文章的"背景"。

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

上海市委因北京各报都不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即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将姚文印成单行本。二十四日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新华书店征求订购数字，大多数地方都有复电。北京新华书店奉命不复，电话询问也不表示意见，直到二十九日，才复电同意。

十一月二十八日

在周恩来同志的督促下，彭真同志被迫在人大会堂西大厅开会，讨论北京报纸转载姚文元同志文章的问题，有北京市委的同志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许立群、姚溱等同志参加。彭真同志一到，就问"吴晗现在怎样？"北京市委书记邓拓说，"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彭真同志大声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是狂妄地露骨地反对毛主席。

十一月二十九日

《文汇报》发表一个版的读者来信，要求开展《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

《解放军报》转载姚文，编者按语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

《北京日报》转载姚文。但该报编者按语不表示支持姚文，反而强调对《海瑞罢官》这出戏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

十一月三十日

《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栏转载姚文。编者按语按照彭真同志的意见，只把这个问题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并且强调"即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没有表示支持姚文元同志文章。按语的最后一段，引用毛主席的话，指出对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要进行斗争。这是周恩来同志加的。

十二月二日

《光明日报》转载姚文，比《北京日报》迟了三天。这是根据姚溱同志转达的彭真同志的意见，说不能同时转载，以免震动太大。

十二月六日

《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时报道全国各报转载姚文元文章的情况，登载了《解放军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的编者按语，按发表先后把《解放军报》的编者按语登在前面。彭真同志对此极为不满。

十二月八日

《红旗》发表戚本禹同志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批评了以翦伯赞、吴晗为代表的反动的历史观，但没有指名。

十二月十二日

《北京日报》、《前线》发表邓拓的文章，署名向阳生，题为《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企图把对吴晗的批判，从政治问题拉到所谓道德继承的"学术"问题上去。这篇

文章是在彭真同志亲自指导下写的，最后由彭真同志亲自修改，经过北京市委书记处传阅定稿。

十二月十四日

彭真同志在国际饭店开北京市委工作会议时，把吴晗找去，对他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直接向吴晗示意，给他撑腰，要他坚持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

十二月二十一日

毛主席同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等同志谈话中指出：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的，原来打算开半个月，会议快结束了，彭德怀跳了出来。他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四十天的娘，我骂你们二十天的娘还不行！他就是要骂娘的。

十二月二十二日

毛主席同彭真、康生、杨成武等同志谈话，又讲了前一天同陈伯达等同志谈的那些意见。毛主席说，要害是“罢官”，我们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彭真同志立刻辩解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掩盖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

十二月二十三日

彭真同志要求单独同毛主席谈话。谈话后，彭真同志故意造谣，说毛主席赞成他的所谓“放”的方针，还造谣说，吴晗问题要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以后再谈政治问题。彭真同志造的这个谣，在许多场合散布过。

十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

上海市委同志向彭真同志汇报情况，谈到姚文元的文章是根据九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毛主席指示发表的，彭真同志未置可否。他说对姚文元的文章也要“一分为二”。彭真同志讲了他的所谓“放”的方针，还说吴晗问题要作为学术问题讨论。彭真同志批评上海转载北京各报按语不该把《解放军报》按语放在第一篇，应当把《北京日报》的按语放头一篇。彭真同志还说：吴晗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反右派斗争时都是左派，邓拓是左派，他署名向阳生的文章是我叫他那样写的。

十二月二十七日

《北京日报》发表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这篇文章是假检讨，真反攻。他为了辩解同“单干风”“翻案风”无关，提出了《海瑞罢官》是在《论海瑞》一文的基础上写的，而《论海瑞》是根据庐山会议精神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这就自己暴露了自己的要害。《北京日报》急忙发表，却不加按语，实际上是对吴晗的支持。这是彭真同志从上海打电话催着要这样发的，还要《人民日报》转载。

十二月二十九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宣部主持写的署名方求的文章，题为《＜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这篇文章关于“清官”问题的观点是很错误的。

十二月三十日

《人民日报》转载了吴晗的所谓《自我批评》，加了一个编者按语。这个按语没有一句话

揭露吴晗的所谓“自我批评”的实质。这是彭真同志决定的。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

彭真同志召集了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的有关负责同志三十多人参加的会议。首先由胡绳同志传达毛主席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他在传达时，有意隐瞒了毛主席指出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康生同志说，毛主席讲了要害问题是罢官，庐山会议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吴晗六月写了《海瑞骂皇帝》，九月写了《论海瑞》，年底，也就是彭德怀罢官以后，开始着手写《海瑞罢官》。彭真同志讲话强调要所谓“放”，说扯得越宽越好。他批评《解放军报》的按语中指出吴晗《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妨碍了放”。他说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说，先搞学术。他还攻击上海，说他们只批评《海瑞罢官》，而对《海瑞上疏》不作检讨。实际上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已经批评到了《海瑞上疏》。《海瑞上疏》的创作，是周扬同志亲自向上海京剧院布置的。

陆定一同志在会上攻击上海发表姚文元同志文章没有同他打招呼。他还说，要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搞。他还在其他场合说，姚文元的文章，要是没有最后一部分（指揭露《海瑞罢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就好了。陆定一同志的基本观点，同彭真同志是一致的。

一月六日

上海市委发出《关于讨论<海瑞官罢>问题的通知》，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重视这场大辩论，加强领导。八日，召集全市党员干部会议，讲了要害问题是罢官，要求发动全党、工农兵群众参加讨论，从大辩论中提高认识，培养队伍。

一月八日

姚溱同志把一九六二年《宣教动态》八十八期刊登的庆云（即关锋）的一篇杂文《从陈贾说起》，送给彭真同志，为彭真同志整关锋同志提供材料。

一月九日

彭真同志批发《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故意隐瞒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部分。

一月十三日

《人民日报》刊登思彤（即王若水）的文章，题为《接受吴晗同志的挑战》。这篇文章提到要害是罢官，提到庐山会议。这篇文章发表几天以后，许立群同志责问，为什么要讲庐山会议和要害问题？

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

关锋同志和戚本禹同志的两篇批判吴晗《海瑞罢官》要害问题的文章写成。这两篇文章都送给了中宣部，一直被他们压着。

一月十七日

许立群同志召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前线》、《新建设》六个编辑部的同志开会。他在会上说，根据彭真同志的指示，要把三报三刊的学术批判管起来，稿件和版面要审查，《红旗》先不要搞。他强调要“放”，把“放”同讲要害问题对立起来。不同意先集中搞《海瑞罢官》问题，要同时讨论历史人物评价，历史剧，道德继承等问题，说要“有领导地造成‘一场混战’”。

在这个会上，北京市委《前线》杂志的同志说，根据市委的意见，他们不打算再发表批评吴晗的文章，只准备将来转载带结论性的文章。

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

戚本禹同志打电话问许立群同志，批判吴晗政治要害问题的文章可否发表？许立群同志答复：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别人还有，现在都不能发表。

关锋，戚本禹同志又把他们攻要害的文章送给彭真同志审查，彭真同志叫他的秘书打电话说，彭真同志工作很忙，最近要下乡，没有时间看文章。

一月三十一日

彭真同志要许立群同志马上把攻击左派、包庇右派的材料送给他。许立群同志立即送去了。

二月二日

江青同志根据林彪同志的委托，邀请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四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的若干问题，开始进行座谈。

二月三日

彭真同志召集五人小组扩大会。会上发了七个攻击左派、包庇右派的材料。

会上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意见。

一种以彭真同志为代表，他们大肆攻击关锋等左派同志。彭真同志说，左派也要整风，不要当"学阀"。他还说，已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彭真同志还要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和北京市委书记郑天翔同志证明，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长期以来是坚定的。彭真同志说，为了"放"，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象郭沫若这样的人都很紧张了，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陆定一同志在会上又大反斯大林一通。

另一种意见以康生同志为代表，指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同吴晗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要分清阶级界限，要保护关锋等左派同志，依靠他们组织我们的学术批判队伍，要把斗争的锋芒针对吴晗，要揭露吴晗的政治问题、要害问题，要联系庐山会议的阶级斗争背景来谈。康生同志批评许立群同志不收集吴晗的材料，专门收集左派的材料。

会后，彭真同志要许立群同志和姚溱同志起草"汇报提纲"。

二月四日

许立群同志和姚溱同志，根据彭真同志自己的意见，在钓鱼台关起门来制造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谁也不许进去，谁也不让知道，连对同住在一个楼里的所谓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吴冷西两位同志也严密封锁，不透露一点消息。

二月五日

政治局常委开会。临开会前，彭真同志把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送给常委。上面写着："此件因时间匆促，来不及在五人小组传阅和商酌。"在会上，叫不是"五人小组"成员的许立群同志口头汇报情况，彭真同志插了一些话，没有读"提纲"，没有提出"提纲"中的关键问题请常委讨论，也没有说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发给全党。

二月八日

彭真等同志向毛主席汇报。彭真同志采取了欺骗常委的同样手法，叫许立群同志向毛主席汇报，然后彭真同志说了一些话。在汇报过程中，毛主席的意见同彭真同志的意见是完全对立的。毛主席一向认为，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这次，毛主席又当面问了彭真同志两次，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彭真同志事后却故意歪曲，说毛主席认为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同志否定解放以后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各次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他认为这些批判都是虎头蛇尾，

没有结论，他说这次要做政治结论。毛主席明确地反对和批驳了这种意见，指出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绝不是匆促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这里也就戳穿了彭真同志假造说毛主席主张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的话，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当彭真同志说到，要用"整风"的方法整左派的时候，毛主席立刻反驳，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当许立群同志攻击关锋同志的杂文时，毛主席明确地顶了回去，说："写点杂文有什么关系。""何明（即关锋）的文章我早就看过，还不错。"

这一系列的问题，都说明毛主席是不赞成这个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但是，彭真同志根本不理睬毛主席的指示，滥用职权，搞了一个中央的批语，把这个"提纲"变成了中央的正式文件。这个批语没有送给毛主席审阅，而彭真同志竟然用欺骗手法，打电话告诉常委同志，说文件已经毛主席同意，火速发给全党。

二月十二日至十四日

彭真同志对上海市委的同志说，"汇报提纲"是常委讨论过，毛主席同意了的，问题都解决了，也不需要跟你们谈了。上海市委的同志提出："提纲"中"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等还需要研究。十三日，彭真同志指定胡绳同志同张春桥同志谈话。胡绳同志说，不能讲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能联系庐山会议，并且硬说是毛主席的意见。胡绳同志说，这是彭真同志要他这样讲的。

二月十八日

许立群和胡绳同志在北京召集学术界和各报刊负责同志传达"汇报提纲"。他们根本不传达毛主席反对他们收集左派材料、反对对左派进行"整风"、反对他们要仓促做政治结论的指示，讲了一套同毛主席指示完全对立的错误意见。他们继续包庇吴晗，不准讲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问题，不准把《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他们对抗毛主席的保护左派、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的方针，继续打击左派，把锋芒针对着左派。

传达后分组讨论，邓拓被指定为第一小组的召集人。

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

北京听传达的同志正在讨论的时候，彭真同志带着许立群和胡绳同志到三线参观去了。许立群同志在临走前说，问题已经解决了，让他们讨论讨论就行了。

三月一日

在许立群同志指定专人整理并以他自己的名义发出的《学术批判问题座谈会讨论简况》中，吹嘘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学术界兴无灭资的纲领性文件"，是"思想斗争的二十三条"，"总结了过去学术批判和讨论的经验"，"中央这样直接地抓学术问题，过去还不多，说明中央很关怀，并且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三月二日

《红旗》发表尹达同志的文章，题为《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这篇文章被中宣部压了一年半。

北京市委叫吴晗当了四清工作队员，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了怕暴露是吴晗，化名为"老李"。

三月十一日

许立群同志向彭真同志汇报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同志请示"学阀"是否有所指，彭真同志叫许立群同志给杨永直同志打电话，就说我彭真说的：第一，学阀没有具体指是什么

人，是阿Q，谁头上有疮疤就是谁。第二，问上海发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个招呼。在讲这两点的时候，彭真同志又怒气冲冲地说，上海市委的党性那里去了！

三月十二日

《光明日报》发表穆欣同志的文章，题目是《评<赛金花>剧本的反动倾向》。这篇文章，被中宣部压了一年又四个月。

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

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专门就学术批判问题讲了话。讲话中指出，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年青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注：中央农村工作部一九六二年被解散）。

三月二十五日

《红旗》发表戚本禹、林杰、阎长贵的文章，题目是《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

三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三十日

毛主席同康生同志谈了两次话，然后又同康生、赵毅敏、魏文伯、江青、张春桥等同志谈了一次话，批评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指出这个提纲是错误的。毛主席说，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毛主席提出，扣押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毛主席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毛主席要求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批评彭真同志、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对于三月十一日彭真同志叫许立群同志给杨永直同志打电话的问题，毛主席要彭真同志向上海市委道歉。

三月三十日

中央军委批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并报中央和毛主席审批。

三月三十一日

康生同志向周恩来同志和彭真同志详细地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彭真同志说，他没有包庇吴晗，只是主张"放"，"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可以修改一下。他顽固地抗拒毛主席的批评。

四月一日

彭真同志在深夜向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同志打了两次电话，不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向上海市委道歉，而是编造一套谎言，抵赖和掩饰自己的错误，推卸责任。

四月二日

周恩来同志报告毛主席，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指出“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准备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毛主席的指示。

彭真同志向毛主席作了简单空洞的表示，没有任何具体内容，只说“在这一方面确有严重错误和缺点”。他强调所谓“这一方面”，就是说，他在“这一方面”以外的各方面都是正确的。

《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题目是《<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这篇文章被彭真、许立群同志压了两个半月。

四月三日

总政治部刘志坚同志根据彭真同志的意见，于三月三十一日，代中央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起草了一个批语。这个批语送给彭真同志后，刘志坚同志感到太一般化，于四月三日又代中央起草了第二个批语，增加了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重要性，毛主席一向十分重视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文艺思想是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方向等重要内容。新的批语于四月四日送给彭真同志，被他压下了，没有采用。

四月三日

彭真同志召开北京市委常委会，掩饰自己的错误，继续包庇邓拓，布置对抗中央。

四月五日

彭真同志召集十几个人开会，他在会上说：他在合作化、工商业改造、农村工厂四清、国际反修等方面，都不是落后分子，唯独在学术方面是落后分子。他说，这是因为上学迟，知道的情况少。他还说，他的严重错误在于“放”，想再放出几个吴晗来，结果是幻想。他还提出要取消清规戒律，不要受任何束缚，烧着谁就是谁。又说，吴晗问题已经差不多了，到定案的时候了。

《红旗》杂志发表关锋、林杰同志的文章，题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这篇文章也被彭真、许立群同志压了两个半月。

四月七日

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同志在全国创作会议上作报告，在中央尚未正式批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之前，全面地剽窃了《纪要》的内容，并且作了严重的歪曲，为所谓三十年代的错误的文艺路线辩护。

四月九日至十二日

邓小平同志主持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同志参加。先由康生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然后，彭真同志作了几句形式主义的表态，夸耀他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反对毛主席，实际上却继续顽固地抗拒毛主席的批评。康生同志系统地批评了彭真同志在这次学术批判中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陈伯达同志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从政治路线方面批评了彭真同志的一系列严重错误。

最后，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指出，彭真同志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

这个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

四月十日

中央批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注：中央的第

一次批语已经撤销，另换了一个新的批语)。

四月十日到十五日

彭真同志连续召集北京市委常委开会，匆匆忙忙地要所属各级党组织进行所谓对吴晗、邓拓、廖沫沙的批判，用假积极来掩护他们包庇坏人的错误。

彭真同志背着中央，把中央的《通知》草稿交给北京市委的同志传阅，这是违背党的纪律的。

四月十六日

毛主席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同志的错误，撤销所谓《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等问题。

四月十六日

在彭真同志直接指挥下，北京市委在《北京日报》上，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了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个人的材料，并且加了一个《北京日报》和《前线》的编者按语。这个毫无自我批评、别有用心的按语，内容和分寸，都是彭真同志具体规定，并且由他最后定稿，下令在十六日见报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总社当天广播了这个按语。当晚新华总社通知撤销。

四月十八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第二天，全国各报转载了这篇社论。

四月十九日

中央书记处通知首都各单位：

(一)《北京日报》十六日的编者按语和材料，因为北京市委毫无自我批评，首都各报都不要转载。各报按原订计划发表学术批判文章。

(二)各高等院校、各机关、各基层单位，停止执行北京市委布置的那种制造混乱的措施。

四月二十四日

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基本上通过了中央的《通知》草稿，提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五月四日

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四同志的错误问题。

五月四日

《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

五月九日

《解放军报》发表高炬同志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

《光明日报》发表何明同志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

《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一批材料：《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

五月十日

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评"三家村"》。

第二天，全国各报刊转载了这篇文章。

五月十一日

《红旗》发表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五月十四日

《人民日报》发表林杰同志的文章：《揭破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

五月十六日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通知》。

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节录）[①]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现将中央工作小组四月三十日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转发给你们。中央同意这个报告。

中央认为，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用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

中央认为，这次小组会议开得很好。贯彻执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摆事实，讲道理，对罗瑞卿同志进行了耐心教育和严肃批判。罗瑞卿同志不仅不认真检讨自己的错误，反而于三月十八日跳楼自杀（受伤），走上了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鉴于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极端严重，中央决定停止罗瑞卿同志的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以后再提请中央全会决定。

为了教育干部，吸取教训，并肃清罗瑞卿同志错误的影响，中央决定，将中央工作小组的报告和中央的批语，发到县委和团级党委。

〔附〕 铁骨忠魂——罗瑞卿同志遭受林、江反革命集团陷害记实

《人民日报》记者　胡思升

“愿君知我心，何畏遮天云。太阳终归出，一样照人行。”罗瑞卿同志在遭受屈辱和不幸时写下这样的诗句，绝不是偶然的。

第二审判庭审理林彪、叶群、吴法宪、黄永胜、李作鹏、康生、谢富治串通一起，陷害罗瑞卿一案时所揭示的桩桩事实，使不了解真相的人们第一次接触到当时来势汹汹的“遮天云”，也使一向敬重罗瑞卿同志的人们更懂得将军忠于人民的赤子之心。

---

① 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罗瑞卿同志平反的通知》。

乌　云　袭　来

当陷害的乌云开始向罗瑞卿同志袭来的1965年，这位一生戎马倥偬的将军的职务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显然，这是林彪篡军夺权所必须逾越的重要障碍。林彪一伙开始了软硬兼施的试探。罗总长面临着考验：要么向林彪投靠，这样虽可以暂时保留个人的名位，但却上了贼船；要么坚守党托付的阵地，卫护必须卫护的原则，这就会成为奸臣的眼中钉。二者必居其一。

忠贞的将军迈出了勇敢的步伐。他不同意林彪"突出政治"的提法。一支军队，不着重抓军事，还算什么军队?! 他不同意林彪"最高最活"和"顶峰"的说法。难道有"次高次活"？有了"顶峰"，都到顶了，思想怎么发展?! 等等，等等。

矛盾激化了。林彪，还有那个叶群，下决心除掉罗瑞卿，为夺取全部军权扫清道路。

吴　法　宪　上　贼　船

整人，需要打手。整倒罗瑞卿，需要职位高的打手。林彪、叶群看中了吴法宪，当时的空军司令员。

由于林彪的地位当时还没有后来充当"副统帅"那样显赫，叶群怕吴法宪临阵动摇，施展了软硬两手。

先是硬的一手。

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你要彻底揭发罗瑞卿在空军的活动。你听到刘亚楼生前对罗瑞卿有什么意见要讲。"这是明显的示意、出题目。接着又说："林总讲，你是跟罗长子（注：指罗瑞卿），还是跟林总?"

听话听音。吴法宪以为正在高升的林彪对他不完全信得过，马上表忠心："我当然是跟林总。跟罗瑞卿不是往邪路上走吗？请你告诉林总，我一定跟他。你们可以看我今后的行动。"

还有软的一手。

叶群又告诉吴法宪："林总已经把你的级别由六级调升至五级。"

此时此刻，吴法宪已经心甘情愿地上了林彪的贼船，不惜要踩着罗瑞卿同志的躯体往权力的顶峰攀登。

死　无　对　证　的　"四　条"

两个人谈话，一个人后来死去，谈话的内容就死无对证了。叶群就利用这个死无对证，做了一篇狠毒的陷害文章。

1965年底和1966年初，叶群两次召见吴法宪，向他口授和书写了所谓罗瑞卿要刘亚楼（前空军司令员）转告叶群的"四条意见"，内容是：

一、林彪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的，不出也要出，现在不出，将来也要出政治舞台的；

二、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

三、今后林彪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罗总长去管好了；

四、一切由罗去管，要放手叫他去管。

明眼人一听便知，林彪是当时的国防部长，如果罗瑞卿真的讲了这四条，那就确有伸手夺军权之意。

叶群叫吴法宪拿这"四条"去放一颗"原子弹"。

吴法宪遵命，从1965年底到1966年3月，发了两次言，写了一封信，一口咬住罗瑞卿讲了"四条"，因而"充分说明罗瑞卿向党伸手和夺取军权的野心。"

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少奇、恩来、小平同志，对吴法宪的揭发没有表态。有人提出怀疑，说这是死无对证啊！因为刘亚楼已于1965年5月去世。

连环的伪证

愚蠢的吴法宪有点慌了手脚。叶群出主意，叫吴法宪去逼刘亚楼的遗孀翟云英作证。

翟云英正因失去丈夫处在恍惚之中，表示没有听说所谓"四条"；在胁迫之下，据说只承认她看见刘亚楼临死前伸出四个指头。吴法宪捞住这根稻草，叫秘书代翟云英写了个证明，由吴法宪同翟一起签名上送。

叶群怕露了马脚，同吴法宪统一口径说：如果有人问起翟云英为何和吴法宪一起写证明，就说翟经常去罗瑞卿家，现在罗出了问题，告诉了她，才写的。

叶群编造了伪证，又编造了伪证的伪证。

她还推出旁证，授意李作鹏也凭空诬告罗瑞卿"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有阴谋活动，想占领海军这个阵地"，等等。

如此严重的诬陷、造谣和诽谤，象一盆盆污水向将军泼来。有口难辩，遭到暗算而无法还手的冤屈和痛楚使将军难以自制。

人身的摧残

"文革"开始后，周恩来总理指示吴法宪，把罗瑞卿同志安排到空军总医院，妥加保护。

吴法宪马上密报叶群。叶群答复说："不行！你反对罗瑞卿，你又包藏罗瑞卿，你怎么交代？"吴法宪于是寻找各种借口，一会儿说空军总医院没有合适的房子，一会儿说医院靠近公路不安全，欺骗周总理，拖延时间。就这样，轮番的批斗，人格的侮辱，肉体的摧残，无休止地冲击着罗瑞卿同志。

康生、谢富治也煽风点火，公开宣称罗瑞卿"里通外国"，是"内奸"，还是"假党员"。

狂风暴雨，越发坚定了罗瑞卿同志同混在党内的敌人作韧性斗争的信念。"要活下去"，才能使党和人民"知我心"，才能看到驱散"遮天云"之后的日出。越是有人盼他快快死去，罗瑞卿同志越发觉得他的生命是有意义的。

为了这个目的，1968年6月，罗瑞卿同志要求在腿部动手术。8月3日，罗瑞卿专案组把这一要求上报叶群、江青、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五个人。

8月4日上午，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罗瑞卿动手术问题，林彪不同意，要推迟进行。林彪说，罗瑞卿现在没有搞出什么材料，要抓紧审问和斗争，搞出材料来。……如果手术后不好，什么材料也不能写了。"

推迟动手术，是一种折磨，也是一种威胁。

将军左腿上的伤口化脓，不肯愈合。"你说吧，你篡军反党，你组织反党集团，你勾结特务，说了，就给你治腿，就让你舒服"。

将军用沉默代替回答。

一天24个小时，把将军拖出来，拖进去，车轮战，精神战，都用上了。他日益虚弱的

身体发高烧，半夜里拖着双腿、扶着墙上厕所，看守嫌动作慢，又推了一把，将军跌倒在水泥地上，大腿骨跌断了。

不得不动手术了。在手术台上，原来可以接好的股骨头被摘除了，这样，将军的左腿失去了安装假肢的可能。魔鬼们是多么害怕将军挺直地站立起来啊！

谁 笑 到 最 后

盛极一时的株连危及罗瑞卿同志的夫人郝治平、她的父母和她的7个孩子。

郝治平，16岁投奔延安，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深重的冤屈。1966年下半年被关进监牢，在狱整整6年。

1968年初，农历年三十夜，罗瑞卿的儿子罗宇，也被抓走坐牢，一坐就是5个春夏秋冬，其他的子女，也受尽了各种折磨、侮辱和艰辛。

1973年底，罗瑞卿同志初步获得人身自由之后，曾对子女说："一个共产党员，这么多年不能为党工作，还要受人无端的打击和诬陷，内心是太痛苦了。这些年，我已经几乎不会笑了……。"

历史有情。如果将军九泉有知，今天听到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们绳之以法的讯息，定会浮现出美好、宽慰的笑容！

唯一使人难以平静的是，将军的劫后余生，结束得过早了！

铁骨忠魂啊，罗瑞卿将军！异乎寻常的考验表明，您是同林彪、江青这伙窃国大盗作斗争的坚定战士。

(原载1980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上午)

林 彪

本来是常委其他同志先讲好。常委同志们让我先讲，现在我讲一点。我没有写出稿子来，凭口来讲，有些材料念一念。

这次是政治局扩大会。上次毛主席召集的常委扩大会，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这一次继续解决这个问题。罗瑞卿的问题，原来已经解决了。陆定一、杨尚昆的问题，是查地下活动揭出来的，酝酿了很久，现在一起来解决。四个人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有共同点。主要是彭真，其次是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他们几个人问题的揭发、解决，是全党的大事，是保证革命继续发展的大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的大事。这是使中国前进的重大措施，是毛主席英明果断的决策。

这里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迭打”。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取政权来改变，靠夺取政权来巩固，靠夺取政权来发展。否则，是经济主义，是叫化子主义，是乞求恩赐。无产阶级拿到了政权，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一下子就可以打倒，无产阶级就有了一切。所以，无论怎样千头万绪的事，不要忘记方向，失掉中心，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政权是甚么？孙中山说是管理“众人之事”。但他不理解，政权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反革命是这样，革命也是这样。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当然，政权的职能不仅是镇压。无产阶级的政权，还要改造农民，改造小私有者，搞经济建设，抵御外部侵略，职能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是镇压。社会上的反动派，混进党内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都要镇压。有的杀头，有的关起来，有的管制劳动，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撤职。不然，我们就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权的根本观点，我们就要丧失政权，就是糊涂人。

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个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领导机关。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改变政权，大概是这样，一种是人民革命，从底下闹起来，造反，如陈胜吴广、太平天国、我们共产党，都是这样。一种是反革命政变。反革命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有的是上下相结合，有的和外国敌人颠覆活动或者武装进犯相结合，有的和天灾相结合，大轰大闹大乱。历史上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一九六〇年以来，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在亚非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先后发生六十一次政变，搞成了的五十六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八次，留当傀儡的七次，废黜的十一次。这个统计是在加纳、印尼、叙利亚政变之前。六年中间，每年平均十一次。

马克思主义者是唯物主义者，在任何时候都是重视现实的。我们不能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别的事情搞得热热闹闹，忘了这件事，看不见本质问题，就是糊涂虫。不警惕，要出大乱子。

我们过去几十年来，解放以前，想的做的就是夺取政权。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已经夺取了政权，许多同志就不大注意政权本身的问题，只是搞建设，搞教育，对付蒋介石、对付美国，没有想到夺取了政权还可能丧失政权，无产阶级专政还可以变成资产阶级专政。在这个消极方面，我们，至少是我，没有去多想这个问题，更多想到的是打仗、发生战争的问题。从大量的事实看，是要防止内部颠覆，防止发生反革命政变。道理很简单，很多事情要靠大量事实才能加深印象，才能认识。人的认识规律就是从感性到理性。

从我国历史上来看，历代开国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

周朝建立以后，不久就发生了叛乱，到春秋战国就大乱了。“春秋无义战”，各国互相颠覆，内部互相残杀。楚成王的儿子商臣，以卫兵包围王宫，逼成王自杀。成王好吃熊掌，要求让他吃了熊掌再死，企图拖延时间，以待外援。商臣不许，说“熊掌难熟”，成王被迫立即自杀。吴国公子光派专诸刺杀了王僚，夺取了政权。晋献公、齐桓公、齐懿公当政前后，多次发生政变杀人。春秋战国这类事太多了，我就不说了。除了相砍相杀夺取政权外，还有用其它阴谋诡计掌握实权的。例如，吕不韦送怀孕的赵姬给秦庄襄王，生了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秦始皇统治的初期，实际上政权落到吕不韦的手里。

秦朝三代共统治了十五年。秦始皇只有十二年就死了，以后赵高捧出秦二世当皇帝，秦二世把他的兄弟姐妹杀了二十六人。

汉高祖在位十二年，后来吕后专政，夺取了刘家的政权。周勃、陈平勾结起来，又把吕家搞掉了。

晋朝司马炎统治了二十五年，以后爆发了八王之乱，出现了相互残杀的局面。

南北朝的时候，为争夺政权，互相残杀的事就更多了。

隋文帝在位二十四年，就被隋炀帝杀了，儿子杀老子。有一出戏叫《御河桥》，就是杨广杀父，还杀了他的哥哥杨勇。

唐朝李世民兄弟相杀，争夺皇位。李世民杀了他的哥哥建成、弟弟元吉，即玄武门之变。

宋朝赵匡胤，在位十七年，被他的弟弟赵光义杀了。“烛影斧声，千古之谜”。有一出京戏叫《贺后骂殿》，讲了这件事。

元朝忽必烈，统治中国十六年，他的儿子铁木耳在位十三年，皇族争位。大乱，两宫相争，一个是皇孙，一个是皇后，也是夺权杀人。

明朝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他的四子燕王棣，带兵打朱元璋的孙子建文帝，相杀三年，南京的王宫被烧，建文帝是烧死了还是跑了，弄不清楚，后来还派人到外国去找。

清朝统治中国不久，到康熙晚年，他的儿子们为了争夺政权，互相残杀。传说康熙病时遗诏“传位十四子”，雍正改为“传位于四子”。据说康熙是喝了雍正送去的“人参汤”死掉的。雍正夺取了政权后，还把他的好多弟兄都杀死了。

辛亥革命，孙中山当了大总统，三个月就被袁世凯夺去了政权。四年后，袁世凯做了皇帝，又被人推翻。此后，军阀混战十几年，两次直奉战争，一次直皖战争。蒋介石，正是靠篡夺军权、党权、政权，发动反革命政变上台的，对革命人民进行了大屠杀。

这些历史上的反动政变，应该引起我们惊心动魄，高度警惕。

我们取得政权已经十六年了，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会不会被颠覆，被篡夺？不注意，就会丧失。苏联被赫鲁晓夫颠覆了。南斯拉夫早就变了。匈牙利出了个纳吉，搞了十多天大灾难，也是颠覆。这样的事情多得很。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难道没有事情，无缘无故这样搞？不是，有很多迹象，“山雨欲来风满楼”。《古文观止》里的《辨奸论》有这样的话：“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坏事事先是有征兆的。任何本质的东西，都由现象表现出来。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有很多现象，很多材料，我在这里不去详细说了。你

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混到我们党内，混到党的领导机关，成为当权派，掌握了国家机器，掌握了政权，掌握了军权，掌握了思想战线的司令部。他们联合起来搞颠覆，闹大乱子。

罗瑞卿是掌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罗长子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扬尚昆。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关，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相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军队，不论是会场上的政变，战场上的政变，他们都有可能搞得起来。大大小小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大大小小的"三家村"，不少哩！毛主席说，十六年来，思想战线我们没有去占领。这样下去，人家就会不投我们的票，不投毛主席的票，而投他们的票。打起仗来，人家就会跟他们走，拿起枪来打我们。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所以很值得我们注意，思想上不能麻痹，行动上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防患于未然。要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定时炸弹、地雷，事先发现，挖掉。不然，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生反革命政变，或者遇到天灾，或者发生战争，或者毛主席百年之后，这种政治危机就会来了，七亿人口的大国，就会乱起来。这是很大的问题。

当然，还是两个前途。他们的阴谋，不一定能得逞，不一定能胜利，不一定能实现。因为我们的党是毛主席领导下几十年革命的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不是幼稚的党，是成熟的党。我们的党，紧紧地掌握着枪杆子，始终没有离开过枪杆子，没有搞过甚么议会活动，和欧洲的党是不同的。我们的党，是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血肉相联的，是有长期的革命传统的，是有丰富的革命经验的。

整个形势是大好形势，世界是大好形势，中国也是大好形势。他们想得逞，是不很容易的。他们可能得逞，也可能失败。如果我们不注意，大家都是马大哈，他们就会得逞。如果我们警惕，他们就不能得逞。他们想杀我们的脑袋，靠不住！假使他们要动手，搞反革命政变，我们就杀他们的脑袋。

任何时候，不管形势多么好，总有阴暗的一面。形势好的时候，要看到坏的一面。如果没有坏的一面，好就不成其为好。好之所以为好，是有坏。坏之所以为坏，是有好。

现在毛主席健在，我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毛主席已经七十多岁了，身体很健康，可以活到一百多岁。

正因为形势好，我们不能麻痹，要采取措施，防止发生事变。有人可能搞鬼，他们现在已经在搞鬼。野心家，大有人在。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想推翻我们无产阶级政权，不能让他们得逞。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他们是假革命，他们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假毛泽东思想，他们是背叛分子。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他说他不知道他老婆的事！怎么能不知道？罗瑞卿就是一个。彭真手段比他们更隐蔽更狡猾，使人家不容易看出来。他冒充拥护毛主席，他在晋察冀是百分之百的王明路线，比王明路线还王明路线，超王明路线。一九三八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路线，他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他还把蒋介石说成是"最有政治眼光的人"，"要竭诚的拥护蒋委员长。"他说，"抗战最坚固的中心是蒋委员长。"他还

说，"国共两党之间，要互助互爱互让，反对利用困难，与政府（即国民党政府）为难。"他在延安装着反对王明路线，到东北又搞王明路线。彭真在东北拒不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炮火连天的时候，他幻想和平，幻想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没有战争打算，幻想在谈判桌上取得胜利。他没有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味道，不搞阶级斗争。他不把重点放在农村，不把干部和主力派到农村去建立根据地，恋恋不舍大城市，不愿意离开大城市。撤出沈阳，还赖在郊区不走。搬到本溪，搬到抚顺，又搬到梅河口，不肯在农村安家，不准备打，只准备和。在东北，他想把主力孤注一掷，和敌人硬拼，以军事上的冒险主义掩盖他政治上的投降主义。他借口照顾山头，实际上是培植他个人的实力。他不注意补充主力，只是从散兵游勇中收编和建立一些地方部队，，后来这些部队都叛变了，成了"座山雕"。他说反山头，就是他在搞山头、招降纳叛，搞他自己的军队，搞小圈子，搞"桃园三结义"。北京市水都泼不进去，针也插不进去。党内搞党，党内搞派。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同志都有感觉，我也有感觉。

不少人挂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毛泽东思想的招牌，实际上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们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实际上是反共分子。这次揭露是党的伟大胜利，不揭非常危险。再让他们搞下去，就可能不是党揭露他们，而是他们要"审判"党。

我们的社会还是建立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一切剥削阶级是打倒了，但是没有完全消灭。我们没收了他们的物质，但是不能没收他们的反动思想，把他们关起来也没法没收他们的脑袋。他们是想复辟的。他们在整个人口比例上占很少数，但是他们政治上的能量很大，他们的反抗力量比他们的人口比例大得多。城乡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不断地生长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工人当中，也掺杂一些复杂成份。党和国家机关有些人腐化。加上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包围和颠覆活动。这些，使我国产生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种危险是综合的，各种反动力量是互相联合的。国内国外，国内是主要的。党内党外，党内是主要的。上层下层，上层是主要的，危险就是出在上层。苏联出了赫鲁晓夫，全国就变了颜色。

现在，我们把剥削阶级打倒才十六年，他们的人还在，心不死。地主把他的地契还秘密保存起来。被推翻的地主和资产阶级，随时都在梦想恢复他们的天堂。他们的枪杆子被缴械了，他们的印把子被夺过来了。但是，他们在思想文化阵地上还占有相当的优势。他们拼命利用这种优势到处放毒，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准备。当前正在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资产阶级阴谋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它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和将来面貌的头等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头等大事。

我们一定要严重注意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重要问题，不要忘掉这个问题，而要念念不忘。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然的话，就是糊涂虫。不要在千头万绪、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丧失警惕性，否则，一个晚上他们就要杀人，很多人头要落地，国家制度要改变，政权要变颜色，生产关系就会改变，由前进变成倒退。

说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这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是不合辨证法的。那里会没有矛盾呢？一千年、一万年、一亿年后仍然有矛盾。地球毁灭了，太阳熄灭了，宇宙还是有矛盾。不久前，邢台地区发生了地震，自然界也在斗争着，我们总理亲自去处理。太阳黑子增加到一定程度，无线电就发不出去。任何事物都处在矛盾中间，斗争中间，变化中间，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从沙粒到太阳，大到银河系，小到基本粒子，大到宏观世

界，小到微观世界，都充满矛盾。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它的基本点是要批判，要斗争，要革命。无产阶级，只有经过批判、斗争和革命，才能夺取政权，保持政权，推动我们的事业前进。因此，要提高警惕，要斗争，不能存有和平幻想。斗争就是生活，你不斗他，他斗你嘛！你不打他，他要打你，你不杀他，他要杀你。丧失这种警惕性，不团结起来斗争，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全党越团结得好，越要斗争，越有战斗力。但是，绝不同反党分子讲团结，而是批判他们，揭露他们，一直到开除他们出党。不是绝对的团结，而是相对的团结，是批判反党分子、揭露反党分子的团结。

总之，要斗。这次我们斗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他的老婆，还有杨尚昆，是马克思主义的行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行为，是重大的政治措施，是防止反革命颠覆的措施。不然，我们得了天下，要丧失天下，创了业不能守业，我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几十年来为革命前仆后继，无数先烈所流的血，统统付之东流,我们就成为历史的罪人，成为机会主义者。

我们同他们斗，但内部要团结，要以毛主席为中心来团结，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来团结。他们这些家伙的共同点，就是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无论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邓拓、吴晗，廖沫沙等等，都是这样。材料太多了。他们或者明目张胆，或者暗中影射，采取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体裁，不同的手段，恶毒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国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我们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在全国人民面前端出来，同全国人民更广泛地见面，同全国人民更广泛地结合，让毛泽东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促进全国人民思想进一步革命化。我们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揭露各种修正主义，批判揭露各个战线，各个部分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批判揭露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的资产阶级思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样，就能保证我们防止修正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最最根本的关键问题。很多党内的坏家伙，他们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他们是反党分子。陆定一控制的中宣部就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诬蔑这是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他们不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资产阶级思想。不宣传革命思想，宣传反动思想，不是把革命推向前进，而是拉着革命倒退。别人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们就冷嘲热骂，千方百计加以压制，加以攻击，加以反对。

马克思主义者起码应该知道，存在决定意识，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同时，意识又有巨大的能动作用。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毛主席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认识论观点就是这样。我们要很好地运用毛泽东思想，就能大大前进。精神潜力大得很。

几十年来，毛主席经常阐明了精神和物质这两方面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辩证法。毛主席对辩证法运用自如，渗透一切，在每个问题上都体现了辩证唯物论的无产阶级哲学基础。毛主席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毛主席所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多得多。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伟大的人物。马克思活了六十四岁，恩格斯活了七十五岁。他们有很高的预见，他们继承了人类先进的思想，预见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可是他们没有亲身领导过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像毛主席那样，亲临前线指挥那么多的重大的政治战役，特别是军事战役。列宁只活了五十四岁，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六年就去世了。他也没有经历过像毛主席那样长期、那样复杂、那样激烈、那样多方面的斗争。中国人口比德国多十倍，比俄国多三倍，革命经验之丰富，没有那一个能超过。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恩格斯说，十八世纪的天才是黑格尔、圣西门，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他说，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他是天才。列宁也承认天才，他说要有十几个天才的领袖，才能领导俄国取得革命的胜利。毛主席是天才。我们同毛主席那一点不同？一起搞斗争，有些人年龄比他老，我们没有他老，但经历的事也不少。书我们也读，但我们读不懂，或者不很懂，毛主席读懂了。我看到很多人读书圈圈点点，把书都圈满了，证明他没有读懂，不知甚么是中心，甚么是主次。辩证法的核心，毛主席在几十年前就懂了，我们没有懂。他不但懂了，而且还会熟练地运用。从懂到用，有很大的距离，懂了未必会用。打乒乓球，你懂得了规则，你也打不过庄则栋、徐寅生。打仗也一样，你懂一点书本上的军事知识，打的时候不一定能打胜仗。毛泽东思想全部贯串着唯物辩证法。毛主席广泛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能手选为我们的领袖。

人和一般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是能够制造工具的动物。人在劳动过程中，逐步发展自己的头脑，能够去思想。思想是人的最大特点之一。思想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我们应该重视先进思想的作用，重视社会主义时代先进思想的作用，重视毛泽东思想的作用。不重视思想的作用，是庸俗的唯物论，机械的唯物论。在社会主义时代，在财产公有的条件下，忽视先进思想的作用，搞物质刺激，是不行的，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同修正主义不同，我们不能象他们那样靠物质刺激。资产阶级的物质刺激这条路，我们是决不能走的。我们必须用毛泽东思想，用伟大的正义的事业，来激发人民的热情，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摆脱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传统和习惯势力的影响，从这种狭隘的影响下解放出来，表现出强大的力量，发生强大的作用。

文化、思想战线被坏家伙控制了。彭真、陆定一控制的中宣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宣传部。他们控制的文化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文化部。他们仇恨毛泽东思想，他们阻碍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泽东思想一定要最广泛地同人民群众见面。不同人民群众见面，我们国家的面貌就不能改变。我们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毛泽东思想和人民一结合，无论那一方面，就会发生很快的变化。

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思想的集中表现，是同私有制思想，剥削阶级思想根本对立的。我们反对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私有制和私有观念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大因素。这种因素非常广泛。农村有自留地，有集体的地。一筐粪，是先送自留地，还是先送集体的地，都是有斗争的。这是两个阶级的心理，是两个阶级的思想，是两条道路的表现，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我们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战斗，资产阶级思想就会占领阵地，引起蜕化变

质，出乱子。匈牙利不就有裴多菲俱乐部这批学阀吗？在他们的煽动下，二十万人围着国会，要纳吉当政。我们党内这些坏家伙，就是纳吉。一旦有事，他们振臂一呼，就会有些人跟着跑。幸亏过去几年各个击破，打掉了一批纳吉，打掉了高岗、彭德怀、张闻天。这次又打掉了一批纳吉，一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分子。

这次斗争以后，不要存太平观念。有些人，私有观念、剥削阶级观念根深蒂固，渗透到每一个细胞。他们随时都要搞鬼，还得提高警惕。

人的脑子是存在的反映，是有矛盾的，是有阶级性的。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就拿革命队伍里的人来说，脑子里也有正确思想同错误思想的矛盾，有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有集体主义、共产主义同个人主义的矛盾，有真马克思主义同假马克思主义的矛盾，有走群众路线同反对群众路线的矛盾，等等。这一系列的矛盾，不断在脑子里发生斗争，不是这个克服那个，就是那个克服这个。

还有一些人的脑子里，甚至有革命思想同反革命思想的矛盾。要随时开展斗争，两军对战，消灭隐蔽的反革命思想。

要看到地球在运动，万物在发展的现象，要看清历史发展的规律，不要做违反历史前进的事。做这种事，害人害己，身败名裂。毛主席提出保持无产阶级晚节，就是这个问题。老同志也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严格要求自己，认真改造自己。不看清楚这个大形势，打个人小算盘，必然会犯大错误，甚至会参加卑鄙无耻的阴谋反党集团。

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泽东思想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高度同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国人民最好的教科书和必修课，是全国劳动人民团结和革命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全国人民行动的指南。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锐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毛泽东思想能够改变人的思想面貌，能够改变祖国的面貌，能够使中国人民在全世界面前站起来，永远站起来，能够使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站起来，永远站起来。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普遍真理，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财富，是永放光辉的。解放军把毛主席著作做为全军干部战士的课本，不是我高明，而是必须这样做。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军、全党，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对毛主席的著作，我领会得很不够，今后还要好好学习。

我们一定要抓住政治不放，抓住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放。这是革命的需要，是形势的需要，是对敌斗争的需要，是备战的需要，是彻底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需要，是防止和反对修正主义的需要，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那些坏家伙攻击我们是实用主义。这绝不是实用主义，是行之有效、符合实际的客观真理。什么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论。在他们看来，对资产阶级有利的就是真理，对资产阶级不利的就不是真理。我们抓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是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是符合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真理，是符合无产阶级革命需要的真理。如果不根据革命的需要去指导我们的行动，就必然犯大错误，必然要失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一) 停止彭真同志[①]、陆定一同志、罗瑞卿同志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同志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

(二) 撤销彭真同志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同志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

(三) 调陶铸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调叶剑英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他们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

(四) 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五) 上述决定，地方通知到县委以上，军队通知到团级以上。

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②]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停止和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和杨尚昆四同志职务问题的决定已经下达。会议决定，中央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进一步审查彭、陆、罗、杨四同志的反党活动和他们之间的不正常关系。彭真和罗瑞卿二同志错误问题的材料已经发给你们。在传达这个决定时，关于陆定一和杨尚昆二同志错误的问题，可以先作如下说明：

(一) 关于陆定一同志的问题

陆定一同志的妻子严慰冰，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现已查明，严慰冰在一九六〇年三月到一九六六年一月的六年期间，连续写了几十封反党反革命的匿名信，其中百分之九十是集中攻击和辱骂毛泽东同志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和他的一家的。这些信中充满了刻骨的反动阶级仇恨。

大量的材料证明，陆定一同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是有密切牵连的。在严慰冰的卧室内书桌上放着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五日写的一封匿名信的四页底稿和寄给叶群同志的信封，时间达

---

①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

② 一九七九年六月八日，中央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陆定一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对杨尚昆等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及贡献。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经书记处批准的《关于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平反问题的请求报告》。

一年零两个月之久，陆定一不可能不知道。而且严慰冰写反革命匿名信达六年之久，在写的时候，陆定一几乎全都在家。当陆定一被告知严慰冰犯了反革命罪行时，陆不仅不表示愤慨，还想诳说严患有神经偏执症为严开脱。陆定一在这个反革命案件中究竟扮演一个什么角色，专案审查委员会将加以彻底查究。

这几年来，陆定一一有机会就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把活学活用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骂成是"实用主义"、"庸俗化"、"简单化"，这纯粹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污蔑口吻。他还到处大反斯大林，大反所谓"教条主义"，在许多问题上，同党中央和毛主席唱对台戏。陆定一大反党中央和毛主席最放肆的时候，也就是严慰冰写匿名信最多的时候。

反革命匿名信集中攻击林彪同志，就是因为林彪同志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他们第一封反革命匿名信，是在一九六O年初，即彭德怀反党集团已被揭发批判的时候。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党中央揭发了罗瑞卿的反党篡军的阴谋不久，一封直接给林彪同志的极其恶毒的、令人愤慨的反革命匿名信就寄出了。

在文化革命的问题上，陆定一的立场和观点是同彭真完全一致的。陆定一垄断中央宣传部的工作，打击左派，包庇右派，替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

（二）关于杨尚昆同志的问题

杨尚昆同志的主要错误如下:

(1) 他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设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

(2) 他把大量的机密的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给别人抄录，严重地泄露党的核心秘密。

(3) 他同罗瑞卿等人的关系极不正常，积极参加了反党活动。

(4) 他还有其他的严重错误。

这个文件发到县委和团级党委。

《解放军报》刊登《剥"权威"画皮 向"权威"开火》的编者按语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今天我们转载了《文汇报》刊登的周信礼同志的文章《剥"权威"画皮，向"权威"开火》，并在第二版上发表了黄丑和等同志批判资产阶级"权威"的文章。这些文章，充满了对毛主席著作无比浓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以令人信服的事实，严正地驳斥了那些资产阶级"权威"反对工农兵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种种谬论。《文汇报》的编者说得很对："凡是一切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谬论，不管他是多大的'权威'，我们都要有勇气批判它，打倒它。"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国人民团结和革命的共同思想基础，是战胜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资产阶级牛鬼蛇神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对待毛泽东思想采取什么态度，是承认还是抵制，是拥护还是反对，是热爱还是敌视，这是真革命和假革

命，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水岭。

我军是在党和毛主席直接领导和亲手抚育下，在战胜国内外强大敌人的长期革命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我们无限热爱和永远忠实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无限热爱和永远忠实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什么牛鬼蛇神，都不在我们话下。任何资产阶级“权威”，都不在我们眼里。他们越是拚命地反对我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就越是证明我们学得对，做得对。他们越是无耻地污蔑我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是“庸俗化”、“简单化”、“实用主义”，就越是证明我们学得好，用得好。我们抓住突出政治不放，抓住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放，是革命的需要，是形势的需要，是反对美帝侵略、搞好战备的需要，是防止和反对修正主义的需要，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那些坏家伙攻击我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只不过是更加暴露了它们反革命的丑恶面目罢了。

我们一定要遵照军委和林彪同志的指示，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们要和全国广大工农群众和革命干部一起，满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推向新的高峰。我们一定要更好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个威力无比的强大武器，向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戳穿资产阶级“权威”的画皮。谁胆敢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和它斗到底，拼到底！

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你们。

组　长：陈伯达

顾　问：康　生

副组长：江　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　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　欣、姚文元

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的成员（四人）确定后，另行通知。

《人民日报》刊登《把资产阶级“权威”统统打倒把毛泽东思想世世代代传下去》的编者按语

(一九六六年五月三十一日)

自从《解放军报》《光明日报》重新发表了乒乓球运动员庄家富同志和上海市果品杂货公司闸北区公司经理周信礼同志写的文章及编者按语，揭穿了某些“权威”恶毒地攻击和压制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丑恶面目以后，激起了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的义愤。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这是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放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支毒箭。广大工农兵用自己的切身体验和铁的事实，严厉驳斥了某些“权威”的反党谬论，戳穿了他们的险恶用心，把他们拉到了光天化日之下。

对待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样一件关系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有人说“好得很”，有人说“糟得很”，这里鲜明地反映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种根本不同的立场。今天本报刊载的李素文、沈素娟两位同志合写的文章，说得完全正确：“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如果敌人不起来反对，那就说明我们没有学好，学了没有起作用。敌人起来反对，说明我们学的对，学的好，起了作用。敌人反对的越厉害，说明我们学习的越好，起的作用越大。”敌人越是反对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越要更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越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我们就越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举得更高。

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开辟了广大工农兵直接掌握理论的新时代。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这个工农兵自觉地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正以雷霆万钧之势，猛烈地冲击着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垄断地位，大大地动摇了他们一直盘踞着的宝座。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十分仇视和害怕毛泽东思想，十分仇视和害怕广大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那些代表资产阶级的所谓“权威”迫不及待地以贵族老爷的态度，大骂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是“简单化”、“庸俗化”和“实用主义”，反对“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原则。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如何对待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是真拥护毛泽东思想还是假拥护毛泽东思想，真拥护党还是假拥护党，真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假马克思主义者，一句话，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的试金石。某些“权威”用什么“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来攻击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同广大工农兵群众相结合，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其目的是推行他们的修正主义的一套，为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

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

准的普遍真理，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战胜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强大武器，也是我们反对资产阶级“权威”的强大武器。在目前正在展开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高度发扬共产主义的革命精神，敢想，敢说，敢闯，敢革命，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向一切资产阶级“权威”开火，坚决打倒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一切文化阵地的领导权完全夺取过来，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

《人民日报》社论

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我国，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它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国解放十六年以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一直是十分激烈的。目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正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发展。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根本对立的，是不能和平共处的。无产阶级革命，是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是要逐步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的最彻底的革命，这不能不遇到剥削阶级最顽强的反抗。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剥削阶级的枪杆子被缴械了，印把子被人民夺过来了，但是，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还存在着。我们推翻了他们的统治，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并不等于没收了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剥削阶级统治了劳动人民几千年，他们垄断了由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反过来用以欺骗、愚弄、麻醉劳动人民，巩固他们的反动政权。几千年来，他们的思想是统治的思想，在社会上不能不有广泛的影响。他们的反动统治被推翻以后，他们是不死心的，总是企图利用他们过去这类的影响，为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

的复辟进行舆论准备。解放十六年来思想文化战线上的连续不断的斗争，直到这次大大小小"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被揭露，就是一场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也是首先从意识形态上进行准备，搞资产阶级的化文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是由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尚且要经过多次反复，经过多少次的革命、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资产阶级革命从思想准备到夺取政权，在欧洲的许多国家，都进行了几百年之久。无产阶级革命是彻底结束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更不能幻想剥削阶级会乖乖地听任无产阶级剥夺他们的一切特权，而不想恢复他们的统治。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必然要象列宁所说的那样，以十倍的疯狂，来企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篡党，篡军，篡政，这个事实，对全世界无产阶级说来，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教训。目前中国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学者权威"，他们所做的，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梦。他们的政治统治被推翻了，但是他们还是要拼命维持所谓学术"权威"，制造复辟舆论，同我们争夺群众，争夺年青一代和将来一代。

资产阶级进行反封建的文化革命，到夺得政权的时候就结束了。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反对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这种文化革命的性质，同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截然不同的。这种文化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取得了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先决条件，才能为这种文化革命开辟最广阔的道路。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末有的移风易俗的伟大事业。对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一切遗产、风俗、习惯，都必须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加以透彻的批判。在人民生活中清除旧社会的恶习，是需要时间的。但是，解放以来的经验证明，如果充分发动了群众，走群众路线，使移风易俗成为真正广大的群众运动，那末，见效就可能快起来。

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为少数新剥削阶级服务的，它只能由少数人参加，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和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它能吸引和团结广大劳动人民参加。资产阶级启蒙人物总是卑视群众，把群众当作愚民，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当然支配者。无产阶级思想革命家同他们根本相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目的是在唤起人民群众的自觉，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

资产阶级的卑鄙的自私自利，抑制不住自己对于人民群众的仇恨心。马克思说："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会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它。"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也还是这样。

目前，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模和声势，在人类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它的威力之大，来势之猛，在运动中所迸发出的劳动人民无限的智慧，远远超出了资产阶级老爷们的想象。事实雄辩地证明，毛泽东思想一旦掌握了群众，就成为威力无穷的精神原子弹。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正在大大推动中国人民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也必将对世界的现在和未来，发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我国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引起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惊慌和混乱。他们一会儿想入非非，说什么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表明了中国下一代"和平演变"已经有了希望呀；他们一会儿又悲观失望，说什么一切消息表明，共产党的统治还是十分巩固呀；他们一会儿又表现出无限迷茫，说什么要对中国所发生的事情随时作出准确判断的真正的"中国通"是永远不可能有的呀。亲爱的先生们，我们的胡思乱想总是同历史的发展背道而驰

的。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和胜利，敲响了中国土地上残存的资本主义势力的丧钟，也敲响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丧钟。你们的日子不会长久了。

让我们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这一场文化革命的胜利，必将进一步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我们在各个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保证我们将由社会主义胜利地过渡到伟大的共产主义！

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

《三家村》黑帮分子宋硕、陆平、彭珮云负隅顽抗 妄想坚守反动堡垒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许，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人，在大饭厅东墙上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全文如下：

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那里？这里有鬼。请看最近的事实吧！

事情发生在五月八日发表了何明、高炬的文章，全国掀起了声讨“三家村”的斗争高潮之后，五月十四日陆平（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急急忙忙的传达了宋硕（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在市委大学部紧急会议上的“指示”，宋硕说：现在运动“急切需要加强领导，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这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方法上怎样便于驳倒就怎样作。要领导好学习文件，开小组讨论会，写小字报，写批判文章，总之，这场严肃的斗争，要做的很细致，很深入，彻底打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所能解决的。”“如果群众激愤要求开大会，不要压制，要引导开小组会，学习文件，写小字报。”

陆平和彭珮云（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完全用同一腔调布置北大的运动，他们说：“我校文化革命形势很好”，“五月八日以前写了一百多篇文章，运动是健康的……运动深入了要积极引导。”“现在急切需要领导，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积极加强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北大不宜贴大字报”，“大字报不去引导，群众要贴，要积极引导”等等。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线吗？不是，绝对不是！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

“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要作的细致”。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这是理论问题吗？仅仅是什么言论吗？你们要把

我们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还要“引导”到那里去呢？邓拓和他的指使者对抗文化革命的一个主要手法，不就是把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导到“纯学术”讨论上去吗？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干？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要积极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什么是“正确的道路”？什么是“正确的方向”？什么是“正常的发展”？你们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引导”到“纯理论”“纯学术”的圈套里去。不久前，你们不是亲自“指导”法律系同志查了一千五百卷书，一千四百万字的资料来研究一个海瑞“平冤狱”的问题，并大肆推广是什么“方向正确，方法对头”，要大家学习“好经验”吗？实际上这是你们和邓拓一伙黑帮一手制造的“好经验”，这也就是你们所谓“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实质。党中央毛主席早已给我们指出的文化革命的正确道路、正确方向，你们闭口不谈，另搞一套所谓“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方向”，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

“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能解决的”。“北大不宜贴大字报”，“要引导开小组会，写小字报”。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大字报？害怕开声讨大会？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你们“引导”群众不开大会，不出大字报，制造种种清规戒律，这不是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反对群众革命吗？我们绝对不答应！

你们大喊，要“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这就暴露了你们的马脚。在革命群众轰轰烈烈起来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时候，你们大喊：“加强领导，坚守岗位”。你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为谁坚守“岗位”，你们是些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吗？直到今天你们还要负隅顽抗，你们还想“坚守岗位”来破坏文化革命。告诉你们，螳臂挡不住车轮，蚍蜉撼不了大树。这是白日作梦！

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鬼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保卫党中央！

保卫毛泽东思想！

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哲学系　聂元梓　宋一秀　夏剑豸
杨克明　赵正义　高云鹏
李醒尘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原载 1966 年 6 月 2 日《人民日报》）

〔附〕 北大第一张大字报是怎样出笼的

——揭露康生的反革命罪行

《北京日报》记者　林浩基

历史已经证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发表的、震惊神州大地、引起全世界关注的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是林江反革命集团主犯康生一手策划的、反动的大字报。

十几年前，康生在一次接见外宾时声称："这张大字报是我搞出来的。"并以此做为自己"光辉"历史的一页，到处炫耀。然而，这张大字报的出笼经过，恰恰成了揭穿康生狰狞面目的绝妙材料。

去年十一月三十日上午，前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长陆平同志，在工作繁忙中接待了我。他说："北大反动的第一张大字报的出笼不简单，现在应该把野心家康生的罪行公诸于世。"陆平同志语调缓慢而激愤，陷入了对往昔的深深回忆之中。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对于英雄的中国人民，是面临困难和考验的时候。

在党中央关于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指引下，我们国家胜利地度过了三年严重困难时期，又出现了新的生机。亿万人民笑逐颜开，同心同德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

然而，历史的发展是不平常的。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抛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带头发难。"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样对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做出准确解释的情况下，以姚文元这篇反动文章为开端，逐渐展开着、进行着。

一九六六年，北京的春天是那样的清新而迷人，但批判"三家村"的浪潮却象一片乌云，在人们的心上投下了一层阴影。

北京处在巨大风暴的旋涡之中。

五月十四日，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同志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了华北局指示，强调各级领导要坚守岗位，加强对运动的指导，遵守党的纪律，积极投入斗争。

这一天的中午，康生以中央理论组的名义，派他的老婆曹轶欧带七人"调查组"到了北京大学。

"记得那天中午，我下班刚回到家里，校党委办公室来电话，说曹轶欧带工作组来了。"陆平同志回忆说："我放下饭碗，赶到办公室，只见曹轶欧和一个人坐在那里。我说：'调查组需要了解什么情况，我们准备一下，做个汇报'曹说：'不必了，我们是来了解学术批判情况的。'我问：'你们住下吗？'曹说'住下'。接着，我要办公室的同志准备房子，好好接待。"

晚饭后，按照往常的惯例，陆平同志前去住处看望"调查组"，结果发现室内空无一人。他心一沉，感到很纳闷。想，曹轶欧不是说要住下吗？到哪里去了呢？他沿着未名湖畔，缓步走着。湖面微波翻动，他的心也象这湖水一样，泛起了涟漪。曹轶欧一伙行止的蹊跷诡密，引起了他的疑虑。

“十几年后，我才清楚，原来他们秘密地住到西颐宾馆，秘密地找北大一些人到那里策划。我们哪里想到了这些呢!”陆平同志说着，站了起来，在屋内踱了几步，显示出一股难以压抑的愤慨。

“北大点火，往上搞”

的确，曹轶欧的“调查组”，住在离北大有五里之遥、僻静的西颐宾馆。

调查北大的情况，不住在北大校内，搬到离校这么远的地方秘密住下，是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的。

原来曹轶欧临行之前，康生面授机宜，明确要调查组在“北大点火，往上搞”，并且点了宋硕同志的名。在康生的指使下，曹轶欧完全撇开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干尽了阴谋的勾当。他们声言“要参加会议”，可是北大邀请他们又拒不出席；他们说“要了解北大文化大革命情况”，可是陆平同志找曹轶欧汇报，又被断然拒绝。但是，人们发现，曹轶欧从早到晚，频繁地找学校的一些人到宾馆密谈，有的人甚至谈了二次、三次。北京五月下旬，天气还不那么热，可是，那个被指名调到“康办”的哲学系教员，每天挥汗如雨，得意地穿梭于燕南园一带，奔走于北大和北大在北太平庄、十三陵水库分校之间，忙得很。他们鬼鬼祟祟，想方设法搜集北大党委的情况，扬言要揭开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盖子，把矛头直指中央。

由谁来带头“点火”、“揭盖子”呢？康生是很费了一番心思的。他们知道聂元梓在北大臭得很，没有什么号召力。所以，就找陈守一同志。因为陈守一是北大党委常委，法律系主任，有威信。

五月的一天，曹轶欧打电话给陈守一同志，作了自我介绍之后，表示要到陈家谈谈。接着曹就到了陈守一同志家里，询问了北大的学术批判情况后，她阴险地说：“北大的学术批判方向错了，陆平要负责。”

陈守一同志辩驳说：“学术批判，党委常委分工由我负责，有错误，首先是我的责任，希望具体指出。”曹轶欧碰了一鼻子的灰，没有再说什么。临走时，她告诉陈守一同志：“我和你谈话的事，应该保守秘密。”

过了几天，曹轶欧又私下约陈守一同志到西颐宾馆见面。并且一再叮咛不要对任何人说这件事。陈守一同志到了那里后，曹轶欧劈头就问：“你对聂元梓的印象如何?”

陈守一同志感到问题提得很突然，略作沉思，回答说：“聂元梓在社教中闹得太不象话。”

曹轶欧这时亮了底，说：“你们应该揭发陆平、宋硕，最好你领头，和聂元梓一起搞。”陈守一同志迟疑了一下，估计聂元梓就在隔壁的房间里等候着，坚定地回答：“北大学术批判有错误，是我的责任。我不能诿之于人。”

曹轶欧挑拨说：“你没有责任，是陆平、宋硕搞的鬼。”

陈守一说：“别人可以这样说，我却不能这样看。”曹轶欧见陈守一同志态度坚决，大失所望，不敢提出与聂元梓见面的事。

康生的密谋遭到了严重的挫折。曹轶欧在送陈守一同志上车时，怕露马脚，不得不一再嘱咐，要对这次谈话绝对保守秘密。站在一旁的“调查组”另一个成员弦外有音地说：“曹大姐送人从来没有这样客气过。”

这就是康生指使他的老婆，用鬼蜮的伎俩，精心策划，点火北大，上整市委、中央，搞

乱全国的重大阴谋。见不得人的人，干着见不得人的事。善良的人们哪里能料到这些呢？

“是王八蛋也要支持”

一九六六年春夏之交，北京的政治气候和天候一样，温度一天天上升。康生策划的阴谋也在紧锣密鼓之中。策动陈守一“点火”失败之后，他和他的老婆又多次与聂元梓密谈。聂元梓是个权欲熏心、野心勃勃、臭名昭著的人。在市委主持召开的传达中央解决北大社教问题的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上，虽然迫于形势，作了一点检查，但是心怀不满，伺机反扑，因而同康生一拍即合，立即达成了一笔反革命政治交易。五月下旬，“调查组”亲自出马，召集北大一些人开会，直接授意写大字报。大字报写些什么内容，他们煞费了一番苦心。开始，他们准备翻北大社教的案，但感到马上把锋芒指向中央，时机还不成熟，不如从市委下手容易得逞。他们就别有用心地抓住宋硕同志五月十四日传达华北局指示的那个讲话，杀气腾腾地叫嚷这个讲话是捂盖子，要揭宋硕、陆平、彭珮云。

这几天的白天、晚上，聂元梓根据曹轶欧这个调子，同其他几个人一起密商、起草大字报。他们两易其稿，终于炮制了出来，于五月二十五日下午帖在北大的一个饭厅墙上。这张反动的大字报，用歪曲事实，截头去尾，诬陷栽赃的卑劣手法，诬陷宋硕五月十四日讲话中提出的现在要急切加强领导，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诬陷“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是把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导到‘纯学术’批判上去”；攻击中央规定的“内外有别”等纪律，是“清规戒律”，“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等等。把矛头指向北京市委和中央，引起了全校师生员工的极大愤慨。化学系分析教研室和法律系的许多同志首先帖出反驳的大字报，指出这张大字报违反中央“内外有别”的精神，颠倒黑白，歪曲事实。在大字报贴出的短短半天时间内，全校自发地贴出了一千五百余张大字报，其中绝大多数对聂元梓等人的这张大字报加以驳斥和揭露。当时还有千余人围着聂元梓辩论。聂元梓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

在大字报贴出的前一天，即五月二十四日，北大党委传达了中央、国务院关于运动中贴大字报的五点指示，强调要内外有别。当时是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的聂元梓明知中央指示精神，却公然无视党纪国法，就是有康生为后台老板。

五月二十五日深夜十二时许，当时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同志、周恩来总理又派华北局、国务院外办和高教部的负责人来北大，重申中央关于运动中张贴大字报的指示，并传达了周总理的四点补充指示。周总理特别指出：作为党和国家的纪律，这就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严肃批评了聂元梓搞乱了中央的部署，违反了中央规定的原则。康生得知周总理批评后，惟恐揭破其反革命面目，急急忙忙让曹轶欧要走了大字报的底稿。当“调查组”的人反映大字报贴出后，因为聂元梓政治上、生活上有不少问题，太臭，北大反对激烈，当初不应该选她带头时，康生恶狠狠地狂叫：“是王八蛋也要支持。”露出一副赌棍的凶相。

捣鬼有术

康生不愧是个搞阴谋诡计的里手。他要走大字报后，背着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同志等政治局常委，隐瞒他精心策划这张大字报的阴谋活动，欺骗了毛主席。

六月一日晚上八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北京的空气一下

子好象凝固了起来。人们疑虑环生：北大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方式呢？中央不是明确规定要“内外有别”吗？

在这同一天晚上，陈伯达和工作组在研究人民日报六月二日的社论和主要版面安排。当时，有人汇报北大到处贴满了大字报，其他一些高等院校的人到北大去，秩序很乱等等。陈伯达听了后，决定要亲自去看看。王力、关锋劝陈不要去，由他们去看看再说。王力、关锋从北大回到报社后，就宣扬北大形势好得很，那有什么乱，完全是一派革命大好形势。所以，就这样起草了题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由陈伯达同意签发，同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一起，刊载在人民日报六月二日第一版上。自此，先是北京，后是全国各地的高等院校以北大为“榜样”，揪斗校系领导，冲垮了各级组织，使全国高等院校陷于混乱。

六月二日下午和三日晚，陈伯达两次到北大看大字报。这个自诩为“小小老百姓”、实则是大大野心家的陈伯达，对于北大革命师生不怕高压，反对聂元梓大字报，支持校党委的正义行动，极为仇视。他看完大字报回到报社后，立即“指示”工作组写了题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社论，发表在六月五日的人民日报第一版上。这篇反动的社论，大翻北大社教运动的案。把贯彻中央指示、纠正北大社教运动错误的“国际饭店会议”打成“一九六五年发生的一个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将攻击矛头指向了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使全国亿万维护党的领导、不愿起来造所谓“走资派”反的群众，顶着“保皇派”、“保皇党”的帽子，受到了不同程序的迫害和摧残，造成了群众之间严重的对立和分裂。

大字报广播后，康生们欣喜若狂，弹冠相庆。康生在一次会上说：“大字报广播后，我感到解放了。”聂元梓从这张大字报中捞到了不少政治资本，因此，她对“顾问”康生感恩戴德，急忙给康生写了一封感谢信，肉麻地吹捧康生，表示要“为康生同志争气。”不打自招地供认了他们的反革命勾结。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康生又在北大的万人大会上，针对刘少奇同志、周恩来总理对大字报的批评和广大群众的反对，狂叫“大字报贴出后，反革命想扼杀它。”穷凶极恶地把矛头指向了敬爱的刘少奇同志、周恩来总理。他的老婆曹轶欧也由后台跳到了前台，以工作组副组长的头衔到了北大，继续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开了极为恶劣的先例

北京大学这个光辉的名字，是同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最辉煌的篇章联系在一起的。她曾经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和主力军；她是孕育中国最早一代共产主义战士的摇篮；她为祖国的繁荣和昌盛，造就了一大批人才。然而，今天，康生这伙凶犯使她蒙受了极大的历史耻辱。康生、陈伯达、江青等反革命主犯，连续炮制反动文章，污蔑北大的党是“修正主义的党”，“假共产党”；把党的组织、党的纪律一概攻击为“黑组织”、“黑纪律”；把社会主义的北京大学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把数万北大师生打成“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等等。使在校的教职员工和已经走上工作岗位的北大学生，蒙受不白之冤。这张大字报的出笼，是林江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造成我国长达十年大动乱的一个祸根：开了一个肆意颠倒是非，践踏社会主义法制，利用“四大”进行政治诬陷和人身迫害的极为恶劣的先例。北大成了人间的地狱，数百名干部、教师被抄家、揪斗、游街，一些人被活活打死。康生一伙又把北大的经验作为全国的“样板”，到处推销，派聂元梓到上海点火，到中央和国家各部委去抢权。他们组织全国二百一十二万四千多人到北大“串连”、“取经”，把北大的“经验”带到各地，煽风点

火，揪斗从中央到地方的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冲垮各级党组织。康生利用这张反动的大字报，“点火北大”，上整中央，搞乱全国，给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

陆平同志十分痛心地回顾了这段历史，历数康生的滔天罪行。我请他谈谈他和他一家受林江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的情况，他摇摇头说：“我是个共产党员，那些事，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可谈的。”沉默了一会，他又说：“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不行呀！刘少奇同志是国家主席，还有陈老总、贺老总、彭老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但是被林江反革命集团活活整死呀！”说到这里，他再也不能强抑住自己的情感了，热泪夺眶而出。我理解这位一九三三年就投身中国革命的老同志的心情。是的，人民不能没有法制。唯有社会主义的法制，才能倾听真理的呼声，维护人的尊严。

(原载 1981 年 1 月 9 日《北京日报》)

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

《人民日报》评论员

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揭穿了“三家村”黑帮分子的一个大阴谋！

“三家村”黑店的掌柜邓拓被揭露出来了，但是这个反党集团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仍然负隅顽抗，用“三家村”反党集团分子宋硕的话来说，叫作“加强领导，坚守岗位”。

他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他们“坚守”的是他们多来来一直盘踞的反动堡垒。他们加强的是什么“领导”？就是指挥他们的伙计作垂死挣扎、力图保持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阵地。

宋硕的“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这是一个信号。它反映了在这场摧枯拉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切牛鬼蛇神们的动态。他们是一步不让的，寸土必争的，不斗不倒的。

“三家村”黑帮是诡计多端的。在前一个时候，他们采取“牺牲车马，保存主帅”的战术。现在“主帅”垮台了，他们就采取能保存多少车马就保存多少车马的手法。他们妄图保存实力，待机而动。

为陆平、彭珮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已经到了五月十四日，陆平还传达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的所谓紧急指示，并手忙脚乱地进行部署，欺骗、蒙蔽和压制广大青年学生和革命干部、革命教师，不许他们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起来革命，彭珮云是一个神秘人物，上窜下跳，拉线搭桥。在这个事件中，她转入地下活动，来往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住地十三陵和宋硕、陆平之间，出谋划策，秘密指挥。

这一切，都说明“三家村”黑店的分号，“三家村”黑帮的“车马”们，还是有指挥、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顽抗。

陆平以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的身份，以“组织”的名义，对起来革命的学生和干部，进行

威吓，说什么不听从他们这一撮人的指挥就是违犯纪律，就是反党。这是“三家村”黑帮反党分子们惯用的伎俩。请问陆平，你们所说的党是什么党？你们的组织是什么组织？你们的纪律是什么纪律？事实使我们不能不做出这样的回答，你们的“党”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

陆平们这一套是骗不了人的。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注**①）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关于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兴无灭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是我们必须坚决遵循的。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妄图阻挡这个潮流的小丑们，他们是难逃灭顶之灾的。

工农兵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以排山倒海之势，正在一个一个地夺取反革命的文化阵地，摧毁反革命的文化堡垒。那些什么“三家村”、“四家村”，不过是纸老虎。他们的“将帅”保不住，他们的“车马”也同样是保不住的。

北京大学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能够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一定能够更加有力地团结群众进行战斗。一时还看不清楚的人们，一定会迅速地提高自己的觉悟，参加到战斗的行列中来。北京大学广大师生的反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革命斗争，一定能够胜利。一个欣欣向荣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新北大，一定会很快地出现在人民的首都。

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

《人民日报》社论

今天我国正处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伟大变革的新时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日益深入的新形势下，处于触到人们灵魂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激流之中。

社会主义革命一步一步地深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步一步地深入，必然会把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问题突出出来。你是真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假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在怎样对待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这是触到人们灵魂

① 这是毛泽东加的注。

的问题，也就是触到人们的世界观的问题，触到人们脑子里是无产阶级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问题。这是两个敌对的世界观的斗争。

两个敌对的世界观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敌对世界观的斗争，正如两军对战，总是一胜一败。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党和毛主席教导我们，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武装起来，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学者权威"却硬要把我们拉到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泥坑里去，挖我们的社会主义墙脚。大敌当前，我们必须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团结起来，坚决向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学者权威"展开坚决的毫不留情的斗争。只有坚决同他们斗争，把资产阶级的妖风彻底压倒下去，才能使大家从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传统习惯势力的影响下解放出来，过好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大关，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大道上阔步前进。

说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这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不符合辨证法的。那里会没有矛盾呢？一千年，一万年，一亿年以后仍然有矛盾。地球毁灭了，太阳熄灭了，宇宙还会有矛盾。任何事物都是处在矛盾中间，斗争中间，变化中间，这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看法。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它的基本点是要批判，要斗争，要革命。这样才能不断推动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毛主席经常引用"树欲静而风不止"这句话告诉我们，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资产阶级天天企图影响我们，腐蚀我们。当前这场斗争，完全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挑起的，而且他们是准备、并进行多年了。我们想避免也避免不了。斗争就是生活。你不斗它，它就斗你。你不打它，它就打你。你不消灭它，它就消灭你。这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搏斗，在这样一场搏斗中，丧失警惕是危险的。

毛主席说："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我国还有很大的力量，很大的影响。在意识形态方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我们要抓意识形态，抓上层建筑，搞理论，搞学术，搞文艺等等，巩固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仍然也还在抓意识形态，抓上层建筑，搞理论，搞学术，搞文艺等等，在文化战线上搞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宣传，为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

不要认为打笔墨官司，无关大局。匈牙利事件就是裴多菲俱乐部一批修正主义文人扮演了打先锋的角色。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是他们妄图进行反革命复辟的前奏。

因此，当前我们在思想文化战线上进行的这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就是从思想上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阴谋的斗争，是从思想上挖修正主义根子的斗争，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是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斗争。这场斗争只能胜利，一定要胜利，也一定能胜利。

我们应该重视思想的作用，重视无产阶级思想的作用，重视社会主义思想的作用，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作用，重视毛泽东思想的作用。对我们共产党人说来，不重视思想的作用，是庸俗的唯物论，机械的唯物论。我们必须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的正义事业，

激发人民的热情，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我国人民要摆脱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传统和习惯势力的影响，摆脱帝国主义的影响，从这一切影响下解放出来，这就将发生强大的力量，发生强大的作用。我们一定要加强共产主义的自觉性，有意识地发展共产主义思想，要作彻底的革命派，不当动摇派，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

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同志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李雪峰、吴德两同志业已到职工作。北京市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领导。

(新华社 1966 年 6 月 3 日讯，载 6 月 4 日《人民日报》)

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

中共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决定：(一) 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二) 撤销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　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三) 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

(新华社 1966 年 6 月 3 日讯，载 6 月 4 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

《人民日报》社论

本报今天发表了两条重要消息。一条是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新市委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同志兼任第一书记，吴德同志任第二书记。一条是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决定撤销陆平、彭　云的一切职务，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派出了工作组，到该校领导社会主

义文化大革命，并代行党委职权。

这两条消息，在昨天下午四时广播以后，立即得到了北京市广大工人农民群众和各机关、院校、群众团体和驻军的热烈拥护。广大群众欢欣鼓舞，一致认为，中共中央的决定和新改组的北京市委的决定，是非常英明、非常正确的。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

前北京市委的领导，贯穿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

前北京市委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修正主义者。

在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揭露了"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集团。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根子，就是前北京市委。

《前线》、《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了反革命集团散布修正主义毒素、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它们的根子，就是前北京市委。

北京市的党、政机关许多部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是执行党中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路线，而是执行修正主义的路线；不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它们的根子，就是前北京市委。

前北京市委，在教育方面，也是推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路线。北京大学就是它们控制下的一个最顽固的堡垒。正如北京大学广大学生所揭发的，他们的教育方针，不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是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

北京市的广大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对前北京市委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他们坚决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做了很多工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北京市地区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都是拥护毛主席的，拥护党中央的。一时受了蒙蔽的人，一旦了解了事实的真相，就立即行动起来，投入反对前北京市委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战斗。

现在，北京大学已经出现了一个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打响了第一炮。这张大字报在电台上一广播，在报纸上一发表，全校人心激动，一片欢腾。无产阶级革命派扬眉吐气，左派队伍迅速扩大。千万张大字报，象排炮一样，打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头上。首都各院校的积极支持，大壮无产阶级的革命声威。"保皇党"吓破了胆，他们已经陷于完全孤立的地位。北京大学的广大学生、职工、教员，在新市委派出的工作组的领导下，正在对陆平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进行坚决的清算和斗争。

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集团，看样子很凶。在他们的控制和封锁下，水也泼不进，针也插不进。但是，当毛主席和党中央发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号召，群众起来之后，他们的反革命面目就很快被揭穿了。他们和一切反动派一样，也不过是纸老虎。

我们的国家是一片大好形势。全国人民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无限热爱，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谁要反对毛主席，谁要反对毛泽东思想，谁要反对党中央，谁要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谁要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职位多么高，资格多么老，都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他们得到的结果，只能是身败名裂。

我们坚信，在新改组的北京市委的领导下，前北京市委的错误路线和它的影响，一定能够被彻底肃清。北京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够取得伟大胜利。北京市的各项工作，一定能够做好。

中共北京市委决定

（一九六六年五月、六月）

中共新改组的北京市委最近作出两项决定，全文如下：

中共北京市委决定

（一）撤销《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原来的编委会；撤销范瑾的社长职务。

（二）成立新的《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编委会，领导《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的工作。新的编委会由翟向东、吴象、林青等七同志组成，翟向东任总编辑，吴象、林青任副总编辑。

（三）撤销《前线》编委会，《前线》暂时停刊，进行整顿。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中共北京市委决定

撤销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的一切职务。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

（新华社1966年6月6日讯，载6月7日《人民日报》）

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

（一九六六年六月五日）

《人民日报》社论

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伟大号召下，北京大学掀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北京大学过去被压抑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站起来了。他们推翻了以陆平为首的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统治。一场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阴谋的斗争正在胜利展开，资产阶级保皇派陷入了广大群众的包

围之中。

北京大学是我国教育领域中的具有悠久历史的一个最重要阵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实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一直把它看成为同无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的基地。

陆平等这一小撮保皇党，顽固地执行前北京市委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北京大学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在陆平等人的统治下，一些机构名义上还保存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实际上干的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勾当。他们推行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竭力要把青年学生引向修正主义的道路，竭力要把青年学生培养成资产阶级的接班人。

陆平等这一小撮保皇党，把资产阶级的所谓学术权威捧上了天，让他们在青年学生中大肆放毒，系统地宣传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思想。他们排挤革命的教师，对他们进行无情的打击。

陆平等这一小撮保皇党，对于一些接受他们修正主义教育方针的学生，精心培养，给予各种方便条件和特殊照顾。他们企图培养出一批修正主义的苗子，把他们散布到各地。

陆平等这一小撮保皇党，对于工农子弟，对于抵制他们那一套修正主义教育方针的学生，极端仇视。这些保皇党订出许多办法，从招生到教学，从学期考试到毕业分配，都千方百计地来限制、排斥、刁难和歧视这类好学生，甚至对他们进行极粗暴的斗争。

陆平等这一小撮保皇党，拼命抵制和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北京大学的革命师生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揭发了陆平这些保皇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量言行，揭发了他们实行修正主义教育方针的大量材料，但他们仍然顽抗。他们在前北京市委的直接指挥下，还疯狂地反扑，进行反攻倒算。他们给革命派捏造种种罪名，戴了许多帽子，组织围攻，轮番作战。他们对一批积极分子进行的这种残酷斗争，竟长达七个月之久。这是一九六五年发生的一个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陆平等一小撮保皇党，动辄用破坏组织纪律、反领导这些名义打击不服从他们命令的人。他们的党性确实很强，他们的党性就是资产阶级保皇党的党性，就是修正主义反革命的党性。他们确实是有组织纪律的，有领导的。他们的组织纪律就是资产阶级保皇党的组织纪律，他们的领导就是修正主义反革命的领导。我们必须告诉这班老爷们，同你们的党性敌对的，正是无产阶级的党性。破坏你们的组织纪律的，正是自觉地遵守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纪律。反对你们的领导的，正是自觉地拥护和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这些人是好同志，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北京大学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就是要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推翻你们的领导，打倒你们这批保皇党。

北京大学的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保皇派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修正主义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斗争，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是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

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的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部分。教育领域里的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归根到底，就是把青年一代培养成为无产阶级接班人，还是培养成为资产阶级接班人。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将来面貌的关键性的大事。

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新中国"和平演变"的幻想，寄托在青年一代。他们妄想我们的青年一代不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道路，而走修正主义的道路。陆平等人顽固地执行前北京市委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正是适应了帝国主义的需要。

毛泽东思想在我国日益深入人心。任何人要想封锁，不让毛泽东思想和群众见面，都是办不到的。就是在被陆平等人盘踞了多年的这样一个顽固堡垒中，绝大多数学生、职工、教师，都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毛泽东思想，拥护我们党，拥护我们党中央的。在那里，很多学生、职工和教师，一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陆平等人进行坚决的斗争。

北京大学的斗争，是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斗争的一个典型。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应该从这里得到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展开，向教育工作者，向青年学生，向一切文化工作者，也向一切人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生死斗争中，究竟站在哪一边，是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当资产阶级保皇派？每个人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

我们相信，绝大多数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必然会唾弃资产阶级保皇派，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一边，紧紧地团结在毛主席、党中央的周围，把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北京日报》新编委会公告

（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

《北京日报》今天刊登了《北京日报新编委会公告》。公告全文如下：

在中共中央英明地改组了北京市委之后，新的北京市委立即作出决定，成立《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编委会。我们怀着无限兴奋的心情宣告：《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生了！这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个新胜利。

《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过去堕落成为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成为“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集团的工具。这三个报刊曾经散布大量的毒素，疯狂地攻击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包庇资产阶级右派、打击无产阶级左派；蒙蔽人民群众，压制广大读者的批评。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明目张胆地抗拒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和方针，妄图把这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纳入修正主义的轨道。当他们的阴谋败露之后，又在四月十六日，制造了一个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舍车保帅”的大骗局、大阴谋。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群众和其他革命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对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家伙的阴谋诡计，本来早有觉察和抵制。自五月八日起，当我们党和人民群众，公开揭露了他们的阴谋之后，全国各兄弟报刊，各地的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以及本报大多数愿意革命的职工，以雷霆万钧之力，高屋建瓴之势，展开猛烈进攻，到处口诛笔伐，愤怒声讨，很快地就把这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近两三天，在文化革命大好形势鼓舞下，北京市呈现一片欢腾景象。许多工厂、郊区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商店，纷纷集会，庆祝胜利。这就大大长了无产阶级志气，大大灭了资产阶级以及一切牛鬼蛇神的威风。事实再次证明，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面

前，不管什么人，如敢反党反社会主义，必将碰得头破血流。

当新生的《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今天和读者见面的时候，我们郑重宣告：

我们一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也当作办报的最高指示，坚决把这两个报纸办成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党报，永远为宣传毛泽东思想、捍卫毛泽东思想的而斗争，推动工农兵群众和广大人民，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们一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同全市和全国人民紧紧站在一起，和全国各兄弟报刊紧紧站在一起，积极参加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彻底揭露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目，彻底粉碎资产阶级黑帮的进攻，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激发劳动人民的革命热情，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一定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指示的全党办报的方针，依靠广大工农兵群众和一切革命干部、革命的知识分子，坚决面向工农兵，全心全意地为工农兵服务，把《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办好，使它充满工农兵群众的战斗声音，永远生气勃勃。

亲爱的读者们，本市和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已经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取得了新的胜利。但是，这还只是我们在斗争中迈出的第一步。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充分认识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尖锐性、复杂性，坚决乘胜前进，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们面前的斗争任务，仍然是光荣的艰巨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我们满怀信心地认为，有伟大的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有全市人民和全国人民对我们的监督和热情支持，我们一定能够站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前列，坚决地冲锋陷阵!

让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永远地、永远地飘扬在《北京日报》《北京晚报》这个阵地上!

(新华社 1966 年 6 月 6 日讯，载 6 月 7 日《人民日报》)

中共中央、国务院
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并决定将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三日)

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有不少大专学校和中学，资产阶级的统治还根深蒂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十分尖锐激烈。在大专学校和高中，把文化革命运动搞深搞透，将对今后学校教育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同时，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解放以来虽然不断地有所改进，但是基

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这样也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来研究和制定新的招生办法。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考虑到上述情况，决定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一方面，使高等学校和高中有足够的时间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另方面使实行新的招生办法有充分的时间作好一切准备。

为了不影响高级中学接收新生和新学年开学，高中的应届毕业生，凡本校的文化革命运动尚未结束的，可以由学校妥善安排时间和住地，继续把文化革命运动搞深搞透；在本校文化革命运动已结束，而高等学校尚未招生时，可以由学校组织他们下乡下厂参加生产劳动。

(原载 1966 年 6 月 18 日《人民日报》)

南京大学革命师生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匡亚明[1]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五日)

最近，在江苏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南京大学革命师生揭发了该校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匡亚明的反动罪行。匡亚明以卑鄙毒辣的阴谋手段，镇压校内的革命群众运动，走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道路。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撤销匡亚明的一切职务。

六月一日以前，南京大学广大师生响应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积极投入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六月一日晚，中共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七位同志的一张大字报的消息后，进一步激起了南京大学广大师生的革命热情。正在进行劳动建校的南京大学溧阳分校的革命师生，二日下午贴出大字报。他们一致声援北大革命师生的正义斗争，同时对匡亚明领导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态度，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在这以前，有一位工人写信给南大党委，对该校编著的《左联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提出批评，指出这本书竭力吹捧"三十年代"文艺传统，抵制毛泽东文艺思想。南大溧阳分校政治处印发了这封信，由匡亚明亲自写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按语"。这个按语，有意混淆了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性质，要学生"投入学术大批判运动"，根本不提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按语特别强调"实事求是的原则"，强调通过运动要"初步拟定今后教学计划，为下半年教学作好准备"，企图把文化大革命运动引到邪路上去。按语故意把水搞浑，要"在全校开展一次群众性'兴无灭资'的自我教育运动"，转移斗争目标，打击左派。这个按语还左一个"无意识"、右一个"客观上"，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打掩护。分校学生周冠华、陈云绮、郑立业、王钟元、吴相乔等写出的第一张大字报，就对分校政治处提出责问：是否愿意彻底革命？接着，二年级学生蔡琼、潘玉玲、李为华、施锐琴、王秀英、鲍玉花、周慧和苏

[1] 匡亚明不是反革命分子，这篇报道中所说"反动罪行"，是莫须有的。

寿祁等八人，联名写了一张《十问匡校长》的大字报，义正词严，向匡亚明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言行提出了责问。这些大字报提出的责问，条条问得对，条条问得好。

就因为这些大字报，触犯了匡亚明这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尊严"，他就公开暴露出那副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嘴脸。六月二日下午和晚上，匡亚明在分校连续召开党总支扩大会和全体党员大会，挟持党组织，欺骗党员，先把自己说成是"绝对正确"，然后别有用心地诬蔑批评他的人是"不怀好意"，布置立即组织"反击"，煽动大家"不能手软"，对革命师生进行恶毒的诬蔑、谩骂和恐吓，把革命师生贴出的大字报说成是"毒箭"。

六月三日，匡亚明继续猖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在上午他召集的党总支扩大会上，命令进一步"跟踪追击"、用大大小小的所谓"讨论会"（按：即斗争会）进行反扑，打击革命派。为了做出样子，匡亚明亲自出马，赤膊上阵，参加所谓"讨论会"，破口大骂革命师生。在外语系，他诬蔑写大字报的学生是"反动派"，他甚至谩骂有的学生连"反动派"都不如。并且一再在群众面前，给那些革命积极分子戴上各种无中生有的"帽子"，强迫他们"检讨"，还下命令要一律取消那些写大字报的预备党员的资格。这些暴行，完全暴露了匡亚明这个资产阶级保皇派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刻骨仇恨。

在匡亚明的筹划和组织下，从二日到五日为止的短短四天内，在溧阳分校的五百多师生员工中，被斗的共达七十人，包括学生六十四人，教师四人，工人二人。其中党员九人，团员二十二人。他们大部分是劳动人民的子弟，其中有一些是革命烈士的子女。四个团总支书记，除一个不在家外，三个全被斗了；四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突出政治的标兵，也被斗了。有的被反诬是"小三家村"，有的被说成是"黑帮"，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有的甚至遭受到人身侮辱。三日下午匡亚明回到南京后，竟然趾高气扬，叫嚷"反击"形势大好，命令溧阳分校对被斗的师生要"扭住不放"，并立即召开党委常委会，大肆吹嘘他在溧阳分校的"经验"，颠倒黑白地说是"粉碎了一次六小时的政变"。匡亚明为了压制常委会内部的不同意见，还强调"加强领导"，"统一认识"、"分清敌我"，妄图继续打击革命师生，破坏文化大革命。

中共江苏省委及时发现了这一严重事件，立即派人进行检查，发动南京大学党组织中的革命派和广大革命师生，彻底揭发了匡亚明的反革命罪行。现在，南京大学广大革命师生，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揭发和批判匡亚明的反革命罪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新华社南京1966年6月15日电，载6月16日《人民日报》）

放手发动群众　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

《人民日报》社论

南京大学革命学生、职工和教师，揪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匡亚明，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改组共青团北京市委，罢了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官、夺了他们的权，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最近以来，广大工农兵，广大革命干部，广大革命知识分子，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大闹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向一切资产阶级顽固堡垒，冲锋陷阵，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匡亚明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反革命事件，告诉我们什么呢？

它告诉我们，匡亚明这些牛鬼蛇神，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黑帮，是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是决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的。他们必然要负隅顽抗，必然要作垂死的挣扎，必然要采取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来镇压革命的群众运动，来维持他们摇摇欲坠的反革命统治。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盗窃党的名义，把自己所控制的许多部门，当作进行反党活动的阵地。他们利用一整套专政的工具，来对付革命的群众和无产阶级左派。他们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同党中央和毛主席所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相对抗。运动刚刚开始，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他们就刮阴风，造谣言，制造混乱，转移目标，设下重重障碍，束缚群众手脚。无产阶级左派刚一说话，贴上几张大字报，他们就暴跳如雷，歇斯底里大发作，对左派组织围攻，谩骂恐吓，横加罪名，进行政治陷害。这些家伙们有个奇怪的逻辑，谁要揭露他们，谁要反对他们这伙黑帮，就说谁是“反党”、“反中央”。他们这样干的结果，恰恰和他们的愿望相反，完全暴露了他们这些保皇党、反革命党的真面目，也就为他们的彻底垮台敲响了丧钟。

这场文化大革命，对于那些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了领导权的部门和单位来说，是一个夺权的斗争，是一个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这个斗争，决不能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决不能搞“和平过渡”，决不能搞“合二而一”，而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必须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

要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对群众运动采取什么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这是区别革命和反革命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志。我们应当满腔热情地、全心全意地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积极地投身到这个运动中去，正确地指导这个运动。我们一定要坚定地依靠无产阶级左派，以工农兵为革命的主力军，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集中火力，集中目标，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开火，向资产阶级顽固堡垒开火，向一切牛鬼蛇神开火。

革命的大字报，是揭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是放手发动群众向敌人猛烈冲击的最有效的办法。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都最害怕大字报。一切革命群众，都最喜欢大字报，都把大字报当作揭露和战胜敌人的最强有力的新式武器。你贴一张，我贴一张，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都可以揭发出来，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都可以揪出来，叫他躲也躲不了，藏也藏不住。我们就是要大搞大字报，大辩论，大鸣大放，大长无产阶级左派和革命群众的志气，大灭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一切牛鬼蛇神的威风。

对那些资产阶级顽固堡垒，一定要群起而攻之。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继续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就要在报纸上点他们的名，撤他们的职，罢他们的官，夺他们的权，坚决进行改组。象坚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前中共北京市委，不改组怎么行呢！象作为前中共北京市委的帮凶、疯狂毒害青少年的前共青团北京市委，不改组怎么行呢！象这些反革命顽固堡垒的头头们，不罢他们的官怎么行呢！

我们一定要放手发动群众，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黑帮统统打倒，把他们盘踞的一切阵地统统夺回来，牢牢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

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

《人民日报》社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了。我们要站在运动的前面，积极领导这个运动。

要放手发动群众，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让群众把意见充分地讲出来，把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统统揭出来，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揭出来，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堡垒一个个地砸得粉碎。

毛主席说："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

革命的大字报好得很！

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你一张，我一张，从各个方面，一下子就让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露出了真面貌。

革命的大字报，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揭露各种各样的矛盾。我们就是要从各种不同的意见中，从各种矛盾中，去了解情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革命的大字报，把大是大非的问题摆出来，让大家来议论，大家来鉴别，大家来批判。这对于教育群众，特别是提高青年一代的无产阶级觉悟，真是一天等于二十年。

革命的大字报，大长无产阶级的志气，大长工农兵群众的志气；大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切反动派的威风，大灭资产阶级"权威"老爷们的威风。

对待革命的大字报采取什么态度，是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区分真革命和假革命，区分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保皇派的一个重要标志。

你是革命派么？你就必然欢迎大字报，拥护大字报，带头写大字报，放手让群众写大字报，放手让群众揭露问题。

你是保皇派么？你就必然对大字报怕得要死。见了大字报，脸色发黄，浑身出汗，千方百计地压制群众的大字报。

害怕大字报，就是害怕群众，害怕革命，害怕人民民主，害怕无产阶级专政。

有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的脑袋是花冈岩做的。他们不准群众革命，不准群众写大字报。群众写起来了，他们就利用他们的职权，假借种种名义，组织保皇派搞反革命的大字报，企图围攻革命的大字报，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他们这种做法，我们并不怕。他们跳出来当反面教员，正好提高广大群众的警惕，有利于辨别大是大非，这岂不是一件大大的好事吗！

毛主席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正因为这样,正因为我们充分信任群众,完全相信毛主席领导下的光荣、伟大、正确的党在群众中享有极大的、不可动摇的威信,所以我们提倡群众写大字报,以利于我们对敌斗争,以利于我们改进工作,以利于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更健康地、大踏步地前进。

放手发动群众,放手让群众写大字报,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中央转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

现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

今天(十八日)上午九时至十一时,全体工作队员正在开会的时候,在化学系、生物系、东语系、西语系、中文系、无线电系等单位,先后发生一些乱斗的现象。据我们初步了解的情况,斗了四十多人。在这些被斗的人当中,有重点人,也有些有问题的党团干部和教师,还有两个反动学生。斗争时,发生了在脸上抹黑、戴高帽子、罚跪、少数人被扭打的现象。当时情况比较混乱。

事情发生后,工作组领导小组同志和各系工作组同志,立即赶赴现场,张承先同志在两个斗争地方讲了话,当即得到绝大多数群众支持。十一点以后,情况已缓和下来。

今天发生的问题,同北大革命运动刚开始时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性质根本不同。据初步掌握的材料分析,带头给被斗人戴高帽子、动手打人的主要是坏人有意捣乱,还很有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据房产科有个工人反映,十七日晚上,历史系有个学生(姓名待查)给校外打电话说:"明天上午工作组开会(会议是十七日晚十时左右才决定的),是个好机会。工作组不来,我们斗我们的,工作组来了我们就把他们撵出去。"同时,在斗争时出现一些可疑的现象,据工人王焕同志反映,在三十斋有七个未带校徽,来历不明的人,用电话到处联络,说已斗争过什么人了,现在正斗谁,到十点钟到校办公楼集合等话。还发现有十几个骑自行车的人,到处搜索他们想斗的人,并且把这些被斗的人拉到同一个场合,在一个所谓"斗鬼台",几个不明身份的人在群众中煽风点火。

从几个在乱斗中起主导作用的人物,也可以看出这一事件的本质:

东语系二年级学生陈应复(团员,家庭出身旧职员),有流氓习气,有人称他"小阿飞"。运动中不学习,不参加讨论,到处乱串,今天上午他是"斗鬼台"上的主角,专门把斗争对象拉上台,给被斗人脸上抹黑,戴高帽子,扭打。他自认打了八人,学生反映他打了十

几个，还夸耀自己是打鬼英雄，并且耍流氓，摸妇女的乳房，打屁股。

庶务科一赶车工人刘佳宾，国民党员，兵痞，当过国民党上尉连长，被俘后，隐蔽反革命身份，混入革命队伍，因贪污判过徒刑，后来到北大。上次社教就表现很坏，到处煽动打击党员，这次运动中打人最凶。几次打人他都带头先下手。

无线电系六年级学生夏林翰（党员），今天在斗争一个女干部时，撕破她的裤子，摸她的乳房和阴部。另外还在人群中乱摸两个女同学的下身。散会后已由同学把他扭送到校卫队，此人过去就有严重流氓习气，在王府井曾乱摸女人，偷东西，被逮住过，正在留察期间(已宣布立即开除党籍)。

还有个名叫修治才的人，是个被开除的北大附中学生，今天拿一个一九六〇年的出人证，混人校内，到处起哄。在张承先同志讲话之后，他还在人群中高喊："不行，我们就是要这样的斗法！"

除了这些坏人以外，参加乱斗的还有两种人。一种是本身有问题的人，怕火烧在自己身上，趁机表现自己，假装积极，抓替死鬼，乱斗乱打。政治系二年级学生（调干生）杨文良，在围攻聂元梓等大字报时是个急先锋，今天捣乱又最厉害，很多同志讲应该说理斗争不要打人，他则大喊"要坚决地打，非打不行"。另一种人还是单纯从个人出气出发，不听工作组的劝告，不顾党的政策，不顾文化大革命的整体利益。

针对上述情况，领导小组立即采取了以下紧急措施：

（一）下午一时召开各系工作组长紧急会议。分析了上午的形势，指出这次事件与运动初期所出现的问题根本不同，坏人搞了我们一下，但坏人也暴露出来了。因此决定抓住这件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教育群众，把问题交给群众讨论，辩明是非，擦亮眼睛，提高觉悟、增强革命警惕性。

（二）以系为单位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揭露今天事件的阶级斗争的本质，号召大家引起警惕，严防坏人破坏。会后即分组讨论。同时还强调工作队要高举革命旗帜，坚决支持革命群众把北大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三）今晚十时又召开了全体师生员工大会，由张承先同志讲话，主要表示工作组要坚定地支持真正左派的革命行动。同时，明确指出避开工作组乱打乱斗的做法是有害于革命运动的行为。并指出这种作法会被而且已被坏人利用，指出今天事件的发生本身就是一场复杂的阶级斗争。号召大家务必擦亮眼睛，不要上敌人的当。并组织全体讨论。

（四）还作了一些具体规定：依靠革命的左派，组织起来，维护无产阶级革命的秩序，斗争人要经过工作组批准。还宣布：地、富、反、坏、右分子，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如果乱说乱动，按现行反革命论处。

通过以上措施，绝大多数群众热烈拥护工作组的主张，纷纷揭露并谴责了坏人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如工人张鼎如说："工作组支持我们革命派，领导我们革命。但是有一小撮坏蛋却企图给工作组抹黑，把运动搞乱。我们决不答应，一定要把它顶回去。要和工作组一起，把这次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好。"化学系二年级许多学生，在讨论中揭发了几个假左派的活动情况。有些同学说："坏人企图在文化大革命中把水搅浑，转移斗争目标。我们今天就是混战了一场，上了坏人的当。"许多系的广大师生在会上就高呼口号："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听党中央的话"，"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把北大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

〔附〕 从"六一八"事件和"黑帮大院"看聂元梓的反动面目

北京大学　余崇健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在北京大学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对革命干部乱打乱斗的严重政治事件。"六一八"事件发生后，在全市、全国立即掀起了一股反对各级党委、残酷迫害干部、群众，大搞打砸抢的浪潮。这是林彪、陈伯达、江青及和林彪、"四人帮"关系密切而又颇有权势的那个人，公然干扰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乱党、乱军、乱国，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步骤。

事件的经过是这样：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后，被聂元梓扇动起来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北京大学迅速泛滥起来，干部和部分教师开始受到冲击，不时出现乱批乱斗干部等现象。到了六月十八日上午，情况有了急剧发展，出现了全校性的大规模乱打、乱斗的严重违法乱纪事件，在校园里设了所谓"斗鬼台"，四处抓人，乱打乱斗。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有六十多个干部被戴上高帽子，脸上涂墨汁，身上贴大字报，被罚跪、揪头发、撕衣服、拳打脚踢，拉着游街，而且还发现有多起污辱妇女的流氓行为。当时，驻北大的工作组闻讯赶到现场，工作组长在两个围斗干部的地方讲了话，得到绝大多数群众的支持。当天晚上，工作组长向全校师生员工作了广播讲话，批评了乱批、乱斗干部，违反党的政策的行为，揭露了当场被揪住的几个坏人。

陈伯达、江青及那个和他们关系密切的人对北大的运动和"六一八"事件是一清二楚的，但是，由于他们急于篡党夺权，搞乱全国，便施展卑鄙的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抓住这一事件，大耍阴谋诡计。他们始而高喊要揪出"六一八"事件的后台，既而吹捧"六一八"事件是"革命事件"，翻手为云，复手为雨。他们亲自到北大，以所谓"调查"文化革命为名，以座谈会的形式召见聂元梓等人，扇风点火，蓄意挑起对"六一八"事件的辩论，鼓动他们起来反对工作组。反革命分子聂元梓更是得意忘形地欢呼"'六一八'革命精神万岁！"他们在全校万人大会上公然扇动无政府主义，要群众脱离党的领导，"依靠自己救自己"。江青还在大会上大耍无赖，又是哭，又是骂，气势汹汹地吼叫："有胆的就站出来，我们不怕！"完全是一副政治流氓的嘴脸。她欺骗蒙蔽和假手天真无知的青年，在台上当众批斗工作组组长，并用皮带抽打他。江青对此感到非常得意，还肉麻地和那个打人的青年亲吻拥抱。

"六一八"事件带来了极为严重的政治恶果。首先，最直接的严重后果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的北京大学，被陈伯达、江青及那个和他们关系密切的人一手扶植起来的反革命分子聂元梓篡夺了领导权。从此以后，北京大学变成了推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重要据点。乱批、乱斗，大搞打砸抢抄抓等违反社会主义法制的倒行逆施，规模更扩大，方式更多样，手段更狠毒，对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更加恶性发展。这时候，聂元梓有恃无恐，横行霸道。她秉承江青"十六、十七年官僚机构重重叠叠，学校也是这样，要搞掉"的旨意，学着陈伯达的腔调，鼓吹"上揪下扫"。对上把矛头指向上级领导人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聂元梓是北京市高等学校中第一个揪斗北京市委负责人，并实行

“大弯腰”、“坐飞机”等体罚的。她也是第一个写大字报恶毒攻击邓小平同志的。对下则把学校中层以上的干部打成“黑帮”，把学有专长的老教师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把许多基层干部和许多教师也都列为“黑帮”和“社会基础”，扣上“黑帮爪牙”、“修正主义苗子”等帽子，给他们剃阴阳头、挂牌子、罚跪、戴高帽、游街批斗。在横扫“四旧”的口号下，抄家之风，甚嚣尘上。据统计，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短短几天之内，就有一百多人被抄家，有的教师书籍被抄一空，甚至有的人连必需的生活资料也被抄走。在教职员中，被挂上黑牌子监改劳动的人数以百计。更有甚者，聂元梓之流为了进一步迫害干部和群众，加紧对他们的镇压，由打砸抢抄步步升级，发展到私设公堂、监牢，四处抓人、任意刑讯逼供，以至挑动武斗，把人活活打死杀死，被打身残和留有后遗症的，为数更多。

聂元梓一伙在北大校内私设的刑讯点和牢房共有二十多处，其中“劳改大院”是最大的监狱。他们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关押了许多干部和教师，统称为“黑帮”。因此“劳改大院”也叫做“黑帮大院”。他们对这些同志施行残酷的暴行，触目惊心，骇人听闻。他们制订了一套森严的戒律，不许随便交谈，不许大声说话，不许笑，走路不许抬头，打出血不许擦……。他们为了使这些同志服帖就范，往往采用“杀鸡给猴看”的办法，抓住一个人的一件小事，借题发挥，大施淫威，给新进“劳改大院”的“黑帮”一个“下马威”。他们刑讯逼供，制造假案、冤案，逼迫“黑帮”承认所谓“政治历史问题”和劳改期间犯下的新“罪行”。在这方园不到五百平方米的大院里，完全是一座法西斯集中营。此外，他们还设有兼管指挥、策划武斗、制造武斗工具、教练拳击刺杀以及刑讯逼供的据点，戒备森严，阴森可怕。一时间，校园内妖雾迷漫，腥风血雨，一片白色恐怖。

聂元梓在北京大学刮起的这股更大的黑风，成为陈伯达、江青等人的得意之作。他们欺骗、蒙蔽不明真相的人借“大串连”推广他们的黑经验，从全国各地引来一批又一批的人参观、“学习”。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到八月二十八日一个月当中，来北大串连的共二百一十二万四千多人次，其中仅八月十二日一天就达十七万九千六百多人次。在全国，北京大学成了乱打乱抄、乱批乱斗的黑“样板”，是林彪、江青一伙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橱窗”。此时此刻，聂元梓俨然成了风云一时、不可一世的“英雄”人物。聂元梓这个权欲熏心、野心勃勃的政治扒手，借机把黑手伸向社会，伸向全国，扩大影响。聂元梓等一方面采取播放录音，巡回展览和宣讲等方式，把残害干部、群众的黑经验和“新创造”向各省市推广；另一方面向各大城市派驻“联络站”，狂叫“打倒”这个，“炮轰”那个。聂元梓窜到上海，大闹华东师范大学，亲自批斗、残害迫害曾经担任北大工作组副组长的该校党委书记常溪萍同志，并以此为突破口，在几十万人的群众大会上，第一个喊出了打倒陈丕显、曹荻秋同志的口号，并公开发动了对邓小平同志的攻击。另一方面，则盗用“群众领袖”的名义，以支持“造反”为幌子，到处煽风点火，参与策划一系列阴谋活动，为“四人帮”篡夺上海市党政大权，效尽了犬马之劳。在北京，他们组织“夺权指挥部”，进驻北京市委、华北局、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民委系统以及高教部、教育部、北京日报社等单位，抢大印，夺地盘，造成一片混乱。

简单回顾这段历史，完全可以看出，“六一八”事件对搞乱全市、搞乱全国影响很大，作用极坏。它为反革命分子聂元梓篡夺北大的领导权，为大阴谋家、大野心家林彪、陈伯达、江青等蓄谋搞乱全国、乱中夺权，打开了一条道路。同时也可以看出，林彪、陈伯达、江青等是破坏文化大革命、搞阴谋、耍权术，大搞打砸抢，践踏党纪国法、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罪魁祸首。他们一贯借“高举”以营私，高喊革命口号，贩卖修正主义黑货。他们对同志一贯

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是一伙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和托洛茨基分子，是一伙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聂元梓供认："文化革命初期北大发生的'六一八'事件是江青他们搞的鬼。"他们一伙完全靠欺骗、讹诈、搞阴谋过日子，是政治上的投机分子、反革命两面派，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现在，他们已经被人民革命的浪涛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我们一定要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通过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分清是非，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原载 1979 年 1 月 19 日《北京日报》)

中央批转《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中央同意《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请各级党委根据此报告精神，部署本地区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运动。

当前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的头等大事，也是关系世界命运和前途的一件头等大事。这一仗必须打胜，以彻底解决作为文化革命的重点的文教部门领导权基本不在无产阶级手里的问题。

全国解放以来，文化战线的绝大多数领导机关，一直为以周扬为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所统治，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文化工作路线相对抗。绝大多数文化部门，都成了这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向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阵地。因此，在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中，首要的问题是要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依靠革命左派，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多数，开展夺权斗争，建立无产阶级对文化战线及其所属一切部门的牢固的领导权；要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武器，彻底揭露以周扬为代表的所谓三十年代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和方针，彻底清算。周扬提倡的"国防文学"口号，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口号，必须彻底批判，彻底消毒，真正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高高举起，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引下，建设起崭新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

中央认为，文化部在报告中所提出的对运动的部署，以及组织坚强的革命化的工作队、举办集训班等办法，是可行的，是实现上述要求的重要保证，可供各地、各部门参考。

此件地方发至县委和文化机关党委，军队发至团党委。传达范围，由各级党委酌情决定，文化工作部门可以适当放宽。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日)

目前，全国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战线，同其他战线一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广大职工群众热烈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战斗号召，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猛烈开火。一个前所未有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正在兴起。这个大好的革命形势，必将深刻地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有力地促进生产建设高潮的发展。一切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部门，必须坚决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同时，必须坚决地贯彻执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加快大小三线的建设，力争提前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

今年上半年，无论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和基本建设，总的形势都是很好的，各项指标和去年同期比较，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是，最近时期，一部分产品质量下降，事故增多，设备维修计划完成得不好，某些产品（如钢、钢材、木材和煤炭）的产量开始出现下降的情况，某些基本建设项目的施工进度，也开始出现迟缓的现象，外贸方面开始有所下降。对于这些刚刚露头的问题，各级党委必须看得见，抓得起，立即采取措施，加以解决。要大抓生产，特别要注意大抓质量。高温、雨季已经到来，防洪、防汛、防暑工作也急需妥善安排。

这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锋芒，是指向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特别是指向党内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当权派。这和四清运动的主要打击目标是一致的。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需要用相当长的时间。目前各地党委需要用很大力量领导正在开展的文化教育方面的革命运动，同时也应注意到工矿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必须保证完成国家任务的特点，因此中央认为，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包括设计、施工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要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按照《二十三条》的规定，按照各地原来确定的部署，分期分批地有领导地有计划地进行。不要打无准备、无把握的仗，不要全国所有厂矿企业一哄而起。否则，不但不能取得文化大革命的成功，而且会使生产建设遭到损害。

正在进行四清的单位，要在工作队的领导下，把文化大革命插进去进行。还没有进行四清的单位，可以组织职工群众，集中精力学习主席有关文化革命的著作，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和文章，批判《三家村》，批判经济学界孙冶方等人的修正主义谬论；本单位的重点批判对象，不要急于发动群众批判斗争，要和四清运动一起，由上级派出工作队领导进行。已经结束四清运动的单位，确实达到了搞好运动的六项标准的，可以在本单位党委的领导下，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补课工作；没有达到六项标准特别是领导核心问题没有解决的，要重新派工作队去，从文化大革命入手，把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搞彻底。所有单位，不论属于上述那一种情况，都必须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各级党委必须抓革命、促生产，做到革命和生产建设双胜利。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的单位，要以主要力量抓革命，同时，也要组织一个班子，专门抓生产建设工作。

这个通知，也适用于财政贸易基层单位以及医院等。

这个通知下达到各工矿企业、基本建设、财贸、医院的基层党委，必要时可向职工群众口头传达。

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吧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

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中央关于成立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的通知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日）

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委员会的名单是：

主　任：刘少奇

副主任：康　生、陈伯达、陶　铸。

委　员：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王任重、
魏文伯、胡乔木、肖　华、刘志坚、张平化、
熊　复、王　力、戚本禹、刘　汉。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

高等学校招生，是关系到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大问题，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

解放以来，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虽然不断地有所改进，但是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

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招生办法，必须彻底改革。

一、按照毛主席关于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从一九六六年招收的新生起，各地要向学生宣布：将来毕业以后，必须服从国家分配，可以分配当技术人员、干部、教员，也可以分配当工人、农民。国家分配做什么，就做什么。一定要彻底打破过去大学毕业生只能分配当脑力劳动者的资产阶级的框框。各地要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使学生懂得这是逐步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防止产生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措施之一。各地并要教育本届高中毕业生，高中毕业以后，不论升学或者就业，都是服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是否继续升学，一定要服从祖国的挑选，国家分配做什么就做什么，被选上升学的就升学，需要分配到农村或工厂参加生产劳动的，就积极参加生产劳动，需要分配参加其它工作的，就积极参加其它工作。

今年高中毕业生除国防有关部门按特殊需要挑选以外，仍同以往一样，应该首先满足高等学校招生的需要；在高等学校招生以前，各单位不能自行招收高中毕业生。

二、根据中央关于领导体制适当下放，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的精神，从今年起，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办理；教育部负责编制各高等学校招生计划和检查各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以及完成招生任务的情况。

三、高等学校招生，应该首先保证全国重点学校（包括半工半读的重点学校）所需的新生的质量。各地在办理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一定要有全国一盘棋的观点，服从总的招生计划，反对只顾自己地区的需要，把"尖子"都留下来的本位主义思想。

今年分省市分部门的招生计划，由国家计委和教育部联合下达。各高等学校招生分配计划和其他若干具体事项，由教育部根据本通知精神，另行规定。

四、从今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

高等学校招生的推荐与选拔，应在各地党委统一领导下，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进行。首先由中学根据统一规定的政治审查标准、健康检查标准和高中毕业生的平时成绩，经过学校领导、教师和学生的党团组织共同评议，把德智体三方面条件较好的学生推荐出来，然后由县委或市（区）委组织的由各有关部门参加的招生委员会进行审查，最后集中到省、市、自治区，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下，由高等学校统一招生委员会按照基层党委和中学的推荐意见，并参考学生的志愿择优录取。各地在分配推荐名额时，应大于选拔名额（即招生计划数字），以便从中选拔。

对于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经受过一定锻炼的、政治思想好、年龄在二十五周岁以下（个别特殊情况的可以超过二十五周岁；理工科一般年龄应小一些）、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文化程度、劳动两年以上的工人、贫下中农、劳动青年，以及退伍军人、在职干部（包括中小学教师）、四清工作队员，也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由所在单位的基层推荐到县或市的招生机构审查，然后推荐到省、市、自治区的招生委员会负责加以选拔，保送入学。

对于高中二年级个别在校学生，如果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提前学完高中三年级的主要课程的，也可按上述规定办法，由中学负责审定推荐。

五、高等学校选拔新生，必须坚持政治第一的原则。应该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对于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女以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女，凡是合乎

条件的，应该优先选拔升入高等学校。至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一定要经过严格审查，对于那些在政治上确实表现好的，也允许挑选适当数量的人升入高等学校。在处理政治、学业、健康三者的关系上，必须重在政治表现，要在保证政治质量的前提下，结合学业和健康条件，择优录取。

高等学校在审查学生的学业条件时，理工农医类应该注意选拔数学、物理、化学、外国语成绩较好的学生；文史类应该注意选拔语文、政治常识成绩较好的学生。

六、中央和国务院已经发出通知，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现在决定，本年度高等学校录取新生的时间，从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开始，至一月底结束。

七、高等学校招生办法的改变，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革命性的措施，可能会遇到一些思想阻碍，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高等学校党委，要特别注意加强对招生工作的领导，充分做好思想工作，对教师、学生、家长进行深入的宣传教育，保证中央关于高考制度改革的精神顺利贯彻执行。为此，各省、市、自治区要组织强有力的高等学校统一招生委员会，下属各县、市也要组织强有力的招生委员会。各级党委应当有得力的负责同志主持招生委员会的工作，有关部门和高等学校应当派得力的负责同志参加招生委员会的工作。

今年招生工作结束后，各省、市、自治区和高等学校，应认真总结经验，使其逐步形成一套更加完善的招生制度。

中央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中发〔66〕283号批转高等教育部党委“关于改进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停止执行。

康生在北师大关于“二月兵变”的讲话（节录）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今年二月、三月初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阴谋策划政变，阴谋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计划之一就是要往北大、人大每个学校派去一个营的军队，这个事实是千真万确的，并在北大、人大看过房子的。这件事包含着极其大的阴谋，这件事，北大团委组织部长×××亲自参加过他们的黑会，陆平黑帮给他们修房子，修食堂，人大校长郭影秋完全知道这件事，并且在人大也看过房子。这是一件明显的事，六月一日后，北大的同学用大字报揭发出来的，这消息也传到了你们师大，师大的一位同学叫王运民的，回去在六月二十日贴出一张大字报本来是千真万确的，但是这个大字报，被工作组孙友渔歪曲了。孙友渔在六月二十日的报告中认为，这张大字报是造谣，挑动同学说这张大字报是要使人民解放军去流血，胡说这是要孤立党中央和毛主席。在他五千多字的报告中，四千多字要讲这个问题，为彭真辩护，有些同志不了解，被孙友渔蒙蔽，被孙友渔麻痹了，认为高淑奎、谭厚兰……等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完全是孙友渔一手造成的。而且不仅如此，同志们你们看看这是北师大出的简报，就是这样诬蔑、恐吓群众，制造思想混乱，说：“现在有些同学说，彭真要搞政变，要夺

权，这是造谣恐吓群众，并且用简报形式写出来压人"。本来是件真事，孙友渔说是假的，彭真要政变，要夺权，孙友渔说是造谣。你们说孙友渔到底站在什么立场？同志们想想，这样的工作组能不能领导你们进行文化大革命呢？你们再想想，这样的为彭真大黑帮辩护的人，要不要罢他的官？还要向同学们讲一讲，在孙友渔的反党活动中，他们不去反对彭真黑帮,而把矛头指向党中央《红旗》杂志社，指向林杰同志。你们看，今天我把林杰带来了。同学们，林杰是师范大学的毕业生，是个好学生，是你们的好同学，却被孙友渔说成是林杰同志支持右派学生。还有人讲林杰同志有后台，后台是谁呢？后台是关锋，这里边有一条线索说关锋的后台是陈伯达，是我！你们来审查审查，我们算不算黑帮？算不算黑线？

〔附〕"二月兵变"真相

《解放军报》记者　钱　钢

一九六七年初春，随着一阵阵虎啸狮吼般的北风，一个耸人听闻的消息飞快地传播开来。许多大中城市的街道上贴出了这样的大字报："贺龙彭真阴谋发动二月兵变！""贺龙企图逃往苏联！"

这是一个无耻之极的谣言！这是一个闻所未闻的冤案！康生就是这谣言和冤案的制造者。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一九六六年二月，中央军委为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决定北京市组建一个团，归卫戍区建制,平时担负民兵训练，维持社会治安等任务，战时作为扩编地方武装的基础。这个团组建后，一时没有营房，北京卫戍区便派人到市人委交涉。市人委答复："由你们找有空房子的单位，找到后由市人委出面借用。"卫戍区的同志先到大兴、房山、丰台等地，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后来海淀区武装部介绍，有些大学的学生下去"四清"，有些空房。找房的同志即到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石油学院、农业大学等处进行联系。当时、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表示同意拨出部分空房借部队暂住。但是卫戍区一位领导同志得知后，认为部队住学校不太适宜，决定不住学校。那个团组建后，住到了郊区一个靶场。

谁知道，就是这样一件简单的事情，竟然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一九六六年夏天，"史无前例"的运动在北京的大专院校首先掀起。林彪那个大念"政变经"的"5.18讲话"已在学生中广为传抄，一些"神经过敏"的人，拿着"放大镜"和"显微镜"，四处寻找"阶级斗争"的蛛丝马迹。一天，北京大学有几个学生和工作人员在一起开串联会、会上有人"揭发"了二月间曾要在北大住一个团的事，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调动这么多的军队，很明显是要搞政变。"会后，有个学生把议论的内容整理归纳，将谈到的所谓"政变"取名为"二月兵变"，贴了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很快被转抄了，北师大一个学生看见后，联想到卫戍区也曾派人到人大联系借房，也贴出大字报，质问原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郭影秋知不知道在学校驻兵搞政变的事。

有关"二月兵变"的大字报贴出后，野心家、阴谋家们如获至宝。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康生问郭影秋同志：关于"二月兵变"的大字报你知道不知道？郭说：没有看过大字报，这件事我知道。康说：你知道，汇报过没有？郭说：没有汇报，我认为大字报的事是不

可能的，是没有的。康生当时就给郭影秋看了一个材料。这个材料是他的联络员写的一个汇报，内容是说北大某人曾揭发北大、人大要驻军，兵变确有其事。这个材料经康生用红铅笔批过，康生指着它说："二月兵变"明明是有的！

过了半个月，康生又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群众大会上宣布：在今年二月底、三月初，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变成他们资产阶级专政。他们计划之一要把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每一个学校驻上一营部队，这个事情是千真万确的事情，而且在北京大学看过房子，在人民大学看过房子，这件事是包含极大的阴谋的！

就这样，经过康生的"肯定"，本来是无中生有的"二月兵变"，便成了"千真万确"的事实，其矛头所向，先是所谓的"彭真黑帮"，继而就是贺龙元帅。

一九六六年八月，林彪首先发难诬陷贺龙同志，在他的授意下，吴法宪、李作鹏先后写了诬陷材料。九月七日，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原处长宋治国也受叶群的指使写了诬陷信，其中捏造事实，说贺龙同志领导的体委"私自销毁一百二十部电台"。九月八日，林彪在军委常委会议上诬陷贺龙同志"搞颠覆活动"。这一诬陷一下子和康生的谣言对上了口。康生趁风纵火，竟把谣言放大了许多倍，危言耸听地说：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贺龙去苏联与苏修的将军共谋推翻毛主席的领导；贺龙在体育口阴谋组织政变队伍，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海军、空军都有他的国防俱乐部，还有无线电俱乐部，等等。

林彪一伙也居心险恶地将康生捏造的所谓"二月兵变"引为事实。一九六七年二月，装甲兵有两个干部访问李作鹏时问道："传单说许光达是贺龙兵变中的总参谋长是事实吧？"李答："有那么回事，总参谋长是事实。"又问："二月兵变是怎么回事？"答："去年二月兵变，贺要×军（贺龙的老部下）调北京来，由于中央及时识破贺的阴谋，才使兵变未遂。"

林彪、康生这一伙野心家，就是这样制造了一桩震惊全国的冤案。直到一九七四年，在《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中才澄清："关于所谓贺龙同志搞'二月兵变'的问题，纯系讹传"。

但是，贺龙同志已经惨遭迫害，满怀冤屈地与世长辞了！可以告慰贺龙同志的是：今天，在人民的法庭上，林江反革命集团制造"二月兵变"冤案的罪行，正在受到人民的清算！

（原载1980年12月7日《解放军报》）

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

《人民日报》社论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到今天，已经三十九周年了。

毛泽东同志亲手缔造和直接领导的这支伟大的人民军队，几十年来，在革命战争年代，在同国内外阶级敌人长期艰苦的战斗中，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担负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的任务中，一直保持和发扬了“**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又是生产队**”的光荣传统。近几年来，解放军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林彪同志的指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力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发扬三八作风，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加和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在无产阶级化，革命化，战斗化的道路上，又大大迈进了一步。

我国人民群众历来都把解放军作为学习的榜样。一九六四年以来，全国人民响应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号召，掀起了大学解放军的热潮。这对推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最近，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把人民的军队办成革命的大学校，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贯的思想。我们过去就是这样做的。现在，毛泽东同志根据新的情况，又对解放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国人民，把我国的工厂、农村人民公社、学校、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也都要象解放军那样，办成革命化的大学校。

毛泽东同志指出：

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毛泽东同志这个光辉的思想，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经验，研究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经验，特别是吸取了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教训，创造性地对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问题，作出了科学的答案。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

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无产阶级意识，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促进人们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决裂，从而能够进一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能够更快地铲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

基础和思想基础。

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就可以避免城市和工业的畸形发展，就可以使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就可以培养出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

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去做，就可以实现全民皆兵，大大加强我们的战备工作。帝国主义胆敢侵犯我们，就会被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去做，我国七亿人民就都会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设者和保卫者。他们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

这样，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

中国人民解放军，几十年来就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思想办事的，现在还在不断发展提高。解放军是最好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全国的工厂、农村人民公社、学校、商店、服务行业、党政机关，都要以解放军为榜样，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所有的共产党员，都要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英明指示中，吸取无穷的力量、智慧和勇气，为实现党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伟大历史任务而斗争。

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附〕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

有些大胆的反对造反的人，今天突然变得忸怩起来，絮絮叨叨，吞吞吐吐。什么太片面了呀，什么太狂妄了呀，什么太粗暴了呀，什么太过分了呀。

这统统是谬论！要反对就反对，何必羞羞答答的呢？

我们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你们了！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一起投过去，来一场大搏斗、大厮杀。什么“人情”呀，什么“全面”呀，都滚一边去！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片面了吗?你们要的是什么样的全面呢?看来你们的全面是“合二而一”，是折衷主义。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狂妄吗?我们就是要“狂妄。”毛主席说:“粪土当年万户侯”。我们不但要打倒附中的反动派，我们还要打倒全世界的反动派。革命者以天下为己任，不“狂妄”怎么行呢?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粗暴了吗?我们就是要粗暴!对待修正主义怎么能缠缠绵绵，大搞温情主义呢?对敌人的温情，就是对革命的残忍!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过分了吗？老实说，你们所谓不过分，就是改良主义，就是“和平过渡”。这是妄想！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上，再踏上一只脚!

还有些人，对革命害怕得要死，对造反害怕得要死。你们循规蹈矩、唯唯诺诺，缩在修正主义的蜗牛壳里，一有造反的风声，你们就神经紧张。这些日子，无情的斥责声天天送入你们的耳中，你们天天心惊胆颤，你们不感到难受吗？你们怎么活得下去呢?

革命者就是孙猴子，金箍棒厉害得很，神通广大得很，法力无边得很，这不是别的，正是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要这样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原载《红旗》杂志 1966 年第 11 期)

〔附〕 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一九六六年七月四日)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毛 泽 东

过去，工人打倒资本家，农民打倒地主，剥削阶级诬之为造反。无产阶级造反的帽子真是光荣得很!

今天，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等等产生修正主义的东西，都完全消灭了吗?

没有!

各地各单位的黑线黑帮现在都完全消灭了吗?

没有!

现在消灭了黑线黑帮,将来就不会产生新的黑线黑帮吗?

不是!

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消灭了吗?

没有! 没有!! 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产阶级能不造反吗?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怎么能不万岁呢?

资产阶级的右派先生们，我们这群造反之众，有领导，有武器，有组织，有“野心”，来头不小，切不可等闲视之。

我们的领导是党中央和毛主席!

我们的武器是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我们的组织是彻底革命的红卫兵!

我们的“野心”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撼山易，撼红卫兵难!

资产阶级的右派先生们，我们很理解你们的特殊心情：你们被我们专政了，你们痛苦了，你们也想喊一声“造反”了。无怪乎，最近出现了左派、右派齐喊造反的怪现象。老实告诉你们，珍珠不容鱼目来混杂。我们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 你们胆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 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七月四日

(原载《红旗》杂志 1966 年第 11 期)

〔附〕 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古今中外的一切反动派说：剥削有理，压迫有理，侵略有理，修正主义统治有理，无产阶级造反无理。是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最伟大的革命导师毛主席，把这个混蛋理论颠倒过来了。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今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革命的大造反。谁个是修正主义，谁个反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大造其反！

我们，毛主席最最忠实的红卫兵，无限忠于毛主席，一定最坚决，一定最勇敢，最忠实地执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关于造反的最高指示。

对待革命的造反行动采取什么态度，是鉴别忠实于最高指示还是反对最高指示的分水岭，是鉴别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

你是革命者么？你就必然欢迎革命的造反，拥护革命的造反，参加革命的造反，一反到底！

你是反革命么？那就出于阶级的本能，就必然咒骂造反，反对造反，抵制造反，镇压造反。

无产阶级革命的左派，就是靠革命的造反吃饭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天天在造我们的反，你不造他的反，他就造你的反，骑墙、搞折衷是不行的！对黑帮,对旧世界，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对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就得来一场革命的大造反！

一听革命的造反就心惊肉跳，就皱眉头，就暴跳如雷，就骂街，就歇斯底里大发作的先生们，不是反革命就是糊涂虫！这些混蛋们，只准他们造无产阶级的反，不准我们无产阶级造他们的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真是岂有此理，欺人太甚！

造反，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传统，是红卫兵要继承和发扬的传统。我们过去造反，现在造反，将来还要造反！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就要造反！只要有矛盾存在，就要造反！革命的造反精神，一百年需要，一千年需要，一万年一亿年还需要！

目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激荡的大风暴。红卫兵的战士们，一切革命的同志们，让我们像勇敢的海燕一样在这场大风暴中翱翔吧！

红卫兵的战士们，我们既然已经把反造起来了，那么就一反到底吧！迎上前去，让革命的大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万万岁！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原载《红旗》杂志 1966 年第 11 期)

〔附〕 一个红卫兵发起者的自述

梁 梁　执笔

二十年前发生的事情，就象昨天那样清晰。当年卷入那场红卫兵运动的青年，在他们已经进入成熟的中年的时候，在中国已经是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改革年代，仍然在默默地、不止一次地进行着严肃的反思。原北京清华附中的高中学生卜大华，是红卫兵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我们讲述了红卫兵运动从发起、兴盛到中落的过程，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线路。

那是一段十分痛苦的经历。当然不是我一个人，整个民族都遭受了一场深重的灾难。但是作为这场运动的"急先锋"——红卫兵的发起人之一和较早觉醒因而遭受迫害的人来说，那场运动对于我的教训就更加深刻了。

要寻找红卫兵的思想轨迹，就不能忽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我们是新中国的同龄人，是和年轻的共和国一同成长的。我们所受的教育，无论来自家庭的还是社会的，都使我们特别容易接受党的一切宣传，包括正确的和后来被证明是"左"的东西。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党的指导思想越来越"左"，59年开始把党内斗争说成是阶级斗争，62年更进一步把阶级斗争观念扩大到意识形态及一切领域。天灾人祸，无一不纳人阶级斗争的轨道。对内"四清"，对外反修防修，这一切都对我们正在形成的世界观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64年提出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更使我们激动不已，政治热情和革命责任感空前高涨，报纸上和社会上所开展的一切讨论都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可以说："阶级斗争"的观念已深深地注人了我们的头脑。

66年5月初，我们班的班长写了一份思想汇报，谈对《海瑞罢官》的认识过程，当然是从学术问题往政治问题上认识。我和另一个学生干部在前面加了个"编者按"，提出要"突出政治"，结果引起了全校大讨论。为此我们和校领导发生了争执，我们说校方不积极引导讨论，是不突出政治，校方说你们这样对待党组织很危险，当心57年的教训。我们当然不理会这些了，深信我们的行动能得到中央的支持。到5月中旬，我们和校方的矛盾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每天都是两种意见的激烈辩论，下了晚自习我们几个同学也常常聚在一起分析形势。一点不是瞎闹着玩，那时就这么想：我们是在参加一场实实在在的阶级斗争。

有一天，一位同学跟我说，他写的小字报署名叫"红卫兵"。我一听就觉得这个名字很贴切，说今后凡是和我们意见相同的小字报不如都署名红卫兵。这个意见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从此我们便有了统一的名称。当然我决想不到这三个字以后会风靡全国，震惊世界，演出那样复杂纷纭的活剧来。"红卫兵"被推上政治舞台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必然性，至于它叫什么名字则是偶然的，是个插曲。

5月29日，卜大华等和其他高年级的学生聚在一起讨论形势和对策。这一天后来被看成是红卫兵的诞生日。

6月2日，各报转载了《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全国上下为之震

慑。从这以后，文化大革命正式拉开帷幕。

同日，清华附中正式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表示“坚决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红卫兵”三个字后面有一百多人签了名，卜大华名列其首。

尔后北京各中学学生纷纷涌到清华附中观看大字报，并纷纷以某校红卫兵的署名来表示他们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红卫兵”不胫而走，出现在各个校园。

然而，真正把红卫兵推上历史舞台的，还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起者——

大字报仗打翻了天，工作组进驻学校，明确表示校方压制学生，犯了错误。我们大受鼓舞，把这看成是党中央对我们的支持。不错，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就是在那种情况下产生的。说它的名气大，那是因为后来毛主席支持了它。这篇东西写出来后，我们几个讨论了一下就贴了出去。这下可热闹了，工作组非常紧张，问我们“造反”两个字如何解释？现在是共产党领导，要造什么反呢？我一点也不慌，拿出了确凿的根据——66年6月5日《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摘引的毛主席的一段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工作组的同志惊愕不已，又亲自去对证核实。我们想，也许我们阐述得不清楚，那就再来一篇，于是就有了“二论”“三论”，无非是对第一篇的补充。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些东西，不仅内容是错误的，而且只是些口号词藻的堆砌，什么“天翻地覆”“人仰马翻”“落花流水”……

“三论”出来后一再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我们有压力。但我们反复琢磨，认为我们的观点是对的。我们希望得到支持。于是，7月28号，在海淀区的一次文化革命工作大会上，我们把前两论递了上去，请那天到会的江青转给毛主席。8月3号，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突然把我们召到钓鱼台，给我们看了一份令我们惊喜万分的文件。当时中央正在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的第二个文件就是《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后面附着我们的“两论”。信是8月1号写的。信上说：“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的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以热烈的支持。”信上还有一处“热烈支持”，是对北大附中的彭小蒙讲的。想想看，一个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威，一位万众仰望的至高无上的领袖，对我们连说了三个“热烈支持”，这还得了吗？我们当时的情绪大概只能用“紧跟毛主席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来形容了。

红卫兵立即成了最有光彩的称号，人们纷纷放弃自己组织五花八门的名称而统归于它。但这仍然只能算是嘹亮的前奏，真正的高潮是1966年的8月18日——

所有当年的红卫兵都知道这个日子。那天天安门前集会，各学校的学生潮水般地从东西长安街涌到天安门广场。我和许多红卫兵一起登上了红色观礼台。我们高兴坏了，颇为自己是毛主席支持的红卫兵而自豪。一会儿得到通知说：“今天要让红卫兵上天安门，很可能毛主席还要亲自出来接见。”我第一次登上这巨大的城楼，俯看广场热烈的场面，抑制不住兴奋和激动。毛主席那天穿军装，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很多老干部没有准备，一见到后也纷纷赶回去换装。毛主席显然是经过考虑才穿军装的，含义是什么？也许是表示坚决要搞文化大革命的决心？红卫兵特别喜爱穿军装，大概就是这么来的。

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这意味着毛主席向亿万群众明确了他

对红卫兵的支持。我站在毛主席和周总理中间，新华社记者为我们拍下了照片，那时我刚满18岁。

8·18之后便是大串联。红卫兵杀到各地去"煽风点火"。毛主席则在北京一次又一次地接见全国的红卫兵，四个月的时间连续接见了八次，这种举动实在异乎寻常。我后来终于明白了，从65年下半年到66年上半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酝酿过程不可谓不长，但仍形不成全国的声势。65年秋，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那篇文章《人民日报》顶着不发，只好到上海去出小册子，这说明党内的反对力量也很强。而毛主席对红卫兵的支持，则使局面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

9月之后，卜大华开始从"左派"的狂热走向迷惑、不解和痛苦的思考。他们原以为文化大革命是夺回被资产阶级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而他们在京广线和沿海一带串联，看到的却是没有一个党的领导、没有一个党的组织、没有一个省委、市委不受到"炮轰"和"火烧"。到处是"打倒"，到处是混乱。难道红卫兵运动所带来的竟是这种结果吗？就是用这种疯狂的破坏方式去打倒一切、毁灭一切吗？

当时清华附中红卫兵在各地的待遇有如"首长视察"，每每被请上主席台就座。在认真了解了湖北的情况之后，卜大华他们支持了湖北省委。当时的省委书记激动地挽着卜大华他们的手臂高呼口号。后来王任重同志对他们说：你们起了很好的作用。然而北京的形势也大变了，从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到一大批战功赫赫的老帅，一个个相继倒台，他们信任的王任重同志也被炮轰，最后，连他们中许多人的父母也成了"资产阶级"。那么党呢？一个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党难道只是由少数几个好人组成的吗？

大串联的那些日子，我的心情一直郁郁不乐，在外地时甚至没有戴过红卫兵袖章，我们实在耻于同那些对不论什么人都不分青红皂白高喊打倒的人为伍。文化革命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一级组织的领导人到什么程度才该打倒？我们常常为这些问题讨论到深夜。毛主席给我们的那封信尽管说了三个"热烈支持"，但也说了这样的话："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然而冷酷的事实常常否定了我们讨论的结论，面对这一场我们曾经那样热烈响应的革命，我们陷入了深深的迷惘。

我们的特殊地位也使我们多多少少接触到了党内一些不正常的东西。有两件事对我震动很大。一次是66年8月6日，在天桥剧场，江青把几个有名的红卫兵叫到一起，神神秘秘的、象哄小孩似地说："我跟你们说呀，中央内部也不一致，我们站在前台支持你们，可是有人背后捅刀子，有人谎报军情……"我心里很别扭，觉得有一种阴暗的东西让人不痛快，同年10月份，社会上出现了炮轰陶铸，王任重同志的风潮，陈伯达、王力找我们了解王任重同志和我们接触的情况，我们如实讲了，认为这种接触是光明正大的。没想到陈伯达不阴不阳地摇摇头，王力弦外有音地说："这些情况我们都不知道。"我觉得很不正常，这不是我心目中的党。

66年12月，在经过了迷惘、徘徊和思考之后，我们终于忍不住了，公开贴出了"向中央文革质疑"和"向江青同志质疑"的大字报。当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那两篇东西都还是很肤浅的，还不可能从根本上认识文化革命，只是对文革中的个别现象提出了疑问，尤其对中央文革小组提不得一点意见的做法表示不满。比如"毛主席批评江青同志有小资产阶级情

绪，我们还要再加上一句：心胸狭隘，听不得不同意见”。

我们的做法大大激怒了他们。67年1月25日，我被扭送入狱。对此我最大的感觉是气愤而不是害怕，难道仅仅因为给中央文革提意见就可以抓人吗？在监狱待了88天，没有人理我。我愤怒地要求将我释放，我渴望辩论，渴望见到最高领导人。我巴不得他们提审、批斗，我会拿出自己的全部辩论才能和他们干一场。可就是没有人理我。后来监狱的管理员透露说：“你们都是中央文革让抓的，不是我们管得了的。”我们干等了快三个月。4月22日，监狱突然一个一个牢房提人，一下子点了一百多人，全是“老”红卫兵。我们说这回有戏看了，要是去批斗才有意思，一百多个红卫兵往台上一站，看他们怎么批。没想到不是去批斗，而是坐着大轿车到人民大会堂接受中央首长的接见。中央碰头会的成员差不多都在。江青假惺惺地说了一句“委屈你们大家了。”当时我们都哭了起来，觉得委屈，委屈极了。还有一个原因，好久没见到周总理，这回又见到了。周总理问：“有没有清华附中的？”我站了起来，但哭得说不成话。总理那天很严肃，开始是一声不响，后来也流泪了。总理说：“在这里见大家是毛主席的意思。我送外宾到广州，发现抓了许多人，都是些孩子，这怎么行呢？不能不教而诛嘛！回京后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说：‘不要抓嘛，放出去嘛。’”后来我们还得知，所谓的“二月逆流”，一批老帅和副总理向中央文革发难，其中也说了这样的话：“你们不教而诛！十七八岁的孩子也抓。”就是指的我们。

——结束了。红卫兵运动由此中落，取而代之的是名目繁多的造反派组织。原来的红卫兵迅速分化，一部分人由于沦为“革命对象”的子女和自身的思考而变成文化革命的对抗力量，另一部分人则或向造反派靠拢，或被潮流裹挟着前行。

上海“一月风暴”，造反派开始全面夺权，中国进入了更为深刻的全面内战。天下大乱，绵绵十载。卜大华也象千百万人一样，因卷入了这场翻云覆雨的政治斗争而在心灵上备受创伤。1976年，周总理的逝世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使他由悲痛转而愤怒，他坚决拒绝参加所在单位的“运动办公室”，拒绝揭发所谓“政治谣言”。那时的中央对“四·五事件”的态度使他震惊和极为失望，他觉得需要用一种全新的眼光——否定的眼光来看过去了。明白了这一点他首先感到的是痛苦，极度的痛苦，远胜过67年的锒铛入狱。他甚至说，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过问政治了！所幸的是这种念头只存在了短短的一瞬，“四人帮”的倒台使他迅速振作起来。

我当然没有消沉，消沉是不可能的。中国的伟大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是那样深深地吸引着我。这不仅因为它能使中国走向富强之路，还因为它是从根本上避免文化革命悲剧重演的唯一途径。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这代青年的向往和追求，要做的事情很多，真正有志气的青年人应该在这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二十年来我是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责任感和热情却没有消失，而且永远不会消失。

（原载《中国青年》杂志1986年第10期）

中共中央关于决定陶铸同志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的通知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

中央决定陶铸同志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特此通知。

炮　打　司　令　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毛　泽　东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中央决定撤销转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的文件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中央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

红卫兵紧急呼吁书

（一九六六年八月六日）

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

最近，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运动中出现了一系列极端严重的错误事件。一小撮混蛋和一伙不听毛主席话的糊涂虫披着红卫兵，红旗等革命左派组织的外衣，打着造反的旗号，公然抗拒毛主席的指示，公然违背党的政策，公然违犯无产阶级专政纪律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压制打击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到处殴打一些人，打伤了许多好人和工农革干子弟，捣毁机关学校，进行流氓活动，有人竟敢乘机肆意毁坏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画象和塑象，发泄自己对革命的刻骨仇恨，进行反革命政治活动！这一切，都严重地破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着革命左派的威信，破坏着党的威信，破坏着毛主席的威信。

我们感到十分的痛心和最大的愤慨，我们强烈地反对这些流氓行为！我们要正告那些混蛋：党中央和毛主席撤走了工作组，交给了我们自己闹革命、自己领导自己的伟大光荣的历史使命，十分信任我们，对我们寄托了无限希望。但是你们滥用党和毛主席对我们的信任，肆意玩弄这个历史使命，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文化大革命，辜负党的希望，把伟大的严肃的政治斗争引入庸俗下流的歧途，你们对得起党中央和毛主席吗？你们对得起看着北京的全中国人民吗？我们一百个不答应，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你们也喊"造反"，但是无产阶级造反同流氓造反毫无共同之处。我们再一次严正声明：我们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右派流氓胆敢乱说乱动，立即镇压！

真正的革命左派最听毛主席的话，最坚决地造修正主义的反，我们造反，毫无私心杂念，绝无争权夺利，从不脱离毛泽东思想，从不脱离党的政策，是革命的高水平的造反。而你们除了不分好坏地乱打一顿，就是耍流氓，实在低级，这叫什么左派？你们是假左派，伪红卫兵，伪红旗！

我们向全市真正革命的红卫兵、红旗及其他左派组织呼吁：

（一）各校真正的左派联合起来，行动起来，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格制止乱打人，耍流氓，破坏国家财产等坏行为。提高警惕，监视、管制反革命分子，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二）毫不留情地勒令那些故意破坏党的政策的混蛋们滚出红卫兵、红旗及其它真正左派组织；假左派组织一律解散！今后谁还胆敢破坏党的政策，我们绝不答应。

我们认为，有一些同志出于一时义愤，忘记了党和毛主席的教导，忘记了党和毛主席亲手交给我们的自己闹革命、自己闯出新道路的伟大历史使命，忘记了党的政策，乱搞一通或者为坏人利用。我们希望这些同志能够认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认真地学习党的政策。同志们，党的政策是党的生命。我们工农革干子弟，决不能去损害党的生命。我们只能最主动、最积极、最勇敢、最坚定地捍卫党的生命。上刀山，下火海，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辞！

革命的同志们，让我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指引下，最好地、胜利地完成党中央和毛主席交给我们的自己闹革命的光荣、伟大、艰巨的历史使命！依靠革命左

派；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革命师生，一斗、二批、三改。把我们的学校办成社会主义的新学校。请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放心吧!!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二、主流和曲折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

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的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特别是年青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

目前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存在着四种情况。

（一）　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他们是"敢"字当头、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们提倡大字报，大辩论，鼓励群众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时也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种正确领导就是由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由于毛泽东思想领先。

（二）　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他们是"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规，不求进取。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他们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三）　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实际上，他们只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接受群众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谅解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

（四）　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做法是正确的，那些做法是不正确的。

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

谁是我们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

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

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

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帖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八、干部问题

干部大致可分以下四种：

(一)　好的。

(二)　比较好的。

(三)　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四)　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

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九、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

无产阶级同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斗争，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

十、教学改革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在各类学校中，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十一、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

在进行文化革命群众运动的时候，必须把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传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同对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思想批判很好地结合起来。

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其中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

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

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

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十三、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

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的重点。

文化大革命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

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乱它，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但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题，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交给群众讨论，以便进一步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

有的地方，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这样做，如果那里党委认为合适，也是可以的。

十四、抓革命，促生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十五、部　　队

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在广大工农兵、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

各级党委，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各级党委，要遵守毛主席历来的指示，贯彻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伟大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撤销和补选书记处书记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通过）

（一）十一中全会批准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的决定。

（二）从已揭发的大量事实证明，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错误性质是极端严重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因此，全会决定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撤销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

（三）批准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调叶剑英担任书记处书记的职务的决定。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在北京举行。

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进行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出席了会议。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同志，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中央有关部门的同志，首都高等院校革命师生的代表，列席了会议。

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全会讨论和批准了一九六二年九月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关于国内和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

国　　内

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对当时的形势作了正确的分析，再一次强调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这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南。近四年来，我国人民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指引下，展开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人民公社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全国到处是一片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正在出现新的全面跃进的局面。

我国的国民经济正在持续地健康地向前发展。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已经胜利实现。从今年起，开始实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在工业战线上，不但产品的数量，而且品种，质量，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在农业战线上，连续四年获得了好收成。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三次核试验的成功，集中表现了我国科学技术和工业发展的新水平。

近几年来，在全国的农村、城市和军队，广泛地展开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现在，一个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我国兴起。工农兵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活学活用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开创了劳动人民直接掌握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纪元。

全会完全同意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完全同意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这两个文件，是在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下制定的，是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在农村和城市，应该继续按照这两个文件，结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四清”运动，也就是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

全会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近四年提出的一系列英明决策。这些决策主要的是：

关于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发扬群众路线的革命传统的问题。

关于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

关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号召，

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

关于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问题，

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体系和布局的问题，

关于全党抓军事，实行全民皆兵的号召，

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规划和部署的问题，

关于人民解放军和工厂、农村、学校、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都应该成为一个革命化的大学校的号召。

全会强调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当前我国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

全会认为，搞好这场文化大革命，关键在于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这就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

众的先生。要敢于革命，善于革命。不要怕出乱子。反对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包庇右派，打击左派，压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制造许多框框，束缚群众的手脚。反对做官当老爷，站在群众头上瞎指挥。

要热烈支持革命的左派，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全会认为，毛泽东同志在近四年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问题，大大加快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胜利，对于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防止修正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我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积极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保证我国将来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国　　际

八届十一中全会认为，当前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形势是大好的。当前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各种政治力量正在经历着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局面。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特别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尽管国际形势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曲折和反复，但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总趋势，是改变不了的。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对革命群众的残酷镇压、疯狂进攻和收买欺骗，都不能挽救他们灭亡的命运，相反，只能进一步地促进各国人民的革命觉醒。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所进行的反人民反革命的活动，正在促进各国人民的革命活动。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貌似强大，实际上是很虚弱的。从长远看来，他们都是纸老虎。

苏共新领导集团，继承赫鲁晓夫的衣钵，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他们的路线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维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统治，在社会主义世界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苏共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伟大的列宁，背叛了伟大的十月革命的道路，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叛了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事业，背叛了伟大的苏联人民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利益。他们咒骂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其实，他们所攻击的恰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正在联合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结成一个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反中国的新神圣同盟。可是，这种反革命的神圣同盟，是注定要破产的，现在已经陷于分崩离析。

全会认为，近几年来，我们党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所进行的全面的公开的批判，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是一个纲领性文献。在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下制定的这个文件，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九篇评论，《评莫斯科三月会议》，以及林彪同志《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文章等等，对当代世界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分析，是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

全会认为，要反对帝国主义，就必须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决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对于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必须划清界限，坚决揭露他们工贼的真面目，不可能同他们搞什么“联合行动”。

全会指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我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全会热烈支持亚洲、

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正义斗争，支持全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全会最强烈地谴责美帝国主义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罪行。全会最热烈、最坚决地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的《告全国同胞书》，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打到底，直到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最后胜利。全会完全同意我党中央和我国政府同越南方面商定的关于援越抗美的一切已经采取的措施和将要采取的行动。

全会强烈谴责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在越南抗美斗争的问题上，执行假支持、真出卖的反革命两面政策。

全会认为，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共同敌人。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美帝国主义，必须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奉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中，进行分裂、破坏和颠覆活动，积极为美帝国主义效劳。他们当然不包括在这个统一战线之内。

我们一定要联合世界上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人们，把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进行到底。

我们一定要同全世界一切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道，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把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推向前进。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八届十一中全会强调指出，全党全国大学毛泽东同志著作，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全会认为，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展开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工农兵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进一步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是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我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最可靠、最根本的保证。对毛泽东同志著作，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普遍适用的，应当进一步在全党全国推广。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我们的党，是毛泽东同志缔造和培育的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我们的党，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有认真的自我批评精神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我们的党，是经历了历史上最激烈、最艰苦、最长期、最复杂的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国家是伟大的国家。我们的军队是伟大的军队。我们坚信，在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军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和障碍，一定能够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一定不辜负世界革命人民对我们的期望。

八届十一中全会号召全国工人、人民公社社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师生、科学技术人员，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克服从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诸方面来的阻力，克服困难，克服缺点，克服错误，克服党内和社会上的阴暗面，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

革命进行到底，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我们一定要有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敢于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我们一定要把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建设好，使它成为无产阶级的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一定要百倍地提高警惕，防止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的突然袭击。如果它们胆敢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七亿中国人民，就一定要打断侵略者的脊骨，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它们消灭掉。

(原载 1966 年 8 月 14 日《人民日报》)

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

毛 泽 东

关于第九次大会的问题，恐怕要准备一下。第九次大会什么时候召集的问题，要准备一下。已经多年了，八大二次会议到后年就十年了。现在要开九次大会大概是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再开，现在要准备，建议委托中央政治局同它的常委会来筹备这件事，好不好？（热烈鼓掌）

至于这次全会所决定的问题，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要看以后的实践，我们所决定的那些东西，看来群众是欢迎的。比如中央主要的一个决定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广大的学生和革命教师是支持我们的，而过去那些方针，广大的革命学生跟革命教师是抵抗的，我们是根据这些抵抗来制定这个决定的。但是，究意这个决定能不能实行，还是要靠我们在座的与不在座的各级领导去做。比如讲依靠群众吧，群众路线，还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依靠，一种是不依靠；一种是实行群众路线，一种是不实行群众路线。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都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可能比过去好一些，因为过去没有这样公开的决定，并且这次有组织的保证。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议以及公报的实行。

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比如说对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题。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所

以，我看这次会是开得好的，是有结果的。（热烈鼓掌）

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

林　彪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已经胜利地结束了。这一次会议，从头到尾，都是主席亲自领导的。今天，主席又在会议上同我们作了极为宝贵的指示。这次会议解决了重大的问题。在这次规模伟大的文化革命进行的过程中间，发生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几乎扼杀这一个革命，使之停顿下来，中断下来，倒退下来。在这种危险的时候，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势，使这次文化革命能够重整旗鼓，继续进攻，打垮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使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除了物质的发展以外，精神上、思想上得到健康的发展。今天又把组织机构解决了，保证了我们今后的工作能够更加落实。

现在如果是没有别的问题，就宣布散会。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三日）

林　彪

今天开会议论一下中央全会的传达问题，工作部署问题，文化革命问题，干部问题。

我先讲两个问题。

一个是文化革命问题。

前天晚上我同主席谈军队的文化革命问题，主席叫我向大家讲一讲，供地方工作参考。

现在军队里师级以下的单位，只搞正面教育，宣传文化革命的意义，学习文件，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批判和肃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军级以上机关，则发动群众搞大民主，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搞文化革命，大体上准备搞三个月。同时，在运动中解决机关的精简问题。过去我们提倡四轻四重，主要的是机关轻，连队重。但是，机关还是很大。主席说，地方上也要注意这件事。

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思想革命，就是大破一切旧思想，树立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的头脑，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带动业务，带动经济建设，带动各项工作。

从思想的形成过程来说，是从客观到主观，从实际到思想。从办事情的过程来说，倒过

来，是从主观到客观，从思想到实际。在实践中，又不断地丰富了主观，丰富了思想。要做好工作，首先要搞思想革命，即先搞主观世界，动员人的积极性。主席说的思想领先，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必须认真搞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苏联没有搞，所以革命失败了。我们就要搞。要大搞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用无产阶级思想代替孔孟之道，代替资产阶级思想，代替一切旧思想。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反革命复辟，防止反革命颠覆。这方面的工作一削弱，资产阶级复辟和颠覆的可能性就要增加。

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革一切旧思想的命，就是改造人的灵魂，就是要做到人的思想革命化。只有在人的灵魂改造、人的思想革命化的基础上，才能保证充分发挥人的革命积极性。才能使人变成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不然，就会使人变成低级的人，没有道德的人，庸俗的人，唯利是图的人，变成苏联社会出现的那种追逐名利、道德败坏的人。

没有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道德，就必然是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道德。我们应当大破旧思想、旧道德，大立新思想、新道德。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措施。

我们许多同志，容易埋头于粮、棉、油，还有钢铁、煤炭的指标，而忽视政治思想。其实粮、棉、油、钢铁、煤炭，怎么才能上去呢？只有把人的思想面貌改变过来。每行每业，如果都由我们想办法，不行，我们没有那么多办法。我们应该抓政治思想革命，从思想解决问题。把群众从思想上武装起来，动员起来，群众起来了，就会有办法了。亿万人思想革命化了，一切办法都会有了。这是我们党领导我们国家由弱到强，由落后到先进的根本办法。

毛主席说，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是一个伟大的唯物辩证法真理。这个真理既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又符合自然、社会发展的规律。掌握了自然、社会的发展的规律，就是掌握了正确的思想，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把思想传播给群众，就能把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把毛泽东思想这一个伟大的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根本保证。否则，我们就会变成修正主义。我们一定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打倒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发挥群众的智慧，把人的精神面貌改变过来。

思想革命不是一个大运动能彻底解决的，但是必须要有一个大运动，才能把资产阶级的威风打倒，才能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权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具体的作法是坚决按照十六条办事，字字句句都要按中央的决定去做。

这次文化大革命触及每个人的灵魂，党政军、工农商学兵，三里五界都是我们斗争的领域，十六条是我们具体的行动纲领。

不要重复压制群众、围剿左派的错误。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坚定地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冲破一切阻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要走过场，干脆大闹几个月，弄得人们睡不着觉。这一次一定要大搞，这是破旧立新的重大的战略措施。

第二个问题，是军队的干部问题。

这个问题我有些想法，报告过主席，主席也同意，叫我来向大家讲讲。

对待毛泽东思想有两种人。

一种人拼命学毛泽东思想。有的人学得好，挨打击。因为那时候管思想的最高机关中宣部，陆定一那一帮人，上边还有根子，反对学毛泽东思想，他们污蔑学毛著像吃宣威火腿，天天吃就腻了。污蔑立竿见影，说没有太阳，就见不到影子。甚至恶毒攻击，胡说什么现在

学毛著好的人，将来打起仗来，都是汉奸叛徒。这些黑帮对毛泽东思想充满了敌视、仇恨。

一种人不学毛泽东思想，处于落后或中间状态。

对待政治思想工作，也有两种人。

一种人重视政治思想工作。

一种人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甚至捣乱。

我们的干部在对待工作问题上，也有两种人。

一种人有干劲，工作有成绩，但是性情急躁，得罪人不少，运动中大字报最多，过不了关，大家群起而攻之，要求罢他的官。

一种是老好人，什么事情也不做，什么斗争也不参加，谁也不得罪，人事关系搞得好好的，选举的时候能够得全票，运动中贴他的大字报也很少。

所以我们对干部，要来个全面考察，全面排队，全面调整。我们根据主席讲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原则，提出了三条办法，主席同意了。

第一条，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

第二条，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同政治思想工作捣乱的，同文化大革命捣乱的，罢官。

第三条，有没有革命干劲。完全没有干劲的，罢官。

这三条，同主席的五条原则是完全一致的。我们要按主席的五条和这三条，特别是第一条，作为识别、选拔和使用干部的标准。

这次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个全面的调整。那些犯了错误甚至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只要他们接受教育，坚决悔改，还可以在今后工作中继续考验他们。至于那些不可救药的，就坚决罢官。不这样，就打不破死气沉沉的局面，一旦有事要搞颠覆活动的就是他们。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我们的政权究意是掌握在什么人的手上？是掌握在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人手上，还是掌握在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手上？这是一个严重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经不起战争的考验，经不起反革命颠覆的考验。只有组织机构革命化了，我们的党才能经受得住一切考验。在干部问题上，只搞思想革命化，不搞组织革命化不行。该升的升，该降的降，该留的留，特别是关键的岗位上，不能埋下颠覆的种子。不然，在组织上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

组织问题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之一，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一切方针路线就不能贯彻。毛主席常讲出主意，用干部。一个是办什么事，一个是什么人去办，这两个缺一不可。“人存事兴，人亡事废”。用干部就是组织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一定要用可靠的人，要用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人。现在人多得很，为什么不用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人。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人很多，青年学生中就有很多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人。现在团中央的许多人，不如十七、八岁的青少年。为什么不用青少年？当然，有些人也可以照顾使用，但是他们不能成为工作中的骨干。

政权是革命的根本问题，组织问题就是政权问题。

历史唯物论的根本原理就是历史是人创造的。人是最重要的物质，人是一切物质中发展起来的最高物质，人是能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是同大自然斗争的力量，也是进行阶级斗争的力量。历史是人创造的，没有人就没有历史。历史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而人，劳动人民，是社会生产力的第一要素。没有人，没有劳动人民，就谈不上社会生产力和它的发展。所以，历史就是劳动人民的历史。

在阶级社会里，人是阶级的人。爱什么，恨什么，都是有阶级性的。所以我们要重视人的政治思想工作，不发挥人的积极性，是不能推动历史的发展的。

修正主义国家不重视，也不可能重视人的政治思想工作，我们不能象他们那样。我们要极度重视人的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主要是发动群众的力量和智慧，解放生产力，依靠群众去创造历史。否则，单纯军事观点，单纯技术观点，单纯业务观点，不发动群众，只自己单干，那就是少数人创造历史，不是群众创造历史。把我们整个机构来个革命化，才能更好地发挥群众力量，才能更好地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斗争，才能轰轰烈烈地，干劲十足地做好各项工作。政权如果不掌握在革命分子手里，就会蜕化变质。

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不称职的。我意料是要出错误的，但是要力求减少错误，依靠主席，依靠常委同志，全体同志，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以主席为轴心，我们做磨盘，一切按主席指示办事，不能有另外做法，不能有两个方针，两个司令部，不能以想当然代替主席的想法，不能唱对台戏，要一元化，紧跟主席。主席处理问题，有全盘考虑，高瞻远瞩，还有他的想法，有很多想法我们是不了解的。我们对主席的指示要坚决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依靠主席的指示。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依靠群众的智慧。就是依靠领袖和依靠群众。要相信主席的天才，相信主席的英明，相信主席的智慧。一切请示主席，一切照主度指示办事。大事不干扰，小事不麻烦。我们就是这样去做，有时也免不了要犯错误，跟不上主席思想。怎么办？办法是朝令夕改，不坚持错误，随时修正错误。主席是世界的天才，我们同他比较差别很大，错了赶快改。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恳辞再三，但是，现在主席和中央既已决定了，我只好服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我还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

中 共 中 央 通 知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补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选举了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补选了书记处书记。现将上述选举结果通知你们。此名单传达到县团级，不向党外传达。

（一）补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六人：

陶　铸　　陈伯达　　康　生　　徐向前　　聂荣臻
叶剑英

（二）补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三人：

李雪峰　　宋任穷　　谢富治

（三）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十一人：

毛泽东　　林　彪　　周恩来　　陶　铸　　陈伯达
邓小平　　康　生　　刘少奇　　朱　德　　李富春

陈 云

（四）补选中央书记处书记二人：

谢富治 刘宁一

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节录）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

我们的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今天同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革命群众一起，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在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在雄伟的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

今天清晨五时，太阳刚从东方地平线上射出万丈光芒，毛主席便来到了人群如海、红旗如林的天安门广场，会见了早已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的革命群众。毛主席穿一套草绿色的布军装。主席的军帽上一颗红星闪闪发光。毛主席走过天安门前金水桥，一直走进群众的队伍当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且向全场革命群众招手致意。这时，广场上沸腾起来，人人双手高举过顶，向着毛主席跳跃着，欢呼着，拍着手。许多人把手掌心都拍红了，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他们欢喜地说："毛主席来了！毛主席到我们中间来了！"广场上，万众放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欢呼声浪一阵高过一阵，震荡着首都的天空。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今天上午整整六个多小时中，一直和百万革命群众在一起。在检阅百万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的庆祝游行时，毛主席和林彪同志肩并肩地站在天安门上，看着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高兴地对林彪同志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几万个系着红袖章的"红卫兵"们，英姿勃勃，像生龙活虎一样，在今天的大会上很引人注目。"红卫兵"是首都大中学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创建的革命群众组织，他们表示要一辈子当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国共产党、保卫祖国的红色尖兵。在天安门城楼上，在天安门城楼两侧东西的观礼台上，站满了"红卫兵"的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在天安门广场上，在广场两侧的东西长安街上，今天都由雄赳赳的"红卫兵"维持会场秩序。

在大会进行中，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亲切握手。城楼上下的"红卫兵"，无限欢欣，有的一蹦尺把高，非常激动地说："毛主席是统帅，我们是他的小兵。"有的说："毛主席参加了我们的'红卫兵'。对我们是最大的支持和鼓舞。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什么也不怕。"

有一千五百名学生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大会，毛主席和林彪、周恩来、江青等同志分批地接见了他们，同他们谈了话，并且在一起照了像。在毛主席接见的时候，学生们兴奋地围在敬爱的毛主席身边，不停地高呼"毛主席万岁！"

上午七时半，庆祝大会开始。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毛主席和林彪等同志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这时，全场万众欢跃，无数只举着红色《毛主席语录》的手伸向天安门，百万颗火热的心飞向毛主席，百万双闪耀着革命豪情的眼睛仰望着毛主席。当人们看到敬爱的毛主席身穿一套朴素的布军装时，情绪更加激动。他们说"毛主席穿上军装，我们感到更加亲切。毛主席永远

和我们战斗在一起。"有的说:"有了毛主席这样的最高统帅,我们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要当一辈子毛主席的好战士,跟着毛主席闹一辈子革命。"

庆祝大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主持。他在致开会词时说:"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今天在这里同大家见面。(群众热烈向毛主席欢呼)毛主席时时刻刻都是同群众在一起的。他的心,永远向着群众。我们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他今天同大家见面,大大鼓舞我们,将大大推动文化大革命前进。"

林彪同志在全场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讲话。

周恩来同志接着在大会上讲话。

北京大学的代表聂元梓和北京、哈尔滨、长沙、南京等地的大中学生,在大会上先后讲话。他们满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深厚、无限诚挚的感情,满怀全国亿万革命师生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钢铁意志,决心把毛泽东思想接过来传下去,保证我们社会主义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

庆祝大会结束后,百万群众组成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浩浩荡荡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

毛主席和林彪、周恩来等同志站在天安门上检阅游行队伍,不时向百万革命群众招手致意。在举行庆祝游行的过程中,毛主席和林彪等同志在天安门上,一再向着广场上的百万革命群众鼓掌。百万群众一遍又一遍地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千遍万遍地放声欢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参加群众大会的各方面的负责人还有:陶铸、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陈毅、贺龙、李先念、谭震林、徐向前、叶剑英、薄一波、李雪峰、谢富治、刘宁一、萧华、杨成武、江青、王任重、吴德、吴玉章、蔡畅、徐特立、邓颖超、廖承志、林枫、张鼎丞、萧劲光、粟裕、王维舟、邓子恢、张云逸、胡乔木、杨秀峰、张际春、伍修权、钱瑛、陈少敏、许光达、王震、赵尔陆、安子文、吕正操、王树声、罗贵波、张经武、谢觉哉、杨勇、张宗逊、李涛、陈奇涵、李志民、刘澜波、苏振华、范文澜、马文瑞、张霖之、廖汉生、章蕴、徐冰、钟期光、韩光、陈正人、陶鲁笳、赵毅敏、孔原、张苏、方毅、王尚荣、张平化、张劲夫、赵伯平、孙志远、姚依林、彭绍辉、李天佑、王新亭、刘志坚、徐立清、袁子钦、周士第、吴法宪、余立金、李聚奎、阎揆要、钟赤兵、唐延杰、吴克华、陈仁麒、陈士榘、李天焕、张池明、周玉成、傅秋涛、刘少文、苏静、蔡顺礼、刘忠、郑维山、韩伟、罗元发、滕海清、傅崇碧、张南生、赵镕、萧新槐、李作鹏、赵启民、周希汉、刘浩天、方正平、卢仁灿、康志强、成钧、常乾坤、王辉球、吴信泉、欧阳毅、雷英夫、李静、史进前、江文、陈鹤桥、李真、王绍南、张春桥、谢镗忠、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杨明轩、程潜、王昆仑、卢汉、史良、庄希泉、许广平、吴有训、陈劭先、陈其尤、陈其瑗、邵力子、茅以升、林巧稚、罗叔章、季方、南汉宸、胡子昂、胡厥文、胡愈之、梅龚彬、谢扶民、熊克武、周荣鑫、余秋里、谷牧、吕东、段君毅、刘杰、王净、方强、刘裕民、赖际发、徐运北、孙大光、朱学范、傅作义、袁宝华、沙千里、萧望东、何伟、钱信忠、汪东兴、江一真、雍文涛、熊复、唐平铸、丁莱夫、杨奇清、康世恩、钱之光、赵辛初、童小鹏、高崇民、李四光、沈雁冰、许德珩、蔡廷锴、苏谦益、高扬文、马力等。

(新华社1966年8月18日讯,载8月19日《人民日报》)

林彪在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

同志们，同学们：

我首先代表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大家问好！我代表党中央向大家问好！

我们坚决地支持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我们在伟大统帅的指挥下，好好地听我们统帅——毛主席的话，文化大革命一定能顺利发展，一定能取得伟大胜利！

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伟大创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创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人的灵魂，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

我们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权威，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一句话，就是要大立毛泽东思想。我们要让亿万人民掌握毛泽东思想，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思想阵地，用毛泽东思想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让毛泽东思想这个伟大的精神力量，变成伟大的物质力量！

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前途的大事！要搞好这场文化大革命，靠什么呢？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毛主席最相信群众，最关心群众，最支持群众的革命运动，和革命群众心连心！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改造人们灵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最强大的思想武器。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变得最聪明，最勇敢，就能发挥无穷无尽的力量！

我们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最锐利的武器，就能够所向披靡，攻无不克，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最近中央公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制定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纲领，是毛泽东思想的最新体现。我们一定要坚决按照这个决定办事，要放手发动群众，要坚决反对包办代替，要坚定地依靠革命的左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最反动的右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文化大革命是个长期的任务。这中间有大战役，有小战役，要持续很长的时间。只要资产阶级思想存在一天，我们就要战斗一天，要一直打到底!

这次是大战役，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总攻击。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旧风俗、旧习惯势力，展开猛烈的进攻! 要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万岁! 万万岁!

(原载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

周恩来在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

同志们，同学们:

你们好!

问你们好! 向你们致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敬礼!

我们向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学生和教职员工表示热烈的欢迎! 你们辛苦了!

党中央刚刚开过了第十一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是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进行的。这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的成功，是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这几天，全北京在欢腾，全国城乡在欢腾，到处敲锣打鼓，送喜报，开庆祝会，下决心书，亿万人民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今天，我们又在天安门的广场上，同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起，开庆祝大会，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

这次会议通过的十六条，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制定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一切革命的同志，都要认真地学习它，熟悉它，掌握它，运用它。这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的武器，是我们行动的指针。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伟大的纲领学好用好，贯彻到我们的实际行动中去。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要靠自己。我们要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一切革命者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要坚决反对包办代替，做官当老爷，站在群众头上瞎指挥。

我们希望北京市的革命同学和各地来的革命同学，要相互学习，相互支援，交流革命的经验，加强革命的团结。首都的同学，你们是主人，你们要好好接待客人，发扬无产阶级阶级友爱的精神，热情地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有问题要好好商量。

无论是北京市的革命师生，还是各地的革命师生，主要的任务都是把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搞好，一要斗好，二要批好，三要改好。这个任务很光荣，很艰巨。你们一定要敢于自己挑起这个担子来，我们相信你们也一定能够挑起这个担子来!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也就是大立毛泽东思想。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们伟大的舵手，就是毛主席。我们要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在全党全军全国进一步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

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铁打的江山，完成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赋予我们光荣的历史使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万万岁!

(原载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

总参谋部、总政治部
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
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最近桂林、西安、兰州、包头等地相继发生学生上街游行、集会后，地方党政机关要求部队全副武装警戒会场、机关，据说桂林已调进一个营的武装部队，以应万一；还有的要求部队派人坐汽车向游行集会的学生或到工厂、学校去作宣传劝说工作等。结果搞得学生和部队之间的关系很紧张，有的学生群众来到部队进行辩论，贴大字报；有的院校师生接连给军委发来电报，说部队围攻革命师生，等等。这种情况，已经造成部队和革命学生的对立，应引起极端重视。为此，特作如下规定：

一、所有部队绝对不准动用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更不得向学生开枪，就是向学生放空枪，也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将要受到严格的纪律处分。

二、如地方党政机关邀请部队参加庆祝集会时，经大军区党委批准，可派少量部队参加，但一律不准携带武器。

三、在任何情况下地方党政机关要求调动部队时，必须报经军委批准。

四、学生与学生或学生与群众发生冲突时军队不要介人，如发现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由本地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如公安机关力量不足，请求支援时，军队可予以协助。

五、部队不得派军队进入工厂，学校去搞宣传劝说活动。

六、军队不得给地方学校、工厂、机关贴大字报，地方学校、工厂、机关给部队贴大字报时应表示热烈欢迎。

七、任何逃避斗争，跑到军队躲藏的人，军队要他们回去，不得隐藏他们。

以上规定，希各单位切实遵照执行。

中央同意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中央同意公安部的规定，希各级党委遵照执行。

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

主席、中央：

最近，兰州、哈尔滨、西安、重庆等地，学生包围了省、市委住地。同时发生了两起人民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严重事件。八月五日，兰州大学学生与铁路职工、铁路中学学生发生冲突，兰州市公安局出动上百名警察，在兰大门前实行戒严。八月二十日，陕西省铜川一中学生包围了市委，在场的公安派出所长杨万杰，竟擅自鸣枪示威。

镇压革命学生运动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能允许。公安部六月十日曾通知各地，要全体公安干部、人民警察满腔热情地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持革命师生闹革命，不准干涉学生的革命行动。但是少数地方没有认真执行。现再作如下规定：

一、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

二、绝对不准向革命师生开枪，放空枪进行威吓也绝对不允许。

三、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

四、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

五、警察只在街道维持秩序，遇有打架、斗殴，可以劝解。如革命学生打了警察，不准还手。

公　安　部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
“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八月二十日以来，首都“红卫兵”纷纷走上街头，到处张贴革命传单和大字报，到处集会演说，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猛烈攻击。一些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色彩的商店字号，在他们的宣传、帮助下，已经更换为具有革命意义的名称。他们向各学校革命师生倡议，迅速改掉一些毫无政治意义的学校名称。他们还向广大服务行业的革命职工倡议，决不再给某些顾客理怪发、做奇装异服、出售和出租黄色书刊。他们要把北京彻底改造成为一个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革命化的北京。“红卫兵”的造反精神和革命行动，得到了广大革命师生、革命职工和街道居民的最热烈、最坚决的支持。

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在市内主要街道的墙头上，贴出充满革命豪情的向旧世界的宣战书。宣战书说：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正在冲击着资产阶级的各个阵地。资产阶级的温床保不住了。“飞机头”、“螺旋宝塔式”等稀奇古怪的发型、“牛仔裤”、“牛仔衫”和各式各样的港式衣裙，以及黄色照片书刊，正在受到严重的谴责。我们不要小看这些问题，资产阶级的复辟的大门，正是从这些地方打开的。过去十七年来，前北京市委对这些事情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甚至禁止改革。他们走的是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路。我们和他们是两条路上的人。他们不管，我们要管，还要管到底。我们一定要堵住一切钻向资本主义的孔道，砸碎一切培育修正主义的温床，决不留情。

“红卫兵”们指出，北京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大街上怎能容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留下的臭名字！他们在广大市民的热烈支持下，倡议把“长安街”改为“东方红大路”，把解放前禁止劳动人民通行的使馆区“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把“西交民巷”改为“反修路”，把王府井大街改为“防修路”，把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所在地“光华路”改为“援越路”。在“红卫兵”革命精神的鼓舞下，王府井百货大楼的革命职工，搬掉了门上“王府井”三个大字，改名为“北京市百货商店”。“东安市场”被改为“东风市场”。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命名的“协和医院”被改为“反帝医院”。“同仁医院”被改为“工农兵医院”。

“全聚德”烤鸭店的革命职工在北京二中、十五中、六十三中“红卫兵”的鼓舞下起来闹革命，砸掉挂了七十多年的“全聚德”三个字，正式换上了“北京烤鸭店”的新招牌。在“全聚德”工作多年的老工人们激动地说，“全聚德”三个字是资本家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铸成的。我们砸毁它，是决心彻底捣烂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残余，是彻底扫除资产阶级遗留下来的陋规习俗。

“亨得利钟表店”的革命职工们，在一九六四年以来曾经两次提出改掉老字号的要求，但由于前北京市委阻挠，一直没有实现。现在，职工们在“红卫兵”的鼓舞下，经过集体讨论，已改名为“首都钟表店”。

二十日晚上，当“红卫兵”把沿用资本家命名的“徐顺昌服装店”改名为“东风服装店”时，街道上顿时响起一片掌声，人们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东风压倒西风！”

在“荣宝斋”的玻璃厨窗里，挂着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红卫兵”送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

说："荣宝斋是个黑画店，几十年来盘剥劳动人民的血汗，为资产阶级小姐少爷太太老爷服务，为封建地主阔老阔少服务，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服务。一句话，就是不为社会主义服务，不为工农兵服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头子邓拓就是你们的大老板，老主顾！黑画家'驴贩子'黄胄也是你们的后台，你们这里已经成了黑帮画家的交易所了。我们就是要把荣宝斋打个身败名裂！！"

"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几天来得到了理发馆、成衣店、浴室等服务行业革命职工的热烈响应。他们纷纷开座谈会，写决心书，发表声明。东城区百货管理处的一位干部说：早在一年半前，我们许多商店的革命职工就提出要铲除掉过去遗留下来的资本家的旧字号，但是前北京市委不让我们改换。这次首都的"红卫兵"们干得好，我们表示热烈支持。

"卫东服装店"（原"蓝天时装店"）全体革命职工在给"红卫兵"的一封信上说：我们坚决响应你们的革命的倡议，我们完全同意北京二中等"红卫兵"关于反对做港式服装和奇装异服的革命行动，保证以后不加工不出售港式服装和奇装异服。让我们携起手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进到一个更广泛、更深入的新阶段。有些服装店的门上，还贴上了充满革命激情的对联："革命服装大做特做快做，奇装异服大灭特灭快灭。"横额是："兴无灭资"。

（新华社 1966 年 8 月 22 日讯，载 8 月 23 日《人民日报》）

好 得 很 ！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人民日报》社论

我们为北京市"红卫兵"小将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欢呼！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红卫兵"小将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正在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灰尘。

北京解放已经十七年了，可是，在修正主义的前北京市委长期把持、压制下，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实在不能再容忍了！

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

这是破旧立新的革命行动。闪耀着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新名称，新风俗，新习惯，为我们伟大的首都，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增添了无限的光彩。

处处是革命的标志和文字，处处是革命的语言和歌声。每个街道，每个商店，每个行业，都要成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学校，成为宣传、执行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阵地。毛泽东思想正在照亮每一个角落。

这是振奋人心的大事，这是大快人心的喜事。

“红卫兵”的革命精神，将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永葆革命的青春。

“红卫兵”的革命行为，是任何顽固的旧势力也阻挡不了的洪流。

“红卫兵”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

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人民日报》社论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指明了胜利前进的正确道路，纠正了错误路线，扭转了错误方向。

党中央这个决定发表后，人心振奋，斗志昂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新高潮开始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正在冲击着种种阻力。毛泽东同志说，“钟不敲是不响的。桌子不搬是不走的”，“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那些顽固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然会采取种种办法，种种手段，抵抗十六条，压制群众运动，破坏文化大革命。他们除了继续挑动学生斗学生以外，还煽动少数工人农民斗学生，来转移斗争的目标。

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顽固派，荒谬地把自己本单位的领导，同党中央，同整个党等同起来。他们利用广大工农兵群众对党的热爱，利用一些群众不明真相，提出什么保卫本地区、本部门的党委的口号，如有革命学生批评他们，起来造他们的反，就被说成是什么“反党”，“反党中央”，说成是什么“反革命”。有的地方，有少数工人农民和机关干部受了蒙蔽和欺骗，参加了对革命学生的斗争。

用这种口号煽动一些工人农民去斗争革命学生的做法，是极端反动的，是完全违背党的路线的。

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单位的党组织，都必须无条件地走群众路线，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评，决不允许以任何借口拒绝和压制群众的批评，更绝对不允许把批评自己的群众打成“反党”，“反党中央”的“反革命分子”。党中央就是党中央。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就是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任何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如果违背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批评不得？为什么反对不得？为什么人家一批评，就叫做“反党”，“反党中央”，“反革命”？

广大工农兵群众，决不要听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爷们的胡说。

广大革命学生起来闹革命，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爷们，是件大好事。他们贴大字报，是好事，大鸣、大放、大辩论，是好事。他们有上街游行示威的权利，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权利。他们敢于用毛泽东思想批评本单位党委和上级党委的错误，正好可以端正那些党委的领导。至于那些死顽固，死不悔改的，垮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也是好事。

革命的学生们组织“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等等革命组织，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合法的组织。他们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是合法的行动。谁要反对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就直

接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违背了党中央的决定。

广大工农兵群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是革命学生的强大后盾。我们一定要坚定地站在革命学生一边，最热烈最坚决地支持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

广大工农兵群众，最听党的话，最听毛主席的话，最拥护毛泽东思想。党中央决定的十六条，是毛泽东思想的最新的体现。一切违背十六条的，危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领导，都要坚决抵制，坚决反对。

革命学生在斗争中，也可能有一些缺点。我们一定要看到他们大方向是正确的，应当满腔热情地支持他们，帮助他们，相信他们会在斗争当中，自己能够分清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应当怎样做，不应当怎样做。相信他们在斗争中会锻炼得更加坚强，更加敢于革命，善于革命。

广大工农民群众，广大革命学生，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密地团结起来，擦亮眼睛，千万不要受坏人的挑拨，千万不要上坏人的当。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人民警察，由于所处情况不同，岗位不同，他们可能不了解那里学校的情况，不明真相，就不要去参加学校的辩论。

我们伟大的党，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一直是信任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同样的，广大人民群众，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认为，必须信任党的领导，依靠党的领导，才能完全解放自己。正是因为这样，党和人民群众心连心，不论有什么曲折，有什么风波，我们的党和人民群众，终归会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斗垮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上海天津革命小将和商业职工向剥削阶级“四旧”发动总攻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上海】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激流中勇猛前进的上海，又掀起了新的革命热潮。二十三日从清晨到深夜，成千上万支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组成的宣传小队，抬着毛主席巨幅画像，高举“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是新世界的创造者”的大型横幅，走上街头，擂战鼓，唱战歌，到处演出宣传，散发革命传单，张贴革命大字报，向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总攻击，为创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开辟广阔的道路。

广大商业职工，热烈支持革命小将这一革命行动，他们互相鼓舞，共同战斗，一起改革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腐朽气息的商店字号和服务行业残存的陈规陋习。职工们坚决表示，绝不再让这些腐朽的东西继续毒化人们的灵魂，一定要把上海改造成为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革命化的城市。

上海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城市，又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统治。解放以来，上海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一次又一次向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猛烈进攻，经过多次移风易俗的群众运动，改革许多带有买办气味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色彩的街道、里弄、

商店、建筑物等的名称。今天，无数红卫兵战士和广大革命职工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激流中，向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发动了总攻击。

著名的南京路，是无数革命先辈曾经流血斗争过的地方，今天，革命小将和广大职工接过先辈的革命大旗，在这里汇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他们说：今天我们要在这里彻底闹革命，用我们的铁扫帚彻底扫除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在上海最大的百货商店之一的永安公司的橱窗上，张贴了许多由红卫兵和这个商店的职工写的大字报，建议改名为"永红"、"永斗"、"红卫"等。他们指出："永安"是旧社会大老板企图永远安安稳稳剥削劳动人民而定的名。有了资产阶级的"永安"，就没有我们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这个商店早已成了人民的商店，今天我们决不允许"永安"这个臭招牌继续挂下去！

在具有五十年历史的上海最大的游乐场所——大世界，职工们和红卫兵一起，在人们的欢呼声中，拉下了几米高的"大世界"这块旧招牌。解放前，在"大世界"这块罪恶的招牌下面，上海的大资本家大流氓不知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不知腐蚀了多少人的灵魂。今天，当职工们把最后一个"界"字拉下地的时候，在马路上，在附近大楼的窗口里，在路过的公共汽车中，数千革命群众立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那些以资本家个人名字命名的商店字号，什么"徐重道"、"雷允上"、"邵万生"、"吴良材"等等，也受到了革命小将和职工们的猛烈冲击，换上了有着革命意义的店名。

上海《新民晚报》接受广大革命群众的建议，从二十三日起改名为《上海晚报》。报社的革命职工一致表示：要更高地举起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办好社会主义报纸而奋斗。

濒临黄浦江的外滩，解放前是帝国主义掠夺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中心。这里的一些高楼大厦上，还遗留着一些带有帝国主义色彩的残迹。红卫兵和革命职工在这里大闹革命，他们搬掉了帝国主义者安置在大厦门前的铜狮子，铲除了墙壁上的洋标志。

红卫兵和广大革命职工汇成的革命洪流，猛烈地冲击着一切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陈规陋习。理发店的革命职工提出了革命性的措施：彻底消灭一切"阿飞式"、港式的头发式样，立即取消专门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项目，如剪指甲、美容、摩面等。在一些原来只供应少数人需要的商品的商店，职工们也作出了革命性的决议：从二十四日开始供应价廉物美的大众化商品，更好地为工农兵群众服务。他们表示，要大破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大立社会主义经营思想，决不把自己的商店办成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名店"，一定要把商业和服务行业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天津】天津市红卫兵，在首都红卫兵小将们的革命造反精神鼓舞下，抡起千钧棒，举起铁扫帚，斗志昂扬地走上街头，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灰尘。

二十三日，在天津市的许多街道上充满了革命的气氛。红卫兵们敲锣打鼓，到处张贴大字报、标语，集会演说，热情地向职工、居民提出更改旧商店字号和街道里弄名称的革命倡议。他们说，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要彻底破"四旧"，坚决地用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天津市的面貌，让天津市换上崭新的社会主义新装。

红卫兵的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得到了全市革命职工最热烈、最坚决的支

持。在天津市商业中心区——滨江道一带，整日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许许多多商店拔去了旧字号，换上了具有革命意义的新名称。中原公司的革命职工热情地贴出决心书，设立接待站，征求红卫兵和广大革命群众对更改名称的意见，最后在革命群众的建议下，决定改名为“工农兵商场”。天津市最大的商场——劝业场的革命职工，在红卫兵革命精神的鼓舞下，抡起铁榔头，砸碎了嵌在墙上达三十八年之久的“劝业场”三个字，换上了“人民商场”的新名称。全场革命职工举行庆祝集会，热烈欢呼“人民商场”的诞生。他们说：“劝业场”是恶霸豪绅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扶助下开办的，解放前，它是远近闻名的剥削劳动人民的“老虎摊”，今天，我们把它改为“人民商场”，这是天大的喜事，我们一定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把“人民商场”办得好上加好。这时聚集在商场周围数以千计的人民群众，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具有四十五年历史的北洋纱厂革命职工二十三日晚集会，一致决议把在北洋军阀时代建立的北洋纱厂，改名为“四新”纱厂，以表达全厂革命职工破旧立新的革命决心。他们还把工厂原来的“金三鼎”棉纱商标，改为“工农”牌商标。

(新华社上海、天津 1966 年 8 月 24 日电，载 8 月 25 日《人民日报》)

各地革命小将向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习俗旧习惯发动总攻击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首都红卫兵小将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强烈地鼓舞着各地红卫兵和广大革命群众，他们燃起了横扫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等反动腐朽势力和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燎原烈火。“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用毛泽东思想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搬掉一切绊脚石，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就是革命小将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战斗目标。

据来自各地的消息，连日来，许多城市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高举着毛主席巨幅画像、毛主席语录和“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是新世界的建设者”的大幅标语，纷纷走上街头，敲锣打鼓，集会演讲，贴革命大字报，散发革命传单，向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向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总攻击。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在这个史无前例的群众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的冲击下，短短几天之内，各地许多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思想色彩的旧店名、旧街名就被迅速扔进垃圾堆，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和许多陈规陋习被打得落花流水。一批批闪烁着毛泽东思想光辉和革命精神的新店名、新街名、新校名诞生了，许多符合广大工农兵利益的革命措施开始实行。资产阶级威风扫地，革命群众扬眉吐气。到处是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到处是不可阻挡的革命洪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战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响彻祖国各地。

杭州、广州、武汉、长沙、济南、南昌、郑州、合肥、南京、福州等地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在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精神的鼓舞下，广泛开展宣传活动。在他们的倡议下，杭州市以宋代封建文人苏东坡的名字命名的东坡剧院、东坡路、西湖苏堤，都换上了具有革命意义的名称。六家以“张小泉”这个旧店主的名字作为招牌、并且一直沿用了三百多年的剪刀店，都换上了“杭州剪刀店”新店名。广州的革命小将们在街道和商店贴出许多大字报和宣战书。广州三大酒家之一的“陶陶居”的革命职工，把康有为手书的“陶陶居”三个招牌字铲掉，换上了自己书写的新招牌“东风楼”。

在东北地区的哈尔滨、长春、沈阳，佩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广大革命师生，到处倡议把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强加在我们头上的旧街名、旧店名统统废除。随着帝国主义在我国铺设中东路而设立的哈尔滨“秋林商店”，已经改名。

在成都、南宁、贵阳等地，革命学生们抬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敲锣打鼓，沿途张贴“向旧世界开火的檄文”，倡议革命群众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宣战。四川大学革命学生宣传队表示要坚决砸碎黑招牌，踢开绊脚石，让古老的成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焕然一新！昆明市近日公园百货商店的革命职工听到首都红卫兵革命精神的广播以后，纷纷议论："近日公园"这个名称来源于封建朝代的“近日楼”，应立即改革。这个商店的团总支书记、曾经和匪徒搏斗而失去双手的女英雄徐学惠说：我们不但要改革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色彩的商店名称，而且要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思想连根挖掉。

湖北省、山西省革命小将和广大职工破“四旧”、立“四新”的活动正在继续扩展。开滦煤矿的广大革命职工提出坚决砸烂帝国主义遗留下的“开滦”煤矿的旧牌匾，更换官僚资产阶级用来统治工人的旧“工牌”。工人坚决主张改“工牌”为“工作证”。

在呼和浩特、乌鲁木齐、银川、西宁，革命小将在大字报里写出了他们彻底革命的决心："不破旧誓不罢休，不立新死不瞑目，造反有理！"

目前，这个革命浪潮正以汹涌澎湃之势，涤荡着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灰尘。广大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表示：一定要乘胜前进，扩大战果。一定要打得一切牛鬼蛇神永世不得翻身，一定要铲除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根子和修正主义的温床，一定要使每条街道、每个行业、每个工厂、人民公社、商店都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成为宣传、执行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保证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万代红！

首都和各地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和革命行动，受到广大工人和贫农、下中农群众最热烈最坚决的支持。连日来，许多地方的革命职工和红卫兵小将一起，并肩战斗，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着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腐朽遗迹和旧习，共同欢庆破“四旧”立“四新”的重大胜利。他们互送毛主席语录、贺信和喜报，相互鼓舞，相互激励。许多革命职工和贫农、下中农还举行集会和游行，热烈欢呼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造反，反得对，反得好！

在上海黄浦江两岸的许多工厂，工人们在工厂的大门口、过道上、车间里贴出了支持红卫兵革命行动的大字报，有些工厂还派出代表，上街和革命师生一起横扫“四旧”。

上海工人阶级的代表人物杨富珍、姜林根、王林鹤、孟德和、祁志超、程德旺、陈阿发等，一致指出，革命小将们向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起猛烈的冲击，大快人心，干得好！一千个应该！一万个应该！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灭资兴无“大会战”。

天津市广大革命职工纷纷贴大字报，写支援信，决心同红卫兵小将们一起砸碎旧世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天津铁路工人文化宫的革命职工们，根据革命学生的建议，摘掉了"宁园"的旧牌子，改名"二七"公园，受到革命学生和职工的欢迎。已经改了新名的"正阳春"饭庄革命职工，在红卫兵的建议和鼓舞下，扩大了受劳动人民欢迎的快餐部。

在武汉，广大革命职工和革命干部，最热烈最坚决地支持红卫兵横扫"四旧"的革命行动，纷纷起来闹革命。八十高龄的"二七"老工人、"二七"大罢工的敢死队队长张士汉，看到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兴奋地说：我们当年参加"二七"大罢工，赤手空拳地同反动派斗争，什么都不怕。今天我看到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非常钦佩。我对我们的后一代完全放心。

重庆钢铁公司今天举行了有一万多职工参加的广播大会，热烈欢呼革命学生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表示坚决做革命学生的强大后盾。重庆钢铁公司副总工程师黄荣昌说：革命学生们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大造资产阶级的反，大造帝国主义的反，大造修正主义的反，大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大造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反，完全代表了我们工人阶级的心愿，我们决心大力支持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

在郑州市，郑州国棉四厂革命职工一千多人涌向街头，和红卫兵们并肩战斗，打掉了本厂具有封建主义修正主义色彩的"龙头鹤舞"大门和露天舞台上的"嫦娥奔月"。这个厂原来生产的"凤凰台牌"棉布，已决定改为"工农兵牌"。郑州纺织机械厂职工还和红卫兵小将们一起动手捣毁了厂区封建主义的遗物，洗新了厂区和各车间的标语牌，写上了毛主席语录和文化大革命的口号。

各地广大农村的贫下中农，也对红卫兵们的革命造反行动表示了最热烈、最坚决的支持。他们说，我们贫下中农受尽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长期欺压，我们最懂得红卫兵小将们的革命行动的伟大意义。他们的所作所为，正合我们的心意。英雄刘英俊的母亲、贫农社员朱秀兰说："革命小将们，你们干得好！我们贫下中农都支持你们。刘英俊活着的时候，最听毛主席的话，最痛恨旧社会，他是向'四旧'开火的冲锋猛将。旧世界必须打破，新世界一定会建立起来。

连日来，乌鲁木齐郊区农村人民公社广大贫下中农纷纷走上街头，敲锣打鼓，高举标语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表示坚决支持小将们的革命行动，破旧立新，彻底打烂旧世界，创造新世界。

昆明郊区官渡区联盟公社桃源大队小菜园生产队的贫下中农社员把"小菜园"的村名改为"革命新村"。全队六十四户社员的家里都贴了崭新的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

贵阳市郊区朝阳人民公社的苗族、布依族和汉族的贫下中农社员，纷纷举行集会，热烈赞扬红卫兵破旧立新的革命行动。

拉萨市郊拉鲁乡的翻身农奴，听到首都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以后，决定改换新乡名。他们说：西藏是我们翻身农牧民的天下，绝不能再让叛国头子拉鲁的名字继续沾污我们的乡村。

（据新华社 1966 年 8 月 25 日讯，载 8 月 26 日《人民日报》）

横扫"四旧"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各城市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首都和各地红卫兵们带头掀起的破"四旧"、立"四新"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创举，更广泛地得到全国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最热烈、最坚决的支持。各地工农群众和红卫兵们并肩战斗，向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展开猛烈攻击，形成了一股不可抵御的巨大洪流，任何顽固的旧势力都将被这股洪流彻底冲毁，妄图阻挠这股洪流的一切牛鬼蛇神都将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气势磅礴的横扫"四旧"革命风暴，连日来席卷了全国各城市。广大红卫兵和工农群众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决心乘胜前进，扩大战果，铲除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臭根子和任何产生修正主义的温床，用毛泽东思想彻底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江苏无锡、徐州、苏州、常州、南通、镇江、扬州等市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学生们，最近几天在广大工农群众的热情支持和配合下，向"四旧"展开了猛烈进攻。苏州采芝斋糖果店职工砸掉了挂了九十多年的老招牌，换上了"红旗"商店的新招牌。街道上群众纷纷鼓掌欢迎。这个店的老工人说：我们砸了这块黑招牌，灭了资本家的威风，长了自己的志气。无锡市东林小学，原来是以明代东林党人聚集讲学的东林书院所在地而得名的，全校革命师生认为决不能再让这些反动文人沾污我们的社会主义学校，立即把校名改为红卫兵小学。南通唐闸大生一厂职工组织了一支突击队，攀上厂门口的钟楼，把大官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张謇题的"大生一厂"四个字全部凿掉，改名为南通市第一棉纺织厂。镇江脱粒机厂职工开着宣传车上街，配合红卫兵们进行破"四旧"、立"四新"的宣传。

在英雄城市南昌，"黄庆仁药栈"的革命职工在红卫兵的鼓舞下起来闹革命，拿起铁锤砸掉了挂了一百四十多年的"黄庆仁栈"四个字，换上了和对面"兴无"商店相呼应的"灭资药店"新招牌。"阳明路商店"的革命职工，砸碎了为封建大官僚、大地主王阳明招魂立碑的店名，换上了表示保卫毛泽东思想的"红卫商场"的新招牌。当红卫兵们把沿用资本家招牌的"东南商店"改名为"东风商店"时，商店里、街道上顿时鞭炮齐鸣，掌声雷动，人们齐声欢呼："毛主席万岁！""东风压倒西风！"

在南昌市郊的原"湖坊"公社，二十四日有三千多名贫农下中农和革命群众，顶着烈日，高举毛主席画像和毛主席语录牌，捧着决心书，举行了支持红卫兵革命造反精神的大会。大会决定废除"湖坊"旧名，改名"东方红"人民公社，以实际行动响应红卫兵横扫"四旧"的革命创举。

横扫"四旧"的革命浪潮，近日来席卷了东北边疆吉林省各个城市的大街小巷。地处长白山区的通化市各中等学校，出动了几千名红卫兵，上街砸碎那些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色彩的商店旧招牌，改换了一些街道的名称，到处宣传毛泽东思想。白城市国药二店革命职工在红卫兵的帮助下，砸碎了广生堂门前挂了三十二年的两个葫芦招牌，这两个招牌原来是大资本家挂起来的。吉林市革命小将们发出的豪言壮语是："我们要冲击资产阶级的一切阵地，堵塞一切复辟资本主义的孔道。"这个市的"福源馆"食品店在一些革命小将们的帮

助下，砸碎了一百多年的旧牌匾。在长春市，革命职工还专门为红卫兵们设立广播站，让他们发表演说，宣传毛泽东思想，批判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在河南，洛阳、开封、新乡、安阳、焦作、鹤壁、许昌等市的红卫兵和工农群众，向“四旧”发动了猛烈攻击。洛阳市在解放后新建的影院、剧院、公园和新修的道路都以封建时代的遗址命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以后，广大工农群众和红卫兵小将们，对这种状态再也不能忍耐，他们说：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我们决不容许资产阶级老爷们拿劳动人民的革命成果，去为帝王将相竖碑立传。王城公园的革命职工在红卫兵们的鼓舞下，敲锣打鼓地把公园的名称换成“劳动人民公园”。在开封市，许多商店革命职工和红卫兵并肩战斗，砸烂了一些商店的旧招牌、旧装饰。元隆、义丰厚商店和王大昌茶店等革命职工，和红卫兵一起动手砸掉旧招牌，换上红光闪闪的新招牌的时候，职工们激动万分，齐声高唱《东方红》歌曲。在焦作市，革命小将们和革命职工一起为一些理发店改名的时候。店门前掌声、欢呼声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成一片。许昌市的革命群众把一户门上卖国贼袁世凯题的“清正廉明”匾打翻在地，人们都说反得好，砸得对，人们热烈高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在青海省西宁市，革命小将们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造反精神受到广大革命职工、革命干部和贫农下中农的坚决支持。原大十字百货商店和饮马街影剧院的职工，在革命小将们的倡议和鼓舞下，分别把他们所在的商店和影院换上了具有革命意义的新名字。全国大庆式企业、西宁运输车辆厂的工人，抬着毛主席巨幅画像，敲锣打鼓上街游行，表示誓作革命小将们的后盾。马坊公社的贫农下中农为了表示最热烈最坚决地支持革命小将们的革命造反精神，他们和革命学生一起，把原来的马坊公社改名为工农兵公社。

乌鲁木齐街头这几天到处呈现出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许多商店里都在非常醒目的地方挂上了毛主席画像和毛主席语录牌，挂起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等红色布标，柜台内外张贴了无数破旧立新的大字报、决心书、倡议书。一些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色彩的商店招牌，换上了“工农兵”、“革命”、“文革”、“抗美”等富有革命意义的新牌号。一些饭店、旅社的各族革命职工，大破陈规陋俗，大立面向工农兵、为工农兵服务的经营思想。工农兵餐部（原“鸿春园饭店”）等饭店的广大革命职工怀着强烈的阶级感情，从工农兵的需要出发，开始向顾客大量供应价廉味美饭菜，受到群众欢迎。

拉萨市街头这几天也沸腾起来。西藏师范学校和拉萨中学的数百名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抬着毛主席巨幅画像，扛着向旧世界宣战的宣言书，敲锣打鼓走向街头，大破“四旧”。拉萨中学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们在宣战书中说，拉萨市解放十几年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领导我们翻了身，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是，三大领主设下的精神枷锁还牢牢地套在我们的脖子上，我们实在容忍不去了！现在应是清算他们的时候了！拉萨市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们倡议给带有封建农奴制和迷信色彩的地名、街名、房名改换名称，倡议文艺单位禁演带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色彩的戏剧等等。拉萨市广大工农群众纷纷表示誓作红卫兵小将们的坚强后盾，为把拉萨市改造成为一个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革命化的新城而并肩战斗。拉萨城关区三百四十多名共青团员和青年，其中绝大部分是手工业工人，听到红卫兵小将们上街大闹革命的消息后，激动得跳起来，第二天，他们就走上街头，和红卫兵们一起闹革命。今天，拉萨市郊区堆龙德庆县六个乡的翻身农民，派出二百八十人的一支队伍，高举

着毛主席像，手捧毛主席著作和刚收获的青稞穗，来到拉萨中学声援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他们表示，翻身农民们坚决和革命学生站在一起，彻底挖掉一切封建根子，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新华社1966年8月26日讯，载8月27日《人民日报》)

红卫兵战校（前清华附中）红卫兵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

一、主流

现在，红卫兵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四旧”猛烈开火，把“四旧”打个落花流水，天翻地复。一个无产阶级的崭新世界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这一场革命大造反的狂风暴雨真是好得很！党中央和毛主席首先站出来大力支持。工农兵齐声欢呼。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胆战心惊。每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在北京城里走一走，无不感到从来没有的痛快。这是运动的主流。所有革命者，都热烈的欢呼和支持这一革命行动！

红卫兵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当然也不可避免地生产了一些缺点和错误。这毕竟是第二位的，是次要的。但是，我们认为，做为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应该最听毛主席的话，勇敢地正视自已的缺点和错误。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特别是按照“十六条”，予以克服和纠正，把运动引向符合党的政策的更高级的水平。

二、谨防把红卫兵打成反革命

但是绝不能看到红卫兵有某些缺点和错误，就颠倒黑白，就否定主流，就“攻其一点，尽力夸大，不及其余”，把红卫兵打成立场错误，方向错误，打成“反革命”。有一些坏人在这样做。有一些思想方法不正确的革命同志也在这样做。我们希望一切真正革命同志，不要跟着瞎说。

红卫兵的主流和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红卫兵的缺点和错误是可以在斗争中改正的，一切革命的同志必须认识这一点。

三、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目前，有些红卫兵和红五类子弟被反革命杀害了，对此，我们表示极大的愤慨，我们一定要为自己的阶级兄弟报仇，坚决镇压这些现行反革命分子，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但是除了对有血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依法惩办外，我们反对武斗。

我们红卫兵要警惕坏人捣乱，警惕他们挑动红卫兵，挑动群众打人的恶毒阴谋。这样的坏人，通通要捉拿法办！

我们红卫兵，最听毛主席的话，最坚决地执行十六条，我们完全有能力在政治上把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斗倒斗垮斗臭，我们决不要打人，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只要

他不动手行凶，也不要打。打人，不能够充分暴露坏人的丑恶面目，不能够真正把他们斗倒、斗垮，不能够彻底孤立他们，不能够彻底肃清他们的影响，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他们的灵魂，不能真正斗倒黑帮，也不利于对部分人教育改造。

打人，不利于争取团结广大中间群众，反而引起他们的恐慌，使他们脱离我们，脱离改造，脱离革命。

打人，不利于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

有许多坏分子乘机起哄，乱打一通。打伤他们的同志，破坏我们的运动，我们要谨防这些坏分子从中渔利。

我们红卫兵应该谦虚谨慎，讲道理，尊重同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绝不能专横跋扈，蛮不讲理，老虎屁股摸不得，草菅人命，把人打死，听到不同意见就暴跳如雷，就动手打人。那样做，是国民党法西斯作风，是恶霸的作风，决不是真正的红卫兵红五类!

我们是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要最勇敢地捍卫十六条，捍卫党的政策。现在是真正的红卫兵站出来的时候了!

四、分清敌我

十六条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

这个问题在一些单位、一些学校并没有彻底解决。在我们红卫兵战校（原清华附中），就出现过对前学校的党政干部一律以"黑帮"论处，人人喊打的偏差。十六条中说的干部的四种情况难道不适用吗？当前特别突出的是大量地混淆了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与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界限，即三类干部和四类干部的界限。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值得引起所有红卫兵和革命同志的严重注意。我们不但要敢于革命，而且必须善于革命。

只有分清敌我，才斗的准，斗得狠。才能真正孤立反党分子，才能真正斗臭、斗倒、斗垮他们。

五、左派内部的团结

毛主席说:"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语录216页）以红五类子弟为核心和主体的"红卫兵"、"红旗"组织是坚定的革命左派是文化革命的先锋队，因此，"红卫兵"、"红旗"内部的团结统一是战胜敌人的重要因素。

我校"红卫兵"是高度统一的左派组织。我们感到要想达到左派内部的团结必须做到:

（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天天读毛主席著作，以毛泽东思想为统一的基石。

（二）内部必须经常开展尖锐的同志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时时注意抵制个人主义、风头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名利主义、反对无原则和平，把组织生活庸俗化，总之一句话:"斗争即团结"

（三）坚决防止个人突出，加强集体主义教育，发扬革命英雄主义。

（四）必须有一个富于批评自我批评精神的领导班子，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枝节问题上不纠缠，提倡互相帮助，互相谅解，共同领导。

（五）全体红卫兵战士都必须注意谦虚谨慎，提倡"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左派内部有分岐有矛盾这是必然的，没有矛盾没有分岐才是不可思议的。我们认为，为了团结，大家必须努力学好毛主席著作，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去掉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并建议：用疏导的方法消除隔阂加强团结，即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而是共同确立一个革命目标，在为这个目标奋斗的过程中互相了解，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过程达到真正的革命的团结。只有左派内部的团结一致才能达到广大革命群众的团结一致，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必须注重左派内部的团结。

六、团结大多数

"依靠左派孤立少数反动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的口号决不是右倾的。

对于出身于非红五类家庭的人们，我们根据自己的实践认为他们的大多数经过斗争的考验和痛苦的脱胎换骨的改造是可以团结的，不可笼统地叫作"狗崽子"，团结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他们。其中少数人、政治表现很好，忠于毛泽东思想和党的阶级路线，也可以吸收他们参加"红卫兵"。前北京市委负责人歪曲了"重在表现"的政策，我们的责任是恢复"重在表现"政策的本来面目并忠实地执行和贯彻到底，决不能把"重在表现"政策一棒打死，因为"重在表现"政策是敬爱的党中央、敬爱的毛主席提出的。我们是：第一有成份论，第二不唯成份论的重在表现论者。第一位第二位的关系决然不可颠倒。

工农子弟立场最坚定，阶级感情最鲜明，最朴实。革干子弟政治嗅觉敏锐，闯劲儿最足。两者结合起来互相取长补短，将形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这样，修正主义在中国复辟的黄粱美梦就会彻底破产。（注：农指的是贫下中农）

七、关于联系群众问题

十六条的灵魂是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放手发动群众，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

红卫兵是闯将，是先锋，但红卫兵决不可以脱离广大群众，另搞一套。马克思说，我们要解放自己必须解放全人类。红卫兵必须紧密地联系群众。红卫兵的主要任务是把本校本班的文化大革命搞好，把本校本班的大多数群众教育好团结好，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主要在本校本班的广大群众中生活、斗争，红卫兵要参加大革命，非红卫兵的革命群众也要参加大革命。红卫兵要相信他们，同他们共同研究问题，共同执行任务。

各单位之间的革命串联是必要的，但决不能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有困难的单位我们愿意鼓励那里的革命群众自力更生，不愿意包办代替，也不可能包处代替。有些搞串联的人不相信自己能解放自己，总想依靠外援，这决不是真正的革命者，适合自己的经验不能从外面取经得到，只能从毛泽东思想从十六条上得到，得到的方法是自己去闯，去造反。有困难，无经验，走弯路是大好事，可以锻炼人。这种锻炼机会是难得的，万万不可放过。

我们红卫兵是人民的儿子，人民的勤务员。我们必须带头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人民不要狂妄自大，不要少爷小姐作风，不要吊儿郎当。对于人民我们永远是谦虚谨慎，恭恭敬敬甘当老黄牛的。

八、关于破"四旧"

在形式上破"四旧"是比较容易办到的，但在人的灵魂上破"四旧"则是艰巨的，也是最主要的，最本质的。

在形式上破"四旧"有一些偏差：

有人见到辫子长一点就剪，甚至把女同志的头剃光。有人不问青红皂白，谁家都抄，甚至连革命干部家也大闹一场"没有任何阶级性，这是绝大的错误，必须引起严重注意。有人不许商店出售点心，只许卖窝头，有少数流氓坏分子借破"四旧"之名，大肆进行流氓活动和破坏活动……等等。这些必须制止！

流氓坏分子必须坚决镇压！

有些重大行动（如取缔民主党派等）应该先动口，让中央、市委知道，在中央、市委的统一具体领导下再动手。不然会给中央工作造成很大的被动。

九、关于新市委

我们红卫兵战士信任新市委，支持新市委工作。因为新市委是毛主席委派的。我们也相信，新市委不会辜负毛主席的委托。

当前，我们热切地希望：新市委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十六条精神，勇敢地站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前列，大胆地引导革命运动，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十、红卫兵对十六条的态度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十六条就是当前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就是党的政策。我们红卫兵战士必须努力学习、忠实执行、热情宣传、勇敢捍卫十六条。

我校及其他学校有的同志甚至有个别红卫兵战士没有这样做，他们不重视十六条，不按十六条办事，甚至有的说十六条是框框，执行十六条是右倾路线。这统统是谬论。什么框框?! 没有十六条文化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正是十六条扭转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方向，使革命重新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广泛深入地学习十六条，按十六条精神办事，是红卫兵的首要任务，是衡量真红卫兵和伪红卫兵的分水岭。

红卫兵战士们，你是否拼命地努力学习十六条了，你是否忠实执行十六条了，而丝毫不改变它的本来面貌；你是否最热情地宣传十六条了，使十六条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你是否勇敢捍卫十六条了，而在一些错误认识面前丝毫不动摇呢？

我们相信，全体红卫兵战士们都会这样做的，这是我们的天职，因为我们是毛主席最最忠实最最勇敢的红卫兵。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人民日报》社论

任何大革命运动，都必然是群众的革命运动。没有群众起来，敢说，敢干，敢闯，就不

可能有什么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然也是这样。

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大破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卷进这个运动，就不可能大破，也不可能大立。

照一般的历史情况看，文化革命，总是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的先导。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不可能不触及到政治，不可能不触及到经济，实际上已经触及了。

文化大革命不能只是少数人的事情，不能只是批判几个资产阶级学者“权威”的事情，不能只是批判几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事情。文化大革命的规律，完全冲破了这些框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为广大群众的革命运动。这是文化革命开始取得胜利的重大新标志。

红卫兵充当了文化革命这个群众运动冲锋陷阵的急先锋。

我们向英雄的红卫兵欢呼，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

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

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账，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红卫兵的行动，真是好得很!

毛主席早在全国胜利前夕指出:“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我们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恰恰进一步地证明了毛主席的伟大预见。

现在正在进行的，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以红卫兵为急先锋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但必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而且必将大大改善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巩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我们现在还存在着的许多不适合无产阶级专政的旧社会残迹，旧习惯势力；必将大大革新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扫除资产阶级在社会上还存在着的一些威风，进一步清算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

当然，红卫兵随时需要在斗争中学习，学会文斗，学会思考。

最根本的问题是，大家需要在斗争中进一步学会毛泽东思想，掌握毛泽东思想，运用毛泽东思想，把自己锻炼成为顶天立地、掌握革命本领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成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士。

英雄的红卫兵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中共中央关于江青代理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的通知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

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

林彪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同志们，同学们，红卫兵战士们:

我代表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向各地来的同学问好，向大家问好！我代表党中央向大家问好!

同学们，你们来到北京，同北京的革命师生交流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你们辛苦了！我们相信，你们回去以后，一定会更好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按照党中央的十六条，冲破一切阻力，克服各种困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得很!

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组织，像雨后春笋一样地发展起来。他们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文化大革命，已经触及到政治，触及到经济。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的斗、批、改。群众的革命洪流，正在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改变着我国整个社会面貌。

革命的小将们，毛主席和党中央热烈赞扬你们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你们干了大量的好事，你们提出了大量的好倡议。我们十分高兴，我们热烈支持你们！坚决反对压制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我们向你们欢呼，向你们致敬!

同志们，同学们!

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敢于斗争，敢于革命，善于斗争，善于革命。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做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认真地、全面地、彻底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十六条。

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要注意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的重点，是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定要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

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是这样。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其灵魂。只有文斗，进行充分揭露，深刻批判，才能彻底暴露他们的反革命面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斗臭，斗垮，斗倒。

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其他革命的青少年组织，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是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后备力量。

同学们，红卫兵战士们，你们要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地联系群众，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维护人民利益，爱护国家财产，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同学们，只要我们认真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一定能够取得伟大的胜利！让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在我们的胜利面前发抖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周恩来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同志们！同学们！

你们好！

你们从祖国各地，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来到人民的首都北京，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北京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统帅。毛主席是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毛主席同群众心连着心，无限地信任群众，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全国革命人民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高潮。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这个文件告诉我们，必须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我们必须把这个决定，当做我们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武器，做为我们的行动指南。一切革命同志，都应该认真地反复地学习它，熟悉它，掌握它，运用它。

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新的高潮。全国各地的青少年组织了红卫兵和别的革命组织，这是一项伟大的革命创举。我们的红卫兵小将们，破“四旧”，立“四新”，充当了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冲锋陷阵的急先锋。你们那种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于革命、敢于造反的精神，得到了全国广大工农兵和革命干部的热烈支持。我们向英雄的红卫兵欢呼！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

我们的红卫兵是以解放军为榜样建立起来的。大学解放军，是红卫兵的战斗口号。要像解放军那样，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永远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士；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要像解放军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执行群众路线，永远做人民忠实的勤务员。要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护群众利益，保卫国家财产，造成良好的社会主义的新风气。红卫兵要建设成为一支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战斗队伍，成为解放军的可靠的后备军。

我们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时刻都要注意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注意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斗争中，要用文斗，不要武斗。文斗，才能教育群众，才能最有效地斗垮敌人。我们的红卫兵，一定能够在斗争中成长起来，成为智勇双全的闯将。

现在，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同学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连。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中央决定，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本地的学生，和外来的学生，要在共同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原则基础上，加强革命的团结。有问题，有不同意见，要用调查研究、平等协商的方法来解决。大家都知道，各地方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都要依靠本地本单位的群众自己动手来干，才能真正搞得好，搞得彻底。我们相信，全国大串连的革命行动，一定能够有力地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人发展。

同志们！同学们！

革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要取得胜利，必须战胜一切阻力，克服一切困难。我们相信你们一定能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掌握和运用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同广大的工农兵在一起，同广大的革命群众在一起，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各种阻力，战胜一切困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铁路企业单位分期分批地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整顿车站、列车秩序的通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

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展开，形势很好。这个革命正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大大促进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大发展。

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是为工农业生产、人民生活和国防建设服务的重要部门。铁路的运输工作是在全国范围内昼夜不停地协同进行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铁路还必须保证安全地运送进行革命串连活动的广大革命师生。同时，铁路员工还要搞好本单位的文化革命，自己动手破四旧立四新。这些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并保证更好地完成运输生产任务，做到革命和运输生产双胜利，特作如下通知：

一、全国铁路各单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应当根据具体情况。结合四清运动，有领导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进行。

二、各铁路管理机关，必须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时，必须指定必要的人员，组成专门的领导班子，切实负责管好各项运输生产工作。铁路分局和分局以下的单位，可暂缓开展文化革命运动，已经开展的单位，应当讲清道理，说服群众，暂时停止进行，集中全力保证完成繁重的运输任务。

三、铁路工厂承担着铁路运输设备的制造和维修任务，是直接保证铁路运输正常地运行的技术基地。因此，铁路工厂的文化革命运动，也应当分期分批地进行。凡是生产任务很重、暂时不宜于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单位，应当说服群众，适当推迟进行。不论开展文化革命运动的单位或推迟进行的单位，都必须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证完成机车、车辆的制造和修理任务，并保证完成冬运防寒的准备工作。铁路工厂分期分批地开展文化革命运动的具体部署，由铁道部党委与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商定。

四、铁路系统暂不开展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的单位，应当认真的组织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学习有关文化革命的文件和文章。同时，还可以有领导地采取适当方式，对上级领导机关提意见、揭发问题，帮助上级领导机关搞好运动。

五、为了保证铁路运输的安全，更好地完成运输任务，铁路系统各单位要在各地党政机关和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进一步整顿车站和列车上的革命秩序。在车站和列车上，不要打人，不要搜查；任何人不要对旅客进行政治审查；不要拦截列车和阻止列车的正常运行，全力保证列车按规定时刻运行。铁路职工和铁路民警，应当坚守岗位，敢于负责，在有关部门协助下，努力学习十六条，积极地做好宣传解释工作。

六、本通知下达到铁路各基层单位，并应向职工进行传达。在传达时，要说明当前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铁路企业分期分批地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整顿车站、列车秩序的重要意义，并反复说明保证铁路运输正常运行，就是对文化革命运动的最有力支持，动员铁路广大职工积极参加运动，努力做好工作，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运输生产的双胜利。

本通知可在车站和列车上张贴。

用文斗，不用武斗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

《人民日报》社论

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又说，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所谓人们的灵魂，就是说的思想，说的意识形态，说的社会风行的文化，说的同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相联系的种种风俗、种种习惯。这些，都是人们头脑里的问题。

既然是这样，无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就必须用文斗，来解决人们头脑里的这些问题。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是这样。

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提倡在文化大革命中，要充分利用大字报，进行大辩论，大鸣大放。这些都要动笔，动口。

动口，动笔，就必须动脑筋，让群众去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发挥自己的智慧和天才。

用武斗的简单办法，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灵魂，不能在群众面前充分暴露那些牛鬼蛇神的丑恶面貌，不能肃清那些牛鬼蛇神的反动毒素。

毛泽东同志说："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这就是说，要用脑筋，要用文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学会文斗，学会动脑筋，这是一件大事。

毛泽东同志历来告诉革命的人们，要善于用脑筋。他指出："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毛泽东同志这个指示，对我们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说来，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知道，敌人对人民是不会宽恕的。我们提倡文斗，不是要宽恕敌人的罪恶活动，而是为了真正从政治上、思想上把人民的敌人彻底斗倒，斗垮，斗臭，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

文斗，就是要充分揭露，深刻批判，把一切牛鬼蛇神的反动言行摆在光天化日之下，用这些反面教材，来教育群众，教育年轻的一代。这样，才能大大提高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把无产阶级的敌人、人民的敌人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这种文斗的办法，是无产阶级的敌人，人民的敌人所最害怕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极其尖锐、极其复杂的阶级斗争。要取得这个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伍，必须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活学活用十六条，学会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阶级斗争的本领。

人民的敌人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我们主张文斗，是因为我们依靠群众，信任群众，是因为真理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里，相信用文斗的办法足以制服敌人。同时，强大的国家机器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我们不怕人民的敌人捣乱。如果敌人胆敢动武，触犯无产阶级专政的刑律，那就坚决依法制裁。

用文斗，不用武斗，这是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项重要政策。我们一定要坚持这个政策，贯彻执行这个政策。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

目前，全国各地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为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组织各省、市、自治区高等学校革命学生全部、革命教职工代表和中等学校革命学生、革命教职工代表从九月六日起分期分批来北京参观、学习，相互支援，交流革命经验，以利于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现将来京参观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每批来京参观的外地革命学生和革命教职工在北京逗留的时间定为四天，主要活动是：(1) 参观和学习北京各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2) 支持北京各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3) 受中央负责同志接见。

（二）外地高等学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农）半读高等学校）革命学生，除了有病的、已经来过的或有其他原因不能来的以外，都可以组织来北京参观；高等学校教职工可按每五十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一人参加。

外地中等学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农）半读中等专业学校及普通中学）按每十名学生选出革命学生代表一人；教职工按每一百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一人参加。

各省、市、自治区应该根据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以及城乡分布的不同情况，通盘筹划，妥善安排。

（三）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同当地铁路管理部门密切联系，协商安排。在本地集中所需交通工具，由各地自行解决。来京参观的革命学生和革命教职工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

（四）注意事项：

(1) 旅途中自带干粮，火车上只供应开水。到京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负责安排，但每人应按照自己的粮食定量交出粮票，在京时的饭费，由国家财政开支。

(2) 自带简单行李、衣物和碗筷。

(3) 为了预防火灾，保证旅途安全，不要在车厢内外贴大字报。

(4) 为了保证来京参观的学生和教职工旅途健康，可根据旅途的长短，由各地自行配备必要的医护人员。

（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人委应当建立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工作，落实计划，并切实做好来京参观的生活管理工作。同时，还应当推选负责人带队，负责旅途的安全和生活管理。

各省、市、自治区应当根据本省、市、自治区的学生和教职工来京时间的先后，选派几个干部先行到京，负责联络工作。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各地党委和政府，教育、铁道等有关接待部门，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做好思想工作，落实组织安排，使来京的革命师生参观好，学习好，把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新的高潮。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保障党和国家机密安全的规定

（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

为了确保党和国家的机密安全，特作以下规定：

一、密码、电报、机密文件、档案和机密资料等都是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所有机关干部、革命群众和革命师生都有责任加以保护。作为人民解放军的后备力量的红卫兵，应协同党政机关和解放军负起保卫党和国家机密的光荣责任。

二、党政机关的密码、档案、机密资料，未经领导机关负责人批准，任何人不得任意索取和动用。任何人不得拦阻和检查机要交通人员。

三、任何人不得强行进入机要、档案和机密资料部门的办公室和库房。如发生群众性的这类行动时，主要负责同志应即出来坚决劝阻，号召革命群众起来保卫党和国家机密，防止坏人乘机破坏。如果发现个别坏分子进行破坏时，应在群众中揭露后依法处理。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

一、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依靠本单位的革命群众和广大干部把革命搞好。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除省、地委另有布置外，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不参加县以下各级的辩论。县以下各级干部和公社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连。

二、秋收大忙时，应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和秋购，“四清”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城市学校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也应动员下乡，有组织地到农村参加劳动，帮助秋收。

三、农村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应在农闲时专门安排一段时间把它搞好。这件事，也应当依靠本县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的力量去进行，必要时可由省、地委有计划地组织一些学校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下乡帮助宣传和协助行动。

四、县以下各级干部，应在本地革命群众和本单位干部的帮助下，揭发错误，批评错误，改正错误。对问题特别严重、不能继续担任工作的干部，应向上级党组织反映，由上级党委作出决定，调动或撤销其工作。属于现行反革命分子，则依法处理。对由上级党委和政府任命的干部，均不应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作法。

五、县以下各级领导，有些已陷于瘫痪的，应迅速调整干部，恢复和加强其领导力量，把县的各项工作全面抓起来。必须加强对各级干部的教育，突出政治，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觉悟，改善领导作风，对工作要勇于负责，坚决执行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

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有力地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进一步解放社会生产力，意义极为深远。当前，我们应当乘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东风，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光辉照耀下，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纲，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全面地、迅速地向前发展。我们必须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建设双胜利。为此，各地方，各部门，各厂矿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单位和服务行业，必须做好如下几项工作：

一、人民日报九月七日《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应当写成大字报，在各机关、企

业、事业单位内外张贴，并组织全体职工认真学习讨论。

二、工业（包括国防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应当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指挥机构，保证生产、建设、科学研究、设计、市场、收购等工作的正常进行，保证革命、生产双胜利。

三、各生产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设计和商业、服务行业的职工，都应当坚守岗位。外出串连的职工和科研设计人员，应当迅速返回原工作岗位，积极参加本单位的革命和生产。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那些工矿企业、科学研究、设计事业单位去串连，干预他们的部署，以免影响生产、建设、科学研究、设计工作的进行。如对该单位有意见，可送大字报去。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国防工业项目和新工矿区，无论已建成的或正在建设的，都是国家的机密，更应说服其他单位搞文化大革命的人员，不能随便进入。

四、中央各部直属企业以及各地区的工矿企业、事业和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设计等单位，凡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应当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迅速组成两个班子：一个班子抓革命，一个班子抓生产，抓业务。职工的文化革命，放的业余时间去搞。领导班子已经瘫痪的，应由上级党委指派或商同该单位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筹委会，责成有关人员迅速成立生产业务指挥机构。还未开展文化大革命、而生产任务又重的单位，文化革命可以推迟进行，但必须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充分的正面教育，以利以后开展文化大革命。具体搞法，除派工作队已不适用外，请仍按中央七月二日的通知和七月二十二日的补充通知的有关措施进行安排。

五、不论是中央直属的和地方的工矿企业、事业、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设计单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对该单位领导干部须要撤换的应由上级党委主动加以调整，不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作法。

六、各级生产、建设的指挥机构，必须认真负责，在抓生产、建设的同时，必须抓好质量、品种、节约、安全等项工作。特别是要抓紧原料、材料的生产、供应工作，注意做好防火、防爆、防寒和维修等工作，保证重要设备、交通枢纽和仓库等要害部位的安全。

此件，请迅速传达到中央直属和各地的工矿企业、事业、商业、服务业、科研、设计单位，并督促他们安排落实。

林彪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

同志们，同学们，红卫兵战士们：

为了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来到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身边。你们辛苦了！我代表毛主席，代表党中央，向你们问好！我们热烈地欢迎你们！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领导下，以毛主席主持制定的十六条为指南，正在全国范围内胜利地向前发展。形势好得很！形势越来越好！

红卫兵战士们，革命同学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广大工农兵群众也坚决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很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斗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是为了巩固和加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很明显，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我们不同，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专政，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不能，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不要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他们只是一小撮人，但是他们有时能够欺骗一些好人。我们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离开了这个大方向，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学生，目标是共同的，方向是一致的。大家要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携手前进！

现在，有些人违背毛主席的指示，违背十六条，利用工农群众对党对毛主席的深厚的阶级感情，制造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的对立，挑动工农群众去斗争革命学生。我们千万不要上他们的当！

在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兵群众，从来就是我国革命的主力军。今天，他们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也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

我们工农兵群众，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坚守生产岗位，坚守战斗岗位。要坚决站在革命学生一边，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做他们的强大后盾。

红卫兵和一切革命青少年，是我国人民的优秀儿女。你们要向工农兵学习，学习他们最坚定的革命立场，最彻底的革命精神。学习他们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一切优良品质。要像工农兵那样，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党，忠于人民，在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把自己锻炼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在我们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学生团结起来，一切革命同志团结起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

同志们，同学们：

我们热烈欢迎你们！欢迎你们从五湖四海，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北京，来到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身边。

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同大家亲切会见，这是对我们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这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光荣！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改造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也是促进社会生产的大革命。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指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

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的兴起，我国工农业生产正在出现一个更新的面貌，更新的繁荣。

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它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关系到城乡人民生活，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也关系到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关系到支援全世界各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双胜利！

广大的工人、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企业干部，都应当坚守生产岗位，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把在文化大革命中焕发起来的冲天干劲，用到工农业生产和科学实验中去！

同志们，同学们！

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现在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革命串连。那里的革命，要按照原来的“四清”部署，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搞革命。革命学生要尊重工农群众，信赖工农群众，相信工农群众完全可以依靠自己把革命搞好。

秋收秋种的大忙季节已经到来。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应当有组织地到农村去参加劳动，帮助秋收，学习贫下中农的革命干劲和勤劳的品质。

同志们，同学们！你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对于你们的革命行动，我们热烈地欢迎，坚决地支持。我们相信，你们一定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革命中学会革命，把自己锻炼成为毛主席的好战士，好学生，成为共产主义的一代新人！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抓革命、促生产，迎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

伟大的中国各族人民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万岁！ 万万岁！

红 卫 兵 赞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七日）

《红旗》杂志评论员

现在，全国革命人民争夸红卫兵。

红卫兵的革命首创精神，震动了全世界。

红卫兵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

红卫兵是毛泽东思想哺育出来的。红卫兵们说得好：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

我们的红卫兵最爱读毛主席的书，最爱听毛主席的话，最热爱毛泽东思想。他们随身带着《毛主席语录》，把学习、宣传、执行、捍卫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最高的职责。

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坚决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一切牛鬼蛇神，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闯将。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布之后，八月十八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在首都检阅了红卫兵。在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直接鼓舞下，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革命组织一起，掀起了一个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

千百万红卫兵由学校走上街头，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他们高举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红旗，发扬了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清扫着几千年来堆积起来的垃圾脏物。

红卫兵干了大量的好事，提出了大量的好倡议。他们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在破除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树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的斗争中，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他们的革命行动，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出现了更大规模的蓬蓬勃勃的群众运动。这种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使钻进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陷入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没有这样规模巨大的群众运动，就不能摧毁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的社会基础，就不能把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彻底。

红卫兵是东方地平线上出现的新生事物。革命的青少年是无产阶级的未来和希望的象征。革命的辩证法告诉我们，新生的力量是无敌的，它一定会在斗争中获得壮大和发展，最

后战胜腐朽的力量。因此，我们就是要赞美新事物，歌颂新事物，为新生事物的发展，摇鼓助威，鸣锣开道，高举双手，欢迎新事物。

我们的红卫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创建了不朽的功勋。毛主席和党中央热烈地赞扬他们的冲天革命精神，广大工农兵群众热烈欢呼他们的革命行动。

革命小将们的革命行动，真是好得很！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功绩，将永远载人无产阶级的革命史册。

红卫兵们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革命中学会革命。他们要求自己，不仅敢于斗争，敢于革命，而且善于斗争，善于革命。他们正在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进一步地学习十六条，掌握十六条，进一步地贯彻执行十六条。

革命小将们受到了毛主席和广大工农兵群众的热烈赞扬之后，他们提出戒骄戒躁，要虚心向人民解放军学习，向工农群众学习。他们下定决心，要按照人民解放军的三八作风、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他们决心在革命熔炉里，把自己锻炼成雷锋、王杰、麦贤得、刘英俊那样的革命战士，培养成为专门利人毫不利己的共产主义者，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对待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看法，革命的阶级认为好得很，而反革命的阶级则认为糟得很。

全世界的革命人民为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拍手欢呼，向红卫兵致以崇高的敬意。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和蒋介石匪帮，则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红卫兵。他们污蔑红卫兵是"少年狂热分子"，攻击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是"违反人类尊严"，是"破坏社会传统"，等等。

毛主席教导我们，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如若敌人起劲地反对我们，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那就更好了。红卫兵受到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起劲的反对，这真是光荣得很。

"少年狂热分子"。革命的敌人总是极端仇视群众的革命热情，并诬之为"狂热"。敌人所恨的，正是我们所爱的。革命小将们，不仅要继续保持充沛的革命热情，并且要进一步发扬这种冲天的革命精神。

"违反人类尊严"。红卫兵无情地鞭挞、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腐朽的文化，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丑恶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于是他们大叫："违反人类的尊严"。老实说，我们不仅要违反你们的"尊严"，而且要把你们打倒在地，叫你们永世不得翻身。

"破坏社会传统"吗？你们说对了。红卫兵就是要破坏地主资产阶级的传统。革命的小将们，对于封建主义的余毒，资本主义的病菌，修正主义的祸根，就是要扫清，灭绝，斩断。只有彻底破坏了剥削阶级的种种旧传统，才能够继承和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

按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红卫兵小将们，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重点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就挖掉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埋在我国的定时炸弹。因此，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对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感到震惊、恼火和愤恨，这是很自然的。

反动阶级的代言人罗马教皇保罗六世无可奈何地供认，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对他们来说"是死亡的象征，而不是生命的象征"。不错，革命小将们的革命行动，确确实实是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最后灭亡的象征。而我们的红卫兵，则象征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欣欣向荣，具有

无限的生命力。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犹如东方升起的红太阳，以自己的辉煌光焰普照大地。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原载《红旗》杂志 1966 年第 12 期）

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七日）

《红旗》杂志社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象一股红色的巨流，冲垮着形形色色剥削阶级的旧事物、旧思想、旧习惯势力，教育着亿万人民群众，推动着我们历史的前进。

毛主席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这个问题，也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

林彪同志说："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要注意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的重点，是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定要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

我们各级党的组织，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广大的革命青少年，一定要紧紧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如果违背了这个大方向，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在现阶段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这个大战役中，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就是要集中力量打击资产阶级中最反动、最顽固的政治上的代表人物。打垮了资产阶级右派，就能够有力地粉碎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的阴谋。

我们的国家是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的党是伟大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在这样的条件下，资产阶级要想夺取政权，总是要通过党内那些极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一小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是最主要的最危险的敌人。在他们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他们实行的是资产阶级政策，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他们运用窃夺到的权力，包庇资产阶级右派，镇压无产阶级左派。如果不把他们打倒，他们就会像赫鲁晓夫一样，一旦有机可乘，起来篡夺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使我们整个国家变颜色。

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斗争的大方向。紧紧抓住这个斗争的大方向，就可以防止坏人混水摸鱼，就可以避免我们在斗争中抓住次要问题，放过了主要目标的错误。

不是无产阶级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的当权派。抽象的超阶级的当权派是没有的。对于无产阶级当权派应该支持，支持他们，正是为了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于走资

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该打倒，打倒他们，正是为了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根本上说来，当权的是无产阶级。在党、政、军各部门，在工、农、商、学、兵各界里负责各级领导工作的干部，在一般情况下，大多数是拥护党、拥护毛主席，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们包括十六条中第八条说的一、二类干部。钻到党和国家领导岗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只是一小撮。这就是十六条中所说的那第四类。

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基本的事实。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是巩固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在我们国家里，才能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上的极其光辉的胜利。

林彪同志指出：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专政，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不能，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不要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牛鬼蛇神，只是一小撮人，但是他们有时候能够欺骗一些不明真相的好人。只要我们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照一照，他们就显出了自己的原形，他们就会陷入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广大群众的包围之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绝对不是斗争一切领导干部，也绝对不是斗争群众。决不允许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打击革命积极分子，挑动群众斗群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中，群众之间是会有不同意见的，有时甚至会有激烈的争论。对于群众之间的不同意见和争论，包括对于群众中的错误意见，都应该按照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恰当地进行解决。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说：

"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

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对于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上述决定，我们每个革命的同志都应该认真地贯彻执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这场伟大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势必涉及到人们灵魂深处的各种问题。这次运动，对我们广大的干部和群众，都是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破四旧，立四新，革命的风气迅速地普及全国，这是大好的事情，具有深远意义的事情。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应该热烈欢迎，坚决支持，都应该自觉地在革命的烈火中锻炼自己，按着毛主席的教导，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对于群众的批评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就整个运动来说，我们要抓住主要矛盾和重点，正确处理主要矛盾和一般矛盾的关系。人们的一般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应当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自觉改正，但不应作为运动的重点。解决这类问题，也要采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要说服教育，防止简单粗暴，不要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去对待一般作风的缺点和错误问题，不要把这类问题当做运

动的主要斗争目标，以免干扰我们的斗争大方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伟大的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这一场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而且是会有曲折和反复的。对于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的估计。只要我们牢牢掌握运动的大方向，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对待运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各种矛盾，随时总结经验，就一定能使这场伟大的革命斗争一步一步地胜利前进。

(原载《红旗》杂志1966年第12期)

林彪关于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八日，接见高等军事学院、

政治学院和总政治部宣传部负责同志时的谈话)

对毛泽东思想抱什么态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就是要抓对毛主席的态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特别是政治学院更应该这样。其他院校和一切教育机关也都要这样。

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统一行动纲领。全世界谁也不能代替毛泽东思想。什么李达，康斯坦丁诺夫，尤金，都不行。这些人的书怎么能同毛主席的书相比？现在全中国、全世界没有那一个人的著作能统一人们的思想。马克思、列宁的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是革命的教科书。要彻底把毛泽东思想贯彻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我们的思想。现在全国都在学习人民解放军，都在学习毛主席著作，形势和从前不一样，局面也不同了。我们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学不好不行。许多事情都要军队参加，如四清、文化大革命、生产、群众工作，还有许多干部不断转业到地方工作。因此，军队应该真正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现在要真正落实，把思想搞通。干部住校学习，就要学好，不能有名无实，要真正把毛泽东思想掌握起来。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科学，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无产阶级的最高真理，是最现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理论是几十年革命实践的总结。学好了，干部水平提高了，革命精神就能振作起来，就能把毛泽东思想、党的路线政策贯彻下去。

现在全国都在搞文化大革命。中央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更高地举起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提出了全党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问题。全党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部队、院校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有新的考虑，必须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势，要尽最大的努力，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真正掌握起来。

你们学校明年招生，离现在还有三个月。今年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好。通过文化大革命，把组织机构搞得精干一些。宁肯人少一些，也不要坏家伙。把组织整顿好，把教学队伍整顿好，这个问题很重要。不把组织整顿好，思想不一致，甚至有坏人插在里边，怎么能搞

好？一定要提高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要严厉批评那种对毛泽东思想估计不足的倾向。

有些人迷信洋教条，总觉得苏联比我们的好，近的不香远的香，说什么山沟里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他们那一套那里比得上我们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那一个人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有些人说《资本论》是理论的基本阵地，其实《资本论》只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问题。我们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打倒了，现在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问题。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中国反动派，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要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高的。要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全国的思想，进一步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资本主义的根子，防止修正主义。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很重视学习毛主席著作，现在全党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已进人了新阶段，出现了新局面，新形势。

我们要打破洋人比中国人高明的民族自卑感。有这种民族自卑感，就会丧失革命斗志。有人说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好，我们不如洋人。其实，中国人到了外国，人家也是把我们看作洋人。有些中国人在外国比洋人还洋，学问都很高。洋教条的观点，土教条的观点，都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洋人、古人那里有毛主席高？那里有这样成熟的思想？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

归根到底，现在全党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已经进人了一个新阶段、出现了新局面。军队要更进一步抓紧，更讲求落实，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一定要比过去举得更高。部队很可能有人认为，这几年搞得差不多了，搞久了就麻痹了。如果这样，就容易抓得不紧，学得不好、贯彻不好，就保持不了过去的朝气。

我们军队打仗，历来靠人的政治觉悟，靠勇敢。这就要靠政治教育，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教育部队。部队战斗力的高低，取决于政治工作、政治教育抓得紧不紧。部队的纪律好坏，作风好坏，能不能出干部，能不能多出好人好事，千条万条，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是第一条。人的觉悟提高了，勇敢也有了，积极性也有了，创造性也有了，组织纪律性也有了，吃苦的革命精神也有了。全军工作情况虽然很复杂，有各种不同的情况，但在这一点上，又复杂又不复杂，又有差别，又没有差别，总的就是都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

明年怎么搞，总政宣传部要研究，各院校要研究。全党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出现了新的形势，我们军队要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到新的阶段，搞出新的局面，要适应文化大革命这个新的形势。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学习时间，你们去研究。

干部要学习毛主席著作。有些同志在部队里尽搞那些事务性的东西，一天忙到黑，那有那么多时间读书？他们到学校来，就是要让他们坐下来读书。如果不读毛主席的书，就要脱离理论，就要脱离方向。具体怎样搞法,你们自己去研究 可以办几个月的训练班，十个月、八个月也可以。

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那些路子好，那些路子不好，要研究。

我过去曾经说过，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部队干什么学什么；学校与部队不同，学习时间长一点，内容可以多一点。要通读与选读相结合，通读与专题相结合。可以有三种办法：一种是按专题学，一种是完全按顺序学，一种是通读与专题相结合。时间长的采取通读与专题相结合，时间短的不通读，或者搞半通读，选读一些同当前形势和部队实际需要结合得紧的毛主席著作。究竟用那一种办法，要根据学习时间来决定，反正不要走过场。一期两个月、四个月的不搞通读、七个月、八个月的可以搞通读。时间长的可以搞通读，但重点要放在专题上。要有重点，不要搞平均主义。读书和做事，都不能搞平均主义。平均主义不合辩证

法。一定要讲究效果，不要搞形式主义。要把这几年的经验总结一下，怎样才学得好，才能真正理解、熟练运用毛主席的思想，看那种形式、方法效果好，就采取那种形式、方法。现在，对毛主席思想不是学不学的问题，而是真正学到没学到、会用不会用的问题。

通读和选读的关系，你们怎么解决的？时间长的可以通读，但重点要放在选读上，平均主义不行。有些人有阅读能力，有学习的习惯，又有时间，也可以让他通读，不然他不放心，怕丢掉了什么。

要列出几个专题来作为重点。有些文章如作战命令，浏览一下就行了，重点文章就要多读。毛主席的哲学著作要学几十遍才能学懂。

部队里就是结合实际学，今天学这篇，明天学那篇，时间久了，就差不多通读了。有的要反复读，读好多遍，有的读几遍。还是干什么就学什么，有目的地学，和自己的工作结合起来学。用得上的学了就容易懂，容易记。例如，搞财贸工作的，学习毛主席关于财经问题的著作，就学得懂，记得住，用得上。不结合实际学，就学不懂，记不住，用不上。理论联系实际是根本原则。总之，重点是结合实际选读，同时又有通读。连队更要结合实际选读，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个别人愿意通读也可以，但不要作死规定。

老三篇虽然是战士必读的，但是干部也要读。老三篇最容易懂，但最不容易做到。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那一级干部都要学，包括我们这些人。从中央副主席到每个支部的每个党员，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思想革命化。思想方法和政策的学习也很重要。

《解放军报》要很好掌握，要很好突出毛泽东思想，联系部队实际，指导好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反复教育，反复宣传。看起来部队是不变的，实际上干部、战士都在变，天天都在变。要反复宣传，结合新的形势，用新的语言反复宣传，就不觉得枯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反来复去就是无产阶级立场，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但一结合实际，就一点也不觉得重复了。这样宣传，形式上不重复，内容上是重复，只有多次重复才能加深认识。

今天我提出的问题，你们回去研究。全国出现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势，全党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进入一个新阶段。为了适应这个新形势，新阶段，部队特别要学好。部队一定要贯彻毛泽东思想，抵制修正主义思想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加强革命化，提高人的觉悟，提高政策水平，提高思想方法。

总政宣传部编的要战士熟读熟记的《毛主席语录一百条》，可以搞，这也是有重点的选读，不过更突出重点，更精练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不上课的政治课，是不经考试的考试。群众运动就是政治，就是最好的政治课。这话是毛主席说的。我也说过类似的话。

今天就谈到这里，一两个月以后，还可以再来谈一次。

中共中央对被批判斗争对象的工资处理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八日）

吉林省委并东北局，各中央局：

吉林省委九月十六日电悉。对被批判斗争对象的工资处理意见，即使已定性的，也暂不改变，如本人少领工资，或捐献一部分工资作党费，听其自愿，但不强求，也不许其由减少用费而致病；私人东西，除政治性的，一般不查抄；凡未定性的，工资仍照旧。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林彪讲话的通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林彪同志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林彪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事实，根据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特别是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党、篡政、篡军的教训，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反革命颠覆的问题作了系统的精确的阐述。

林彪同志尖锐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还可能丧失政权的问题。他指出，无论怎样千头万绪的事，永远不要忘记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那就是糊涂人，脑袋掉了，还不知怎么掉的。

林彪同志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在这篇讲话中，他对毛泽东思想做了全面的、正确的、科学的评价。他指出，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以毛主席为中心来团结，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来团结。他号召在全国人民中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他指出，这是保证我国防止修正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复辟，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根本的关键问题。

林彪同志说，毛主席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思想是永远的普遍真理。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林彪同志这个讲话，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是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文件。全党全军都应当认真学习，认真讨论，认真领会，把它运用到文化革命和一切行动中去。

中共中央转发
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国家经济委员会
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
政策问题的报告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中央原则同意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和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现在作为试行草案发给你们。请你们一面执行，一面进行仔细调查研究，就执行中的问题提出意见，以便补充修改。

这个文件发到县、团级党委和工交、基建、财贸、文教各系统的基层单位，并且向红卫兵和广大群众进行传达，同时，和他们进行商讨，欢迎他们提出新的倡议。目前这些问题不要登报。在传达时，要由负责干部亲自讲解说明，组织群众讨论。

附:

主席、中央:

最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地红卫兵和革命群众，横扫"四旧"，解决了一些多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创举。他们在有关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也提出了许多革命性的倡议。这些倡议，许多是可行的，应当采纳办理。也有些是目前还不能实行的，需要对他们进行耐心的解释和说服。现在把有关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报告如下:

一、关于改换旧商店的招牌，扫除服务行业中陈规陋习的倡议，各地已经在实行，应当继续积极地有领导地实行。

二、公私合营企业应当改为国营企业，资本家的定息一律取消。资方代表一律撤销，资方人员的工作另行安排。关于取消定息，将有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后实行。在未通过前，暂停支付。

三、大型合作商店有条件有步骤地转为国营商店，有的也可以不转，照旧营业。转为国营的，人员要经过甄别清理，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另作安排。小型的合作商店，不转为国营商店，不要停业。小商小贩，现在还起着社会商品流通的作用，为群众所需要，应当让他们存在。但必须接受国家的管理和群众的监督，不许搞投机倒把。大量的小商小贩应当为国营商店代购代销。商业网、点的设置要便利群众。

四、集体所有制的手工业合作组织，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一种形式，生产比较灵活、品种多样，又便利于群众需要，目前一般不要改变。

五、独立劳动者包括个体手工业者，个体服务业和修理业人员，个体三输车工人，以及

家庭服务人员（例如保姆等），应当允许继续存在，以利于安排社会就业和满足社会某些方面的需要。同时，对于这些人，应当积极加强管理，加强教育和改造。凡是有条件组织起来的，应当组织合作小组或吸收他们参加合作社。

六、银行和信用合作社的储蓄存款，继续执行存款自愿、取款自由的原则，利息照付。侨汇存款的优待利率应适当降低。拟于明年一月作出规定。反革命分子的储蓄存款应当没收的，依法处理。

七、公债已经归还了绝大部分。剩下的很小一部分，应当按原定办法还本付息。

八、出口商品，包括工艺美术品，在商标、图案、造型等方面，有明显反动政治内容的，必须立即改变，一般的目前暂不变动；以后要坚决改革，推陈出新，表现我国人民高尚朴素的民族风格，也要适当考虑国外不同市场的需要。仓库里已经生产出来的出口商品，应当继续出口。已经签订的出口合同，应当履行，恪守信用。国外市场需要的出口商品，包括工艺美术品，应当继续生产。

九、国内市场的商品，在商标、图案、造型等方面，应当坚决地有领导地进行改革，改革的步子要快一些。现在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应当继续销售。其中商标图案有浓厚的封建或者资本主义毒素的应当经过改制以后出售。呢绒、绸缎、烟、酒以及劳动人民和舞台、银幕需要的化妆品，还要继续生产和出售。商品的品种不要轻易取消。口红、脂粉、香水这类的高级化妆品，不要在国内销售。

十、城乡非农业人口的粮食供应定粮标准，目前不要提高。要继续严格控制吃商品粮的人数，如农村半农半读学校、民办中学、农业中学的学生，自带口粮进入半工半读学校的农村学生、农村医务人员、兽医人员等，不要转为非农业人口，吃商品粮。要严格控制粮食销售，注意节约粮食。

以上意见如属可行，请批转各地执行。

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国家经济委员会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的伟大节日。我代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代表党中央，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全国的工农兵，向全国的革命师生，向革命的红卫兵和其他战斗的青少年组织，向全国各民族的革命人民，向全国的革命干部，致最热烈的敬礼！向来自世界各国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欢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这是不平常的十七年。在我国，是翻天覆地的十七年。

在世界，也是翻天覆地的十七年。

毛泽东同志领导我国人民进行革命，经历了千辛万苦的曲折道路。国内外的敌人曾经是强大的，但终于被中国人民推翻了，赶跑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一切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者，这些纸老虎，都被中国人民和各国革命人民戳穿了。

中国人民在短短的十七年间，完全改变了过去的面貌。这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人民群众的丰功伟绩。我们相信，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都会按照本国的情况，走自己的路，像中国人民一样，夺取最后的胜利。

今天，我们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来庆祝这个伟大节日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进行的一种崭新的创造性的大革命。这场大革命，是斗倒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横扫社会上的一切牛鬼蛇神，破剥削阶级的四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目的是为着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会出现修正主义的统治，就会发生资本主义的复辟。在我国，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会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封建半封建的老路上去，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就会重新骑在人民头上。我们这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是很清楚的。

现在，亿万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了。革命人民扬眉吐气，反动资产阶级威风扫地。我们正在前进。我们已经奠定了伟大胜利的局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使人们思想革命化，因而成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生产的强大的推动力。今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今年的工业生产计划预计可以超额完成，农业可以获得又一个好收成。我国的科学技术正在攀登新的高峰。我们伟大的祖国，从来没有这样繁荣，这样生动活泼。我们的国防从来没有这样强大。

毛主席早就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新阶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

同志们，朋友们：当前的世界是一片大好形势。几年来世界的大动荡表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他们的寿命不长了。

美帝国主义力图从发动一场世界战争中寻找出路。我们必须加以认真对待。当前斗争的焦点在越南。我们已经作好了一切准备。我们决心不惜作出最大的民族牺牲，坚决支持兄弟的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的战争进行到底。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和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正在狼狈为奸，积极搞和谈欺骗的勾当，目的是要扑灭越南人民反美民族革命战争的烈火，扑灭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民族革命斗争的烈火，扑灭世界革命的烈火。只要全世界人民擦亮眼睛，他们的阴谋是不能得逞的。二十年前，毛主席就说过，全世界人民要结成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来打败美帝国主义。世界各国革命人民，正在这条道路上前进。

毛主席说："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末，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世界的前途，一定是这样。

中国人民将继续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同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起，同各国革命人民一起，把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进行到

底，把反对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同志们，朋友们！

我们的一切成就，一切胜利，都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的思想，统一全国人民群众的思想。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在全国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我们要把全国变成为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我们要把伟大的祖国建设得更加强盛，更加兴旺。这是我国人民的需要，也是世界各国人民对我们的希望。

中国各族人民万岁！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

《红旗》杂志社论

今年，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一个更深人、更广阔的新阶段中，庆祝伟大的国庆节。这是一个最不平凡的节日，这是一个革命精神空前高昂的节日，这是一个最令人欢欣鼓舞的节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十七年，是全国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凯歌猛进的十七年。十七年来，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里，都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就。我们的成就，受到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热烈赞扬，使得帝国主义者、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胆颤心惊。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屹立在东方，使整个世界的革命斗争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们十七年的伟大成就是怎样取得的呢？把我们的基本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毛主席所说的，紧紧抓住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纲。我们的胜利，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道路对资本主义道路斗争的胜利。

毛主席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国内的基本矛盾就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就是说，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贯串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过程的始终，贯串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方面。

十七年的历史经验证明，凡是抓住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就发展，就前进，就生动活泼，就欣欣向荣。凡是离开了这个纲的地方和部门，就出现歪风邪气，就迷失方向，就受到挫折。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上告诉我们:

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新阶段。

这次文化大革命，涉及的范围很广。我们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大破剥削阶级的四旧，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并且势必触及到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是现阶段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斗争的集中表现。

为什么党内会出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这是由阶级斗争规律决定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总是企图用各种办法腐蚀共产党的干部，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教导我们，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这是向全体共产党员敲起的警钟。绝大多数共产党员经受住了这种考验。但是，也有一小撮人却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中了。他们已经不是无产阶级的代表，而是资产阶级的代表。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一小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一旦有机可乘，他们就要阴谋篡党，篡军，篡政。他们是我们最危险的最主要的敌人。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把复辟的希望主要地寄托在他们身上。剥削阶级的复辟活动，主要是通过他们进行的，或者是在他们包庇下进行的。所以，只有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能粉碎剥削阶级的复辟阴谋，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十六条的公布，获得了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拥护，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整个的革命形势好得很，越来越好。

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战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只有彻底批判它，肃清它的影响，才能贯彻执行无产阶级的十六条，才能在正确路线指导下进行社会上的、学校的以及其他文化部门的斗、批、改，才能明确斗什么，批什么，改什么，才能明确依靠谁来斗，谁来批，谁来改，才能胜利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如果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挑动学生斗争学生，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革命群众，等等，那就是对抗和破坏十六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正确地进行斗批改呢?

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对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我们必须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而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庸人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

毛主席说:"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

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毛主席还说：在共产党内发生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非对抗性矛盾的情况下，“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存在着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的可能性”。

党中央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过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同志，应当正视自己的错误，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正确立场、正确路线上来，而不要发展到同党对抗的地步。

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因此，他们是一定要失败的。一时被他们蒙蔽和欺骗的群众，一定会觉悟起来，同他们划清界限，反对他们。

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号召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从人民解放军发展到全国人民群众，取得了伟大的效果。这个运动，使毛泽东思想更加深入人心。有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亿万群众，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最可靠的保证。人民群众精神面貌的飞跃，必然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十七年来，毛泽东同志总是紧紧把握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发展，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到今天，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路线，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发展，这是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伟大创举。

国际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特别是苏联出现修正主义统治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只有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批判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出现修正主义统治，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我们的事业沿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方向胜利前进。

苏共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和其他的叛徒、工贼，天天疯狂地咒骂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咒骂呢？这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中国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是无法阻挡的。它必然会唤醒他们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唤醒广大的革命人民起来反对他们。他们统治的宝座是岌岌可危的。

历史的规律是不可改变的。国内外的一切反对派，绝不能逃脱历史的惩罚。他们都将被自己的掘墓人革命群众所埋葬。

不管敌人怎样叫骂和攻击，伟大的中国人民，都将沿着自己的道路，胜利的道路，毛泽东思想的道路，昂首阔步地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从胜利推向胜利。

（原载《红旗》杂志 1966 年第 13 期）

中共中央批发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

中央完全同意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

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把院校作为重点之一，总的说来形势是好的。但是，有些领导机关和院校的领导过分强调了军队院校的特殊性，至今还有压制民主的现象，不许班、系、校串连，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甚至挑动学生斗学生，打击左派，严重地违背了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因此，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这方面，军队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样。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要充分信任群众，不要怕群众，要敢字当头。要相信院校的学生和教职员工的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好的，他们是听毛主席的话的，听党的话的，他们革命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也要看到军队院校领导和教职员中，确实有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家伙，一定要借文化大革命的东风，把他们揪出来，彻底斗，彻底批。同时要确实掌握林副主席对领导干部所提出的三条标准，即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拥护不拥护毛主席；是不是突出政治；是不是有革命干劲，进行检查。还要注意，要文斗，不要武斗。

以前军委总政对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个别规定，如关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关于指挥学校的学员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与连队相同的规定；关于只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内不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外和地方学校串连的规定等，已不适合当前的情况，应当宣布取消。今后各院校应按照十六条的规定由革命学生和教职员工选举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为了搞好军队院校的斗批改，应当允许进行革命串连和调查，但军队院校不要干涉、介

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这个指示，应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

军委、总政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陈伯达

(一) 形势大好

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很大胜利，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宣告失败。

形势大好的基本特点是：广大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同林彪同志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毛主席三次在天安门接见群众和国庆节的检阅，群众的规模之大，声势之盛，在中国，在世界，都是史无前例的。毛主席同那末多的群众见面，亲到群众中去，同群众在一起，说明了他总是信任群众，同群众共呼吸，共命运，给全党同志树立了最光辉的榜样。同志们要晓得什么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吗？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要向他学习、学习，再学习。

两个多月以来，即从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发表以来，广大群众得到了战斗的思想武器，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更加了解，斗争更加昂扬，运动更深入、更广阔、更健康地发展。文化大革命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伟大的红卫兵运动震动了整个社会，而且震动了全世界。红卫兵运动的战果辉煌。可以无愧地说，整个文化革命运动，比巴黎公社，比十月革命，比中国历来几次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都来得更深刻，更汹涌澎湃。这是国际上更高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这个运动引起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欢呼和支持，同时，激起全世界帝国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恐惧、痛恨和忧虑，而许多庸人都为之目瞪口呆。

(二) 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在这样大好形势下，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会自然消失了吗？不。它并不会自然消失。毛主席在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就已警告我们："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事实的发展，完全证明了毛主席的预见。

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的十六条，纠正了前一个阶段的错误路线，即资产阶级的路线。但是，错误的路线，还可以用另外一些形式出现。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

的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

从我们党创立以来，就有一条正确的无产阶级路线，即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不同时期同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进行斗争中不断发展，不断丰富，而在遵义会议后取得全党统治地位的路线。这一条红线贯串着我们党的整个历史。但是，正如毛主席经常说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总会反映到我们党内来的。因此，“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还总是企图干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斗争一直围绕在群众的问题上。

有些人不愿意执行党的路线，无产阶级的路线，革命的路线，即毛主席的路线，因为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是同一些同志还没有改造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彻头彻尾地不相容的。

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可是，提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他们却是反对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他们在这个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把国民党的“训政”搬来了。他们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这条错误路线要把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引到相反的道路，变成不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

工作组只是一种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在某种运动中，如果用得适当，是可以的，有的是必要的。但是，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把工作组这种组织形式强加在群众头上，不过是为了便于推行那条错误路线罢了。

工作组虽然撤走了，但是，那些不赞成毛主席路线的人，仍然可以利用职权，用其他形式来代替。例如，在一些学校、机关中，有那样的人，他们完全违背党中央指示的巴黎公社原则，预先指定，暗中操纵，成立所谓“文革筹委会”、“文革小组”、“文革会”，或者是别的什么组织。甚至当各地大量的革命师生来到首都见毛主席的情况下，也有的地方组织一小批人跟着前来，宣传自己反对中央十六条的决定，企图打击那些来京的革命师生。

九月二十五日，我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一些同志接待一批各地来的学生，曾经有个建议：如果高干子女在各学校、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中占有领导岗位的话，最好让工农兵和普通干部的子女来担任。我个人认为，在有些学校，有些单位，高干子女一定要掌握领导地位，是没有好处的，对我们将来的革命事业不利，对他们自己也没有好处。当然，如果高干子女的确很好，群众的确拥护他，要选他，我也不反对。我这个建议是否恰当，还可以商量和斟酌。但是，我们调查的材料说：有的人就很快采取对付的措施了。他们说，“中央已有指示（并没有这个指示），高干子女不担任红卫兵领导，趁群众不知道，要争取主动”。于是，就用了金蝉脱壳的办法，辞去了职务，指定了他认为立场“最坚定”的人接替。

坚持反对党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路线的花样是很多的。但有些同志，对这类花样，却津津乐道。这是很错误的。

毛主席八月五日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群众，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但是，有一些人仍然顽固不化，对毛主席的批评，置之不理，还是要你搞你的，我搞我

的。这不是资产阶级的本能在他们的头脑中和行动中起作用，又是什么呢?

毛主席在全国解放的前夜说，“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确是这样：原来是站在革命方面的一些人，被敌人威胁利诱，潜移默化，就站在同革命对立的方面去了。

先进的变成落后，落后的变成先进。这类情况，在我们文化大革命中，深刻地表现出来了。

我们有些同志，是少数同志，以老革命自居，在解放后做官当老爷，甚至把自己的革命历史忘记得一干二净。毛主席多年来批评的“官、暮、骄、娇”，他们全有，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不让群众去触动，而只是想利用毛主席和党在群众中的崇高的、无限的威信，动员一小批不明真相的群众去保他们。这次会议印出了四川南充一个妇女受到压力的材料，我建议大家，不妨仔细读一读，从那里受到教益。我就在这里引出两段话吧!

南充那位妇女对两位街道干部说：“如果这两千多学生都是搞反革命工作，那地委就有问题了，因为这些学生都是在学校受党的教育的。如果出这么多的‘反革命’，我看地委就是有问题。”

大家听着! 这位普通妇女说的话何等中肯，何等尖锐，何等鲜明呀!

同一材料，又写了一位退休工人的谈话如下：

“革命的地委还要我们去保，也不是国民党的地委，革命的地委为什么还害怕群众，又不是旧政府；国民党八百万军队都没有保住……”。

大家听着! 这位普通工人把问题分析的多么明明白白啊。

他很领会毛泽东思想。他比起我们某些干部高明得不知道多少倍。

事实是这样摆着：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而且还会经过多次的反复。

这种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八月八日，中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不过十二天的光景，有一个大学的什么“文革筹委会委员”就跳出来，发表了同中央决定十六条相对抗的一篇讲话，印发得很广。有人对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央决定，没有一点兴趣，但是，对那一篇同中央决定相对抗的讲话，却视为至宝，为之翻印，为之广播，忙得不亦乐乎。还有一位所谓高干子女竟然在称赞的时候，直接了当地宣称：那个讲话“特别适合我们的情况，对我们有利。”“我们高干子弟要掌权”。

高干子女有很多是好的、比较好的，在群众的大风大浪里锻炼，可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也有一些是不大好的，或者很不好，甚至要走修正主义的道路。不做阶级分析，不把事物一分为二，只醉心“高干子弟要掌权”，这是完全脱离了无产阶级轨道，完全同毛泽东思想背道而驰。我们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为什么因为是高干子女，就一定要掌权？难道因为他们的血统高贵吗?

不久以前，有一位同志给我写信，尖锐地提出问题：“十六条以前是否全国凡属派了工作组的地方都犯了路线错误?”“十一中全会之后，各地都在对待大串连、多数少数关系等问题上，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是否都要承认是继续执行了‘反动的错误路线’?”我想，这位同志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对错误路线的认识和估计问题，对待消除错误路线影响的问题。我不妨在这里就这些问题，发表一些我的看法。

第一，路线问题，要分开看：一种是提出的，一种是执行的。提出错误路线的，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人，即刘少奇和邓小平两位同志，他们要负主要责任。

第二，党内路线的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刘、邓的错误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相当一批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糊涂人。

第三，派出大量工作组去镇压革命的学生，这就是犯了路线错误。没有派多少工作组的地方，或者没有派工作组的地方，如果那里镇压革命的学生，同样是犯了路线错误。当然，其中有自觉执行的（这是少数的）或不自觉执行的（这是大量的）之分，有轻重之分，有及时改正错误或坚持错误之分。

第四，区别改正错误或坚持错误的标志，是对群众的态度，是否公开向群众承认执行了错误路线，是否给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认真平反，并且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

第五，不肯彻底批判错误路线，就不可能认真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即毛主席的路线。

第六，因此，有些地方，有些同志，在十一中全会之后，还用各种形式，在许多问题上，继续犯路线错误。例如，对待大串连，对待所谓少数多数，对待所谓工农群众、机关干部同学生冲突等等，归根结底，他们都有挑动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的问题。

第七，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这不是说，执行这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就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只要自己能够改正错误，回到正确立场上来，执行党的正确路线，那就不仅可能是二、三类干部，也还可能发展成为一类干部。必须说明，即使原来称为一类干部，犯了这种性质的错误，也必须承认是犯了路线错误。

第八，对一般犯路线错误的同志说来，他们的错误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对这样的同志，要根据毛主席从来主张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但是，大家都要有高度的自我警惕。无论什么人，无论过去有多大功绩。如果坚持错误路线，他们同党同群众的矛盾的性质就会起变化，就会滑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

第九，受错误路线蒙蔽和影响的群众，或者暂时被错误路线控制和影响的一些群众组织，并不担负错误路线的责任。大家不应该歧视他们，不要给他们扣什么帽子，而是要善于同他们商量问题，善于同他们交换意见，争取他们，帮助他们认识错误路线的危害，帮助他们认识那些幕后控制他们、操纵他们的人是错误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最严峻的考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受这场考验。现在还在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今后还将长期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

（三）去掉几"怕"，放手发动群众

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无所畏惧。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各级党的负责人，要"敢"字当头，不要"怕"字当头。

可是，有些同志，直到现在，还是"怕"字当头。有的人，甚至怕得很厉害，怕得很古怪。而且，运动越开展，怕的花样就更多了。

怕字派说，群众乱来，不讲道理，不守规矩，闹得很糟。

怕字派说，群众把他们习惯的秩序打乱了，使他们的事情不好办。

怕字派说，文化革命妨碍生产。一闹文化革命，生产就不好进行了，生产计划就没有保

证了。

怕字派说，文化革命起来，会给反革命钻空子，右派会翻天。

怕字派说，闹文化革命的，特别是那些闹得厉害的，大多是一些不安分的人，“野心家”，“伸手派”，“暴徒”，“野蛮人”，等等。

他们给革命师生，革命干部，加了不少罪名，不少头衔。

于是，他们怕见革命群众，就有理由了。

他们怕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就有理由了。

他们怕大字报上街，就有理由了。

他们怕串连，特别是怕大串连，就有理由了。

他们在群众中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就有理由了。

他们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有理由了。

这些怕字派的同志，千怕万怕，一言以蔽之，就是：怕群众，怕革命。从好的估计来说，有些同志是想做现状维持派。但是，有那末一种人，越走越远，就只能为自己垮台造成条件。应该引起这些同志高度警惕：历史上有些人，就是从害怕群众走到镇压群众，从害怕革命走到反对革命的。我们希望，这些同志不要重蹈这种复辙。

当然，有些同志原来在口头上并不反对群众运动，也不反对发动群众。但是，我们应该注意毛主席讲过叶公好龙的故事。叶公是好龙的，到处画了许多龙，一旦真正的龙出现，他就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毛主席讲这个故事，已经过了四十年，难道我们还不要引以为戒吗？

德国有个著名诗人，海涅，进步的人物，是马克思的朋友。他自认是共产主义者，却极其害怕共产主义革命。他这样说过：“我承认未来时代是属于共产主义者的，我是用一种忧虑的、和非常恐怖的语调，来说这句话的，可是——唉！这决不是伪装！当真，我想到了那个时代，那个被无知的偶像破坏者们掌握了政权的时代时，我总是惊恐欲绝。”以海涅看，一旦共产主义革命到来，一旦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他所喜欢的艺术品就会被破坏，他的诗歌集也会被毁灭。他说，“我预见了这一切，而我每想到了胜利的无产阶级用来威胁我诗歌的毁灭情形，我总要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悲伤，我的诗歌将随着整个古老的罗曼蒂克世界而沉沦了”。虽然海涅说他还是赞成共产主义的，他愿意旧世界崩溃，愿意这个纯洁沦丧、利欲嚣张、人剥削人的旧社会遭受彻底破坏，但他把无产阶级看成“无知”，他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恐惧，就不能算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宁可说，他对于无产阶级，对于共产主义革命，是一个无知者。他认识不到无产阶级革命，一方面将破坏旧社会剥削阶级所流传的腐败思想，腐败文化，腐败风俗，腐败习惯，另一方面还将保留历代人民所创造的文化的精华，而且必将创造出为过去一切时代都望尘莫及的极其辉煌灿烂的文化。

在座的同志们大概都不是文学家，不担心有什么诗歌集会被毁灭，可是，冒昧地说，算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有些同志所担心的，或许比海涅更糟糕些。有的担心会丢掉乌纱帽，有的担心会丢掉“尊严”，……等等。为了这种担心，有些同志就同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抵触起来了，就同革命群众抵触起来了，就煞费苦心，搬出各种手段，不论硬的或软的，都用来对付革命群众了。有的甚至动员一些不明白真相的工人农民和机关干部，分化一时弄不清是非的学生，标榜多数群众拥护自己，标榜自己主持的机关是什么“无产阶级司令部”，谁要触动他，就要整谁，以至打成“反革命”，也在所不惜。他们说，这不过是辩论而已，不能说是围攻。……

有的同志提出，辩论和围攻的界限究竟是什么？什么是辩论，什么是围攻？其实，只要我们的屁股坐在革命群众一边，真正钻到群众中去，这个问题是很容易懂得的。如果站在革命群众的对立面，尽在怎样对付革命群众的问题上打主意，那末，谁也不能代替他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对待串连问题，也是对待群众，对待革命的态度问题。

让革命学生互相串连，这是让学生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方式之一。他们在串连的革命大熔炉里，受到各种锻炼，在串连中去辨别大是大非，在串连中去熟悉社会，熟悉群众，熟悉阶级斗争，其意义是很深远的。这种串连，将使全国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得以互相交流，把全国文化大革命打成一片，同时，可以使人们识别谁是真革命，谁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谁是真正的毛主席的学生，还可使人们识别什么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而不是相反。串连就是学生们的最大的、最好的学校。

可以提倡串连的学生步行，让他们到全国各地去，演习长征。毛主席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从大连步行来京的学生，就是根据毛主席这个思想做的。这样的人就可能成为有用的人。像那种只从家门到校门，随后就到机关门，这样的人，难道就能够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吗？

有人说，全国串连妨碍生产。但活生生的事实证明：我们今年的工农业生产大好，工业以很高的速度上升，粮食棉花也比去年增产。现在中央提议，串连的学生，在自愿和可能的条件下不坐火车、汽车和轮船。一定会有很多的学生这样做。这么一来，工农业产品的交通运输，不就更好处理了吗？

大串连、红卫兵，这些都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大家都说要当毛主席的学生。请看看，请想想，我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是怎样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吧。

大串连，这一直是毛主席极力支持的，并且主张把这种群众的革命行动大大推广。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这里不多说。

红卫兵，刚刚露苗并且还遭到摧残的时候，是谁起来支持红卫兵呢？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伟大统帅毛主席。在八月一日，他就向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信，说，“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几个月短短时间，在毛主席高瞻远瞩的支持下，一小批的红卫兵竟然在全国发展为惊天动地的广大青少年的革命队伍。一切牛鬼蛇神看到他们，就发抖起来。有些怕群众，怕革命的人，也惶惶不安，他们心里想，最好是取缔，至少也要纳群众运动于他们安排的所谓“正轨”。

红卫兵已经为无产阶级革命做了许多好事，还提出了许多好创议。对于红卫兵的创议，大家都应该重视，认真研究，把能够做的，付之实施。

各地红卫兵的战果，必须开展览会，以便充分暴露那些公开的和暗藏的牛鬼蛇神，用事实来证明革命造反有理，来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后代。

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讯社，在观察了我们的红卫兵运动以后，曾经断论：

“红卫兵到现在，约有两个月的历史，但是它已经成为七亿五千万中国人政治生活中永久性的固定组织。

他们大概会影响中国人未来的政治生产与个人生活。”

这家通讯社还说：

如果西方世界或是现代修正主义集团认为这种“狂热”只是“流氓行为或是短暂的热情”，这“不仅是愚蠢的，也是十分危险的”。

敌人的观察，实际上比我们一些不懂事的同志还要清楚得多。这点值得我们同志好好地想一想。

本来是我们祖国自己的事。为什么敌视我们的那些外国人，会认为是"十分危险的"呢？十分明白，现在已经不是所谓什么"锁国"的时代了。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声气，总是相通的。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正在波及全世界，激动各国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同样，十分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使我国人民的思想更迅速、更高度地革命化、不论什么地方，什么单位，只要认真地而不是马虎地，严肃地而不是草率地，抓好文化大革命，就必然大大促进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大大促进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新飞跃，使我国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世界的先进水平，能够更有力地支持世界各国的革命斗争。

那些敌视我们的世界反动力量，感到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对他们"十分危险"，道理就是这样。

敌人害怕的事，我们就要努力去做。我们各地区各部门的同志，广大工农群众，广大青少年，都必须掌握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注意"决定"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一面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一面坚守生产和建设的岗位，努力尽自己的最大革命义务。

（四）坚持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团结大多数

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毛主席说，革命"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

毛主席说，革命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

这些是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的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在各个革命时期，革命的性质和对象有变化，但是毛主席提出的这个阶级路线和斗争策略的一般原则，在各个时期都是适用的。在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同样适用。

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坚持毛主席提出的这种阶级路线，善于发展和壮大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即真正的左派队伍，没有括弧的左派队伍，同时，要争取那许多动摇不定、可东可西、可左可右的人，团结大多数，彻底孤立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揭露那些顽固抵抗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一心玩弄权术的两面派。

最近一个时期，有人企图用宗派主义代替党的阶级路线。他们把无产阶级的革命原则抛到九霄云外，完全不理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不同政治立场，也完全不理会各种派别都是带有政治性的，阶级性的，都是代表这种或那种社会思潮的。他们用血统论来代替阶级论，企图混淆阶级阵线，孤立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

各地流行着一种所谓"自来红"的谬论。制造这种谬论的人，就是过去用各种手段打击、排斥工农子女的人。他们利用工农出身青少年的阶级感情，利用一部分年轻人天真提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来蛊惑一批学生。实际上，这是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封建地主阶级宣扬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这样的血统论。这是彻头彻尾反马克

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根本对立的。

在我们革命队伍里，毛主席和我们党从来都是特别重视人们的阶级成分、阶级出身的。同时，也反对“唯成分论”。

青少年都必须在阶级斗争中长期考验自己，证明自己的世界观是属于那个阶级的，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还是属于无产阶级的。正如毛主席说，“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人们的思想，不是先天生来的，而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在社会阶级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或者是反映这一个阶级，或者是反映那一个阶级。

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我们党领导人民大众建立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的目的，是要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科学地揭露了阶级社会的秘密，特别是揭露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激烈对抗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毛泽东选集第一篇文章的题目，即《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的结论是：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我国革命胜利之后，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国际国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学说，这一个学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具有极深远意义的新发展。毛泽东同志这一学说教育全党、教育群众，时时刻刻要保持无产阶级的高度警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千万要防备修正主义者篡党、篡军、篡政的各种阴谋诡计，防备国家变色。很明白，在阶级问题上，我们一点都不含糊，都不能含糊。我们是坚定的历史唯物论者。我们的观点，同那些唯心的血统论者毫无共同之处。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认为，工人阶级按自己的社会地位说来，是最革命的，最容易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担负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使命。但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不是工人运动自发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他们创立的思想，都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他们总结了人类历史上创造的先进思想的成果，特别是总结了国际工人阶级斗争各个时期的全部经验，因而创立了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引导工人阶级不断前进。

有些工人出身的，并不一定能够代表工人阶级。因为他们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接受资产阶级的贿赂。比如，英国工党和各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些领导人，曾经是工人，但后来却变成工贼，他们的政党成为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现代修正主义者，在苏联和其他各国，也有一批是工人出身或者干部子女。

现在有一些学生接受什么“自来红”、“自来黑”的观点，接受什么要在学生中划分“红五类”、“非红五类”或者什么“黑几类”的观点。制造这类观点的人，是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制造混乱，蒙蔽青年。我们劝青年们不要接受这种血统论的错误观点，而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论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同时，那些制造和散布这种血统论的人，如果愿意回到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上，就应该改正错误，停止散布这种谬论。

实际上，这种血统论者是否认自己需要在革命前进中不断接受改造，否认别人在群众革命运动中能够改造自己。换句话说，他们自己不愿意革命，也不准别人革命。

不重视阶级成分，阶级出身，是很错误的。唯成分论，不重视政治表现，也是很错误的。这些错误观点，必须批判。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看来，离开阶级分析，来看所谓多数或少数，也是完全错误的。在十月革命前夜，布尔塞维克在苏维埃中曾经是少数，而孟塞维克和社会革命党

是多数，但布尔塞维克的伟大领袖列宁恰恰是代表革命的无产阶级，代表俄国人民的大多数，代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而孟塞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恰恰是代表反革命，代表一小撮的剥削阶级，他们的多数是暂时的，虚假的。

我们党的历史也同样说明了这种情况。我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以前，在党中央曾经处于少数的地位，但恰恰是代表革命的无产阶级，代表中国人民的大多数，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那些反对毛主席路线的代表人物，虽然曾经在党中央拥有暂时的、表面上的多数，但终于一个个地失败了，垮台了，被群众抛弃了。

不做阶级分析，自称处在“超然”地位，不分左中右，既不支持这边，也不支持那边，不偏不倚，公公正正。但是，形势逼人，非此即彼，总有一偏，不偏无产阶级，即偏资产阶级，不偏左派，即偏右派。所谓不偏不倚，也是表面的，虚假的。

无产阶级是历史上代表最大多数人利益的最伟大的阶级。毛主席在八月一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上指出：

“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

接着，毛主席又指出：

“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主席指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路线，要我们注意防止宗派主义，即关门主义。他把关门主义的策略，叫做孤家寡人的策略，叫做依靠单兵独马的策略。而无产阶级的策略相反，是“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

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要遵循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坚持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和斗争策略，发展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孤立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样，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队伍，就将浩浩荡荡地前进，冲破一个一个的阻碍，夺得一个一个的胜利。

“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没有疑义，在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必将取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些腐败东西而代之。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必将扫除一切牛鬼蛇神。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

红卫兵不怕远征难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人民日报》社论

大连海运学院，有十五个革命学生，组成了"长征红卫队"，以红军为榜样，跋山涉水，历时一个月，行程两千里，从大连步行到了北京。

大串连，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一直是极力支持大串连的，并且主张把这种革命行动大大推广。

全国大专学校的学生，中学的一部分学生，到首都来串连，各地的学生互相串连，这是学生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方式之一。学生们在串连的革命大学校中，可以熟悉社会，熟悉群众，熟悉阶级斗争，经受大风大浪，得到种种锻炼。

大连海远学院的革命学生，不坐火车汽车，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连，这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我们衷心祝贺这些革命学生长征演习的胜利，并且希望各地的革命学生，在自愿和可能的条件下，也这样做。

毛主席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从大连步行到北京的学生，根据毛主席的教导，边行军，边学习，边宣传，边做群众工作。他们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宣传党中央的十六条，把毛泽东思想的种子传播到沿途的城市和乡村。群众称赞他们是"毛主席的忠实红小兵"，"老红军、老八路的红后代"，"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队"。

这些步行来京的学生，象解放军那样，坚决遵守毛主席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向群众学习，为群众做好事。他们每到一地，就访问老工人和贫下中农，听革命前辈讲述斗争史，翻身史。他们不顾旅途的疲劳，为群众担水，扫地，干零活，参加秋收，真正和群众打成一片。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一定要经过艰难困苦的磨炼。他们决不能做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风吹雨打；而要做高山上的劲松，勇于迎接暴风雨的挑战。大连步行来京的学生深有体会地说：我们虽然离开了明亮的教室，舒适的床位和优越的生活条件，抛开了方便的交通工具，但是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大锻炼，大提高。

事实正是这样，不打算艰苦奋斗的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谁想要"舒舒服服地干革命"，谁就可能"舒舒服服地和平演变"，滑到修正主义的泥坑中去。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也是最艰巨的事业。任重而道远。我们青年一代，一定要永远忠实于毛主席，忠实于毛泽东思想，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把"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革命传统，继承下来，千秋万代地传下去。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林　彪

我主要讲两个问题，一个是文化革命的必要性，一个是文化革命应该怎么搞法。也就是说，要不要搞文化革命，怎么样搞文化革命。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互相联系的，我着重讲文化革命的必要性。

这个会开了十七天了，开得很好。这个会从头到尾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这个会实际上是十一中全会的继续，是进一步搞清楚两条路线的问题。

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是两头的劲很大，中间就有一点劲头不足，中间甚至还有一点顶牛，局势一度有些紧张。毛主席看到这个形势以后，提议把大家找来谈谈。原来是准备搞三天，以后搞七天，现在搞两个多星期。越开，情况也就越清楚，思想也就越清楚，就更能够掌握毛主席的路线，把这条路线坚持下去。所以，这是很必要的一个会。

两头的劲头大，一头是毛主席的领导，一头是群众。

广大群众轰轰烈烈，从学校到社会，从文化的领域影响到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各方面，收获很大，尤其是政治上的收获，党内揪出了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上搞臭了很多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还挖出了很多潜藏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破获了很多反革命案件，搞出了很多武器，电台，黄金，等等。但是，最主要的是在思想上，确实是触及了人们的灵魂。大破旧思想，大立新思想，这是一个深刻的大革命，社会面貌，人的精神面貌都有很大的变化。毛主席的思想在这次运动中得到很大的宣传，很大的普及，深入人心，对整个社会的教育，对青少年的教育，都是很大的，经过这次运动，不少青少年可能培养成为革命的可靠的接班人。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社会生产，并没有如某些同志所担心的，要受破坏。恰恰相反，生产还是增加。按理，文化革命是应该促进生产的，而且在事实上已经得到证明。

这个运动在世界上树立了史无前例的榜样。对于反对修正主义，中国这种做法很有示范的作用。

上头是毛主席。大家看得很清楚，这个运动从头到尾是主席发动的，主席领导的。毛主席以很大的魄力，很大的决心，来干这件事，发动很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干这件事。一个普通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可能有这样的魄力，不可能有这样大的决心。只有毛主席这样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有极其丰富的斗争经验，有极其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智慧，才敢于发动这样轰轰烈烈的、震动全国和全世界的革命群众运动。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一些同志也很得力，一直是拥护毛主席的路线，执行这个路线的。

刚才说了中间有一些顶牛，这就是五月十六日中央"通知"上说的，"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一直到这次会议以前，我看还是这样的情况。但是，程度有差别，有的地方重一些，有的地方轻一些；有的地方改得快一些，有的地方改得慢一些。有一些是主观上的抵抗性，但是大多数不是，大多数是认识问

题，不够理解的问题。最近这两天，大家才明确，各地的这种情况是有两个方面原因的。一方面固然是本地的原因，思想上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中央有几个领导人，就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刘邓路线，就是毛主席大字报说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经过这几天，同志们已经比较清楚地知道了这个来源。

思想，社会意识，世界观，风俗习惯，政治观点，法律观点，艺术观点，艺术中间的电影、戏剧、造型艺术、文学，以及教育制度，等等，概括起来叫做文化。我们为什么要搞这个文化革命呢？要搞这个社会意识领域里面的革命呢？决定的因素，就是因为我们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思想是从那里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贯认为，思想是从物质来的。社会意识是从社会的存在来的，从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的占有制度来的。全国解放以来，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我国社会的占有制根本变化了。原来是地主的田地，我们没收到农民手上，以后又转到集体化。这是农业所有制经过的两个变化：地主所有制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又变为农民集体所有制。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经济种种的过渡阶段，变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现在要准备取消定息。经济基础既然发生了变化，我们的社会意识形态这个上层建筑，一定要跟着变化，一定要赶上去。如果我们不赶上去的话，就妨碍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巩固，就会使我们进步缓慢，就会使新的社会生产力不能得到发展，就会使革命既得的成果不能巩固，就会走到资本主义复辟，就会使保护社会公有制的人民民主政权遭到颠覆，就会使社会主义公有制度被推翻，就会走到修正主义统治中国，使中国退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所以，搞不搞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关系无产阶级政权能不能巩固、革命成果能不能发展的重大政治问题，是一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政治问题。

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进行的阶级斗争，有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政治，一个方面是经济，一个方面是意识形态。

透过军事战争，推翻一个政权，这是暴力的行动。我们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四年的时间（当然以前还有很多年），就把国民党打垮了，我们取得了胜利，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至于搞两种所有制的革命，即推翻封建所有制、资产阶级所有制的革命，时间就短些。可是，另外一个战线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更曲折的斗争，这就是思想领域里面的斗争。这要比取得政权需要的时间更长，比搞所有制的变化需要的时间更长。苏联的革命胜利到明年就是五十周年，你看它的资产阶级思想肃清了多少？无产阶级的思想增长了多少？五十年来的一个结果，斯大林死了以后，不是前进而是倒退了，走向修正主义，走向资产阶级采取新的形式来复辟，走向资本主义制度用一种新的形式在不同的程度上表现出来。南斯拉夫是第一个复辟的。除此之外，不单是苏联，还有若干"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胜利一、二十年，因为这一方面的斗争没有抓紧，放松了，因此革命停顿、倒退、复辟等等现象都发生了。如果我们不抓紧这一点的话，我们同样的要发生象苏联那样，南斯拉夫那样的情况。苏联搞了近五十年，今天修正主义上台统治。我们如果不始终一贯地来抓文化革命，也会产生这个结果，所以毛主席提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是把文化革命当作国家大事，当作政治。毛主席在今年三月间，修改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同意写上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重申了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这种经典的观点，把它当成国家大事，当成政治问题。如果我们不抓紧文化革命，不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那我们中途也要变颜色。

我们平常抓经济建设是抓得紧的，这是好的。但是，对于文化上的破和立，思想领域上的破和立，不是所有的同志都象我们毛主席这样抓得紧，这样的重视。有人还觉得是一个额外负担，他觉得不是好好的吗，为什么又要搞文化革命？其实，我们取得了政权以后，一方面，固然要搞经济建设，但是另一方面从长远意义来看，更重要的是要搞思想建设。思想，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有巨大的能动作用。旧的思想，是为旧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反映了反动阶级的要求，对社会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新的思想，是为新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反映了先进阶级的要求，对社会的发展起促进、加速的作用。先进思想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变成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的物质力量。所以我们必须大破（不是小破，也不是中破）旧思想，大立新思想。代表新思想的，代表人民的思想的，代表无产阶级思想的，代表共产主义思想的，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足以对抗旧思想的，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应该大立这一个思想。这一点也是很多同志没有抓紧的。大破的方面没有很好地抓。大立的方面也没有很好地抓。在中央工作的刘、邓对毛主席思想的传播所采取的态度，这几天大家都知道了。过去宣传部陆定一所采取的态度，大家是知道的，那简直是令人愤慨和不能容忍的。

我们在夺取政权以后，就国内任务来说，除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和搞经济建设以外，就是要搞文化建设，文化方面的破和立。不单我们如此，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是这么干的。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统治阶级，它是不许可同它相反的阶级立场的思想传播的，它一定要坚持它的思想，以便巩固它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历史上，每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尽管以代表全社会的面貌出现，但是，实际上是代表那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利益的。每一个时代的统治阶级的思想都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劳动人民的思想，在过去那些时代，不能占统治地位。而劳动人民大部分是长期被愚弄的，被欺骗的。我们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根据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说，要同旧的所有制实行彻底的决裂，要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我们有权力、有必要来建立我们无产阶级在思想上的统治。

现在我们在政治上取得统治地位，在经济上取得统治地位，但是在思想上还没有完全取得统治地位。我们在经济上推翻了旧的阶级，在政治上推翻了旧的阶级，可是在思想的领域，旧阶级的东西还是很占势力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在这条战线上坚持不懈地、进行到底地来开展这个斗争。斯大林搞了几十年，并没有解决这个斗争问题。毛主席及时提出了这个问题，要我们来解决，是我们的幸运，也是极其光荣而伟大的任务。

看来远远不是几十年，恐怕是百把年或者是几百年，才能够肃清旧的思想。当然，旧的事物和新的事物的对立在将来的社会也是存在的，二百年、三百年、四百年，一千年，一万年，它总有新旧对立的，这样，就必然还有一个思想领域里面的斗争，总有新的要反对旧的，也总有旧的要保存，不让，不肯退出历史舞台。那个情况，同今天我们进行的这种阶级斗争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但是有共同点：新的要战胜旧的。

相信将来还有思想上的矛盾，思想上的斗争。所以，这个文化方面、思想领域的斗争是长期的斗争，不是一个简单的容易的事情。

我们斗争的方式有的时候是采取报刊批判的方式，例如以前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适、胡风的反动思想的批判，对杨献珍的批判，以及对吴晗、邓拓、翦伯赞、周扬等的批判，等等，这些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运动，有很深刻的意义。可是发展

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就要有像五个月以来的这种轰轰烈烈的，全社会都动起来的大扫荡，大破除。这种运动，这种大战役，搞他半年或者一年，打下一个坚固的基础。这种运动的作用决不是那种报刊上的批判可以代替的，这有它的特大的作用，有它的特大的威力。这次运动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但是，大战役和小战役可能是交替进行的。

旧文化、旧思想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用很多不同的语言来表达，叫旧文化，旧思想，毒草，牛鬼蛇神，反动权威，旧学术，旧道德，旧艺术，旧法律，旧教育制度，旧世界观等等，这些东西，最本质的旧，就是旧在一点上，旧在一个私有制上。概括来说，旧在一个字上，旧在“私”字上。那个新东西，新思想，又新在哪一点上？概括来说，新在一个“公”字上。

人类社会没有文字的历史，那是很长了，至少是五十万年。地球的形成有六十亿年，这是科学家的一种说法。可是在人类有文化的期间，这几千年，都是阶级社会，奴隶制度社会，封建制度社会，资本主义制度社会。这些社会的共同点是什么？都是私有制。私有制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各式各样的剥削阶级的思想，可以分成十样八样二十样，但统统都是为私有制来辩护的。

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社会，土地也好，工厂也好，生产资料统统归公。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巩固这个制度，那就必须要破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旧文化，破除用各种各样形式所表现出来的维护私有制、恢复私有制的旧意识形态。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和影响，最后势必要恢复维护私有制的旧政权。反对破除旧文化旧意识形态的那些人，一定要压制革命，压制群众。我们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经济上的制度，政治上的制度，就必须提倡为公的观念，就是要塑造新的人来建设新的社会，塑造共产主义精神的人。什么样是共产主义精神的人？就是我们毛主席所提倡的张思德、白求恩、刘胡兰、雷锋，还有像欧阳海、焦裕禄、王杰、刘英俊等等，这就是共产主义的人，新型的人。我们新的社会需要这种人来创造，我们要渐渐地把社会上的人改造成这样的人。

什么叫做共产主义呢？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共产主义就是为公，共产主义可以叫做“公”产主义，是为公的。我们所要培养的人，就是毛主席所说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是有道德的人。我们就是要培养这种有新道德的人，要培养这种人。这种人是毛主席所说的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完全彻底为人民的。这样一种人就是共产主义的人。相反的就是为“私”，只顾个人的名利，争名、争利、争权、争位，争出风头等等，处处是想自己而忘记了群众，忘记了劳动人民。总之，只记得自己。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都属于一定的阶级。或属于这个阶级，属于这个阶级的某一阶层，某一集团；或属于那个阶级，属于那个阶级的某一阶层，某一集团。什么抽象的、独立的个人，是没有的。只记得自己，纯粹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是损人利己。他们为了自己发财，自己得利，而不惜让千百万人破家荡产。从为自己、为私的观点出发来看世界，就是从资产阶级的观点上来看世界，而不是从无产阶级的观点上来看世界。

我们就是需要培养为公的人。为公也有不同的阶级性。我们所说的公，是人民的公，无产阶级的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公。从我们党创立以来，就有很多这种为公的人，现在更多了。在毛主席思想进一步深入普及的情况下，这种人就更多了。工农兵和知识青年大学毛主席著作以来，好人好事出的真多。

建设我们的国家有两条战线，一条就是象苏联那样片面地只注意搞物质，搞机器，搞机械化，还搞什么物质刺激。另一条就是毛主席领导我们走的这条路线。

毛主席领导我们创造了一个新型的国家，这个国家除搞机械化以外，更重要的是搞革命

化，用革命化来领导机械化。机器和人比较起来，那当然人是重要的。毛主席说世界上第一可宝贵的是人。在军事上，武器是重要的，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机器只有通过人才能变成生产力。孤立的机器只是一堆铁。机器是人所创造的，为人所使用的。离开了人，就没有机器，有了机器，也不能起作用。机器是一种可能生产力，而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必须通过人，必须通过人同机器的结合，才能够变为现实的生产力。

机器无非是一个人工的器官。同动物不同，我们的手是我们解放的一个"工具"。现在各种各式的机器，实际上是代替我们生产的各种器官，代替我们的手，帮助我们的手，加强我们的手。所以，各种机器统统是为了加强我们的器官的。实际上都是加强人的能力，是以人为中心的。忽视人就是忽视了最伟大的生产力，在政治上就是忽视了干革命的力量，闹革命的力量。

我们同修正主义领导的国家不同。他们片面地搞机械化；我们搞革命化，也搞机械化，我们用革命化来领导机械化。毛主席很早就提出解放军要革命化和现代化。可见他不只提一个化，他是提的两个化。解放军如此，我们全国也应该如此。就是一方面要搞机械化，一方面要搞革命化，而且应该以革命化来领导机械化。

问题是这样摆着，把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放在什么地位，有没有必要搞？是额外负担呢，还是我们份内的事？如果是我们份内的事，我们不搞它，那我们就是失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有三大任务，即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思想建设，我们过去着重进行前两大建设，还有一大建设，即思想建设，即文化革命，没有全面展开。要知道，如果文化革命，思想建设，没有好好展开，那两大建设所取得的成果也会被推翻。所以，我们一定要象毛主席那样大力地搞文化革命。毛主席的理论，就在他的著作中间，他的书给我们提供了必须学习的基础，还有大量的不上书的毛主席著作，同样是我们必须学习的。毛主席怎么做，我们就应该怎么做。毛主席无论是在实践经验方面，在马列主义的理论方面，个人的天分方面，那一方面都是不但比我们强，而且在世界上，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要用毛主席的榜样来衡量我们自己。我们应该紧跟上去，应该仿效、应该学习。我们应该把毛主席提出的文化大革命放在很重要的地位。作为国家大事，作为政治问题，作为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部分，一个重要战线。这样子才是相称的。

由于文化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这样，两条路线的问题就必然产生。关于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大家这两天都清楚了。一条是以刘、邓为代表的路线，是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另一条路线呢，就是毛主席的敢字当头的路线，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路线，也就是党的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个是群众路线，一个是反群众路线。这就是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的对立。在一个短时期内，刘、邓的这条路线是取得了一个差不多统治的地位，全国照他们的这条路线执行嘛。可是，归根结底，毛主席的路线总是要胜利的，因为它是真理。

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句话是很经典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最概括的最精华的语言。历史唯物论主要地是说明人民群众历史的向前发展，是活的生产力的向前发展，这样才有社会革命，才能引起所有制的变化，才能引起生产的变化。所以，群众是各个历史时期进步的动力，最基本的力量，贯彻始终的力量。群众人多力量大。人多智慧多。你提一点，他说一点，许多人想的办法就多，智慧就多，就可以有创造。

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尽管群众中有个别的部分、个别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是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适合社会的发展的，总是合理的。因此，我们应该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创造性。这次运动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规定多少章程。毛主席一再说的红卫兵，不是我们规定的，是群众创造的，随后就变成全国性的了。很多东西都是群众搞起来的。我们先当群众的学生，向他们学习，集中他们的意见，然后再来推广，再当先生。先从群众中来，再贯彻到群众中去，这就是毛主席一贯的思想，一贯的做法。

这一代青年，是我们革命胜利十七年教养出来的孩子。他们现在二十岁左右。他们大多数思想很敏感，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在正确革命路线的领导下，比较容易接受新的世界观，无产阶级世界观。我们在文化革命中间，应该信任这批青年群众，他们这批闯将，小闯将。这种闯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我们想不到的事，很多“老大难”的问题，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一闯，情况就清楚了，决心就好下了。

现在，我们还有不少同志，怕学生，怕群众。怕得很多，伯达同志列举了，我就不重复了。

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里面就说，许多单位的负责人怕出乱子。好多人的确是怕出乱子。其实，这个乱子是乱敌人，而不是乱我们。有的时候，自己也给自己造成一点小乱。

乱子有两重性。这是毛主席早就讲过的。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不要只看到坏的一面，看不到好的一面。还有坏的方面可以向好的方面转化。

总的方面不可能出大乱子。我们的军队很巩固，我们的生产在上升，一些学生，青年，他们闹文化革命，能出得了什么乱子？是不可能出大乱子的。这就是我们对于乱子这个问题的看法，这就是我们的“乱子观”。

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总有点或多或少的偏差。可是呢，主流是好的，是不该怕的。你们现在如果怕出这点小乱子，将来要出大乱子，牛鬼蛇神将来要造无产阶级的反，造我们的反。这次我要谢富治同志搞了一个说明红卫兵战果的材料，我还派过人去参观。事实上人家就是准备造我们的反。那些人的确把变天账都准备好了。有人对旧的地契简直是当成命根子，破了的时候，拿个纸补一补，快坏了的时候，拿照相机把它照下来，保存起来。他们要这些东西干什么？藏得那么秘密，无非是妄想等到国民党来的时候，帝国主义来的时候，那个房子是他的，那个地是他的。他们就是妄想变天。剥削阶级虽然打倒了，但这些人还活着，他们头脑里的思想是很反动的，对人民是很仇恨的。我们党内也有想变天的人。彭、罗、陆、杨，这些家伙就是妄想变天的，就是妄想搞反革命政变的。我们不搞这个文化革命，我们不去搞他们，他们就要搞我们，进攻我们。现在有不少流言蜚语，反动传单，反动的匿名信，很仇恨革命。这些都是妄想要变天。一旦有时机，那些坏家伙就要出来闹事的，就会起哄，就会造人民的反，有的家伙就会拿“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发号施令来篡夺政权，来改变我们的社会制度。他们事实上在进攻我们，所以，我们不搞、不进攻他们，是不行的。我们不给他们打击，他们就要给我们打击。所以说蕴藏着、潜伏着很大的危险。苏联搞了四十多年，出了个赫鲁晓夫，全国就变色了。

我们应该不要怕出点乱子，应该敢字当头，而不要怕字当头。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我们就要犯政治上的大错误。不信任群众就是大错误。刘、邓这条路线就是不相信群众，同时不相信毛主席。不相信群众，而是只相信他们自己，只相信和他们思想相同的一些人；只相信资产阶级世界观，只相信资产阶级路线。

毛主席不是提出了一个问题，叫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晚节吗？保持晚节没有别的办法，一个就是相信毛主席，一个就是相信群众，一个就是正确地对待自己。就这三条。实质上就是遵照毛主席所说的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毛主席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第一条就是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相信毛主席，相信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统一的东西，只有时代的区别，是更高级的更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主席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第二条是为人民服务，第三条是团结大多数，第四条是民主集中制，都是相信群众问题。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不要以为我们比他们高明，其实我们不过是资格老一些。真正讲智慧和品德，未见得赶得上一个雷锋，未见得赶得上一个张思德，未见得赶得上这些同志。所以，许多同志地位虽然高，资格虽然老，但不等于思想就比人家高，不等于才能比人家高。群众中间的智慧可以说是真正的多。你不要小看二十多岁的学生。我接触过一些人，他们很有头脑，能够说出我们几十岁、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的人说不出来的话。

毛主席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第五条，就是正确地对待自己的问题。对自己应该怎么看法呢？应该一分为二。可能有些长处，但是一定有缺点。对自己的长处，要充分发挥，来为革命尽力。对自己的缺点，要不断地进行斗争，来适合革命的需要。我们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同时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革命，也得革自己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个革命是搞不好的。一定要先让自己跳出自己的范围，不要只看到自己。只看到自己，这是一种局限性。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定要超出这种局限性。我是那一个山头的，我就只顾那一个山头，不顾其他的，这也是一种局限性。我们一部分同志只想自己一个小单位，而丢掉了七亿人口和几十亿人口不想，这也是一种局限性。我们也不要局限于现在地位高一些，就觉得要特殊。应该从“我”字中间解放出来。从这一个局限性里面、小单位里面解放出来，顾大单位，顾全体。毛主席讲，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本阶级，而且要解放全人类。不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本身也不能最后解放。所以，一定要努力打破种种局限性。

关于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晚节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要实行毛主席所规定的接班人那五条，简单地概括就是要相信毛主席，要相信群众，和正确对待自己。

毛主席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现在就是这样，我们就是要相信毛主席，相信群众，不然我们什么事情也办不好。保持晚节，的确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严重的问题，不见得能保持。有的人革命革了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有的人年纪到了五十、六十、七十甚至八十岁，是不是能够最后保持晚节，实在是一个问题。很多人就在最后几年没有搞好，滑下去了，不能保持晚节。我们自己应该好好地兢兢业业地来保证这个晚节，为后代树立榜样。如果是不相信毛主席，不相信群众，过分相信自己，那么就不能保持晚节。

这一次文化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但是许多地方是执行的。同志们很关心这个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应该区别对待。发起的和执行的，这是不同的。这就有轻也有重。总的估计是，大部分同志是不自觉的，并不是有意抵抗毛主席的路线。大多数是一个认识的问题，而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个我们都知道。现在的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市委书记，是老好人的多。个别的坏的也有，多数是好的。你们当然也有你们的责任。各个地区执行错误路线的程度不同，也有你们的不同责任。但是，各人的问题，我们要恰如其分地来看待，是多少就是多少，不要扩大也不要缩小。许多人常常有一个习惯，就是不注意量变会引起质变，把不同的量当成相同的量，把不同的质当成相同的质。

比如说水，在零度结冰，零度以上成水，一百度以上变成气。它就是因为温度不同，变成不同的东西。所以，我们对于各级干部要分别对待，不要笼统地对待。情节有轻有重，但是总的方面还是属于认识问题的多。只有少数一小撮，那是抵抗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

我们的同志只要努力掌握毛泽东思想，学会党中央的政策，相信群众，正确地对待自己，在工作中间发生的偏差和错误，就可以改正过来，就可以把工作做好，就可以心情舒畅地来做工作，就可以使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更好地、进一步地团结起来。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毛 泽 东

我讲几句，讲两件事。

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

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的问题，就做了改变。

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

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

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九、十月间说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有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在上海发表的。

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

我要说的再一件事，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

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

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并没有送出，但是他们已经知道了，传出去了。

文化革命运动时间还很短。六月、七月、八月、九月，现在十月，五个月不到。所以，同志们不那么理解。

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

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

上次会议，我说，会议的决定，有些人不一定执行。果然好多同志还不理解。经过两个月以后，碰了钉子，有了一些经验，这次会议就比较好了。

这次会议有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了。你们自己的思想有了变化。

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个时候还会有新的经验，还要总结。

我们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才胜利，开始谁也不知道怎么革法，包括我自己在内。从一九二一年起到一九四九年，二一、三一、四一到一九四九年，二十八年。我们自己也是逐步地在实践中间总结经验，找出道路来的。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社会主义革命也搞了十七年了。这个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们现在就那么理解了。

自从去年十一月批判吴晗开始，许多同志也没有看文章，也不大去管。京戏改革，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等等，更不用讲了。

过去，没有全盘抓起来。我说这个责任在我。谁让你没有系统地抓起来呀？个别的抓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问题不能解决。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以前几个月，去年十一月、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虽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间，五月十六，又发了一个"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们的话来讲，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那么，赶快总结经验吧。

为什么两个月以后，现在又来开这次工作会议呢？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林彪同志讲，要做政治思想工作。很对。你们回去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至少这四级要开一个十几天的会，真正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企图所有的干部统统弄得清楚，不可能，总有一些人不那么清楚，思想不通。

好几个同志对我讲，"原则上我是赞成的，到了具体问题上又糊涂了"。这种话我就不那么相信。原则上你又理解，具体问题又不得解决，是什么道理？现在我看，恐怕也有一点道理。不然为什么老这么讲？原则上是赞成的，碰到具体问题又处理不好，恐怕还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比如上次开会回去以后，就没有开好会，有些地方就根本没有开，有些地方开了，也不是那么充分，被红卫兵一冲就乱了。假如有十个书记，就要有七个或者八个去接见红卫兵，接见慢了要冲进来。学生们生了气，自己还不知道，又没有准备回答什么问题，以为表面上一应付，表示欢迎，就解决问题了。人家有一肚子气，几个问题一问，不能回答，就处于被动。这个被动也可以改变的，可以改变为主动的。

我对这次会议以后的情况，信心增加了。我就不讲上次会议讲过的话了，说这一次会等于不开，回去还是老章程，维持现状，跟红卫兵对立，跟一派红卫兵对立，利用另一派红卫兵保驾。这种状况，我看会改变，情况开始好转了。当然，不能过高要求。中央局、省、地、县这几级，还不讲县以下广大的干部，全部都那么快地就通了，不一定。总有一些人想不通，有一小部分，还是会要对立的。但是，我们相信大多数会讲得通的。

我讲这么两件事。一件事是历史，讲一线、二线的问题。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跟二十八年的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十七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比较起来，这个文化革命只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很多同志，过去尽搞经济工作，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或者做一些别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没有设想到搞这场文化大革命。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没有设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有两个红卫兵说，他们到全国跑了一趟，他们没有料到有些老前辈这么害怕红卫兵。他们说，红卫兵有什么可怕的？有一位同志，他家里有四个红卫兵，就是他的儿女，分成四派，还有他们的同学，有很多人到他家来，大概有十几个二十个吧！他接触了那么一点人。另外也有接触几十个人的，也有接触一、二百人的。我看小接触很有益处。大的接触，一百五十万人，我们一个钟头就搞完了。这也是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各有各的作用。

这一次会议的简报，差不多我全都看了。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过去中央第一线没有领导好。时间太短，对新问题没有精神准备，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所以，这一次又做了十七天。我看，以后会好一些。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维护铁路运输秩序的紧急通知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一日）

目前铁路运输秩序比较混乱，客货列车晚点现象严重，在车站不断发生围车、拦车和阻止列车开行，以及乘车纠纷等事件，因而严重地影响了铁路运输秩序。为保证革命师生、旅客和国家物资的正常运输，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

一、各省、市、自治区要认真按中共中央、国务院九月五日通知的精神，有计划地组织革命师生来京进行革命串连，适当控制来京人数。铁路要有计划地安排革命师生的输送工作。

二、目前来京串连的革命师生十分拥挤，而天气又日渐寒冷，为了不使北京接待工作过分困难，决定从十一月一日到五日，各地来京进行串连的革命师生暂缓来京，各线铁路局停开来京学生专列五天。

三、革命师生要遵守铁路规章制度，维护铁路运输秩序，要按照乘车证指定的区间乘车，严禁拦截和阻止列车运行。严禁强迫铁路延长列车运行区段，或改变列车运行方向。

四、在车站和列车上任何人都不准用各种借口妨碍铁路职工执行职务。革命师生要主动协助车站和列车搞好乘车秩序。

五、凡是革命师生专列都要派人民解放军随车值勤，协助维持乘车秩序，保证运输安全，并在列车上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十六条。铁路职工和铁路民警要在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坚守岗位，勇于负责，满腔热情地为革命师生运输服务。

六、铁路部门要迅速恢复正常运输秩序，保证客货运输畅通无阻。

此通知同样适用于轮船码头。

此通知可在车站和列车上张贴。

林彪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日）

同学们，同志们，红卫兵战士们：

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中，你们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的心情，来到北京，看望毛主席，同时，交流革命经验。我代表毛主席，代表党中央，向你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今天，毛主席非常高兴地接见你们。这是两个多月来，连国庆节在内，毛主席第六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毛主席是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总是同群众在一起，充分地信任群众，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全心全意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毛主席给全党同志，给青年一代，树立了最光辉的榜样。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很好！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一天比一天深入。整个社会面貌，人们的精神面貌，都有很大的变化。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更加普及，更加深入人心。在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下，文化大革命促进了人的思想革命化，推动了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最近发射导弹核武器的试验成功，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伟大胜利！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宣告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宣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两个多月来，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同广大群众见面，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展开了对错误路线的批判。毛主席号召大家关心国家大事，真正变成了广大群众的行动。这是极大的好事。这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重要保证。

毛主席的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是“敢”字当头的路线，是敢于相信群众，敢于依靠群众，敢于放手发动群众的路线。这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运用和新发展。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

资产阶级路线，是反对群众路线，是反对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是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而是指向革命群众，采取各种形式，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水火不相容的。只有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这条路线的影响，才能正确地、完全地、彻底地执行毛主席的路线。

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种大民主，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

串连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没有这种大民主，不可能发动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能实现人们灵魂深处的大革命，不可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不可能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保证我们国家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这种大民主，是毛泽东思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新形式，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新形式。这种大民主，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新贡献。

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证明，没有进行这样彻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实行这样的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削弱，就会变质，资本主义就要采用各种形式复辟，剥削阶级就会重新骑在人民的头上。

这样大民主，不但领导和群众之间必须彻底实行，而且，在群众中，在群众相互之间，也完全必须彻底实行。在群众之间，没有这样的大民主，不善于互相商量，不善于倾听不同的意见，不善于摆事实讲道理，不善于开动脑筋、思考问题，这样，就不可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就不可能达到发展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孤立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的目的，就不可能不折不扣地实行我们伟大导师——毛主席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

毛主席是支持同志们步行串连的。步行串连的好处，可以广泛地接触群众，接触社会的各个方面，更深入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可以更好地向工农学习，在更宽广的范围内，传播毛泽东思想。这样做，对于革命师生进一步领会毛泽东思想，领会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是大有好处的。当然，这种步行串连，必须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地进行。

党中央相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有了几个月的经验，今后将会更好地进行，取得更大的成就！

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前进！

毛主席的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在接见军队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下午于北京工人体育场）

陈毅的讲话（大意）

亲爱的同志们，同学们：

今天，我们军事院校的革命师生在这里集会，周总理和其他中央同志和同志们见面。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讲几句话。请同志们参考。

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指示。全国人民都要学习解放军。解放军是七亿人民的模范，这个军队是有高度政治觉悟、久经考验、战无不胜的部队，是有高度政策水平、革命化的部队，是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部队，是最能吃若耐劳、不怕苦、不怕死、不怕困难的部队。是对己和对敌狠的部队。这里讲的可能不完全，没准备。意思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模范。我每天接见许多外宾。他们都很称赞解放军。七亿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最主要的依靠人民解放军。我们有×百万军队，还可组织起一万万民兵。几千万红卫兵是解放军的后备队。其他单位可以乱。人民解放军不能乱。一定要有铁的纪律。随时准备，一声令下，开赴前线作战。我想强调一下这个意思。很重要。每个指挥员、战斗员都要注意。我们人民解放军要讲政策，有组织、有纪律。林彪同志指示要破"私"立"公"。要破掉"我"字，立"公"字。把人民的利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要"我"字当头，不要我怎么样，我怎么样，要党的利益、无产阶级的利益当头，个人利益可以牺牲，不能牺牲党的利益。今天我在这里讲话，就不是"我"字当头。如果"我"字当头，讲了别人就要到外交部把我揪出来。马上大字报就贴出来了。我不是"我"字当头，不是"怕"字当头，如果"怕"字当头就不讲。大家给我这个机会，我还是勇敢地来讲。

我们解放军是模范，不要跟他们去闹。去闹我是不赞成的。这话有些不好听，但是我要讲。闹我是不赞成的。我是完全欢迎作路线斗争的，十分必要，但是不要乱搞，不要作错误斗争。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会作路线斗争，我完全佩服他，他是我们的先生。林彪同志，林副主席。学习毛主席著作学得最好，也是最会路线斗争的一个，是我们的模范。你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作路线斗争，最好要学习毛主席和林彪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我讲这个话是有意思的，不是空口说白话。我是栽过大筋斗的。我作过路线斗争，犯过大错误，吃了不少苦头。我参加过支持正确路线的斗争，也参加过支持错误路线的斗争，反对过正确路线。我不是吓唬你们。参加路线斗争不是犯严重错误就是立大功。毛主席作路线斗争立下了伟大的功勋。林副主席紧跟着毛主席参加路线斗争也立下了很大的功勋。我们跟毛主席，有时跟得上，做对了，有时跟不上就做错了。想起过去错误地作路线斗争，心里就很沉痛。今天我是给亲爱的同志们说心里话。你们自己考虑一下，是不是做对了。你们百分之九十九作对了，也允许我讲一下，百分之一可能做错了。犯错误就是不注意这个百分之一而引起的。那天，在天安门上我和毛主席说过这件事。（我不是拿毛主席这块大招牌吓大家）。青年学生作路线斗争是好事，是不是会搞，是不是教他们一下。在运动中千条万条就是要学会搞路线斗争。这比原子弹爆炸威力还大。你们也许会说，陈老总。你是不是给我们泼冷水？我说，有时热过头了，泼冷水擦一擦有好处。

路线斗争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楚的，现在先提一个头。你们学习毛主席著作比我们熟，刚才读语录。我们老眼昏花，刚翻到你们就读完了。我犯的错误比你们多，讲路线斗争有这个资格。

搞路线斗争，第一要顾全大局。毛主席多年作路线斗争顾全大局，不考虑个人得失，不要考虑个人利益和小单位利益。作路线斗争，要顾中国革命大局，世界革命大局。为顾大局，可以牺牲局部。牺牲个人利益。那天，有的学生冲中南海，冲国防部，我是坚决不同意的。我们不怪大家，以前没讲清楚，是我们工作没作好。讲清楚了。希望今后不要发生这事。你那个单位再重要，能比中南海、国防部的安全更重要？不要夸大本单位的重要，把局部夸大。打解放军、打干部。都是解放军，解放军打解放军，我是没有见过。没有什么事比这更痛心的了。我是一九二七年参军，当解放军三十九年了，还没有见过解放军打解放军。

要顾大体，识大体。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不要冲进国防部，占领大楼，剪断电话线，……。你们有委屈可以申诉。你们在单位受打击，到中南海、国防部告诉，毛主席同意这样做，林彪同志支持，但不能直接行动，可住招待所。派代表到中南海、国防部等待得到答复。

我学毛泽东思想学得不好，很惭愧。在江西苏区，毛主席受到的打击很厉害。从领导岗位上拿下来了。我亲眼所见。毛主席就沉得住气。识大体顾大局。有时讲话，有时不讲话。今天球场上贴大标语，有多大冤枉？你们的冤枉有毛主席的大？我们要学习毛主席和林彪同志，要有很好的修养，该讲就讲，不该讲的就不讲，等时机成熟再讲。

作路线斗争不要图报复，你斗我四十八天，我非要斗你四十九天。你骂我十句，我非骂你十一句。这个不行。什么"罪魁祸首"、"滔天罪行"、"刽子手"，"没有什么意思。当然受了委屈要讲清楚，不要搞折衷，当然温良恭俭让不好。在清楚之后，要团结起来，帮助同志，不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采用对待敌人的态度。这就是用毛主席思想帮助我们作路线斗争。今天中央委员会有很多人反对过毛主席，但毛主席还是和他们合作。这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胸怀。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说的是肚量大。毛主席的肚量比海大。作路线斗争要识大体顾大局，要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斗争中，我不赞成现在的逐步升级。不是口号提得愈高愈好。"工作组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反革命"，这就是错误的，就是逐步升级。搞校党委不过瘾，还要搞部长，现在还要搞副总理。要有多少是多少，实事求是。作路线斗争要有一定限度，有好大错误，作好大估计，不要一味扩大。本来不错，超过界限就要犯错误。工作组犯了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应该进行批判。但调转过来。我们不能用工作组的办法来对待工作组。用错误的办法来对待工作组。这样越搞错误越大。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批判错误路线，只有正确的方法才能把错误纠正。我看过一些单位的材料，我没有资格批判任何一个同志。但是我根据几十年斗争经验，有资格讲一讲我以前犯过的错误。我犯过右的错误。也犯过折衷主义错误，也犯过"左"的错误，也正确地进行过路线斗争。犯过右倾错误的心情我体会得到，犯折衷主义错误的心情我也体会得到，犯"左"倾错误的心情我也体会得到，进行正确的路线斗争的心情也体会得到。这四种经验都有。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全国人民的模范。我们人民解放军要善于斗争。希望在文化大革命中要做路线斗争的模范。请同志们作路线斗争时，好好地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很好地体会这个伟大的指示，再去进行路线斗争。我讲得不好，请大家考虑。

贺龙的讲话（大意）

同志们、同学们：

你们好！这次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几个月来，已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宣告破产。整个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一片大好形势。我军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和他的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领导下，也是一片大好形势，取得了重大胜利。让我们共同庆祝这个伟大的胜利。我们要乘胜前进，继续坚持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想讲一讲，在革命大串联中、军队院校师生要做好样子的问题。毛主席所提倡的革命大串联有重大意义，可以更好地了解社会阶级斗争，向地方学习、向兄弟院校学习，以便更好地搞好本单位的一斗、二批、三改，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好方法，是一种很好的政治野营，是一种很好的自我教育方法。

毛主席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这是我们的最高荣誉。林副主席号召军队院校师生要遵守秩序，要起模范作用，要做好样子。军队院校广大革命师生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的红旗，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发扬三八作用，一定要做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一定要自觉响应党的号召。把革命大串联搞好。

为了搞好革命大串联，我向大家推荐空军十七航校几位同志提出的串联的十点建议，他们的倡议是这样的：

一、毛主席的书是革命的教科书，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语录、《十六条》随身带，随时学。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真正做到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行动的指导方针，坚決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二、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是我们每一个革命战士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革命战士无限热爱、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无限忠实于毛主席。每一个串联队伍，一定要手捧一幅毛主席象做前导，进行革命串联。

三、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身穿军装接见百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大的鼓舞。最大信赖，最大关怀。最大希望，给我们带来了最高的荣誉。在革命串联中应穿军装，发扬三八作风。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只能做好样子，不能做坏样子。

四、我们同志不论在什么情况，都要把群众关系搞好，谦虚谨慎，虚心向红卫兵学习。向群众学习。

五、不加入、不干涉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不参与地方炮打司令部的活动，不参加游行，不参加抄家。

六、不谈论军队机密，不携带机密文件，不携带武器。

七、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不铺张浪费。不特殊化。不进高级饭馆。不喝酒，不买土产品，不游山玩水。对接待单位不提出特殊要求。

八、一定要携带带被具，一定不住旅馆，既安全又节约，不个人单独行动。

九、发扬我军既要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宣传队的作用。在旅途中向人民积极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人民群众做好事。

十、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一切外出串联的同志，牢记毛主席教导，事事、处处、时时坚持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加强团结、互相关心，搞好革命串联活动。互相间以同志相称，最好不要称职务。

我们认为这个倡议很好，如果能够做到了，就一定能做好样子。就一定能搞好革命串联。

同志们，同学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決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路线，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徐向前的讲话（大意）

同志们，同学们：

你们辛苦了，向你们问好！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们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林副主席、军委和总政治部的领导下，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对你们这种革命精神，我们坚决支持。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亲自领导的，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自从林副主席主持军委以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使我军在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方面，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军战斗力大大加强了。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这样大的民主，没有毛主席的领导是不可能的，出现这样的大民主是因为有伟大的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有无产阶级专政。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师生，又因为有这样一支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党的人民解放军。

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就是解放军。我们解放军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国家安全，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担子是重大的。最近美国在越南搞停炸诱和，这是针对我们的。他们对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非常不舒服。我们导弹核武器的试验成功，使他们胆颤心惊。现代修正主义，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联合反华，企图在政治上孤立我们，在军事上包围我们，破坏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一刻也不要忘记我们周围的强大敌人。同志们，我们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要忘记美帝国主义还在台湾，在越南逐步升级，我们军队要经常注意他们。要保持高度警惕性，万万不可疏忽，我们要稍微疏忽大意，就要造成巨大损失。我们解放军，海军、陆军、空军，随时保持战斗状态，一声令下，就要开得动。我们一开始就在师以下搞正面教育，开展学毛主席著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事实证明，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领导和机关干部，在保卫祖国安全方面有很大责任。他们一方面搞文化大革命，一方面保持警惕。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方面要“敢”字当头，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把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搞好，另一方面要密切注视敌人，一刻也不能中断指挥。要中断了指挥，敌人袭击了我们就不得了。

军队的领导同志要检查自己的缺点。同志们，你们向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反映自己的意见，提批评，要解答问题，你们的一切革命行动，我们都坚决支持。另一方面，希望你们从国家最高利益出发，从大局出发，考虑到他们担负着重要的任务。你们要很好地安排找他们的时间，使他们能很好地指挥部队，进行正常工作，你们要充分注意这一点。你们从白天到黑夜，从黑夜到白天缠住他们，这怎么得了！国家的安全怎么考虑！这样搞领导机关怎么领导你们！要考虑到国家的安全，考虑到敌人袭击我们。因此，请同志们考虑一下，一方面他们满足你们的要求，另一方面，你们照顾他们的工作、作战的任务。他们都是老家伙，都五六十了，有的还有病，要照顾身体。你们要照顾一下他们的身体健康和工作。

同志们，同学们，我们要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贯彻林副主席、军委、总政治部的指示，我们军队院校要作文化大革命的好榜样。希望同志们不要作坏样子，不要作有损于我们军队荣誉的坏样子。过去发生错误是难免的，不责怪大家。我们没有很好

领导，没有很好诱导，我们也有缺点，应该向你们作检查。我们的正确意见，希望你们考虑！

叶剑英的讲话（大意）

同志们，同学们：

刚才军委副主席陈毅、贺龙、徐向前都向同志们讲了很多话。这些话都是很对的，对我、对同志们都有教育意义。我完全拥护。现在，我向同志们简短地讲几句。

在座的都是院校的工作人员，革命学生、教师。这几年，我在军委管院校工作。去年搞了一年整风，整个一些领导，也整了一些行政干部和教师的不良作风。整风没有搞好，不是没有一点效果，但没有把院校的很多方面彻底搞好，没有把院校的思想和工作作风整顿过来，我以后要向大家检讨。

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要整顿彻底。院校是培养干部的，要把思想革命化搞彻底。毛主席接见红卫兵，讲了两句话："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简单的一句话，院校的同志们要很好理解。什么是国家大事？符合全国人民最高、最大、最长远利益的事，就是国家大事。具体地讲，对外：随时准备粉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联合起来向我们突然进攻。……帝、修、反想这么做，敢不敢这么做是另一回事。我们导弹核武器的试验成功，给他们的计划以很大的打击。我们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放松警惕就会犯很大的错误，错误的结果是亡国，亡社会主义的中国。这是关心国家大事的一个方面。对内：我们要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底。如果让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取了中央、国家的领导权，使我们不知不觉地、慢慢地、悄悄地变色，这样也会亡了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关心的最大的一件事情。我国十六、十七年来和平建设，我们绝大多数干部，思想觉悟、政治觉悟提高了，这是主要的。只有一小撮，养尊处优，不前进了，蜕化变质了。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打倒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会变色。文化大革命保证我国不变色，把青年动员起来，在伟大统帅毛主席、副统帅林彪同志的领导下，粉碎敌人的一切阴谋。所以文化大革命是头等大事，人人要关心。

我们要注意国内外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对外可对付外部敌人，对内可对付内部敌人。我们军队院校要作好榜样。下面不是贴了不少大标语吗？（按指会场内贴的大标语）共有二十七条。从中可以看出，一、你们要见毛主席。二、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二十七条的精神是拥护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精神，我们支持。另一方面应该指出，在运动中，有些机关、有些院校没有搞好，有些领导对这场革命很不理解，很不得力，犯了打击群众、压制运动的错误。这些错误十月五日以前军委进行了抵制。十月五日作了一个紧急指示，一定要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同志们要掌握党的政策，使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运动初期，同志们坚决反抗、坚决斗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种斗争精神我们支持。你们顶得住，坚决斗争，我们不仅同情，还支持。但是真理是有限度的，跨过了限度就变成了谬误。列宁说过，真理跨过一步就成了谬误。越过了一定的量就发生了质变。紧急指示发出以后，有些领导同志一次、两次、三次地承认错误，挨打挨斗。有些单位，我们应该指出，如二医大做得过分了，变成了错误。领导运动的人掌握火候，掌握适当的温度。不懂得这点，不懂

得列宁讲过的跨过真理一步就是荒谬。这些事不少了。今天，我们不点这些人的名了。我们是睁着一个眼睛。闭着一个眼睛，闭着一个眼睛放手，睁着一个眼睛看情况。要准许人家犯错误，改正错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只占百分之一、二、三。过去镇压学生运动是错误的，但在转过来不准人家承认错误也不对。毛主席说过，鲁迅的《阿Q正传》中有个人，是不准别人改正错误的人。为了国家、为了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要不准人家革命。毛主席讲过，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允许人家革命。

同志们要见毛主席这是很自然的。有很多是外地院校来的，想见毛主席。你们都见过了毛主席了吗！见过没见过呀？见过了！还想见也是可以理解的。毛主席在天安门上站了六个钟头。用六千辆汽车接见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群众想见领袖，领袖想见群众。你们想多见几次毛主席是可以理解的，但保卫毛主席的安全和健康是更重要的！毛主席的安全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命运！毛主席精力很好，他可以领导我们完成世界革命！你们想见毛主席我们是理解的，但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比见毛主席更重要！你们要理解毛主席的心情，毛主席关心世界革命、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毛主席对你们青年寄托很大希望，希望你们青年更加革命化起来，担当国家大事。毛主席想见你们，在天安门上等你们。天安门挤得很，我们劝毛主席不要下来，但毛主席还是下来了。我们要对毛主席的安全、健康负责。这是国家大事，世界大事！同志们静一静，同志们静一静，你们都是青年小伙子，和毛主席在一条战线上战斗，不要要求过急，今后有机会见到。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形成一种新风气，开会之前先读毛主席语录，促进了我们老家伙。你们青年人教育了老年人。毛主席说，过去旧戏是《三娘教子》，文化大革命是“子教三娘”。我们向青年学习。但是我们奉劝院校同志们，我们要按林副主席的指示办事，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不要当圣经念。现在，许多同学能把《毛主席语录》从头到尾地背下来，就跟我们过去念孔子的书一样。我们要象林彪同志所说的那样，把精髓的地方背下来。我们赞扬大家背下来，但更赞扬的是“用”，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我们过去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大家不要再犯这个错误。

今天会场空气是很好的。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全军的形势都是大好的。现在各军区都动起来了，师、团、营、连、排都要狠抓文化大革命的正面教育，狠抓战备。……红卫兵是毛泽东时代用毛泽东思想哺育起来的青年，你们接班首先是接毛泽东思想、不是接职位。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青年，是抵抗敌人侵略的主要力量。我们院校的青年，是我们军队的基层干部、军事、政治、后勤干部。我们军队院校中的青年要学习地方院校打破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革命精神。回去后，向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向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斗争，通过斗争、批评、教育，改造他们。搞好斗、批、改，把学校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大学校。你们出来是革命的，也有少数人出来表现不好，我们是知道的。方便让给自己，困难留给别人，这不好，坐火车，还没上完，就把门反锁起来，图舒服。红卫兵把玻璃打破了，从窗子爬进来。红卫兵批评我们，这个“解放军”不能学！有的住大旅馆，住老乡家里。生活稍微不好，就不满意。这是在败坏我军的光荣传统。但我们还要允许他们改正错误，真正成为红卫兵的老大哥。

要有阶级感情。我们军队内，有个别人没有阶级感情。我再说一遍，有个别的人没有阶级感情！我们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允许人家犯错误，更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有少数人，有的干部心脏病都发了，倒下了，还要抓人家斗，还不让人家走。我对这件事很愤恨！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的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以后，我们要注意少数别有用心的人。

同志们，不要受坏分子的利用。

同学们，还有些问题和大家谈谈。

最近，有很多人要到总政总参看大字报，这个问题军委已经研究过了，有些涉及到全军，涉及到机密。应当相信机关的群众，不要干涉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他们是能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

地方的情况我们不懂，你们不要急急忙忙参加游行。要考虑运动是不是走向正确的道路。运动有高潮，但有它的方向，不是乱斗一顿。

解放军有一个解放军报。它是军委、总政的机关报。有人要砸烂解放军报社。解放军报是林副主席亲自抓的。毛主席亲自赞扬过，毛主席说过，解放军报比人民日报办得好。几年来解放军报在全军里头，在全军的支持下，高举毛主席思想伟大红旗，取得伟大成绩，是文化大革命中重点保护的一个单位。林副主席指示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解放军报办得更好。你们要积极支持它，使它更能反映全军的情况，要关心它，不要捣毁它。

同志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作好榜样。你们是培养人的，把文化大革命搞好，把教改搞好，才能把人教好。

以上讲话，个别人听了会愤恨、会报复的。我相信绝大多数会支持我的。会理解我的话的。

同志们，静一下……宣布一个重要消息。兽医大学，不是医人是医马的，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的战士李基才写条子问肖华主任："肖华主任，我问一个问题，请回答：今天开这个大会，林副主席批准没有？"同志们，他怀疑我们这个大会是偷偷开的，同学们相信不相信我们？（同学们：相信军委）我代表军委的全体同志，感谢同志们信任我们，请同志们信任我们。他下面还有问题："你们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是不是林副主席批准的？"我们四个人的讲话不仅他个人看过，而且是集体讨论过的。让我代表军委全体同志再次感谢除李基才之外的同志们对我们的信任！毛主席教育我们。现在是"子教三娘"，多数教育少数。儿子教育老子，子教三娘，你们青年教育我们，大家教育李基才，允许他改正错误，允许李基才大胆怀疑。李基才要求大会广播他的条子，他想在这里得到大家的同情。我按照他的意见办了。从口号声和掌声看来，同情他的很少。李基才你听见了吗？现在文化大革命是儿子教老子，教爷爷。多数教育少数。象李基才就需要多数帮助。

我也学红卫兵，读几段语录，作为大会的结束。（当读到"这种批判，应该是说理的，有分析的，即不应当是粗暴的"时）解放军打解放军，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我们是毛主席的军队，自己人打自己人帮助了谁？（众：帮助了敌人）对！帮助敌人！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自从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于八月十八日在首都天安门上接见北京和外地来京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以来，全国掀起了革命师生大串连的高潮。预计到十一月二十日止，来过首

都的外地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将近九百万人。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不到三个月的短短时间内，举行了七次盛大的接见大会。

为了使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地向前发展，全国大专院校、军事院校和中等学校放假闹革命的期限，需要持续到明年暑假。因此，决定在今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到明年春暖季节，全国各地大专院校、军事院校和中等学校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革命串连。目前正在水陆交通沿线等候车、船外出串连的各地革命师生，可劝说他们返回原地。从明年四月起，还有充足的时间，凡是应来而未来北京进行革命串连的大中学生，都会有机会免费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看望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并进行学习和交流革命经验。

今年是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为了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并且更好地实现明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需要在今冬明春集中一切交通力量，加速物资运输。同时，为了准备明年春暖季节更好地、更有计划地免费输送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也需要对前一阶段的运输工作进行总结，并对前一阶段使用过度的客车、客轮进行必要的检修。因此，决定从十一月二十一日起，全国水陆交通，只负责免费输送各地到北京或外地进行革命串连的革命师生返回原地，和北京去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返回北京。他们要凭免费票上车、上船，直回原地，不要在途中停留。

林彪同志十一月三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中告诉我们："毛主席是支持同志们步行串连的。……当然，这种步行串连，必须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地进行。"为了实现林彪同志的这一号召，今冬各省可先在本省范围内、专区范围内有组织地进行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徒步串连的试点；在全国和各大区将由中央、国务院、各中央局和各省、市、区，有组织地进行重点试点，以便取得经验，为明年徒步大串连作好准备。对于已在进行徒步串连的少数革命师生（几个人到几十个人），中央和各地党政机关应主动地给以必要的便利。超过百人以上的徒步串连，必须同有关党政机关事先接洽，有计划地进行，以免沿途发生食宿和其他方面的困难。有关徒步串连的注意事项，将另行通知。

这一通知可在各地大中学校革命师生中宣读，并在机关、学校、车站、码头张贴。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十月五日中央批转的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对于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了重大的作用。

根据最近各地的情况，中央认为，对于文化革命中各学校、各单位编写的整群众的档案材料，都应该宣布无效，全部清出，一律当众[illegible]这样做，[illegible]为了更好地、集中地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抓住大是大非，从思想上政治上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促进广大群众的革命团结，防止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不休[illegible]互相对立。

中央对处理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补充规定如下：

（一）责成原工作组、学校党委或者其他有关组织，必须将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后的各种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包括整理过的或者没有整理的材料，除在这一文件宣布以前，确实已经焚毁的外，全部集中，不许隐瞒，不许转移，不许复制，不许私自处理。否则，就将加深错误，并将受到党的严厉处分。

（二）除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外，其他所有的材料，集中清点之后，在上级领导机关和本校学生代表的监督之下，当众焚毁。

（三）以上规定，完全适用于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等组织，也完全适用于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军事机关和院校。所有这些单位，对于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因为给领导上或工作组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革命群众，都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并按以上规定处理材料问题。

（四）在处理材料问题的过程中，各方发生争执的时候，应该严格遵守十六条的精神，根据上述规定，采取共同协商的方法解决，只许文斗，不许武斗。

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对待犯路线错误的领导干部，一般应该遵循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为了让他们改正错误，继续工作，不要连续地在长时间内去斗，不要勉强留下他们，也不要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犯错误的领导干部应该主动地、认真地、虚心地向群众进行检讨，不要同群众形成对立的状态。

这一文件，应立即在各学校、各单位群众中宣读。

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市委重要通告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北京市委十一月十八日的重要通告，很好。现在转发全国，请各省、市、自治区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名义大量印发，在学校、厂矿、机关或其他单位内张贴。各地如有同样的情况，照这个通告办理。

重 要 通 告

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

这样做是违犯国家的法律和党的纪律。

如果有人在幕前或者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分。

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处理。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中共中央给西北局、东北局并吉林省委的两封电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

西北局:

二十三日电悉，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中　　央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东北局并吉林省委:

请向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和其他革命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赵林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中　　央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毛泽东先后八次共接见了一千一百万外地师生和红卫兵（节录）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十一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在首都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二百五十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

这是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对革命小将的第八次接见，也是明年春暖以前的最后一次接见。这次接见，显示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是三个多月来革命师生进行串连和学习的一次胜利的总结，它将促进全国革命师生实行全程步行革命大串连。

从八月十八日以来的三个多月中，连同国庆节在内，毛主席已经接见了一千一百多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同这样众多的革命群众见面，这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伟大的革命创举。

在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连续两天举行的第八次接见大会上，二百五十万革命小将怀着无比幸福、无比激动的心情说，毛主席啊，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只有您这样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有您这样伟大的天才，才有这样巨大的魄力和决心，发动这场震憾世界的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您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您最最热爱群众，最最相信群众，最最支持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您的心和革命群众的心紧紧相连，您为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我们青年一代，树立了最光辉的榜样。

革命小将们说，毛主席连续八次接见我们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是对全国革命青少年和广大革命群众，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主力军——工农兵群众的最大鼓舞、最大支持。毛主席一次又一次的接见，推动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汹涌澎湃地向前发展，取得一个又一个巨大的胜利。

二十五日这天，虽然气温降到摄氏零度左右，但毛主席接见革命小将的喜讯，温暖着每个人的心。从五湖四海云集首都的六十多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以解放军为榜样，突出政治，把毛主席亲手制定的三八作风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行动的指南，他们按照班、排、连组成红卫兵师、团，人人手持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高唱革命歌曲，迎着黎明前刺骨的寒风，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和广场东侧的条条大道上，结成一支支波澜壮阔的红色巨流。当太阳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的时候，英姿焕发的革命小将们一遍又一遍地朗读毛主席语录，整个天安门广场成了一所雄伟壮丽的毛泽东思想大课堂。

十一点三十分，《东方红》乐曲奏响了，千万人心潮澎湃，千万双眼睛仰望着天安门。

"毛主席来啦！毛主席来啦！"

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在海啸般的欢呼声中，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中央和其他方面的领导同志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宋庆龄、陈毅、贺龙、李先念、谭震林、徐向前、叶剑英、谢富治、刘宁一、萧华、江青、吴德等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顷刻间，"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的欢呼声，像滚滚春雷，震天动地。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康生同志宣布大会开始。他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向革命小将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的敬礼。康生同志对大家说：毛主席接见我们，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是我们的最大光荣！

接着，盛大的游行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开始。

排列在天安门广场东侧大道上的革命小将，以解放军强大后备军的战斗姿态，高举红旗和毛主席画像，迈着矫健的步伐，挥舞着红光闪闪的《毛主席语录》，意气风发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统帅毛主席的检阅。

这一天，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在凛冽的寒风中一直和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在一起，持续达四小时。一队队革命小将在通过广场时，尽情地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含着慈祥的微笑，不断地向大家招手致意。

二十六日，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继续接见并检阅了文化革命大军。

这一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八十多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排列在天安门广场和广场西侧的宽广大道两旁，以及西郊机场上，整个队伍像奔腾浩荡的红色长江。

下午两点三十分，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中央和其他方面领导同志，在《东方红》乐曲声中，分乘敞篷汽车，来到了革命小将中间。

毛主席身穿军装，容光焕发，巍然屹立在第一辆敞篷汽车上，向夹道欢呼的人群不断地

亲切招手。

毛主席乘着汽车走到哪里，哪里就一片欢腾。

“毛主席呀毛主席，我们永远跟着您在革命的长征路上勇往直前！”在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连续两天举行的接见大会上，从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辽宁、河南、安徽、湖北、湖南、陕西、江苏、吉林、江西等省区徒步来到北京的五百多支红卫兵长征队的小将们，见到了日夜思念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在二十五日大会结束前，高兴地来到各国来宾中间，同他们亲切会见。各国朋友们聚在毛主席周围，拿出《毛主席语录》，请毛主席签字。他们激动地一再高呼：“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应邀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大会的各国外宾有：

阿中友协代表团团长、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科尔察区人民会议执委会主席彼·多德，代表团团员：地拉那市党委书记拉·伊弗蒂察，人民议会代表、地拉那区伏拉国营农场主席沙·扎拉，地拉那拖拉机配件厂冶炼车间主任克·科乔，培拉特“毛泽东纺织厂”先进工作者什·沙迪古，斯库台区布萨蒂阿中友好农业社社长哈·希马；

日本的西泽隆二和他的夫人；

新西兰共产党全国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雷·纽恩斯；

法国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央委员会全国书记弗朗索瓦·马尔梯，中央政治局委员乔治·高蒂埃；

意大利《方针报》社长朱塞佩·雷吉斯等。

参加二十五日大会的还有各方面的负责人，他们是：廖承志、张鼎丞、萧劲光、粟裕、邓子恢、杨秀峰、钱瑛、许光达、曾山、吕正操、王树声、张经武、谢觉哉、杨勇、张宗逊、李涛、陈奇涵、陈漫远、李志民、刘澜波、苏振华、廖汉生、徐冰、陈正人、刘建勋、赵毅敏、孔原、方毅、张爱萍、姚依林、李天佑、王新亭、刘志坚、徐立清、袁子钦、傅钟、张池明、李作鹏、吴法宪、余立金、吴克华、陈仁麒、崔田民、黄志勇、陈士榘、谭辅仁、江文、黄文明、李真、郑维山、傅崇碧、黄作珍、李天焕、蔡顺礼、孔石泉、周士第、朱良才、郭天民、杨至成、谭冠三、傅秋涛、胡痴、彭富九、李信、谢镗忠、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郭沫若、杨明轩、程潜、张治中、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周荣鑫、姬鹏飞、杨奇清、江一真、刘文辉、许德珩、高文华、吕东、徐今强、段君毅、刘杰、吴融峰、王诤、方强、王秉璋、钟子云、李四光、旷伏兆、刘裕民、赖际发、蒋光鼐、钱之光、孔祥祯、徐运北、孙大光、朱学范、傅作义、袁宝华、吴波、沙千里、陈国栋、王磊、萧望东、张奚若、楚图南、谢扶民、薛暮桥、丁莱夫、胡立教、汪东兴、曾涤、熊复、李人林、谢有法、王屏、孙正、江学彬、唐平铸、马纯古、王道义、曹轶欧、高崇民、蔡廷锴、李烛尘、李德全、苏谦益、高扬文、马力、雍文涛、丁国钰等。

（新华社 1966 年 11 月 26 日讯，载 11 月 27 日《人民日报》）

〔附〕 “联动”事件始末

乔 伊　　徐雅雅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列宁选集》第2卷第512页

1967年夏天，北京“八一”学校院内，举办过一个名噪一时的“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展览以所谓触目惊心的大量“事实”，把充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急先锋”的“联动”成员，描绘成一群“腐化堕落”、“穷凶极恶”、“青面獠牙”、“手挥皮带”，专搞打、砸、抢的“暴徒”，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是炮制展览会的阴谋家们心里完全清楚，这一切都是假的：所谓“联动”的“高级消费品”是外贸部抄家得来的财物；匕首、铁棒等凶器是从公安局借来的；自行车是从一些学校学生手里扣下的；外国画报是从图书馆里搬来的；而那些被毁坏的教具和标本则是蒯大富、聂元梓之流指挥一些打手一手砸坏的……

这是一个用心多么险恶的骗局呵!

那么，这些阴谋家们精心策划这样一个骗局的目的是什么呢?

当时，号称“五人领袖”之一的谭厚兰对此做了最好的说明：“现在中央文革直接抓这个展览，让大家看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行不行？不反击资本主义行不行？国务院在这里搞了些什么东西?”

事情再清楚不过了。二十年前，围绕着“联动”事件和这个展览会所发生的一切，反映了“十年动乱”中政治斗争的一个侧面和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一)

1966年11月27日，在北大附中教学二楼的一间会议室里，正酝酿着一项重要的决定。

参加会议的是北大附中，石油附中、清华附中、京工附中、八一学校等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这些十六、七岁的青年人，同许许多多人一样，在“文革”开始时，也曾以真诚的激情投入运动的漩涡，有过狂热的举动。然而，仅仅几个月的时间，运动出人意料的发展，却使他们渐渐地清醒过来。

会议由北大附中的牛皖平主持，中心议题是：研究当前运动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牛皖平和其他几个人是最近才回到北京的。“外地全乱了!”这个天真的学生预备党员，本来是想到外地开开眼界，找点“教育改革”的经验的。不是说“文化大革命”只搞六个月，斗、批、改三阶段吗？他和校“文革”的几个人就曾商议过，是不是把北大附中搬到东北或内蒙古，搞半农半读、半牧半读的学校呢？可是，西安、武汉、广州……一路上，他们所到之处，省委、市委的各级班子几乎都瘫痪了，造反派的“炮轰”正逐步升级。难道这些领导都成了黑线人物？都不能用了？他是带着满腹疑团回到北京的。

而作为“革命”中心的北京，更是一番“黑云压城”的景象：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崛起的蒯大富、聂元梓之流，转眼间已成为炙手可热的“左派”。他们打着“怀疑一切”、“打倒一

切"的旗号，象"拳头"一样到处乱打，竟有恃无恐地发展到揪老师、冲击军事机关、炮打国务院了。而他们的幕后操纵者，就是那个"中央文革"。

提起"中央文革"江青、康生之流，青年们已经没有什么好感了。清华附中的卜大华记起了这样一件事：那还是八月初在天桥剧场召开的一次辩论"对联"的大会上，江青突然把他和几个学校"红卫兵"的负责人找到一间化装室里，诡秘地对他们说："你们现在要注意，现在我们站在前台来支持你们，但是背后有人给我们捅刀子。你们要知道，中央内部也不一致啊。"接着，她又煞有介事地对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说："平平，你是不是镇压革命同学了？你应该很好地向同学们检讨……"正讲的时候，江青突然看到一位团市委的工作人员在做记录，不知怎地发起火来："啊，你是来做密探的吧？你回去告诉他们，就说我不怕他们！团中央胡耀邦原来是个红小鬼，现在我看是个胆小鬼……"

卜大华记不得自己当时是怎样离开那间化装室的。但江青的这番"表演"却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当时隐隐感到，江青那连哄带吓的话语中似乎包藏着某种用意，在怂恿他们去做什么事情。而现在，他在蒯、聂之流的所作所为中已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但事情的发展也并非一面倒。北京也出现了一股与"时代精神"不相称的思潮：有人给林彪贴大字报，对他的"顶峰"、"一句顶一万句"提出疑问；有人贴出"四问中央文革"写下了"陈宫溃，骚人溢"的诗句……尽管这些小小的反叛，倾刻之间便被强大的"群众专政"碾碎，但青年人探求真理的勇气并没有灭绝。特别是前些日子，中央军委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更使他们兴奋不已。四位老帅明显地在批评当前的这些过头的做法。这给了他们鼓舞，同时也使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

"中央文革就是中央文革，它既不是毛主席，也不是党中央，对它有意见为什么提不得？"

"可现在谁提意见，谁就是反革命，这岂不是国民党作风？"

"为什么不许我们对当前运动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们中学红卫兵应该联合起来，和蒯、聂之流干到底！"紧张热烈的讨论接触到主题，这个建议一发出，立刻得到会议室里几十个人的响应。

那么，这个组织应该叫什么名字呢？

"我看，就叫'红卫兵第四司令部'。蒯大富是'三司'，咱们是'四司'。"有人说。

"要不就叫'造反兵团'……"

"现在司令部多如牛毛，'造反兵团'也太俗气，我看就叫'联合行动委员会'吧……"

"对，这个名字好！"会议室里的气氛活跃起来，大多数人都赞成"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名字。而且，有人还建议前面再加上"首都中学红卫兵"几个字，和大学的"红卫兵"以示区别。

会议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联动"就这样诞生了。大家决定，它的组织机构采用集体协商办法，各校派出一名联络员，主持常务工作，由京工附中于增寿同学任总联络员，总部设在北大附中，宣传工作由北大附中负责，组织工作由石油附中负责，并委托北大附中的宫小吉起草"联动"宣言。

12 月 5 日是"联动"正式成立的日子。这天夜里，北京街头出现了这样一些标语："热烈欢呼联合行动委员会成立！""坚决拥护中央军委四位副主席的讲话！""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表现形式"……为了制造声势，"联动"成员全力以赴，冒着刺骨寒风，奔走在首都的大街小巷。京工附中邹建平等人竟爬上了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几十张大字报纸刷下了一条巨幅标语，上面赫然写道："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这些标语在动乱的年代，就好象是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几声步枪的连发，青年们觉得很不过瘾。殊不知就是这几条标语也足以刺痛"中央文革"及那些打手们的神经了。一场残酷的腥风血雨正悄悄来临。

按照既定方针，"联动"成员们开始行动了。12月6日，牛皖平等十余人来到一个蒯、聂控制的组织，与他们辩论揪斗老干部问题。谁知刚进大门，就遭到了几十个打手的围攻，为了避免流血事件，牛皖平等人未及开口，只好冲出重围，主动地撤了出来。

12月7日，"联动"再次派出石油附中、农大附中的同学二十余人前往这个组织所在地，谁知，他们竟用电话调来上千人将"联动"成员团团围住，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周总理派周荣鑫同志前来调解。蒯、聂之流不容他人发言，竟然围攻周荣鑫同志，周荣鑫同志耐心劝解，直至第二天凌晨一二点钟，才将"联动"成员放走。

与此同时，12月7日，在民族宫，廖承志同志主持的"第二届中日青年友好联欢"筹备会上，"联动"成员又和蒯、聂之流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

会议刚刚开始，以唯一"左派"自居的"三司"代表，提出整个联欢会活动应由他们独揽，使会议陷入混乱之中。"联动"代表马晓军等人和其他红卫兵组织负责人据理力争，一直辩论了三个多小时，最后，在大家一致抗议下，"三司"代表只好离开了会场。

时间已是深夜了，辉煌的民族宫恢复了以往的宁静。廖承志同志把大家引到自己的房间。青年们象遇到了久别的亲人，围着廖公诉说起抑郁在心中的忿懑和不平。

"总理是理解你们的。"廖公的话一出口，房间里顿时安静下来，几个青年人的眼眶里有泪珠滚动。

"你们要懂得做为一个革命者，在革命高潮的时候应该跟着党，在受到冤枉委屈的时候也要跟着党干革命。我从小参加革命，可到了革命队伍又遭到不信任，长征时是一直戴着手铐走过来的，后来是周总理救了我。希望你们要以革命利益为重，经得起斗争的考验。现在我白天挨斗，晚上还要会见外宾……"这番肺腑之言，深深感动和教育在座的青年。可就在这时，门突然被推开了。两个自称某大报"记者"的人闯了进来，绷着脸要求旁听会议。大家对这两位"不速之客"的"光临"感到突兀，严肃地要求他们退出会场。廖承志同志说："既然孩子们不欢迎你们，就请你们出去吧！"但"联动"成员们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句话，却给廖承志同志召来了一场横祸。12月9日，在有周总理出席的中南海小礼堂会议上，江青首先发难，逼着廖承志就轰出"记者"一事做检讨。三十一年前，周总理从张国焘手里保住了廖承志，而在三十一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却没能从江青手里保住他，廖承志同志从此被"打倒"了。当时"联动"代表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们向主席台递条子："这不怪廖承志同志，怪我们！"但这又有什么用呢？江青之流打倒一个老干部还需要什么更多的罪名吗？

在这次会议上，大家见到了久已想念的周总理，这使他们在忧虑中增添了几许安慰，可是总理被蒯、聂之流死死纠缠脱不开身。"联动"的几个负责人便写了一个条子直接递给总理，上面写着："总理，有人要反您，我们要求您单独接见！联动。"事后总理曾几次安排接见，但都未见成。从这次会议之后，青年们很想把心中的种种疑问向总理倾诉、请他解答。终于，在12月16日的一次群众集会上，他们见到了周总理。可是这又是一次什么样的"会议"啊。在那次会上，江青突然点了国务院正、副秘书长周荣鑫、雍文涛两同志的名字，说他们是保守组织的"后台"，让他们到前台低头认罪。"联动"成员们远远看见从来不抽烟的周总理，拿起了一支香烟，默默地吸着，神色十分严峻。这时江青还在大骂一些中学红卫兵和干部子弟"血统高贵什么东西！"看台上的"联动"成员实在听不下去了。不错，"红卫兵"初期，

曾有一些幼稚、天真的中学生提出“血统论”的错误对联，然而这对联就在当时也是有争论的，邓小平同志就通过自己的女儿向红卫兵表达了明确的态度：“我不同意这副对联。”可是中央文革的康生、陈伯达却模棱两可，江青还为“基本如此”的错误提法站起来鼓掌，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转眼间，江青又把“血统论”的错误全部推到这些红卫兵群众头上，把自己装扮成一贯正确的代表，这不是十足的资产阶级政客手段吗？这使人不能不产生一个疑问：她，以及她的那个中央文革是马列主义的吗？事实催人觉醒，觉醒促人愤怒，愤怒在集聚着力量，这愤怒的力量终于在12月26日“联动”的第一次大会上象火山一样爆发了！

这次大会是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的，由北大附中周春英同志主持。会议开始，由清华附中等四个学校的“联动”代表就运动以来本组织“红卫兵”的成绩和缺点做“破私立公”发言，但就在发言过程中一份署名“红后代”的口号传单，引起了青年们的兴趣，他们三五成群地议论起来。后来石油附中“联动”负责人马晓军、贺邯生等人索兴走上主席台，向大家宣读这份传单：“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几天发表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讲话！”马晓军的话音刚落，剧场里就响起了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接着的每一条口号都引起巨大反响。当读到：“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时，全场同时喊出“好！”这是几千个革命后代从心里发出的声音！这是对中央文革、蒯、聂之流错误作法的强烈抗议！当马晓军他们又喊出了：“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这句口号时，全场几千人全都愣住了，一秒二秒……突然象平地里卷起了一阵狂风，全场沸腾了。大家发狂似地蹦起来，跳上椅子，跳上桌子狠命鼓掌，大声叫好！鞋子、帽子、头巾、传单在园形的屋顶下飘舞。爆竹声震耳欲聋。接着大会放映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纪录片，当镜头上出现毛主席、周总理、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时候，掌声响成一片，一出现中央文革成员镜头时，剧场里却发出不满的嘘声。这是多么鲜明的爱憎，这是多么大胆的挑战呵！这些十六七岁的中学生，尽管没有丝毫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经验，但他们能在短时间内联合四五百所中学的红卫兵组织，甚至包括上海、沈阳、武汉、南京、广州、长沙、新疆等地区的战友，向不可一世的“左派”们发出声讨。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啊！二十年后，当年“联动”的一位负责人对笔者说：“当时我们只要说哪天在哪里开会，根本不用通知，到时候一传十、十传百地都来了。这简直是一种惊人的力量！”这力量是党和人民，是老一辈革命家输送给他们的啊！

（二）

“12.26”大会被躲在灯火楼里的蒯、聂之流派出的“特务”照了相，连同大会的传单自然是火速送到江青等人的手里，可惜我们在这里不能具体描述他们当时恼羞成怒的丑态。但两三天后，当时某大学“红卫兵”组织的一位负责人接到的电话却很说明问题。

电话是“中央文革”的戚本禹打来的：“怎么样？在‘联动’的问题上，你们是不是手太软了？”

“我们，我们……”这位“司令”还想解释什么。

“不要解释了”，戚本禹仿佛在极力抑制着心中的怒气，“你们考虑考虑，连个‘联动’也对付不了，今后你们还想不想当左派！”

电话挂断了。戚本禹及其主子没有说完的话，在后来出版的1967年第三期《红旗》杂志的一篇社论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在这篇题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的社论中，这伙野心家们恶狠狠地宣称：

“对反动派，别说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不给，半点也不给！”接着文章又使用了“实行专政”、“法律制裁”、“天罗地网”、“坚决消灭”等词汇，透出不可抑制的杀机。

他们宣判为“反动派”的是在“一月风暴”中被夺了权的各省、市党政军负责同志，而做为“反动组织”的“联动”，当然也在其中。

绞杀令下达了。残酷的镇压开始了。

1月17日，北京工业学院附中的“造反派”突然召开大会，“安排”“联动”成员，原校筹委会主任赵战平做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检查”。下午三点，赵战平的“检查”还没做完，包括北航“红旗”在内的十三个大专院校共三千多人突然包围了会场，同时公安局还出动了五十余名警察，抓走了赵战平、邹平等三人。接着他们便以“捕获‘联动’巨头”为名，在西单、东单、王府井等处，押着赵战平等游街示众，以欢庆所谓的“胜利”。

1月19日下午，蒯、聂之流又纠集了上万人包围了“联动”组织部所在地石油附中。通过谢富治派出警察，以公安部的名义把任志明、马小军等“联动”成员逮捕了。当他们被戴上手铐、押上卡车时，这些无私无畏的青年迎着寒风，唱起了《国际歌》。

当蒯、聂围抄北大附中时，“联动”总联络员于增寿同志死死抱住电话机就是不撒手。几个人粗暴地压住他，从他怀里抢走电话机，并砸坏了桌椅……一番血洗后，于增寿呆呆地站在那里，望着空荡荡的教室，这位老工人的儿子流下了悲愤的眼泪。

1月25日下午四时，谢富治指挥蒯、聂之流调集三万余名不明真相的群众，要拔掉“联动”的最后一个据点——“八一”学校了。他们把“八一”学校围得铁桶似的，师生一概许进不许出。五时左右，搜捕开始了。所有的教室、宿舍被统统踢开，暖气道被拆开，天花板被踩坏。当时在校的320名职工宿舍有一半被抄，仪器室、标本室、图书馆被砸得乱七八糟，前后抓走32名学生，甚至两名同情学生的教师也被当作“联动”抓走关进了监狱。

这一罪恶行径激起“联动”成员极大愤怒。他们看出幕后操纵者是“中央文革”，于是就组织起来向主管政法工作的谢富治要人。但“联动”代表几次到公安部要求面见谢富治，他就是避而不见。而随意抓人的情况却愈演愈烈。于是，气愤的“联动”成员们就在公安部的墙壁上刷上了“强烈抗议公安部下放专政权力！”、“公安部执行一条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火烧谢富治！”等大标语。没想到这更加招致了围攻和殴打。很多“联动”代表同时遭到逮捕。这就是所谓“冲击公安部”的真相。

清明节到了，往年这是团员、少先队员们缅怀先烈的时节。但这一年的清明，八宝山的绿树丛中看不见共青团的红旗，也听不到少先队的鼓声，有的却是事先埋伏好的便衣，等待着“自投罗网”的“联动”。

“联动”们来了，这些身穿朴素黄军装的烈士子弟、革命干部子弟和工农子弟，骑着自行车，带着花圈来了，他们看见不少烈士墓碑被砸烂，烈士的遗像被砸碎，不禁心如刀绞。这是砸碎青年们心灵中最珍贵神圣的感情啊！他们有的在被砸残缺的任弼时烈士墓前宣誓：“钢气节，英雄胆，洒热血、捍江山”。有的在父亲或母亲的墓前献上自制的小花圈，哭诉着心中的委屈：我们一心想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如今却被当反革命来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就在这时，便衣们冲了出来，踩烂了花圈，踢倒了正在哭诉的孩子，冲散了宣誓的青年，公然于光天化日之下，在八宝山烈士陵园进行了一场围捕。人们也许会问：他们为什么要对这些十六、七岁的孩子们大动干戈？仅仅是因这些孩子们“反动”吗？不！事情很清楚，因为，这些孩子的亲人，那些忠于革命的党政军老干部是这伙野心家们篡党夺权的障碍，他们才采用如此卑劣的手段：给已因“莫须有”罪名被批判的“反动老子”的身上再加一条“联动”儿子的

罪名，这样“火烧”“油炸”“打倒”的理由岂不更充分些吗？

（三）

在半步桥第一监狱里，有一座当时被称之为“红卫兵监狱”的楼房，这就是关押“联动”的所在。

狱中的生活是艰苦的。一日两餐四个窝头，饭量大的一顿都不够。每天除去所谓“学习”之外，还要进行“劳动改造”。但这些并不能摧毁青年们的意志。使他们最难忍受的是那没完没了的“提审”，牛皖平、卜大华，赵战平、邹平等人被“提审”的次数最多，有时一天就四、五次。而“提审”的内容却始终如一，即：你们的“后台”是谁？那些“审讯员”们一会儿说：“有人已经交待了，你们的后台是刘、邓，你怎么还不交待？”一会儿又说：“你说出是受贺龙指挥的就放了你”。“联动”成员们义正辞严地告诉他们：“我们没有后台，我们对中央文革的做法不同意就要反，后台是我们自己！”那些人恼羞成怒了。“你不交待就影响你的父母！”“不交待就关你们一辈子！”更有甚者，一些倔强的青年对狱中恶劣的待遇和逼供信的做法稍有不满，就会被用“苏秦背剑”的姿式反扣上手铐，直勒得手腕发紫。

夜晚，青年们望着窗口透出的一点儿星光辗转难眠，他们在思索什么呢？

请看“联动”成员在外出“避难”前给父母的一封信中是怎么写的吧：“……联合行动委员会……实际上是跟中央文革干，我们怀疑江青，她干了些使人不解的事……江青水平太低，她现在的错误往轻点说是资产阶级思想没改造好，往严重点说，就是怀疑她有野心。……现在大街上炮轰陈老总，又轰叶剑英，中央文革现在又把陶铸、王任重、刘志坚、周荣鑫抛了出来……，北京现在文化大革命方向不对，……”莫要惊叹这些十几岁的青年敏锐的观察力，莫要以为这些是受那个“后台”教唆而来，实际上最好的教师不是别人，就是“四人帮”自己！

监狱的高墙，把青年们与外面激烈的政治搏斗隔绝开来，一有新关进来的“联动”分子，他们便乘着放风时候打听消息。当听说中央斗争很激烈，老帅们在怀仁堂把桌子都掀了时，青年们禁不住从心底里发出欢笑。可是过了不久，消息变得沉重起来，全国开始批判“二月逆流”，“联动”被打成“二月逆流”的急先锋，老帅们也被“点名”批判了。孩子们的胸口象堵上一块铅，他们惦念着总理，惦念着革命的老前辈，那时他们经常唱起大家都很熟悉的《长征组歌》：“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女孩子们则爱唱童年的歌：“谁给我们金色的童年？谁哺育我们成长，少先队员都知道，是毛主席和共产党……”歌声鼓舞了斗志，成了他们的精神安慰。是啊，他们中间最长已经关了三个多月了，这顶“反革命”的帽子还要戴多久呢？

4 月 22 日，这是他们难忘的一天。这天晚上，监狱灯光球场突然大放光明。院子里开进来好几辆大轿车，一百多名“小政治犯”被叫出来上了车。拉到人民大会堂东门停下来，他们被带进了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安排在东大厅的会议室里等候。突然，大厅的门开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快步走了进来，青年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哗”的一下全都站了起来，周总理来了。“周总理……”，“周伯伯……”顿时哭声喊声响成一片。周总理一边招手，一边审视着这群衣衫褴褛的孩子们：这一百多个孩子，脸色腊黄，眼泡是浮肿的，男孩子头发有寸把长，女孩子的短发乱蓬蓬的……总理不忍再看下去了，他挥了挥手让青年们坐好，然后用低沉的声音问到：

“董良翮在不在？”

满面泪痕的董良翮站了起来。

大厅里一阵沉默。

总理又问："谁是孔丹？"

孔丹站了起来，因为难过和激动，他低着头，默不作声。

总理说："你的父母的情况我都了解，你不要难过，你们是党和人民一手抚育大的，你们是党和人民的孩子，受了挫折不要灰心，要继续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孔丹抬起了头，他的目光与总理的目光相遇了，总理那深沉的目光里饱含着对革命后代的爱和一种难言的痛楚。

总理明确地指出："你们回去后，不要搞向毛主席请罪的活动，这样不好，这也是毛主席一贯反对的，应当以实际行动跟着党干革命"。

青年们听了总理的话，心情豁然开朗，一双双眼睛里放射出喜悦的光芒。但就在这时，一个冰冷的声音却响了起来："你们不要把自己划成小团体，会引起误会，你们自己考虑"。大家这时才注意到江青也来了。旁边还有陈伯达、康生、戚本禹。江青问到："谁是牛皖平？""联动"主要负责人牛皖平站了起来。江青讽刺道："啊，早就久闻大名，今天才见到"。牛皖平感到被羞辱，一股愤怒从心头升起。江青用威胁的口吻说道："听说你们有些人骂我，说我这个人不好？"牛皖平没有回答，大厅里一片沉默。继江青之后，陈伯达、康生也阴阳怪气地讲了一番"至理名言"，青年们不听这些鬼话，抓紧时间向总理反映情况，他们从毛主席语录的扉页上撕下一个小纸条，用一截铅笔头写到："总理，他们在监狱里搞逼供信"。纸条在青年们手里传递着，从后排传到前排，落到戚本禹手里，戚本禹看了一眼，竟若无其事地把纸条揉成一团扔进烟灰缸。青年们虽然没有和总理联系上，但却又一次看到这些野心家们色厉内荏的嘴脸。

午夜时分，当"联动"成员们走出人大会堂时，月亮在乌云中时隐时现，在它把光华撒向大地的瞬间，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几个镏金大字显得格外分明……青年们从监狱里拿了衣物，步行回家，心情仍旧是激动不已。身边偶尔驰过一辆小轿车，青年们就想：是不是周总理坐的车啊？要能再见他一面该有多好！廖承志同志曾经对他们说过："总理最理解你们"。是啊，总理既表扬他们的革命热情，又及时批评他们盲目幼稚的做法。一连几个小时讲解党的历史、党的政策，总理襟怀坦白地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做例子讲述党内历次的斗争情况，就像母亲对待初学走路的婴儿一样：当孩子不小心跌倒了，母亲慈爱的手马上把他扶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又继续让他走。可是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伙野心家是怎样对待这些青年的呢？在释放"联动"的前一天，陈伯达、江青到被他们操纵的学生组织去"请示批准"，江青说："如果没有小将们的批准，我就不能接见他们，如果接见了'联动'，你们就说不亲你们了，对他们亲了"，康生在释放"联动"的第二天说："昨天晚上，根据毛主席的命令把逮捕的'联动'头子释放了。……如果不改正错误，再经受一次挫折嘛。难道共产党员还不如诸葛亮？诸葛亮还七擒孟获，七纵七擒。难道咱们共产党员连一纵也不敢纵，那还行？"陈伯达事后煽动说："你们对这几百个人都没有办法，还能解放全世界吗？还能解放全人类吗？你们的笔应该横扫千军，'联动'算什么军？只不过是一百人、两百人嘛。（戚本禹：一个连）横扫千军，何况几百人"。这些人哪里还像共产党员？堂而皇之的语言充满了杀机。尽管他们的阴谋手段能暂时蒙蔽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但逃不过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敏锐的眼睛。董良翮被释回家，他的父亲董必武同志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替我去坐牢呀！"一语道破了江青、陈伯达、康生之流"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天机"。

(四)

"联动"成员们本以为放出监狱便可以呼吸自由的空气，但他们没有想到，"四人帮"在一月夺权和反击"二月逆流"之后，已把中国变成一座大牢笼，在这洒满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正义"被捆住了手脚，"民主"被戴上了镣铐……

"联动"大胆的反抗，深深激怒了正待扶摇直上的野心家们，报复是残酷的！牛皖平被释后，又被揪到学校和父亲所在机关批斗，随之取消他的预备党员的资格，连上山下乡的权力也被剥夺，在家中等候两年多仍无出路，只得化名回老家去落户，至今还用的是假名字；孔丹的妈妈许明因揭露江青的丑恶面貌，遭到迫害，倍受凌辱，终使这位参加革命三十多年的女同志含冤而死，死后江青还恶狠狠地指控她为"反动"儿子的"后台"；贺邯生参军后，在一次行军途中不慎把腿上的韧带撕断，仍坚持步行一千多华里，但因"联动"问题，参军不到三个月就被"赶"出部队；郭大勋也被"赶"出部队，因为"联动"，两年之间不得安排工作……这种事例举不胜举，但更令人气愤的是，"四人帮"及蒯、聂之流还根据张春桥的"阶级关系新变动"，利用宣传机器把"联动"描绘成"土匪"、"流氓"，并且列出这样一个公式："干部子弟＝联动＝反革命"，在人们心中造成了极大的偏见。

然而，经受了考验的大部分"联动"成员们并没有消沉。在后来的"文革"岁月中，他们和广大人民一起度过了漫漫长夜。和全国人民一起思索和探求，他们接触了社会，了解了人民，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在一点点地克服，他们逐渐地成熟起来。如果说"文化革命"初期他们还只是从表面和局部对野心家的行径提出疑问，那么，十年后他们就已经能够看清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本质和那条害党害国的极"左"路线了。

在 1976 年的清明节，他们的怒吼和天安门广场的国际悲歌汇聚在一起，在金风飒飒的十月，他们的欢笑又和举国上下胜利的锣鼓熔合在一起。同时，他们的政治生命也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1979 年 2 月，胡耀邦同志首先对"联动"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在牛皖平、马晓军等人的申诉书上批示道：有关部门应对"联动"问题，"做一个实事求是的善后。"

同年 9 月，北京市公安局对"联动"成员发出复查结论，指出："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阴谋的需要，把群众组织'联动'定为反动组织是别有用心的"。

1984 年 2 月，一位中央负责同志指示将孔丹、董志雄的一封来信印发后给政治局、书记处，同时明确指出：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

同年 4 月，在宋任穷、王震等同志的直接关怀下，公安部和团中央分别召开了当年"联动"主要成员的座谈会，认真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和要求……同时，《红旗》杂志社也向"联动"成员发出通知，对"联动"问题正式予以平反。

颠倒的历史终于颠倒过来了。在本文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告诉读者的是：现在大部分当年"联动"的成员，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祖国的四化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尽管他们已人到中年，但仍保持着当年那种青春的朝气，因为他们将永远记住周总理对他们说过的一句话：

"你们是党和人民的孩子。"

永远也不会忘记!

(原载《追求》1986 年第 5 期)

陈毅、叶剑英在接见军队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于北京工人体育场)

陈毅的讲话（大意）

亲爱的同志们:

今天周总理来看望大家，刚才绕场一周以后，周总理走了。肖华同志让我来讲话，我没有准备好。我首先问大家好，向大家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最高指示。你们到北京来，都是最关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底究竟在什么地方? 有些同志有底，有些同志就没有底。我们今天摸个底好不好? 有些人就没有个底，逐步升级，没有个底，我讲这个话，有些人不爱听。你们不要反感，要好好听听，有道理的。把社会主义建设好是一个底，共产主义社会是个底。几十年几百年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有更高级的社会组织形式，人们还要继续奋斗。新的组织形式、更高的要求还会出现，那个时候还要奋斗。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是破四旧、立四新，把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彻底打垮。这就是底。这是可能的，有客观条件的。如果超过这个条件，就是空想，就是没底。没有底干革命，凭主观空想干革命，就一定要犯错误。

我最近两次陪着毛主席接见外宾（几内亚、赞比亚副总统）。两次毛主席都讲：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对国民党留下来的教育制度可能有所触动，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也可能触动不多。我介绍主席和外宾的讲话是真实的，不是假的。这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亲口讲出来的。旧的教育制度触动一下，效果怎么样，还很难说，还要看一些时候。有的同志听了这些话不过瘾，我听了是最过瘾的。主席的两次讲话是实事求是的，是最过硬的，最革命的。用我们红卫兵的话来说，就是最最最最最革命的。革命就要办得到，办不到有什么用? 明天可能办到的就办嘛，作战计划要可行，要办得到，办不到，指挥官就没有威信。一位外宾很赞扬我们，称赞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说回去也要造反，也要成立红卫兵。毛主席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对高等院校有所触动，教育制度有所改革，就不错了。你们停课闹革命，到明年五月、七月至迟九月复课。所有问题放到这次文化革命中解决是不可能的。今天到会三万多人，几十个院校，每个人的问题都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解决行不行? 我看不行。几十个单位，每个单位都解决我看不行。谁也没有这个本事。把主要的问题，带根本性的问题解决，是可能的。大家的思想要集中，要把主要问题解决。我们军事院校要革命化，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搞好院校之间的关系和革命师生关系，教育制度革命化。思想革命化的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也就解决了，三万多人的根本问题就解决了。我的要求不高，但不是降低你们的要求。

上次七、八万人在这里开会，上次叶副主席讲话，有人不爱听，反映很坏，说泼了冷

水，要批判，要揪出来批判。光听好话，说这好，那好，伟大又伟大！伟大的很！这不好。我们共产党员，革命战士，就是要听逆耳之言。有不少领导干部就是不听逆耳之言。在这次运动中整得好苦，这是活该的。要听不同意见，要听逆耳之言。我的讲话是有意得罪人的，整天讲干劲如何高呀，天气怎样好呀，成绩如何大呀，伟大、伟大，这有什么好处？这不好。这说明陈老总不老实，见到问题不讲，看到有同志犯错误也不帮助，这不是共产党员的态度。我们要集中力量解决军事院校的教育制度，要学习毛泽东思想，政治挂帅，把我们的战斗力提高。过去继承国民党、苏联的一套。当然我们有创造，但创造的不完全，要靠大家想办法。苏联那一套。不好。林彪同志领导军委六年，有了改变，有了一定的基础。现在毛主席亲自发动、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全中国全世界树立榜样，这是最伟大的创举了。现在有些做法是不行的，揪住工作组不放，揪住那一个人不放，揪住一个人的一句话不放。而把根本的目的忘了，对文化大革命很不利，浪费了很多精力，很多时间。毛主席的讲话对我们很有触动。同志们：这个敌人是强大的，是厉害的。旧的教育制度是很顽强的，你们是受害者，我们也是受害者。后来我们跟着毛主席挣扎出来了。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解决改革教育制度的问题。大专院校、军事院校，要分工、专门搞这个东西。

党中央和毛主席原来的计划是一斗二批三改。现在斗得很长，批也批不起来，改也改不起来。你们递了很多条子，有给周总理的，有给叶副主席的，有几百个问题几千个问题，但是，都没有抓住主要问题。打仗也没有这样打的，打仗也要一个一个地打。要有个次序嘛！夺取城市，沈阳、南京、上海、北平，一下子把它吃掉是不可能的吧！我们军事院校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就是斗批改。根据毛泽东思想，创造一个新的教育制度，培养更多的人材，这是古今中外一直没有解决的。林彪同志几年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们军事院校是有基础的，地方上大专院校和我们军事院校不一样，他们比我们还要苦一些。我们是在林总的直接领导下的，不能把地方上的搬到军事院校上来，也不能把军事院校的搬到地方上去，可以相互交换经验，但不能抄袭，地方学校有地方学校的做法，军队、地方总有区别。把地方学校放假闹革命那一套拿到工厂里去停工搞革命，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是很危险的。大专院校可以放假，工厂怎么能够放假呢？工厂停工了，国民经济就瘫痪了，这怎么行呢？有些大专院校到工厂串联。不知道利害。去农村串联，农村的生产不能停，停了就不能丰收了。工厂、农村不能象学校一样搞文化大革命。军队有军队的搞法，军事院校有军事院校的搞法，军委机关、各军区、军兵种有自己的搞法。同志们，讲多了。可能误会，说陈老总又来那一套，又来划框框，定调子，束手束脚，东也不能动，西也不能动。别的我不敢讲，几个框框总要承认的。一个是不能离开毛泽东思想，离开了就变成无政府主义。再一个，你总不可能离开地球，人造卫星要上天，还是要回到地球上来的。

我管外交部，大家出了十一万多张大字报，看起来好厉害，什么"罪魁祸首"，"滔天罪行"，"没有好下场"，"一切严重后果由你负责"，"挑动群众斗群众"，"四十八小时内回答"，看起来吓死人。实际上没有打中要害。真正的要害是什么？真正的要害是各单位要解决各单位的问题。把真正的黑帮揪出来，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揪出来。

现在的斗争，我非常耽心。我也不是害怕，反正有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顶着，还有人民解放军，天塌不下来。但我说老实话，我不能不耽心。现在有些人不是斗真正的黑帮，不是斗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在那里扭着自己的同志在斗！每个部都在斗他们的部长，每个单位都在斗他们的首长，抓住一句话就斗。真正的黑帮，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却不去斗。真正的黑帮，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那里坐山观虎斗。我很耽

心，这样下去文化大革命搞不好，斗争的目标很不明确。不要把工作有错误、缺点的也当成黑帮，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去斗，要区别，不同对待。

我上次讲过搞路线斗争，我再讲讲这个道理。我作为一个过去犯过错误的老同志谈自己搞路线斗争的体会，介绍一点经验，很必要。什么是路线斗争？路线斗争怎么斗法？一讲黑帮，所有的都是黑帮。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有的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有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打击面太宽、太大。以前我们就犯过这样的错误，同志们，所有军事院校的负责人都是黑帮，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果这样看，你们想一想，你们把毛主席放在什么地方？把林副主席放在什么地方？把共产党放在什么地方？这就否认了毛主席的领导，否认了林副主席几年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否认了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否认了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否认了解放军的光荣传统。黑帮有没有？有，有大的也有小的，总归是少数。我们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和群众，共同对敌。这样就不会伤害好人。再就是路线的问题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没有？有，和毛主席的红线是对抗的。但在我们干部中、在领导干部中，也是少数。对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的批判，也要区分。要根据陈伯达同志的分析，区分有提出的。有坚决执行的，有盲目执行的，有轻的，有重的。有纠正得快的，有纠正得慢的，有继续顽抗的。一般说来，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他们同党同群众的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欢迎他们改正错误。这样搞路线斗争非常必要。不按这种科学的分析，就扩大化、简单化，就打不中目标，就不能达到中央的要求。我年轻的时候犯过错误，就是路线斗争扩大化，简单化，认为斗争非常简单，用简单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扭着谁，第一次检查不深刻，第二次检查不老实，第三次……第四次不触及灵魂，第五次要阴谋，反正检讨死也过不了关，最后还搞武斗，过去用枪毙的办法。当时毛主席不赞成扩大化，毛主席指出要分析，说要分主要问题次要问题，是认识问题还是别有用心、是政治问题还是生活问题。我们应该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共同对敌。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真正的黑帮、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真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极少数，这样不会伤好人，不会伤可以改正错误的人。

你们今天来开会的同志的单位，有些我没去过，没有调查。我接触过一些同志，他们造反的搞法，我是不同意的，没有打中要害，打中了同志，他们的作法就是简单化，扩大化。我对他们讲，你们的作法不纠正，我交班也不交给你们。现在你们大学还没有毕业就这样凶，将来掌了大权，还不整死人？现在大学没有毕业就这样凶，将来还了得呀！我就是这样讲话，刺激人。老毛病改不了，就是这个样，有什么办法呢？这是老实话，真话。

搞路线斗争、不要简单化、扩大化。要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要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也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主要是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改正错误。可以提意见，可以作路线斗争，路线斗争完了，还在他的领导下好好工作。这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最重要的是顾大局识大体。毛主席最顾大局，所以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度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要识大体顾大局，抓大的问题。不要计较小事，不要丢掉西瓜，抓住芝麻。毛主席能和反对过他的人共事，他被人赶下台。他沉得住气，等群众觉悟了，请他上台。他和反对他的人合作，不是一上台就报复，这样伟大的气魄我们不可比，可以学。亲爱的同志们，你们才二十几岁，起码还能工作几十年，我们却干不了多少年了，今年我都六十六岁了。我们不要怕吃亏。你们要知道，讨小便宜、斤斤计较的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这是老实话。我见得多，这个话你好好听听。你不听，"我贴

你的大字报"，这一点就不好，就不象一个解放军的样。人民解放军就是顾大局的。他们拿自己的生命掩护老百姓，在生命的关头能冲上去，牺牲自己，把好事让给人家，把困难留给自己。雷锋、王杰就是这样的同志。"好！陈老总你今天讲话是个大阴谋，我要识破你的大阴谋，你要封住我们的嘴，不让讲话，当奴才。"同志们不要误会，我没有资格封你们的嘴，你们可以贴大字报。我作为一个同志讲这些话。

另外，看到错误思想，牛鬼蛇神到处泛滥，不表示态度，看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敢说话，那也不是真正的革命造反精神。也不能当解放军。我们看到青年人有革命造反精神，得到很大的安慰，感到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了。要鼓励这种精神。怎么鼓法？要提高到毛泽东思想的新的更高的水平，提高政治水平，不能降低，不去争吵一些枝节问题，与文化大革命无关的事情。要打得准，打中要害，把革命造反精神提高到毛泽东思想的水平。你们可能把这个水平降低。

一九六五年爆炸了原子弹。尖端技术解决了许多，副食品供应很好，有人说，搞文化大革命没有必要。搞得伤了感情，人们的关系疏远了。搞文化大革命没必要。乱，影响生产，搞得学生不好管，多数派和少数派打、吵。对文化大革命采取否定的观点是不对的。坚决反对，要严厉地批评。

文化大革命搞起来，才几十天，各种大字报都出来了，各种思想出来了，各种思潮出来了。象总理说的，文化革命中各种思潮都涌现出来了。五月以前的平静局面是不可靠的。现在才是真正的情况，把灵魂深处的东西都暴露出来了。不怕乱，有乱有治。通过文化大革命，通过乱，才能真正地治。过去的治也是不错的。但是不牢靠，这一乱，治就更牢靠了。只有毛主席，才敢这样干，放假闹革命，免费乘车来北京，敢于组成红卫兵。敢于检阅一千多万红卫兵，敢于让各种思想都涌现出来，敢于让大字报贴到王府井。毛主席有这样伟大的气魄。我赞成革命造反精神。我是老造反，但是我更想把造反精神提高到毛泽东思想的水平上。我讲的可能不完全，可以批判。上次我讲了，有人要批判我，要我参加，只要我有时间，我愿意去，但是我把你们批倒还是你们把我批倒，还很难说。同志互相帮助么！希望我的话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对就行了。我就讲到这里。天太冷了。

今天又有大标语，说要见毛主席。昨天有一万人开会也要见毛主席，前天也有人要见毛主席。你们的要求我们可以转达。大家要见毛主席是正当的。但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已经接见了来京串联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一千多万了，不准备接见了。你们的要求可以转达，但是要关心毛主席的健康，你不要认为正当的要求就可以实现，七亿人民都要见他怎么办？现在外交战线上最难办的是要见毛主席，外宾一下飞机就要见毛主席。"五分钟看一眼就可以"。我们给他们解释，尽量给他们安排，有的见上了和毛主席握了手，回去两三天不洗手，有的没见到，走的时候说："很遗憾，没见到毛主席。"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讲错了，欢迎大家批判。上次讲的话有讲过头的地方，有讲早了的，放到今天讲就合适了。我这个人就是经常犯错误，经常改正的。

叶剑英的讲话（大意）

同志们，同学们：

我本来不打算讲话了，大家递了很多条子，肖华同志要我讲一讲，我就讲几句。刚才成都军区战斗文工团交来一封信，信中说，他们用了最大的努力，冲破了重重障碍到北京来

了，他们对成都军区的作法和对革命的压抑表示不满和反对。这种敢于造反的革命精神很好。我很支持你们。还有一些条子。我念几个："陈毅副总理的讲话有严重错误。造成了新的阻力——红色造反纵队"，"军委统帅是毛主席。副统帅是林副主席，你有什么权力来代表军委、代表全体同志，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还有一张："敬爱的叶副主席，——好啊，又敬又爱——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求为李基才恢复名誉"。这不好办，怎么恢复名誉，能在人民日报发表么？不行，这个问题让我们思考吧！我在这里也不能向他道歉，因为是他自己要求我宣布的，我是按他的意见办事的，恢复什么名誉呢？这是小资产阶级面子在作怪，这种面子要不得。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同志们，这是谁讲的呀？（群众高喊：毛主席讲的）对，我考考你们。问题就是这样，言者无罪啊！毛主席讲过这句话没有？（群众：讲过）对！我和大家都是一样，都是解放军的工作人员。我把我自己的意见讲一讲，也许明天又来大字报了，来大字报也不怕，我还要讲一讲。

同志们，全国有一千一百多万革命师生来北京串联，主席八次接见。主席对青年一代寄予殷切的希望。我们继续革命，革命到底，使我们的国家不变颜色，建成共产主义，要靠年轻一代。伟大的希望就是你们年轻的一代。主席以最大的热情接见年轻的学生，有人怀疑为什么只见学生，不见工农兵，这不对。主席为什么接见年轻的学生，没接见工农兵呢，大家要了解青年学生现在的地位和将来的地位。他们现在是学生，不是工农兵，但将来不是工，就是农，再不就是兵。千百万学生都是工农兵的苗子。要想果木好，必须先把苗子培养好，苗子培养不好就经不住冰霜。把学生的革命化和战斗化搞好，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当工农兵就更好，更能革命，他们将来就比我更强一些。因此主席用最大的革命热情来培养苗子，把年轻一代培养成能革命，能战斗，不受旧社会沾染，不变颜色、树立新的习惯的作风的一代。这是一项伟大的、长远的、重要的任务。因此，大家不要误会，毛主席只接见革命学生、不接见工农兵。这样看是完全不对的。这是指一般的学生、我们军队院校和地方院校有什么不同呢？你们和地方学生不一样，你们已经是步兵、炮兵、装甲兵、海军、空军了，是更加有明确的目的来培养。国家拿出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培养你们，你们培养得好不好，是好成品还是废品，这不是你们个人的问题，是全军的问题，是关系到解放军的战斗力的问题，是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能否巩固的问题。你们和一般院校不同，因此不允许有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军队院校中，违反毛泽东思想。违反我军光荣传统，失掉表率作用。这决不允许，这是不忠于毛泽东思想的表现。我们对此放任不管，就是失职。

我们的军队是伟大的、战斗的，我们院校的绝大多数师生是革命的，是好的，但也有少数是不好的。有那么一小撮人坐上火车就不管别人了，上了火车不让红卫兵上，红卫兵砸了门进去了，一上车就说："你们这些解放军不能学。"还有人跑到上海要住大房子，要坐小汽车、吃好的，把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忘了。我们的最高统帅是毛主席、军委主席也是毛主席，但是一小撮人煽动一部分群众到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办公的地方猛冲、猛打，这行么？你们如果不改，就是废品，将来不能用的。有人说我又挑动群众斗群众，不是！我不敢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样的人不是群众，是废品，要洗刷！有人冲我们的国防部，这是个大错误，严格讲是反革命，还有比这严重的错误么？你们说是不是啊？（群众高喊："是"！高呼："毛主席万

岁!”“誓死保卫毛主席!”“把坏家伙揪出来!”)我不是发脾气，我与同志们远的无怨，近的无仇，又不认识谁是张三李四。我敢告诉你们，有一个转业军人，不是学生，五十多岁了，站在你们的后边指手划脚在指挥，这种人要揪出来。(群众高喊:““把他揪出来!”)有的人父亲是黑帮自杀了，有的父亲在台湾，他要报仇，这样的人也当革命群众行么?我们大多数同志不要受他们欺骗了。要赶快回头。我们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继续革命，只要他认识错误，能够检查，改进错误，就和大家一样，就欢迎他，希望他们改正，这不是群众斗群众。我是苦口婆心，你们要搞好斗、批、改，你们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把本单位的斗、批、改搞好。我们要培养真正突出政治，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人。我们搞好文化大革命。准备打仗。

李基才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究竟怎么样不知道，但事实俱在。

周恩来给吉林师大红卫兵组织的一封电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来电均悉。关于赵林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电复东北局并吉林省委，请他们向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和其他革命同学说明:“他们揭发赵林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希望你们按照中央上述电示执行。如果你们还发现新的材料和线索可以继续查清，并将新的材料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希望你们不要在群众大会上公布和追查，也不要散发传单，涂写标语。

中共中央、国 务 院
关于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
革命串连问题的补充通知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

十一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第八次接见了二百五十万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这是明年春暖以前的最后一次接见，是三个多月以来革命师生进行串连和学习的一次胜利小结。

中共中央、国务院十一月十六日通知中规定，在今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到明年春暖季节，全国各地大中学校、军事院校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

北京和到各地进行革命串连，现将一些具体问题补充规定如下：

一、十一月二十六日以前到北京的外地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必须妥善安排，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按免费乘火车次序，完全离开北京返回原地。从十二月二十一日起，在北京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吃饭、乘火车和汽车，不再实行免费。

二、所有在外地进行革命串连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在北京的按前条办法），也必须妥善安排，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返回原地。从十二月二十一日起，乘火车、轮船、汽车，不再实行免费。

三、解放军派出的人员，对已被接见未离开北京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仍应继续进行政治、军事训练，传播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并应热情地帮助他们安排好参观、学习以及尽早离开北京返回原地的计划。要对他们负责到底，直到把他们送上火车，欢送他们返回原地。

四、凡返回原地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一律开给直达票，中途不要停留。必须在北京车站中转的，也要开给直达票，按照车票上规定的车次乘坐返回原地的列车，不要延误。

五、徒步长征来北京和到各地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的接待办法另定。

这一通知可在各地大中学校革命师生中宣读，并在机关、学校、车站、码头张贴。

中央军委转发毛泽东、林彪同意南京军区党委紧急请示中的三条意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

毛主席、林副主席同意南京军区党委十二月一日来电中所提的三条意见，批示通报全国同样照办。现将南京军区党委的原电转发你们，望遵照执行，并请转告各中央局、各省市委。

南京军区党委三条意见

（一）一切转业、复员军人不准成立红卫军或其他名义的单独组织，只应参加所在单位的文化革命组织。

（二）不准许冲进解放军机关及所属部队，也不许到部队串连和散发传单。

（三）所有转业、复员军人，必须保持和发扬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并协助解放军加强战备，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南京军区党委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

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

（这一文件发至县、团级和工厂企业、事业、科研、设计单位，供讨论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日）

一、坚决实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带动生产的发展。

二、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按照十六条办事，由群众选出能够代表自己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会议，让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三、八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除了每周一次讨论生产问题以外，都由群众自己商量安排，进行文化大革命。

四、坚持八小时工作制，遵守劳动纪律，完成生产定额。

五、保证产品的质量，力求高质量。

六、由工人群众认真讨论，健全或者改选领导生产的班子，这个班子，对国家生产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担负责任。

七、有问题，要在本单位协商解决。必要的时候，工人群众可派少数代表到上级机关（包括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大区中央局）反映，特别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派少数代表来京反映，不要大批离开厂矿。

八、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许厂矿领导因为群众提出批评，揭露事实，而实行打击报复，不准因此克扣工资，不许开除。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工人，必须平反。不许调动原来的生产位子，不许对工人家属进行威胁迫害。被打击而被迫离开工厂的革命工人，必须允许他们回厂参加生产，参加文化革命。革命工人被迫离厂时的工资应该照发。

九、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的规定，工人群众在文化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

本单位或本地方工人群众之间，工人组织之间，彼此有意见，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讨论，不要被坏人利用，不要造成对抗的形势。坚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

一切工人组织，都应当保持工人阶级劳动朴素的本色，不要搞一套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机构和物质装备。工人组织中的工作人员，一般都不要脱离生产。

十、各单位工人群众之间、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革命串连，交流文化革命经验。

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连，交流革命经验，还可以有计划地和工人一起上班，一起劳动，一起学习，一起讨论文化革命问题。工人也可以派代表到

本市学校进行革命串连。

一切革命串连，都不要包办代替，强行干涉其他单位的文化革命。

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王 力 贾一学 李 鑫

我们当前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这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新时代。尖锐的阶级斗争，在国际范围内，在各国范围内，在资本主义世界，在社会主义世界，都以不同的形式炽烈地进行着。各个阶级、各种政治力量的斗争，是十分错综复杂的。斗争的中心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国家政权问题。

列宁说过，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他还说过，谁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保证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取得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法宝。对于无产阶级说来，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从来都是识别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者的试金石。

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国家政权问题，在无产阶级没有取得政权的资本主义国家，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在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取得政权以前，要坚持暴力革命的原则，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武装夺取政权。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防止修正主义者篡党篡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卫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过去，人们往往认为，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政权问题就已经解决了，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改造旧经济、组织新经济，搞建设，搞教育，没有认识到，国家政权还可以被资产阶级夺过去，无产阶级还可以丧失政权，无产阶级专政还可以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由于铁托集团的叛变，南斯拉夫早就由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以后，在列宁主义的故乡，又发生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党篡国的事件，使进行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走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这个严酷的事实，不能不引起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极大的注意，认真地加以思考。

毛泽东同志不断地研究和总结了中国的和国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的新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

毛泽东同志天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创造性地运用到社会主义社会，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性质和发展规律。

毛泽东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存在着矛盾的，存在着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承认这两类矛盾，正

确地认识和处理这两类矛盾，才能不断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前进。

毛泽东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建立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的，在整个社会主义这个很长很长的历史时期，贯穿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贯穿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动力。

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如果不引起警惕，不采取必要的措施，也就存在着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危险，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故意抹煞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的事实，矢口否认苏联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赫鲁晓夫是这样，赫鲁晓夫的门徒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谢列平也是这样。

他们这种社会主义社会无矛盾的谬论，是为了维护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和特权阶层的利益，为了维护他们对苏联人民的反动统治。他们否认苏联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正是他们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武器。实际上，他们自己牢牢地站在资产阶级方面，镇压无产阶级，对苏联人民进行残酷的阶级斗争。他们用没有阶级、没有阶级斗争的说法，作为实行所谓“全民国家”、“全民党”的根据，来欺骗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掩盖他们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叛徒行为。他们完全背叛了伟大的列宁和斯大林。他们最害怕的是苏联人民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造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同他们展开阶级斗争，推翻他们的统治，重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同志经常引用“树欲静而风不止”这句话，告诉人们，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你想避免也避免不了。你不斗他，他要斗你，你不消灭他，他要消灭你。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不能否认阶级斗争，逃避阶级斗争，而应当领导无产阶级，根据阶级斗争的规律，因势利导，在政治战线、经济战线、思想文化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粉碎资产阶级复辟的阴谋，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为了避免资本主义复辟，进一步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

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这条反动路线，实质上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它在党内是有一定市场的，这就是那些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或者没有改造好的人。而党内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则把这条路线，当作他们的护身符，乘机兴风作浪。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上最深刻的阶级斗争。反映在党内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也是在我党历史上最深刻的斗争。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通过各种渠道，把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搬到社会上来，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交织在一起。

文化大革命每前进一步，都经过激烈的斗争，都经过克服社会上和党内的各种阻力。几个月来，广大革命群众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这是一次最大规模的关于两条路线问题的大辩论。通过这场大辩论，使广大群众和革命干部，提高了阶级觉悟和思想水平，更加自觉地拥护和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尽管极少数顽固坚

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不断变换手法，采取新的花样，来对抗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但是，随着势不可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向前发展，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断遭到破产和失败。

在半年的时间里，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洪流，冲刷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垢，使我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化。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一场真正的大革命，引起了阶级关系的大变动，触动了人们的灵魂。无数的新事物从地平线上冒出来，使得一些人眼花缭乱。但是，如果掌握社会主义社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和主要特点。

第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内阶级斗争的必然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的高级的阶段。

我国的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在经济战线上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紧接着，粉碎了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进行了一场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随着全国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日益突出起来了。

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利用他们还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占有相当的优势，利用旧的意识形态和旧的习惯势力，来腐蚀群众，欺骗群众，蛊惑人心，扩大阵地，制造复辟的舆论。

毛泽东同志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

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和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了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第二，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规模最大的革命的群众运动。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极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改造人的灵魂，促使人的思想革命化的大革命，必然触及到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个领域。这样的大革命，只有依靠亿万群众自觉地行动起来，才能搞深，搞透，搞彻底。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特点，就是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把亿万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贯穿着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却反对群众，反对革命，反对和压制革命的群众运动。

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懈地进行斗争，群众运动的浪潮，就一浪高过一浪。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许多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敏锐和勇敢，就在于当这些新事物刚刚萌芽的时候，给予有力的支持。

红卫兵，就是这样的新事物。在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的支持下，一小批红卫兵迅速地在全国各学校、许多工厂和农村发展起来，成为浩浩荡荡的群众革命队伍。他们敢想，敢说，敢干，敢斗争，敢革命。他们干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

广大的革命群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人。坚定不移地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

已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就出现了声势浩大的、千军万马的、锐不可挡的革命的群众运动。

第三、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防止反革命修正主义篡夺领导的斗争，是无产阶级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亿万群众自觉地行动起来，大破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正在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正在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我国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击的重点，就是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钻入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赫鲁晓夫式的坏蛋，是埋在我们党内的定时炸弹。一旦时机成熟，就会爆炸，就会发动赫鲁晓夫式的政变。

在这场大革命中，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陷入群众运动的汪洋大海。他们被揭露出来，被斗得威风扫地。这就有力地打击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一方面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方面要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斗争。这是一场极其激烈、极其尖锐、极其深刻的阶级斗争。

第四、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大民主的新经验，创造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新经验。

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毛泽东思想统帅下的大民主运动。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支持广大革命群众的创造，支持革命群众广泛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这些大民主的形式。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国家机器的各个环节，群众都有权提出批评和建议。各级领导干部，不管他功劳多大，地位多高，资格多老，群众都可以批评。领导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一律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实行全面选举制，群众对被选的人员，有随时改选和撤换的权力。在群众之间，在各个群众组织之间，也要实行大民主，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来统一认识、统一思想，提高觉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种大民主，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方法。

我们所实行的大民主，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高度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是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新发展。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就不可能实现人们灵魂深处的大革命，就不可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没有这种大民主，没有亿万群众关心国家大事，监督党和国家机关，监督各级领导干部，就不能防止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就不能防止无产阶级专政演变成资产阶级专政。

同时，无产阶级专政是大民主的保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有人民群众的大民主。正因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的，所以敢于和能够实行这样的大民主。

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正在我国形成。

第五、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培养和造就一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打下了

基础。

我国已经有了一批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但是，这一方面的工作做得很不够。一些学校，还没有打破或没有完全打破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框框。一些文化领域里的阵地，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而在资产阶级手里。

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彻底改变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统治这些阵地的现象，夺取和巩固文化领域各界的领导权。

经过革命的大风大浪的考验，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正在发展和壮大。革命的青少年和红卫兵，正在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正在无产阶级革命化的道路上前进。

许多革命干部和革命青少年，正在按照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可靠的接班人。

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要把全国办成为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工、农、兵、学、商和机关干部、都要以本行为主，兼学别样，逐步做到能文能武，亦工亦农，成为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第六，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

毛泽东同志指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有力地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打破一切不合理的旧框框，废除一切陈规陋习，进一步解放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挥工农群众和科学技术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工农业和科学研究事业的大发展，创造了新的有利条件。

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下，工厂和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可以预见，广大工农群众和革命的科学技术人员，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扬起来的冲天的革命干劲，一定会用到工农业生产和科学实验的斗争中去，引起我国国民经济的大飞跃。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保证我国的建设事业沿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方向大踏步地前进。

第七，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反对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上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坚持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就必须在国内坚决反对修正主义，坚决反对“和平演变”。

我们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是同国外阶级敌人互相呼应的。他们积极为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效劳。他们要做的事情，正是赫鲁晓夫在苏联已经做过的事情，也正是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希望他们做的事情。

我国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打破了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我国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幻想，这是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沉重打击。

我国这场文化大革命，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是做好粉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侵略战争的最根本的准备。广大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青少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的后备力量。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个永不变色的社会主义中国，将更有效地进行反对以美国

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反对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更有力地支援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更好地完成我们光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

第八，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发展。

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从来就是在反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在反对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在破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我国亿万群众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彻底批判，必然带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发展。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国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大学大立毛泽东思想，开辟了劳动人民直接掌握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纪元。亿万劳动人民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武器，来观察世界上的一切问题，来批判旧世界，来斗争，来革命，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对于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世界革命人民，同声赞扬。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谢列平之流的叛徒、伙同约翰逊、腊斯克之流的帝国主义者，切齿咒骂。他们开动了全部的宣传机器，用最恶毒的语言，掀起了反华歇斯底里，大肆攻击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些反动家伙为什么这样暴跳如雷呢？就是因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燎原大火，不能不传布到世界人民中去、不能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发生巨大的影响，不能不冲击和震撼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摇摇欲坠的统治。史无前例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响亮地敲起了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丧钟。

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新头目，现在都赤膊上阵，扯下了骗人的假面具。这就进一步暴露了他们同赫鲁晓夫是一路货，他们比赫鲁晓夫更坏。这就必然激起苏联人民进一步起来反对他们。这样，他们自己就加速地走向赫鲁晓夫那样的结局。

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当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候，当马克思主义取得历史性的胜利，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时候，全世界的牛鬼蛇神就要联合起来，进行疯狂的反扑。

马克思主义刚在欧洲诞生，并开始被工人阶级所掌握的时候，敌人就感到了巨大的威胁。当时，欧洲一切反对势力，都联合起来，结成反马克思主义的“神圣同盟”，妄图驱逐这个在欧洲出现的“幽灵”。当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并取得十月革命划时代胜利的时候，正在互相厮杀的一切帝国主义分子，为帝国主义效劳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英雄”们，各国的工贼和叛徒们，又都联合起来，结成反列宁主义的“神圣同盟”，张牙舞爪地对列宁主义进行围攻。现在，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世界各国的反动派，一切新老工贼和叛徒们，又都联合起来，拼凑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神圣同盟”，妄图抵制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的传播，妄图阻挠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

历史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英雄好汉”们，反对列宁主义的“英雄好汉”们，一个个的都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现在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英雄好汉”们，将失败得更惨。他们的叫嚣，只不过是垂死的疯狂挣扎罢了。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国人民积极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正在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国人民，是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可靠最根本的保证。用毛泽东

思想武装中国人民，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于全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也具有伟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原载《红旗》杂志1966年第15期）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

（供讨论和试行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一、坚决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狠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

二、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前十条、二十三条的原则进行。必须是群众当家作主，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一般不派工作队。可以考虑派些少而精的观察员。

三、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

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在文化大革命中，解决四清问题和四清复查的问题。

大破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

文化大革命也要纠正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贯彻实行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

四、在农村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坚定地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逐步做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

五、领导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是贫下中农文化革命委员会，由贫下中农大会民主选举产生，如不称职，可以随时改选或撤换。

经过群众讨论，健全或改选领导生产的班子，负责生产、分配、收购、供应工作。

六、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和发展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红卫兵可以参加民兵。

在农村中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子女，一般不要担任红卫兵的领导职务。

在外地工作和学习的地富子女，不要回原籍进行串连。要像土改时那样，采取回避政策。

七、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的空闲时间，进行串连。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

连，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参加农村文化大革命，但不要包办代替。

在斗争中，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坚持文斗，不要武斗。

防止坏人挑起宗派斗争。

八、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向领导上提意见、贴大字报的革命群众，不许打击报复，不许扣工分。因为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破坏分子”等的革命群众，应当平反。

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专政的对象。绝不允许他们造无产阶级的反。绝不允许他们造贫下中农的反。

九、中等学校放假闹革命，直到明年暑假。半农半读大中学校的文化革命，应当按照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根据具体情况，妥善安排。

农村小学的文化革命，和所在社、队一起搞，由所在社、队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

十、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经过文化大革命，把农村变成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林　彪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因些，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国人民的头脑，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是我党政治思想工作最根本的任务。广大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都必须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做到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为了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要反复学习毛主席的许多基本观点，有些警句最好要背熟，反复学习，反复运用。在报纸上，要经常结合实际，刊登毛主席的语录，供大家学习和运用。几年来广大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证明带着问题选学毛主席的语录，是一种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好方法，容易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为了帮助广大群众更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我们选编了这本《毛主席语录》。各单位在组织学习的时候，应当结合形势、任务、群众的思想情况和工作情况，选学有关的内容。

现在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出现一个工农兵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毛泽东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毛主席语录》的大量出版，对广大群众掌握毛泽东思想，推动我国人民思想革命化，

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措施。希望每个同志认真地、刻苦地学习，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原载1966年12月17日《解放军报》）

江青、陈伯达、康生等接见"全国红色造反者总团"部分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晚）

江青（询问了每个同志的姓名、工作情况后说）："毛主席是支持你们的！"

全红总代表（齐声高呼）："感谢毛主席！""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代表："感谢中央文革领导首长对我们的亲切关怀！"

江青："我们今天是来听听同志们意见的，你们不要叫我们首长，我们都是革命同志，叫名字算了，大家谈一谈吧。"

代表："现在合同工制度，把工人阶级分为两个阶层，制造差别，分化瓦解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不仅束缚工人群众革命积极性，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繁殖修正主义种子，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这个修正主义制度把几千几万工人的政治权利完全剥夺了。这个制度是刘少奇一九六四年八月到河北等各地视察做报告后，劳动部根据其报告做出合同工、临时工制度的规定，在全国执行。"

江青："刘少奇嘛，也是国家主席啦，但是要看是什么样的主席？刘少奇老婆的父亲是接收大员，刘少奇的老婆是个大资本家，就是根据他老婆那一套搞的。"（接着江青让人马上打电话命令劳动部部长和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参加会议。）

江青："什么劳动部长，劳动部长不劳动，让他们当科长去吧！"

姚文元："最好让他们当合同工。非造这个反不可，这个制度就象资本主义对待工人一样！"

（代表们谈到有人招合同工和转正合同工，全靠拉私人关系时）

江青："这是拉裙带关系。""这完全是资本主义的一套，保留一定数量的雇佣工来减少资本的支付。"

代表："彭真在北京组织了一个大合同工队伍……。"

江青："你们这些同志，完全可以斗争彭真一次，这是他一次罪状，封建主义也不能比这个制度残酷！（非常气愤地）等他们来了（指劳动部长和全总书记）让他们靠边站。合同工就是没有前途吗？真是气死人啦！都让他们（指郗、李、王）当合同工去。你们去雇他们。"

代表："现在有的单位搞破坏、耍阴谋，如中国科学院在二十五日决定，把本单位合同工转正，用转正来瓦解工人斗志。"

江青："你们不要他们转正，合同工要革命！"（这时劳动部两个部长和全总书记王志杰进屋，戚本禹命令他们站到座位后边去。）

江青（问王志杰、郗占元、李正亭）："你们是干什么的？"

郗、李："我们是劳动部的。"

王："我是总工会的。"

陈伯达、江青："你们认识他们吗？"（指工人代表）

王、郗、李："有的认识。"

江青："我们听到同志们反映合同工制度，是你们发明的？还是你们刘少奇发明的？这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旧制度。你们不为工人服务，还是回家的好。"

代表："与全总签订的'六条'意见，把'不得借口解雇'，改成'不得无故解雇。'这是个阴谋。"

江青："这是个政治事故，应该追究政治责任的。北京市的反动势力是很严重的。你们这些搞劳动部的、工会的，算了吧！"

陈伯达："你们和这些代表签了字的材料（指在十一月十七日、十八日几次交涉的书面材料）为什么你们又作废了，不承认？"

（王、郗、李回答不出。）

代表："我们昨天（二十五日晚）把劳动部办公地点全部查封了，今天把劳动部所属单位也全部查封了，并向全国各地分团发出电报，把劳动部调配部门全部查封，并决定明天查封总工会。"

陈伯达："封的好嘛！没有这个部，工人照样工作！"

江青："好！封的好！我赞扬你们！"

江青（向劳动部长）："你们工作具体内容都是什么？有多少人员？"

郗、李："有四百多人，工作是劳动力调配，劳动保护，工资制度。"

江青："全国有多少合同工？"

李："说不清楚。"

江青："你们当部长，一天到晚都是干什么的？说不清楚！做部长！"

江青（又问王志杰）："你们工会负责什么工作？"

王："负责教育工人，组织工人。"

江青："你们不为工人办公，不为工人服务，你们既不向中央反映情况，又不给工人解决问题，你们象共产党员吗？你们是不是一个共产党员？"

（代表们即席控诉了在这个反动制度下，工人群众所受的政治上的迫害、经济上的压迫，这个制度就是要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代表们在控诉临时工制度对工人残酷迫害时，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泣不成声。）

江青（含着眼泪）："我流泪不是软弱，是因为看到自己真正同志！我感谢同志们，你们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

（江青、陈伯达等听到了工人的控诉，谈到了这个制度破坏了党群关系，如不废除，我们的国家就要变颜色时，大家都流出了愤怒的热泪，在座的人大会堂招待员同志都痛哭起来。）

江青（气愤地说）："合同工也是无产阶级，也是革命工人！你们这些大部长是怎样对待工人的？照这样下去，工人得到什么前途？什么合同工，简直是包身工！""同志们，这次反

映情况对我们是很大教育。我建议：发给他们每人一枚纪念章、一本毛主席语录。你们把全国劳动分配部门全部扫掉。你们进京工人，全部住到工会、劳动部去，让他们负责吃饭住宿。”（问王、李、郗）“你们听到了吗？”（**王、郗、李**：“听到了。”）“能不能做到？”（**王、郗、李**：“能！”）

康生：“制定合同工制度就是赫鲁晓夫，哪里是什么共产党员。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这是个夺权的大问题，那些不给工人办事的全部给他们解散！”

江青：“同志们，我不知道事情这么严重，对不起同志们！”

陈伯达：“提个建议，你们不要封全总了。你们工人全部住到里面去，你们给他们封了门，他们就没事可干了！”

（代表们在谈到这个制度已经泛滥成灾时，）**康生**：“刘少奇一九五四年到处做报告，是相当严重的问题。今天这个制度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变不变颜色的大问题，是社会主义工厂变不变为资本主义工厂的问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修正主义道路问题，苏联就是一个例子。”

江青：“我建议最近开一次外地来京合同工、临时工的控诉批判大会，今天咱们当家做主了。希望你们回去向大家讲，并组织好，发言时，简单扼要，要说明问题，举出典型的例子，最好不超过半小时。”

代表：“有些单位负责人，对江青同志十二月十八日向广播局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的讲话，不信任，抱怀疑态度。”

江青：“他们都是老爷，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我建议马上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发个通知。”（大意如下：

一、必须允许所有合同工、临时工等，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歧视。

二、不得解雇，必须照发工资。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后解雇的工人，必须允许马上回原单位参加生产，工资补发。

三、现行反革命分子按十六条处理。）

陈伯达、康生、江青（对王志杰、郗、李两部长讲）：“不得挑动群众斗群众，如果发现合同工、临时工群众斗群众，拿你们试问，按党纪国法处理。你们没有阶级感情，你们心中没有毛主席，没有常委，也没有群众。你们欺上瞒下，向中央封锁消息，不管工人，简直罪大恶极！”

江青：“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但我是军人，我们是有解放军的！你们这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地、富、反、坏可优待啦！合同工、学徒工在他们眼里已不是后娘养的了，已经是私生子了。你们现在就是没有父母了！”（意指党中央和毛主席）（**陈伯达**：“就是有剥削！”）

江青（最后对王、郗、李说）：“他们都是毛主席的客人，你们要很好地照顾他们。”

（会后，在“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中，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全红总同志依依不舍地和中央首长告别。）

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总部整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林彪关于浙江问题的重要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二十九日)

林彪同志：此件应转到全军营以上各级机关去。

毛 泽 东
十二月二十九日

十二月二十七日，杜平同志电话向林副主席报告了浙江省军区同浙大红色造反联络站谈判的情况。当天下午五点半林副主席作了重要指示：

"要把对学生的工作当作群众工作来做，这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不但不应当由于这个问题而引起军队与革命学生的对抗，而且应当借这个机会大力加强军队与革命学生的团结。

处理这个问题的原则要重申以下三条：

第一、领导同志要挺身而出，同群众见面，既不能躲，也不能压，越躲越压越糟。

第二、对学生提出的正确批评要诚恳接受，完全接受。自己做错了的，要坦率地进行自我批评。他们合理的要求，凡能做到的要完全做到。对他们的不正确意见和不合理的要求要进行解释和教育。

第三、从头到尾要贯彻对学生热情、友好、耐心的态度。在耐心的问题上军队要做出榜样，听了反面的话，绝对不能粗暴发脾气。"

中共中央、国 务 院
关于制止大搞所谓"红色海洋"的通知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根据各地群众反映，最近城市中有些党政机关部门，借口"写毛主席语录"、"美化市容"等等，大搞所谓"红海洋"，就是用红色的油漆把大门和大片大片的墙涂成全红色，甚至强迫群众挨家挨户出钱。有些农村中除了"红海洋"外，还搞了大牌坊。还有别有用心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想用这个方法使群众没有贴大字报的地方，掩盖自己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他们的这种做法，不但完全违背毛泽东同志历来教导的艰苦朴素的作风，而且是一种抗拒大字报，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恶劣行为。中央认为，各级领导机关必须坚决制止这种错误的做法。

特此通知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毛主席在最近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时，向林彪同志多次提出：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学三八作风，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组织纪律性。驻京部队派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经验很好，很有成效，应当在全国推广。

毛主席的这一指示，给全国大中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增加了新的重要的内容，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创举，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中共中央、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解放军，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从现在起，到明年暑假，派出得力的干部和战士，分期分批地对全国大中学校的革命师生，普遍进行一次短期军政训练。

毛主席早在革命初期就指出，农民武装、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是红军的现成后备军，以后又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一九五八年，又号召"实行全民皆兵"。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给林彪同志的信中说："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并且说："教育要革命"。林彪同志在今年八月三十一日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说："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其他革命的青少年组织，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是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后备力量。"派军队干部战士训练革命师生，是实现毛主席号召学习解放军的一个好方法，是毛主席所说的"教育要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民兵工作"三落实"的重大措施。这样做，对加强战备、保卫国防，对加强革命师生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的锻炼，对有些学生将来参加人民解放军，当解放军战士，对进一步密切军民关系，都有极大的好处。中共中央、国务院殷切希望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大中学校的全体革命师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坚决完成军政训练的任务。

政治训练内容，主要是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和语录。着重学习以下几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学习和时局》、以及《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林彪同志和陈伯达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其他有关文件。有些学生还可以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同时，要学会《国际歌》、《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八作风歌》等歌曲。提高阶级觉悟，灭资兴无，破私立公，懂得党的政策和策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学会做群众工作，军民一致，团结对敌。

军事训练，要进行必要的队列训练，重点是单个到连的队列动作。

训练办法　由各军区、省军区分片包干，派出学习毛主席著作好，能起模范作用的干部和战士，到革命师生中充当排长、连长、指导员、营长、教导员、团长、团政委，负责军政训练。大专院校人民武装部和原来的民兵组织，应积极参加这一工作。各校革命师生应按照班、排、连、营、团的序列进行编组。训练地点在本校。每期训练时间半个月到二十天。

总参、总政设立全国大中学校革命师生短期军政训练领导小组，各省和大中城市，以军队为主，当地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和文化革命小组派人参加，设立大中学校革命师生短期军政训练领导小组，负责指导此项工作。

这种短期军政训练的方法，要长期坚持下去，成为制度。今后每年暑假或寒假期间，各大中学校都要实行这种训练。望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全体革命师生遵照执行。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元旦社论

一九六六年，在我国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最伟大的事件。这个革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这个革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在列宁领导下，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十月革命，解决了用革命暴力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给全世界无产阶级树立了伟大的榜样。但是，当时不可能解决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保持无产阶级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一系列问题。十月革命的故乡，竟然出现了现代修正主义集团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使得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走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这个教训，说明了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成了国际无产阶级的一个新的中心课题。它不仅决定着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命运，而且决定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革命事业的命运。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解决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问题，给全世界无产阶级树立新的伟大的榜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右派和党内的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不甘心剥削制度的灭亡，不断地向无产阶级发动猖狂进攻，妄图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在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的指导下，我们党领导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群众，对资产阶级的挑战举行了胜利的反击。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和它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的一次全面的较量。

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一九六三年、在毛主席亲自指导下，我国进行的以戏剧改革为主要标志的文艺革命，实际上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端。

从一九六五年十月起，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海瑞罢官》的批判，对

"三家村"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对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领导人的批判，为大规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作了舆论准备，打开了道路。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毛主席决定发表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掀起了一个以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重点的群众运动。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揭露了出来，群众把他们斗得威风扫地。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面貌、人们的精神状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个伟大的群众运动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勇敢的革命闯将。

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正当亿万群众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自觉起来闹革命的时候，有一两个或几个在中央做工作的负责人，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机会，抛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他们和那些坚决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负责人，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在他们暂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力图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这些人，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

正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我们的伟大舵手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条反动路线，包庇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跟他们同流合污，镇压革命的群众运动，跟革命群众作对，归根到底，是要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复辟。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宣告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宣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失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这是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的一个新的伟大胜利。

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相结合，就出现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性的批判，出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这个新高潮的重要标志，就是红卫兵运动和革命大串连。

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六七月间，红卫兵刚出现，只有几十个人，当时被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诬蔑为"反动组织"，遭到了打击和围攻。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一发现红卫兵这样的新事物，就立即看到它的无限的生命力，歌颂它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给予坚决的热烈的支持。毛主席的声音，象一声春雷，在极短的时间内，红卫兵在全国各学校和许多工厂、农村发展起来了，成为一支浩浩荡荡的文化革命大军。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上的斗、批、改。革命的红卫兵，大破剥削阶级的四旧，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他们站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前头。他们起了先锋作用。

革命大串连，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支持和倡导的。革命师生在全国范围的大串连，把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连成一片。革命大串连，在全国传播毛泽东思想，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组织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有力地冲击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但是，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主要是资产阶级，还有一批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党内也有一定的市场，这就是一些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干部。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利用这条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和它在党内的影

响，兴风作浪。他们使用阴一套、阳一套的种种手段，对抗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破坏广大革命群众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

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最重要的阴谋诡计，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他们暗中组织和操纵一些受他们蒙蔽的群众和群众组织，压制革命，保护自己，挑起武斗，企图制造混乱。他们还散布谣言，颠倒黑白，把他们暗中所做的这些坏事，加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头上，给革命派戴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帽子。他们继续妄图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指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向无产阶级的革命司令部。

正当我们党按照毛主席的阶级路线，组织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队伍的时候，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却利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口号，蛊惑一批学生，制造宗派，搅乱阶级阵线。这个口号，开始是一些天真的青年人提出来的，他们由于思想方法上的某些片面性，从反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排斥和打击革命干部子女、工农子女这个正确前提出发，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对于这些天真的青年，应该循循善诱地引导他们。我们党，当时就是这样做的。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却别有用心地利用这个口号，欺骗极少数学生（其中有些是没有教育好的干部子女），要把他们引上邪路，来同另一部分学生闹对立。这样一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口号，就成了对抗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东西。应当指出，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个口号，实质上是宣扬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封建地主阶级宣扬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这样的血统论。它是彻头彻尾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

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不但不向群众检讨，不给被他们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假左派、真右派"、"伸手派"等等的革命群众平反，不肯当众销毁那些整革命群众的材料，反而大肆宣扬"秋后算账论"，扬言还要把革命群众当作"右派"处理。这种论调，就是要反攻倒算。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不怕算账的。"秋后算账论"是吓不倒革命群众的。散布这种论调的人，又对党、对革命群众欠下了一笔新账。革命群众对于他们的这笔账，是一定要算的。

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这些形形色色的表演，恰好暴露了他们自己。他们闹得越凶，就越使广大群众认识到什么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识到非起来揭露和批判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可。

这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为什么在一个时候能够蒙蔽一些群众呢？这是因为，他们利用毛主席和党在群众中的崇高威信，他们贪天之功，据为己有，把自己说成是党的化身，把自己的言行说成是党的领导，把相信党说成是相信他们自己。他们还特别宣扬这样一种论调，就是要人们不讲原则、无条件地服从直接上级领导。这种论调，实际上是提倡盲从，提倡奴隶主义，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

早在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从思想上解决王明路线问题的时候,毛主席就指出:

"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事实上，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

坚决接受和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领导，坚决抵制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坚决反对奴隶主义，这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政

治原则，也是组织原则。一切真正的共产党员，都应当坚决地、不折不扣地、无所畏惧地按照这个原则办事，并且正确地向群众宣传这个原则。这个原则，为广大革命群众和广大革命干部所掌握，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会被缴了械。

八届十一中全会到现在，已经四个多月了。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对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做了许多政治思想工作，广大革命群众也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和教育。有些同志已经改正了错误，有些同志正在改正错误。这是应该受到欢迎的。对于那些还不肯改正错误的人，应当大喝一声：必须悬崖勒马！如果他们继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党对群众玩弄两面手法，那就要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合流了，或者证明他们自己本来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次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非常深刻的。几个月来开展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运动，获得了极大的胜利，使得亿万群众懂得了这场斗争的实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放手发动群众，斗垮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革除一切剥削阶级的旧东西。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则要压制群众，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保护一切剥削阶级的旧东西。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旧秩序，一个要革，一个要保，这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

随着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性批判的深入发展，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一步为广大群众所掌握，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一个新局面。这个新局面的主要特点就是：

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革命学生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壮大和提高。有些革命学生走到工厂，走到农村，开始同工农群众相结合。

党和国家机关的革命干部，起来造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负责人的反。

群众运动的规模更大了。斗争的内容更丰富了。在工人中，农民中，学生中，机关干部中，涌现出了更多的革命闯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加孤立了。

我国现代史上的文化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运动开始，发展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发展为革命的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相结合。这是客观的规律。作为我国现代革命史开端的五四运动是这样，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也是这样。一九六七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按照这个客观规律进一步地展开。

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提到全党和全国革命群众面前的政治任务，主要是：

第一、在工厂和农村中，要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大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推动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工厂和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要按照文化革命的十六条办事，坚持让群众自己

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任何人不能包办代替。四清运动要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在文化大革命中，解决四清问题和四清复查问题。

工厂和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极其重要的。工人和农民，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必须放手发动工农群众，斗垮工矿企业和农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铲除一切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旧东西。只有这样，才能把资本主义复辟的根子挖掉。

毛主席在抗日战争初期说过："**只有动员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才能战胜帝国主义，才能战胜封建主义。**"。同样，在今天，只有"**动员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才能战胜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能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要从机关里、学校里和文化各界里，发展到工矿企业和农村，让毛泽东思想去占领一切阵地。如果运动停留在机关、学校和文化各界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会半途而废。

一切抵制在工矿企业和农村中大搞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论调，都是错误的。

有些糊涂人，把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认为一搞文化大革命就要妨碍生产。因此，他们只抓生产，不抓革命。这些同志没有想一想，种田、织布、炼钢是为了什么？是要搞社会主义还是要搞资本主义？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保证我们的经济建设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前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事实证明，凡是文化革命搞得好的地方，生产就有了很大的发展。革命只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会妨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

还有极少数人，他们借口抓生产来压制革命。他们表面上关心生产，其实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乌纱帽，是保存资产阶级的旧东西，害怕革命革到自己的头上来。当着群众起来大搞革命的时候，他们竟然挑动一些暂时受他们蒙蔽的人，停止生产，来对付革命群众。其中有的人，甚至同地、富、反、坏、右勾结起来，进行不可告人的勾当。这恰好暴露了他们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甚至他们自己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者是快要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工矿企业和农村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切阻挡这个潮流的论调，一切阻挡这个潮流的人，都将被革命群众送到垃圾堆里去。

第二，对于学校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大力提倡革命师生、革命知识分子，有计划、有组织地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实行和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

毛主席在一九三九年发表的《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里指出：

"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这是一支几万万人的军队呵！有了这支大军，才能攻破敌人的坚固阵地，才能攻破敌人的最后堡垒。"

毛主席在这里阐述的是一个普遍真理。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青年运动的方向，也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青年运动的方向。

在今天，也是这样："**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

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只有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才能真正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在今天，也是这样：知识青年、学生青年要下厂下乡，去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组织起几万万人的大军，攻破那些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盘踞的阵地，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

下厂下乡和本单位斗、批、改，要作合理的安排。对于前一段本单位的斗争，要作必要的总结，进一步明确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分清大是大非，端正下厂下乡的态度和认识。

下厂下乡，要虚心向工农群众学习，甘当小学生，同工人农民一起劳动，一起学习，一起讨论文化革命问题，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眼睛向下，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和那里的革命群众组织相结合，不要自以为是，不要包办代替。

下厂下乡是完成本单位斗、批、改任务的重要条件。青年学生、青年知识分子，投到火热的工农群众运动中去，使自己的思想得到改造，就能更有力地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能更明确地认清大辩论中的是非。只有工厂、农村彻底实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属于上层建筑的学校和文化各界的革命才能彻底完成。只有了解工厂、农村的实际，听取工人和农民的声音，才能切合实际地改革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学方法，才能有效地改造我们的文化团体和文化工作，真正地完全地做到为工农兵服务。

第三，充分发扬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这种大民主，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统帅下，发动亿万群众，向社会主义的敌人举行总攻击，同时也是对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进行批评和监督。造成这样一种大民主的社会风气，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

无产阶级大民主，是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新发展，是毛泽东思想同亿万群众相结合的新形式。这种大民主，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最好的方法。广大群众在这种大民主运动中，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分清敌我，分清是非。这种大民主，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最好的学校。

毛主席告诉我们："**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我们运用大民主这个手段，要达到的目的，是实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社会主义事业。背离了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利益，背离了社会主义，背离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大民主，而只能是少数人对革命群众的压迫。

我们提倡的大民主，是在毛泽东思想集中指导下的大民主。群众之间的不同意见，要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辩论，而不能用强制的办法压制别人。在人民内部，如果只允许自己发表意见，不允许别人发表不同意见，那就违背了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原则。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挑动被他们蒙蔽的群众进行武斗，来压制革命，这是破坏无产阶级的大民主，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反动派实行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实行无产阶级大民主的保障。无产阶级大民主，又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没有无产阶级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有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危险。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不用说大民主，连小民主也不会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必须坚决地毫不动摇地保证人民民主权利，保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正常进行。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制造交通事故进行暗害、里通外国、盗窃国家

机密、捣毁破坏活动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实行专政，依法制裁。一切革命群众，都应当协助和监督我们国家的专政机构，执行保障无产阶级大民主的任务。对于那些思想反动、但没有违法行为的右派分子，还是要由群众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同他们进行斗争。

第四，继续开展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性的批判。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绝不是偶然的。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以来，就存在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存在着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的斗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反动路线的人，只是进一步地暴露了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

在工矿企业，在农村，在大中小学和文化各界里，在党政机关，在各个领域内，反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且清除它的影响，使人们真正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还要做许多深入细致的工作。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今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工人运动中，农民运动中，学生运动中，在各个战线上，都要大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立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关键。

党政机关的革命干部，要打破清规戒律和那些束缚革命的条条框框，到群众中去，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学生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使我们的党政机关，彻底实现无产阶级的革命化。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中，对待犯路线错误的同志，要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至于极少数不肯回头，坚持错误，阳奉阴违的两面派，他们一定会被人民群众打倒，那是咎由自取。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人。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经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考验和锻炼，将更加坚强起来。

革命的左派队伍，要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进行提高和整顿。革命的左派队伍，要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加强团结。要进一步学习和掌握毛主席的战略和策略思想，善于争取和团结大多数，把顽固的敌人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在斗争中要严格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一定还要玩弄新的花样，继续捣乱。同一切反动派一样，"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当然，同一切反动派一样，他们也是纸老虎。我们要象毛主席教导的那样，在战略上藐视他们，在战术上重视他们，坚持不懈地同他们进行斗争。

我们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为纲，结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进一步响应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林彪同志的号召，开展活学活

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锻炼和壮大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革命队伍，夺取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

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下，

工人阶级联合起来，

工人阶级同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者联合起来，

一切劳动者同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联合起来，

各族人民联合起来，

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

姚　文　元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象大海的怒涛一样，猛烈地冲刷着那些阴暗的毒蛇的巢穴。

轰！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盘踞的旧中央宣传部这个阎王殿倒垮了。

在最近举行的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上，江青同志指出："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互相勾结，对党，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清算，对于我们党内以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目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批判。"

对旧中宣部周扬等人的揭发和清算，关系到用毛泽东思想总结几十年来的革命历史、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历史，关系到党内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关系到更深入地挖掘政治上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必须搞深搞透。

周扬是一个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他一贯用两面派手段隐藏自己的反革命政治面目，篡改历史，蒙混过关，打着红旗反红旗，进行了各种罪恶活动。他是我们现在和今后识别反革命两面派的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他最后的一个公开报告，即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题名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的报告，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典型。

这个报告，忠实地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目的旨意，极力抵制毛泽东同志关于批判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指示。这个报告，在马克思主义词句的伪装下，对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进行了肆意的歪曲和捏造。这个报告，把周扬这个修正主义分子，伪装成毛泽东文艺路线的执行者，完全颠倒了历史。特别使人愤慨的是，周扬在这个报告里，十分卑鄙地篡改了毛泽东同志对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极为重要的指示。

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同志对周扬和他控制下的全国文联和各个协会，提出了一针见血的批评、指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是对以周扬为首的文艺界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一个严厉的批判和打击。这个指示彻底揭露了全国解放以来，旧中央宣传部领导人、包括周扬在内，执行的是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彻底揭露了文化战线上大多数的机关、团体和刊物，一直被修正主义集团所控制，成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全面进攻的工具，必须进行夺权斗争；彻底揭露了周扬这伙文艺界的修正主义分子，正在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舆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在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的导演下，演出裴多菲俱乐部式的反革命政变。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在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一日当作正式文件发给了各级党组织，推动了全国的文化革命。但是，一贯抗拒毛泽东同志指示的周扬，竟敢在报告中把毛泽东同志的话明目张胆地篡改成："他指出，一些重要文化部门的领导、一些文艺刊物，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把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十五年来"这个长时间的期限删掉了，把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大多数"文化部门和刊物，减少成"一些"文化部门和刊物，千方百计掩盖这条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罪恶。毛泽东同志揭露他们这一伙人"做官当老爷"，就是当了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来专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也被周扬删掉了。最不能容忍的是，他把毛泽东同志最重要的话，即指出周扬控制下的这些协会"**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个精确的科学论断和严厉的政治警告，一刀砍掉，统统删去。在"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伪装下，玩弄了一个篡改、歪曲、抗拒毛泽东思想的偷天换日的大阴谋。

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决不是周扬的黑手所能涂抹得了的。下面，我们将以毛主席的这个指示为指针，通过对十六年来阶级斗争历史的分析，用大量确凿的事实，来揭露周扬反革命两面派的真实面貌。

一部反革命两面派的历史

周扬在对青年业余作者的报告中，伪装出"一贯正确"的姿态，跳出来"总结"解放以来"五次大辩论、大批判"。他竟把自己打扮成是"全面地正确地执行毛泽东文艺路线"的代表者。

这是假的。这是撒谎。这是颠倒黑白。这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伪造历史。

真相如何呢？

请看周扬在历次思想战线上的大斗争前后的真实面貌：

第一次大斗争，是一九五一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次斗争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当时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正在全面展开，资产阶级同封建残余势力相勾结，向年轻的无产阶级专政发动了一场猛烈的进攻。他们抛出了《武训传》。这是一部狂热地歌颂地主阶级及其走狗，狂热地宣扬最无耻的奴才主义、投降主义，狂热地诬蔑农民革命斗争的极端丑恶的反革命电影。远在解放以前，国民党反动派的伪"中国电影制片厂"就动手拍制这部影片，他们没有来得及拍完，人民解放军的炮声响了。解放以后，周扬修正主义集

团的另一个头目夏衍继承了国民党反动派未完成的事业，在他的直接领导下拍完了这部反革命电影。电影一放映，立刻就受到一批党内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吹捧，号召学习武训和“武训精神”，也就是要无产阶级象武训那样向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屈膝投降。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了对《武训传》的批判。他在为五月二十日的《人民日报》写的一篇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中，尖锐地指出了文艺界的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向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投降的错误，严肃地责问：**“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毛主席所说的“一些共产党员”，为首的就包括周扬。周扬当时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党组书记。他自称“我自己很早就看了电影《武训传》”，这部电影是经过他批准后在全国范围放映的。这部反动电影一出来，立刻被毛泽东同志发现了。当时，中央有的同志通知周扬，《武训传》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动电影，必须批判，还没有说到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就被周扬顶了回来。周扬趾高气扬地摆出一副十足的贵族老爷架子，十分轻蔑地说：“你这个人，有点改良主义有什么了不起嘛！”

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以后，在毛泽东同志的严厉责问下，周扬被迫出来做了几句假检讨。实际上他一直阳奉阴违，寻找机会反扑。一九五一年六月四日，《武训传》批判刚开始，周扬立刻就写了一封黑信给他的一员大将于伶，指示于伶“在思想斗争问题上”，“具体处理要慎重、仔细、不可急躁鲁莽”。并焦急地说：“我们最需要知道的是真实情况”。于伶当时窃踞了上海文化局副局长，他包庇和勾结着一批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所谓“慎重，仔细”，就是要于伶注意“仔细”保护资产阶级力量，保护那些披着文艺外衣的反革命分子；所谓“不可急躁鲁莽”，就是指示文化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尽量削弱毛主席批评中尖锐的政治内容，采取拖延的策略，以便把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最后化为一个“认识”问题。周扬在信中加了圈的所谓“真实情况”，就是要收集保护资产阶级右翼的种种材料，进行反党活动。这是周扬一伙在《武训传》批判过程中的一次反党大阴谋。

在毛泽东同志发起下，突破了周扬的重重抵抗，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这个团克服了周扬派来的他的秘书钟惦棐的怠工破坏，依靠广大群众开展了工作。这个团的调查结果，就是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在《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的《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这篇经过毛泽东同志修改的文章，以铁的事实揭开了武训这个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的反动面目，为这场大辩论作了最好的总结。这时周扬见铁证如山，再抵抗下去不行了，立刻变换了策略，赶紧换一副面孔，出来写文章，捞资本。他在八月发表的文章中，先说了两句什么自己“并没有能够充分地认识和及早地指出它的严重的政治上的反动性”，然后摇身一变，出来做“系统的”总结，好象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者，不是别人，而是他周扬！

当然，周扬对毛泽东同志的批评是决不甘心的。批判的高潮刚过去，周扬就迫不及待地站到第二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讲坛上，发动反攻，为《武训传》批判“纠偏”。他在题名为《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报告中，声色俱厉地说：“自电影《武训传》批判以后”，“我们的批评工作中发生了一些偏向”，“应当加以纠正”。接着就猛烈地攻击什么“从教条公式出发”的“一些粗暴的、武断的批评”，“一部分读者的偏激意见”（即广大工农兵的革命批评），再加上党的领导不“支持”所谓“创作事业”，“使不少作家在精神上感到了压抑和苦恼。这种情绪是需要设法转变的。”

请看，周扬在这里“纠偏”纠得多么彻底！他实际上把由毛泽东同志发动的对反动电影

《武训传》的批判彻底否定了，把工农兵的批评一把扼杀了，也把毛泽东同志对周扬等"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的批判推翻了！无产阶级刚刚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周扬就大喊大叫"苦恼"了，"压抑"了，这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映他那个阶级的呼声是多么敏锐啊！

请看，《武训传》批判前后，周扬扮演的是一个什么角色！开头，他以文艺界"老头子"的身份，领着他那一伙放毒，大反毛泽东思想，大反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战斗一打响，他连忙来个假检讨，蒙混过去，欺骗党、欺骗人民。然后，他装出"正确"的姿态来"总结"斗争，把功劳算在自己帐上。接着，他就逐步把运动拉向右转，向革命人民发动反攻倒算。同志们，请注意，周扬是玩弄反革命两面派的老手，抓住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清楚周扬在各次斗争中的基本面貌。也可以看清楚其他已经揭露和尚未揭露的"两面人"的特征。

第二次大斗争，是一九五四年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这次斗争发生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深人展开的重要时期。随着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不甘心死亡的资产阶级加紧了对社会主义力量的进攻、并且加紧在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彻底揭露了和粉碎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篡党阴谋。斯大林逝世后，现代修正主义逆流开始泛滥。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到我国文艺界，使党内外的一些资产阶级分子活跃起来。以周扬为首的文艺界修正主义集团，利用他们垄断的刊物和报纸，大力吹捧和支持资产阶级"权威"，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则采取了贵族老爷式的压制和打击。他们全力支持极端反动的胡适派的唯心论，毒辣地镇压一切起来批判资产阶级的人，为资产阶级抗拒社会主义改造服务。毛泽东同志看到了文艺界黑线专政的严重形势，又发动了对《＜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毛泽东同志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的一封信中，尖锐地深刻地批评了以"大人物"自命而镇压对资产阶级批判的"某些人"，他愤慨地说：**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1]**，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毛泽东同志尖锐批评的以"大人物"自命而压制"小人物"的"某些人"，反对在《人民日报》转载批判俞平伯的文章的"某些人"，为首的就包括周扬，也包括丁玲、冯雪峰支配的《文艺报》。

正是周扬，一贯执行一条吹捧资产阶级"权威"、压制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反动路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他在《文汇报》发表的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中，就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吹捧为"革命的领导力量之一"，说什么离开了他们"革命就搞不成"，胡说什么进城的工农干部没有知识，"这一方面的缺陷，就需要城市的知识分子来填补。"他又一再叫喊要"依靠作家、艺术家自己的团体"，用所谓"社会方式来领导艺术创作"（一九五三年《文艺报》第十九期），不许无产阶级插手资产阶级"权威"控制的"团体"。周扬就是这样把资产阶级"权威"、叛徒、反革命分子安排、"填补"到文化界的各界里，去作"领导力量"，压制一切革命者对他们的批判。

正是周扬，直到一九五四年《＜红楼梦＞研究》批判展开前夕，还专门在《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一文中，五体投地地吹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什么“民主倾向”，什么“有思想、有才能”，什么有“抱负和理想”，什么“有良心的、正直的人”。……你们看，这不是简直把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捧上了天吗？

正是周扬，还在这篇文章中大捧特捧“西方先进的科学和先进的文化思想”，这里的“西方”，是指欧美资产阶级的文化，就是形形色色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宇宙观，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胡适派的唯心论，即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把资产阶级反动哲学说得那么神圣，这不是对俞平伯之流的资产阶级“权威”最大的撑腰吗？这不是十足地“甘心”作资产阶级代言人吗？

正是周扬，在这场大斗争中又重演了一次反革命两面派的角色。战斗刚刚开始，周扬就尽力想把这场尖锐的政治思想斗争，化为一场所谓“纯”学术讨论。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他在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迫不及待地要人们去研究“包含复杂的内容”的所谓“学术思想上的问题”，开了一大批题目，要人们去搞烦琐考证。十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发表了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公开揭露了文艺界某些领导人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态度。周扬看看形势不妙，马上及时制造假检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他在全国文联主席团和全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上，说什么“放弃了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和斗争”“是我们工作中最大的错误。我也就是犯了这种错误的。”等等。这个“检讨”、拆穿了说，不过是“错误人人有份”而已。他根本不想稍为清算一下自己反动的资产阶级政治立场，只是想借此蒙混过关。什么“我们”“进一步展开了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贪天之功以为己功，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人们都清楚：这个“我们”是不包括你周扬的。你的所谓“全面批判”不过是摇身一变的故技重演，这是为了保持你窃踞的领导地位，以便把斗争拉向右转，开展反攻倒算。到了一九六一年、六二年，你们不是连续发表了成百万字的曹雪芹死年考据、祖宗考据、大观园地址考据……等等奇谈怪论，登了整版整版的稀奇古怪的地图，为胡适派唯心论实行了一次大复辟吗？

第三次大斗争，是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五年紧接着批判胡适而展开的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这是一场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亲自领导之下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尖锐斗争，是对反革命势力的一个严重打击。周扬的思想同胡风思想本质上是一样的。他同胡风一样，反复鼓吹“艺术的最高原则是真实”（一九五二年），反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反对毛泽东思想。他同胡风一样，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反对作家深入到工农兵斗争中去，甚至狂妄地说“不去，也还是可以结合的”，“我们和工农是要分工的”（一九四九年），公然以贵族老爷自居。他同胡风一样，反对写重大题材，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大力鼓吹所谓“选择题材”上要有“完全自由”，要“最大限度地保证这种自由”（一九五三年）。他同胡风一样，主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性论，反对阶级分析，用所谓“新的国民性的成长的过程”（一九四九年）之类人性论的语言，来歪曲劳动人民的阶级面貌和阶级性格。他同胡风一样，提倡“创作就是一个作家与生活格斗的过程”、就是“主观和客观完全融合”“物我一体”（一九四一年）之类极端反动的主观唯心论的创作方法。他同胡风一样，把西方资产阶级文艺奉作至高无上的祖师。胡风的反动文艺思想，周扬都有，只是伪装得更巧妙些。一九五二年，周扬、林默涵等人召开过一个所谓“批判”胡风的座谈会，在会上就吹捧胡风是“政治态度上拥护毛泽东同志”的，“在大的政治方向政治斗争上”，是“同党站在一起的”，甚至把这个反革命头目捧做“非党的布尔什维克”。完全暴露了周扬一伙同胡风“政治方向”上是

一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所以要攻击周扬等人，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攻击周扬的这一套。正如《人民日报》编者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的按语中指出的："反革命分子的攻击少数人不过是他们的借口"，他们攻击的目标是我们的党，是毛泽东思想。可是周扬却利用反胡风斗争投了一个机，他抓住胡风攻击他周扬这个假象，把自己打扮成好象是毛泽东文艺路线的代表者。从此就神气起来了。从此就更加露骨地使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段了。其实，拆穿了，这是一场政治投机，是一个大骗局。

狐狸尾巴是藏不住的。果然，对胡适、胡风批判的革命硝烟还没有消失，周扬就急忙把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和斗争拉向右转。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周扬写了一篇《纪念＜草叶集＞和＜堂·吉诃德＞》的文章。当时，毛泽东同志坚决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已经发表，中国农村正处于伟大的社会主义高潮中间。毛泽东同志号召文艺工作者到农村中去，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去，大写"成千上万"的英雄人物；周扬却针锋相对地狂热地鼓吹堂·吉诃德的什么"高度的道德原则"，即资产阶级的道德原则；他特别狂热地吹捧十九世纪美国资产阶级诗人惠特曼，要作家把他当作"参加斗争"的"范例"。他还从惠特曼著作中抬出了一种"新型的人"，当作中国人民的"光辉榜样"。请看：

> 惠特曼的奇异贡献是他在他的诗篇中创造了"人"的一种光辉形象。读了他的诗，人们就好象能够看见一种惠特曼式的人，一种新型的人，身体健康，心胸开阔，有崇高的理想，劳动创造的手，并且永远乐观。
>
> 惠特曼式的人，肯定的说，是一种新的人，是一种足资我们学习、模仿的光辉榜样的人。

在这里，周扬用"劳动创造的手"这样一个迷惑人的短句，好象惠特曼歌颂的是劳动人民。不，《草叶集》中所歌颂的"人"，并不是什么抽象的人，更不是劳动人民，而是美国资产阶级的化身。我们查了一下，发现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周扬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早就吹捧过美国资产阶级。那时他直截了当地说出了他所欣赏和赞美的惠特曼式的"人"，是"充满信心的美国资产阶级的典型，肉体地健壮，胸怀广阔"。丑死了，丑死了，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狭窄心肠捧做"胸怀广阔"，不觉得肉麻吗？在六亿工人农民兴起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时刻，在社会主义英雄人物成千上万地涌现的时刻，周扬再一次把反动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捧做"崇高理想"，把惠特曼当作"参加斗争"的"范例"，把"美国资产阶级的典型"叫做"新型的人"，当作"光辉榜样"，把堂·吉诃德的骑士道德捧作"高度的道德原则"，要人民去"学习、模仿"，这不是公开同毛泽东思想对抗吗？这不是对于六亿工人农民的翻天覆地的社会主义革命一个猛烈的反扑吗？这不是要城乡资产阶级和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永远乐观"，坚决抗拒社会主义改造，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吗？

这还不够。紧接着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吹捧，一九五六年三月，周扬就迫不及待地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的报告中，破天荒地一次封了五位所谓"当代语言艺术的大师"。他用双手奉上"大师"的皇冠，表现了自己是资产阶级"权威"忠实的代理人。这也是从外国学来的。这是命令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权威"跪倒投降，这是对于毛泽东同志历次指示的猖狂大反攻。这顶帽子封了许多人的嘴。当一九五八年、五九年、有一些要求革命的"小人物"冲破了周扬的禁令，甘冒挨打的危险，对其中某几位"大师"进行了一点批评时，周扬马上出来为

这些"大师"保镖，多次用最刻毒的语言打击批评者。一九六二年二月，他在对"老剧作家"的讲话中愤恨地反驳道："有人对有些作家被称为语言艺术大师不满意，说是捧场。……要不要学语言？要不要跟大师学？"这不是要青年死心塌地做资产阶级"大师"的奴仆吗？连对资产阶级表示一点"不满"都不准，真是蛮横极了。

第四次大斗争，是一九五七年粉碎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伟大斗争。这次斗争，发生在我国经济战线上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修正主义的大出笼大泛滥，直接促使了国内的修正主义逆流的发展。周扬在这个时期发表了一连串的讲话和文章，为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提供了精神武器。

一九五六年三月，苏共"二十大"刚开过，周扬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就赤裸裸地说：

> 一定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我们不只学习苏联，也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中那些进步的艺术。……比如《居里夫人》就是很好的片子，思想性或艺术性都是很高的，这是十几年以前的美国片子，虽然不是正面宣传共产主义，但是那就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居里夫人的世界观和我们共产主义者的世界观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要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文艺发生更密切的关系……我们应该吸收他们的好的东西，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会影响他们，而他们也会影响我们。

这是一篇搞"和平演变"的计划书。《居里夫人》是美国罗斯福执政时拍摄的一部反动影片。它通过居里夫人的一生，集中宣扬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平主义、个人奋斗、成名成家、阶级调和的反动观点，宣传了科学家的活动是超阶级、超政治的，要为"全人类"服务，实际上是为垄断资产阶级榨取高额利润服务。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拍出这种"传记片"，是想用比较隐蔽的形式，为资产阶级涂脂抹粉，"影响"和腐蚀美国劳动人民，使他们放弃阶级斗争的道路而幻想爬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用心极为恶毒。它比那些色情片、"西部片"有更大的欺骗作用。周扬把它当作宝贝，称颂它是"进步的艺术"，是要做美帝国主义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即用西方资产阶级反动艺术来"影响我们"，使我们的艺术变成挂社会主义羊头，卖资本主义狗肉的修正主义艺术，为培养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服务。同志们只要看一看，这些年来，在周扬一伙控制下出了多少坏电影，这些坏电影同西方资产阶级艺术有多少"密切的关系"，就会懂得向美国这种"进步电影"学习的结果是什么了。

周扬说，"居里夫人的世界观和我们共产主义者的世界观是一致的"。这是一大发明。你们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讲"一致"，说明你们这伙"共产主义者"嘴上的"共产主义"是假共产主义，即修正主义。这难道不是暴露了你们的一个大秘密吗？请看自然科学领域中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不是同周扬一样，到处同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讲"一致"吗？

不久，周扬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让文学艺术在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一文。这是一个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纲领，这是一篇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宣言书。

周扬在文章中大反"庸俗化""简单化""清规戒律""宣传作用"，认为党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对待文艺工作的简单化的、粗暴的态度"，"严重地束缚了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自由。"自由是有阶级内容的。抽象的"创作自由"是资产阶级的反党口号。在阶级社会里，只有阶级的自由，没有超阶级的自由。有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资产阶级进行专政的自由，就没有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派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自由，

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自由。周扬向党伸手要"创作自由"，是为资产阶级争反党反社会主义自由，让牛鬼蛇神解除"束缚"，自由地搞反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活动。周扬所攻击的所谓"教条主义""清规戒律"，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阐明的关于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原则；他所攻击的"宣传作用"，就是反对文艺宣传无产阶级的即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创作自由"和所谓"反教条主义"这两个反党口号，后来成为文艺界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主要武器。直到一九六二年、六三年，不是还有人用"尊重创作自由"之类的老谱，来为各种毒草催生吗？

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越凶，周扬反革命的真面目就暴露得越清楚。正当资产阶级右派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达到高潮的时候，一九五七年四月九日，周扬在《文汇报》上发表讲话，眉飞色舞地欢呼"剧目开放是戏曲界的一件大事"，为舞台上乱舞的群魔助威；极力赞美右派分子刘宾雁等从苏修那里搬来的所谓"干预生活"的一批大毒草，认为"尖锐地揭露和批评生活中的消极现象的作品，愈来愈引起了人们的注目"。在四月间，周扬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呼风唤雨，煽风点火，反对所谓"春寒"，要求"春暖"，鼓动右派起来争取"春天"也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到来。五月十三日，他在一次报告中疯狂地诬蔑共产党员"象特务一样""象木头一样"，极力称赞当时成为章罗联盟喉舌的《文汇报》放火"胆子大"。他说，讲要杀几百万共产党的人，"也不见得就是反革命分子。"真是毒牙毕露。这完全证实他是一个漏网的大右派。

反右派斗争一打响，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段的周扬，立刻又见风转舵，巧妙地摇身一变，把自己的大右派的狰狞面目藏起来。在整风开始的时候，周扬和旧中宣部负责人，十分热心地积极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翻案，要摘掉他们反党的帽子，直接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可是反右派斗争一起，周扬却立刻利用对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的批判，把自己这个大右派打扮成左派，俨然用"一贯正确"的姿态出来总结文艺界反右派斗争。在《文艺路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一文中，他把"我们这些人"分成"两种人"，一种人是"同党不是一条心"，"不肯按照集体主义的精神改造自己"的；另一种人就是他周扬，说是已经"丢掉个人主义的包袱"，"同党一条心了"。对照一下那些恶毒的右派言论吧，这种两面派的手段是多么卑鄙啊！前次，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周扬用两面派的手段投了一次机；这次，在反丁玲、陈企霞、冯雪峰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周扬又用两面派的手段投了一次机。他用这两次投机，把自己的罪恶掩藏了过去，包庇了一批右派、叛徒混过关，把他黑线中的一伙人安插到文艺界各种领导岗位上去，扩大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势力。这还不算，他又乘机翻案，篡改他在三十年代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提出"国防文学"这个投降主义口号的一段历史，反诬鲁迅是"宗派主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耍了多少花招！

有一些人总爱写什么三部曲。总起来看，周扬的一套把戏，原来玩的也是三部曲：向党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然后马上用假检讨或者伪装积极一变而站在正确方面；然后大搞反攻倒算，发动新的进攻。周扬的所谓"一贯正确"史，就是一部反革命两面派史。然而，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周扬混过了这四次大斗争，在第五次大斗争中，三部曲还没有演完，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面目就彻底暴露了，就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利剑彻底戳穿了。

大风大浪中的大暴露

一九五八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以来的历史，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更加深入发展的

历史。在这个期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同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两次大斗争，即一九五九年的一次，最近的一次。在斗争中，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空前伟大的胜利。

在这场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的领导人，包括周扬在内，进一步暴露了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面目。周扬自以为自己的势力更大了，政治资本更多了，加上有了旧北京市委的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作后台，有了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物的支持，可以更加放肆了。在这种估计下，他就抛掉了伪装的一面，赤裸裸地摆出了他反革命的本来面目，更加恶毒、更加疯狂、更加嚣张地向党、向无产阶级专政、向毛泽东思想发动进攻。

一九五九年一月，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召开了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会上对我国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进行了恶毒的诬蔑和攻击。在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集团的支持下，自命为海瑞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梦想推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把我国拉回资本主义的黑暗道路上去。在这个过程中，周扬猖狂地进行了大量的反革命活动，积极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政治需要服务。

一九五九年二月，周扬在《牡丹》二月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在洛阳宣教干部座谈会上的谈话》，说什么经过了一九五八年的批判，"有一种被压抑的情绪"，现在要颠倒过来，"要使人人敢于讲话，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人人"是划分为阶级的，周扬要动员起来的"人人"是什么阶级的人呢？就是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是你压倒我，就是我压倒你。不是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被资产阶级"压抑"，就是资产阶级被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压抑"，有阶级对立存在，就根本没有什么"人人"平等、"人人"不受"压抑"的社会。无产阶级专政对广大革命人民实行最广泛的大民主，对一小撮地富反坏右分子就要进行坚决的专政。只有对敌人进行专政，才能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周扬所谓要"人人敢于讲话"，就是要把那些被批判的牛鬼蛇神重新扶起来，只准他们"讲话"攻击毛泽东思想，攻击党的总路线，不准无产阶级"讲话"批判他们。"也要让少数人讲话，因为他代表某种社会力量"。这是混淆黑白。对所谓"多数"和"少数"，都必须作阶级分析。坚定的左派和顽固的右派都是少数。右派是极少数。左派争取、团结了中间派才成为多数。你周扬残酷地压迫无产阶级左派这个"少数"，却支持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登台夺权，这分明是要他们来专革命人民的政。

一九五九年初春，周扬为了贯彻他鼓动牛鬼蛇神"敢于讲话"的反动纲领，向周信芳推荐《海瑞上疏》的题材，并且提供了具体材料。他向周信芳说：现在"大家不敢讲话，演一演这类戏是需要的"。"少数人"到了两个反党分子私下对话的时候，变成了"大家"。这个"大家"就是他们所代表的极少数地富反坏右。他要通过《海瑞上疏》，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和一切牛鬼蛇神打气。一九五九年，他到处宣传"海瑞精神"，还广泛动员各地来京的艺术团体的干部和演员，要求他们"选择海瑞、包公"作为"今天写历史剧"的主角。吴晗不是说写反党的"海瑞戏"也要"全国一盘棋"吗？这"一盘棋"的指挥者就是周扬。

一九五九年二月，周扬在创作工作座谈会上疯狂地攻击大跃进，奴颜婢膝地把现代修正主义的反动艺术叫做"国际水平"。他咒骂我们的党说："有了一千万吨钢，就以为了不起了，连苏联也不放在眼里了。"伟大的七亿中国人民的"眼里"有五大洲的革命风云和全世界的阶级兄弟，就敢于蔑视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包括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内，敢于同一切妖

魔鬼怪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鄙视它们，压倒它们，战胜它们。周扬"眼里"只有几个修正主义的狐群狗党，他当然要对着大无畏的中国人民狂吠了。他还攻击我们的党"违背国际主义"。这证明了他所谓的"国际主义"，就是把修正主义奉为"老子党"，跟在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屁股后面，亦步亦趋。这是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完全对立的资产阶级的奴才主义。

一九五九年六、七月间，周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届文艺会演大会干部座谈会上作了讲话。这个报告，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久之后在庐山会议上提出的反革命路线唱的完全是一个调子。他诬蔑我们歌颂大跃进是"搽粉"，是"乱用群众的积极性"；他攻击群众运动，咒骂唱革命歌曲是"老太婆唱歌没有人听"；他咒骂劳动人民不配作诗，因为"做诗本来是要灵感的"；咒骂"中学生是些小娃娃，十二三岁"，根本没有资格过问政治，如果要他们学习政治，是"庸俗的了解为政治服务"。一谈到大跃进，一谈到群众运动，包括工农兵起来掌握文化的群众运动，他就冷嘲热讽，指手划脚，极尽其挖苦打击之能事，这是出于他的资产阶级憎恨社会主义、憎恨革命群众的阶级本性。这种站在群众运动对面的人，不管多高的职位，到头来总要碰得头破血流的。事实无情地驳斥了周扬，今天，不但从"老太婆"到青少年都齐声高唱革命歌曲，"十二三岁"的"中学生"和小学生，也正以空前高涨的"积极性"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资产阶级发动一场全面的总进攻！

周扬在这个报告中还极端狂妄地攻击说："十年来"，有我们自己的"科学著作"没有？周扬妄想把解放以后十年中，毛泽东思想在各个方面的伟大发展，一笔抹杀，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周扬这个家伙，你低头听着：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九年，十年以来，党中央出版了光芒万丈的《毛泽东选集》，成为我国和全世界人民进行革命的指南针，这算不算"科学著作"？十年以来，在政治、军事、哲学、文化、经济、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毛泽东同志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论十大关系》……等等伟大的划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进一步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算不算"科学著作"？十年以来，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了思想战线上的历次伟大斗争，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等等著名文章，包括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的直接批判你周扬的那些重要指示，这算不算"科学著作"？你的反革命面目难道还不清楚吗？

其实，拆穿了，你们所谓"科学著作"，就是现代修正主义那些又臭又长七拼八凑的"条条"、"本本"、"教科书"，就是那些"嘴尖皮厚腹中空"的牛皮，你们眼睛里只有洋菩萨的修正主义好，毛泽东思想这个战无不胜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广大群众手中的活哲学、活科学，你们一概疯狂地反对。这充分暴露了旧中宣部一伙人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罪恶本质。这种罪恶，要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国内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达到了高潮。现代修正主义者联合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加紧对我国我党进行封锁、包围、诬蔑、渗透、颠覆、妖魔鬼怪纷纷出笼，修正主义逆流泛滥一时。周扬不但积极组织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为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作舆论准备；也是一个发了狂、红了眼、自己出来打头阵的主将。他连续召开许多专业会议，抛出了一个接一个的修正主义纲领；他还拔脚在全国乱跑，上海、长春、杭州、大连、福州、厦门……，到处开会，到处做报告，四面点火，八方煽风，鼓动和策划牛鬼蛇神起来夺权，起来翻案，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文艺界的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几乎都是从周扬一伙那里拿到通行

证，按周扬的信号弹行动的。一切接近灭亡的反动阶级，总是利令智昏地来个自我大暴露，以便革命人民看出他们的真相，群起而灭之。下面我们只举出几个突出的方面：

周扬疯狂地反对和咒骂毛泽东思想。周扬一贯反毛泽东思想，但过去总要用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披上一件伪装。一九六一年以后，他以为形势对自己有利，资产阶级的复辟阴谋就要得逞了，索性抛掉伪装，赤膊上阵，跳了出来破口大骂。

一九六一年二月，周扬跑到上海，在一次座谈会上，他攻击有的戏"把'感谢毛主席'这句话直接表现出来，一遍还不够，感谢了三遍四遍"。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永远跟毛主席走，跟党走，这是几万万中国劳动人民从心里喊出来的，是每一个从剥削阶级压迫下得到解放的劳动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头等大事，为什么你周扬这样深恶痛绝？这完全表现了周扬反革命的阶级本性。

一九六一年三月，周扬跑到福建去大骂毛泽东思想。他说："毛泽东思想是一条红线，太多了就不是红线，而是红布了。政治是灵魂，灵魂不是肉体……灵魂不占地方，来去无踪。"把毛泽东思想变成一根"来去无踪"、"不占地方"的线，这不是明明要把毛泽东思想赶出各个领域，让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思想去挂帅么？这一段十分刻毒的黑话，他到处讲，翻来覆去不知讲了多少遍。

一九六一年六月，周扬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恐吓说："广播电视里不要老宣传拥护毛主席"。这是旧中宣部的阎王殿里的黑话。这充分显示了他的反革命嘴脸。你们反对宣传"拥护毛主席"，你们要宣传"拥护"什么人呢？岂不是想把一小撮被全党全国人民唾弃的反党分子"拥"上台，实现反革命复辟么？你们这种打算，只能落得个可悲的下场。

一九六二年七月，他又跑到东北去反对"天天讲毛主席"。我们就是要天天讲毛主席，天天读毛主席的书，天天温习毛主席的指示，天天学毛主席思想。"天天讲毛主席"，一切牛鬼蛇神就没有空子好钻了，一出来就被识破了，一活动就被抓住了。

周扬是一个对毛泽东思想刻骨仇恨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那些冠冕堂皇的话统统是骗人的。上面这些材料，还不足以说明这个人的真面目是多么反动么？

周扬疯狂地为一切牛鬼蛇神翻案，向革命人民反攻倒算，鼓动和组织过去被打倒的形形色色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权威"向党进攻。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九日，"三家村"反革命集团的《燕山夜话》开张了。只隔一周，三月二十六日，《文艺报》立刻抛出了一篇题名为《题材问题》的专论。这篇文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纲领，它是在周扬、林默涵授意、指导之下写的，并经过他们精心修改。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煽动性的口号，叫做"用一切办法广开文路"。

他们要"广开"什么"文路"呢？

没有什么抽象的"文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只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开"社会主义文艺的"文路"，就要堵塞资本主义反动文艺的"文路"；"开"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反动文艺的"文路"，就要堵塞社会主义文艺的"文路"。他们说，"广开文路"是为了"不使任何有志之士、有用之才受到冷淡或压抑"，对了，这就暴露了他们原来是要"用一切办法"为那些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受到"冷淡或压抑"的反革命分子翻案，好让那些怀有反革命之"志"的牛鬼蛇神，利用报刊、文艺的工具，通行无阻、横冲直撞地进行反革命宣传。你看：反革命复辟可以走"武路"，也可以走"文路"，我们一定要"用一切办法"粉碎他们由"文路"实行复辟的梦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请看周扬是怎样在各种"座谈会"上，接二连三地为那些被"压抑"的"有志之士"翻案，狂

热地鼓动他们向党进攻：

他狂热地歌颂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说：右派中"有些很有头脑的人"，十分"宝贵"，那些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青年人"很有学问"，要"注意培养他们"。他利用职权，千方百计把一批穷凶极恶、腐朽不堪的反革命分子和右派扶起来，当作"宝贝"，网罗进他控制下的各种机构中去，高官厚禄，关怀无微不至。连老汉奸、大流氓周作人，也批给他一个月几百元，帮他吮吸劳动人民的鲜血！相反，周扬、林默涵一伙对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青年，对无产阶级左派，刻骨仇恨，咒骂他们是"头脑简单、情感简单、趣味简单"的人，因为他心目中"有头脑的人"，就是反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

他极力附和胡风的反革命言论，为胡风翻案，完全暴露了他同胡风站在同一个立场。他说："胡风说，机械论统治了中国文艺界二十年。……如果我们搞得不好，双百方针不贯彻，都是一些红衣大主教，修女，修士，思想僵化，言必称马列主义，言必称毛泽东思想，也是够叫人恼火的就是了。我一直记着胡风的这两句话"（一九六一年六月十六日）。这是多么毒辣的黑话！胡风是一个凶恶的反革命集团的头目，周扬却把胡风的话当成祖宗的"家训"一样"一直记着"，就因为他十分欣赏胡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刻骨仇恨，对毛泽东思想刻骨仇恨。"言必称毛泽东思想"，是有所指的，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批判那些坚持王明路线的人"言必称希腊"，其中包括了周扬，周扬一直怀恨在心，现在就破口骂出来了。你对"言必称毛泽东思想"感到"恼火"，因为你是个资产阶级，你是个洋买办，你要言必称洋人，言必称"别、车、杜"（即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才觉得舒服。周扬还再一次吹捧胡风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论，要作家根据胡风的反革命理论，去大写劳动人民的"落后、迷信、偏见、猜忌"等等，丑化和侮辱劳动人民。什么"批判"过胡风，统统是假的，是骗人的。还有什么"红衣主教""修女修士""思想僵化"，这种胡风式恶毒至极的语言真是叫人怒火直冒，念不下去！周扬用这种黑话来辱骂无产阶级左派，辱骂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工农兵，只不过使人们看清了他这个修正主义者的黑心黑肺。其实，把"红衣主教"这顶帽子回敬给周扬，倒是很适合的，当时披着红袍子，打着黑旗子，抓着文化战线印把子的，不就是你们吗！？

一九六一年六月，周扬又提出"我们要培养海瑞上本的精神"。这正是《海瑞罢官》演出之后，"三家村"的"兄弟"们"破门而出""失败了再干"的进攻的时期。在周扬伙同文化部前党组书记齐燕铭的指挥下，《谢瑶环》《李慧娘》等大批毒草正在先后出笼。周扬一再鼓吹"海瑞精神"，是为了组织一场大进攻，把矛头指向党中央，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一九六二年，旧中宣部主要领导人又一次提倡要学习魏征，他们一个"海瑞精神"，一个"魏征精神"，找到了反革命的共同语言。

周扬还说："首先要改变这种统治和被统治、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这就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周扬的目的是要"改变"无产阶级专政，让"被统治"的反革命分子、胡风分子，海瑞，魏征，等等，变成"统治"者，一窝风上台专政，疯狂地镇压革命人民！

周扬到处鼓吹资产阶级的"自由化"，要把各个协会、各个文艺团体、机关统统变成裴多菲俱乐部。周扬等人一九六一年七月抛出、八月一日又修改印发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即所谓"文艺十条"，其中心就是推翻毛泽东文艺路线，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文艺的领导，实现资产阶级自由化。

"文艺十条"中攻击"在文艺如何为政治服务的问题上"存在着所谓"狭隘的、片面的、不正确的理解"，这就是周扬黑话原封不动的翻版。周扬所痛恨的"狭隘理解"，就是文艺紧密

地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服务，把文艺当作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周扬所谓的“广阔”，就是“十条”中一再叫嚣的“对于题材，不应作任何限制”，就是《文艺报》在《题材问题》专论中所说的“帮助人们认识世界的多样性，历史的规律性和生活的复杂性”。

“不应作任何限制”是裴多菲俱乐部的反革命口号。任何事物都要受一定条件的限制，不受“任何限制”的事物是不存在的。问题在于是革命的限制还是反革命的限制，进步的限制还是反动的限制。无产阶级文艺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一定要接受无产阶级政治的限制，政治统帅文艺，自觉地从无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出发来考虑题材问题；不接受这种限制，就会接受资产阶级政治的限制，变成资产阶级文艺。“借古讽今”“崇洋非中”的毒草盛行一时，“离经叛道”“写中间人物”等等反社会主义的坏电影、坏戏、坏小说争相出笼，就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政治限制的结果。揭破在“限制”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欺骗，是为了使人们看清周扬所谓“不应作任何限制”，其实是要求文艺不受六条政治标准的限制，不受为工农兵服务的限制，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各种大毒草统治文艺界，实行反革命的大复辟。

他们所谓“世界的多样性”，其实只有一样，就是要美化和歌颂那些腐朽没落的地主阶级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及其知识分子多种“多样”的丑态。在周扬看来，创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歌颂无限壮丽的工农兵生活是“狭隘”的、“单调”的，只有大力地去描写资产阶级糜烂不堪的生活方式，才叫“多样”，才有什么“美的享受”。他们所谓“生活的复杂性”，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修正主义文艺中的红军战士同反革命白匪拥抱之类的阶级调和论和阶级投降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文艺中美化叛徒、奴才、阿飞、地富反坏右的肮脏手法，就是修正主义文艺中欣赏剥削阶级阴暗心理和精神分裂的丑恶笔墨！一九五九年，赫鲁晓夫无耻地吹捧肖洛霍夫时，就说什么《一个人的遭遇》的“伟大意义”是“表现了普通人的复杂的和丰富的精神世界”。赫鲁晓夫的应声虫们要我们去写什么“生活的复杂性”，不就是要我们去向肖洛霍夫之流的叛徒文学看齐吗？

周扬大力推销现代修正主义的黑货，提出了“全民文艺”的修正主义口号。一九六一年十月开始的苏共“二十二大”，公开宣布了“全民国家”、“全民党”，赤裸裸暴露了自己用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叛徒面目。周扬急忙响应。他借一九六二年五月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的机会，又玩弄了一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大阴谋。他把他手下的资产阶级“权威”集中到北京，以“写文章”“总结经验”为名，发动了一个反毛泽东文艺路线的高潮。这伙人在周扬、林默涵的领导下，过着贵族老爷的生活，一天到晚密谋如何打击左派，如何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干了许多见不得人的肮脏勾当。最后抛出了《文艺队伍的团结、锻炼和提高》(《文艺报》社论)、《战斗的胜利的二十年》(何其芳)、《关于创造人物的几个问题》(陈荒煤)、《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瞿白音)……等一批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对毛泽东文艺路线进行了全面的极其恶毒的歪曲和攻击。周扬亲自抓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三月十五日，周扬在一次会议上专门对“社论”内容作了详细的规定，定下了调子。后来又仔细修改。这篇发表时名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文章，中心就是用赫鲁晓夫的“全民文艺”来代替无产阶级文艺，用为“全体人民”服务来篡改为工农兵服务的毛泽东文艺方向。

“全民文艺”是周扬一贯的修正主义思想。他多次提出过“全民的文学”“全民的文化”这类修正主义口号。到了苏共“二十二大”之后，他觉得有了洋主子“靠山，又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的批准，就干脆把这个口号变成一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强加给全党。

文章说："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都应当是我们的文艺服务的对象和工作的对象。"这是对于毛泽东思想极其恶劣的篡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文艺"**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又指出："**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为工农兵服务，以工农兵为对象，这是二十年来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方向，是阶级路线，是决定文艺阶级性质的根本条件。今天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更是这样。周扬企图用所谓的"统一战线"来偷换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硬要把资产阶级作为我们文艺的服务对象，这是要篡改无产阶级文艺的阶级性质，使它变成资产阶级手里的反革命工具。周扬把资产阶级等革命的对象当成"工作的对象"，是要我们把对资产阶级的批判改变成对资产阶级的歌颂，用这条"全民文艺"的修正主义的路线反掉毛泽东的文艺路线，为资产阶级复辟"广开文路"！

文章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加强作家、艺术家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这是一个原封不动从赫鲁晓夫那里搬来的修正主义口号。赫鲁晓夫做过一个报告，题目就叫做《文学艺术要同人民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搞假共产主义的所谓《苏联共产党纲领》中，就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写上："文学艺术发展的主要路线是加强同人民生活的联系。"为什么苏修这样欣赏和热衷于"联系人民生活"的口号呢？因为这个口号就是抛弃革命、就是抬高反革命。第一，它把作家、艺术家放到一个高高在上的贵族老爷的位置，只是要求他们"联系"一下"人民"，完全反对同工农兵结合；第二，赫鲁晓夫所谓"人民"，就是"全民"，就是那些资产阶级、高薪阶层。"密切联系人民"就是密切联系资产阶级、高薪阶层，为资产阶级服务；第三，它取消了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使资产阶级作家可以完整地保存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放手写反社会主义的反动作品；第四，裴多菲俱乐部也可以变成所谓"加强同人民联系"的一种形式，使反革命组织、反革命活动合法化。周扬把现代修正主义文艺当作"主要路线"的口号搬过来，是为了取消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工作者"**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的指示，使修正主义路线进一步统治中国的文艺界。

够了。此人是一个报告狂，我们不可能列举这几年周扬多如牛毛的大小报告中所有反动内容，从这一部分事实中，已经足以看出周扬的真面目。平时以两面派面貌出现的周扬，在这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大风大浪中，完全暴露了反革命一面派的本质。然而，"物极必反"，反革命派趾高气扬的充分暴露，反过来为革命派的反击提供了致命的子弹，周扬一伙就这样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

摧毁黑线的顽强抵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直到一九六二年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前夕，周扬还在积极参加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阴谋活动。他伙同一小撮反党野心家，积极支持并鼓励为反党分子高岗翻案的反党小说《刘志丹》的出版。他亲自接见写这本书的反党分子，亲自审阅了这部小说，称赞这本书"做了一个模范""树立了一个榜样。"他们企图假借这部小说，洗刷高岗的反党罪恶，篡改党史，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正确结论。

他们的反党阴谋很快被党中央和毛主席识破了。在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再一次强调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且直接

批评了周扬等人。

毛泽东同志指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毛主席和党中央对周扬等人，又一次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等待。但是周扬却又一次采用反革命的两面派手段，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十中全会之后，他利用职权，依靠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窃踞重要职务的反党野心家的支持，压制左派的反击，力图再一次使用两面派的伎俩，把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力量保存下来，继续同无产阶级较量。于是，在广阔的思想阵地上，接连展开了一场场你死我活的争夺战：

一、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刚开过，周扬为了掩盖自己的反党恶行，急匆匆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九日向参加文艺工作座谈会的人作了一次所谓“传达”。一面把自己打扮成是“不能说精神准备很充分”的左派；一面歪曲十中全会精神，说什么文艺界“基本情况是好的”、“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发表得……不多”，力图把许多大毒草都说成是香花，麻痹革命人民。又说什么“也不要走向另一极端”。就是说不要批判资产阶级，不要铲除毒草。无产阶级刚要开始反攻，他就决心抵抗到底了。

二、紧接着，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在周扬的批准、指示和亲自策划下，在山东召开了所谓“孔子讨论会”。这是周扬伙同一大批牛鬼蛇神对十中全会革命精神的一次反攻。这是一个资产阶级右派嚣张得发了狂的黑会，演出了解放以来所未曾出现过的向封建祖宗鞠躬致敬的丑剧。

三、一九六三年元旦，柯庆施同志根据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向上海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写十三年”的倡议，希望文艺创作大力反映十三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现实，歌颂工农兵中的英雄人物。这个革命的倡议马上受到了以周扬为首的文艺界修正主义集团的抵制和攻击。一九六三年四月，在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上，周扬组织林默涵、邵荃麟等一伙人，从小组会到大会，围攻“写十三年”的口号。在这次会上，和接着在四月二十七日的全国文联委员扩大会上，周扬还亲自出马，大讲“不论写什么题材都能反映时代精神”，“不要以为只有描写现在，才是主导的”。到了一九六五年底，当他向青年业余作者作报告的时候，他却板起面孔批评什么“三年前”提出“写十三年”的时候，“有的同志就曾经表示不能接受”。好象他当时还是个积极极分子。这真是虚伪透顶了！怎么能够这样子厚颜无耻，用撒谎来吹嘘自己呢？

四、一九六三年上半年，毛泽东同志对“**鬼戏**”、“**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严厉指出周扬、齐燕铭、夏衍、林默涵领导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周扬在一九六三年八月和十月的两次关于戏曲工作的讲话中，却说什么“主张演鬼戏不一定是资产阶级思想”，竭力对抗毛主席的批评。周扬还根据他投靠的反党野心家的谬论，公开提出所谓“分工论”，说什么“特别是京剧，适合于表现帝王将相”，制造反对革命现代戏的理论根据。他还吹嘘什么戏曲改革已经取得“巨大的成绩”，妄想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舞台的罪恶掩盖起来。

五、一九六三年九月，周扬专门召开了一次包括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各所和各报刊负责人的会议，带头围攻《评李秀成自述》这篇革命文章。他在会议上喊叫“李秀成是一个民族英雄，把他说成叛徒是完全错误的。”指挥邓拓、翦伯赞之流出来“反驳”。这个阴谋被毛主席及时发觉和制止了。

六、一九六三年十月，周扬在哲学社会科学部扩大会议上做了报告。这个报告的第三部

分是讲国内任务的，根本不谈当时思想战线上严重的战斗任务，相反，却大谈“整理和研究历史遗产”。他拿出了旧中宣部一伙人的黑话，拼命攻击所谓“用简单化的办法乱贴标签”。“标签”就是指阶级分析。他在会上排斥左派，捧出了一大批修正主义者、资产阶级“权威”来控制这次会议，在历史组做“反修报告”的就有邓拓。要邓拓来充当“反对修正主义”的领导，这不是开玩笑吗？不，这是做政治交易。周扬要投靠反革命的野心家，就一定要支持他们手下的“三家村”。

七、一九六三年十二月，针对反党黑线对文艺界的反动统治，毛泽东同志再一次尖锐地指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毛泽东同志还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个指示，同上面周扬吹捧戏曲“巨大成绩”的谎话，针锋相对，当头一棒，完全揭穿了周扬的反动立场。周扬却继续狡辩，妄想蒙混过关。一九六四年一月，周扬就在一次会议上公开反对毛主席的指示，他说：“文化部的错误不一定是路线错误。”“大多数人是认识问题，包括文艺部门的领导成员和我自己在内。”他以为这样一“包括”，他们就可以重演检讨几句、变为正确的那套反革命两面派把戏了。

八、由于周扬等人一再抗拒中央指示，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同志又一次向文艺界的修正主义领导人提出了极其尖锐的批评，向周扬等人提出了严厉的警告。这就是本文开始时提到的被周扬篡改的那次指示。周扬见势不妙，再抗拒下去自己有灭顶的危险，于是在文化部搞了一次所谓“整风”。这是一次欺骗群众、压制左派、包庇坏人、掩护自己的假“整风”。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周扬在一次“报告”中就利用“批评”夏衍等的机会，吹嘘他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就是“在主席教导下工作的”。“我的错误和你们的路线错误不同”，是“没有经验”。对他周扬是不准批判了，对别人的批判也要“有领导”，即“一律要经过”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领导”的“批准”。这是《阿Q正传》中假洋鬼子的手段：不准革命。

九、在毛主席的亲自关怀下，一九六四年七月，举行了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一贯反对京剧革命现代戏的周扬和他的后台老板，突然假装热心起来。周扬又扮演了作“总结发言”的角色。这篇修改了多少遍的讲话，虽然想尽量装得革命些，却仍然露了马脚，他把夏衍向香港报纸记者发表歪曲京剧革命的谈话，说成是“对京剧演现代戏估计不足”；他还公开宣称：“不是说《谢瑶环》整个的都反动”，尽量开脱田汉的反革命罪行。

十、一九六五年初，在毛主席的号召之下，对于杨献珍、周谷城的反动观点和一批坏电影的批判正在展开。周扬深知这些批判深入开展下去会危及自己的反革命统治，千方百计加以扑灭。他用的还是反革命两面派的老办法：一面假装赞成批判；一面窥测时机，一有机会，就一下子把运动拉向右转。二月下旬，正当一个批判高潮起来，周扬、林默涵立刻以“总结”为名，在北京召集几个主要报刊的负责人谈话，气势汹汹地指责这个时期发表的批判各种毒草的文章“打空炮”、“缺乏分析”、“教条主义”、“乱猜”、“夸大”、“光扣帽子了”，进行了疯狂的反扑。他们还攻击和嘲笑工农兵群众的评论文章“简单化”、“不能代替专家评论”，想把工农兵的批评打下去。他们公开说：“批判夏衍、田汉等人，过去与现在要分开，政治与学术要分开。”又说什么“有些人家已经不谈了，……就算了”。一个“分开”，一个“算了”，这是对毛泽东同志发动的文化革命的反噬，是要强使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就此刹车。此计果然奏效，大批批判资产阶级的文章就此被死死扣押在他们的阎王殿里。

十一、一九六五年九月，周扬等人以为他们已经把革命群众压了下去，稳住了阵脚，可

以演三部曲的第三部曲了，马上迫不及待地向党进行反攻倒算。他们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全国文化局（厅）长会议，周扬和他的后台老板，一齐登台，疯狂诬蔑毛泽东同志。他们还把夏衍、阳翰笙等人请上主席台去，趾高气扬地坐在那里继续专无产阶级的政，周扬在作报告时一再安慰他们："不要老是想到我挨了批评，批评得多一点，少一点……批评得过重或是不够，总是有的"。向他们暗示批评得太"多"太"重"是可以翻案的，只要我周扬不倒，你们总是不会垮的，以后可以东山再起。并再一次把自己说成只是"觉察很迟，纠正很慢"，是"认识问题"。以为这样就可以把他们这一伙人全部保护过关，继续对无产阶级专政了。

十二、最后，就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周扬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做的这一个报告。这是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展十九天之后，无产阶级左派同资产阶级右派进行你死我活斗争的严重时刻。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为了坚决抗拒毛泽东同志关于批判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指示，进行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疯狂地打击左派，包庇右派，妄想扑灭迫在眉睫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周扬决心寸步不让，抗拒毛泽东同志彻底革命的指示。在他的报告中，只字不提眼前这场风雷激荡的斗争，就当作世界上根本没有批判《海瑞罢官》这回事。一九六六年一月，周扬的报告正式发表了。这时，距离他作报告的日子已经一个多月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革命人民批判《海瑞罢官》的斗争已经进一步展开，一小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者则在作最后的顽抗。周扬在他公开发表的报告里，公然继续篡改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表示他决心抗拒到底。

同志们请看：他们是多么顽固地抵抗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啊！他们对无产阶级左派是抱着多么刻骨的仇恨啊！革命的火焰要烧到他们的头上了，他们就死也不肯后退了！他们就要动员黑线、黑店的所有力量反扑过来了！

当我们回顾解放以来文艺斗争的历史时，可以清楚地看到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一条毛泽东文艺路线，是红线，是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了历次重大的斗争，把文化革命一步步推向前进，作了长时间的准备，直到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向资产阶级全面进攻的、亿万人民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直挖进周扬一伙的老巢。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是黑线。它的总头目，就是周扬。周扬背后是最近被粉碎的那个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反革命集团。胡风，冯雪峰，丁玲，艾青，秦兆阳，林默涵，田汉，夏衍，阳翰笙，齐燕铭，陈荒煤，邵荃麟等等，都是这条黑线之内的人物。他们内部不同集团之间尽管会发生各种争吵和排斥，但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就是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工农兵群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政治立场。"批判"胡风的周扬又采用了胡风的恶毒语言，是他们本来就立场一致的缘故。周扬一伙用一打一拉、封官许愿、招降纳叛、相互吹捧等等卑劣手段，把一批叛徒，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极端个人主义者，都收罗进来，安插到各种岗位上去，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他们还竭力用种种方法，使青年中毒，变成资产阶级的接班人，罪恶地把一批青年作者拖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店。这条黑线控制了文化界，控制了各个协会，又伸展到各地，用所谓"会员"制度和重重迭迭的"协会"组织，养了一批资产阶级作家，排斥打击工农兵，搞了大大小小一批"裴多菲俱乐部"。这条黑线是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的。今天，我们一定要砸烂他们一切"裴多菲俱乐部"，捣毁他们修正主义的阎王殿！我们一定要把所有文艺单位的领导权从资产阶级手中夺过来，彻底夺过来！要把那些腐朽的资本主义关系和封建关系，坚决地加以摧毁！

周扬不是曾经自封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吗？由于周扬窃踞了党在文化方面的领导

岗位，并利用党阀兼学阀的地位，把自己装成党在文艺方面的代表，不断吹嘘自己，吓唬别人，造成了这种假象。事物是作为过程而展开的，透过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常常需要一个观察的过程，需要一段让隐藏着的本质充分暴露出来的时间。这并不奇怪。这种情况，过去有，今后还可能发生。然而，当那些反毛泽东思想的"大人物"的真面目暴露之后，回过头一看他们的历史，便会从庞大的假象中发现渺小的本质。周扬公开的文章和内部讲话，只要仔细一查，充满反动的谬论，错误百出，一戳就破。至于周扬自己的所谓"文艺理论"，不过是鸡零狗碎地从洋书中抄一些句子罢了。有什么了不起呢？

周扬不是吹嘘他是从"解放区"来的吗？其实，在延安的时候，他同王实味、丁玲、肖军、艾青等托派分子、叛徒、反党分子是一路货色。周扬是一个混进革命队伍的资产阶级分子。三十年代，周扬是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反对者。四十年代初在延安，他仍旧顽强地宣告"在美学上，我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忠实信奉者"（《解放日报》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七日）。他到了革命根据地，却极端厌恶革命根据地。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七日至十九日，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过反党杂文《文学与生活漫谈》，诬蔑和攻击"延安也自有它一个圈子，它的一套。都穿同样的制服，拿相差不多的津贴，……你在路上走，会从前后左右到处听得见挂在人们嘴上的老一套的革命术语。多么的千篇一律，丝毫没有变化啊！"他用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反革命语言，攻击延安"太窄狭"，"太呆板"，"容不下自己"，狂妄之极地要求"延安也决不能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一套，而必须力求改进，使自己成为更广阔，更包罗万有"（《解放日报》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九日）。这是在毛主席所在的地方，在全中国人民心中的革命圣地延安写出来的话啊！这样恶毒，同王实味的腔调有什么两样！一到无产阶级掌权的地方，周扬的资产阶级本性就爆发成仇恨的反党叫嚣了！"包罗万有"，就是要把牛鬼蛇神也"包罗"进来！果然，在周扬这三篇反党杂文带头之下，冒出了"包罗"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在内的一批反革命的奇文。周扬这种反动立场和思想，受到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尖锐批评。但是，他始终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批评，死也不肯同工农兵结合。这种资产阶级反动本质屡教不改，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进一步发展为全面的修正主义路线。

周扬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派。他之所以能长期蒙蔽一些人，同他这种两面派的手段有很大关系。要学会识别两面派型的人物。两面派是混入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敌人向我们进行斗争的一种策略，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他们只有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办法，才能够混下去。阴一面，阳一面，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用的是马克思主义词句，贩的是修正主义黑货，在不利时退却，在有利时进攻，用假检讨来躲藏，用真进攻来反扑，招降纳叛，结党营私，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为自己的最终目的，这就是他们的一整套策略。识别这种两面派，要看他在重大关键时刻的政治立场，特别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时的政治立场，不能相信那些顺风转向的表面文章。揭露这种两面派，要靠群众运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不就烧掉了周扬的伪装，暴露出他丑恶的灵魂了吗？

揭发出周扬这条黑线，文艺界就万事大吉了吗？也不是。揭发出来，并不等于挖掉，更不等于肃清影响；挖掉了这条黑线，还会有今后的黑线，还得再斗争。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总是要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反映到文艺上来的。战斗的路还很长。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向自己提出新的更高的斗争任务，决不能因为一个战役的胜利就麻痹起来，陶醉起来。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当前是一片大好形势，但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会有反复，会有起伏，会出现种种假象，会遇到反动势力的反扑和软化，要准备再打若干个回合；**但胜利必将属于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善于学习的、团结群众的、革命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只要按照毛主席的这个教导认真去做，善于总结经验，使我们的认识跟着客观过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我们就能练出一身敢于革命、善于革命的真本事。被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冲洗掉的，是一小撮旧世界的残渣余孽，是剥削阶级遗留下的各种腐朽制度和精神枷锁。中国人民将空前巩固地团结在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之下，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迈着革命的大步，朝气勃勃地去创造一个红通通的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原载《红旗》杂志 1967 年第 1 期）

注：

(1) 《清宫秘史》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的影片。一九五〇年三月开始在北京放映。它一面无耻地宣扬屈膝投靠外国帝国主义的奴才思想，美化光绪皇帝和地主阶级中的保皇党，疯狂地叫嚣要依靠"洋人"打进来"帮助皇上恢复皇位，重振朝纲"；一面狂热地诬蔑英勇地反对帝国主义的义和团是"杀人放火""状如疯魔"的"拳匪"，极尽其丑化之能事。这个影片同美帝国主义一个腔调，完全适合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需要，完全适合了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进行反革命复辟的需要，而同毛泽东同志《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伟大号召相对抗。可是这部卖国主义电影出来后，由于党内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鼓吹，不但没有被批判，反而被捧成是"爱国主义"影片。那些反毛泽东思想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竭力阻挠对这个影片的批判。他们实际上"爱"的是地主资产阶级，他们用以观察问题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他们是真正的"保皇党"，这不是很清楚的吗？鼓吹《清宫秘史》的"大人物"当中，就包括有在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保护剥削阶级、仇恨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本质，早在建国初期吹捧《清宫秘史》时就表现出来了。

中共中央关于报纸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

最近，有些省市的报纸，停刊闹革命，这是可以的。但是，有的报纸停刊以后，对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的航空版也停止代印，这就不对了。因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机关报，光明日报也是中央批准发行的报纸，如果不能正常发行，必然会使党中央的精神不能及时同广大群众见面，对全国文化大革命和各方面的工作都是不利的。希望你们遇到这种情况，对红卫兵，工厂工人和机关干部很好地进行思想工作，说服他们在任何情况下保证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的正常印刷和发行。

（已停印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的代印厂，接到这个通知后，请把它印出来张帖在工厂内）

江青、陈伯达、康生接见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

陈伯达讲话

陶铸同志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是同他有关系的，他洗刷这一点，但后来变本加厉。例如你们到中南局去，你们了解很多情况，是有后台老板的，一个后台老板就是陶铸。他在北京接见你们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他是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的许多问题，从来没有跟我们商量过。他独断专行，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党中央，你们揭得很好，给我们很多支持，感谢你们。

江青讲话

同学们：

你们回去斗争要注意两条：一条是实事求是，核实材料，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二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争取多数，不要把敌人看成铁板一块，多数派同学，很多是受蒙骗了，不是不能做工作的，是可以分割的，一定要做细致的工作，这是策略问题，希望大家注意这几点。

康生讲话

同志们：

把材料整理出来，有材料摆出来了，你们就胜利了。再见！

〔附〕 陶铸同志被打下台的真相

宋 琼

望不尽浩气贯虹彖生辉，怀不尽耿耿丹心鞠躬瘁；恨不尽妖魔切齿谤忠骨，烧不尽革命烈火焚污秽。每当我读到这几句诗的时候，总是禁不住心潮汹涌，深深怀念起我们所尊敬的陶铸同志。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以前的短短几个月里，因为工作关系，我曾和陶铸同志有过一些难

忘的接触。我亲眼看到，陶铸同志怎样不知疲倦地、夜以继日地为捍卫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英勇奋战；我也亲眼看到，陶铸同志如何横眉冷对林彪、“四人帮”、同陈伯达、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我还亲眼看到，陈伯达、江青一伙怎样施展反革命阴谋，对陶铸同志进行卑鄙狠毒的政治陷害。陶铸同志所具有的那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秀高尚品质，长时期以来深深地教育着我，激励着我。

整整十二个年头过去了。陶铸同志同林彪、“四人帮”英勇斗争的情景，如今又一幕一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毛泽东同志发动的旨在反修防修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林彪、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伙披着“左派”红色外衣的阴谋家、野心家，就相互勾结，猖狂地进行干扰破坏。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制造混乱，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妄图利用文化大革命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党内就展开了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周恩来同志坚定地站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一边，陶铸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积极协助周恩来同志，投入极为艰巨复杂的伟大战斗，阴谋篡夺运动领导权的林彪、“四人帮”，首先把矛头指向当时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同志。一九六六年六月，调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长的陶铸同志，刚来到北京，江青就施展诡计，妄图在他身上打主意。她一面假惺惺地向陶铸同志表示亲切，说什么“你来中央工作，我们很高兴”，一面居心险恶地进行挑动，说什么邓小平同志“很凶”呀，“镇压群众”呀，“搞反动路线”呀，要陶铸同志向邓小平同志“开头炮”。对于以党的原则作交易极端卑视的陶铸同志，深信小平同志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位杰出领导人，深知在党内搞突然袭击是最卑鄙最无耻的，斩钉截铁地作了回击:“我不了解情况!”有眼无珠的江青，在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的陶铸同志面前碰了一鼻子灰。但是，江青并没有死心。她到处游说，拉帮结伙，策动当时掌管政法工作大权的那个人充当打手。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这个人按照林彪、“四人帮”的意旨、一手拿着帽子，一手拿着棍子，恶狠狠地向邓小平同志打了过来。陶铸同志对他的这种卑劣行径极为不满，当即向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作了汇报，并且坚决不让这个人对邓小平同志的毁谤发言刊登会议简报，使它没有市场。从此，江青对陶铸同志更加怀恨在心。

怎样估计建国以后的十七年，怎样估计我们党的干部队伍？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我们党同林彪、“四人帮”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一场严重的斗争。诡计多端的陈伯达、江青一伙，向全会抛出了一个所谓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二十三条”，把他们所谓的“黑帮”、“黑线”专政的反动观点塞进党的正式文件，妄图为他们打倒一切制造合法根据。陶铸同志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托，和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等同志一起，担负修改这个文件的任务。这是一场特殊的斗争。陶铸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思想和周恩来同志的意见，坚决驳斥了陈伯达、江青一伙的反动观点，把“二十三条”中有关所谓“黑线”、“黑帮”的内容和字样统统删掉；并在文件中对我们党的干部状况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绝大多数也是可以改正的。他们还根据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以及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同志的建议，在文件中明确规定军队不搞“四大”，保持人民解放军的稳定。毛泽东同志说这个文件改得好，并亲自将其中一条归纳简化为“要文斗，不要武斗”。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就是这样制定的，提交全会顺利通过，挫败了林彪、“四人帮”在全党推销假左真右货色的阴谋。

林彪、“四人帮”顽固对抗十六条，疯狂破坏十六条。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十六条以

后，他们打着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幌子，制造了所谓当权派和工作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黑帮”这样一个反动公式，煽起揪斗各级领导干部的妖风。已经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陶铸同志，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和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朱德、邓小平、陈云、李富春同志，政治局委员叶剑英、李先念、陈毅、贺龙、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等同志并肩战斗，步调一致，积极协助周恩来同志，同林彪、“四人帮”的罪恶活动作了顽强的斗争。在那些日子里，陶铸同志和其他许多中央领导同志一样，通宵达旦地接见来自各地区和各条战线的群众代表，教育群众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要把有缺点有错误的干部当成“黑帮”；要大家具体分析文化大革命初期工作组的情况，“不能把工作组某些工作上的缺点错误都当作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绝大多数也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陶铸同志在多次接见群众代表的时候，反复强调“要学会用毛泽东思想正确处理两条的路线斗争，不要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的那一套搞得党内离心离德、怨声载道”，叮嘱广大群众记取这个历史经验。他还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道，亲自出面保护中央和国务院的一些部长和一些省委书记，以及一些高等院校的负责人，身体力行地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积极保护党的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一九六六年八月以后，一些党政领导机关开始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无政府主义思潮抬头，少数工厂停工停产。为了扭转这种状况，特别是为了防止它向农村蔓延，保证十六条规定的抓革命促生产方针的贯彻执行，同年九月间，陶铸同志根据中央常委办公会议的精神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提出了农村县以下暂时不搞文化大革命，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城市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按“四清”部署分期分批进行等八项规定，经中央批准后下发。同年十月，陶铸同志和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等同志一道，又提出农村县以下单位不搞“四大”、不搞串连等五条规定，报请中央批准后下达。同年十一月，陶铸同志受党中央委托，召开部分省、市委书记座谈会，提出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要按照“四清”部署分批分期进行，不搞串连，要坚持八小时生产，坚持业余闹革命。这时，林彪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他赤膊上阵，竟然颠倒是非，攻击省、市委书记座谈会纪要是什么“用生产压革命”，把这个座谈纪要一棍子打死。江青仗恃林彪的黑旨意，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大发雷霆，狂妄地要陶铸同志下令取消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的五条规定。陶铸同志义正词严地告诉江青：“这是中央决定的，我没有这个权利！”江青妄图破坏革命和生产的阴谋被揭穿了，她气急败坏，大吵大闹，强逼周总理表态。周总理坚决支持陶铸同志的意见，驳斥她说：“生产搞乱了，我们去喝西北风吗？”

“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是毛泽东同志亲自规定的原则。对此，林彪、“四人帮”疯狂进行干扰和破坏。早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江青在一次会上就煽动年轻幼稚的中学生，说什么：“我们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陶铸同志同他们针锋相对，在七月三十日的一次万人大会上，当着陈伯达、江青的面，在讲话中强调：“要搞真正的民主空气，有的地方说辩你一家伙，就是斗你一家伙，搞‘喷气式’，这个不好！”陶铸同志还在接见群众代表的许多次会议上，反复教育大家：“要摆事实讲道理，要实事求是”，“绝不搞武斗，不搞变相体罚，不囚禁起来、不搞疲倦战术”，引导群众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办事，极力抵制林彪、“四人帮”挑动武斗的妖风。

陶铸同志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越来越白热化，几乎在每一次中央文革会议上，陶铸

同志都在和陈伯达、江青一伙进行面对面的斗争，驳斥他们的反动观点。江青和林彪为了达到篡党夺权，勾结在一起进行了许多罪恶活动。陶铸同志察觉江青销毁了一些有关林彪的材料。为此，江青很恐慌。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的一次中央文革会议上，江青一进门就歇斯底里地把皮包往陶铸同志面前一摔，狂喊大叫："你怎么知道的！你想干什么？"在敌人的法庭上、在艰苦的战争中久经考验的陶铸同志，对江青的丑恶表演十分蔑视，他当场怒斥道："你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江青理屈词穷，又怕又狠。到了十二月下旬，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就象疯狗一样，在一次会议上对陶铸同志猛扑过来。他们攻击陶铸同志是"最大的保皇派"。陶铸同志当场驳斥："对我们党的干部为什么不应该保？"江青说："你保的一伙是坏人！"陶铸同志反问"根据是什么？"那个和林彪、"四人帮"关系很密切、老奸巨猾的人，看到江青无言以答，就编造了一个血口喷人的谎言，他说："你保的王任重是一个CC特务！"他竟把一个名叫"任重"的特务，硬安到王任重同志身上，对陶铸同志和王任重同志实行政治陷害。陶铸同志不畏强暴，刚直不阿，警告他们："历史是谁也篡改不了的！"这天陶铸同志再也压抑不住他对林彪、"四人帮"的满腔怒火，在他走出会场时，愤愤地说："他们存心要把阶级阵线搞乱！"

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信赖陶铸同志。一九六六年八月，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和大家一起选举陶铸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同志认为陶铸同志政治上坚定，有实际工作经验，建议在常委分工时，让陶铸同志担负更重要的任务。毛泽东同志采纳了周恩来同志的建议，委托陶铸同志协助周恩来同志处理党和国家的日常事务。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还决定陶铸同志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下旬，毛主席和陶铸同志作了语重心长的谈话，并且决定派他在新年过后去外地考察几个省、市的运动情况。毛泽东同志还亲自交代陶铸同志，要他代表党中央去保一保正在受到严重冲击的几位省委第一书记。十二月底，周恩来同志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重要决定。

毛主席和周总理越是信赖陶铸同志，林彪、"四人帮"对陶铸同志就愈加仇恨和恼怒，他们恨不得一棍子把陶铸同志打翻在地。一九六七年元旦刚过，这伙老奸巨猾的政治恶棍终于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反革命突然袭击。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下午，周恩来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到北京体育场接见教育界、文化界、新闻出版界、体育界的代表。当时，周恩来同志叫我通知在场的政治局委员在接见群众代表后，到人民大会堂开政治局会议，并通知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成员列席。当天下午两点钟，周恩来同志和陶铸同志来到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厅，正在商量政治局会议要议定的几个问题。这时，阴险毒辣的陈伯达、江青和那个同林彪、"四人帮"关系很密切的人，却在人民大会堂的另一个会议室，接见所谓中南地区的一个群众代表团。在这里，陈伯达杀气腾腾地诬蔑陶铸同志是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变本加厉"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的"新的代表人物"。江青恶狠狠地攻击陶铸同志"独断专行"，把陶铸同志打入"敌人"之列。那个同林彪、"四人帮"关系很密切、老奸巨猾的人，更是施展那套先定罪后编材料的惯技，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把材料整理出来"，胡说只要按照他们事先罗织好的"罪名"，把"材料摆出来了"，"就胜利了"。

下午两点钟，中央政治局的同志按照通知陆续来到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同志和陶铸同志所在的那个厅，但是陈伯达一伙却迟迟不到。于是周恩来同志亲自去找陈伯达，催促他们赶快来开会，但并不知道他们已经在背后打了陶铸同志的黑枪。陈伯达、江青这伙惯骂别人"两

面派”的家伙，这时再次扮演了货真价实的反革命两面派角色。他们装模作样地走进厅来，又若无其事地和陶铸同志坐在一起开会了。政治局开完会，已经是下午五点多钟，周总理和陶铸同志没有来得及休息，又分头去接见群众代表，他们谁也不知道，就在这个时候，“打倒陶铸”、“揪出陶铸”的大标语，已经贴到了大街小巷；印有陈伯达、江青和那个同林彪、“四人帮”关系很密切的人的讲话的传单，也正在北京许多地方散发。陷害陶铸同志的反革命舆论已经形成，并象妖风黑雾一样在弥漫。

就这样，没有经过党的任何会议讨论，没有经过党中央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批准，没有下发任何文件，党的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国家的一位副总理，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位顾问，我们大家所尊敬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陶铸同志，竟被陈伯达、江青一伙的诬蔑诽谤所中伤，成了他们卑鄙无耻的政治阴谋的牺牲品。

敬爱的周总理对陈伯达、江青一伙的恶劣行径极为愤怒。他在一月七日凌晨一点钟，接见了所谓“批判陶铸联络站”代表，郑重地向他们宣布：“陶铸同志是中央常委”，“你们举行批判陶铸的大会不恰当，因为中央常委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讨论，你们开会我们不能参加！”一月二十三日夜，周总理在接见首都大中学生代表时，又当着陈伯达、江青的面，告诉群众：“陶铸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来的，我没有根据不信任他呀！”

林彪、“四人帮”选择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这样一个时刻，举起屠刀向陶铸同志杀将过来，矛头决不只是对着陶铸同志个人的。这是他们篡党窃国的一个重要反革命步骤。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半年时间中，林彪、“四人帮”到处伸手夺权，在中央工作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的被“打倒”，有的被罢官，有的靠边站。在中央文革小组任副组长的王任重、刘志坚同志，当时也已受到诬陷。陶铸同志当时仍在坚持工作，而且职务和威望较高，又任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这不能不是林彪、“四人帮”的心腹之患，是他们篡党窃国的一个直接障碍。这一点江青曾经不打自招地作过供认。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她在接见群众代表时说：“陶铸还镇压我，镇压我们小组”，“隐蔽在我们中央文革小组里边”的，“开始是王任重，后来是刘志坚，现在是陶铸”。这里，江青说得再露骨也没有了！他们把王任重同志和刘志坚同志等搞倒，再把陶铸同志搞倒，中央文革小组就变成了他们这伙叛徒、特务、篡党夺权分子的一统天下，就可以进而打倒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国实行他们的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了。为了实现这一阴谋，早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江青、姚文元在清华大学西操场，就下达了一道反革命动员令：“在一九六七年我们将要在各个战线发动全面的总进攻！”一九六七年元旦，他们的同伙王力在接待站进一步宣布要“重点抓好北京和上海”。从此，他们便在北京、上海煽起了反革命风暴。在上海，张春桥、姚文元于一月初窜了去，策划一系列的阴谋活动。一月四日和六日两天，他们所控制的《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几个人相继发表所谓“造反”宣言，宣布“夺权”。紧接着，王洪文和他的党羽篡夺了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权，从而在全国煽起了“夺权”的妖风。在北京，一月三日，由林彪死党邱会作控制的军事院校群众组织的头头，发起召开所谓批判叶剑英、陈毅同志的十万人大会；并贴标语，散传单，攻击聂荣臻同志和徐向前同志。一月四日下午，陈伯达、江青对陶铸同志搞突然袭击；同时，江青又大闹政治局，恶毒诬蔑贺龙同志是“坏人”，“要把贺龙端出来”。一月七日至九日，林彪、“四人帮”直接煽动群众多次包围中南海，要揪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领导同志李先念、李富春、陈毅、谭震林和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同志。与此同时，北京大街上连续贴出打倒周总理的大标语，散发林彪辱骂朱委员长的传单。一月十日，陈伯达在接见群众代表时，毫不掩饰地说出了他们的狼子野心。他说：“除陶铸之外是否还有旁人呢？

可能还有个把子，至少!”他还说:“有的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过得来，但到社会主义时期就有许多人过不了关……，所以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主义这个大关就有相当多的人过不了，当然也是‘一小撮’啦!”接着江青插话说:“跟七亿人口比就很少了!”这伙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野心家，要把站在第一线同他们作坚决斗争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当作“一小撮”统统打倒。

一九六七年一月，我们伟大祖国的上空阴云密布，妖风四起。林彪、“四人帮”妄图架空毛主席，打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而打倒周总理和朱委员长，搞垮政治局，瘫痪国务院，全面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罪恶阴谋已经昭然若揭。他们陷害陶铸同志，正是这个政治大阴谋的一个行动步骤。

这就是历史的真相，历史的见证。

革命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林彪、“四人帮”妄图逆历史潮流而动，终于被历史的车轮辗得粉碎，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寒凝已尽春华茂，血沃长培劲草妍”。我们党胜利了，无产阶级胜利了，人民胜利了。这是在革命斗争中英勇献身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数先烈的鲜血换来的。他们的英名，包括我们所尊敬的陶铸同志的英名，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他们的光辉斗争业绩，将永远载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光荣史册；他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将永远鼓舞我们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向四个现代化胜利进军。

安息吧，陶铸同志!

(原载 1979 年 1 月 4 日《解放军报》)

〔附〕 陶铸生命的最后四十三天

一

这是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的夜晚，合肥机场来了一架专机。

在一片黑暗中，几个人从飞机上走下来，很快进了等候在停机坪上的一辆轿车，悄悄地驶出了机场大门，朝西郊的解放军某部医院急速驶去……

不一会，从停机坪开来的那辆黑色轿车开到了“秘密病房”门口。车门打开，一个面戴口罩、身穿呢大衣、手拄拐杖的人，忍着痛苦，坚强地走下车来一位从北京用专机送到合肥的“特殊病人”。

他是谁呢?

监护人员猛然认出来了。他不就是那位被诬陷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叛徒”“资产阶级司令部第三号人物”的陶铸同志吗!

从这天晚上起，身在囹圄的陶铸同志连真名真姓也不能使用。病历上写着“王河”的化名，那是押送他的人给他起的名字。住院期间，别人都是用这个名字叫他。

这是一间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病房，一间经过精心安排的“秘密病房”。

几天前，医院里有个搞政治工作的同志被领导召去“密谈”，要他立即选个地方做病房备用。要求是：既要安全又要绝对保密。最后他一再得到训诫：此事只允许他一人去做，不准

告诉任何人。

这个政工人员领受了"密令"，很快对全院所有的房子作了一番选择。

为了做到"安全"和"保密"，防止病人"逃跑"、"自杀"、"行凶破坏"，防止病人"被抢走"、"被打死"、被选的"病房"特作如下改装：一张病床的床腿被截去一段，显得特别矮；电灯吊得几乎贴到天花板上；重新单独改装了变压器，电压很低；北边墙的窗子外面钉上了几道木杠、窗口堵死了；窗子上蒙挂着厚实的窗帘，不能让别人从外面看见里面的人；病房门口走廊的一头被堵死，一直堵到顶上楼板，不留一条缝；走廊外只有一道门进出，平常是封闭的，不轻易开、非监护人员一律不准进入。

病房门口，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两个战士看守着，严密注视病人的活动，进行"特级护理"。按照规定，看守人员不能随便与病人交谈，但要认真地记病人"动态日记"。……

早在陶铸同志入"院"之前，在专案人员的组织下，就成立了监护小组，由一名组长，两名副组长负责。当时陶铸同志在合肥住院的事，省里除那个主要负责人和有关部门极个别负责人外，知情人就限制在这个小范围里了。专案人员要监护小组"终身保密"，并威胁说："你们的名字都装在中央档案里，谁泄密谁负一切责任！"在监护小组负责人会议上，专案人员宣布说："陶铸是叛徒，性质已定。我们采取监护措施为的是保存罪证，……对他管理一定要严格！"

到合肥那天夜里，专案人员又一次召集起监护人员警告说："现在你们面对的是一个凶恶的敌人。对他监护，只要不出问题，就是完成任务！"就是说，治病是假的，控制住他才是真的。对他"要坚持斗争，要讲究斗争策略。"如何才能不出问题呢？他们的具体规定有十条之多。

不是囚犯，却不如囚犯。囚犯还有放风的时候，陶铸是不能出来放风的。病房里不见一丝太阳光，大白天小屋里也是一片灰暗。

"铁屋如灰"。陶铸同志生命的最后四十三天，就是在这间见不到阳光的小屋里度过的。

二

一来到合肥，陶铸同志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都被掐断了。规定他不准打电话，不准与外面通讯，不准会客，等等。他活动的天地就是病房。开始，陶铸同志还能在病房里走动，有时一走就是二十分钟；实在累了，他就躺下来歇歇，擦擦汗水。有次，陶铸同志吃了一点面条，自觉精神还好，就下床来了。踱着踱着，他索性把拐杖甩到一边，不用任何支撑走起来。小小的病房，成了他作体育运动的场所。

陶铸同志以极大的毅力坚持着踱步，锻炼身体，为党为革命要活下去！那情景如牢笼里的一只猛虎，多么想大吼一声，冲出牢笼，奔回山林！现在他被关着，不仅受了"伤"，连"吼叫"的权利也没有。看守人员接受了押送者的"密令"："如果他不老实，'装疯卖傻'，大喊大叫，就堵他的嘴！"要进一步"顽抗"吗？对不起，他们手中有的是整治囚徒的工具！

在这里，他连张一张嘴，说一句话，都要受到注意和反击，都会被认为是"放毒"，专案人员曾多次向监护人员交待："警惕他挑衅、攻击和放毒"，要防备他"套话"，遇到这些情况，"要作坚决斗争"。

林彪、"四人帮"在政治上诬陷、迫害陶铸同志，这在今天已是尽人皆知的铁案。但人们迄今并不了解，作为一个病人的陶铸同志，在这间病房里住了那么多天，是否得到了应有的

治疗?

关于治疗情况，专案人员也有“指示”:“根据病情和这里的条件治疗用药。”这句话记在监护小组一位负责人的本子上。猛听这话似乎还不错，其实是个骗局。“治疗”吗？那只是个幌子，如果真要“根据病情”给陶铸同志治疗，为什么要把他从北京搞到合肥？难道他的病情还不够危险？难道北京治疗的条件还不如合肥吗？否。他们这句话的要害。是在“这里的条件”上玩弄花招——治好治坏，谁能包得了?“这里的条件”就是“这里的条件”嘛！当然这几个字，也还有更深的一层意思：这里医疗条件虽不好，但政治条件却是很好的。那个主持省委工作的某负责人是林彪、江青信得过的。在这里他们想怎么处置陶铸同志，都可以得心应手嘛。事实上，自从陶铸同志迈进这间“秘密病房”那时候起，“这里的条件”的特殊威力，就开始起作用了。根据陶铸同志的病情，他的饮食标准在名义上是“特饮”，其实是任何特殊的照顾也没有；他想吃点甲鱼，黄鳝，这类东西在合肥不难买到，但回答是搞不到。结果每天端上来的都是吊不起胃口的老一套。

到十月下旬，由于病情和精神的双重折磨，陶铸同志的健康状况明显恶化。他已经完全不能起床，不能吃饭，不解大便，再不作病情检查，进行抢救治疗，不病死也要很快会饿死!

监护小组把病情反映给上面，结果勉强得到同意可以给陶铸同志作一次检查。同时也下来一道“指示”:“与病人接触的人不能再扩大范围，特别要注意保密。”

十月二十三日深夜，万籁俱寂，医院里的人都睡了。监护人员进了“秘密病房”，给陶铸同志带上口罩，用担架把他抬到放射科进行胸透。检查结果证明，陶铸同志的病情已非常严重：肠子粘连，已经发展成为完全性肠梗阻。后来又经过请示，一直拖到十一月十五日，时间过了二十三天，才得到据称为“中央”的批准，决定给陶铸同志施行手术。

这就是所谓“根据病情”得到的“治疗”!

手术仍在深夜进行。当陶铸被送上手术台时，他的神志还是清楚的。他不放心地再三问手术医生：

“我到底是什么病?”

“溃疡病眼发黄吗?”

“……”

陶铸同志不相信自已是溃疡病。溃疡病眼睛是不会发黄的，但监护人员却说他是“胃溃疡”。

腹腔打开了，无影灯下，医生惊呆了：淋巴结广泛转移，癌组织满腹部都是，大的如蚕豆，小的如绿豆，血管焦脆，稍碰即破，随时都会引起大出血。手术已根本无法进行，折腾了半夜，腹腔打开后又缝合起来，连完全性肠梗阻治疗问题也没有能解决。但是极度衰弱的陶铸同志挨了这一刀后，由于失血过多，又没有得到相应的积极治疗，这对他的生命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是无法回答的。

手术后，陶铸同志就一直处于肝昏迷状态。

手术中，有一件事不能不单独一提。不知是由于真个的“这里的条件”限制，“血库里没有血浆”呢（监护人员这么说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这个原因，有关人员还没有敢说出的），这次手术后，没有能给陶铸输血，只是按一般情况输输液而已!! 这是我们今天能想象的事吗?

癌症发作时给病人造成的疼痛，据说是任何其他病症所比不了的。护士们亲眼看过陶铸

同志每当疼痛发作时，坐起趴下，趴下坐起，一刻也不安宁。坐着时，他用拳头顶住腹部，腰勾着，强迫拳头对痛点产生巨大的压力，用来减轻痛苦。趴在床上，他的病痛似乎也未能有些微的减轻，常常能看到他用拳头顶着腹部，两条腿，一会儿伸，一会儿曲，辗转反侧，苦不堪言。虽是冬天，病房里不生暖气，他却满身冷汗。这是剧痛和毅力激烈交锋后的产物。不吃东西，不给营养补充，却要流汗，单这汗水也会耗尽他的心血和生命。

那是个晚上，只有一个护士值班。陶铸同志已经吃过止痛片，仍没有效果。这个护士心里也有些不忍，在陶铸同志一再要求下，没有报告，自作主张地给他打了一针止痛针。

可是第二天，这事被上级知道了。护士受到警告："以后不要给他打针了。打止痛针要请示'中央'！"

可见，陶铸同志每一个治疗细节都是在"中央"即林彪、江青一伙控制下进行的，想要获得真正的治疗，这是可能的吗？

三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二十二时十五分，不朽的无产阶级忠诚的战士陶铸同志不幸逝世了！

陶铸逝世的当天夜里，监护小组立即打电话报告了"中央"。第二天，专案人员带着"六条意见"从北京飞到合肥，在他们的"监督"下对陶铸同志的遗体进行了"热处理"。

有人提出让他的亲属来合肥料理丧事，遭到了专案人员的断然拒绝！

监护人员为陶铸同志穿上一件件"老衣"——最外面的是黑灰色大衣。在为陶铸找"老衣"时，他们打开他从北京随身带来的那个大木箱子，才发现里面几乎全部装的是书，衣物只有少量的几件：米黄色的衬衣、丝棉衣、呢制服……

陶铸同志的遗体用一床白布床单裹盖着。在他逝世后第二天灯火已残的深夜，遗体被抬上救护车，迎着哀号的寒风，偷偷地送到合肥火葬场去！

火葬场上，一切早有了周密的安排。人们被告知说：死者叫"王河"，是"烈性传染病"夺去了他的生命。因为是这么一种病，"安全"要紧，所以，火葬场除二名烧大炉的工人参加工作外，其余一概不参加这次火葬，但两个烧炉工不准接近遗体。跟来的几个监护人员戴着大口罩，穿着白衣服，忙着搬运遗体，谁也不说话。他们以"医护"名义出现，造成一片"烈性传染病"的恐怖气氛。

火葬要有人签字。谁来签字呢？那个政工人员"奉命"在火化单上签了"斯亮"二字。"斯亮"是谁呢？当时人们并不了解。可是后来大家终于知道，原来那是陶铸同志心爱的女儿的名字。

根据专案人员的"意见"，陶铸同志的骨灰被收进一个质量最差的骨灰盒。骨灰盒上连一点点花纹也没有，这也是专案人员规定死了的。

(摘自徐子芳《陶铸生命的最后四十三天》，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抓革命，促生产　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几个月来所开展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运动，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胜利。我们在胜利的战歌声中，跨进了一九六七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指出："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人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也就是说，一九六七年将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线崩溃彻底瓦解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的伟大胜利的一年。

上海市广大革命群众，在批判上海地区党内一小撮人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也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并进人了一个更深人、更广阔的新阶段。

我们上海市工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冲破一切阻力，汹涌澎湃地向前发展。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最听毛主席的话，坚决执行**毛主席亲自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我们革命造反派深深地懂得：不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的生产就会迷失方向，就会滑到资本主义的方向上去。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亲身经历的事实越来越多地证明：只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了，生产才会有更大的发展。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的看法，是错误的。

可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十分仇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千方百计地对抗**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他们的阴谋手段大致表现如下：

运动初期，他们以"抓生产"为名，来压制革命，反对抓革命。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要起来革命，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就以生产任务压工人，给我们扣上"破坏生产"的大帽子。他们是真的要"抓生产"吗？不是的，他们是为了保他们自己的乌纱帽，企图阻挠我们革命。我们戳穿了他们的阴谋诡计，勇敢地起来造反了。

于是，他们又抛出了另一种花招，以极"左"的面目，以漂亮的革命词句，煽动大批被他们蒙蔽的工人赤卫队队员借口北上"告状"为名，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运输，以达到他们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最近，更有一小撮反动的家伙在阴谋策划停水、停电、停交通。对这样一些反动的家伙，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严加惩办，决不能让他们的罪恶阴谋得逞。

革命的工人同志们！紧急行动起来！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

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要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我们不但要做抓革命的先锋和骨干，而且也要做促生产的先锋和骨干。我们上海是一个全国最大的工业生产城市，它在国家的整个经济生活中起着极其重大的作用。但是，最近在很多工厂中出现部分或者大部分的赤卫队员停止生产、离开生产岗位的现象，这就直接违反了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直接影响了人民的生活和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我们的革命造反派工人牢记着毛主席的教导，顶着这股逆流，发挥了高度的革命负责精神，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顶起了全厂的生产，有力地打击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他们企图用破坏生产来打击革命的大阴谋。这样做得对" 做得好" 我们全体革命造反派的同志，都要向他们学习。**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我们革命造反派工人有志气、有决心，有力量，一定能把革命和生产搞得更好，实现**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

工人赤卫队的广大的要革命的阶级兄弟们!**"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提出的方针**，是党中央一再强调的方针，是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重要方针。拥护不拥护、执行不执行这个方针是一个原则问题，大是大非问题。你们受他们煽动而离开生产岗位，究竟是对谁有利呢？你们这样做到底是使谁高兴、使谁心痛呢？我们希望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一定要擦亮眼睛，明辨是非，不要再受骗了，赶快觉悟过来，回到生产岗位上来，回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一定会热情地欢迎你们回来，和我们共同革命，共同搞好生产，我们一定不会责怪你们，因为我们都是阶级亲兄弟，因为你们中绝大部分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毒害的人，是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蒙蔽的革命群众。

全市一切革命学生和革命的机关干部们" 让我们和广大革命工人紧紧结合在一起，为了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广泛地开展宣传和斗争，更坚决地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打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切新反扑，将工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高潮"

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无限光芒照耀下，展望未来，革命前程灿烂辉煌。我们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一切劳动者同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联合起来，共同努力，并肩战斗，乘胜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万岁" 万万岁"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
上海市反到底联络总部
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
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
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
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
首都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

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驻沪联络站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

(原载 1967 年 1 月 5 日《文汇报》)

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
告 读 者 书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

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 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 革命的同志们"

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宣告: 经过一段时期的艰苦斗争，从今天起，我们"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接管了《文汇报》。

我们决心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刀两断。我们坚决听毛主席的话，紧跟毛泽东思想，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边。

《文汇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中获得了新生。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胜利，是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胜利。

解放以来，《文汇报》罪恶滔天。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曾经几度顽固地统治着《文汇报》。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窃取了《文汇报》的领导权，执行了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做了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喉舌，《文汇报》堕落成为一张右派的报纸。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窃踞《文汇报》领导岗位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公然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在报上宣传毛泽东思想，忠实地执行旧中宣部"阎王殿"的黑指示，实行了一条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办报路线、《文汇报》成为一张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的报纸。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来的《文汇报》，又不折不扣地贯彻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头的根子，就是一两个或几个在中央做工作的负责人。《文汇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压制群众，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妄图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下去。《文汇报》又成了一张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报纸。

《文汇报》对党对人民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旧《文汇报》必须彻底革命，彻底改造。十几年来，革命的左派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不断地对《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和斗争。《文汇报》不是风平浪静的。今天，我们《文汇报》的革命造反派决

心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大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一切腐朽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反，大造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的反，大反特反，一反到底。阻力再大，决不回头。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最高的行动指南。我们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办好新《文汇报》的灵魂。我们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宣传和捍卫毛泽东思想作为新《文汇报》的最高的战斗任务。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大力宣传，大力提倡；凡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就坚决抵制，彻底打倒。

《文汇报》应该成为一张革命造反的报纸。我们要全面开展阶级斗争，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战斗任务；在这场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我们坚决一边倒，最鲜明地倒向革命造反派一边，为革命造反派擂鼓助威，摇旗呐喊，为新生事物鸣锣开道，大喊大叫；我们决心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腐朽的意识形态，痛加针砭，痛加批判。

在报纸工作中，我们要最坚决地贯彻毛主席的办报思想，走群众路线，依靠革命造反派和广大工农兵群众办报，发扬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的无产阶级的战斗风格。

今天，我们重新全文刊登了**毛主席为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对《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进行再批判。我们一定努力把新《文汇报》办成一张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革命造反的报纸。如果我们的工作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热烈欢迎革命同志来造我们的反。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革命造反有理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彻底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全上海的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原载 1967 年 1 月 4 日《文汇报》）

《解放日报》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
告 读 者 书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

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

一月五日下午八时整，我们接管了《解放日报》，宣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解放日报》死亡，革命造反的《解放日报》诞生了！

这一革命行动，是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沉重打击，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胜利，是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胜利！

毛主席教导我们："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

《解放日报》原来是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报，它应该成为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贯彻执行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得心应手的工具。但是，近几年来，《解放日报》在市委和报社党委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操纵下，背离了毛主席的教导，发表了许多严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毒草。一九六二年前后，窃踞《解放日报》社领导岗位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的办报路线。他们抵制宣传毛泽东思想，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先后发表了如《李世民与魏征》《南包公海瑞》等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大毒草。他们大捧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发表了为三十年代文艺路线的"祖师爷"夏衍、田汉等人记功立传的《影事春秋》等等。总之，这一时期的《解放日报》竭力为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成了资产阶级的工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解放日报》忠实地执行了市委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报纸上制造舆论，转移斗争大方向，压制红卫兵运动和工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击革命左派，妄图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下去。

最近发生的大规模群众斗群众的"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市委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又一次大暴露。而《解放日报》党委，在"解放日报事件"中，成了忠实执行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帮凶。

旧《解放日报》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必须彻底批判，彻底改造。我们《解放日报》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有责任接管《解放日报》的领导权。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革命的事情，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解放日报》就是要成为革命左派的报纸，就是要成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专政工具，就是要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这个阵地，我们是占定了！这个权，我们是夺定了！

毛主席说："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高举的就是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办好《解放日报》的指针。我们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要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坚决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战斗任务；我们要根据**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教导**，大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推动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大力宣传，大力提倡；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坚决抵制，彻底打倒。

我们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贯彻群众路线，依靠革命左派，和广大工农兵群众一起，把报纸办得尖锐泼辣，旗帜鲜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挥革命的、批判的、战斗的作用，使《解放日报》成为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如果我们的工作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热烈欢迎革命同志来造我们的反。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
彻底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原载 1967 年 1 月 6 日《解放日报》)

革命造反有理万岁

(一八六七年一月六日)

《文汇报》社论

《红旗》杂志编者按：《文汇报》从今年一月四日以来，面貌焕然一新，成了一张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报纸。它连续发表了许多好文章和好社论，本刊转载的《革命造反有理万岁》就是其中的一篇。这篇文章好得很！它把那些形形色色的不准造反的奇谈怪论痛加驳斥，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

有些负责人，他们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但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或没有改造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既不学习，又不接近群众。因此，他们直到今天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很不理解，于是就跟着瞎说"过头了"，"太乱了"，"革命精神是好的，具体做法不对"等等。应该向这些同志大喝一声：这样下去就要从不理解走到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些同志，极有必要读一读《革命造反有理万岁》这篇文章，照照自己的思想，换一换脑筋。希望这些同志，赶快猛醒！赶快猛醒！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杀出了一批革命造反派。他们根据毛主席"造反有理"的教导，高高举起革命造反的大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那些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物，发起了急风暴雨式的总攻击。其势锐不可当，迅猛异常，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批红色革命造反派，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他们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

革命造反派，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感情最深厚。他们最理解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最支持革命造反派。他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一边，为了誓死捍卫党中央，誓死捍卫毛主席，他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天不怕，地不怕，鬼不怕，神不怕，围攻不怕，打击不怕。他们怀着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敢想，敢说，

敢干，敢闯，敢革命，真正做到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革命造反派，深深地懂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他们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作出了许多所谓“越轨”行动。“越轨”就是革命！“越轨”就是造反！这些“越轨”行动，是革命的创举。每一个真正革命的同志，都应该欢呼“好得很”，而不应该跟着瞎说“糟得很”。

革命造反派，他们的目光最锐利，嗅觉最灵敏，斗志最旺盛。在他们的冲击下，一小撮躲在阴暗角落里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论伪装得怎样巧妙，还是一个一个地被他们揪出来了；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不论采取什么新的形式来欺骗群众，都一一被革命造反的红卫兵小将们识破了。在革命造反派的穷追猛打之下，那批顽固分子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处境越来越狼狈。他们如果不低头认罪，不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而继续顽抗下去，则非垮台不可。

革命造反派，他们敢打敢拚敢造反，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结果，革命造反派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最有成绩。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是关在书斋里学，而是在大风大浪中学，带着阶级斗争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学，因而学一句，顶一句用，精神力量化作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在大敌当前、困难重重时，他们学了毛主席著作，就浑身是胆，敢于豁出去，任何困难、阻力都压不倒他们，而只能被革命造反派所压倒。

革命造反派冲在前头，遇到了种种阻力。这些阻力，花样不少，说法不一，但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一句话：不准造反。我们必须把那些形形色色的不准造反的奇谈怪论痛加驳斥。

“过头了，过头了。”这是一种怕字派的意见。他们一概不赞成革命造反派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冲击。他们喜欢舒舒服服地闹革命。其实，舒舒服服是闹不成革命的。革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舒舒服服地闹革命是假闹革命，真想舒服。谁想舒舒服服地闹革命，谁就会舒舒服服地“演变”成为修正主义。毛主席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亦是这样。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没有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剧烈的冲击，没有一场尖锐的决战，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不会轻易地从执行者的头脑里退走的。我们就是要大喊大叫，就是不怕“过头”。

“这样搞法太乱了。”你怕什么！毛主席说：“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在今天的条件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发扬大民主，只会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决不会削弱无产阶级专政。打掉那些束缚群众手脚的清规戒律，打掉那些千奇百怪的旧框框，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这是一件大好的事情。革命就是无罪，造反就是有理。我们再不要重犯叶公好龙的错误了。天天在叫发动群众，当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又惊惶失措，怕得要命，这不是重犯叶公好龙的错误吗？革命的大乱好得很。革命的大乱的结果，失去的只会是一切腐朽的东西，而在斗争中我们却能学到更多的毛泽东思想。

“革命精神是好的，具体做法不能同意。”这又是一种折衷主义的提法。革命造反派的革命造反精神，总是通过一个一个具体行动体现出来的。你既然支持革命造反派的革命精神，但对每一个具体革命行动却又百般指责，这样，你的“支持”、“赞成”，岂不一一落空了吗?!一面肯定革命精神，一面又反对革命行动，两者怎么能够统一起来呢？造反派在斗争中，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这也是难免的。谁想抓住他们的某些个别缺点来攻击革命造反派，谁想从中捞取半根稻草，肯定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对待革命造反派的革命行动，要末积极支持，要末坚决反对，折衷主义这条路决然走不通。

“造反有理”。这个口号永远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口号。是真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假马克

思主义者，如何对待这个口号，以什么态度对待革命造反派，这是检验他们的试金石。你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你就一定会不折不扣地认为"造反有理"，你就一定是"革"字当头；你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你就一定会不折不扣地认为"造反无理"，你就一定是"保"字当头。当今时代的时代精神，就是革命造反精神。每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都要高举起革命造反的大旗，以当一个革命造反派而自豪！

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展望新的一年，形势大好，任务艰巨。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狠抓世界观的改造，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实行和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在任何情况下紧密团结，继续战斗，革命到底，向着更高的目标前进，夺取一个又一个新胜利！

（《红旗》杂志 1967 年第 2 期转载）

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节录）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

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八日同时发表了题为《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的记者述评，评述上海地区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

记者述评提出：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正确指引下，上海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空前团结壮大的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抓革命、促生产，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着上海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发起了总攻击。上海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正面临全线崩溃的命运，他们正在采取更隐蔽、更毒辣的手段进行垂死挣扎。上海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开始进入了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上海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的第一个重要标志是：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造反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百万产业工人，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文化革命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冲破一切障碍，推动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汹涌澎湃地向前发展。工矿企业的革命造反派，坚决按照毛主席的'造反有理'的教导办事，不怕打击，不怕压制，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杀出来了。

郊区的农民现在也积极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革命的组织像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了。

上海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的第二个重要标志是：市级党政机关的革命造反派杀出来了，他们打破了"内外有别"等种种框框，同工人、革命学生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的革命行动，给上海地区各级党政

机关的工作人员以很大的影响。上海新闻单位的革命造反派，接管了《解放日报》和《文汇报》。革命造反派掌握的宣传工具，以最大的革命热情，大力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长了革命造反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老爷们的威风，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

上海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的第三个重要标志是：革命造反派不仅队伍越来越壮大，而且斗争艺术也越来越趋于成熟。他们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在斗争中学习斗争，在大风大浪中、在艰苦、复杂、曲折的阶级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

近一个多月来，通过几次全市性的斗争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工厂、农村、学校和机关的革命造反派实行了大联合、大团结，在同一个战斗目标下，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同时，通过每一次斗争，每一次揭发批判大会，加上革命造反派进行了广泛的政治思想工作，使许多受蒙蔽的群众认清了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真面目，使犹疑观望的群众进一步明辨了是非，倒向革命造反派一边。

上海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的第四个重要标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全线崩溃，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庇护下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丑恶面目，已开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进攻的过程中，越来越明显地看清，上海地区一小撮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有的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如此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不是偶然的，其中有的人自己就犯下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他们死死地抱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根稻草，就是为了“保”自己，“保”自己的“乌纱帽”。

(新华社上海 1967 年 1 月 11 日电，载 1 月 12 日《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转载《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编者按语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

上海《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

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王力在新华社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

今天的报纸同志们都看了吧！(群众答：看了) 今天的报纸第一版上转载了《文汇报》发表的上海十一个革命群众团体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这一事情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这是毛主席亲自决策的。(群众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

这是继聂元梓等七个同志在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后，毛主席亲自决定要广播的重要文件。它标志着我们国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新的形势，到达了新的阶段，提出了新的战斗任务。上海是一个重要的城市，上海发生的事情，它标志着我们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要出现这样的形势：就是革命群众的力量发展了，壮大了。革命群众在上海市从过去处于少数受打击、受围攻的地位，到了他们要掌握上海的革命命运，掌握上海的工业城市的生产的命运，到了这样的一个时候了！(热烈鼓掌)

跟随着上海革命群众力量的发展，上海出现了那样一个崭新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对于这样一件事情，我们作了很高的评价，看作是一个大革命，看作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热烈鼓掌)，看作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胜利的产物。

造反派起来了，革命的造反派自己掌握报纸，同革命的群众团体联合起来，使得这样一个报纸成了推翻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领导。推翻了那些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自己掌握报纸，自己把报纸变成为一个同革命群众联合起来的报纸。办成了一个革命的报纸，这是我们的方向，对于这样一件事情，它不仅是上海的问题，它必然对整个华东，对整个中国、对各省、市、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起巨大的推动作用。以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织起来，团结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不但担负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担负起一个革命报纸的责任，担负起上海一个大规模的工业城市的生产任务。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正把国家的命运，生产的命运，把业务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样的一件事情，在今天这样一个时候，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在这样一个时候，决定广播这样一个事件，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

目前形势好得很，北京形势，特别是在最近一个时候，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揪出了陶铸，(群众喊：打倒陶铸！打倒熊复！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反扑！) 揭露了他继续忠实地执行了刘、邓路线，揭开这样一个盖子，这个变化突出表现在中央直属机关同宣传文教系统各个单位，把陶铸这个盖子一揭，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起来了。过去是一块大石头压着。

毛主席指示我们：机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仅仅有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没有机关干部起来积极投入到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是不成的。有好多重要的问题，就是要依靠机关干部来揭露。同志们，人民日报、红旗的元旦社论就根据毛主席这个指示，提出了机关文化革命的重要性。现在，我们经过了革命群众对陶铸问题的揭露，

现在好多以前死气沉沉的中央机关，现在变了，盖子揭开了，斗争展开了。(热烈鼓掌)

什么陶铸、熊复呀，什么大大小小的人物呀，那些继续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物呀，同志们都揭露了。陶铸在刘、邓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就是忠实执行刘、邓路线的，他的屁股就是坐在那一边的。在几个重大问题上：在派工作组问题上，在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问题上，在恢复党、团组织问题上，他就是执行了刘、邓路线。刘、邓路线被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一边站了。陶铸还继续执行刘、邓路线，千方百计，阻止对刘、邓路线的批判，继续压制革命。特别是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起来了，他就更沉不住气了，千方百计地压制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刚起来的时候，这种形势本来是好得很嘛，但是他就怕得不得了，硬要把它压下去。凡是他领导的单位，凡是他操纵的单位，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不能得到贯彻，就得继续执行他的那一套。那一套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红旗》杂志提出的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变成了一个全国群众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的时候，陶铸反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连这个词儿他都反对。(群众喊：打倒刘、邓！打倒刘、邓追随者陶铸！)他在你们新华社搞的是什么东西？什么照片，把邓小平的脑袋搬到陈毅同志的身上。光就这一条，什么货色呢？在机关，彻底批判陶铸这一套，对于机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了很大作用。现在我们看，许多机关，都出现了这样一个很好的形势。我们觉得，机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这样轰轰烈烈的开展。而且，根据毛主席决定广播这个《文汇报》、《解放日报》的这样一个榜样，经过这样批判，经过辩论、经过斗争，经过一个发展，我们这些机关一定能够掌握在毛主席的好学生手里边。(鼓掌)那些坏家伙，请他们滚下台！(鼓掌)

当然我们要区别对待。但是我们要相信自己，相信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自己一定能够掌握我们自己的命运，一定能够把所有的事情办好，办得比他们好。(热烈鼓掌)(群众喊：打倒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陶铸！)

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紧 急 通 告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

《文汇报》编者按：我们全力支持《紧急通告》的十条意见。我们希望全市革命造反派认真执行这十条意见。

目前，经济主义思潮的泛滥，是一个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新反扑。上海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在政治上已开始瓦解了，便必然要从经济

上来发动新的进攻。这场新的进攻，其矛头直接针对无产阶级的司令部，直接针对**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我们必须最最坚决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这种新反扑。

任何破坏生产、破坏国家财政金融、破坏文化大革命的行为，都是反革命的行为。广大革命造反派和革命职工行动起来，不折不扣地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一面揭穿上海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新阴谋，一面坚守生产和建设岗位，把生产搞好，努力夺取文化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

《解放日报》编者按：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造反派组织，继发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之后，又发出了一个《紧急通告》。这个通告十分重要。我们表示最坚决的支持。这个通告指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严重的问题：上海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正在玩弄新的花招，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抗**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并妄图用物质刺激来腐蚀群众的革命意志。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和广大革命群众及时识破了这个大阴谋，粉碎了这个大阴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

经济主义，物质刺激，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货色。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革命群众坚决不要这些破烂货；他们完全懂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灭资兴无，破私立公，改造人的灵魂，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紧急通告》所提出的十条意见，正是反映了革命群众的共同意愿，代表了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再一次有力地打击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各有关部门必须坚决贯彻，认真执行。

目前，正当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两条路线决战的时候，正当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上海市委被打倒的时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玩弄新的阴谋。他们与社会上资本主义势力相结合，以经济福利问题来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挑动群众斗群众，造成工厂停工，铁路中断，公路阻塞，甚至挑动港务工人停止生产，影响港口工作，破坏我国国际威望，他们任意挥霍国家财富，随意增加工资、福利，滥发各种补助费，煽动群众强占公房。这是上海市委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采取这种卑鄙阴险的手段，无非是为了：一、以破坏生产、中断交通、危害国计民生来对抗毛主席，对抗党中央，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施加压力，以达到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二、利用经济福利问题来转移斗争的大方向，企图把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引入经济斗争的邪路上去，同时以物质利益来腐蚀群众的革命意志，推行和平演变，使资产阶级思想泛滥成灾。

为此，我们严正警告上海市委，任何妄图用破坏生产、中断交通和增加工资福利来转移斗争视线的阴谋，都是绝对不能得逞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造反派，坚决揭露这个阴谋，坚决打退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进攻。我们一定要坚决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一方面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坚守生产和建设岗位，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计划，并且力争产品的高质量。我们相信革命的广

大工人群众，对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一定能“公”字当头，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正确地处理上述问题，夺取文化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

全市的革命造反派战友们，为了迅速扭转由上海市委在社会生产上所造成的严重局面，我们呼吁大家：

一、革命造反派的工人、机关干部、学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同时又要坚守生产岗位，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二、呼吁全国革命造反派立即行动起来，说服、动员在各地串连的上海工人、机关干部、企业事业工作人员、艺徒等立即回沪，搞好本单位文化大革命，超额完成一九六七年生产计划。

三、凡过去由各单位当权派签发的外出串连证明，即日起一律作废，各单位发出的大量串连费（车费除外），一律由当权派签发者负责追回（可分期退还）。

四、除必要的生产经费、工资开支、文化革命经费、办公经费及其他正当经费外，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流动资金，自即日起一律冻结，由革命造反派、革命群众联合组织监督市级和各级财务机关执行，以保证国家经济不受损失（群众在银行的存款除外）。

五、为了避免转移斗争大方向，关于工资调整、工资补发、福利待遇等，原则上放到运动后期再作处理（特殊情况请示中央另作处理）。

六、学生与工农相结合，是学生改造世界观，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必由之路。有些当权派为了挑起工人对学生的不满，破坏工学结合，对学生进行“和平演变”，竟发放较高的劳动工资，这完全是修正主义的一套，即日起，一律不准发放。

七、所有公房及没收的资本家房屋都是全民所有制财产，运动后期由国家统一安排，不准任何个人强占公房，违者由公安局查处。凡怂恿居民抢占公房者，按情节轻重，依法处理。凡已住入抢占来的房屋者，限一周内搬回原处。

八、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凡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及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者，立即由公安局依法逮捕。凡在运动中破坏社会治安、打人行凶、抢劫和偷盗别人财物者，应立即交回赃物，并按情节轻重依法处理；以后重犯或屡教不改者必从严惩处。

九、上述各条，希各单位造反派组织和全市广大革命群众立即贯彻执行，开动一切宣传机器，进行宣传教育。

十、上述各条，责令市委、公安局照此执行，凡有违犯上述各条者，立即以破坏文化大革命查处。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二兵团
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
上海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红卫军指挥部
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
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
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
上海医务界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上海医药工业工人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

上海造纸工人革命造反总部
上海市学徒造反革命委员会
上海革命艺徒造反军第三兵团
上海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司令部
上海小教革命联合造反总司令部
上海工人造反联合委员会
红卫兵上海革命造反委员会
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
赤卫军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东北地区指挥部
上海市反到底联络总部
上海工人安亭兵团
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三兵团
民族造反司令部黄浦区指挥部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同济大学东方红总部
上海第一医学院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
上海交通大学革命造反指挥部
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
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
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驻沪联络站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驻沪联络站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

(1967年1月12日《人民日报》转载)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

你们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

你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你们及时地识破了和揭穿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阴谋，举行了有力的还击。

你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大方向，提出了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战斗任务。

你们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制定了正确政策。

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原载 1967 年 1 月 12 日《人民日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关于保护银行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

现在，有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转移斗争目标，煽动一时被他们蒙蔽的、支持他们的工人、农民和机关干部，大批地脱离生产和工作岗位，到北京来，或者流进大城市，甚至煽动罢工，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包围银行，强行提款。一切革命同志必须提高警惕，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今后，如果发现有人继续进行这种煽动，应立即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各地银行一律由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门负责保护。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

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工矿企业和农村全面地深入地展开。广大工农群众起来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一切资本主义的和修正主义的东西。形势非常好。但是，有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转移斗争目标，挑动不明真相的少数人大闹经济主义，向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他们用各种经济收买的手段，企图把一些群众引向经济主义的邪路，不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单纯追求个人的暂时利益。他们不但要恢复而且要扩大过去关于工资、

福利制度中的一些错误措施。他们煽动一些群众要晋级加薪，随便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物资。他们煽动前几年下放到农村业已参加农业生产的群众，回到城市，提出不合理的经济要求。有些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不按国家规定，强行到银行提款。地富反坏右分子也乘机妄图扰乱国家经济生活，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中央认为，必须立即制止这种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为，立即制止这种大闹经济主义的倾向。

第一，一切革命群众都要提高警惕，用毛泽东思想作武器，说服少数被蒙蔽的群众，揭露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的阴谋诡计，保护国家财产、保护集体财产，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遵循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前进。

第二，在经济问题上，过去有些不合理的东西，中央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进行调查研究，吸收群众的合理意见，提出解决的办法。在中央没有提出新的办法以前，暂不变动。

第三，前几年下放农村业已参加农业生产的群众，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应当安心参加农业生产，参加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安置工作中的问题，应由各级党委负责逐步加以解决。

第四，中央责成各级银行，不论是国家机关、国营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是集体经济单位，所有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支出，都要一律拒绝支付。

第五，集体所有制的企业、手工业合作社、合作商店等等，现在都不要改变为国家所有制。

这个文件，应该在工人、农民、学生中普遍宣读，也可以在工厂、农村、学校中张贴。

中共中央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

我们的广播电台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同那些控制广播电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斗争，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中央决定，凡是发生这样情况的广播电台，一律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管制，停止编辑和播送本地节目，只转播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已经进入广播电台的革命群众，应当立即退出。广播电台中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当交给群众离开电台去斗争。群众有意见的领导人，应当到群众中去，听取群众的意见和批评。

各地广播电台，应当一律使用原来人民广播电台的名称，不要改变。

(注：必要时，可在广播电台内部张贴)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思想统帅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运动，它把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形势大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实行人民群众的大民主。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必须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采取恰当的方式，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正常进行，保障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为此，特规定：

（一）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抢劫、制造交通事故进行暗害、冲击监狱和管制犯人机关、里通外国、盗窃国家机密、进行破坏活动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

（二）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三）保护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严禁武斗。凡袭击革命群众组织，殴打和拘留革命群众的，都是违法行为。一般的，由党政领导和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批判教育。对那些打死人民群众的首犯，情节严重的打手，以及幕后操纵者，要依法惩办。

（四）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这些分子，如有破坏行为，要依法严办。

（五）凡是利用大民主，或者用其他手段，散布反动言论，一般的，由革命群众同他们进行斗争。严重的，公安部门要和革命群众相结合，及时进行调查，必要时，酌情处理。

（六）党、政、军机关和公安机关人员，如果歪曲以上规定，捏造事实，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要依法查办。

以上规定，要向广大群众宣传，号召革命群众协助和监督公安机关执行职务，维护革命秩序，保证公安机关人员能正常执行职务。

这个规定可在城乡广泛张贴。

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
第一号通告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四日)

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史无前例的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造反。要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就必须一反到底,彻底打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

山西省委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毛主席、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几年来,他们秉承其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旨意,企图把山西搞成一个在中国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战略根据地。

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更是积极地推行和发展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革命派进行疯狂的反革命围剿,把大批革命闯将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伸手派"、"野心家",企图扼杀山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就是这一小撮混蛋,亲自纠集了大小特务,建立了秘密情报网,安放窃听器、派出特务,专门刺探各革命组织的动向,把其划成一、二、三类,并把其领导成员登记造册,以便不久的将来好下毒手。

就是这一小撮混蛋,把大批黑材料放在省委各部内,至今拒不交出,猖狂对抗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和中央补充规定。

就是这一小撮混蛋,在省人委某一楼内建立了一个地下黑司令部,天天云集其中密谋行动。

就是这一小撮混蛋,组织了一些保皇团体,公开与革命造反派拚命捣乱。等等,等等。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山西广大革命群众向这一小撮混蛋及其卖力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动了强大攻势,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文化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一小撮黑帮分子,为了挽救其灭顶之灾,采取了更毒辣的手段——经济战。他们拚命给一些组织大量房屋、汽车、经费,某些单位的钱像流水一样成千上万地淌出,近几天更是达到不可控制的地步,严重破坏了山西的财政经济和腐蚀了革命组织。

在他们的怂恿或操纵下,最近不断发生大规模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革命造反派,甚至发生武斗的现象。大量工人不断出外"串连"。

狗急跳墙,前些天他们甚至不惜挑动上万工人围攻革命造反派,以致许多企业停工,严重影响生产,甚至造成骇人听闻的交通事故等。

革命的同志们!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了新的转折点!为了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为了保证山西省文化大革命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我们二十五个革命造反组织召开了联席会议,一致决定成立"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并立即投入战斗。

我们庄严地宣布：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自即日起由本指挥部接管。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我们于元月十二日夜夺了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等党政机关的权和抄了一些坏蛋的家、搜出了大批私藏的枪支、弹药和黑材料，彻底捣毁了反党分子的巢穴。这个反造得好！好得很！

我们大声疾呼：

一、所有的工人、农民和干部都要牢记**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照常上班生产。我们革命造反派们更要在积极造反的同时，坚持生产岗位，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任务，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机器。凡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和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者，就是现行反革命，立即由公安部门依法处理。任何群众组织、任何人不得动用武器、弹药和泄露国家机密，违者依法查处。

三、鉴于前一段贪污浪费之风大盛，勒令山西省文革接待站自即日起冻结流动资金，停止发放一切车辆，并进行调查和调整。除必要的正当的经费外，各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的流动资金自即日起一律冻结，由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联合监督财务机关执行。

四、上述各条，希各革命组织广为宣传，协助执行。凡有违反上述各条者，由有关部门协助我们以破坏文化大革命查处。

打倒折衷主义！打倒经济主义！决战刚刚开始，胜利就在前头：我们的决心下定了，为了真正捍卫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是牺牲我们的生命也在所不惜！我们深信，在今后的革命斗争中，我们的队伍必将发展壮大。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革命的造反派们，一切革命的同志们，让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

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附：总指挥部参加单位名单：

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
山西革命造反兵团
山西革命工人野战兵团
山西工农商学革命造反总部
山西省红色造反者联盟
山西医卫革命造反总部
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太工永红战斗队
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楠猎大队
山西革命干部造反兵团
北航播火兵团
北农机“全无敌”纵队
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
山西体育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团

山西日报革命造反军

山西东风革命造反兵团

太原市小学教师革命造反联络总部

共青团山西省委机关大无畏战斗队

中共太原市委机关红旗战斗队

太原革命造反司令部

晋京革命造反大军

山西反修兵团

山西红色革命造反联盟

山西农民造反兵团

山西“延安”文艺兵团

太机第四野战军

(新华社太原 1967 年 1 月 24 日电，载 1 月 25 日《人民日报》)

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

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主要的工具。它担负着备战和保卫国防的伟大任务，担负着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任务。今后，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地方党委把重要档案材料，电台机要人员和机要交通人员，暂时转移到军事机关，这对保证党和国家机密的安全，保证党内文电的正常传递，是有好处的，是必要的。但是，有一些地方党委，却借此为名，把文化大革命中整革命群众的材料，也塞进军事机关。更恶劣的是，有的地方党委，自己干了这种事，却嫁祸于人，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事机关。这是极端错误的，是党纪国法绝不允许的。中央责成你们:

(一) 凡属真正的党和国家的机密材料，以及保证党内文电正常传递的人员已转移到军事机关的，应当由你们向群众正面讲清道理。如果革命群众怀疑党和国家机密文件中有整群众的材料要求清查，说服不了的时候，可以采取由你们和革命群众的代表共同封存的办法处理。

(二) 凡是把整革命群众的材料转移到军事机关的，必须立即全部取出，按照中央的有关规定当众处理。

(三) 决不准把事实真相掩盖起来，在幕前或幕后煽动群众把斗争锋芒转向军事机关。否则，就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对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必须负全部责任。

另外，地方的电台、监狱、仓库、港口、桥梁，由军队负责守卫，也是完全必要的。同样，不准挑动群众对这些地方进行包围、冲击、占据和破坏。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

《红旗》杂志评论员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光荣的上海工人阶级，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组成了百万革命造反大军。他们联合其他革命组织，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中夺了权，建立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秩序。势如破竹，锐不可挡，他们正在乘胜追击，扫荡抗拒历史车轮前进的垃圾。

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这一革命行动，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新的伟大胜利。

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提出的革命方针和采取的革命行动，给全国树立了榜样，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新经验。

他们的经验是多方面的。这些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把上海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导我们，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任务，归根结底，就是无产阶级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的斗争。这是现阶段我国阶级斗争的焦点，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集中表现。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决定广播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就是支持北京大学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一个大学的范围内，从陆平反党集团手里夺权的斗争。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这个措施在全国范围内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现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决定广播上海市各革命群众组织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支持上海工人阶级同其他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在一个市的范围内，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权的斗争。这是在新形势下所采取的又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这个措施将推动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一个新的飞跃。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人，但是，在他们盘踞的地方和单位，他们还在不同程度上掌握着党权、政权、财权，他们总是利用掌握在他们手中的这些权力，来打击群众，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一小撮人怎样利用他们手中掌握的那些权力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

这一小撮人利用他们手里掌握着的党权，来欺骗、蒙蔽、压制一批干部和党团员。他们企图瓦解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极严格的无产阶级纪律，企图涣散无产阶级为战胜资产阶级所必需的纪律。他们把我们党的纪律，歪曲为资产阶级的纪律，歪曲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纪律"，歪曲成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纪律"，变成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紧箍咒，谁要反对他们，就把谁打成"反党"分子。

这一小撮人利用他们手里掌握着的那些部门、那些地方的部分政权，在他们力所能到的范围内，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镇压革命群众。谁要起来革他的命，就要把谁打成"反革命分子"，以至开除、监禁。他们挑动群众斗群众，歪曲地利用"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欺骗一些群众，组织什么"红色政权保卫军"等等御用团体，来保他们自己。

这一小撮人利用他们手里掌握着的财权，笼络一些受他们蒙蔽的群众，为他们保驾。他们还用金钱收买的手段，来腐蚀革命群众。他们用各种经济手段，企图把一些群众引向单纯追求个人暂时利益的经济主义的邪路。他们不但要恢复而且要扩大过去关于工资、福利制度中的一些错误措施。他们乱开支票，乱发物资，慷国家之慨，收买人心，妄图破坏生产，破坏财政金融，破坏交通运输。他们恶意地把"矛盾上交"。这是当前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垂死挣扎的表现。这是当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反扑的新形式。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于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旧东西，这也保，那也保，归根结底，就是保住他们自己的权力。在革命群众的压力面前，他们可以做这样一些假"让步"，也可以做那样一些假"让步"，但是，他们所做这样一些或那样一些的"让步"，都是企图打击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保持他们压制群众的权力。他们在权力问题上，是寸权必争，绝不让步的。他们企图采用各种手段，阴谋扰乱我们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生活，以达到他们保持自己权力的目的。

我们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最根本的，就是夺他们的权。只有夺了他们的权，对他们实行专政，才能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

毛主席教导我们，**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曲折的。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盘踞的堡垒，要一个一个地夺取。无产阶级夺回来的阵地，也还要一个一个地去巩固。

我们对于狡猾的敌人，必须提高警惕。他们也虚伪地打着"革命"旗号，向无产阶级夺权。他们惯于制造谣言，挑拨离间，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煽动群众，转移斗争目标，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革命派，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指向无产阶级的革命司令部。一切革命同志，都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擦亮眼睛，分清敌我，辨明大是大非。要坚决把那些在背后煽阴风、点邪火，矛头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指向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家伙，一个个地揭露出来，把他们打倒。

上海工人阶级和其他革命群众、革命干部的伟大贡献，就是他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无所畏惧地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举行大反击，创造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的经验，他们提供了正确的方针、政策、组织形式和斗争方法。

这正是值得全国党、政、军、民各界学习，值得全国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的最主要的东西。

上海的大革命，体现了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和首创精神，体现了工人阶级的革命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

上海的经验证明，只有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的权夺过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障无产阶级的大民主。

上海的经验证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绝不是极端民主化，绝不是小团体主义。只有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实行民主集中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才能集中力量打漂亮仗，才能建立革命的新秩序。

上海的经验证明，必须紧紧把握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必须向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化等等，进行坚定的，不调和的斗争，坚持社会主义的大方向，维护社会主义的所有制，这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

上海革命群众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目的是很鲜明的。这就是发动广大群众打垮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中指出：“**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是对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崇高评价，也是向全国革命人民发出的伟大号召。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并不说明那一小撮反动家伙的强大，只不过是一种歇斯底里的发作。这种发作，恰好是表明他们就要垮台了。

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的。我们有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人民的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我们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亿万人民群众。这是足以战胜任何敌人的最伟大的力量。

我们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一切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在我们的面前，是一片大好形势，是一片光明。我们要看到“**敌人快要消灭，自己快要胜利的实质**”。我们要象上海的革命群众那样，勇敢地打退一小撮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挑战。我们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敢于胜利，善于胜利。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团结广大群众，在伟大统帅毛主席的领导下，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

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粉碎资产阶级的经济主义！

坚决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原载《红旗》杂志1967年第2期，1967年1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

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关于各级公安部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

中央同意公安部给各级公安部门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望即转发公安部门并督促执行。

通　　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决定广播上海各革命群众组织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支持上海市革命左派的夺权斗争，是在新的形势下所采取的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将推动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来一个新的飞跃。公安机关过去的某些规定，如中央批转公安部党组的四条、特别是其中的第一条，民警和劳改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只作正面教育等，已经同目前形势不相适应，应该立即作废。各级公安机关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要再受这些规定的约束，而应当根据《人民日报》《红旗》元旦及一月十二日社论、红旗评论员一月十六日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的精神，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和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支持革命左派，支持左派的一切革命行动（包括夺权"接管"），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公安机关的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

公　安　部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保护粮食、物资仓库和监狱等问题的规定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

现在发现有的坏人煽动抢劫仓库的事件。中央决定：一切重要的粮食和物资仓库，监狱，以及其他中央规定必须保护和监视的重要单位，都要立即派出军队，实行军事管制。国家仓库中的一切物资，没有国家调拨的指示，任何机关和个人都不得私自动用，违背者以国家纪律严厉惩处。

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

《人民日报》社论

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一切牛鬼蛇神的丧钟敲响了！让我们高举起双手，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好得很！就是好得很！

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的飞跃。这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

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极其伟大的创举，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事，是关系到世界前途和人类命运的大事。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亿万革命群众以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为核心，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自下而上地夺权。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大发展。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我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出现了无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的夺权。但是，被打倒了的阶级敌人，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在无产阶级和小生产者的队伍里也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夺权斗争一直在激烈地继续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夺权斗争。这个文化大革命，就是发动亿万群众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只有展开这样伟大的群众运动，展开一个群众性的全面夺权斗争，才能彻底解决无产阶级的夺权问题，彻底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持的各种权力，非夺不可！这是广大革命群众，通过几个月的艰苦斗争，掌握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真理。

为什么当革命的左派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满怀着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瞄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出第一炮的时候，就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

为什么当“工作组”来了以后，革命左派不仅没有翻身，反而更变本加厉地遭到白色恐怖的残酷镇压？

为什么当广大革命群众起来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却发生了更大规模的群众斗群众的事件，甚至武斗流血，多少革命的闯将受打击，遭迫害，被开除，被镇压，直到最近，又出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大反扑，出现了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大泛滥？

几个月的反复和曲折，一场场惊涛骇浪的阶级斗争暴风雨，深刻地教育了广大革命造反

派。他们越来越明白了：革命之所以受挫折，原因不是别的，只是因为印把子没有攥在自己手里。那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之所以如此猖狂，之所以敢于这样欺负人，就是因为他们还有权！革命群众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要自己掌握印把子！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千重要，万重要，掌握大权最重要！于是，革命群众凝聚起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咬紧牙关，斩钉截铁，下定决心，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夺权！夺权！！夺权！！！一切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所窃取的党、政、财等各种大权，统统要夺回来！就是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他们说得好：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正的革命左派，看的是夺权，想的是夺权，干的还是夺权！这不是什么"个人野心"，而是为无产阶级夺权，为共产主义夺权，让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

翻天覆地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群众运动，是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大决战。它必然带来阶级矛盾的集中爆发，带来一场空前规模的急风暴雨。这场大决战的现实，已经为我们展现了极其激动人心的场面。

你看！广大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已经冲破重重障碍，紧急行动起来，集合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之下，团结起亿万革命群众，发扬了高度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敢于斗争，敢于夺权，冲锋陷阵，所向披靡，正在从胜利走向胜利。

你看！那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权，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因为夺权就夺去了他们的命根子，夺去了他们赖以"秋后算账"的最后法宝。他们惊慌失措，暴跳如雷，歇斯底里大发作。然而，一切反革命的垂死挣扎都无济于事，他们正在迅速被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群众运动的洪流所淹没。

这对于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真是从未有过的痛快啊！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要展开夺权斗争，就必须大联合。没有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就只是一句空话。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第一次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为无产阶级的第一次夺权擂响了战鼓，使旧世界的资产者吓得发抖。四十几年前，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了**"民众的大联合"**的伟大号召，吹响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军号。今天，在我国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势下，亿万革命群众正在毛主席的新的伟大号召下，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伟大口号下动员起来，投入战斗。这就预示着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末日，已经来到了。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我们！我们！！我们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是新世界当然的主人！"这就是广大革命群众响亮的声音！

革命的干部、革命的学生，一定要同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相结合，使社会上的斗争同本单位的斗争结合起来，内外联合，两面夹攻，彻底打碎旧的剥削制度、修正主义制度、官僚主义机构。广大工农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一起当家做主，建立崭新的无产阶级新秩序。

大联合，要在夺权的斗争中形成。大联合，必须旗帜鲜明。它是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而不是乱七八糟的大杂烩。那些折中主义、改良主义的东西，那些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分散主义、分裂主义的东西，必须统统打倒。

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高潮中，极少数资产阶级顽

固分子总会乔装打扮一番，削尖了脑袋，力图钻进革命派大联合的队伍中来。他们虚伪地打着"革命造反"旗号，向无产阶级夺权。他们惯于制造谣言，挑拨离间，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煽动群众，转移斗争目标，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革命派，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指向无产阶级的革命司令部。我们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分清敌我，辨明大是大非，戳穿他们的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回击!

阶级敌人空前强烈的抵抗是必然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正在和社会上的一切牛鬼蛇神，勾结起来，拼凑起反革命的联合，来对抗革命的大联合。但是，无论遇到多少曲折和反复，我们上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亿万革命群众，我们必将战胜一切困难，把那些在背后煽阴风、点邪火，矛头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指向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家伙，一个个地揭露出来，把他们打倒。革命的大联合终将战胜反革命的小联合。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革命的战友们，让我们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动员起来，实现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胜利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伟大历史任务。

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
第一号通令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

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宣告成立，夺取了青岛市委、青岛市人民委员会全部权力。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充分发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特作如下通令：

一、前青岛市委、青岛市人民委员会的一切权力，自即日起完全归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所有。前青岛市委、青岛市人民委员会予以封闭，停止其一切活动。

二、前青岛市委书记、常委、委员、各部委负责人，前青岛市市长、副市长、各局局长、处长，自本通令公布日起三日内，向本委员会报到，听候处理。其他一般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听从指挥，照常工作。

三、前青岛市委、青岛市人民委员会自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所发出的一切指示、文件（转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文件除外），自即日起一律作废。

四、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青岛市各级党政机关、工业、基本建设、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单位和各群众团体的权力，凡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所把持的，一律由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夺权。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各级领导人员和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而尚未改正错误的人，无权夺权。

五、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号召全市革命造反组织和革命群众，积极协助监督执行，对有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革命秩序，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坚决依法予以惩办。

六、号召全市革命工人、革命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时又要坚守生产岗位，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的模范。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大方向。彻底摧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七、由于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委员会，不折不扣地执行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本委员会郑重宣告：对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委员会所发出的一切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拒绝执行。并呼吁全省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把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内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所把持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手中来！

(新华社济南1967年1月29日电，载1月30日《人民日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主要特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权。这场夺权斗争，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十七年来猖狂进攻的总反击。这是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

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最重要的工具。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的夺权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

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

我军全体指战员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

(一) 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

(二) 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

（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

（四）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

（五）在全军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

这一指示要原原本本地传达到每个解放军战士。

中共中央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补充指示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新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开展群众性的夺权斗争。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需要做如下的补充规定：

（一）坚决支持各省、市的广播电台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成为各省、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喉舌。

（二）在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尚不能控制局面，要求人民解放军保护时，军队应当立即实行军事管制。在实行军事管制期间，军队应当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

（三）实行军事管制是暂时的、过渡的措施。在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能够控制局面的时候，应当结束军事管制。

（四）在实行军事管制期间，除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外，地方台可以自编一部分节目。这些节目必须是反映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声音，而不得反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声音，不得反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声音。

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人民日报》社论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平地又是一声春雷，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下，山西省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和代表们，联合起来，把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窃取的种

种大权夺回来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山西省重新掌了大印，当家做主了！

这是继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胜利以后，在一个省的范围内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斗争的伟大胜利，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新的伟大胜利！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压迫最重，哪里就反抗最烈。山西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长期以来，上下勾结，结党营私，企图把山西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独立王国。在这次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更是变本加厉，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阴一面，阳一面，表面上高唱"检讨检讨"、"认罪认罪"，暗地里却刮阴风，放暗箭，处心积虑围剿革命派。最近，当他们陷入广大革命群众的层层包围之中，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就狗急跳墙，使出了更加阴险狡猾的手段——反革命经济主义，企图以此挽救他们彻底灭亡的命运。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山西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这样一些蠢人，他们对革命派的疯狂围攻和反扑，正是掘下了埋葬自己的坟墓。山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起来造他们的反了，罢了他们的官，夺了他们的权，这真是好得很！好得很！就是好得很！！！

山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善于作阶级分析，善于掌握毛主席的策略思想，不断发现和扶大左派队伍。他们不但把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军人、革命知识分子中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而且把领导机关中那些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的领导干部也联合起来，组成了更加广泛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

山西省委内革命的领导干部，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生死决斗的紧要关头，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同革命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的学生团结一致，上下结合、内外夹攻，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的总攻击。

山西省军区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坚决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毫不含糊地、全心全意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起来夺权，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山西省的革命造反派，为全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创造了新的经验。山西省委内革命的领导干部，为全国革命的领导干部作出了良好的榜样。山西省军区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为全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树立了鲜红的旗帜。

山西省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一切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应该热情支持他们的夺权斗争，大力宣传他们的夺权斗争，积极参加他们的夺权斗争，认真学习他们的夺权斗争经验。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的态度。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面前，站在后面指手划脚是错误的，站在旁边冷眼观望也是错误的。

革命的造反者们，革命的同志们，革命的干部们，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们，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联合起来！

学习上海市和山西省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革命造反精神，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的夺权斗争！

敌人不投降，就叫它彻底灭亡！

中共中央关于保卫四清运动成果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现在，有些农村和企业、事业单位要把“四清”工作队员揪回去斗。中央认为，四清运动有伟大的成绩。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十条》、《二十三条》，都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这是必须肯定的。根据《十条》和《二十三条》的规定，在当时派出工作队，是正确的，不能说是错误的。至于有些同志在工作中受形“左”实右路线的影响，犯了一些错误，主要应由错误路线的提出者负责。因此，中央决定：

(一) 四清工作队的同志，一般的不要揪回去斗。

(二) 对于四清工作队的同志有意见，可以用写信、送大字报或者其他方式提出。

(三) 必须保卫四清运动成果。不许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下台干部和地富反坏右分子翻案，不许他们兴风作浪。

这个通知可以在农村、城市和部队各单位内部普遍张贴

国务院、中央军委
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为了战备的需要，为了保障国际国内航班的正常与安全，为了保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现决定：

一、对民航总局、各大区管理局、省（区）局、航空站、指挥勤务保障体系、机场和飞行学校，一律由军队接管，接管工作由空军组织实施。

二、在军队接管后，民航系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遵照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按军队系统的安排和做法进行。

三、在军队接管后，民航系统各单位的革命组织，对民航系统以外的革命组织，一律不进行串连。

中 央 军 委 命 令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毛泽东

一月二十八日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全面阶级斗争的新阶段，军队必须改变过去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为了适应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发展的新形势，特规定如下：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凡非文化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有关文化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以上规定，从公布之日起，立即生效。全体指战员、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同志，必须严格遵守，违者要受纪律处理。

中央军委重申军区文化大革命分期分批进行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一、军区的文化大革命，遵照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应分期分批进行。

二、目前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全面阶级斗争的新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积极支援革命左派和保卫文化大革命的任务。

三、帝、修、反正在加强反华，蠢蠢欲动，蒋匪也想乘机袭扰。因此处在反帝、反修第一线的军区（济南、南京、福州、广州、昆明、新疆）和有随时策应各军区任务的武汉军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都应照前次指示暂缓进行，把自己稳定起来，以便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保卫国防。何时开始，听候军委命令。

西 南 的 春 雷

(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

《人民日报》社论

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从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取了党、政、财、文大权。这是西南地区在隆冬季节响彻云霄的第一声春雷！我们欢呼！欢呼毛泽东思想在贵州省的伟大胜利！这个胜利，是对整个大西南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沉重打击。这个胜利，将引起连锁反应，使西南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中乘风破浪地前进。

贵州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经验，再一次证明了，在夺权斗争中，必须建立一个为群众所拥护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机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核心领导，是无产阶级的权威。它有威信，有能力，统一地集中地领导夺权斗争。这是夺权斗争胜利的重要保证。

贵州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经验，再一次证明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核心领导的权力机构，在夺权斗争中，必须从当地实际出发，集中群众的革命要求，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通告，就是这样一个纲领。它向全省人民发出的五项号召，好得很！好得很！

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决战的关键时刻，一切革命的干部，都应当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应当拿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魄力和勇气，应当在群众中亮相，应当振臂高呼，应当亲临前线，和革命群众结合，并肩战斗。只有这样，才能号召广大群众，才能组成一支有集中领导的、有

组织纪律的、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革命大军，胜利地完成夺权斗争的任务。

贵州将彻底变革。贵州在前进。夺权，这仅仅是彻底变革的开始。我们预祝贵州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将沿着毛泽东思想的光明大道胜利前进！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我们，我们无产阶级！

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发出了战斗的号召，上海、山西、青岛给我们作出了榜样，贵州又树立了一个榜样。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让我们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革命派！

《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刊登《打倒"私"字，实行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的编者按语

(一九六七年二月)

《红旗》杂志编者按

《打倒"私"字，实行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是一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好文章。我们在这里向全国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推荐。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带普遍意义的重要问题，就是在当前的夺权斗争中，必须"打倒'私'字。"

这篇文章之所以好，就是因为它看到了我们正在进行着两种"夺权"的斗争。文章指出：**革命造反派不仅要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而且必须夺我们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权。**

不夺我们头脑里"私"字的权，不打倒头脑里的"私"字，就不能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只有夺了我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权，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思想阵地，才能形成浩浩荡荡的步伐一致的坚强革命阶伍。否则，即使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也不能巩固。精神的东西要转化为物质的东西，脑子里带着"私"字去夺权，即使夺了，这个权也还会蜕化为资产阶级的政权。

在当前夺权的斗争中，一些革命造反派队伍中暴露出来的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义、主观主义等等错误倾向，有一个总根子，这就是"私"字。"打倒'私'字"这个口号，提得深刻，提得及时，说到了问题的根本。

打倒"私"字，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在当前，学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老三篇"等光辉著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应该切实学好。借口斗争紧张而放松学习，是完全错误的，应该立即纠正。

打倒"私"字，必须在自己的灵魂深处闹革命，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开展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打倒"私"字，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实行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树立全心全意为工农服务的思想。

林彪同志说："我们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同时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革命，也得革自己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个革命是搞不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革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夺他们的权，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但同时、又要革我们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命。我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改造主观世界。

革命队伍的主观世界的改造，在一定的条件下，具有决定的意义。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者说："不怕八路军大练兵，就怕八路军大整风。"同样，在今天，对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说。他们最害怕的，就是我们的思想革命化，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头脑、打倒"私"字、实现和巩固革命派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的大联合。

胜利属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

（原载《红旗》杂志 1967 年第 3 期）

《解放军报》编者按

今天，本报转载的《打倒"私"字，实行革命造反派大联合》一文，提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极其重要的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中，要实现真正的大联合，必须彻底造"私"字的反，让"公"字在头脑里牢牢地扎根。

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势不可挡。这个大革命的风暴，正在迅速摧毁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盘踞的顽固堡垒、同时，也更广泛更深刻地触及每个人的灵魂。

在革命造反派的队伍中，也存在着妨碍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一些非无产阶级的错误的思想。这些错误思想，归根到底就是一个"私"字。这个"私"字，是革命派团结的大敌。我们必须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把"私"字打倒，才能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派肩负的极其伟大的历史使命。正如文章中指出的："我们同时进行着两个革命：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和改造主观世界的革命。我们同时进行着两个夺权斗争：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自己头脑里'私'字的权。只有在思想上彻底夺了'私'字的权，才能保证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彻底胜利。"

夺自己头脑里"私"字的权，就是用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的武器，彻底清除一切私心杂念。我们每个同志，只有这样做，才能成为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站稳脚跟。

（原载 1967 年 2 月 1 日《解放军报》）

东 北 的 新 曙 光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日)

《人民日报》社论

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黑龙江省新生了！黑龙江省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实现了大联合，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窃踞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都夺回来了！

我们热烈欢呼黑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伟大胜利！我们热烈祝贺"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黑龙江省是我国重要的工农业生产基地，是我国防御现代修正主义和美日反动派进攻的前哨。黑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胜利，对于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着重大的意义。

黑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对夺权斗争的胜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采取反对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的方针，是完全错误的。应当看到，有些领导干部，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坚决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斗争的。对于这样的干部，我们就一定要充分地信任他们，与他们并肩战斗。对于那些动摇不定的、或者犯过路线错误的领导干部，只要他们愿意改正，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回到毛主席的路线上来，我们也应该团结他们，一道战斗。

凡是愿意继续革命的领导干部，都应该立即振作起来，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站在一起，支持革命造反派。

所有的革命干部，都应该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组成的临时权力机构的领导下、积极工作，经受文化大革命的新考验，虚心当群众的小学生，为文化大革命建立新功劳。

我们革命造反派对于犯错误的同志，一定要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新的斗争实践中考察他们，团结他们，帮助他们。

黑龙江的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和革命干部联合起来，夺取政权后，首先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保证，一定要努力学好"老三篇"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光辉著作，掌握好毛泽东思想这个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他们说得好，做得对，提得及时，反映了革命造反派强烈的愿望。

黑龙江的同志们说："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只承认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阶级斗争，不承认社会主义时期尖锐复杂的夺权斗争，就不能当一个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毛主席的好战士。"他们不愧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派。把夺权斗争提高到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水平上来，这是每个革命造反派都必须认真思考的头等大事。

毛主席教导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黑龙江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这次夺权斗争中，记住了毛主席的这个教导。他们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及时地提出了一系列的很好的政策和具体措施。

经验证明，我们有了正确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有了夺权斗争的胆略、魄力和勇气，还必须有一系列的具体政策和措施。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胜利。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切实注意这一点。

黑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胜利，是东北的新曙光。让我们热烈地祝贺他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继续前进！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
步行串连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

几个月来，广大革命师生热烈响应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号召，进行步行串连，得到了极大的锻炼，促进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更加深入、广阔的发展。当前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展开了夺权斗争。外出步行串连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应当回到本地本学校去，参加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决战。

目前北京、韶山、井冈山、瑞金、遵义、泸定桥、延安等革命圣地以及大寨，由于前去的革命师生过多，拥挤一起，天气寒冷，食宿、交通安排极为困难，也影响了当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有的地方还发生了传染病，影响了革命师生的健康。这些问题，急需加以解决。

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

一、长途步行串连，在全国都停止。已经到达目的地的步行串连队，凡停留时间超过三天到五天的，请迅速返回原地。在县以内步行串连，也要防止过分拥挤。北京、韶山、井冈山、瑞金、遵义、泸定桥、延安等革命圣地以及大寨，一律停止前往串连和参观。

二、步行串连队在返回的时候，原则上应当步行。目前，为了使远离本地五百公里以外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迅速回到本地本校闹革命，参加斗、批、改，实现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进行夺权斗争，在十五天内也可以免费领取直达票乘坐火车和轮船。不靠铁路线的，应当步行到邻近的铁路线上乘坐火车。

三、为了响应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发扬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反对经济主义，防止铺张浪费，步行串连的革命师生，在串连和回程期间的伙食费、市内交通费，一般应当自理。粮食定量可适当增加。宣传费、医药费只在必要时可给予少量补贴。

四、来北京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凡是吃饭尚未交费的，自二月八日起一律交费，不再免费。

本通知可在全国城乡各有关单位和地方张贴。

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

《红旗》杂志社论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的战略任务，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代理人的决战。

这个革命的大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革命群众把它叫做伟大的"一月革命"。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立即坚决支持，号召全国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号召人民解放军积极地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

毛主席的这个伟大的号召，立即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热烈响应。无产阶级革命派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队伍，对一些地方、一些部门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盘踞的堡垒，正在一个一个地夺取、一个一个地巩固。"一月革命"的风暴正在席卷全国。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阵线被打得七零八落。但是，他们同一切反动派一样，决不甘心自己的灭亡。他们也同一切反动派一样，"**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

毛主席指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对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来，也是这样。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上海市、山西省和其他一些地方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夺权斗争过程中，必须高度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他们掌权的时候，总是运用他们的权力来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镇压革命群众。在他们权力被革命群众夺掉的时候，他们还是千方百计地进行反夺权，妄图反攻倒算，把他们失去的权力再夺回去。

有的地方，这些反动家伙，正在重新组织他们的反动队伍，聚集地富反坏右分子，搜罗社会渣滓，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反扑，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

有的地方，这些反动家伙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办法，妄图分化瓦解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妄图篡夺革命造反团体的领导权，来转移斗争的大方向。

有的地方，这些反动家伙唆使尚掌握一个工厂、一个车间、一个单位、一个生产大队领导权的同伙，来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运输，破坏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妄图扰乱国家的经济生活，以达到他们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反夺权的政治目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阴谋，是决不能得逞的，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们要蔑视他们。但是，我们必须认真对付，切切不可等闲视之，掉以轻心。

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充分认识，我们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和反夺权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是敌我矛盾。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这是大方向。一切革命同志，考虑和处理一切问题，都必须从这个大方向出发，都必须服从这个大方向。否则，就会走错道路，就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

凡是经过半年多来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地方和单位，谁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头面人物，革命群众已经看清楚了。在夺权斗争中。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集中目标，狠狠地打击敌人。必须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绝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乱轰一气。否则，就会妨碍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斗争，就会犯方向的错误，就会被阶级敌人利用。

（二）

坚决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团结广大群众。这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斗争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全面夺权斗争的阶段，革命群众团体必须实行大联合。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就不可能胜利地完成夺权斗争，就是夺回了一些权、也还会丧失。

要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必须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整顿思想，整顿队伍，加强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必须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去克服自己头脑中和自己团体中的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等错误倾向。所有这些违背毛主席教导的、妨碍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思想和行动，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都是当前尖锐的阶级斗争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反映。这些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要根据毛主席一贯提倡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和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去解决，多做自我批评，而不要互相攻击。对于上述的非无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和行动，绝不能任其滋长，否则，就会被阶级敌人所利用。如果有人坚持这些错误思想和行动，发展下去，就可能从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

革命群众组织夺回了某些部门的权力，本身的地位就随着发生了变化。在这个时候，一些同志头脑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很容易发作。我们必须高度警惕。我们要排除一切私心杂念，在自己灵魂深处闹革命。一切要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要以大局为重，不要闹个人的名誉、地位。要坚决响应毛主席"节约闹革命"的号召，不要讲排场，讲阔气，浪费国家财物，不要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打中。

夺了权的革命群众组织和负责人，对持有不同意见的群众和群众组织，应当采取团结的方针，争取大多数，而不能排斥大多数。这样做，才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有利于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新秩序。

每个人在夺权斗争中和当权以后，都要经受新的考验。我们期望，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革命闯将，要永远忠于无产阶级，忠于毛主席，忠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期望他们逐步地在政治上成熟起来，不要做历史舞台上昙花一现的人物。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老老实实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认真地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三）

必须足够重视革命干部在夺权斗争中的作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他们可以成为夺权斗争中的骨干，可以成为夺权斗争中的领导。

这些领导同志，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在党内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斗争。他们现在已经在群众面前亮相，在群众面前公开表明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和革命群众相结合，共同战斗。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要相信他们。一定要分清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还是资产阶级当权派，是拥护和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是拥护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一概不相信，这是不对的。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观点的

当革命的领导干部起来，同群众一道，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时候，革命的群众团体应当支持他们。应当看到，他们的斗争经验比较丰富，他们在政治上比较成熟，他们的组织能力较强。有他们参加核心领导，对于夺权和掌权，都是十分有利的。

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本人心悦诚服，也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很危险的。

党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的一般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他们当中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是本单位夺权的重要力量。对于这一点，决不能忽视。

各级干部，都要经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考验，都应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新的功劳，不能躺在过去的成绩上自以为了不起，看轻新起来的革命小将。对自己只看见过去的功劳，而看不见今天的革命大方向。对新的革命小将则又只看见他们的某些缺点错误，而看不见他们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样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必须改过来。

（四）

这一次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不是自上而下的撤职和改组，而是由毛主席亲自号召和支持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文化团体和学校焕然一新，彻底清除资产阶级的旧东西。

经验证明，在夺权斗争的过程中，要由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当地驻军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的领导干部，经过酝酿和协商，建立临时的权力机构，负责领导夺权斗争。这个临时的权力机构，要“**抓革命，促生产**”，使生产系统照常工作，指挥原来的业务班子（必要时加以调整）执行任务，并组织革命群众对业务班子实行监督。这个临时的权力机构，还要担负起统一指挥镇压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的任务。建立这样一个临时的权力机构，是应该的，必须的，非常重要的。经过一个过渡，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智慧，创建更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崭新的政权组织形式。

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长期盘踞的烂掉了的一些单位，他们实行的不是无

产阶级专政，而是资产阶级专政。这些单位的夺权斗争，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指出，无产阶级决不能接受资产阶级的现成的国家机器，而必须把它彻底打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理。既然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盘踞的一些单位，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机构，我们当然不能把它现成地接受过来，不能采取改良主义，不能合二而一，不能和平过渡，而是必须把它彻底打碎。

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伟大的群众运动，已经开始创造并将继续创造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机构的新的组织形式。在这里，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大胆地采取在群众运动中涌现的具有生命力的新形式，来代替剥削阶级的旧东西，来代替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旧东西。而绝不能只是把权接过来，一仍旧章，按老规矩办事。

去年六月一日，毛主席就把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称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这时，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式。

自下而上地发动亿万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打碎旧东西，创立新形式，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上，在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上，开创了新纪元，它将大大地丰富和发展巴黎公社的经验，大大地丰富和发展苏维埃的经验，大大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五）

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斗争，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进行的。在夺权的过程中，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新秩序，必不可缺少的条件。

在当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一小撮代理人决战的阶段，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坏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美蒋特务，都纷纷出笼。这批牛鬼蛇神，造谣惑众，欺骗、拉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成立反革命组织，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例如，所谓“中国工农红旗军”，所谓“荣复军”、“联合行动委员会”以及其他一些被修正主义分子组织起来的名为“革命派”，实是保守派的组织，就是这种反动组织。这些组织中的多数群众是受蒙蔽的，是应当争取教育的。但是，这些反动组织的一小撮头头，却处心积虑地炮打无产阶级的革命司令部，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袭击革命群众组织，暗害革命群众，收买职工，停止生产，中断交通，破坏和抢劫国家财产。他们趁火打劫，妄想变天。这种反动组织，有的就是在顽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指挥下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这种反动组织，是建筑在沙滩上的，一旦被群众识破，就会立即土崩瓦解，一小撮头头就会被群众揪出来。

牛鬼蛇神一齐跑出来，是一件大好事，我们正好趁此机会来一个大扫除，“**扫除一切害人虫**”。

对于这些反革命家伙，我们要坚决地实行专政。

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著名论文中指出：**对于反动派，必须“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果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

"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这个学习很要紧。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学会这一项对待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他们就不能维持政权，他们的政权就会被内外反动派所推翻，内外反动派就会在中国复辟，革命的人民就会遭殃。"

一切革命的同志，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这些教导。对于反动派，别说大民主，就是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不给，半点也不给！对它们只能实行专政！

现在，一批牛鬼蛇神跑出来，搞反革命组织，进行反革命活动。对于反革命组织，要坚决消灭之。对于反革命分子要毫不迟疑地实行法律制裁。

毛主席号召**人民解放军积极地支持和援助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地反对右派**。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热烈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人民解放军正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社会主义事业创立新的伟大的功劳。这是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任务。

有的地方，反革命组织暴露得很充分了。当地驻军和广大革命群众、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的公安机关，对反革命组织实行了镇压，这是做得完全对的。哈尔滨驻军和广大革命群众、市公安接管委员会，对当地所谓"荣复军"这个反动组织的处理，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他们在包围了所谓"荣复军"以后，首先发动政治攻势，使广大受蒙蔽的人觉悟过来，反革命肇事的现场，变成了控诉反革命分子的大会。受蒙蔽的人们交出了头头。所谓"荣复军"很快就瓦解了。这样做，既打击了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又争取了受蒙蔽的人们。

在镇压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的时候，专政机关必须同广大革命群众相结合。这样就能形成天罗地网，使反革命分子无处藏身。

一切革命群众组织，一切革命同志，都必须提高革命警惕性，防止反革命分子混进来捣乱。要在统一指挥下，配合专政机关，担负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

在解放战争进入对蒋介石反动派举行总反攻的时候，毛主席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发出了号召：**"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在今天，无产阶级革命的大军正在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正在向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发起总反击，我们也必须抓革命、促生产，也必须加强纪律性。这样，我们在当前这场斗争中也将是无往而不胜。

"一唱雄鸡天下白"。让我们热烈地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吧！

（原载《红旗》杂志 1967 年第 3 期）

61

上海人民公社今日宣告成立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

上海人民将于今天下午隆重地在人民广场举行盛大集会，热烈庆祝上海人民公社成立。

上海人民公社是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诞生的，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中诞生的。她的诞生，庄严地宣判了旧上海市委的死刑。从此，旧上海市委的一切权力全归上海人民公社。这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又一巨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极其重大的胜利！上海革命的工人、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学生、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热烈庆祝她的诞生，从心底里欢呼："上海人民公社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上海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打倒旧上海市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粉碎了旧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实现了大联合，从旧上海市委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魔掌中夺回了党权、政权、财权和文权，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上海人民公社在东方地平线上出现，是上海地区一月革命的胜利成果，也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团结、大夺权的胜利成果。

今天，上海人民将以万分振奋的心情，热烈隆重地庆祝上海人民公社的诞生，欢庆这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节日。

（原载 1967 年 2 月 5 日《解放日报》）

一 月 革 命 胜 利 万 岁！

——上海人民公社宣言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我们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地宣告：在伟大的一月革命的大风暴中，旧上海市委、市人委被我们砸烂了，上海人民公社诞生了！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

根据这个道理，我们就反抗，就造反，就斗争，就夺权。一九六七年一月初，上海革命造反派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进攻的号角，打响了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胜利的第一炮。

在这个极其重要、极其关键的时刻，北京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声音：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发来了贺电。毛主席支持革命造反派夺权，这个伟大号召，好象一声春雷，振奋了全上海，震撼了全中国，震动了全世界。从此，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如急风暴雨，迅猛异常，如大海怒涛，滚滚向前。在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基础上，在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基础上，在痛击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逆流的斗争中，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现了。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新型的上海人民公社，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地平线上，诞生在黄浦江畔，屹立在世界东方。

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

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光辉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辉胜利！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光辉胜利！广大革命群众热烈地欢呼：伟大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

政权，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大搏斗，大厮杀，归根结底，就是为了争夺政权。因此，千重要，万重要，夺取政权最重要。旧上海市委、市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掌握了上海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他们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他们对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恶意攻击。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他们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他们千方百计地扶植资本主义势力，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竟狗胆包天，公然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耍阴谋，放暗箭，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挑动群众斗群众，把革命左派打成“反革命”；当他们感到自己快要垮台时，他们又开黑会，定黑计，大刮阴风，大布妖雾，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旧上海市委、市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老爷们，凭着他们手里掌握的权力，兴风作浪，作恶多端，干尽了坏事，在一个短时期内使全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上海，陷人了瘫痪状态。他们妄图用这种毒辣的手段，卡住我们的咽喉，切断我们的血管。他们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社会主义经济。但是，正象世界上一切反动派一样，他们都是一批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蠢人。他们自己给自己敲响了死亡的丧钟，他们自己为自己创造了垮台的条件。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和历经革命风浪考验的上海各革命造反派，目睹这些资产阶级代理人的倒行逆施，眼看毛主席缔造的红上海开始改变颜色，无不义愤填膺，怒火万丈！**“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红色造反者们发扬了天不怕，地不怕，敢同恶鬼争高下的大无畏精神，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乘革命的大好时机，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高举无产阶级夺权斗争的旗帜，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勇敢地挑起革命与生产两副重担，煞住了反革命经济主义的黑风，击退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迅速扭转了局面。就在这个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进行了自下而上的夺权，奋起砸烂了修正主义的阎王殿，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新政权。

一月革命，是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铁拳；一月革命，是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团结的战鼓；一月革命，创造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自下而上地夺回自己

专政权力的新形式；一月革命，开辟了上海劳动人民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新阶段。

上海人民公社，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产生的崭新的地方国家机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实现大联合，夺取一月革命伟大胜利的指路明灯。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抵抗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进攻，防止修正主义和平演变的坚强保证。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横扫自己头脑中和自己队伍中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本位主义、宗派主义、行会主义、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山头主义、个人主义等等资产阶级垃圾，加强无产阶级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强大武器。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我们的组织就团结，我们的队伍就一往直前，我们的斗争就所向无敌。我们上海人民公社的全体红色造反者向毛主席庄严宣誓："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就是我们的终身天职。伟大的"老三篇"，就是我们的座右铭。光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等著作，就是我们的行动指南。我们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狠斗"私"字，大立"公"字，不断促进自己的思想革命化，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一定要把上海人民公社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一定要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一定要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永远普照全上海！

上海人民公社，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彻底打碎已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专政权力的国家机构，重新创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它的组织原则，是**毛主席教导的民主集中制**。它对人民内部实行最广泛的无产阶级大民主，对阶级敌人则实行最无情的无产阶级专政。它的领导成员，在上海自下而上的全面大夺权取得胜利后，由革命群众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在目前，则由各革命造反组织协商推举组成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它是革命群众组织、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负责人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领导干部三结合的临时的过渡性的权力机构，行使公社的领导权力。不论是现在的临时委员会，或是条件成熟时选举产生的正式委员会，都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坚决执行毛主席制定的群众路线，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接受群众的监督，倾听群众的意见和批评。

上海人民公社的一切工作人员，都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绝没有做官当老爷的权利。谁要脱离群众，包办代替，甚至压制群众，专断独行，就必须随时撤换清洗。

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在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更广阔的基础上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全面的大夺权，发扬"打落水狗"的精神，彻底打倒旧市委、旧市人委，挖出一切目前还隐藏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高地举起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和"**节约闹革命**"的旗帜，坚决打垮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反革命逆流，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大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对于地、富、反、坏、右和其他一切牛鬼蛇神，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否则就坚决制裁，坚决镇压，同时，严防类似所谓"荣复军"、"联合行动委员会"之流的反革命组织，以及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煽动群众，进行捣乱，袭击革命左派和革命组织，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一旦发现，组织立予取缔，首恶分子及幕后操纵者马上依法严办，决不宽贷。

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号召：

全市的革命工人们，要发扬上海工人阶级的光荣传统，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进一步联合起来，更好地挑起革命和生产两副重担，进一步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工业生产，搞好交通运输，搞好市场供应，搞好内外交流，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六七年国家生产计划而奋斗！

全市的革命农民和革命的农村干部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开展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彻底揭发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加强对地、富、反、坏、右的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大力抓好田间管理，保证城市供应，夺取今年夏熟丰收，努力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全体指战员们，要坚决响应毛主席最近发出的伟大号召，积极地支持和援助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地反对右派；同时，严守岗位，加强备战，提高革命警惕，时刻准备迎头痛击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帮凶的挑衅和进攻，时刻准备无情镇压国内一切阶级敌人的捣乱和破坏，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社会主义经济，建立新的伟大的功勋！

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们，要更认真地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更好地与工农相结合，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加强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为文化、教育制度的改革作好准备！

党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的全体革命干部和工作人员们，要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和革命群众站在一起，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同时要严守岗位，尽职尽责，经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考验，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新的贡献！

全市和外地在沪的革命造反派同志们，要继续发扬敢想、敢说、敢闯、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大无畏精神，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夺权斗争进行到底！

我们一切任务的最中心的任务，就是夺权。要夺权，就要彻底地夺，就要百分之百地夺，什么折衷主义、改良主义、调和主义、温情主义，统统要打倒。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对敌人的宽恕，就是对革命的背叛。我们就是要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寸权必夺"**！在已经夺权的单位，我们要学会巩固权力，使用权力，决不容胜利果实再落入敌人之手；在被右派假夺权或我们夺权后得而复失的单位，就必须在群众中揭露他们的罪恶阴谋，组织阶级力量重新夺权；至于那些仍然被资产阶级代理人所盘踞控制的单位，我们就要充分发动群众，立即开展夺权斗争，决不容许那些反动家伙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为非作歹。总之，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定要把一切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了的市、区、县各级党政机关以及工厂、企事业单位、农村人民公社、商店、学校、街道等等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统统夺过来，完全、彻底、干净、全部地夺过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同时，在夺权斗争中，我们还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夺权，就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那种"见干部就揪，是当权派就打"的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论调，必须彻底批判。我们对于旧市委、旧市人委以及各级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观点进行分析，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的精神，区别对待。对于他们当中的革命领导干部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我们就是要积极支持。对于犯有一般错误或犯有严重错误但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愿意悔改的，我们就应该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允许他们改过迁善，将功赎罪，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至于那一小撮反

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家伙，则必须坚决打倒！

全市的革命人民，进一步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坚决地支持上海人民公社，为实现上述号召而斗争！

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成立，是上海社会主义革命新的里程碑。革命左派夺权、掌权，为开展全面夺权斗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加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但是，夺取政权，这只是革命的开始，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斗争更尖锐、更复杂。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其他一些反革命分子，决不会甘心自己的死亡，决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必然要向我们发起新的反扑，在革命队伍内部寻找他们的代理人。我们决不可以松懈斗志，麻痹大意。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再有几个反复，多次曲折，再打几个大战役，打几次歼灭战。但是我们的决心是下定的了，不管风浪再大，都要挺起胸膛，勇猛前进，迎接阶级斗争的惊涛骇浪，闯过前进道路上的急流险滩，决不后退半分。上海人民公社是在革命的暴风雨中诞生的，它必将在更猛烈的革命暴风雨中锻炼成长！让美帝国主义者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及其走狗在上海人民公社面前吓得发抖吧！让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让一切牛鬼蛇神，在上海人民公社面前胆颤心惊吧！让那些只知道按照常规走路的政治庸人在上海人民公社面前目瞪口呆吧！上海人民公社涤荡的是一切污泥浊水，创造的是光辉灿烂的毛泽东思想的新天地！

伟大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

伟大的上海人民公社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夺权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上海人民公社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

(原载 1967 年 2 月 7 日《解放日报》)

上海人民公社宣告成立（节录）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

“中华儿女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在震撼世界的一月革命风暴的隆隆炮火声中，一个崭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上海人

民公社，犹如一轮朝日，出现在地平线上、屹立于世界的东方，闪耀在黄浦江畔。昨天上海百万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战士和革命群众，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陆海空三军指战员，怀着对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心情，隆重集会和游行，热烈欢庆上海人民公社成立。

这是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最盛大的节日！

大会以响彻云霄、巨人般的声音，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旧上海市委、旧市人委被无产阶级革命派砸烂了！

大会庄严宣告：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

上海人民公社，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通过自下而上地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建立起来的地方国家机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组织形式。

上海人民公社是由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和其他革命工人、革命学生、革命干部的造反团体发起成立的。

庆祝大会在市中心的人民广场举行。

下午二时，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东方红》乐曲声中开始。当大会主席宣布："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了"时，全场欢声雷动，鞭炮、锣鼓齐鸣，无数个彩色气球冉冉而起，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的欢呼声，震动了全上海、全中国、全世界！这个具有伟大意义的时刻将永远载人史册。

接着，大会宣读了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宣言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旧上海市委、市人委被砸烂了！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

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同志参加了昨天的大会，并讲了话。张春桥同志首先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向上海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向上海的革命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他同时宣布：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建议，并且得到发起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同意，姚文元同志和我两个人即日起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工作。

姚文元同志在讲话中说，夺权以后，一切革命组织都面临着新的考验。是革命到底，还是半途而止？我们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的武器，来克服我们头脑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坚决反对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行会主义等等资产阶级思想。我们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的彻底解放而斗争，决不只是为了某一团体、某一组织派别的利益。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陆海空三军代表、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同志也在会上发言，热烈祝贺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大联合、大夺权的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热烈祝贺上海人民公社的诞生。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毛主席号召我们、人民解放军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我们坚决拥护，坚决照办。上海革命工人、革命农民、革命学生、革命干部和外地在沪革命造反组织的代表都相继在大会上发言。他们热烈欢呼上海人民公社的诞生，决心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卫公社，用毕生的精力来建设公社！他们表示坚决响应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号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紧把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最最热烈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中，大会宣读了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的致敬电。

大会宣布了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第一号通令。

最后大会在高昂的《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声中胜利结束。参加大会的各路革命造反派战士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簇拥着红光闪闪的"上海人民公社"的巨牌，载歌载舞，举行了庆祝游行。张春桥、姚文元同志，驻沪陆、海、空军首长和革命群众一起参加了游行。游行队伍走到外滩旧市人委大楼前，砸烂烧毁了旧市人委的招牌，挂上了崭新的上海人民公社的巨牌。这时，庆祝集会游行又达到了新的高潮。

(原载 1967 年 2 月 6 日《解放日报》)

〔附〕 上海"一月革命"的前前后后

金 春 明

一九六七年初，在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发生了所谓"一月革命"。它成了全国全面夺权的发端，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曾受到肯定和颂扬，而且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得到了高度评价。九大政治报告说："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于一九六七年一月自下而上地夺了旧市委、旧市人委中走资派的权力。""毛主席及时地总结了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经验，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推动了全国的夺权斗争。"

打倒"四人帮"以后，进行了拨乱反正。一九七九年一月四日，党中央批转了上海市委《关于解决所谓"一月革命"问题的请示报告》。这个报告明确指出："所谓一月革命，完全是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精心策划的一个大阴谋，是一场反革命风暴，一股反革命逆流，是他们搞乱全国，进行全面篡党夺权的一个严重步骤。""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把上海市委诬陷为'修正主义的'、'反革命的'旧政权，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陈丕显、曹荻秋等一大批领导干部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强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策划这一篡党夺权反革命阴谋的头目和主要骨干分子，是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以及他们的余党……他们确实是一伙反革命的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地痞流氓、打砸抢者、反动文痞。他们通过这一场篡党夺权的大阴谋，结成了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

这样就在基本点上，把这一段被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所谓"一月革命"，实际上是从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张春桥、姚文元回上海，到二月五日建立上海人民公社这一段时间内，他们进行的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为弄清这一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现从安亭事件说起，按照时间顺序介绍以下六个问题。

一、安亭事件及其后果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在上海附近的一个小火车站安亭，发生了卧轨拦车事件。这次事件是由上海市一部分人要成立"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引起的。

在"文化大革命"造反浪潮的影响下，在北京南下串连的红卫兵（主要是蒯大富的红卫兵

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的支持帮助下，十一月六日，王洪文、潘国平、陈阿大、黄金海等三十多人开了一次会。会上决定要成立一个全市性的工人组织，并定名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以下简称工总司）；还决定于九日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控诉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宣布工总司正式成立。会上推举了大会五人主席团，王洪文因为是党员（当时参加会的只有两名党员），很受重视，被推举为主席团成员。十一月九日，大会如期举行，参加者据说有万余人。大会上散发了工总司成立宣言。

大会前，工总司曾派人到上海市委提出要求，市委作了认真研究。根据中央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通知的精神，市委认为成立工总司是不适当的，这样做违反中央关于工人要“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到厂外去串连”，不要成立跨行业的组织等规定的精神，决定采取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的方针。上海市委曾就这一意见打电话向北京汇报请示，得到了赞同。张春桥对上海市委的方针当时也表示完全同意。

工总司没有得到市委的承认，就在大会后组织了请愿游行，一直闹到半夜。在没有任何结果的情况下，他们冲进上海火车站，强占列车，声称要北上赴京请愿。这列火车离开上海不久，被铁路局下令阻留在安亭站。于是，王洪文等人就率众闹事，卧轨拦车，造成沪宁铁路交通中断三十小时又三十四分钟，严重影响了客货运输。

安亭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委及时向中央作了汇报。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打来电报，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坚决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革命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中央文革决定派张春桥回上海处理这一事件。上海市委一方面不承认工总司的条件，一方面又派人到安亭，送去衣服、食品，做思想工作，动员工人回厂抓革命、促生产。从当时的情况看，可能不要很久，问题就可以妥善解决。

可是，十一月十二日张春桥到上海后，不同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就自行驱车去安亭。他先找王洪文等几个头头开小会，然后又开大会，当众答应第二天回上海解决问题。第二天下午，张春桥就在文化广场签字同意了工总司提出的五项要求，即：1.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组织；2.承认十一月九日大会以及工人“被迫”上京控告是革命行动；3.这次事件所造成的后果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4.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5.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活动提供各方面的方便。十五日，张春桥又去苏州，同在那里继续坚持北上的工人签定了内容大体相同的五条。这两个五条统称“双五条”。

上海市委对陈伯达、张春桥出尔反尔的行动十分不满。陈丕显同志曾打电话给陈伯达，提出严厉质问：“一个中央文革成员，究竟有没有权，不同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商量，就在群众组织反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五条上签字？还要不要国家法律？党中央的指示还算数不算数？”在曹荻秋同志主持的上海市委常委会上，不少同志还当面批评了张春桥的两面派行为。但张春桥说，他向毛主席汇报过，并得到了批准。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市委只好接受了既成事实。

张春桥搞的这一手可以说是一箭三雕：一是把上海市委置于群众的对立面，给市委强加上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的罪名；二是扶植了反对上海市委的力量——工总司，使它迅速扩大，成为搞乱上海的一支主要力量；三是开始为自己培植了一支以王洪文为首的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帮派势力。

工总司的成立，开了一个恶劣先例，从此上海就出现了大量的红卫兵之外的各种名目的群众组织。这些组织大搞揪斗、炮轰、游行、集会，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冲击和迫害，使

上海的局势进一步恶化起来。把上海搞乱之后，张春桥借口江青要他改文章而飞回北京。等待时机，准备下手摘“桃子”。

二、赤卫队的成立和康平路事件

十一月二十六日，上海市出现了另一个全市性的工人群众组织——上海工人赤卫队。赤卫队成立后发展很快，据说最多时达八十万人。他们公开反对张春桥签字的五条，并给陈伯达、江青发了一份“特急电报”，说“双五条”是大毒草；要求张春桥立即回上海检查交代。赤卫队成立伊始，就同工总司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上海发生了解放日报事件。这次事件的起因是上海红卫兵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办的《红卫兵战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红革会要求把这份《红卫兵战报》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以便“消毒”。解放日报社领导经请求上海市委后，拒绝了红革会的要求。于是红革会决定占领报社，封闭解放日报。这一行动遭到赤卫队的反对，很多赤卫队员到报社附近游行示威，高喊“我们要看《解放日报》”的口号，并同红革会展开了辩论。工总司闻讯立即派人支持红革会。这次事件是工总司同赤卫队的第一次大较量。经过八天八夜的争斗，十二月八日，上海市委终于被迫承认了红革会的“三项决定”。

十二月十八日，原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负责人徐景贤、朱永嘉等人“奉命造反”，根据张春桥的电话指示在文化广场召开了炮打上海市委大会。红革会动员了八千红卫兵压阵助威，并帮助他们揪斗了陈丕显同志。工总司也派了一千五百名工人声援。当晚，“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宣告成立。这个联络站在一段时间里，成为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的办事机构。

十二月二十三日，工人赤卫队召开了批判大会，强令曹荻秋同志到会，并提出了与工总司相对立的八项要求，曹荻秋同志被迫签了字。第二天市委开会，陈丕显同志主持，批评了曹荻秋同志。会议认为不该签字，要曹荻秋同志给赤卫队做工作，妥善解决。但工作尚未来得及进行，二十五日，工总司又召开批判大会，把曹荻秋同志揪到会场，迫使他当众宣布同赤卫队签字的八条作废，赤卫队是“保皇组织”。这样，就使矛盾激化了。

十二月二十七日，赤卫队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决定一方面给党中央、国务院打电报，要求中央派专人解决上海问题；另方面，调人包围康平路上海市委书记处，要找陈丕显、曹荻秋同志“算账”。到二十八日晚，包围康平路的工人赤卫队员已达到一万多人，而且还在陆续增多。这就是康平路事件的开始。

张春桥在北京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策划了一个大阴谋。二十九日下午，张春桥的老婆李文静秘密派人找到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头头徐景贤，传达张春桥的“紧急电话指示”：“赤卫队去造曹荻秋的反，上海的造反派为什么看着不动？希望上海的造反派想想这件事的后果。如果曹荻秋投降了，签字同意赤卫队的要求，那么上海造反派打下的天下就是赤卫队的了，桃子就被赤卫队摘去了。想办法告诉工人造反派，赶紧动员人去康平路，对赤卫队搞政治攻势。人去得越多，曹荻秋就越不敢轻易投降。”徐景贤得到这个“指示”后，立刻向王洪文等传达，马上行动起来。他们在衡山宾馆设立总指挥部，又在荣昌路六十号设立“前线指挥部”，紧急调人。到二十九日晚饭后，被调集到康平路一带的工总司一派成员已达十万人，被包围的赤卫队员不到三万人。

但是，要兴师问罪总要有个罪名，于是，张春桥又同他老婆一起，给赤卫队无中生有地

捏造了一个抄张春桥的家，"炮打中央文革"的罪名。事实是怎样的呢？当时身临其境并作过调查研究的红革会常委马立新、戴定宪等人曾在一份材料中作了如下描写："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爆发了康平路事件……就在二十九日夜里，突然到处谣传：'赤卫队冲砸敬爱的春桥同志的家"。凌晨四时，劳一元、戴定宪（均为红革会常委）等人特地来到康平路一百号，就在张春桥家门口，问了张的老婆李文静：'赤卫队有没有抄你的家？'她亲口回答：'他们要找陈丕显，敲了我家门。我对他们说，这是张春桥同志的家，他们就走了。'可是到了五点多钟，张春桥打电话回家问怎么回事，他的大女儿张维维在电话中回答：'赤卫队并没有抄我们的家'。张春桥叫张维维让李文静听电话。一阵计议之后，李文静立即满脸杀气。天亮后，她马上改口。大叫大嚷说赤卫队抄了她的家。这样，赤卫队'冲砸敬爱的春桥同志的家'的政治谣言，就满城风雨地传开了。"

正如鲁迅所深刻指出过的："只有有利于己的，什么方法都肯用，这正是流氓行为的模范标本。""四人帮"的"军师"张春桥正是这样一种政治流氓。

调集了人马，又给赤卫队诬加了"炮打中央文革"的罪名，王洪文、徐景贤一伙就按照预谋大打出手，指挥了上海市的第一场大武斗。

关于这一场大武斗的简略经过，在"四人帮"上海余党炮制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初稿）中，有如下一段自供："三十日凌晨二时左右，工人造反队员开始向康平路的赤卫队员冲击，到六点多钟，康平路书记处院内的赤卫队员全部投降。七点钟，近二万名赤卫队员排成单列，分成六路，到四周马路上集中，袖章缴下来六大堆。这天共有九十一人受伤送至医院治疗。工人造反队员还缴获几百箱饼干。"

康平路事件产生了极严重的后果：赤卫队是一个有数十万工人的群众组织，包括一些著名的劳动模范和大量老工人，他们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当然难于忍受。不少赤卫队员北上赴京控告，被阻于昆山。上海铁路局调度所八十多人中，七十多人是赤卫队员，被迫离开了工作岗位，这样就造成运输无人指挥，上海铁路交通中断。从三十日凌晨到三十一日的二十六小时中，停开客车二十六列，五万多旅客不能乘车，五万多旅客被阻于中途；停开货车三十八列，中途停车二十二列，货物积压数万吨。在当时群众组织林立，干部普遍受冲击，党政机关瘫痪的情况下，再加上这一严重事件，使上海经济生活和社会秩序陷于极度混乱。

事实充分说明，上海市的混乱和危机的制造者，正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而不是别人。

三、《告全市人民书》与《紧急通告》的发表和党中央的态度

对于上海市出现的这一大动乱的局面，当时的中央领导者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力求减少混乱、稳定局势的主张。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陈丕显同志，指示他要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做好赴京上告工人的思想工作，同群众组织协商，一起解决上海当时面临的严重问题，并特别强调："交通不能中断，革命的秩序要搞好"。另一种主张以张春桥为代表，他们极力制造混乱，以便乘乱夺权。张春桥在分析一九六六年年底上海形势时曾得意地说，赤卫队进入康平路，"我们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人听了，赤卫队也垮了"，"上海的桃子熟了"。

接到周总理电话指示后，陈丕显同志立即通知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到东湖招待所开会。在这次深夜召开的紧急会议上，陈丕显同志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大家根据周总理指示，对上海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商定了一些办法，同意陈丕显同志的提议，决定起草一份告全市人民的传单。

会后，由几位工人和红卫兵（主要执笔者是中央音乐学院到上海串连的红卫兵舒泽池）根据会议讨论的精神，起草了《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进攻》的传单，副标题是《急告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转载时改为《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初稿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完成。四日，又向一些群众组织负责人征求意见，作了修改，有十二个群众组织同意签名。后来就把它送给陈丕显同志。陈丕显同志立即签字同意，责成《文汇报》印二十万份在全市散发、张贴（这份被"四人帮"隐藏多年的陈丕显同志签字的传单原件已经找到）。一月五日，这份传单又在《文汇报》头版头条刊出。

今天看来，这个《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观点是错误的。它一开头就引用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的话，并且宣称"一九六七年将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面崩溃的一年"，"上海市广大革命群众批判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也进入了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这个基调是根本违反事实的，站不住脚的。但是，其中也提出："革命的工人同志们，紧急行动起来！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要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这对于解决当时上海市面临的混乱和危机又是有好处的。因此，它是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上海市委努力克服生产面临的困难，稳定局势的措施。

《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发布后，交通运输情况经各方面的努力稍有好转，但所谓"经济主义妖风"仍刮得很厉害。一月八日，在锦江饭店又召开了一次群众组织负责人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到会大多数群众组织代表统一了意见，决定起草一个《紧急通告》，并推选红革会和联络站的代表起草，草成后又经三十二个群众组织表示同意，于一月九日在《文汇报》上发布。

陈丕显等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同意发表《紧急通告》。事后，陈丕显同志还专门给张春桥打电话，谈了这个问题。根据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当时记下的电话记录，陈丕显同志是这样说的："报上登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市委要表示支持。那个《紧急通告》是前天晚上我和各个左派组织开会，还找了有关部局的负责人参加，造反派提出意见，我们表示同意和支持，一起共同搞出来的。"

长期以来，由于"四人帮"控制舆论工具，歪曲宣传，使很多人误认为这两个文件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搞的，而陈丕显同志和曹荻秋同志则是反对的。可是，事实恰恰相反。

工总司是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上签字的第一个群众组织，但作为工总司负责人的王洪文并不同意。王洪文虽然参加了陈丕显同志召集的会议，但却攻击这次会议"是个阴谋"，中途退场，表示抗议。起草时他没参加，签字时也找不到他，就由别的负责人代表工总司签了字。事后，这个代为签字的负责人受到王洪文的斥责。

文件起草时，张春桥和姚文元还远在北京。一月四日他们虽然到了上海，但并不知道这件事。四日晚，《文汇报》负责人打电话给市委机关联络站，说明天头版准备刊登《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请他们帮忙问问张春桥、姚文元的意见。一个当时担任联络站宣传组长的人去向姚文元请示，"姚很冷淡地说，刚回来，许多事不了解，看了也没法表示意见，登不登由

他们自己决定吧"。

他们对待《紧急通告》的态度又是怎样呢？在讨论起草《紧急通告》时，通知王洪文参加，但他拒绝出席会议，还指使一些爪牙冲进会场大吵大闹，胡说什么：反对经济主义"是把矛头指向群众，大方向错了"等等。当派人找到王洪文要他代表工总司在《紧急通告》上签字时，王公然拒绝，说："我不同意参加签字。"张春桥、姚文元当时是在上海的。"四人帮"余党吹嘘说张姚"指导"了《紧急通告》的起草。实际上，在《紧急通告》发表后，张春桥对徐景贤等人大发脾气说："五号刚刚发表《告全市人民书》，毛主席肯定了，现在是照着办的问题，为什么又来一个通告？"吓得徐景贤等人"很紧张"。于是，便把代表联络站签字的朱永嘉在内部批了一顿。

一月八日，毛泽东同志在谈话中，对上海的夺权活动给了充分的肯定。他说："《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五日的告全市人民书，可以转载、广播。""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这个谈话实际上成为在全国进行全面夺权的号召。

一月十一日，张春桥、姚文元得到了毛泽东同志谈话和中央发来贺电的消息，马上命令徐景贤等人召集各群众组织的头头，连夜到上海市委党校开会，抢在中央广播贺电之前，宣读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贺电。接着，张春桥就无耻地美化自己，说什么，他和姚文元回上海才一个星期，上海已经发生了如何大的变化，毛主席、党中央已经肯定过两次。中央"给一个城市的群众组织发贺电，这是史无前例的事"，"这是对上海的最大支持"等等。还说他已给中央回电，"请中央放心"。似乎这一切都不言而喻地应当记到他们的功劳簿上。王洪文更是再也绝口不谈自己如何反对两个文件，反而借口贺电是打给工总司等群众组织的，口口声声说这是中央对"我们工总司"的关怀和支持，并从此把工总司吹嘘为"毛主席亲手树立的一面红旗"。

一月十二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精心策划下，上海召开了有数十万人参加的"欢庆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张春桥、姚文元之流又在会上大肆炫耀了一番。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假象，好象这两个文件真是他们主持搞的，一时蒙蔽了许多人。

事隔十年，在粉碎"四人帮"后，他们在上海的余党朱永嘉被迫说了几句老实话。他说："八日的那次会议以及《紧急通告》的起草，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都没有予闻过。如果说有关的话，陈丕显却是有一点姻缘关系，他在那里支持了群众的要求。按历史事实，陈丕显在反击经济主义妖风中，是有一点功劳的。"

四、"打倒上海市委大会"
和夺权中的反复争斗

张春桥、姚文元急急忙忙赶回上海，目的就是要夺权。他们一月四日一下飞机，就分别找徐景贤、王承龙和工总司的几个头头密谈。张春桥说："我和姚文元两人参加你们一起。"并煽动说："对市委不必再抱什么幻想"，"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

在他们的精心策划下，一月六日，徐景贤、王洪文一伙假冒全市各造反派组织的名义，召开了"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魏文

伯、杨西光等同志，并把全市高级干部几百人揪到会场陪斗。大会发出三项通令，宣布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市长、勒令陈丕显交代所谓“反革命罪行”，压中央彻底改组上海市委。大会的发言稿和口号是经过张春桥、姚文元审查修改的，但他们却欺骗中央。明明是他们自己把大会的口号定为“打倒陈丕显、曹荻秋”，但在五日向中央汇报的简报上却说：“明天造反派开大会，批判市委、口号升了级，变成打倒陈丕显、曹荻秋。”张姚一伙颠倒黑白，把当时由他们造成的生产瘫痪、交通阻塞以及大刮“经济主义妖风”的混乱局面的责任，硬栽在陈丕显、曹荻秋等同志身上，上欺中央、下骗群众，公开打出了夺权的旗号。大会之后，他们在全市进一步掀起了戴高帽子、游街、揪斗的恶浪，大规模地迫害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

这次大会后，市委、市人委的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全市的实际权力落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的手里。

在搞垮各级党政机构的同时，张姚策划建立他们自己一手独霸的全市性政权组织。一月八日建立的“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夺取了铁路、海港、长江航运、邮电等单位的领导权。张春桥叫嚷说：“火线指挥部可称为‘经济苏维埃’，代替上海市人委。”他们还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来代替上海市公安局，用“造反组织联络站”作为全市最高机构，来代替上海市委。这些行动充分说明了他们妄图以自己的面貌来改造党，把上海经营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基地的狂妄野心。

但是，上海市的广大群众对张春桥、姚文元控制下的工总司王洪文一伙的倒行逆施是不满的。上海的各个群众组织也并不都是甘心听凭张姚等人一手摆布的，有些群众组织想把权夺到自己手里来。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几番反复的争斗。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之前，上海曾发生过四次夺市委、市人委权的行动，这就是一月十五日以上海市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为主的夺权；一月二十三日“上三司”的再次夺权；一月二十四日红革会的夺权；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的夺权。

这几次夺权行动，由于妨碍了张春桥、姚文元篡夺领导权、独霸上海的阴谋部署，因此，在他们的分化瓦解、威逼利诱和残酷镇压下都失败了。

五、“一二八”炮打张春桥和红革会被镇压

张春桥一伙在上海的种种倒行逆施，引起了群众的怀疑和不满，于是，以上海红革会为主的青年们首先行动起来，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炮打张春桥的斗争。后来被称为“一二八炮打”。

红革会对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本来就有些看法，以后又听到了关于张春桥历史问题的一些传闻，产生了怀疑；再加上“上三司”被镇压，自己夺权被反对等原因，因此，对张春桥的不满就爆发了。

一月二十六日，红革会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先搞徐景贤，抓住“材料袋”，打开突破口，再搞张春桥。一月二十七日深夜，复旦大学一批红卫兵到市委党校揪走了徐景贤。张春桥闻讯后大为恐慌，立即打电话给上海警备区，悍然调动军队进行镇压。当时出动了全副武装的四个摩托车排和一个步兵连，包围了复旦大学。事实证明，一贯自称“支持新生事物”、“支持学生运动”的张春桥，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最早用刺刀镇压学生的人。

这件事引起了红卫兵的极大愤怒。一月二十八日红革会常委扩大会决定进一步炮打张春桥。张春桥、姚文元破例主动到会场会见各校红卫兵负责人。红卫兵当场质问，同张姚面对

面斗争长达六个小时。当红卫兵问张春桥:"你三十年代干了什么","狄克是谁"的时候，张春桥面色死灰，臭汗直流。

一月二十九日晚上，在复旦大学礼堂，以红革会为主，联合其他组织召开了"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决定第二天在上海市人民广场召开全市炮打张春桥大会，并示威游行。

面对这种情况，老奸巨猾的张春桥再次耍弄了一系列的阴谋诡计。他开始是调解放军镇压学生，但解放军在了解事实真象后很快撤走了。接着，一月二十九日晚，张春桥、姚文元把王洪文等一帮亲信找到衡山路一幢小楼里密议对策。之后，王洪文等人一面派人到街上覆盖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大标语，一面紧急调动人马封锁人民广场，准备冲击会场抓人，制造流血事件。继而，他伙同陈伯达、江青炮制"中央文革特急电"。一月二十八日，事件一发生，张春桥马上给中央文革打电话，歪曲事实真象，向陈伯达、江青求援。二十九日，张春桥又打电话，张打完了，姚文元又打，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

陈伯达、江青等人接到张春桥的电话，立即起草了内容为：不应把矛头对着"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张春桥；不能组织十万人的游行；要放回徐景贤的所谓"中央文革特急电"，发往上海，为张春桥解围。

有了中央文革的这份特急电报，张春桥的胆子马上壮起来了。他立即批示:"印八开，二十万份，立即出动广播车，广为宣传散发。"并且公然宣称:"这一场斗争，不是一个小问题，也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能否贯彻的问题，关系到上海运动的大方向问题。"

三十日晨五时，红革会得到"中央文革特急电"，又得知工总司已在调动人马，于是取消了全市大会和示威游行，并释放了徐景贤。这样，这一场炮打张春桥的斗争就失败了。上海市红革会也因掀起"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逆流"而垮了台。张姚一伙对参加"一二八炮打"的青年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据初步统计，全市因参加"一二八炮打"而受到打击迫害的（不包括一般请罪、检查）达二千五百人，其中隔离审查二百多人，被办学习班的四百四十人。审查中，非刑拷打，肆意摧残，逼死五人，逼疯六人，不少人被打成残废和造成终生疾病。

六、上海人民公社成立

首先搞乱上海，然后妄加罪名，搞垮上海市委，接着又采取种种手段消灭不听话的、异己的群众组织，经过这样几个步骤之后，张春桥一伙就逐步把权抓到了自己手中。在这个基础上，从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起，他们开始筹备自己的政权。

一月十九日，张春桥一伙在拼凑班子的会议上，狂妄地把他们的夺权同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相比，说什么，他们的所做所为可以叫做"一月革命"，全市政权机构可以叫做"新上海公社"，成立宣言可以名为"一月革命胜利万岁"等等。二月初，张春桥把筹建上海领导机构的情况报告了陈伯达。这时，《红旗》杂志发表了《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的社论。这篇社论不仅高度赞扬了上海的所谓"一月革命"，说向走资派夺权"这个革命的大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革命群众把它叫做伟大的'一月革命'。……'一月革命'的风暴正在席卷全国"。而且说:"毛主席把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称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这时，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式"。陈伯达将社论的内容告诉了张春桥，又告诉张春桥：主席正在考虑建立北京人民公社的名单。善于观风投机的张春桥马上找了十多个组织的头头座谈，提议把"新上海公

社"改名为"上海人民公社"。这个提议当即获得赞同。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上海人民公社正式宣告成立。张春桥说：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标志着旧市委、旧市人委实行的资产阶级专政垮台了，标志着上海无产阶级、广大的人民夺了权，当了政"。事实正好相反。"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上海市委在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直接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带领全市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胜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把一个半殖民地的旧上海建设成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把一个"冒险家的乐园"改造成为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型城市。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前的上海市委实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绝不是什么资产阶级专政。而这个所谓的"上海人民公社"实行的却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

这个所谓"上海人民公社"为首的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还有林彪死党王维国，文痞徐景贤，卖身投靠这些坏人的老干部马天水等。就是这样一批坏人掌握了上海市的党政财文大权。

他们上台以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夺权。在由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指挥炮制的公社成立宣言中写道："我们一切任务的最中心任务，就是夺权。要夺权，就要彻底地夺，就要百分之百地夺"，"一定要把一切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了的市、区、县各级党政机关以及工厂、企事业单位、农村人民公社、商店、学校、街道等等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统统夺过来，完全、彻底、干净、全部地夺过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他们还在"第一号通令"中公然宣布：反对"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破坏上海人民公社"的，都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要"立即逮捕法办"。

他们怎样对待广大干部呢？张春桥说："对解放出来的干部，要当国民党留用人员对待。"毛主席、党中央多年培养教育出来的广大干部，中国人民最宝贵的财富，在张春桥口中，竟然成了"国民党留用人员"，这充分暴露了张春桥一伙妄想通过"文化大革命"搞"改朝换代"的野心。

他们采用名目繁多的严刑酷法，残酷地折磨和摧残革命老干部，甚至把一所监狱的劳改犯全部放出去，而把大批老干部关进来，充分表现了他们封建法西斯的惨无人道。

历史是公正而无情的。唯一符合事实的结论只能是：所谓上海"一月革命"不是革命风暴，而是反革命逆流；不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而是一小撮坏人操纵利用的"群众运动"；不是革命的大联合，而是一派包办；不是无产阶级政权发展的新形式，而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个严重步骤。历史的教训必须吸取。这次反革命逆流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必须彻底肃清。

（原载《党史通讯》1983年第10期）

中央军委转发福建前线部队公告

（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

兹将福建前线部队公告转发你们，望参照执行。

福建前线部队公告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最近，正当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实行大联合进行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正当福建部队加强战备的时候，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对福州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进行造谣诬蔑，煽动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军事机关。他们违背中共中央关于不准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的规定，一月二十六日、二十九日两次冲进会场非法夺取大会领导权，破坏会场设备，二十六日冲击军事指挥机关。特别是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命令公布之后，三十日仍然有人明知故犯，乱抓军队干部进行斗争，实行体罚，侮辱人格等等，公开违抗最高统帅毛主席批发的中央军委命令。这是严重违犯纪律的行为，应当受到纪律制裁。我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最主要的工具，是人民利益的最忠实保卫者，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忠实保卫者，是毛泽东思想的最忠实的保卫者，谁违抗毛主席的命令，谁就是反对毛主席！

我们遵照最高统帅的命令，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反对右派，加强战备，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对不执行中央军委命令者，坚决实行纪律制裁！

为着维护最高统帅命令的尊严，对军队内部极少数违抗中央军委命令的违法分子，实行了纪律处理。外部如有借此进行造谣诬蔑，或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继续冲击军事机关，丑化中国人民解放军者，我们一定按照最高统帅命令，坚决采取必要的措施。

坚决支持真正的革命左派！

坚决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央军委关于外出串连人员限时返回本单位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

中央军委一月二十八日命令发布后，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军事工厂等单位外出串连的同志，热烈响应军委号召，大部分已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去进行斗批改，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但是，仍有一些同志，目前还逗留在北京和其它地方。为切实贯彻执行军委一月二十八日命令，军委决定：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机关、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军事工厂等单位的同志，一律于二月二十日前返回本地区、本单位，不得再在外地逗留。革命群众组织设在各地的联络站也一律撤销。各单位的接待站，从二月二十一日起一律停止接待。凡过期不归者，不予报销旅差费。凡违犯上述规定者，一律按一月二十八日命令给以纪律处分。

《人民日报》发表《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争取和团结大多数》的编者按语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

在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的决战时刻，革命造反派不仅要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联合起来，而且要团结广大革命群众，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革命大军，这样，才能保证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把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统统夺过来，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哈尔滨师范学院革命造反派，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及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进行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对那些受蒙蔽的群众，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从而把大多数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哈尔滨师范学院革命造反派的经验很好，可供各地参考。

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

军以上领导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军级本身不含，以下同），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全面阶级斗争的新阶段，形势大好。为了进一步贯彻中央军委一月二十八日的命令，更好地支援和参加地方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胜利地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国防的光荣任务，把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特作如下规定：

一、中央军委一月二十八日的命令，是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亲自批发的。军委的这个命令，是个重要的文件，必须广泛宣传，充分发动群众，深入学习讨论，认真抓好活思想，务使大家深刻认识颁发这个命令的伟大意义，提高执行命令的自觉性。凡是我军真正的革命同志，要坚决地捍卫，要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

二、军以上机关（各总部、军种、兵种，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区空军、海军舰队）的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进行四大。由军委决定已经开展四大的单位，除因必要暂停进行的以外，要继续充分发动群众，坚决依靠真正的而不是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团结大多数，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军委决定暂时不开展四大的单位，必须进行正面教育，何时开始，必须听候军委命令。

三、陆、空军的军以下单位，海军的基地以下单位，海、空军的飞行学校，北京卫戍区，上海、天津、旅大警备区，以及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一律不搞四大，坚持进行正面教育。绝对不准任何人、任何组织以任何借口到这些单位进行串连。

四、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帝、修、反加紧反华，我军更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保持高度集中统一和不间断的指挥。因此，各级军事领导机关（包括司、政、后及其他领导部门）一律不允许自下而上的夺权，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冲击。

五、根据古田会议决议和一九六O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所确定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党委领导。党委个别成员问题严重的，可以撤换，党委不能领导的，可以改组，但都必须经过上级批准。军队领导机关必须保持严密的、完整的指挥体系，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已经成立的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必须以行政单位进行改组。这些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对党委有批评和建议之权，但不能代替、监督党委和行政领导行使职权。

六、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一定要分清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还是资产阶级当权派。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一概打倒，是完全错误的。

各级领导干部，要敢字当头，到群众中去，虚心倾听群众的意见，同群众紧密结合，一

道闹革命，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

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应该根据问题的性质和情节的轻重，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别对待。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

凡是没有上级命令停职、罢官的领导干部，应该坚守岗位，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努力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

七、在运动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要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等不良倾向。要大力宣传、认真贯彻林副主席的指示，加强运动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

以上规定，应立即向各级党委、全体人员传达。军委要求全体同志，认清当前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发展的新形势，充分认识我军在这场斗争中所处的地位和肩负的光荣任务，坚决执行上述规定，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部

布　　告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

奉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接管北京市公安局、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牟立善同志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刘传新、王更印两同志为副主任，并对市公安局所属机构一律派出军事代表、实行军事管制。

一、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任务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维护革命秩序，坚决支持、保护无产阶级革命派，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北京市的全体人民警察和公安人员，应当在军事管制委员会领导下，坚守岗位，积极工作、听从命令，服从指挥。

二、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坚决支持公安局内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闹革命，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同群众相结合，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彻底肃清彭真、罗瑞卿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流毒，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彻底改造旧公安局，建立以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的非常革命化的无产阶级公安局。

三、各革命群众组织有义务支持和协助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维护革命秩序。革命群众对人民警察和公安人员有意见，可以向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军事代表提出；问题严重的，可以由公安局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同意，邀请有关的革命群众代表参加批判；有犯罪行为、证据确凿的，由军事管制委员会依法处理。任何群众组织和个人不得私自处理人民警察和公安人员。

中共中央、国务院
通　　告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

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和各地出现了许多所谓全国性组织，它们都不是自下而上地在全国各地真正的革命派大联合的基础上，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而是少数人临时凑合在一起组成的。其中，还有极少数组织是地、富、反、坏、右分子搞起来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

一、所谓全国性组织，中央一律不予承认，所有这些组织应当立即取消。它们的成员应该立即从北京等地回去，到原单位参加运动。

二、这些组织以各种名义冒领的公款，应一律由批款单位如数追回。在本通告下达前，已经花掉的款项必须开列清单，由批款单位进行审查，购买的实物，除已经消耗的以外，也应一律追回。本通告下达后，领到的款项，不准动用。如有携款逃匿者，追查法办。

三、这些组织，如发现有反革命活动，其成员必须向公安部门揭发报告，由公安部门负责审查处理。

特此通告。

中共中央关于党员党籍处理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

最近，有些单位的党组织或群众组织按照某些群众的要求，开除了一些党员的党籍，有的还当场烧毁了入党志愿书等档案材料。对此，中央认为：

一、除了逮捕法办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该立即开除其党籍外，一般党员的党籍处理，应该放在运动后期进行。

二、按照党章规定，党员的处分，必须由党组织执行，群众及其组织，无权对党员进行党纪处分。

三、有关党员的入党申请书等档案材料，不得烧毁。

这个通知可以在农村、城市和部队各单位内普遍张贴。

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发展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的新阶段。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形势，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命令，对军队内部的夺权问题，作如下规定：

（一）军队可以夺权的范围，只限于学院学校（机要学校、尖端技术学校、飞行学校和有外训任务的班、系除外）、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只限于解放军总医院、军区、军种总医院、教学医院）、军事工厂（有尖端技术试验任务的工厂、海军基地所属工厂和绝密工厂除外）。在这些单位中，那些要夺权，那些不需要夺权，要看党委领导存在问题的性质。如果领导权确是掌握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的，要坚决夺回。夺权后，对于犯有错误的原有领导干部，应根据问题的性质和情节的轻重，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别对待。一棍子打死的风，万万不能长，一犯错误就一脚踢开，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立功赎罪。不能把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人当作夺权的对象。

（二）夺权必须是由本单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进行，不准联合本单位以外的革命组织参加夺权。本单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夺权，必须是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实现最广泛、最紧密的大联合。必须是革命的领导干部、革命的中层干部和革命的群众三结合。必须是通过充分酝酿协商、条件成熟，经过上级批准后，才能夺权。不能搞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非组织观点、自由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在夺权斗争中，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之间互相发生争执时，要通过民主协商来解决，绝不能武斗。对有不同意见的群众组织和个人，不能采取排斥、打击、压制和歧视。夺权单位，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保证既搞好文化大革命，又要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三）各学院学校、军事工厂等单位的警卫、通信、练习、勤务和运输分队的权不能夺，也不准参加夺权。这些分队的指挥权，应按军委二月八日的规定移交各驻地军区或部队。

（四）除第一条规定可以夺权的范围以外，其它一切大小单位都不准采取自下而上的办法进行夺权。群众对这些单位的党委和领导干部有意见，可以充分鸣放。党委成员个别不行的，个别撤换，大部分不行的，进行改组，但均须报请上级批准。在本规定之前，凡规定不应夺权的单位而夺了权的，可由上级机关、革命群众组织和本单位领导三方面协商解决，把权交回。

以上规定，望全军指战员、学院学校师生员工、文艺团体、医院和军事工厂的全体同志，切实遵照执行。

谭震林写信痛斥江青一伙

布　日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谭震林同志在给林彪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昨天碰头会上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前天在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忍无可忍的地步。

"他们（指江青一伙）不仅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

"……大批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同志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无人过问，他们有兴趣的是打倒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非整死你不可……他们能执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

"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绝不自杀也不叛国，也决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心襟宽，想得开，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谭震林同志这封充满革命激情的信，到了林彪手里，林彪十分恼火。他想不到，谭震林同志竟敢这样仗义执言、慷慨陈词，公开反对他们一伙"打倒一切"的罪恶阴谋。

二月十九日，林彪在谭震林信上写了一个批示，把信转交毛泽东同志。

林彪在信的批示中写道："主席，谭震林最近的思想意识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现将他的来信送上，请阅。　此致　敬礼　林彪　十九日"

毛泽东同志过去曾多次指出，要保谭震林同志，可是林彪、江青一伙反革命集团却千方百计要打倒谭震林同志。林彪多么希望毛主席看了谭震林同志的信件，看了他自己在信上的批示，能有一个表态，支持他们打倒谭震林同志。可是，毛主席只淡淡地批了"已阅"两字，就退了回来。

林彪顿时恼羞成怒，立刻将毛主席的批示撕成碎块，丢到墙角的痰盂里去了。

站在一边的秘书，看到一向叫嚷"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林彪，竟这样粗暴无理地对待毛主席的批示，感到很过意不去。后来，他趁林彪不在的时候，将毛主席的批示，从痰盂里捞出、晾干、又拼凑到一块，复制保存到中央档案馆。

（原载《党史文汇》1986年第3期）

〔附〕 一场捍卫党的原则的伟大斗争

——揭穿林彪、"四人帮"一伙制造"二月逆流"

重大政治事件的真相

《人民日报》记者　　纪希晨

《人民日报》编者按：一九六七年春天，所谓资本主义复辟的"二月逆流"，是林彪、"四人帮"炮制的迫害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其目的是打倒当时抵制他们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谭震林等同志和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进而打倒周恩来同志和朱德同志，架空毛泽东同志，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扫清道路。

在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斗争里，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们英勇捍卫马克思主义原则和党的传统。他们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同林彪、"四人帮"一伙进行了惊心动魄的斗争。他们坚持原则，光明磊落，无私无畏，表现了共产主义战士的崇高品质，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

党中央最近再次郑重宣布不存在什么"二月逆流"，而是"二月正流"。为了使广大读者了解这个事件的真实情况，本报特组织了这篇报道。

还历史本来面目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叶剑英等同志就同林彪、"四人帮"一伙，在政治局会议上，在中央军委会议上，在如何领导运动的问题上，发生了深刻的路线分歧。双方多次的斗争，都集中在运动要不要党的领导；对老干部应不应都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等革谁的命、靠谁革命的问题上。这种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一九六七年二月怀仁堂会议达到了高潮。

林彪、"四人帮"一伙，把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的这场保卫党的原则的斗争，污蔑为所谓"二月逆流"，炮制了一个震撼全党全军全国的大冤案。在全国范围内立即掀起了一股反击"二月逆流"的妖风，造成了极大的恶果。

但是，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一九七一年"九·一三"林彪反革命武装政变彻底失败以后，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同志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周恩来同志和叶剑英同志参加了这次接见。当叶剑英同志走进会场时，毛泽东同志就对大家说：

"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

毛泽东同志还多次讲过："这件事搞清楚了，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

这就是说，毛泽东同志在那个时候，就已为"二月逆流"翻了案、平了反。但是，林彪、"四人帮"一直掩盖着历史的真相。

现在，我们可以来回顾这段历史了。

一九六七年二月中旬，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会议室里，在周恩来同志主持下，召开当时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同志和中央文革成员的碰头会议，讨论"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

有关同志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把老干部统统打倒等几个问题，展开了尖锐争论。

这是因为，当时社会上已出现了公然破坏党中央制定的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的许多事件。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十六条》。广大群众迅猛起来了。为了达到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目的，八月十三日，林彪以"副统帅"姿态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公然破坏《十六条》中关于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估计，篡改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另立所谓三条标准，凡他认为不符条件者，一条"罢官"，二条"罢官"，三条还是"罢官"。八月十八日，他又在百万人大会上，叫嚣要"四个打倒"，要"大破一切"，"改革一切"，"扫除一切"，"搬掉一切"！他鼓吹什么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号召打倒"走资派"和"反动权威"，进一步煽动大乱，把"罢官"、"横扫"、"火烧"之风刮遍全国！

北京市委和各省、市委连遭冲击之后，大批干部被扣上"走资派"、"反革命"帽子打倒了。

邓小平同志等党中央、国务院、军队的许多领导干部，被点名批斗、关押或靠边了，"公检法"被砸烂了，国家机构开始瘫痪了。

人民解放军的领导机关连续遭到冲击。林彪、"四人帮"一伙一股劲地煽风点火，造谣诬蔑，狂叫有"带枪的资产阶级路线"，"揪军内一小撮"，妄图毁我长城。

功在祖国的贺龙同志，早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就被林彪一伙造谣诬蔑，接着全家被抄，妻子儿女离散、流落了。与此同时，在陈伯达、戚本禹操纵煽动下，一些受蒙蔽的学生掀起了炮轰聂荣臻同志的浪潮。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同志也遭到恶毒攻击。在外事口，他们集中攻击陈毅同志，把外交部搞瘫痪，妄图先夺国防和外交大权。

林彪、"四人帮"一伙为煽动群众冲垮军队，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唆使军事院校学生要求开十万人大会，批判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一月十九日，陈伯达诬蔑"军队资产阶级化"了。各个大军区，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无不遭到冲击。

就在这时，政治局常委陶铸同志，被林彪、陈伯达、江青突然袭击，一月四日被点名诬陷打倒了。这是怎么回事？谭震林、李先念、陈毅等同志去问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同志，富春同志也不清楚，回答说："不知道，没有讨论。"

这时，全国许多工厂停工停产，国家经济生活引起严重混乱。周恩来同志不能不出来过问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他就指示谷牧同志立即起草工交系统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要求工厂不要停产闹革命，红卫兵不要到工厂串连。但是，这个指示还没有发出，立即遭到林彪一伙的围攻，谷牧同志被批了三天。在一次会上，林彪叫嚷，工交战线比文教战线更坏，必须"彻头彻尾地打破旧的东西"，坚持要在工交战线大串连，造成许多地方"停产闹革命"的严重形势。首先，国务院有关的部长和主管生产的国家计委几位副主任，都被揪斗了。王震同志等也被斗了。"现在管生产的只剩下一只胳膊了。"这是指在战争中失去一只胳膊，在漫天风雪中踏遍大庆油田的余秋里同志。

周恩来同志象中流砥柱，巍然矗立在险风恶浪中间。周总理挺身保护被揪斗的老同志。他把贺龙同志一家接到自己家中；他煞费苦心地把一些老同志安排到中南海居住，使他们在冲击中得到短暂的休息。他看到煤炭部长张霖之同志被鞭打致死的照片时，悲愤地说："这些同志，死的不明不白，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呵！"

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在林彪、“四人帮”一伙操纵下，上海爆发了“夺权”黑风。接着，山西、青岛、贵州、黑龙江等省市，以及中央、国务院的各部门也相继发生夺权。这时毛泽东同志发出警告，指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是反动的”。可是，这些整天喊“高举”“句句是真理”的人，根本不理会这些，仍然大肆宣扬“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竟然向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严禁夺权的外交部、财政部发动了夺权。

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同志来到李富春同志的住处。他们面对眼前的混乱情况，十分义愤地议论说，这些家伙把老干部打倒，把几个副总理和老帅打倒，下一步就要打倒周总理了。把毛主席架空了，国家就要大乱了。半个世纪千百万人民大众，无数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无产阶级天下大乱了。这不能不引起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打天下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度警觉和忧虑！陈毅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不光是反对几个副总理和几位老帅，还要反对周总理，这一定是反革命要搞垮我们的党。他们这样搞，决没有好下场！”事实不正是这样吗？

一场面对面的生死搏斗

二月中旬怀仁堂会议，双方斗争发展到白热化。后来所传的所谓“大闹怀仁堂”，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同一伙反党阴谋家、野心家进行的搏斗。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下午的碰头会，象往日一样，周恩来同志坐在中间，一边坐着七位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余秋里、谷牧同志；另一边坐着陈伯达等中央文革成员一伙。两军对阵，十分鲜明。

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首先站起来讲话。为党和国家命运感到无限焦虑的老帅，气愤地向坐在对面的陈伯达一伙，义正词严地说：

“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坐在叶剑英同志旁边的新任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同志，激愤地拍着桌子，痛斥陈伯达一伙：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在这以前，徐向前同志曾因他们凭空捏造刘志坚同志是“叛徒”，顶过陈伯达。徐向前同志说：

“我们是带兵的人，军队的干部，跟我们打过仗，难道我们还不了解吗？”

叶剑英同志接着又质问他们：

“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叶剑英同志幽默地嘲弄陈伯达：

“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为了稳定军队，在这以前，叶剑英同志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常委会议。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的一致意见是，无论如何都要稳住军队，军队不能乱。叶剑英、聂荣臻同志一同去找林彪，指出：军队要搞个法，要搞个命令，要有限制，不能把军队搞乱。于是，中央

军委向部队发了指示，军队不能搞大民主，不能成立战斗队，不能搞串连。

但是林彪利用他窃取的权力，主持召开了一次军委常委会。他横蛮地提出要在军队全面搞大民主。参加会议的几位军委副主席，异口同声地同他辩论：军队搞乱了、天下大乱了，你国防部长靠什么？

经过争论，决定野战部队不搞大民主、军事院校可以搞，但不准串连。这样，军委搞了八条命令，送给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亲自找了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详细进行研究，认为八条命令很好，一月二十八日，批准照发，以稳定军队。

斗争更加尖锐化。就在传达经毛泽东同志审查批准的军委八条命令的会议上，关锋仍在诬蔑解放军不能搞社会主义革命，当即遭到叶剑英等同志的痛斥。他们指出，由党领导和培养的解放军，战胜了民主革命的敌人，也一定能战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敌人。谁要想搞垮解放军，必定粉身碎骨！

但是在林彪一伙煽动下，八条命令以后，冲击军队的事，仍然连续发生。听到一些军队高级干部被抄家，机密文件被盗劫时，叶剑英同志在京西宾馆激怒地用拳头敲着桌子，警告想要搞乱军队的野心家说，谁想要搞乱军队，决不会有好结果！

徐向前同志也愤然站起。他说，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人民的军队，难道就叫他们几个毁掉吗？他气怒之下，一把抓倒跟前的桌子，真是义愤冲天。

就这样，叶剑英、徐向前等同志怀着无产阶级的怒火，来到碰头会上，点燃了怀仁堂的斗争。

斗争在继续着。三天之后……

二月十六日下午三时，前来参加碰头会的谭震林同志，在门口碰到操纵上海"一月夺权"黑风的张春桥。谭震林同志问他：

"陈丕显同志来了吗？"

谭震林同志所以提出陈丕显同志来京的问题，是因为一些省、市委书记被游斗之后，毛泽东同志连续在三个不同场合，一再指示，要把各省、市委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周恩来同志排除多方阻拦，把一部分省委书记接到北京，可是仍有一部分在当地被无理扣押着。陈丕显同志就是一个。张春桥听了，狡猾地说：

"群众不答应呵！"

"群众？"谭震林同志说："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

"党？党不管用了。"张春桥说："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说的多轻巧！千万干部的命运就这样被他们决定了？一股怒火在谭震林同志胸中燃烧着，他激愤地指着张春桥：

"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呵！"

谭震林同志一进屋，就再次提出陈丕显同志来京的问题。

"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林彪、"四人帮"惯于打着"群众"的招牌，把群众运动变成"运动"群众，假借"群众"之手，实行他们的罪恶阴谋。谭震林同志见张春桥故意刁难推脱，马上打断他的话：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什么？这是形而上学！"接着又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蒯大富，是个什么东西？是个反革

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谭震林同志说着，愤怒地站起来，穿衣服，拿皮包，边走边说："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干不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同志要他回来，不要走！

陈毅同志也说："不要走，要在里边斗争！"

陈毅同志接着发言。他针对林彪一伙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进行反革命两面派活动，斥责说：

"这些家伙上台，他们就要搞修正主义。在延安，过去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延安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到现在还有意见。这个历史教训，不能忘记。那次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人。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指林彪）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叶剑英同志讲到党的传统："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那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看到许多单位发生残酷虐待老干部的事，余秋里同志拍案大声疾呼："许多干部被揪来斗去，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照那样干法，我就不去！"

一个事后证明早已倒向林彪、"四人帮"的公检法负责人插话辩解。

"你不要和稀泥！"

李先念同志也愤怒地谴责林彪一伙破坏党的传统，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法西斯罪行：

"我们党一贯强调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能是反革命吗？"

想到许多老干部被残酷斗争和凌辱，谭震林同志说：

"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跟前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只能背地流眼泪！"

当那个公检法负责人插话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时，谭震林同志驳斥他：

"我哭不是为自己，是为全体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我也哭过三次。"李先念同志说："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社论号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在全国范围内就开始了大规模的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倒了！"

周恩来同志当即质问中央文革的那个顾问："理论权威"：

"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那个顾问回答："我没有看！"

周恩来同志气愤地说：

"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看！"

聂荣臻同志对林彪一伙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诬蔑成是什么"联动"，是保守反动分子，进行打击迫害，不让他们上学，有的还关押起来的情况，十分气愤。他说：

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毛主席在军委八条命令中特别加了一条，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教子女。如果父母不教育，责任就在父母。不能为了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就是不安好心！

在中央碰头会上，我们尊敬的共产主义老战士就这样同一伙叛徒、特务、阴谋家、野心家进行英勇战斗。老将们铿锵、锋利的语言，剔肤见骨地揭露了林彪、“四人帮”一伙的罪恶，伸张了革命的正义，是代表全国人民对他们进行的审判和控诉！

顶着惊涛骇浪

在怀仁堂的会议室里，林彪、陈伯达一伙一连对李富春、陈毅等同志围攻批斗了半个多月。其中数那个“理论权威”和那个公检法负责人叫嚣得最凶。他们恶毒诬蔑老帅们在碰头会上的发言，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延安整风运动”，叫嚷什么“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走资派，保护叛徒、内奸、特务。”

各种帽子、棍子一齐飞来。什么“俱乐部”呀，什么“黑干将”呀，什么“联络员”呀。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同志协助周总理处理日常工作，是主管国务院工作的业务组长，几个副总理常到他那里讨论问题。那位中央文革顾问，因此就诬蔑他是“俱乐部主任”。李富春同志回答这位“帽子工厂”的老板：

“好呀，那你就组织专案审查吧！人有嘴，话总是要讲嘛。”

三月十八日，陈毅同志回到家里，无限感慨地对身边的同志说，“真是巧合！四十一年前，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这天，在党和李大钊同志领导下，我们组织四千多市民、工人、学生，冲击北洋军阀段祺瑞的反动政府，革命群众遭到屠杀。鲁迅痛斥‘三一八事件’这天，是‘最黑暗的一天’。想不到四十一年后的今天，我因反对这一类反动家伙，受到批判！”

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受到了践踏。一场危机真正到来了。从此，党、政、军、文碰头会中断了。合法的政治局委员们的发言权被剥夺了，而且被批斗了。在组织上，林彪公然宣布：中央文革小组代替政治局；用军委办事组取代军委常委会，逐步实现了他们的夺权阴谋。

他们并不满足。在社会上大规模掀起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谭震林同志曾写信给中央揭发江青，称她是“今日中国的武则天！”希望对她提高警惕。江青听了暴跳如雷，对谭震林同志等恨不得一口吞之而后快。她立即叫戚本禹和谭厚兰密谋商量，决定“反击‘二月逆流’先从谭震林开刀”，“反谭震林可以从大寨展览开刀”。三月八日前后，相继制造了冲击农业展览馆和冲击工业学大庆展览的事件。

三月十四日，在林彪、陈伯达一伙操纵下，首都街头出现了示威游行，他们高喊打倒“二月逆流”，打倒国务院五个副总理和军委四个副主席，“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等口号，掀起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个高潮。

在极其复杂的局面中，王震同志等坚决保护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全国广大群众同林彪、“四人帮”一伙掀起的黑风恶浪展开斗争。

一九六七年五一节、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亲自批准叶剑英、李富春、谭震林、陈毅、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等同志登上天安门，检阅游行。五月四日，陈伯达、戚本禹亲自窜到北师大，向谭厚兰等煽动说：“他们上天安门，你们反他们嘛！”“如果真理在你们手里，……按照你们的意见去办嘛！”果然，他们就把毛泽东同志亲自批准的决定，当作所谓“五月妖风”来反，使已经混乱的形势，变得更加混乱！

七、八月，在江青、陈伯达策划下，王力、戚本禹直接指挥国务院各口“造反派”，建立“摧资联委”和“揪刘火线指挥部”，动员二十万人，对党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展开围困战。他

们妄图下毒手、劫持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夺“旧国务院的大权”。街头上公开出现了反对周恩来同志的大字报和标语、传单。直到毛泽东同志察觉了这一罪恶阴谋，他们的企图才未能实现。

七月十五日，“批陈联络站”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周恩来同志多次指示要他们撤出。那个公检法负责人却几次窜到那儿煽动：“小将们、你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支持你们！”陈毅同志到飞机场接待外宾，痛斥那些阴谋篡夺外交大权的野心分子：“你们是两面派，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我不能把权交给你们！”他们更加猖狂揪斗陈毅同志。

陈毅同志在大小会议上被批斗六次。周恩来同志旗帜鲜明地保护陈毅同志。八月初，一次会上，有人公然对抗周总理指示，在会场挂出“打倒陈毅”的大标语。周总理站在灼人的阳光下，坚持不进会场，直到他们灰溜溜地把标语摘下，才同意开会。八月十一日大会上，他们搞突然袭击，甚至窜上主席台揪斗陈毅同志。周总理指示警卫人员保护陈毅同志，并愤然退场。八月十五日，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批斗大会。那个公检法负责人操纵大会，一心要搞臭陈毅同志。周恩来同志批评他：“搞臭了陈毅同志谁来当外交部长？你来当外交部长？”八月二十七日凌晨，连续工作了十八个小时的周恩来同志，又遭到一伙人的长时间围攻，以致心脏病复发。可是，他们却不听劝阻，扬言要拦截汽车，坚持要冲击陈毅同志。周恩来同志万分气愤地警告他们：

“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今天要冲，我一定出席，并站在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

八月十九日，人民大会堂进行批斗谭震林同志的大会。会上周恩来同志再三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保护谭震林同志。会中，周恩来同志临时离开会场，“四人帮”在卫生部的女黑干将，乘机扑上台，劈面打了谭震林同志两个耳光。接着，就有三个大汉，一跃上台，将谭震林同志架起喷气式，一阵拳打脚踢，把谭震林同志打倒在地，然后在他腰背上踏上两只脚！

对这种错误作法，李先念同志当场抗议：“周总理事先跟你们是有协议的，可以批判，但不能武斗。你们这样搞，我就退出会场！”

一九六八年三、四月，是陈伯达所说的反击“二月逆流”的“决战的第五回合”。江青在三月二十七日十万人大会上，妄加罪名，宣布谭震林同志是“大叛徒”。同时还宣布杨成武、傅崇碧等为“二月逆流”翻案，撤销他们的职务，逮捕了余立金同志，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进一步巩固了他们夺取的权力。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唐太宗诗）在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中，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大批老干部经历了严峻的考验。

林彪、“四人帮”杀人之心不死。一九六八年十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搞突然袭击，把除谭震林同志外的六个老同志，分割开来，每人专门成立一个小组，不断地围攻、批斗，大搞逼供信。聂荣臻同志曾到一些政治局委员那里交换工作意见，林彪、“四人帮”一伙就诬陷他们是“反党集团”，监视行动。有人甚至拿出聂荣臻同志的活动登记，逼他承认。聂荣臻同志当场痛斥这种法西斯罪行：

“我们政治局委员之间就不能交往吗？就不能相互商量问题吗？党内还有什么民主？你

搞这是什么？是特务！"

叶剑英、聂荣臻、陈毅、徐向前、李先念、李富春同志，每日带着病弱的身体，出席会议，有时连请假写"检讨"也不准许。被折磨得精疲力竭的副总理和老帅们，只能在会议间隙时间稍事休息。会上，他们抓不住老帅们什么问题，就凭空诬陷叶剑英、聂荣臻同志是什么所谓"杨余傅事件"的黑后台。

聂荣臻同志去问林彪：是怎么回事？林彪狡辩说：没有点名嘛。

聂荣臻同志很气愤地说：

"你没有点名比点名还坏。我宁可受明枪，不愿遭暗箭！"

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后，林彪、"四人帮"为继续迫害老帅，又编造谎言，埋下伏笔，突然把闭幕了几天的一期"会议简报"发了下来。"简报"不仅莫须有地诬陷徐向前同志的爱人、聂荣臻同志的爱人是"叛徒、特务"，而且故意披露，一九四八年毛泽东同志由延安来到华北，暂住阜平县陈南庄军区司令部时，驻地遭到国民党飞机的扫射轰炸。这件事，后来在解放大同、保定时，从敌伪档案里查清，是司令部的一个内奸作案引起的。在罪证确凿，罪犯供认不讳的情况下，经过正式审判，把这个内奸枪毙了。这期由江青发言的"简报"，竟血口喷人，说聂荣臻同志是杀人灭口，意思是说，聂荣臻同志当时要蓄意谋害毛泽东同志，真是恶毒至极！

他们把两件事连在一起，故意制造借口，诬陷当时在山西、河北前线指挥作战的徐向前、聂荣臻同志，妄图给他们戴上勾结敌人的帽子，置之于死地。

徐向前同志先后被抄家三次。家中的文件、书信，甚至连作战日记也都抢劫一空。可是他们一根稻草也没有捞到。他们看到了什么呢？看到的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活中的忘我战斗。徐向前同志和战友们同无数先烈一起，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鲜红的战旗。他说："我们跟毛主席革命几十年，错误也犯了不少，但是我们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问心无愧！"

林彪一伙通过所谓疏散，对老帅们进行精神折磨，"围而待歼"。被批斗的几位老帅，一家老少全都分散各地，不能互通音信。聂荣臻同志的爱人，被别有用心地安排到靠近边境的吉林草原上的一个五七学校里去劳动。

战争年代，曾长期在大别山区和中原地区坚持武装斗争的李先念同志，一九四六年奉中央命令，率部向北突围。林彪、"四人帮"竟制造谣言说他是"大叛徒头子"。当即遭到参加领导突围的王震、王树声等同志的有力反驳。他们用大量确凿的证据，驳斥了诬陷，保护了李先念同志。王震同志等拿出当时突围作战的会议记录说，这些都是我们亲身经历的历史，怎么能允许颠倒呵！

林彪一伙把献身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叶剑英同志视作他们篡党夺权不可逾越的障碍，千方百计要打倒。一次中央会议上，叛徒江青突然发难，诬陷叶剑英同志"要搞政变"！

那个"理论权威"马上接着说："我对徐向前、陈毅也有意见！"诬陷老帅们要"搞政变"。

叶剑英同志当场反击他们：

"我跟毛主席革命几十年，无论在长征中，在延安，无论筹划指挥全军作战，或是在解放以后的历次路线斗争，我都忠实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坚持站在毛主席一边，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毛主席的安全！"

会后不久，他们公然违抗党规国法，派人抄了叶剑英同志的家，还挖开了地板，检查有无武器、电台。一九六七年四月二日，戚本禹讲话当天下午，北京街头贴出"打倒叶剑英"，

"打倒带枪的反动路线","斩断叶剑英伸向文艺界的黑手"等大标语。中央戏剧学院成立"揪叶联络站",先后将叶剑英同志的五个子女及其亲戚、保姆拘捕,分别关押一年到四五年。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在七位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先后被冲击、批斗和疏散的日子里,他们尽管身陷囹圄,但始终对党对人民怀着无限希望和信心,充满高昂的斗争精神。

那时,国内外大事,几乎全靠敬爱的周总理操劳处理。从夜晚到黎明,从日出到黄昏,他关心着祖国各条战线的问题。从生活必需的油米柴盐,到遨游宇宙的人造卫星;从少数民族的山寨,到深更半夜接见外宾,日理万机!他的身体一天天瘦弱了。有一天,一个烈士子弟前来探望总理,他恳求总理为全国人民保重身体。总理听了,在黄昏的庭院里,停下脚步,两道浓眉下,闪着炯炯目光,深情地望着这个同志,激动地说: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同林彪、"四人帮"搏斗的暴风雨里所表现的崇高品质。他们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

沉痛的教训

林彪、"四人帮"一伙制造的我党历史上罕见的"二月逆流"大冤案,给我们党的创伤十分深重,教训极其惨痛。

谈到这个问题时,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等同志指出,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学了许多东西,要认真吸取教训。

他们说,建立好的领导班子,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文化大革命给我们最重要的教训就是,这场运动的领导班子——中央文革,被一批叛徒、特务、阴谋家、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和篡党夺权分子掌握了领导权。他们通过种种阴谋,居于一人之下,全党之上,爬上了权力的高峰。他们利用篡夺来的权力,从中央到地方,实行法西斯专政;上整干部,下整群众,制造大量冤案、错案、假案。他们把许多老同志打倒,把大批干部和群众打成"走资派"、"反革命",破坏工农业生产,使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它从反面教育我们,必须十分重视领导班子的配备和建设。选拔到领导班子的干部,应具有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富于斗争精神、作风正派,光明正大,实事求是,敢讲真话,善于团结同志,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品德。我们决不能再让坏人来篡夺领导权!

他们说,要把领导班子建设好,关键在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林彪、"四人帮"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破坏社会主义法制,使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民主权利受到摧残。我们一定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在全党、全国造成浓厚的民主空气,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作到使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使党和国家的命运,能真正掌握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手里。如果有人敢于践踏民主,破坏法制,就坚决和他斗争。千万不要忘记林彪、"四人帮"给我们党的沉痛的教训!

是的,同志,这些沉痛的教训,我们这一代永远不能忘记,也要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不能忘记,并逐步加深对这场斗争的认识。正如恩格斯说的:"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第3卷第562页）总结教训也是如此。

我们要发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生动活泼的民主精神，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为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

（原载1979年2月26日《人民日报》）

〔附〕 所谓“二月逆流”的历史真相

宋 琼 孙浩刚 邵一海

党中央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极大地鼓舞和振奋起全国人民的革命精神。在我们欢庆胜利，向“四五”运动的英雄们学习的时候，不能不想到林彪、“四人帮”制造的许许多多假案、冤案。其中震撼全国的一个，就是所谓“二月逆流”事件。

天安门事件和所谓“二月逆流”事件是有内在联系的。如果说，天安门事件是全国人民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终于看清了“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真面目，公开显示党心、军心、民心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那么，所谓的“二月逆流”事件，就是我们党内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以他们高度锐敏的阶级警觉性，及时识破了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挺身而出，对林彪、陈伯达、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所进行的一场英勇斗争。这场斗争是围绕着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保护老干部，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这样一些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展开的。林彪、“四人帮”搞的所谓反击“二月逆流”，完全是颠倒是非，蓄意诬陷，是为了打倒当时站在第一线反对他们的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李先念、李富春这七位同志，进而打倒周总理和朱委员长，架空毛主席，以达到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恶目的。

林彪反党集团自我爆炸之后不久，毛主席就为“二月逆流”翻了案，多次指出：“这件事搞清楚了，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毛主席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周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参加了这次接见。当叶副主席走进会场时，毛主席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毛主席的这段话，说清了所谓“二月逆流”的真相，点明了这场斗争的实质。

最近，华国锋同志代表党中央再次郑重宣布为“二月逆流”平反：由于这个案件受到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到牵连和处理的所有同志，一律平反。过去各种文件、材料中关于所谓“二月逆流”的不实之词，都应该作废。党中央的这个英明决定，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意愿，得到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

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还事物的本来面目，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现在是把所谓“二月逆流”的真相公布于众的时候了。

一

林彪一伙炮制的所谓“二月逆流”事件，主要是指一九六七年二月中旬，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同林彪、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关戚”一伙，所进行的几次面对面的激烈斗争。这场重大的原则斗争发生在一九六七年的早春，决不是偶然的。

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展开后，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一小撮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纷纷趁机跳了出来。经过一番谋划、勾结、招降纳叛之后，很快形成了以林彪为头子和以江青为头面人物的篡党窃国的反党集团，他们用革命油彩在自己脸上涂抹打扮以后，互相提携着登上了政治舞台。于是，在我国阳光普照的晴朗天空，出现了乌云，刮起阵阵反革命政治台风。

林彪、"四人帮"这两个阴谋集团，一开始就是以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为目的的。他们悉心研究古今中外一切反动阶级的政治经验，特别是巧妙地袭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新老修正主义分子的反党手段，打着文化大革命的旗号，卑鄙地炫耀、渲染并利用某种特殊地位，自封为"高举更高举"的"革命家"，"最忠最忠"的"左派"，各树山头，互相吹捧，紧密勾结，互为利用，进行篡党窃国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打着"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之类蛊惑人心的口号，公然叫嚣要"革过去革过命的人的命"。他们网罗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新老反革命分子、流氓分子、打砸抢者，作他们的基本力量，拼命煽动一些人的极"左"狂热，鼓吹"打倒一切"，挑起"全面内战"，向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进行全面冲击。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在清华大学西操场，江青、姚文元气势汹汹地狂叫："在一九六七年我们将在各个战线发动全面的总进攻！"果然，随着一九六七年的到来，林彪、陈伯达、江青一伙煽起并操纵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反动逆流，更加猖獗。在这股逆流冲击下，党中央、国务院许多部门以及全国各地省市委许多党政机关瘫痪了，许多工厂企业停工停产了，广大农村地区也一片片动乱起来，并且开始冲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人民解放军，严重地威胁着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党中央政治局。

让我们举几个例子，来回顾一下一九六七年初那些惊天动地的日子，看看当时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出现了一幅多么触目惊心的情景：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林彪死党邱会作操纵一些军事院校群众组织的头头，向叶剑英和陈毅同志发起进攻，策划要在一月五日召开十万人大会，"批判"这两位老帅。与此同时，出现了攻击聂荣臻和徐向前同志的标语、传单。

一月四日下午，陈伯达、江青等人背着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对陶铸同志搞突然袭击，诬陷陶铸同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新的代表人物"。刹时间，"打倒陶铸"、"揪出陶铸"的大标语，贴满了北京的大街小巷。

同一天，江青又大闹政治局，恶毒攻击贺龙同志是"坏人"，"要把贺龙端出来"。

一月七日至九日，林彪、"四人帮"操纵几个坏人煽动受蒙蔽的群众，多次包围中南海，要揪李先念、李富春、陈毅和谭震林同志。在北京的大街上，连续出现要打倒周恩来同志的大标语，还有包含林彪辱骂朱德同志等内容的传单。

在这同时，林彪、陈伯达、江青一伙又在上海刮起了反革命的一月黑风。一九六六年底，他们就煽动群众"集中目标攻上海市委"，"造上海市委的反"，并通过处理"安亭事件"，制造"康平路事件"，使上海市委和各级党组织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这时，张春桥认为"上海的桃子熟了"。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张春桥、姚文元窜回上海，在他们的策划和操纵下，党在《文汇报》;《解放日报》的领导权相继被篡夺。一月六日，他们假借全市各造反组织的名义，召开打倒上海市委的大会，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等同志，并把全市几百名局以上干部，揪到会场陪斗，使市委、市人委的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同时，他们在背地里策划建立全市性的政权组织，张春桥还授意他们的御用组织贴出"拥护张春桥当市委第一书记"的大标语，不久便篡夺了上海市委的领导权。张春桥得意忘形地嚎叫："我们上海革命造反

派，我们上海革命任务的首要任务，就是……开展全面的夺权斗争。”

从上海刮起的夺权黑风，是一股真正的“一月逆流”。这股逆流很快冲到山西，冲到青岛，冲到贵州，冲到黑龙江，冲到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祖国的天空，乌云滚滚；祖国的大地，浊浪滔滔。那些被林彪、“四人帮”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和单位，无产阶级专政正在逐渐演变为封建法西斯专政。我们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真正面临着被一小撮阴谋家颠覆的严重危险。

二

林彪一伙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不可避免地引起全国人民的极大不满和各种方式的抵制、斗争。“愿与人民同患难，誓拼热血固神州。”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战斗了几十年，曾为砸烂旧世界、创建新中国立下了丰功伟绩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站在斗争的最前列。

一九六七年早春，表现在怀仁堂碰头会上和军委常委会上的斗争，决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以坚持马列主义的老一辈革命家为一方，以林彪、陈伯达、江青一伙为另一方，所进行的一系列斗争的继续和发展。这场斗争首先是从军队的问题展开的。

搞乱军队，还是稳定军队，在这个问题上，几位老帅同林彪一伙存在着根本分歧。林彪、陈伯达、江青一伙为了达到乱中篡权的目的，千方百计要把军队搞乱。几位老帅认为，军队担负着保卫祖国、保卫文化大革命的神圣使命，一定要保持稳定。针对林彪一伙煽动群众搞乱军队的阴谋，一九六七年一月初中央发了文件，规定不准冲击军事机关。

林彪一伙并不死心。一月十日，江青、王力、关锋伙同林彪，抛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林彪还提出了所谓“带枪的刘邓路线”。在他们的策划、操纵和煽动下，我军威震中外的总司令朱德同志受到了恶毒攻击。当时负责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同志受到卑鄙的诬陷，许多同贺龙同志一道工作过的军队负责人被揪斗。从总部到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不断发生。

为了顶住林彪、“四人帮”搞乱军队的阴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副主席主持召开了军委常委会议，讨论稳定军队的问题。向部队发出了搞正面教育、不搞“四大”的通知。不久，林彪利用自己窃踞的地位，再次召开军委常委会议，蛮横地提出要部队全面搞“四大”。会上，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四位老帅坚决反对，严词责问林彪：“军队搞乱了、天下大乱了，你国防部长靠什么！”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最后决定野战部队不搞“四大”，军事院校可以搞“四大”，但不得串连。根据这个精神，拟出中央军委八条命令，送请毛主席审定。毛主席亲自把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请去，详细进行了研究，认为很好，同意照发，并强调了不要搞喷气式，不戴高帽子。这对林彪、“四人帮”要搞乱军队的反革命阴谋是个很大的打击。但是，他们反党乱军的反革命活动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收敛。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下午的碰头会上，老帅们再次同林彪一伙进行了斗争。叶剑英同志指着陈伯达，毫不留情地质问道：“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问得陈伯达瞠目结舌，支吾半天，说不出名堂。这时，徐向前同志也拍着桌子，责问陈伯达：“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这时，坐在陈伯达旁边的那个同林彪、“四人

帮"关系密切的"理论家"，竟气急败坏地对老帅进行人身攻击，叫嚷道："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你有什么了不起。"接着，叶剑英同志责问他们："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叶剑英同志并且辛辣地讽刺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过了三天，二月十六日下午三时，在怀仁堂举行的当时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同志和中央文革成员的碰头会上，又进行了一次更加尖锐激烈的斗争。这就是后来被林彪、"四人帮"诬指为"二月逆流"的主要事件——所谓大闹怀仁堂事件。当天晚上，惯于"恶人先告状"的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为了诬告几位老帅和副总理，"集体整理和核对"了一个关于这次会议的纪录（以下简称《纪录》）。出于显而易见的目的，这份《纪录》有许多歪曲篡改、断章取义的地方。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从中看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在斗争中光明磊落、威武不屈的高尚品德。为了使大家了解这一事件的历史真相，不妨把这份《纪录》的内容详细摘引如下，并作一些必要的说明。

《纪录》说：

二月十六日下午，周恩来同志主持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原订日程"抓革命，促生产"。

开会前，谭震林提出要张春桥保陈丕显，张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同志打断了话，大发雷霆说：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

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

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二月十六日的斗争，确实是从谭震林同志提出陈丕显同志的问题开始的。但是，《纪录》笼统地说了一句"谭震林提出要张春桥保陈丕显"，不仅把这一事件的真实背景和双方辩论的过程掩盖了，而且歪曲了谭震林同志提出问题的实质。当时，由于不少省市委书记被游街、批斗，毛主席连续三次在三个不同的场合，一再提出要把一些省市委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意见，排除林彪一伙设置的种种阻挠，把一部分省委书记接到了北京。但是，仍有一部分被当地的一些人无理扣押着。陈丕显同志就是毛主席指名要接到北京而仍未到京的一个。因此，那天谭震林同志前来参加碰头会，在门口遇到刚从上海搞了反革命夺权回来的张春桥，便将了他一军，问道："陈丕显回来了吗？"张春桥推托说："群众不答应啊！"谭震林同志紧追不放，又将一军："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张春桥老羞成怒，露出了凶相："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谭震林同志听到这话，一股怒火不由从胸中升起，指着张春桥说："原来打击一大片就是你领导的啊！"进了会议室，谭震林同志再次提出陈丕显同志以及一些大区书记、省委书记回京的问题。狡猾的张春桥又故意推托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这时，谭震林同志打断张春桥的话，说出了大意如《纪录》的那些话。

《纪录》继续引述谭震林同志的发言说：

捕鱼问题，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指当时紧跟林彪、“四人帮”的那个政法部门的负责人〕插话：江青和小组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这里说的捕鱼问题，是指渔船出海时搞不搞“四大”的问题。谭震林同志考虑到：一、一条渔船只有十多个人；二、船上有电台，民兵有武器；三、渔船经常同日本、南朝鲜、台湾的渔民打交道。因此确定出海捕鱼时不搞“四大”。陈伯达蛮横地起来反对，几次在电话上同谭震林同志吵架。

《纪录》接着说：

（谭起来，拿文件，穿衣服便走。要退出会场，说，）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陈毅同志说，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陈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

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的吗？历史不是证明了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余秋里同志拍桌子发言：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

（×××不断插话，文革小组经常讲谭震林同志的好话，劝他不要这样讲法）先念同志说：不要和稀泥。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谭震林同志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先念同志说，我也哭过几次。

谭震林同志说，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我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整个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谈到“哭”的事，不妨在这里介绍一点背景。由于林彪一伙的干扰破坏，许多工厂停工停产，国家经济生活引起严重混乱。有一次，敬爱的周总理召开会议研究生产问题，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三位副总理到了，可是，主管工业生产的国家计委副主任余秋里同志却被揪走了，大家焦急地等待着。周总理和三位副总理看到国家的经济命脉破坏到如此程度，看到在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中作出了重大贡献的老干部被整得这种样子，怎能不担忧，怎能不痛心！周总理流泪了，三位副总理也流泪了。

《纪录》最后引述李先念同志的话说：

先念说，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事连，老干部统统打倒了。

这里，《纪录》却没有引用周恩来同志接着讲的话。周恩来同志当时质问那个和林彪、“四人帮”关系密切的“理论家”：“这篇社论，你看了吗？”那个“理论家”回答说：“我没有看！”周恩来同志气愤地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看！”

在怀仁堂碰头会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同志也慷慨陈词，愤怒斥责了林彪一伙的罪恶行径。叶剑英同志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聂荣臻同志严正指出陈伯达一伙对老干部“落井下石”，不怀好心，把干部子女都说成所谓“联动”，进行打击迫害，是“不教而诛”，用心险恶。

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整理和核对”的这份《纪录》，他们是用来作为陷害几位老帅和副总理的“罪状”的。可是，在我们看来，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看来，这不是什么“罪状”，而是一篇对林彪、陈伯达、江青一伙义正辞严的控诉书，是一篇正气浩然的战斗檄文。字里行间，迸发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林彪、“四人帮”的切齿痛恨，洋溢着对党和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

所谓“二月逆流”，就是在党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关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持正义，为国为民，同林彪、“四人帮”进行的这样一场短兵相接的英勇搏斗。这是一场捍卫马列主义、捍卫党的原则的伟大斗争，这是一股奔腾澎湃的革命激流。

三

林彪、“四人帮”施展颠倒黑白、制造事端的反革命惯技，采取极其卑鄙的反革命阴谋手法，炮制出大冤案“二月逆流”事件，并且抓住这个问题大做文章。在他们策划和指使下，三月八日，北京全城到处贴出“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谭震林”的标语。过了几天，攻击的矛头又指向叶剑英、陈毅、李先念、聂荣臻、徐向前、李富春诸同志，或“打倒”，或“炮轰”，反动气焰甚嚣尘上。他们倾巢出动，大打出手，给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加上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什么“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呀，什么“一种政变的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呀。可是，他们拿得出来的，除了帽子，就是棍子，实在没有什么象样的货色。他们根本不敢把事实的真相公之于众。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陈伯达和另一个同林彪、“四人帮”关系密切、当时窃踞高位的所谓“理论家”，在同一位外宾会谈时，介绍了所谓“二月逆流”问题。这是到目前为止可以看到的林彪、“四人帮”对这场斗争的实质说得最明白的一次谈话（以下简称《谈话》）。虽然其中大多是诬蔑攻击之词，但却从反面透露出了当时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同林彪、“四人帮”之间的重大原则分歧。

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这是分歧之一。《谈话》诬蔑几位老帅和副总理，胡说什么：“他们惧怕革命群众，惧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认为，群众路线就是否定党的领导。……他们叫嚣说：你们天天喊群众、群众，那还有什么党的领导?”这段奇妙的谬论，一方面血口喷人地对几位老同志进行诬陷，一方面也对他们借口群众路线而否定党的领导作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供认。那个林彪、“四人帮”的所谓“理论家”，居然振振有词地把党的领导和群众运动、群众路线对立起来，这实在是一个荒谬绝伦的大笑话。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无论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任何群众运动都不能离开党的领导。那种排斥党的领导的群众运动，不可能是革命的，很有可能是反革命的。事实正是这样。当时，林彪、“四人帮”把听命于他们的一小撮坏蛋封为“革命群众”，把他们煽动和操纵这批坏蛋刮起的反革命复辟逆流称之谓“革命群众运动”，到处煽动“踢开党委闹革命”。正是在这种所谓“革命群众运动”的冲击下，各级党的组织纷纷被“夺权”、被“踢开”，被冲垮。林彪、“四人帮”公开提出用造反派“代替”党、“改造”党的反动口号。他们耀武扬威地凌驾于党组织之上，不顾国法，践踏党纪，大搞法西斯专制主义。他们把党内的一切原则和制度，连最起码的民主生活都破坏殆尽。广大革命群众被当作“保守派”，政治上受到歧视打击，被施以钳口术，还有什么群众路线可言!

要不要保护干部的大多数，这是分歧之二。《谈话》说：“他们借口保护老干部，说文化大革命把老干部整得很苦，所以他们要起来保护老干部。”“他们反对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进而否定二十五年前的延安整风运动。"这是强词夺理的歪曲和捏造。其实，当时争论的实质是很清楚的，这就是：承认不承认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不要保护干部的大多数。在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淫威下，大批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好干部，被他们无辜打倒，受到了无情打击，遭到了残酷折磨，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对于这种状况，几位老帅和副总理表示了极大的义愤。在二月十六日的怀仁堂碰头会上，陈毅同志谈到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时，由于那个同林彪、"四人帮"关系密切的"理论家"提出搞什么"抢救失足者"运动而造成的肃反扩大化，提出要接受历史的教训，这难道不是完全正确的吗！这怎么能说是否定延安整风运动呢！

几位老帅和副总理的正确主张，击中了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又一个要害。他们老羞成怒，暴跳如雷。这个"理论家"在《谈话》中叫嚣道："否定延安整风运动，就是否定二十五年来毛主席的马列主义领导，就是否定人民解放军在革命战争中取得的全国性胜利。""他们借口保护老干部，企图招降纳叛，组织队伍，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中央文革，……就是保护一小撮反马列主义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他们的目的就是这个。"帽子实在不少，罪名也大得怕人。但这个"理论家"的高超理论，实在不值得一驳。我们把这些蛮不讲理的胡言乱语引在这里，好让同志们欣赏一下他们陷害忠良的反革命伎俩。他们就是这样，可以不要任何事实，随心所欲地给我们的同志（而且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加上一顶顶置人于死地的政治帽子。

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这是分歧之三。《谈话》说："他们还有一个口号，叫做文化大革命把军队搞乱了。他们把保护军队同文化大革命对立起来。"其实，把军队的稳定同文化大革命对立起来的，正是林彪和"四人帮"。他们炮制"二月逆流"冤案，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整倒我军的一批负责同志，进一步把军队搞乱。他们借口反击"二月逆流"，把一些军队的负责同志诬指为"某老谭"，从而为冲击军事机关，搞乱军队，在军队内部打击一大片开了绿灯。

四

林彪、"四人帮"炮制所谓"二月逆流"这个震动全国的大冤案，使党和国家遭受了重大损失，并且在很大程度上篡夺了党中央的实际领导权。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当时中央政治局的实际状况。一九六六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到一九六七年初春，尽管"刘、邓、陶"被打倒，贺龙同志被诬陷，坚持马列主义、坚持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仍占大多数。除了林彪、陈伯达外，紧跟他们的就那么两个人，一个是所谓的"理论家"，一个是当时掌握政法大权的那个人。这就使他们的反党活动经常受到限制和抵制。他们看到这些老一辈革命家不可轻侮，便处心积虑地要进行迫害。

所谓"二月逆流"这个大冤案，就是林彪、陈伯达、江青一伙为此目的而炮制的。他们把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李先念、李富春这样一些肩负着党和国家命运的老同志整垮、整倒、整臭，不让他们正常工作，剩下的政治局成员，有的早已受到他们排挤，有的年老体弱，这样，毛主席被架空了，周总理孤掌难鸣了，这就迫使中央政治局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随后，卖国贼林彪就乘机非法宣布：中央文革代替政治局。这样，他们就在党中央这一层公然取消了党的集体领导，明目张胆地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开创了"踢开政治局闹革命"的最恶劣的先例，进一步为在全国范围的

"踢开党委闹革命"开了绿灯。这是他们篡党窃国的一个重要步骤，又为他们阴谋全面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扫清了道路。

一九六七年秋季，毛主席视察南方以后，采取了一些重大措施，周恩来等同志做了大量工作，努力排除种种干扰，在全国范围内，曾有一度开始出现归口大联合、停止大串联、复课闹革命、业余闹革命、就地闹革命等使运动走向稳定的趋势。林彪、"四人帮"把这些积极的趋向统统诬之为"逆流"，是"反动路线新反扑"，更加猖狂地在全国范围内为他们在上海掀起的真正的"一月逆流"推波助澜。

列宁曾经指出："党如果不捍卫自己的生存，不坚决反对那些要取消它，消灭它，否认它，背弃它的人，那它就会不能生存。"（《几个争论问题》《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四五九页）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代表广大群众同林彪、"四人帮"之间的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林彪、"四人帮"反对党，要取消党的领导，摧垮党的各级组织，打倒党的各级干部，搞垮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直接威胁到党和国家的生存，一切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一切爱国家、爱人民的人们，怎能不起来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每一次重大的斗争总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而它的意义却往往是无法估计的。一九六七年初春这场尖锐的生死搏斗、尽管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干部、群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从这场斗争中，广大的党员，广大的人民却得到了启示，或者得出了结论。这一切，有如革命的火种，埋进人们的心里，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到一九七六年的清明节以后，终于燃烧成熊熊的烈焰，把"四人帮"及其封建法西斯统治，统统烧成灰烬。最后的胜利属于真理，属于人民！

尖锐激烈的斗争，不仅教育和锻炼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并且检验和造就着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人物。"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林彪、"四人帮"的复辟迷梦，已经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那些在斗争中真正坚持马列主义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却更加受到人民的爱戴、信任和尊敬。

历史的洪流不可阻挡。曾经被林彪、"四人帮"诬陷的所谓"二月逆流"，已被斗争证明实在是"二月正流"。一百多年来任人宰割欺凌的中华民族，今天要崛起，要尊严地和世界各民族并肩而立；贫穷落后的中国，应该转变为文明富强；中国人民要革命，要坚持社会主义，要过共同富裕的幸福生活。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二月正流"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革命潮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真正锐不可挡的。尽管当时碰到了重重暗礁，遇到了条条弯道，但它总归要冲刷掉一切障碍险阻，奔腾向前。一九六七年春天这一场斗争的历史经验，将成为我们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斗争中，继续教育着我们，鼓舞着我们，胜利地奔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海洋。

（原载 1979 年 2 月 26 日《解放军报》）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支援内地和边疆建设的职工应就地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紧急通告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

一、加强内地和边疆建设，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是实现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措施。支援内地和边疆建设的职工，担负着极其光荣而重大的任务，应当以模范的行动，以文化革命为动力，坚决实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

二、所有迁入内地的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调入或借调支援内地建设的职工，支援边疆建设的职工，都应当坚决地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坚守岗位，积极工作，就地抓革命，促生产。

三、现在，有些地区和单位，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唆使和蒙蔽支援内地和边疆建设的一部分职工和家属成批地离开现有工作岗位，回到原调出地区，影响了内地和边疆建设。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又一种形式，革命职工和家属千万不要上当，必须擦亮眼睛，彻底揭露，坚决反对。

四、支援内地和边疆建设的职工，如果对原调出地区和单位的当权派有意见，可以写信或寄大字报进行揭发批判；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可以派少数几个代表回原单位参加运动，但不要成批离开工作岗位。

五、凡是目前已经回到原调出地区的职工，应该迅速返回内地和边疆。调出和调入地区的有关单位和革命群众组织，都应当积极动员和帮助他们回到工作岗位上去。当他们返回到原工作岗位之后，应当欢迎，不得歧视。

六、原调出地区和单位，对于从内地和边疆自动回来的职工，一律不得安排工作。如已经安排工作的，仍应积极动员和帮助他们返回内地和边疆。任何单位不许留用。

七、对于一小撮挑唆和煽动职工群众离开内地和边疆工作岗位的负责人和肇事者，应该交给群众批判斗争，情节恶劣的，应该依法惩处。

本通告应在各大中城市和各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宣读、张贴。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处理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的新阶段，广大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已积极返回本单位，参加夺权斗争和农业生产。但是目前还有一小部分人，以种种借口长期在城市逗留。为了妥善处理这一问题，特作如下规定：

一、凡尚在外地进行串连、请愿、上访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支边青年、农场职工，所有人员应立即返回本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并搞好生产。所设联络站，一律撤销。

二、有些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受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影响，做了一些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事，只要他们回到本单位认真检查，改正错误，可不再追究。

三、在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支边青年、农场职工中，有少数行踪诡秘，不报真实姓名和工作单位，到处招摇撞骗，扰乱社会治安，破坏国家财产的坏分子，要彻底查清，依法惩办。

四、对于安置工作中的问题，应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第三条：“前几年下放农村业已参加农业生产的群众，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应当安心参加农业生产，参加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安置工作中的问题，应由各级党委负责逐步加以解决”执行。

五、前几年精减下放、现居城镇的人员安置问题，也应按上述第四条的精神执行，不得回原工、交企业和事业单位强求复工。

此通知可在农村和城市张贴。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确保机要文件和档案材料安全的几项规定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单位因为抢占机要室，争夺机要文件和档案材料而造成严重失密。为了杜绝类似事件继续发生，防止坏人乘机破坏，现就确保机要文件和档案材料的安全问题，特作如下规定：

一、对机要文件和档桉材料一定要加强保护，一律不准冲击、占领机要室和档案库，不准抢占机要文件和档案材料。如果发现机要档案的安全受到威胁时，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应该挺身而出加以保护，如劝说无效，应立即报告当地军事机关或公安机关，请他们加以保护。已经抢走机要文件和档案材料，一律追回。

二、夺权部门所属的机要室、保密室、机密档案室，应由原有机要和保密人员中的革命同志接管，不准其他任何单位和人员干预。原有人员中个别不适宜继续做机要工作的，可按中央规定的机要人员条件选派，报上级审查批准后，进行调整。

三、有关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包括密码、密电、绝密文件和机要保密单位的一切图表、图纸等技术资料，都要严加保管，未经上级批准，任何单位和人员一律无权翻阅查看。

四、在文化大革命中、未经上级同意，擅自批准借出的机要文件和档案材料，要责成当事人火速追回，并限期交回原部门。

五、以上规定，革命群众要遵照执行。如发现有坏分子乘机破坏、盗窃、抢劫档案材料时、要依法惩办。

中共中央关于文艺团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

（供讨论和试行用）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

（一）文艺团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进行，必须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以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目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二）文艺界的斗争重点，是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必须彻底揭发和清算彭、陆、罗、杨反革命集团的罪恶，肃清以周扬、夏衍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毒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阀、反动“权威”。

在斗争中，要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毛主席、但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三）根据目前斗争的新形势，文艺团体工作人员，一律停止外出串连。到外地串连人员尽快回到本单位，集中力量彻底闹革命。一面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一面创作和排演现代的革命化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作品和戏曲等。

文艺工作人员应该有组织有计划地下乡、下厂，同工农相结合，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四）认真整顿和清理文艺工作队伍，把混入文艺团体中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不是指家庭出身）清除出去。假冒革命组织名义招摇撞骗者，必须坚决揭露。

(五) 要节约闹革命，爱护国家资财。破坏国家资财者，按照情节轻重，给以必要的处分。

(六) 自负盈亏的文艺团体，如果他们今后演出有困难，现在基本生活费又没有来源的，可以由当地政府另外安排生活出路，主要是到农村落户或者分配到工厂或新建的企业中去劳动。

以上规定的前五条，适用于部队的文艺团体。

中共中央关于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工作组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

关于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派出的工作队 (包括搞了一段文化革命的四清工作队) 问题，中央考虑到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主要锋芒应当针对着这条错误路线的提出者，而不应当长期揪住工作队不放。因此，中央决定：

(一)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有的工作团和工作组，包括团长、组长和组员，都回原机关参加革命和工作。

(二) 各学校、各工厂、各机关、各单位，今后不要再揪工作队去斗争。

(三) 工作队中的坏人和确实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也应把材料送原单位或上级领导机关，必要时，可以同原单位的革命造反派联合斗争。

中共中央、国务院
通告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

一、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联合通告，是非法的，应予取消。各省市劳动局根据“三团体”的联合通告所决定的一切文件，一律作废。

二、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等制度，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很不合理的，错误的。中央正在研究，准备分别情况予以改革。在中央未作出新决定以前，仍按原来办法进行。

三、各企业、各单位的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应和正式的职工、工作人员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有权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因为对领导上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应当平反，因此而被解雇的，应当回到原生产岗位，按原合同办事，克扣的工资应当补发。

五、要把混入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中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不是指家庭出身）清除出去。假冒革命组织名义招摇撞骗者，必须坚决揭露。

六、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没有必要成立单独的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以及各地的分团应当取消。参加这个组织的革命群众，可以参加本企业、本单位、本地方的革命群众组织。

特此通告全国，并可张贴。

中央军委重申切实执行军委二月八日通知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

军委二月八日关于外出串连人员限时返回本单位的通知下达后，外地来京人员已大部返回，但近日仍有一些人来京。为切实执行军委通知，特重申如下：

1.请各单位大力宣传军委通知精神，要求全体人员严格执行军委规定，不再外出，集中力量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有什么问题，应报请军区、军兵种领导机关解决，也可以写信向上级机关反映。

2.今后各单位来京和到外地去的人员，必须经军以上党委同意，报告军区、军、兵种领导机关批准。来京人员，要报经全军文革小组批准。未经批准外出的，各地接待站一律不予接待，各单位也不予报销旅差费。

中共中央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导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

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夺权斗争的宣传报导问题，中央作如下规定：

（一）各省、市、自治区领导夺权斗争的临时权力机构，叫什么名称？是不是真正做到三结合（即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党政机关真正有代表性的革命领导干部组成的）？今后要先报告中央，经中央批准后，再在当地报纸上发表。

(二) 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城市的政权组织形式，除对上海中央另有指示外，一般的不要采用人民公社的名称。

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

贫下中农是农村中抓革命、促生产的主力军。当这春耕开始的时候，毛主席号召你们，党中央号召你们，希望你们认真地抓革命，促生产，动员一切力量，立即为做好春耕生产而积极工作。

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要善于同贫下中农一起商量，同一切劳动群众一起商量，掀起一个春耕生产的高潮。

党中央相信，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过错误的同志，也应该努力在春耕生产中将功补过。犯过错误的干部只要这样做，贫下中农就应该谅解他们，支持他们工作。对他们的批评，要采取毛主席历来指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

绝对不许地、富、反、坏、右分子乱说乱动，破坏生产，破坏劳动人民之间的团结，挑动宗派纠纷。他们必须在贫下中农监督下，认真地继续进行劳动改造。

在四清运动中下台的干部，必须积极参加劳动，改造自己，不许反攻倒算。

建议你们考虑立即开一次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三级干部会议，布置春耕生产工作。会议要有准备。会议时间要短，以一天到两天为好。

还建议，召开好生产队全体社员会议，讨论春耕生产工作。

同时，还建议，人民解放军当地部队和各级军事机关大力支持、帮助春耕生产工作。

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团结起来!

祝你们为夺取春耕生产的胜利而奋斗!

(这封信要在农村中宣读和张贴)

中 共 中 央 通 知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中共中央认为，中央军委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的八条命令很好。这个命令，除第七条关于军队的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外，其他各条，都适用于地方。

中央还做以下几点说明:

（一）认真执行中央军委命令中的有关规定，是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走上正轨的重要措施。

（二）根据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斗争的要求，所有在外地、外单位串连的大中学校的师生、工厂职工、农民、文艺工作者、医务工作者、机关工作人员和其他人员，除经中央特许的以外，都应当立即返回本地、本单位、本校，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三）军事领导机关，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队和地方的战备系统、机要系统和保密系统（包括保密的工矿企业、仓库和科研、设计单位在内），今后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

（四）党中央各机关，国防工业各部、公安部、外交部、计委、经委、建委、科委、财政部、各级银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新华社、广播事业局和各地广播电台，不许由外单位人员接管。已经进驻这些机关的外单位人员，要立即退出。

（五）中央和地方一切需要夺权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都应以本机关、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主进行夺权斗争，外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必要时可以协助，不得包办代替。

本通知连同中央军委的命令，要在所有基层单位普遍张贴。

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党中央于二月廿日下达了《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文件。我军全体干部战士，要紧急动员起来，遵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发扬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光荣传统，积极协助驻地农村人民公社和各级领导干部，抓好春耕生产。这是一项时间性很强的紧迫任务，各级领导一定要十分重视，坚决抓好。

（一）各地驻军要根据上述中央文件的精神，大力宣传抓革命、促生产的战略意义，不违农时，迅速掀起春耕生产的高潮。

（二）省军区、军分区和市、县武装部，要把抓好春耕生产作为目前工作的重点，协助当地（省、专、市、县）领导机关和农村人民公社，开好春耕生产会议，具体安排春耕工作的落实。

在某些原来干部已经不能工作的单位，军分区、市、县武装部以及驻军团以上的领导机关，要同当地的贫下中农组织协商，成立领导生产的班子，恢复生产组织，安排春耕生产。

（三）各级人民武装部门，要号召全体民兵，成为春耕生产中的骨干，充分发挥民兵组织生产突击队的作用。

（四）各地驻军要不失时机，以劳力、技术力量大力支援农村人民公社的春耕生产。

（五）所有部队在助耕生产中，都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对地、富、反、坏、右分子、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

当权派和四清运动中已被罢免的干部破坏农村文化大革命和破坏生产的活动，要协助地方专政机构和贫下中农组织，坚决给予打击。

各单位接此通知后，应立即研究执行，并将执行情况及时上报。

关于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点燃的一月革命的熊熊烈火，从上海开始，席卷全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这场气势磅礴的革命风暴中，我们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实行了大联合，开展了自下而上的夺权斗争，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在取得这一系列胜利的基础上，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我们庄严地宣布了上海“三结合”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诞生。这一切，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现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道问题的通知》中的指示，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就上海临时最高权力机构的名称问题进行了讨论。我们深深感到，这一指示充分体现了中央对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关怀，对上海人民的革命精神的最大爱护。我们坚决拥护中央的正确指示，一致通过把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这一新的名称，现在已得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批准。这是我们全上海革命人民的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光荣。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将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发扬一月革命精神，领导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全市革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把上海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原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所颁布的宣言、通令、通告、决定、决议及其他一切文件，一律继续有效，全市人民必须切实遵照执行。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原载1967年2月25日《文汇报》）

总政治部关于工作组的干部回原单位不再作检查的规定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各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工作组的干部，有些同志在工作中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对这些错误，主要应由提出这条错误路线的人负责。同时，他们对自己的错误都已在工作单位作了比较深刻的检查。这些干部回去后，各单位不要再让他们作检查；他们在工作组期间的检查材料，也不列入档案。

张春桥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在上海文化革命

广场召开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进一步开展夺权斗争誓师大会”上）

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战友们：

你们好！我们好久没有坐在一起讨论问题了。

十二号毛主席叫我们去北京的。毛主席当天很快接见了我们，以后又召集，主持了中央会议，讨论了上海问题和其他工作，发出了一系列决定。临回上海时，主席又接见了我们。

首先要向同志们汇报的是毛主席身体很好，每次谈话时间都很长，但精力始终旺盛、愉快。对上海非常关心，非常了解，使我们很感动。毛主席对上海革命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贡献给了很高的评价。这次讲：“上海的工作，总的来说是很好的。上海工人在安亭事件时才几千人，现在一百多万了，这说明上海工人组织得很快。”主席又问了农民、学生、机关干部的情况。这是对上海革命造反派、上海工人、上海人民的最大信任、帮助和支持。有毛主席、党中央的支持，我们面前有再大的困难，阶级敌人要出再多的花招也休想阻挡我们前进。

一、关于夺权问题

1.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是由上海的“一月革命”开始的。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文化大革命的根本问题也是如此。这次夺权和一九四九年从国民党手里夺权是不同的。毛主席讲：“这次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自己

搞起来的，是我们发动的。"那一天，毛主席还指示中央文革小组写一篇文章《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很重要。我们的理解是，毛主席在这里指明了十七年来，我国是无产阶级专政，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而不是刘、邓路线占统治地位。那无产阶级专政下又为什么还要革命呢？毛主席解释说："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机构中有一部分被篡夺了。"毛主席的话是辩证法的，先肯定了整体，后否定了局部。毛主席还指出所谓"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是反动的，是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正确的说法只能是部分地改善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自己搞起来呢？因为我国建国十七年，十七年来都很稳定。中国经过一百多年动乱，终于统一了，稳定了。大家都很满意。但和一切事物一样，统一和稳定有它好的一面，又带来了不好的一面。一部分被篡夺了，稳定中包含着不稳定。搞这次革命可以把修正主义根子连根拔掉。毛主席的概括力很强，把很深的道理归结成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2.在夺权斗争中，成为今天的关键的是"三结合"的问题。这是夺权和巩固好权的重要条件。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权已经夺过好几次了：一月十四日北上返沪第二兵团夺过；一月二十二日上三司等四个组织夺过；一月二十四日红革会又夺过。但他们夺了些什么呢？夺了几间房子，夺了大印，自以为有了权，实际上根本没有得到实权，他们也发表声明了，但他们的话根本没人听。华东局机关也是这样。夺了几间房子，向魏文伯要了几部汽车，别的东西都没有得到。我看这样的权还是不要夺了。中央指示，华东局书记处的权不能夺，因为它是党中央的代表机关，夺就是夺党中央的权。华东局机关的权可以夺，尽是些房子，夺过来也没意思。这说明，必须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才能真正夺过权来。一个、两个组织夺权，只能发展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实质上是把全民所有制变成小团体所有制。实际上是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南斯拉夫的办法，他们那里不是在搞工人"自治"吗！我们把话说的尖锐一些，目的是让这些同志明白这条路是不能走的。要想夺权，就必须找一个大联合的最好形式——这就是"三结合"的形式。缺少一方，就不算是大联合。大联合不是说群众团体多就算，缺少另外两方就不算大联合，就夺不过权来，夺过来也不会巩固。毛主席这次谈这方面最多。

我们旁听了山西省代表的汇报：如果没有山西驻军的支持，山西根本夺不了权。山西省委反动透顶，组织了便衣特务，发了枪。刘格平对面住了两个特务，枪口对准刘的窗口，刘随时有被捉的危险。因为山西驻军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才使手无寸铁的革命群众夺了权。因此，必须要有解放军的支持。

那么没有革命领导干部成不成呢？也不成！一个战斗队还要有个负责人嘛！现在夺权也要有干部，无非有新有老。为什么要有担任过领导工作的老干部呢？道理很简单。比如，一些工人表现很好，敢闯敢造反，很有工作能力，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很大贡献，但如果把一个城市，比如上海；一个省，比如江苏，交给他们，他们就会感到很困难，因为没有经验。他们管理一个车间也许会熟练一些。不要说工人同志，我总还算做过一些工作吧！现在让我一下子管全上海市的工作，我也感到很困难。我过去也参加过市委的讨论，但不是我做决定。柯老在世时，我们有问题解决不了就跑去找他请示。他病倒后，我们便感觉担子很重了，现在更重得多了。对许多东西我了解很少，比如财政税收，老实讲，我过去根本就没有兴趣。对农村有些了解，但很不够……。毛主席讲：一个大学生当大学校长不行，大学还没毕业，对整个学校还不熟悉。当个系主任我看也不行，因为没有教过书，没有领导全系工作的经验。还是应该由过去培养的教师、助教来担当。在座的青年同志，不要泄气。毛主席还说：青年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做了不少贡献，但是让他们马上接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的班还不

行。我个人的理解也是这样，“三结合”的方式是对青年的很好锻炼。青年人二十几岁跟着老革命干部学习它七年、八年、十年，三十多岁当省委书记也还是很年青的。

拿上海来说，主席给了我们很高的评价，但是如果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开始成立时没有实现“三结合”的话，牌子恐怕老早就让人家砸了。没有这个危险吗？人家不是早在筹备第二个、第三个公社吗？连守卫公社办公大楼的警备连都向上请示过，如果有人来砸牌子怎么办？因此，如果没有解放军的支持是不行的。我这里不是过高估计我和姚文元的作用，我们个人没有什么。但是由于我们参加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也使得某些人在砸人民公社时多考虑考虑。这说明“三结合”的重要性。有的人总想试一试，过去，有人反对上海人民公社，现在，有人反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我们态度也很鲜明，谁敢试就让他来吧！

上海人民公社已经有了一定权威，今后还要加强它的权威。

上海市部（局）长以上干部六百多名，处长以上干部六千多名，难道这六百多和六千多中还愁找不出“三结合”的对象吗？这里面的大多数同志还是好的。当然，他们起来造反得很晚，直至十二月十八日开大会，但这在全国还算早的呢！主席知道了很高兴。那次造反的也多是一般干部，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中没有一个。这当然不能怪造反派，只怪他们自己，也怪陈丕显、曹荻秋他们。他们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一些干部带坏了。许多主席和中央的指示他们根本没有认真传达，使得许多干部听不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八届十一中全会，曹荻秋在市委常委会上只传达了一个小时。据说，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根本没有传达，因此北京红卫兵小将一冲，许多干部有抵触情绪。“安亭事件”，曹荻秋只传达陶铸的指示，而毛主席的指示连市委书记处都未传达，马天水就不知道，因此，在曹的鼓动下，竟然跑到中央工交会议上去放炮。所以陈、曹这些人不仅对上海人民和广大干部欠了债，而且对周围的同志也欠了债。他们又利用“内外有别”、“组织纪律”来限制干部，由此，我们才理解到为什么柯老在世时，也是这批干部，把上海的工作做得不是还比较好吗！特别是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期间，上海工作在全国还是比较好的嘛！还不是这六百多部（局）长，六千多处长吗！毛主席讲，不要只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而且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态度也不是铁板一块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是会跟着我们走的，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很多，但只要我们引导很好，他们也会跟我们走。毛主席无论什么时候，总是相信群众的最大多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不相信最大多数。《红旗》第三、四期社论很重要。其中第三期里面有一段原文是“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毛主席改为：“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主席加这几个字体现了最伟大的思想，政策界限清楚了，宽得多了。

有的同志夺权以前还注意学习主席著作，夺权以后忙得一塌糊涂，不看书，不读报，这是很危险的。这两期社论应当逐字逐句地体会啊！

“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想是反动的。这不是我们造反派的思想，但对我们有影响，因为看到许多人那么顽固，十分气愤，于是在人家宣传时就听信了。其实这个口号根本不成立。首先喊这个口号的人就不打倒他自己，不怀疑自己，也不怀疑这个口号是否错误。阶级斗争就是两个阶级的对垒，一个阶级打倒另一个阶级。资产阶级也打倒资产阶级吗？除非他们内部有矛盾。喊“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人最后势必走向自己的反面，被人家打倒。

在上海，当我们问到造反派组织怎么样时，他们总是说：我们组织很好，连一个科长也没有。中央有一个机关连副科长都不要，还自以为纯洁。简直没有一点阶级分析。最近，国

务院向我们反映了一个材料，一个市委机关造反总部向国务院发了一个通令，要求取消一切“长”。里面不少话是错误的。如“历来是处长管科长，科长管科员”。我看将来也还是要这样。“带长的历来骑在党和人民的头上。”林彪同志是国防部长，他也是骑在党和人民头上吗？这是反动的。毛主席毫不含糊地讲：“连副科长都不要的，呆不了几天。”毛主席在五项接班人条件中讲：“……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朱德从井冈山时期就反对毛主席，《古田会议决议》中许多就是反对朱德的。毛主席对这种人多年来就是拉着他走。我们要向主席学习。

据我们了解，在上海，有些人一直没有发言机会，我们应该给他机会，让他们出来亮相，让他们串连，让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当然，也一定有一部分人就是给他机会也不行。我们不要等条件完全成熟再三结合，我们也不要一定找十全十美的干部来结合。可以区别对待。有的参加核心领导，有的搞一般工作，还可以有别的形式。

有人担心他们“投机”，这也没什么可怕的。投机迟早会暴露的，革命造反派什么都不怕，怎么现在怕起来了？这也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影响的结果，如果我们将来一旦犯错误也会立刻被打倒。回去以后，各单位要排排队，选标兵，也要对干部做工作，要他们站过来。他们之中，有的也承认站晚了，那就赶快站过来吧！“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可以这样办。

现在双方感情上过不去。斗了半天，现在又要结合。感情上不通，认为不好。这有什么不好呢？我们斗是为了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今天结合也仍然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首先要注意不能记仇，斗了一下，有时过分了，应当谅解。造反派对犯了错误的干部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干部对造反派、对革命小将也要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任何一次革命都要付出代价，这样一个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怎么能不付出代价呢？我们的代价并不大，比英、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代价小得多。有的斗完全对，有的斗过分了，也算是你对革命的贡献吧！老实说，没有革命小将的冲锋陷阵，没有毛主席的领导，没有这样一次伟大的运动，上海市委的盖子能揭开吗？一些人能揪出来吗？不可能！这些伟大的成就是不容抹煞的。还是看看大局吧！从国家的、世界的前途着眼，不要光看到自己。包括省、市委书记处的同志，只要他们愿意改正错误跟毛主席走，我们就欢迎。那些犯了错误的甚至是犯严重错误的同志，现在是你们选择道路的紧要关头。

3.毛主席说：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成立，到现在已经九十六年了。如果巴黎公社当时不是失败了，而是胜利了，我看现在也得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因为法国的资产阶级不会允许无产阶级公社存在这么长时间。十月革命创造了苏维埃，列宁很高兴，但没有料到这种形式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结果让赫鲁晓夫利用了。……南越是总统制，邻国柬埔寨是君主制，我看还是柬埔寨的君主制好。印度是总统制，尼泊尔是王国制，我看还是尼泊尔的王国制好。以后，毛主席又举了周、汉等朝的例子，谈到王莽时说他是最喜欢改名字的了，就和北京的红卫兵把所有街道名称都改了一样，结果，新名字记不住，还用旧的。因此名字不易多改，形式是次要的，内容是主要的，主要的是看哪个阶级在掌权。比如苏联变了，但名称却仍然没变。我看我们还是稳当点好，现在各省、市都学习上海叫人民公社，那国务院叫什么呢？国号改不改呢？如果改为中华人民公社，那国家主席就得叫公社主任或社长了。国号一改，还有个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我看苏联就不会承认，承认对它不利。公社成立了，还要不要党呢？我看应当要，总要有个核心，甭管叫共产党、社会民主党，还

是叫一贯道……总之，还要有一个党。我看名称还是不变的好，还是开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也还叫国务院。上海人民公社就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吧！是不是上海人民很喜欢人民公社这个名称？你们回去和大家商量一下，还叫上海人民公社，优点是保护上海人民的热情，缺点是全国只你们一家，不是很孤立吗？《人民日报》不能登，一登大家都叫人民公社了，就会发生上面一系列的问题。你们回去以后和大家商量一下，如果一定要叫，就叫是了。总之，既不要挫伤上海人民的热情，又不要影响大体。

从上面，我个人体会到主席站得高，看得远，什么问题一到主席那里，他总是考虑得很细致，很多、很远。而且总是保护人民群众的热情。以后中央会议决定一律不叫人民公社，但给上海人民留了余地，指出“除上海主席另有指示外”。我们回到上海后开会时，大家一致同意改名。

现在，有不少人讲，由于没有实行三结合，没有“红革会”参加……因此毛主席不同意叫人民公社。这些人请你们收回你们的言论吧！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夺了市委、市人委的权是不可抹煞的。

有一个人在会上说：“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的口号是错误的，因为是少数人搞的。说穿了，就是因为没有包括他，我们现在可以清楚地表明：“一切权力归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和“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一样，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的权力决不能和一些个人野心家分享。

那些喊“上海人民公社是少数人搞的”人，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话，也是根本不了解什么是一月革命。上海的夺权斗争在十二月下旬就开始了，那时“赤卫队”搞“三停”，如果再不夺权，只要一个月，不！二十天，上海就会不可收拾了。实际上远在公社成立以前，一月六日的大会上就夺了权了。上海千百万群众起来夺权，这么雄厚的群众基础怎么会是少数人搞起来的呢？有人还说是我搞起来的。谢谢你，我没那么大本事。我们今天只是把名称改一下，有的同志提出：“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人民公社”是一个十分庄严的口号，现在可以提“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了。

有那么一小撮人，只是一小撮，搞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被“私”字迷了心窍，老实说，谁想从人民公社改名字上做文章，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劝你们不要枉费心机了。

二、抓革命、促生产

中央最近发出了一系列文件，我们的任务是坚决执行。我们革命造反派要下定决心保证党中央的指示得到贯彻执行。首先是农业。因为农业最大的特点是季节性强，晚一天就会影响很大产量。不管搞什么革命，大家都要吃饭，因此要促生产。但是要搞好生产，又必须抓革命。不要一提抓革命、促生产就无限制地增加革命的时间，抽出许多人脱产。林彪同志讲：抓革命是第一位，但在时间上，生产是主要的。特别是春耕季节，要按照现时的具体情况处理。

对于支农、支内、支疆的同志，我希望你们用心地领会中央的指示，你们去那儿是十分光荣的。那里不建设好，上海建设得再好，也没用。我们应该记得，柯老正是因为关心内地建设才到四川去，而在那里逝世的。有的人想回到上海来，达不到目的，就去斗里弄干部、安置干部、有些人吃人民的饭、不为人民服务，而且在城里干了许多坏事、就更成问题了。新疆因为许多青年都返回原地，生产已经受到很大影响。……在和平饭店住着一些国营农场

的工人，你们在干什么？你们的岗位在农村，你们再在这里（饭店）呆下去，会学坏的。我们知道，你们之中有那么一小撮人是坏人，广大的工人同志不要上他们的当。

懒懒散散不是工人阶级的本色。

三、镇压反革命

上海不但有中国的地、富、反、坏、右，还有外国的地、富、反、坏、右。我们在战略上要藐视，在战术上则要重视。现在情况很复杂，而要我们认真观察，他们打着"造反"的旗号，有的更是削尖了脑袋钻到造反派组织内来了。镇压反革命，毛主席的方针从来就是专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相结合。我们要坚决支持人民解放军，不仅陆军，而且包括海、空军。上海的陆海空三军对上海革命造反派支持很大。在这里，我代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向你们表示深深的感谢。上海还有那么一小撮人反对军事管制，这些人如果是真正的造反派，那么首先应当向军代表赔礼道歉。否则，我们将采取另外的措施。

现在，社会上有那么一批人，就是靠造谣吃饭。如市委有人假造了周总理的四点指示，又如关于"红革会"和我全不对的总理指示，"红卫军"的两次大喜报，王力同志关于上海形势的五点指示，全是伪造的。更可笑的是最近有人传出所谓中央文革接待站关于上海形势的指示。只要说一句就够了。中央文革根本没有接待站，连接待站都没有，哪有什么几点指示呢？真是见鬼了！我们辟谣很容易，但我们不愿意，也不值得。这些造谣的人自己要小心一点，假冒中央和国家首脑的名义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我们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你有理就来讲吗！不要靠造谣吃饭，造谣是吃不饱饭的。"红革会"那一小撮头头，你们有理就讲吗！我从来没有怀疑过"红革会"的战士是革命的。他们打电话给我，讲要开请罪大会、我说，你们有什么罪，有罪的只是"红革会"的一小撮头头，对他们也要争取，要看他们自己的表现是否悔改。

目前有人在挑动革干、军干的子女，我们告诉你们：革干中大多数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军干中更是如此。这是党和国家宝贵的财富，我们绝不允许"联动"在上海扩大活动。

四、组织整顿

上海造反派对文化大革命的贡献是不容抹煞的、是全国人民都看得到的。我讲的是造反派组织，不是反革命组织。我们内部有些不纯分子，同时，我们要按斗争形势的要求进行调整。按系统、部门、单位建立组织。有的组织里面有工人、学生、干部……、很杂，大家都浮在上面，混进坏人也不知道，如果按系统组织起来，如纺织系统、冶金系统，那么解决本系统的问题就好得多。此外、有的组织本身就具有分裂的性质，如有的按年份，如一九五六年大学毕业生组织一个造反司令部。不管你是哪一年毕业的，总有左、中、右之分吧！我们要按阶级、按左、中、右来组织、而不能按别的原则组织。有的组织则更明显地带有经济主义性质，如迁坟的那些人组织起来，成立什么造反司令部，我真不知道，他们要造什么反？我劝那些浮在上面的人还是回到本单位去搞斗、批、改、许多单位还没搞好。

革命造反派必须抓紧主席著作的学习，不要当昙花一现式的人物。在北京和外地、我们发现有这么一批人，当然还是少数，我们很欣赏的人、很有才干，但现在都先后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这个教训大家都要记住。我的话，就是对这些人说的。总之、要去掉盲目性、加

强自觉性。夺权以后，大家成了当权派了，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还是资产阶级当权派要看今后的表现。弄不好，又会被别人，也许是这里的一部分同志所打倒。为了让同志们不被打倒，现在要记住打倒。

毛主席每天读一大迭报纸和传单。他再三嘱咐中央文革小组同志，每天不管多忙，都要抽出四小时读书读报。在座的能不能拿出两小时来呢？

我在结束讲话时，我想讲，我们应当想敌人是打不倒我们的，我们一定要乘胜前进！

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的补充规定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颁发后，得到全军广大革命同志的热烈拥护。军委决定暂停四大的单位，有的已经转入正面教育，并撤销了文化革命战斗组织。继续开展四大的单位，广大革命群众按照保持军队高度集中统一的要求，也自动撤销或改组了文化革命战斗组织。为了保持军队领导机关严密、完整的指挥体系，进一步贯彻军委指示，特决定：

凡继续开展四大的单位的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应以基层行政单位进行改组，所有超越基层行政单位的文化革命联合战斗组织，如各总部、各军种、各兵种、各大单位的造反总部、联络站等，应一律撤销。所有文化革命战斗组织所使用的宣传工具，如有线广播、宣传车、印刷用具等，应一律移交各单位党委文革办公室。

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节录）

（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

《红旗》杂志社论

经过半年多以来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考验，证明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根据毛主席的教导，《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十二期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指出："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根本上说来，当权的是无产阶级。在党、政、军各部门，在工、农、商、学、兵各界里负责各级领导工作的干部，在一般情况下，大多数是拥护党，拥护毛主席，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钻到党和国家领导岗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只是一小撮。""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基本的事实。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是巩固的。正因为这样，

所以在我们国家里，才能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上的极其光辉的胜利。”

事实证明，这个基本估计是正确的。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怎样对待干部问题，必须从这个基本估计出发。

必须清醒地看到，确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一些地方，在一些部门，篡夺了党政的领导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有它的社会基础的。他们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我们无产阶级当前的主要敌人。不把他们打倒，我们国家就会变颜色，重新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从他们手里夺权，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决战。谁要否认这一点，就是敌我不分，就是否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大多数干部是好的，钻进干部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只是极少数。犯有错误的干部，甚至是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在党和群众的教育下，大都是可以改正的。我们绝不能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钻进干部队伍里来的阶级异己分子估计得过多。如果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广大的干部，也是敌我不分，那是很危险的。

半年多以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动猛烈的反击中，有一些人，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是不好的，不能信赖的，应当一律打倒。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是不符合事实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告诉我们，对于社会上的一切事物，都必须进行阶级分析，对于当权派，当然也必须进行阶级分析。一定要分清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切革命群众对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必须坚决打倒，而对于无产阶级当权派，则应当坚决支持。对当权派，不作阶级分析，一概怀疑，一概否定，一概排斥，一概打倒，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思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占统治地位的，大多数干部和党团员是执行这条路线的。十七年来，在各条战线上所获得的伟大成就，就是铁的证明。要把干部一概打倒的观点，就是抹煞十七年来的基本事实，就是否认十七年来的伟大成就。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故意混淆无产阶级当权派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界限，故意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煽动群众转移斗争目标，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指向好的和比较好的党团员，妄图达到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目的。一切革命同志，一切革命群众组织，都要高度警惕，千万不要上当。

（原载《红旗》杂志 1967 年第 4 期）

推荐两篇好文章

（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

《红旗》杂志短评

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鲁迅兵团东方红战斗队的大字报《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体育战报》评论员的《为“东方红”小将的一张大字报叫好》，是两篇很好的文章，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一个好范例。他们“有的放矢”，他们把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本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是值得全国各地的革命小将学习的，同样也是值得革命的老干部学习的。

这两篇文章，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新阶段的时候，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革命群众组织内部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带有普遍性的。他们提得及时，切中要害。这些问题，归根到底就是“私”字，就是个人主义，就是资产阶级世界观。

“东方红”小将的大字报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决不是什么‘罢官革命’。”单纯的罢官，“只能使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走过场，其结果，是组织上罢了修正主义的官，而在思想上却没有罢他们的官，修正主义的土壤还是存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个被打倒了，而第二个又会爬上来，甚至可能自己就会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说得何等好，何等深刻啊！这是值得所有的同志深深思索的。

他们还提出了解决内部问题的正确方法，这就是：一边战斗、一边整顿，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自觉地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进行整风，纠正在自己内部存在的错误思想。他们不是遮遮掩掩，而是公开地进行自我批评，把自己的思想问题亮出来，并且真诚地欢迎群众的批评。在同志之间，在各个革命的战斗组织之间，不是互相指责、互相攻击，而是同志式的互相帮助。他们真正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公式，来解决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运动。这正是我们要大大提倡的。

我们相信一切真正的革命左派群众组织，一定能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自己来解决这些思想问题，从“私”字中解放出来，锻炼得更加坚强，在政治上较快地成长起来。

革命小将们，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及时地正确地提出自己组织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一事实，又一次证明了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六条提出的、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相对立的“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正确性。“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这是历史唯物论，这是历史辩证法，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触及人们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须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需要夺权的单位，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以后，自己的地位起了变化，这就发生了在新条件下自己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在对待群众的问题上，必须坚持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

自己解放自己，而不能少数人包办代替，更不能压制群众。

旧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人数众多的国家。在左派群众组织的内部出现一些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思想，这是合乎规律的，不应该大惊小怪。问题是，对待革命群众，应该积极地不断地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引导，满腔热情地耐心地帮助他们，纠正错误思想，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加强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这是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应当采取的正确态度。

如果不看革命小将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而抓住他们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任意夸大，对他们进行攻击，那就站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去了，站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对立面去了。

革命小将们，我们一定要为无产阶级争气，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争气，说到做到，认真地不断地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原载《红旗》杂志1967年第4期）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关于劝阻红卫兵和革命群众自发赴越援越抗美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日）

从去年十一月以来，发生多起我红卫兵越境到越南，要求去越南南方参加抗美斗争的事件。最近又有安徽、江西、湖南等二十个省市的二百多名红卫兵和革命职工，汇集于中越边境的凭祥市，要求市委发给他们去越南的护照。还有些人直接向越南驻华使馆写信、发电报、打电话，要求赴越。此事已引起越方注意，并要我们帮做解释工作。由于这些行动涉及中越两国关系，处理不好容易使我陷于被动，请你们即通过革命组织予以劝阻。谈话时可着重说明以下几点：

一、我红卫兵和革命职工要求到越南参加抗美斗争，表达我国人民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坚强意志，这种革命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是好的。

二、我国抗美援越的行动，是全党全国的大事，应当在党中央和我国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进行。任何个人、任何团体，必须严格遵守纪律，不得自由行动，一切不听命令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都是错误的。在当前情况下，我红卫兵和革命职工应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回到本地原单位去闹革命，把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也是对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积极支持。

三、我国人员去越南必须取得越方同意。私自越境外出是非法的犯罪行为，也是对兄弟国家的不尊重。因此，这种行为必须坚决制止。我各地革命群众也不要直接向越南驻华使馆、领事馆提出赴越要求，以免使对方为难。

此通知在必需时可向革命群众宣读，不得向外张贴。

中共中央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

（供讨论和试行用）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

一、大专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进行斗、批、改。

二、下厂下乡和在外地串连（包括参加外单位夺权的和设在外地的联络站）的革命师生，一律在三月二十日前返回本校，参加本校文化大革命。

三、各大专院校的革命师生，必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按着统一安排，分期分批地进行短期军政训练。

四、各院校根据本单位具体情况，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要在政治上、思想上、学术上深入地进行批判和斗争。着手研究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教学方法。

五、各大专院校，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的学术"权威"以外，对各级领导干部、教授、讲师、助教、职工、都应当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吸收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并且安排他们的工作。对犯错误的人，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

六、大专院校必须由革命学生、革命教职员工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临时权力机构，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行使本校的权力。已经由革命左派学生组织掌握领导权的，应着手吸收革命教职员工和革命领导干部参加。在条件成熟时，实行全面选举制，正式建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组织形式，作为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正式权力机构。

七、大专院校的革命的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应该在运动中整顿、巩固和发展。红卫兵应该以劳动人民家庭（包括工农兵和革命干部以及其他劳动者）出身的革命学生为主体。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学生，对毛主席有深厚感情，有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一贯在政治思想上表现比较好的，也可以参加。

八、大专院校所属工厂、企业和科学研究单位，必须坚决实行毛主席、党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认真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

这一文件，可在全国各大专院校张贴。

中小学复课闹革命（节录）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

《人民日报》社论

中小学的革命师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已经有了很多的贡献。目前，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新阶段。在这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决战的关键时刻，摆在中小学革命师生面前的光荣任务，就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复课闹革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现在，是革命的师生回到学校去，为无产阶级占领中小学阵地的时候了。

中小学（包括中等专业学校、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等学校）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条重要战线，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年轻一代的一个重要战场。毛主席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中小学革命师生，一定要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这个伟大任务，把中小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并且在这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锻炼自己，把自己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成为毛主席的好学生。

复课闹革命，要紧紧抓住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要看到，复课闹革命，是教育战线上的一场阶级斗争。对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定要很好批判，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或者批判得不认真，就不能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不能很好地完成伟大领袖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一斗、二批、三改的伟大任务。

复课闹革命，复的是毛泽东思想的课，上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课。上课，主要是结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语录，学习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批判资产阶级的教材和教学制度。同时，应该用必要的时间，中学复习一些数学、物理、外语和各种必要的常识，小学学一些算术、科学常识。

过去，在有些学校里，由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斗群众，造成了一些学生和学生之间，学生和教员之间、教员和教员之间的隔阂和对立。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也存在着个人主义、风头主义、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极端民主化等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这些，都阻碍着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阻碍着斗、批、改的进行。中小学的革命师生一定要认清形势，一定要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基础上，由革命学生、革命教职员工和革命领导干部民主选举文化革命委员会，负责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具体安排上课。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小学的革命师生一定要牢牢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重点是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注意绝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学生。就是参加过反动组织的学生，除了个别的首恶分子和犯罪分子必须法办以外，对他们也应当采取争取教育的方针，只要他们承认错误，就应当允许他们革命，不应当歧视他们。教职员工中坚持反

动立场而又不接受改造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是指本人，不是指家庭出身）必须清除出去。但是应该看到，中小学的教员和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不要排斥一切，打倒一切。对于犯了错误的人，要按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积极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群众之间的不同意见，要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正确解决。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小牛鬼蛇神"的革命学生、革命教职员工，必须认真平反。我们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团结大多数，彻底孤立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在春耕期间不要夺权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发布以来，广大贫下中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大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反，农村文化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当前正是春耕大忙时节，各地农村应该在这样大好形势下，认真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立即掀起一个轰轰烈烈的春耕生产高潮，这是关系到"备战、备荒、为人民"，关系到全年收成和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头等大事。

为此，中央决定：

一、在春耕大忙期间，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不要进行夺权斗争。

二、已经夺权并经革命群众和上级同意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领导班子，应该切实地挑起革命和生产的两副重担，用毛泽东思想指挥好春耕战斗。领导瘫痪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应由贫下中农积极分子、革命干部组成临时的领导班子来抓好春耕生产。

三、农村干部（包括正职）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应该本着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

四、在已经四清过的地方，决不允许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下台干部和地富反坏右分子翻案，要坚决卫护四清运动的成果。

（这一通知可在农村中宣读和张贴）

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关于《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的批示

（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

现将毛主席批转的《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发给你们，望参照执行。毛主席所加的批语，对于学校的军训问题，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请你们向所有参加军训工作的干部和全体师生传达，组织大家学习，坚决贯彻执行。

林彪、恩来、文革小组各同志：

此件似可转发全国，参照执行。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预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

毛 泽 东

三月七日

陈伯达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大意）

（一九六七年三月九——十日）

刚才康老介绍了毛主席 1966 年 5 月份同谢胡同志的谈话和今年 8 月份毛主席同卡博、巴卢库同志的谈话，从理论上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必要，是在什么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极其尖锐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继续社会主义革命，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斗争，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逐步走向共产主义的斗争，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那是很危险的，资本主义就要复辟。

毛主席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写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说："在五十多天里，从

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1962年刮单干风，就是刘少奇为首，邓小平赞成的。他们的那一套，就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1964年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搞的那一套，表面上"左"，实际上右，现在揭发了很多材料，象王光美在桃园大队搞的四清，原来是假的，让坏人专了政。1964年毛主席有意指出了这个问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否认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说社教运动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当时，毛主席就反对刘少奇的错误意见，说："什么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封建社会就有清官赃官的矛盾，这种提法，不是阶级分析，没有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性质。"刘少奇1962年提倡单干，分田到组，包产到户。毛主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作了新的重大发展。

1964年刘少奇作了一个公开报告，反对毛主席。这个报告落到我们手里，把他反对毛主席的东西砍了，他就不让发了，他说："这个报告修改后，有些地方还要斟酌。这个报告，讲毛主席提出的调查研究过时了，他对这个问题很强调，说从中央委员到支部书记，如不按他说的蹲点方法去做，按毛主席调查研究的方法去做，就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支部书记，不能当干部。他就是要用这个方法改组干部队伍，改组党中央。他说的蹲点，是王光美式的蹲点，是没有阶级分析的蹲点，没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蹲点。蹲点是毛主席提倡的，不是刘少奇提倡的，毛主席提倡的蹲点是阶级分析的蹲点，是两条道路斗争的蹲点，是调查研究的蹲点，刘少奇抓住蹲点这个问题，就是要否定一切，打倒一切。

刘少奇的这种观点，不是1964年开始的，也不是1962年开始的。大家知道，日本投降以后，他就提出有名的"理论"——和平民主新阶段，提出共产党员要当"红色买办"，就是要当美帝国主义的买办，当美帝国主义的走狗。那时候刘少奇是完全悲观的，对中国革命是绝望的，对中国前途是绝望的，他要投奔另一条当美国买办的道路。刘少奇这些东西被毛主席否定了，毛主席对他进行了教育，要他执行七大的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夺取全中国。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完全违背刘少奇的意志的。

中国革命胜利后，1949年他在天津王光美的哥哥王光英的家里，对资本家说，资本家要大胆剥削，工人欢迎你有剥削。他说现在必须提倡剥削，欢迎剥削，还说工人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不能生活。1952年山西有一个合作化问题的文件，刘少奇批了，认为合作化是不合适的。最近发现了一个材料，1950年1月他在东北提出了一个意见，说搞变工队不行，不能发展到集体经济。大家知道，毛主席在抗日时期，大大提倡变工队，变工队是发展合作化集体经济的前身，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刘少奇在东北否定变工队，提倡"三马一犁"。他认为"三马一犁"发展到80%，才能搞变工队，没有"三马一犁"，变工队就没有基础，要让单干放任自流，放任资本主义发展。

七大以后，在中国就有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要不要胜利，敢不敢胜利，胜利后走到那里去。一条是要胜利，敢胜利，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不要胜利，不敢胜利，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条是毛主席的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刘少奇的资本主义道路。

1965年二十三条公布以后，彭真迫不及待地在北京召开了一个会议，这个会议是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他的一个讲话，我们做了注解，发给大家看看。彭真在东北实行的是国民党

路线，美帝国主义的路线，是保护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林彪同志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彭真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在东北取得了胜利，这是很重大的关键问题。后来，彭真在东北站不住脚了，回到华北。那时正在土改，刘少奇要他在华北搞土改。他搞"搬石头"就是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否定一切。历史上可以查明，不是在文字上而是在行动上，刘少奇、彭真都是这样搞的。打倒一切，否定一切，实际上不是一切，而是打倒无产阶级、贫下中农，肯定地主，资产阶级。

从历史上看，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问题就容易看得懂了。

彭真在去年二月搞了一个汇报提纲，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提纲，要在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革无产阶级的命。在同一时期，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搞了另外一个文件，无产阶级的文件。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两个针锋相对的文件，一个代表资产阶级，一个代表无产阶级。后来中央发了五月十六日的通知，这个通知的主要内容，是毛主席执笔的，否定了彭真的二月提纲。接着又发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不能不反映到党中央来。过去是若隐若现，现在变的非常明显，非常尖锐了。

社会主义越发展，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一定要反抗。一九六五年，彭真一边讲二十三条，一边反二十三条，经过一年多一点时间，他就抛出了这个汇报提纲，赤裸裸地反党、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这个提纲，否定了彭真在中央在北京的地位，站不住了。中央的通知是五月份发出的，六月北京市的形势就急转直下，一天等于二十年，时间过得很快，事情很多，这是一个大革命。连反动派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世界历史上没有过的大革命，广泛地动员了群众，是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是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大规模斗争。在这样一场斗争中，八个多月大家都经历过来了，有好多问题事先没有想到，好多问题我也没有想到。但是如果想一想革命历史，想一想中国革命的历史，世界革命的历史，任何一次大革命，很多事情都是出现很迅速，是事先不能预料的。在座的同志有些问题一下子不能马上理解，是不奇怪的。

回想一下，运动开始的时候，以刘、邓为代表，由他们主持，派了大量的工作组，到各地方，各部门，各机关，各学校，他们的目的是干什么？就是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一张大字报中讲的，他们利用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机会，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压下去，打下去。六月以后，大量的大字报在各学校、工厂、机关出现了。以刘、邓为代表的一伙人显得非常恐慌。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看来，这些大字报没有什么可怕的。当然，毛主席说过，大字报这个武器，革命的可以利用，反革命的也可以利用。但是大量的，主流，是革命群众贴大字报揭发了工作中的问题。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看来，本是正常的事情。但在刘、邓他们看来，这是"反革命"，他们把很多人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对于真正反革命的大字报，如李世权反毛主席的大字报，刘少奇却说要保护，要保护少数。（**康生**：当时有两种少数，一种是毛主席保护的革命派的少数，一种是刘少奇保护的反革命的少数。）在这样的紧急关头，毛主席回到北京，开始扭转局面，把那些被打成"反革命"的人看一看，很多是革命的，是好人。这并不是说所有被打成反革命的人都是好人，没有一个坏人，而是说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把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打成"反革命"。这就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一中全会后，两个月了，有些同志对于两条路线的斗争，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在看到《红旗》十三期社论后，还觉得不能理解。我看是由于没有好好考虑，没有好好想一想。

昨天讲了刘少奇的问题。下面再把邓小平的问题讲一下。邓小平每次开会，基本节目就

是打牌，每次开会都要打。有人找他谈话，他没时间，还要陪他打牌，成了很大负担。不陪不行，他是个总书记，陪了又耽误时间。很多同志有议论，总书记带头打牌，每天都打，还打通宵。我想打牌这个风气传下去很不好，影响到小孩子也打牌，打扑克。下面地、县也打，各系统、各部门也打，形成了一个风气。在乡下不是一般的打牌，有的还赌钱。总书记打牌，下面不好说，就传开了，这决不是小事，作为总书记，有这样的作风，影响很不好。有时间为什么不找干部谈话，学习毛主席路线，接见群众。他找肖华谈话，不好好谈，谈几句就算了。（肖华：每次我去汇报情况，都是三言两语，卡住时间，所以我到他那里汇报最容易。）从这个小事，可以看到他的大的方面。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有的同志给邓小平提意见，跟他商量，不派工作组，他就打回去，说一定要派工作组，那里也要派，气势很凶，很嚣张。文化大革命，刘少奇有两个点：清华大学，师大附中，就是王光美、刘涛搞的。他还批评工作组长，说你们没有蹲点，我蹲了点。这就是刘少奇的路线。邓小平蹲点的地方，也是靠他的儿子、女儿，根本不接近群众。当然小孩子的意见也是可以听的。但这只是一方面。他只听这一方面，不听广大群众的。邓小平有个女儿，有个时期，读谭立夫的文章比读毛主席语录还起劲。他在美术学院说，谭立夫的发言，大灭资产阶级威风，大长无产阶级志气，对我们有利，我们已经翻印了五百本、广播了四次，最重要的话是我们高干子弟要掌权。当然，对高干子弟要一分为二，大多数是好的，也并不是说高干子弟不能掌权，但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不要去操纵。我曾经说过，高干子弟不要去插手，去操纵。邓小平的女儿说的话，是谭立夫那里来的。流传最广的话，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是"联动"的根本纲领。他们无法无天、蛮干，不顾党纪国法。同志们看了"八一"学校，最早是主席建议中央文革的同志去看看，康生同志看了，建议到会的同志也去看看。一看很清楚，那是"联动"的堡垒，这个学校，办成这个样子怎么行。他们可能是少数人，威胁一批人跟他们走。好好的学校，破坏成这样子，是刘邓路线造成的恶果。

刘少奇同邓小平是有个人矛盾的，但在大的方面站在一个立场上。他们共同的阶级立场，是资产阶级立场，他们共同的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九六四年冬一九六五年春，中央召开会议讨论二十三条时，毛主席批评刘少奇，不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批评邓小平搞独立王国。他们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搞独立王国，就走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去了。这次会议以后，刘少奇、邓小平的个人矛盾就抛到后边去了，他们的资产阶级共同性就突出来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们两人立场一致，路线一致。在座的同志可能听说过，也可能没听说过，在紧急关头，邓小平是一个打手。文化大革命，究竟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呢？还是让那些人站在群众头上，采取高压政策呢？邓小平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坚持派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立场一致。为什么说刘、邓路线，就是他们站在一个立场上，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镇压群众运动。

毛主席回北京后，改变了局面，但刘、邓路线还有市场。在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说，这个决议（十六条）可能执行，也可能不执行。毛主席有伟大预见。十一中全会以后，路线问题是不是解决了？事实上文件只是在会议上通过了一下，有相当数量的同志有抵触。这个时候，毛主席看到了这种情况，提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让大家进一步把问题弄清楚。毛主席有个讲话，林彪同志有个很长的讲话。会议快结束时，毛主席又单独找各大区的同志们谈了一下，说大家在工作上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主要负责是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的人，执行的人有各种情况，区别对待，要让我们丢掉刘、邓路线的包袱，不要把制定反动路线的人，同那些执行的，不自觉执行的，执行了又改了的混在一起。下面的同志是执行了的，但好多同志是不自觉执行的。一说明这个问题，大多数同志就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事实说明，中央工作会议是有成效的，很多同志同刘、邓路线划清了界线。但是还有些同志不是很容易划清界限的。有的人，是一小撮人，还要为刘、邓路线服务，阎红彦就是这样，是一个典型例子。事实上他并没有受谁的逼迫。有一天晚上，我们听说昆明有一批学生冲昆明军区，目的是找阎红彦辩论。这时我出于好意，打了个电话，电话很快就接通了。我问他，你是阎红彦吗？他说是。因为我普通话说得不好，一边说一边请汪东兴同志代讲，请他出来见一见群众，不用怕，没有什么问题。就说了这样几句话。我与昆明学生从来不认识，没通什么消息，也没有什么来往。我只是根据大局来判断，任何一个领导人，只要站出来，与群众谈心，什么问题都好办，就是这样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根据毛主席思想，群众路线，毛主席教导的甘当小学生的态度和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十六条精神。就是简单的几句话，他说是我们逼死他，给我们安了好大的罪名。他写了遗书，不交给别人，交给他老婆。他不请我们原谅，不请群众原谅，请他老婆原谅。这次简报上有的同志问、阎红彦是怎么死的，我说了这几句话，汪江兴同志还在，这怎么能说逼他去死。这是他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不愿向无产阶级屈服，不愿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屈服。事实就是这样。

我们绝大多数的同志是好的，思想慢慢地通了，逐步转变过来了。毛主席告诉我们，要从感性知识到理性知识。有很多同志是有感性知识的，接近群众，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很容易接受。如果完全没有感性知识，不接近群众，就不容易通。我们也接触过很多同志，他们一与群众见面，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们坐办公室，接触的就是那么几个人。我们本来是从群众中来的，现在与群众接触，却变成很困难的事情。这个困难好象很困难，其实只要一个钟头就能解决，只要见群众，就可以弄清楚，就能知道是怎么回事。

对待反革命，那要镇压。如果对反革命宽容放纵，就失掉无产阶级的原则，失掉无产阶级立场，那不是毛主席的路线。但是应当相信，只要我们同群众接触，反革命就更容易暴露出来，就更孤立，抓他就容易。不然，反革命混在群众中，他抓住我们不接见群众这一点，播弄是非，颠倒黑白，制造事件。

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是有很大成绩的。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了，许多同志进一步接触群众，证明毛主席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接着来了个工人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原来主要是在学校，社会上扫四旧，横扫牛鬼蛇神。工人起来，各地方都起来了，最集中表现在上海。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愿意接近工人群众，把他们哄到北京来，给他们路费，大搞经济主义，想收买工人，想这样把工人运动压下去。上海的革命工人不理这一套，他们发现这是用经济主义来腐蚀工人，破坏工人运动，他们就发起了新的斗争，发展成为向资产阶级代理人进行夺权的斗争。这个时候，毛主席号召人民解放军要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介入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是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决定，这样不但把一般的群众运动提高了一步，而且使人民解放军进一步同群众相结合，使斗争走上了新阶段。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人民解放军打出来的，没有人民解放军，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在七大讲过，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没有人民解放军，就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可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是在人民解放军保护下进行。人民解放军公开站出来，公开支持革命左派，对文化大

革命，对夺权斗争，有重大的不可估量的意义。

夺权斗争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康生同志传达的，毛主席同阿尔巴尼亚领导同志两次谈话所说的，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社会上有资产阶级，就可能渗透到上层建筑中来，渗透到政权中来，形成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毛主席、党中央一直讲就是一小撮。人民解放军要巩固、要壮大，一定要清除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相互联系的。

在全国解放前，在夺取政权以前，毛主席就说过："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刚才讲的阎红彦就是一个例子。十七年的经验证明，有些人就是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袭击。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他们失掉了政权，失掉了生产资料，他们就千方百计让他们的后代钻到我们队伍中来。有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量宣传剥削阶级的思想，大量保存剥削阶级腐蚀人民的文化。这样，产生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不足怪。无产阶级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旁的选择，就是要坚决拔掉这一小撮人。这件事情，必须得到人民解放军的支持，这也是人民解放军的神圣任务，人民解放军要保持光荣传统。这个传统，是无产阶级的传统，是人民的传统。毛主席英明地作出的这个决定，已经开始在全国收到了成效。当然，不要那么急，要充分酝酿。人民解放军要跟人民群众、要跟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的老干部相结合，这就是《人民日报》上登的革命的"三结合"，就是毛主席提出的"三结合"，是革命的"三结合"，不是糊里糊涂的"三结合"，是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原则的"三结合"。

这个斗争是很尖锐的，我们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斗争，不是很简单的事情。要充分估计到斗争的复杂性。最近，我写了个材料给毛主席看，毛主席批示，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夺权斗争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目前有些地方、有些部门在夺权斗争中，就有资本主义复辟的现象。这里顺便说一下，混到群众里面的也有坏人，反革命份子，浑水摸鱼，搞反革命活动。中央采取了措施，取缔了一些反革命组织。反革命有的是内部的，有的是里通外国的，有的是蒋介石策动的。所以毛主席说的很值得大家注意。文化大革命中，学生中也混进一些反革命份子，所以我们要头脑清醒冷静地作阶级分析。到群众中去，就可以把这些人分辨清楚。反革命活动本来是搞地下活动，他们利用大民主搞地上活动。地下活动不容易看得清，地上活动更有利于我们破获，这是好事。

大字报中有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但是大字报的主流是好的，是革命的。《人民日报》去年六月的一篇社论，《大字报是牛鬼蛇神的照妖镜》，王光美在清华大学说，这是一大毒草，不准学。我们现在仍然认为，这篇文章是好的。当然对大字报，我们要有一定的领导。对反革命份子利用大字报，丑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丑化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要采取措施。大字报是一种工具，是一种形式，革命的可以利用，反革命的也可以利用，各个阶级都可以利用。问题是要看到对无产阶级更有利，还是对资产阶级更有利。应当看到，大字报还是对无产阶级更有利。大字报可以进行彻头彻尾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如有反革命插上来，我们可以识别，对这种大字报，也不可怕。所以我们必须坚持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军队还是按照军委的规定执行。

有的同志问我，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怎么样？毛主席认为，这本书脱离阶级斗争，脱离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空空洞洞地讲一些个人修养，是欺人之谈。书

里也讲阶级斗争，但只是概念上的，没有把阶级斗争当作现实问题。这本书是在抗日时期写的，他不分析抗日战争中，无产阶级应如何做。毛主席说，这本书是唯心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本书尽管讲了那么多马列主义概念，阶级斗争概念，结果把阶级斗争变成了个人修养，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修养。毛主席说，不讲现实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世界上的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什么个人，个人修养，每个个人都是阶级的个人，没有孤立的个人，抽象的个人。他讲的个人是没有阶级的个人，抽象的个人。他讲的孔孟之道，从封建地主到资产阶级都可以接受。我顺便说一下，马克思讲过，列宁也讲过，阶级斗争的学说，并不是我个人的发明。阶级斗争必然引导到无产阶级专政。当然发现阶级斗争，是一个进步。事实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讲阶级斗争还不够格，完全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本书是空空洞洞的，也有马列主义概念，也有孔孟之道，是一个大杂烩，是不三不四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东西。从这本书里得不到无产阶级的东西，只是一些抽象的概念，糊糊涂涂的概念。

原来刘少奇还有一封信，说中国没有斯大林，只有靠我们来工作。那个时候毛主席已经很明显是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突破了斯大林讲的框框，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不是没有斯大林，而是有更高的斯大林，林彪同志已经充分阐明了这个问题。

先说到这里，有不对的，请大家批评。

康生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大意）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

请到会的同志们原谅，原来准备和同志们座谈，不是来作报告，到场后同志们来个不发言，这就逼着我讲话，这样一讲难免犯错误，这就相当为难。现谈几个问题。

一、关于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问题。首先请同志们打开《毛主席语录》204页，把第24节的标题“思想意识修养”改为“纠正错误思想”。同一节的208页，倒第五行起“刘少奇……你的还是我的。”这一段删去。为什么把标题改了？这是刘少奇的语言，是说不通的，不科学的。在毛主席著作中，从来不用“思想意识修养”这个词。思想和意识有联系，但又是两个概念。讲思想是一回事，讲意识那就含义很广。意识是指人的头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在一定意义上讲，在生理学上讲，意识和知觉有相同的意义，失掉知觉，就失掉意识。意识，是包括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两个方面在内的。思想有独立的含义，它是指人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对社会现象的反映。与这相同的语言，有时又叫思维，主要是讲通过感性认识达到理性认识。看来，刘少奇这个“马克思主义”是不通的。

毛主席讲过刘少奇的这本书是欺人之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在这本小册子中只谈个人修养，个人道德，根本不谈夺取政权问题。离开了政治，离开了阶级斗争，自然就会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同志们有时间可以看看这本书。

刘少奇说共产党员修养要有很好的共产主义道德，他的共产主义道德是能“爱”人，能“恶”人。又说，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完全是孔孟之道。

刘少奇说,要有最大的勇敢,没作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这是他说的共产党员的最大勇敢。

刘少奇在这本书中,说到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时,说什么没有偶像的崇拜。可以看出,这是暗示攻击毛主席的。他在讲到忠诚坦白时说,要能"无事不可对人言"、照他这样说,党的机密也是可以告诉蒋介石的。

刘少奇还说,要"有最高尚的自尊心,自爱心"。请同志们注意他的所谓自爱心是"保持自己的生命和健康",这是赫鲁晓夫的活命哲学。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叫安子文、薄一波去自首。这就是他的所谓"修养"。

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出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本质和丑恶灵魂。同志们提出,要对这本书进行批判,是很好的。这本书在国内外流毒甚广。毛主席说要写文章批判。

二、昨天,我把毛主席对谢胡、卡博、巴卢库等同志的谈话向同志们传达了。我想,同志们的问题原则上可以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毛主席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还要夺权。毛主席领导下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还会产生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的问题。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为什么还会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从这里可以理解到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

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天天写文章骂我们。《真理报》一月份就发表二百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和帝国主义腔调一模一样,没有什么新东西。无非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的,不是革命的;说不是发展文化,是破坏文化。毛主席说:"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人民的看法。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深入发展,是触及人们灵魂的一场大革命,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大革命,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揭发黑暗面的大革命。因此,这场革命运动,是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史无前例的伟大的革命运动。它使毛泽东思想深入亿万人民头脑中,使亿万劳动人民直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直接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一百多年来发展的新阶段。这不仅对中国革命有极其伟大的意义,对世界革命也有极其伟大的意义。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相反,他们欢欣鼓舞,热烈拥护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世界上影响很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骂我们,说"糟得很"。一切革命人民,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异口同声地说好得很。好得很和"糟得很",这是世界上对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反映。

对任何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总是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两种不同的看法。我们研究历史教训,对于认识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好处。一九二七年,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另一方面,革命的人民则认为完全是对的,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这是四十年前毛主席对伟大的农民运动的看法。我们今天重读这一段,仍感到很现实。

同志们还可以想一想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整风运动的历史。毛主席说,这次整风运

动，是无产阶级思想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机会主义斗争，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通过这场斗争，大大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粉碎了王明路线，奠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思想基础。对待这个伟大的运动同其他的革命运动一样，也有两种截然对立的看法。毛主席和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认为好得很，而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则认为糟得很。

解放后，一九五八年毛主席提出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毛主席提出的这三面红旗，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全国人民、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认为好得很，而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反党集团则认为"糟得很"。

所有这些，说明什么呢？有些人是站在敌对的阶级立场上来反对革命的，有些人是反党分子，他们利用群众运动中个别缺点，他们利用延安整风审干中的个别缺点，他们利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的个别缺点，抓住不放，向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攻，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还有一种人，一时看不清楚，分不清主流非主流，主要非主要，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固定一点，看不见运动的发展，看不见缺点错误已经或正在纠正。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其结果容易把是非颠倒了。

同志们可以想一想，认识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并得到全党的信任，是经过许多曲折，许多斗争的，从党创立时算起，到七大是经过了二十四年。有个代表人物叫王明，住在莫斯科，化名外国人骂中国共产党。直到现在中央委员会里还有人否定延安整风，比如张闻天。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就更多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谭政等等。彭德怀最近又写信给毛主席为庐山会议翻案。

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避免地会有两种立场、两种看法，有的是党外的敌人，有的是混进党内的敌人，也有一些同志一时看不清楚，有怀疑。所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取得了相当胜利的时候，解放军同志必须吸取历史教训，看清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这个运动象延安整风运动一样，年限越久意义越大，时间越长看得越清楚。同志们要坚信毛主席。今天到会的同志，包括我在内，摆在面前的是象《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的那种情况。毛主席说："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要从主流、本质和运动的发展看问题，吸取历史上的教训，看清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

三、什么叫两条路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是什么？

去年十二月，毛主席同一个兄弟党的领导人谈话，指出了这个问题。什么叫两条路线斗争，什么是刘、邓路线的本质，有一个概括的说法。毛主席说，两条路线的斗争，实际上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加尖锐更加集中地暴露出来罢了，其实它是长期存在的东西。什么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本质是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消灭一切私有制，而且逐渐消灭产生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刘、邓路线就是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坚决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全国解放，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在这一年的五月间，刘少奇到天津视察工作，向天津的工人代表会议公开声明说，中国今天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否则就违背人民的利益，违背工人的利益。这是刘少奇的政治纲领。同

一个时候，他在干部会议上讲了两句概括的话，他说，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少了，劳动人民不是反对剥削，而是欢迎剥削。一九五0年，刘少奇曾提出中国不是发展社会主义、而是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这句话，后来邓子恢也讲过。这些是修正主义，社会主义民主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共同论点。考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人，虽然说法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结论：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农村分散落后这样的国家，无产阶级即使取得政权，也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只能让资本主义发展到可以走社会主义的时候，才能发展社会主义。这个理论，在苏联十月革命后，大大发展，他们说，一定的经济基础，才能有一定的上层建筑，一定的生产力，才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经济不发达，怎么能实行社会主义，如果实行社会主义，就是反马克思主义。一九三0年，考茨基写了一本书，叫《陷入绝境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他在这本书里讲，十月革命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按照俄国的条件，不能发展社会主义。他狂妄地说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如果列宁是对的，那么他几十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就全部垮台了。在苏联有个苏汉诺夫说，城市工业水平低，农村很落后，在俄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列宁在一九二三年写了一篇文章——《论俄国革命》，严厉驳斥了这种修正主义观点。列宁说，俄国生产的发展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工业还有一定的基础，农民虽然落后，但同无产阶级一起革命、农民是赞成革命、赞成社会主义的。你们是修正主义者，在哪本书上看见过先要发展资本主义，然后再建设社会主义。苏联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成功，到一九二八年才实行农业集体化，这里除有各种原因外主要是资本主义逆流的影响。

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列宁在《论合作制》的文章中说，如果只有城市的社会主义、广大农村是资本主义，那么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就不巩固。只有农村实行集体化，合作化，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有可靠的基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一个社会基础，就是苏联农村存在的个体经济，东欧的一些国家也是这样。这样的国家是什么社会主义？是名义上的社会主义。

再看看刘少奇，昨天伯达同志已经讲过了。刘少奇一九五一年六月在宣传工作会议上说，办互助组合作社，在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是错误的，不实现工业化，农业就不能合作化。一九五二年，他批山西省的一个报告说，把农业劳动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水平，企图战胜自发势力，这是错误的、危险的，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个批语曾印发给马列学院的学生和中央各组委。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在城市发展资本主义，在农村反对搞合作化，主张发展富农经济。后来的大砍合作社，事实上也是他的主张。他一九五七年反对党校学习毛泽东思想，一九五九年在庐山反彭、黄时不积极，一九六二年又大刮单干风，一九六四年搞形“左”实右，在文化大革命中实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切是有联系的，决不是偶然的。毛主席说过，走资本主义道路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存在。

四、“三结合”问题。基本论点，已经在《红旗》第五期社论上说了。这个社论，主席亲自修改，增加了下面一段话：“从上至下，凡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队代表或民兵代表参加，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大、中、小学），党政机关及民众团体都要这样作。县以上都派军队代表，公社以上都派民兵代表，这是非常之好的。军队代表不足可以暂缺，将来再派。”林副主席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我们一万句。这个“三结合”是对解放军的最大信任。如何执行这个任务，请同志们好好讨论。对于否定一切、排斥一切的问题，当然要注意，但是也要提醒大家，有的省委虽然有戴高帽子的，实际上问题还没有真正

揭开，不要去“和稀泥”。

夺权问题，同志们有很多很好的意见，很好的经验。现在夺权，军管与解放初期不一样，这是在大民主条件下的军管，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军管，军管一定要毛泽东思想挂帅，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军管中可能发生一些矛盾，要放手发动群众去解决，决不能压制群众。军管决不能走到过去工作组的道路上去。

今天就谈这些，下次有机会再谈一次。

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支左支农、工业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

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单位革命群众组织外出串连人员，遵照军委规定返回本单位后，不少单位正开展整风学习，总结前一阶段斗争的经验，准备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有些单位的群众组织返回以后，没有切实执行军委命令，没有进行整风学习，不抓本单位的斗批改，而仍然热衷于搞大串连。有的外出人员迟迟不回，有的同地方群众组织搞串连，不通过当地驻军领导机关，擅自同地方群众组织一起去参加地方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夺权斗争。在与当地驻军发生分歧时，不尊重驻军领导机关的意见，一意孤行，甚至同地方群众组织结合起来去冲击当地驻军。这是无组织无纪律行为，是违反中央二月廿一日的通知和军委一月廿八日命令的，妨碍了我军支左工作和支农业支工业生产的进行。为此，特作如下规定：

一、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各革命群众组织，都要以两三周时间进行整风学习，学习文件，提高思想，总结经验，修正错误，尔后集中精力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一律不再到外地串连，也不要同本地区外单位或地方组织搞串连。所有外出人员一律收回，地区性的和几个单位组成的联络站，一律撤销。地方群众组织，也不能到军队串连。

二、支左、支农、工业工作，是毛主席交给军队的光荣任务，是对人民解放军最大的信任和鼓励，一定要切实作好，努力完成。在这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必须加强领导，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各地区、各城市支左、支农、工业工作，一律由当地驻军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安排，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单位的支左、支农、工业工作，一定要服从当地驻军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不得各行其是。

三、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单位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或者比较好的。凡是未经上级批准撤职或停职的干部，除应在群众帮助下，认真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努力改正外，应该站出来做工作，把本单位的支左、支农、工业和行政管理工作管起来，各革命群众组织要帮助和支持他们领导好这几项工作。

中共中央关于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的问题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一日）

北京怀柔县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的经验很好。材料在三月十二日人民日报上登载，并发表社论，请注意！

中央认为：各省、市、自治区、地、县，都应该参照怀柔的经验，在农业、工业、财贸各方面，成立这样三结合的指挥部，以利“抓革命，促生产”。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出狱问题材料的批示[1]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

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揭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余人的叛徒集团。这些叛徒长期隐藏在党内，窃据了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揭露这个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这批人的出狱，决不是象他们自己事后向中央所说的那样，只是履行了一个什么“简单手续”。他们是签字画押、公开发表《反共启事》，举行“自新仪式”后才出来的。张闻天的材料中说到在狱中的人提出过“三个条件”，同案的许多人都否认这件事，看来是靠不住的，不可信的。

当时在狱中的人，对刘少奇、张闻天这个叛卖的决定，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刘格平、张良云同志坚决反对，拒绝执行，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本来就企图叛党保命，刘少奇的这个决定，就成为他们自首叛党的合法根据。他们不但自己叛变，还诱使和迫使别人同他们一道叛变。

这些变节分子出狱后，由于刘少奇等的包庇重用，把他们安插在党、政、军的重要领导岗位上，其中有少数人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许多人在重新混入党内以后，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

[1]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为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平反。

毛主席最近指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

现将张闻天给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信件及附件，彭真专案小组办公室《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及附件，印发政治局、书记处、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及其他负责同志。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叛徒集团的揭露，应当引起我们全党极大的警惕。

〔附〕 天地有正气（节录）

熊怀济

党中央和"七大"对一九三六年出狱问题作的结论

一九四五年四月，在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在抗日战争战略反攻的前夜，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正式代表五百四十七人，候补代表二百零八人，代表一百二十一万余党员。

党的"七大"召开之前，从前方来的"七大"代表都集中到延安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和审查。从"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出狱的五十二名党员中，有七大正式代表十二人，候补代表二人。这十四名代表中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周仲英、赵明新、吴云甫、王德、彭德、马辉之、李楚离、刘慎之、傅雨田、刘子久等。

一九四四年三月[①]薄一波同志作为"七大"正式代表到达延安。他到延安后的第二天就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五年半的监狱斗争，当他谈到关于上海事变和福建人民政府的那个长期争论时，毛泽东同志说：你们那个争论也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嘛。薄一波谈到狱中党支部规定了反对"反省政策"的方针，强调把身体搞好，学习马列主义，坚定信念，斗争到底。毛泽东同志说：这样做是对的，你们把监狱变成了学校，通过学习革命理论，武装了自己的头脑，保存、锻炼和教育了一批同志，这就是胜利。毛泽东同志还问了出狱的还有哪些同志和他们的情况。薄一波同志作了汇报后，他关切地说：你们这些人来自五湖四海，出来以后又分派到各地去，又回到五湖四海，做了不少工作，是起了作用的。他还要薄一波同志开了个名单。[②]

这次谈话后，党中央书记任弼时同志又找薄一波同志谈话，也谈到一九三六年出狱问题。任弼时同志说：中央完全知道，是刘少奇、北方局向中央建议的，中央作了讨论，让你们出来的。此外，刘澜涛同志于一九四四年冬，周仲英同志于一九四五年一月，都曾分别向中央负责同志汇报过一九三六年出"反省院"的经过。

"七大"期间，中央和各代表团对每个代表都进行了认真的代表资格审查。晋冀鲁豫代表团团长是刘伯承，副团长是薄一波、王从吾。安子文是晋冀鲁豫代表团的代表。薄一波同志

---

① 过去薄一波同志在他写的文章中说是1943年，后经查对，应是1944年。

② 薄一波：《崇敬与怀念》，1981年7月3日《人民日报》。

提出应把他们一九三六年出狱的问题向"七大"作出报告，把过程说清楚，作出结论。

对于薄一波同志提出的这个问题，经代表团审查，认为一九三六年他们从北平草岚子监狱出来是中央根据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由党组织营救他们出来的。因此，代表团同意了他们的代表资格，并报请中央批准。后来，刘少奇、李富春同志告诉薄一波同志：你的建议中央同意了，中央把你们出狱的问题通知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他们还说，其他代表团如提出此问题，也照此解释。

事实上，从一九三六年这些同志出狱，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召开前，中央组织部在审查干部的过程中，都遇到这批同志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出狱的问题。在他们填写自传和向党组织的汇报中，都谈到这是党组织的决定。对此，中央组织部作了认真的调查，证明事实确是如此。因此，"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讨论时，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任弼时同志说明了这件事。他说：这批同志政治上是没有问题的。党组织营救他们出狱，是北方局建议，经中央回电同意的，所以完全不影响他们的代表资格。因此，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对薄一波等同志一九三六年出狱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结论，认为适合代表资格，并提交七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

在选举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时，中央提名的候选人有薄一波、刘澜涛等同志。在各代表团酝酿候选人名单时，中央正式通知，这些同志的出狱，是北方局建议经中央批准的。

党中央对薄一波等同志出"反省院"的问题是经过多次严格审查的，对他们这段历史是清楚地知道的，一直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炮制的大冤案

这样一个经过北方局建议、党中央批准的正确决定，中央和党内许多负责同志，特别是主管这方面工作的同志，都是清清楚楚的。三十年来，党组织一直没有认为有什么问题。全国解放后，一九五〇年，安子文同志又向中央负责同志汇报过一九三六年出狱的经过。一九五三年薄一波同志再次向中央负责同志写了一份关于出狱经过的报告，也批示存档了。为什么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个问题就成了重大的政治案件呢？就成了一个被突然"发现"的、向党隐瞒了几十年的"叛徒集团"？这就必须揭露一个那个"中央文革"的"顾问"、阴险狠毒的野心家康生的丑恶表演。

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有些虽然现象不同，本质却完全一样。一九三一年，当这批共产党员因宣传抗日、组织抗日力量而被捕的时候，日本侵略者提出的口号叫"中日提携，共同防共"。同侵略者的口号相呼应，国民党反动派的口号是"先安内而后攘外"。两个口号都把防共、反共放到首位。八年抗战，蒋介石龟缩后方，宁愿把半壁河山抛给敌人，也日夜不忘"限制异党活动"，多次掀起反共高潮。三年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重提"剿共"的口号，公开向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发动进攻。外国侵略者反共，国内反动派反共，人们都看到了。可是有谁曾经想到，还有些混入革命营垒、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人也在反共？而且，他们行径之卑劣，手段之狠毒，实在令人发指。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康生和林彪的高级幕僚陈伯达就在策划一场反共阴谋。康生是一个残害过大批共产党员的刽子手，而陈伯达恰恰是当年进草岚子监狱之前就在天津叛变出狱的叛徒，进了草岚子监狱后之久，又向敌人写悔过书出狱了。刽子手加叛徒，从共产党内部搞反共活动比起日本人和国民党就高明多了。他们把党的大批好干部打成

“走资派”以后，又上演了一出罪恶滔天的“抓叛徒”的丑剧。

康生对于薄一波等同志于一九三六年出“反省院”的经过，本来是完全清楚的。一九四四年，康生当着薄一波同志的面，赞扬北方局的一大功劳就是营救草岚子监狱的一批干部出狱；一九四五年四月，党的“七大”召开时，康生身为“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成员，对这些同志的问题、中央对这个问题的通知以及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对此事的结论，都是知道的；一九四五年九月，康生找安子文同志谈话，安又向他谈了一九三六年出狱的经过，康生说这件事我们知道。一九四八年，当时以康生为团长的中央土改工作团全体成员回到当时渤海区党委所在地过春节时，康生曾对别人说起一九三六年北平一批党员出狱的问题。康生说：一九三六年，中央分析当时华北形势危急，抗日高潮又已经到来，需要大量干部出来工作，但是很多有经验的老同志都被关在北平狱中，如不及时把他们营救出来，蒋介石就可能把这批同志解往南京。另外，如果敌人很快占领平津，或者华北政权汉奸化后，这批同志就只有全部牺牲。考虑结果，当时中央决定营救他们出狱。

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康生为了打倒刘少奇同志和一大批革命老干部，以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一九六六年八月，康生为了制造这一大假案，把这件事重新提了出来，让某专案审查办公室搞调查，还指使红卫兵去查当年北平的旧报纸，说在那里能查出一大批叛徒。根据康生的指示，南开大学有个所谓“抓叛徒战斗队”，经过“调查”，“发现”了一个由六十一人组成的“叛徒集团”。九月，康生就迫不及待地诬陷薄一波等同志当年在草岚子监狱有“叛变行为”，而“刘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了”。康生的调子一定，其他“文革”干将都争先恐后大造舆论。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戚本禹同总政文工团部分同志谈话时说：“红卫兵小将查出安子文叛党，这些变节分子叛党的最大组织者就是刘少奇。”二月十二日，关锋对参加军训的解放军代表的讲话中说：“安子文，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占据了组织部、监委、工交等很多重要部门，权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执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小将是有很大功劳的，这些人是自首分子，是叛徒。”四月十二日，江青粉墨登场，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煞有介事地说：“小将们的这个功勋可大啦！”“要是没有他们，怎能搞出那个叛徒集团来啊？有六十几个人。他们都占了重要的领导岗位。”康生也说：“北京这六十几个人，只是刘少奇的叛党组织路线、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的一个例子。”五月六日，康生接见中央组织部全体人员时说：“南开‘八·一八’、北航‘红旗’他们组织了‘三六’专案抓叛徒的联合调查团，应该向他们学习。”所谓“三六”专案，指的就是一九三六年被敌人关押在草岚子监狱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几十位同志，执行党中央、北方局的决定，由党组织营救出狱，投入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问题。

由于江青、康生一伙的煽动，从一九六六年九月以后，各地纷纷成立“揪叛徒”的组织，把过去已经作了结论的问题，统统翻腾出来。他们甚至无中生有，栽赃陷害，制造了一大批冤案、假案、错案，很快把一场祸及成千上万人的灾难扩展开来。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在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的操纵下，以中央的名义印发了某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

八月九日，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时刊登《策动叛党就是为了篡党》的文章，说这个“叛徒集团”是刘少奇“背着毛主席、党中央”指示狱中的人自首叛变的；而这些人“本来就企图叛党保命”，刘少奇“盗用党中央的名义”作出的“决定”，“就成为他们自首叛党的‘合法’根据”；这批“叛徒”出狱后，又是刘少奇“欺骗毛主席、党中央”，“千方百计把他们保护起

来”。两天后，《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

在康生一伙的指使下，南开大学红卫兵向当年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同志，追问一九三六年薄一波等人出狱的问题。他们到张闻天同志家，向他追问经过情况，还逼他写具体材料交代。张闻天同志说，事隔数十年，具体情况需要仔细回忆再作回答。

鉴于这是一起重大政治案件，为了回答红卫兵的质问，张闻天同志作了认真的仔细的回忆。但是，对当时的一些具体的细节，确实是记不很清楚了。只有一个关键的情节，就是关于营救薄一波等同志出狱，刘少奇同志曾给党中央写过报告这件事，他是记得很清楚的，对报告中向中央的建议，他当时也是认为可以同意的。但当时正式批准北方局的报告的经过，他就记不清了。为了慎重起见，张闻天同志曾将他回忆的情况，先给康生写了封信，请他查查中央原来的档案，以证实当时的情况。

奇怪的是，康生接信后不予置理；张闻天同志又第二次给康生写信，康生也一直不作答复。最后，张闻天同志只好决定由他个人负责，承认是他批准的。

一九六八年四、五月间，有一天，有两个自称是康生派来的干部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找到张闻天同志。他们对张闻天同志说：一九三六年薄一波等出狱的案件，被你(张闻天）从中把水搅浑了。这案件是刘少奇背着中央干的，你张闻天为什么要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你如再瞎说，后果由你自己负责，你应替你的子孙后代留条后路，等等。

这次谈话后，张闻天同志感到压力很大。事隔不久,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下午,在康生一伙的指使下，竟有一个排的武装，把张闻天同志和他的爱人看守起来，实行隔离监护、进行审讯，直到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日才解除监护。

事情很清楚，康生之所以要威胁张闻天同志，就是怕张闻天同志如实说出北方局的报告是经过中央批准的这一历史事实。因为这样一来，康生一伙诬陷、迫害刘少奇同志和薄一波等同志的阴谋，就可能落空。

在那一段天昏地暗的日子里，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完全疯狂起来了。康生使出了浑身解数：时而亲自出场，时而调兵遣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颠倒历史，混淆是非，伙同林彪、江青、陈伯达一伙，越过党的组织部门，把持了“专案组”，并且砸烂了“公检法”。真正是为所欲为。只要康生写张纸条指名把谁“铐起来”，谁马上就会遭逮捕。甚至周总理发现此事，亲自发出了保护这些老干部的指示，他们也拒不执行。党纪国法被他们糟踏到了何等地步!

尤为恶劣的是，康生一伙采取卑鄙的手法，先是制造一种这个案件是“群众揭发”的假象，然后又把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同志对当时《农口运动情况的报告》写的一段批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塞进他们炮制的《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中去，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印发，使人认为毛泽东同志这段话就是针对“六十一人案”而写的。据此，康生一伙就将薄一波等同志定为“叛徒集团”，并且还借党中央的名义，去欺骗和蒙蔽广大群众。

总之，炮制“六十一人案”这一千古奇冤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就是作恶多端、老奸巨滑、一贯靠玩弄阴谋诡计以欺世盗名的康生。

康生之所以要伙同林彪、江青、陈伯达一伙炮制骇人听闻的“六十一人案”，就是妄图通过分裂我们伟大的党、破坏我们伟大的党，来实现他们篡党窃国的反革命阴谋。

我党领导的民主革命中，始终有两条战线：一条是处在农村的苏区、边区，后来叫解放区；一条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敌占区、国统区，总起来叫白区。正是在这两条战线、两个地区进行了长期斗争，特别是农村的武装斗争，我们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而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进行篡党夺权活动的时候，却把成千上万参加过民主革命的共产党员称为“民主派”，胡说什么“民主派变成走资派”，要统统打倒；他们还把成千上万来自白区、被敌人迫害过的共产党员称为“叛徒”，要统统“揪出来”，用以全盘否定我们党的白区工作。事实上，他们不仅要揪一个草岚子监狱的“北方叛徒集团”，还把魔掌伸向全国，还要揪一个“南方叛徒集团”，揪一个“开封监狱叛徒集团”、“太原监狱叛徒集团”、“新疆监狱叛徒集团”，等等。

历史无情。同一切反动派一样，他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最终被“揪出来”的，恰恰是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货真价实的反革命集团。这帮败类受到了应得的惩罚：林彪死无葬身之地，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被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俗话说：“雪地里埋不住死尸”。他们那个埋藏得很深的“顾问”康生，如今也在阳光下现出了魔鬼的凶恶面目。

〔附〕 身处逆境的岁月——忆闻天（节录）

刘　英

一九六九年二月十六日，一个难答的问题突然提到了闻天的面前：一九三六年春“六十一人出狱”是怎么一回事？提问者是天津南开大学的“抓叛徒战斗队”。

这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若干细节印象已经模糊，但总的经过闻天是记得清楚的。

那是一九三六年春天，少奇同志报告，说有一批干部（六十一人）关在北平草岚子监狱，过去表现好，据监狱内部传出消息，只要履行一个不反共的普通手续就可以释放。当时华北抗日形势迅速展开，急需干部，而狱中同志要得到中央同意，看到领导同志签字的文件，才愿出狱。少奇同志请中央立即决定。事情来得很急（因为如果日本人侵占平津后就不能办了），又是如此重大，闻天当即与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商量，决定予以批准。薄一波、安子文、杨献珍、刘澜涛等六十一人出狱以后，许多同志成为抗日战争的领导骨干。七大召开前夕，审查代表资格的时候，对他们又审查了一遍。闻天对我说，事实就是如此。“六十一人出狱的确是中央批准的。”可是在这个当口重提这桩历史陈案，该怎样回答呢？闻天很为踌躇。

当时以批《清宫秘史》为由头，引发了全国上下抓叛徒的运动，斗争矛头向着少奇同志。报纸上，“中国的赫鲁晓夫”就是刘少奇的代称；如果对此事推卸责任，那么少奇同志“大叛徒”的罪名就更重了。事实并非如此，闻天怎么肯为了一己的安危而使少奇蒙冤受害呢？六十一人出狱本来是那种特殊条件下采取的特殊策略，无可厚非；六十一位同志本身更是在狱中坚持长期斗争的好同志，当然不应为此而蒙冤受屈。但此刻如果明说此事是经中央研究批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也担待不起。闻天考虑再三，决定给知道此案经过的中央文革顾问康生去信，闻天用了一个较为模糊的概念，说此事回忆结果是“经中央批准”，这样回答是否可以，请他查查文件。

闻天接连去了两信，却不见回音。红卫兵"小将"催得急，闻天乃独自承担责任，他答复：六十一人出狱是经过我签字批准的，当时我是中央负责人。并说："我现在记得，当时我没有把此事报告毛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别讨论。"

"小将们"欣喜若狂，又揪出了一个"大叛徒"——张闻天！

闻天反倒有一种轻松之感，这个坎总算是迈过去了，虽然又多了一顶帽子。

可是，阴谋家的卑劣远远超出老实人的意想之外。这事并没有就此了结。

一九六八年四、五月间的一天，闻天突然被叫到经济所受审讯。回来后，他对我叙述了这次审讯的经过——

今天来了两个身穿军服的人，自称是康生派来的。问了一通六十一人案始末之后，严厉地训斥我，说我在这个问题上"把水搅浑了"。他们说："这个案子是刘少奇背着中央搞的，你张闻天为什么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再瞎说，后果由你负责！你应该给子孙后代留条后路！"这明明是暗示我重写材料，把责任推给刘少奇。我当场拒绝了他们，告诉他们："要整就整我吧，我不能说假话，陷害人。"

闻天讲完了这段经过，轻声对我说："我可能会被逮捕。"

果然不出闻天所料，隔不几天，五月十六日，景山后街甲1号我们的寓处开来了一个班的武装，宣布对我们实行'监护'，就地将我们隔离开来，把我们两人分别关在两间冬冷夏热的小屋子里。……

我们被这样分隔拘禁，长达五百二十三天，阴谋家终于没有从闻天嘴里挖出他需要的那句话来。

（原载《回忆张闻天》第334—337页）

〔附〕　须待历史证明的话（节录）

——在哀悼父亲安子文的时刻所想到的

安黎　小鲁　安国　德平

过去同父亲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父亲一向是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的。即使在囚禁中，他也顽强地战斗，任何威逼和利诱都不能使他有丝毫的动摇。

1975年上半年，全国局势从长期混乱中出现了一线光明。这时，突然传来一个消息："六十一人"案已"重新定性"，对父亲这样的人要监禁终身。8月，我们兄弟中有人到过父亲的管制地——淮南。他头一回谈到了专案人员对他诱供、逼供的令人愤慨的情况。

1967年4月，父亲已被"隔离反省"半年多了。专案办公室某负责人忽然亲自找他谈话。这人对父亲说："现在有件头功等着你！只要你能证明刘少奇是叛徒，马上就可以去钓鱼台和中央首长谈话，车子就等在门口。"父亲问"这位中央首长是否就是康生？"这人答："是。"父亲清楚地告诉这人说，他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二十一年，从来没有听任何人说过，也没有从任何材料中看到过刘少奇是叛徒，断然拒绝为他们制造伪证。

1968年1月，父亲被投进监狱。不久，这个专案负责人又来到监狱继续劝诱。他对父

亲说："头功已有人立了，你若能补充证明刘少奇是叛徒，立二功也有很大好处。"并且说："你难道不愿同自己的老婆孩子见面吗?"父亲说："我不仅想同亲人团聚，更想为党工作。可是，我不知道刘少奇是叛徒，有什么法子呢!"这时，这人又历数了刘少奇的四次"叛变"经过。父亲鄙视地对他说："你既然都知道，你就自己写吧!"

专案人员劝诱之心未死。1969年，党的"九大"前夕，这人又来向父亲报告"好消息"："'九大'快开幕了。你如果能证明刘少奇是个大叛徒，绝不能亏待你。组织部长嘛，是做不成了，中央委员还可以有你的。"父亲明确地对他说："以后再不要问这件事了。"这人仍然赖着要父亲考虑，并且给一个"最后的机会"。父亲再一次严正地拒绝了他："不用了，我不知道!"

三次劝诱都失败了，他们就使用暴力逼供。父亲从容地说："手铐脚镣对我不起作用。不给我戴手铐脚镣我这样讲，给我戴手铐脚镣我还是这样讲。"父亲就是这样临难不苟，实事求是，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

(原载1980年7月24日《人民日报》)

〔附〕　血的教训[①] (节录)

方志纯

到一九五二年，新疆监狱的几个大叛徒、特务头子都先后被我们抓住了。可是，谁能想到，十五年后，在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中，当年我们这些在新疆监狱中坚持反法西斯斗争的战士，竟被打成"叛徒"、"特务"抓起来了。

从一九六七年起，我们受到了极严酷的刑讯逼供，这就是林彪、江青反党集团以及他们的摇鹅毛扇的军师康生，捏造的所谓"新疆监狱叛徒集团案"。康生无中生有地诬陷说："这个案子是叛变自首，不同一般，有很大罪恶，是跟国民党勾结起来，有组织有计划地隐瞒潜伏下来，有计划地搞内奸。马明方、张子意、方志纯是首恶分子，结成一个组织，有计划向党隐瞒，销毁证据，掩盖叛徒面目。因此，对这个案子要有决心、有耐心、有信心地搞下去。"

当然，康生要搞我们，真正的目的是想通过整我们来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我们这些人在新疆的情况，组织上是知道的，在延安时，我们就已经向党中央写了报告。康生当时身为中央社会部部长，当然了解全部情况。记得我们从新疆回延安时，康生也到七里铺来欢迎我们。他还"跳上汽车，热烈拥抱住一位黧黑面孔的同志，兴奋地喊出：'你们终于回来了……'。"[②] 他明知我们不是叛徒，但是，现在却要把我们诬陷为"叛徒"，因为这样，那营救我们出狱的周总理，不就成了"叛徒"的"后台"了吗?! 这就是康生的险恶用心。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折戟沉沙，一命呜呼。林彪反党集团垮台后，很多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的老同志都恢复名誉了，可是，我们这个案子却还没有平反，我们这些人还在关着。我知道：康生不死，吾难不已!

---

① 此是方志纯《回忆新疆监狱的斗争》一节。

② 见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二日延安《解放日报》报道。

但是，我就不相信，康生一手能遮天，我们真的要关一辈子？我相信，党中央是了解我们的，毛主席、周总理是了解我们的，组织上是会给我们作出正确结论的。我坚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一九七五年四月四日，“新疆监狱集体叛变”这一错案由党中央宣布予以平反。此时，我们已受了八年的缧绁之苦。

五月，中共江西省委派人向我传达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央文件中说：

“一九四二年九月，新疆军阀盛世才，为达到其投蒋反共的罪恶目的，捏造了所谓‘四·一二阴谋暴动案’，诬陷我党，将我在新疆的人员全部拘禁，于一九四三年春关进监狱，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同志坚贞不屈，惨遭杀害。其余的我党被捕人员，除徐梦秋、潘柏南、刘西屏和黄义明等十五人先后自首叛变没有回延安外，马明方等绝大多数同志，在敌人监狱里表现很好，没有自首叛变。”

“没有自首叛变”！我们等待这个结论，可等了八年之久啊！

从这个文件里，我还知道，张治中先生早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在写给毛主席的信中，就为我们作了证。张治中先生在信中证实，马明方等人一九四六年六月在新疆出狱，没有履行任何反共手续，是他担任国民党新疆省主席时，受我党委托，无条件释放，派专人护送回延安的。张治中先生在信中还称赞马明方等同志“在党中央、毛主席教育下，觉悟高、组织好、纪律好，被反动派关在监牢里，始终坚贞不屈”，是“经得起残酷考验的”。

但是，由于当时还有“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专案组的报告中，把本来是林彪一伙和康生等人制造的这一冤案，说成是“有人揭发”，“立案审查是完全必要的”，而且长期未能向广大干部、群众公布，使一些受迫害和株连的同志，仍然没有得到及时彻底的平反昭雪。直到一九八〇年六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组织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为“新疆马明方案”平反的报告，这个报告，对我们在新疆的斗争以及出狱后的情况，才最后作了实事求是的结论。

报告指出：一九四二年九月，新疆军阀盛世才为了达到其投蒋反共的罪恶目的，捏造了所谓“四·一二阴谋暴动案”，诬陷我党，将我党在新疆的全部人员拘禁，于一九四三年春天关进监狱。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同志坚贞不屈，无情揭露敌人，盛世才恼羞成怒，下令杀一儆百，三同志英勇就义。马明方、张子意等绝大多数同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百子一条心”，既同敌人的毒打、监禁、饥饿等法西斯暴行作“至死不变”的斗争，驳斥了对我党的种种诬蔑；又同叛徒的拉拢、引诱作斗争。表现了无产阶级大无畏革命精神，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没有自首叛变的问题。一九四六年，党中央指示周恩来同志委托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先生，把关押在新疆监狱的马明方等一百三十一人，于同年六月无条件集体释放出狱，并派专人护送回延安。这些同志回延安后，受到党中央和军民的热烈欢迎，毛主席、朱总司令亲切接见慰问了由新疆回来的同志。马明方、张子意代表狱中的同志如实向中央作了报告。方志纯同志代表狱中的同志向中央组织部写了《在新疆反法西斯斗争经过报告》。

就是在这个报告中，中央又一次强调为我们平反昭雪。事实证明，所谓“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案”，是林彪一伙和康生等人制造的一起冤案，应推倒强加于马明方、张子意等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中央还特别指出：因此案受牵连的同志，如尚未落实政策，望督促有关方面抓紧解决。

至此，“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案”，才算是公开的、彻底的平反了。

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冤案虽然平反了，我们却为此付出了几乎是无法补偿的代价。当年新疆监狱被关押人员在“文化大革命”中，为此案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含冤而死的竟达二十三人，他们是马明方、杨之华、冯家树、王伟、杨南桂、陈广竹、李宗林、薛汉鼎、胡子明、白大方、沈谷南、陈谷音、周健、曹建培、安志敏、朱火华、陈旭、陈御风、王东汉、杨一德、胡鉴、陈九柯、刘子平。张子意同志，也由于身心受到严重摧残，长期卧病，于一九八一年五月逝世了。这是一个多么沉痛的血的教训啊！

〔附〕 历史不容忘记（节录）

——记南开大学清查“抓叛徒活动”的前前后后

肖 荻

祸及全国的一场大迫害

那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南开大学造反组织两个骨干在北京图书馆从敌伪报纸上查到高仰云等同志一九三六年经党组织营救、办理出狱手续的材料，一时之间如获珍宝，便向“中央文革”写报告，诬陷高仰云和几十位中央和地方领导同志是“叛徒”，同时以南大“八一八”造反组织的名义张贴大字报，发表《告全国人民书》，抢先把诬陷材料公布于众，自以为是抢到了“爆炸性新闻”！

“四人帮”和康生等人对此备加赞赏，并加以充分利用。他们百般赞扬南开大学造反组织“八一八”和“卫东”抓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有功，关批准同意，“抓叛徒”成员以“中央特许”和“中央专案组”名义，到各地任意抄家、抓人、审讯和查阅机密档案；同时亲自向南开大学两派造反组织的头头部署调查一些老干部的所谓“历史问题”，从而使“抓叛徒”活动祸及全国。

在笔者面前摆着一份历史见证。那是当年南大造反组织留下的原件。其中有一段是这样记载着：

“……我们派出了几十个抓叛徒小分队、几百个专案调查组，调查人员出动了几万人次，行程约一百五十万公里（其长度可绕地球三十七周半）。从海南岛到黑龙江，从天山脚下到东海之滨，从云贵高原到福建前线，从大江南北到长城内外，除台湾、西藏外全国二十多个省、几百个城市都留下了我‘八一八’战士的足迹，共计调查了北京、太原、济南、武汉、开封、南京、苏州、杭州、保定等十二个敌伪反省院材料……”

自然，对立的一派“卫东”也不示弱。后来的“北航红旗”、“西安交大文革委员会”、“北京化工学院”等所谓“联调”更是紧紧跟上，加上各个当地单位内部的造反组织，一时“抓叛徒”热如火如荼。仅据当时南大两派组织宣称，这一活动迫害十二级以上各级领导干部即达一千二百余人。

一场惨绝人寰的大迫害，其矛头恰恰是指向为了建立新中国、为了给广大青年包括这些造反者本人开辟光明前途而呕心沥血奋斗几十年的老同志。

阴谋家的导演

象"抓叛徒"活动中所迫害的"六十一个"和越来越多的老同志，他们的襟怀不但是坦白的，脚步是光明的，而且历史是一清二楚的。

然而，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对这一特殊情况加以歪曲岂不更加蛊惑人心？作为老谋深算的野心家康生自然不会放过这一加害老干部的良机，尽管早在"文化大革命"前，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对六十一人出反省院的问题是审查过的，对他们这段历史是知道的，一直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康生之流还是瞒天过海纵容和导演了这场骇人听闻的大迫害。在十年浩劫那一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周总理值班室针对"八一八红色造反团"要用大传单形式向全国广泛宣传"叛徒"材料的作法，打来电话，"总理要你们把材料交上来。在中央没有审核以前，不能用报纸形式发表"。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这一极其重要的指示，竟公然被造反派肆意篡改和歪曲。老革命家张闻天同志首当其冲，早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就遭受到了"八一八红色造反团"的非法审讯。但他铁骨铮铮，在"六十一人案件"问题上不推诿，不含糊，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独自承担责任。直至一九七六年，他冤死江南。在年老力衰、失去自由的情况下，张闻天同志在肇庆被监护时期写了《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等重要文章，就"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曲折历史提供的教训痛切陈辞。周总理舍生忘死对受冤老干部的尽力保护，张闻天同志无所畏惧地为坚持真理以命相争，他们这大义凛然的光辉形象将彪炳千秋流芳万古！而康生、"四人帮"之流机巧权变诬害忠良，终将在历史审判台上蜷缩在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落。

当法制荡然无存时

不要证据，不许申辩，事实可以随意捏造，剩下的就只有无尽无休的逼、供、信，加上拳打脚踢，棍棒齐飞，视人命如草芥的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

安徽教育学院副院长曹建培同志，是一位一九三七年到延安并于转年入党的老干部，他在接受重任赴新疆开辟工作中，一九四三年被反动军阀盛世才捏造罪名关进监狱，后经党组织营救，同马明方等一百三十一人于一九四六年七月回延安。经党组织审查，曹建培同志的结论是"在狱中政治立场坚定"。但，就是这样一位历经敌人风刀霜剑坚强不屈又已早作结论的老同志，也没有逃脱悲惨的厄运。

一九六七年南开大学造反组织为扩大"六十一个""战果"，派人到合肥和当地造反派一起，对曹建培刑讯逼供达二十九次，那是日夜不休的"车轮战"。有一次从晚上逼打他惨叫到第二天凌晨四点。连续的刑讯毒打，使曹建培同志头、腰、背、腿多处受伤、口吐黄水、血水，直到胃病复发，溃疡穿孔。动手术后第四天、那些狂热的刑讯者为了"在咽气前抢下口供"，又对他进行了连续四天七次突击审讯，终于在三月二十六日凌晨，使曹建培同志含冤死去。

这位坚强的老同志至死也没有承认自已是什么"叛徒"，因为那是诬陷！

"凡是住过反省院的，不分青红皂白，全定为叛徒"，这就是造反组织荒唐的逻辑。在南京化学化肥公司审讯政治部主任方立凡这位老干部时，外来的造反组织手里什么材料也没掌握，硬是把别人在三十年代写的什么启事念了一遍，逼方立凡承认写过这东西。方立凡拒不承认。审讯者大声喝斥："承认不承认，叛徒的案也翻不了！"谁知这一套讹诈式的审问中所念

的材料，竟被当地造反组织抄成大字报公布，使他备受折磨。南开大学去的造反者"放一枪就跑了"，但方立凡同志却被置于绝境。跳楼自杀身亡。

为了人的尊严

中共天津市委对清理南大"抓叛徒"一案给以很大的重视，不仅组织了市属十七个单位进行联合办案，并请中指委核查小组牵头，组织了有关省、市进行协作。市有关部门和南大负责同志组成领导小组，在清理工作中，把主要力量放在调查核实上。

这和当年法制遭践踏的情况，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南大党委首先深入开展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他们对当年曾参加过两派组织的群众，不加歧视；同时不分哪派，吸收其中了解情况并积极向组织反映情况的同志参加校系两级核查班子，充分发挥知情人的作用。这样，很快解脱了大多数，把力量集中到搞清"抓叛徒"一案的来龙去脉，和核查重点审查对象上来。核查，一切都要有足够的事实根据。天津有关各部门的同志们，下大力清理了天津档案馆和其他部门保存的有关"文革"的材料，并到中央档案馆等部门查阅了当年南大两派造反组织上报"中央文革"的有关材料。这些"笨工作"一直做到这样细致：举凡"文革"期间的两派小报、讲用材料、来往信件、大字报底稿、外调介绍信存根、入党志愿书……直至车票的报销存根，都被一一分析整理，按人头建立了一千一百多张卡片。

与此同时，各有关单位开展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取证工作。塘沽盐场为弄清一个有关人的问题，先后到六个省、市五十四个单位进行了细致艰苦的调查核实。

核查工作自始至终在严格的政策指导下进行。只有头衔而错误事实不多的人被实事求是地一一剔除。清查结果，在区别对待的方针下，对一些组织、指挥、策划"抓叛徒"造成严重后果的少数首要分子以及具体指挥刑讯逼供，提供诬陷材料，造成严重后果，而又态度不好的几个责任者定为"三种人"，开除出党，对犯有上述罪错，干了一段但中途退出，态度又较好的人，定为犯严重错误；对于清查属于一般性错误，态度较好的人，则及时解脱和使用；对在过去已作过处理，这次整党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仍维持原结论，但由于罪错实属严重，有的在整党中不予登记。如"文革"中造反起家的陈相文，在十年浩劫中，他派人抄党委书记高仰云同志的家，派人去北京从伪报中查找老干部的所谓"罪状"，到外地大肆宣讲所谓"抓叛徒"的"功绩"，扬言"我们怀着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的决心，杀出南开园，踏遍全中国"！并因此被认为有"功"，一九七一年后，先后升任市委委员、团市委书记、团中央"十大"筹备组副组长，直至"四人帮"倒台后被审查期间仍不老实。在清查中，经过反复调查核实，证据确凿，被清除出党。《天津日报》对此公之于众，并以《大快人心事》为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还有一个学生除了积极参与"抓叛徒"罪恶活动，又有触犯刑律的行为，尝了铁窗风味。这算是两个比较特殊的处理。至于其它人，包括在"抓叛徒"中错误十分严重并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都留有余地，也没有公开点名，期待他们自重、自新。

（原载《蓝盾》1985年第7期）

中共中央转发对需要实行军事管制的厂矿的布告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

现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部起草并经中央批准的对需要实行军事管制的厂矿的布告，转发你们参照执行。这种布告不登报、不在全市广播，只在有关厂矿张贴。

布　　告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奉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对×××厂（矿）实行军事管制，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组成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特任命×××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为副主任。

一、军事管制委员会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首先要从政治思想上支持。也就是要帮助他们认真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掌握党的政策，使他们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壮大，依靠革命群众自己的力量，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搞好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工作。

二、厂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生产和业务工作，在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应当坚决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中共中央二月二十一日批转中央军委一月二十八日命令的通知》和中央有关的政策规定。

三、厂矿全体人员，必须坚守岗位，积极生产，努力工作，遵守劳动纪律，服从上级指挥。建立革命秩序，严格出入制度。

四、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强调摆事实，讲道理，只许文斗，不许武斗。

五、坚决响应毛主席提出的"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减少脱产人员，反对铺张浪费。坚决同经济主义进行斗争，坚决同破坏国家财产的行为进行斗争。

六、为了有利于抓革命、促生产，提倡厂矿内革命群众组织，逐步做到按生产系统和行政单位编组。

七、各单位工人群众之间，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在本单位或本市内进行革命串连，交流文化革命经验，必须在业余时间进行。任何革命组织联合厂矿外革命组织召开大会，必须经过军事管制委员会批准。

八、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成立筹备组织，推动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

九、厂矿一切外出长期不归的人员，限一个月内回到本单位，如在规定时间内仍不回厂

矿者，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直至开除。

十、厂矿全体革命同志必须提高警惕，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加强安全保卫工作，不许地、富、反、坏、右分子乱说乱动。对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破坏国家财产、破坏生产的人，要依法惩处。

十一、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作人员应该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从事生产，从事群众工作，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加强调查研究，发扬民主作风，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并参加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

十二、厂矿全体革命同志，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大破“私”字，大立“公”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厂矿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月×日

中共中央关于各省、市、自治区报纸宣传问题的几项规定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

现在，各省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情况错综复杂，各省市的报纸宣传工作出现一些问题，中央特作如下规定：

（一）各省、市、自治区的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喉舌，绝不能成为一个革命组织攻击另一个革命组织的工具。

（二）各省、市、自治区的临时权力机构建立起来以后，地方报纸应即接受其领导。在实行军事管制的地方，地方报纸应接受当地军管会的领导。

（三）各省、市、自治区报纸的宣传方针，应严格遵守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并参照红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重要社论和评论进行宣传，而不得宣传那些同党中央精神相对立的口号。例如：党中央强调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有的报纸强调革命派内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强调革命派必须大乱，强调革命群众组织之间要打内战，打到底。又如，党中央强调反对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有的报纸却提出一些宗派主义的口号，甚至提出“打、砸、抢万岁”等反动口号。这些都是错误的，应该改正过来。

（四）在报社内部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能控制局面，派别斗争严重的情况下，可以实行军事管制。如报纸不能正常出版，可以出版新闻电讯，刊载新华社电讯和中央报刊上的文章。

（五）报纸上一律不许刊载戴高帽子，挂黑牌子，罚跪，开斗争会等图片。

（六）报纸上一律不要使用那些谩骂的词语，例如：“砸烂狗头”，“混蛋”，“油炸”等等。

（七）对国际问题的发言权集中于中央。对于国际上的重大问题，一切地方报纸都无权擅自发表评论。

（八）报纸要注意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不许泄密。违犯者要追究责任，严重的要受到党纪国法的处分。

（九）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报纸上都不能发表攻击人民解放军的文章和报导。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应当立即处理。

（十）实行军事管制的地方和单位，包括报纸和广播电台，都一律不要在报纸和广播中公开宣布军事管制。

中共中央通知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

各省、市、自治区一级的夺权，在采取行动之前，应事先取得中央同意派代表来京同中央商量。没有经过中央同意，不要成立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不要在地方报纸上报道和广播电台上广播夺权。

中共中央给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

工人阶级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力量。

毛主席号召你们，党中央号召你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希望你们在这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中，在这个新的条件下，更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成为现阶段全国劳动群众抓革命、促生产的最出色的模范。

希望你们成为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模范。

希望你们成为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模范。

希望你们成为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的模范。

希望你们成为实行革命大联合的模范，成为反对小团体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风头主义、反对经济主义、反对自私自利的模范。

你们应该巩固劳动纪律，坚持民主集中制，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和文化大革命的良好秩序。

你们应该按照党中央的规定，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在八小时工作制的以外时间，坚持文化革命。不许在生产时间内，擅自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要同一些无故旷工、敷衍了事的不

良现象作斗争。

你们应该按照党中央的规定，在文化革命中，促进自己的思想革命化，多快好省地进行生产，保证产品的质量，力求产品的高质量。要同一些不顾质量、浪费国家资材的不良现象作斗争。

一切厂矿职工，都必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研究精兵简政的经验。既要大大减少脱离生产的人员，又要大大提高工作的效率。要注意节约闹革命。工人组织中的工作人员，一般都不要脱离生产。

一切厂矿职工，都必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高国家主人翁的伟大责任感，好好保护国家财产。如有破坏国家财产的人，必须按照国家的法律，严格惩办。

党中央号召，一切在厂矿中工作的革命干部，应该带头做好各项工作，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生产计划和国家建设计划，尽最大的努力。

党中央相信，一切厂矿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过错误的同志，应该严格进行自我批评，应该在文化大革命中，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当好群众的小学生，在工作中改造自己，将功补过。犯过错误的干部只要这样做，工人群众就应该谅解他们，支持他们工作。对他们的批评，要采取毛主席历来指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

混进厂矿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绝对不许乱说乱动，破坏生产，破坏职工之间的团结，制造和挑动派别纠纷。对他们的处理，可以根据他们的政治立场、劳动态度和厂矿的具体情况，分别对待。

党中央决定，人民解放军大力协助地方，支持工业生产工作。你们应该很好地同人民解放军的同志合作。

建议厂矿的全体职工，在业余时间，认真讨论中央发给你们的这个信件。

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团结起来！

祝你们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业生产的双丰收而英勇奋斗！

(这封信要在一切厂矿和基本建设单位中宣读和张贴)

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三月十八日的布告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

现将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三月十八日的布告转发你们参考。各大、中城市如有类似情况，可以参照办理。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反动派，必须"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

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果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

首都广大红卫兵和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把一批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社会渣滓遣送回农村监督劳动。这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意义。近几个月来，有些被遣送走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私自返回北京，有的妄图翻案，无理取闹，进行破坏活动，扰乱社会秩序。

为了加强对敌人的专政，维护首都的革命秩序，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特颁发《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希一律遵照执行。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

〔附〕 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

一、凡被遣送的下列人员，原则上一律不准返回北京，已经回来的应立即返回原遣送地，接受革命群众监督改造。

（一）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包括摘了帽子后表现不好的）；

（二）查有实据漏划的地、富、反、坏分子；

（三）表现不好的敌伪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

（四）表现不好的反动会道门中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

（五）表现不好的反动党团骨干分子；

（六）坚持反动立场的资本家、房产主；

（七）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和解除管制后表现不好的分子；

（八）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

（九）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

（十）有流氓、盗窃犯罪行为，屡教不改分子。

原来依靠上述十种人生活的家属子女，已回北京的，一般也应动员他们返回原遣送地。少数确有正当理由、在京又有亲属抚养的，也可以不回原遣送地。已在迁入地安家落户的，就不要再回北京。

二、被遣送后返回京的人员中，有下列情形的，可以在本市给予安置：

（一）不属于第一条中所列十种人的人员，已经返京的应予落户。原来在机关、厂矿、企业、学校内部的，由原单位妥善安置；

（二）十种人中，被遣送去沿海、沿边地区和国防要地，已经返京的，可予落户。

上述两类人，已在迁入地安家落户的，就不要再返回北京；

（三）十种人中，年老病残，不能单独生活，原籍无依靠，北京又有人赡养的，以及个别有其他特殊情况的，可予落户。

三、那些人可以在本市安置，应由原单位的或街道的革命群众组织提出意见，经有关行政领导和公安机关审查批准。

四、应该返回遣送地的人员，必须立即离京，违者由革命群众组织和公安机关强制遣送。无理取闹和有破坏活动的，根据情节依法处理。

五、凡遣送到本市各县的，当地基层干部和革命群众应当顾全大局，做好遣送回乡人员的安置工作，不要让他们返回市区。

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

目前，各地区、各学校、各机关、各企业事业单位，正在集中力量，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建立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同时，在外地、外单位串连的学生和群众，刚刚返回本地、本单位，斗、批、改的任务很繁重。因此，中央决定：继续停止全国大串连，取消原定的今年春暖后进行大串连的计划。希望各级领导向学生和群众妥为解释。

这个通知可在城市、农村和部队中张贴。

中央军委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

为了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阶段形势的需要，集中力量完成毛主席赋予军队的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等项重大任务，军委决定：

一、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的"四大"，一般在三月底左右暂告一段落。除了照顾战备、援外和必需的工作外，视情况抽调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的人员，立即投入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工作。这些单位究能抽调多少人员，何时开始，由各总部、军兵种党委讨论决定。

二、各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包括各军区所属的这些单位），可在整风告一段落后，立即全部投入上述工作，作为这些单位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步骤。这样做，既可以增加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力量，又可以使这些单位的人员，更好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向工农群众学习，促进思想革命化。这些单位的整风何时结束，能抽调多少人员，何时开始，由各总部、军兵种、大军区党委讨论决定。

三、各总部、军兵种(包括在北京的所属院校)抽调的人员，由总政治部统一分配、使用。驻各军区所在地区的院校抽调的人员，统一由各大军区、省军区领导、调配和使用。

中共中央关于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处理红卫兵抄家物资的几项规定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

现将中共广西梧州市委文革小组关于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红卫兵抄家物资处理意见的请示，转发给你们，供参考。为避免这类物资受到损失，望各地从速处理。中央特作出如下几项规定：

一、查抄地、富、反、坏、右或其它不法分子的财物，除日常生活必需品退给本人（如原物已遗失或损坏则不退赔）以外，一律上交。

二、确属革命群众和劳动人民被错抄的财物，应全部退还本人。原物遗失或损坏者，做价偿还。

三、贪污、盗窃和私用查抄财物者，应自觉退出上交，否则严加处理。但被小集体用于文化大革命的少量消费物资或现款，经说明情况，可不予追究。

四、地、富、反、坏、右或其它不法分子，不准借处理查抄财物的机会，喊冤叫屈，反攻倒算。违者必须严加惩办。

(此件发各级党委内部掌握)

关于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红卫兵抄家物资处理意见的请示

区党委文革小组并中央文革小组：

我市在去年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之后，于八、九月间红卫兵对一些四类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抄了家。这些物资至今尚未处理。春季已到，南方雨水多，保管不好或不及时处理，就会霉烂和丢失(已发现有被偷盗现象)，我们意见：

一、属于黄金、白银、外币和大量人民币(以一户有数千元以上的)，予以没收或代管。

二、属于高级生活用品，如高级皮衣、手表等类物资，予以没收。

三、属于普通生活用品，如布料衣物和一般生活用具等归还原主。

四、这些物资在抄家时已损坏的或保管不善损坏和丢失了的讲清楚，不予赔偿。

以上意见当否，请速复电。

中共广西梧州
市委文革小组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一日

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

我今天要讲三个问题。第一、讲阶级、阶级斗争、阶级观点的问题；第二，讲主流、支流的问题；第三、讲军队支援地方的问题。

前几年，毛主席就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的问题。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可是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面，阶级斗争这个问题，却变得容易被忽略，好象没有阶级斗争了。我们毛主席就特别地强调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这一点，有些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没有注意，更不用说修正主义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了。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毛主席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大发展了。

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后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讲过，自从有了文字以后的人类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从原始公社崩溃瓦解以后，人类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列宁更进一步了，他强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还有尖锐的阶级斗争。

列宁在《向匈牙利工人致敬》一文中说："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象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强调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较强大的敌人——资产阶级进行的最无畏和最无情的战斗。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古今中外，阶级存在的社会领域里面，最基本的问题，影响一切的问题，是阶级斗争的问题。**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每一个人在思想上都有阶级的烙印，没有一个人不是属于某一个特定的阶级，总都是隶属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一定的阶级。这种社会阶级是人类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所产生的现象，区别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也区别于将来的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种阶级存在的事实，经历几千年的历史，贯串于各个方面。这种阶级斗争的存在，来自一定的经济基础，反映到上层建筑，就形成了政治、法律、文化、宗教、道德、政党、政党里面路线的分歧、政策上的分歧、社会上的风俗习惯的差别。这些分歧和差别，处处都有阶级的烙印，处处都是由于阶级、阶级斗争这个根源引起的。

因此，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所有现象的总的根源。离开了这个总根源去观察社会

现象，就观察不出来，就会观察错了。它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它这个客观的存在不是不影响我们的思想，而是或者不知不觉地、或者有意识地，自觉地来影响我们的思想。我们共产党，就是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来影响我们的思想，自觉地指导我们的思想，自觉地指导我们的路线，指导我们的政策。我们的路线和政策，如果离开这一点，就会犯错误。我们观察人，观察事，离开这一点，就会犯错误。如果我们不自觉，不重视阶级、阶级斗争，阶级观点，不注意阶级分析，就会变成客观主义。而客观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一种思想体系。这种客观主义的思想，在表面上是否认阶级的。但是，实际上用这种形式来掩盖它的阶级的面貌，阶级的愿望，阶级的政策，阶级的行为，便于欺骗群众。

整个的社会，几千年来都是处在阶级、阶级斗争中，阶级斗争通常采取三种斗争形式来进行，一种是思想战线；一种是政治战线；一种是经济战线。可是这三样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有的时候以这一个为主，有的时候由那一个为主，可是它总不是孤立的。所以，它这三个方面是统一的东西。

阶级斗争在各个时期，由不同的阶级来出现，采取不同的阶级对抗形式。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奴隶主和奴隶、地主和农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等等。当然，每个国家发展的阶段不同，在不同的阶段，每个国家都有两个主要的对抗的阶级。当然，同时也总会有其他阶级的残余，或者新的阶级的这种苗头。

我们的国家，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从一九四九年以后，开始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毛主席说："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的矛盾、对立、对抗、斗争，成为我们全部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一个总根源。不把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看成是阶级斗争的现象，那就会把事情混淆起来，是非颠倒起来，就是回到一种所谓全民观念，就会把个人看成是孤立的个人。人哪，任何人都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人，他总是社会的人。正如医生给我们验血的时候，他抽出一滴血来，就看出全身的红血球和白血球，酸性和碱性的这些变化。这一滴血就代表你的全身。你一个人的活动，就是一个阶级整体的一种表现。

所以，没有这种无产阶级观念，看一个人就会看错了。对于每件事情的评价，每个问题的作法就会不同。例如：对老干部的看法，就可能认为一切老干部都好得很。其实，对老干部，是必须做阶级分析的。有很多老干部是保持了原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可是有些老干部，进到社会主义时期，没有跟得上，没有变成社会主义革命的战士，而是停留在旧的民主革命阶段。有些就蜕化变质，变成资本主义分子，变成新的资本主义分子。他到底怎么样？是好，是坏？只有用无产阶级的观点来看他。不会是统统变成资本主义分子，也不会是统统变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青年的看法也是这样：或者说这些青年在冲你那个单位的时候，就说他们统统都是坏的；或者是另一种观点，说他们统统都是好的。其实，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很多人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的，但一定还有属于资产阶级的分子，以及其他的社会成份，地、富、反、坏、右分子。干部子弟也是这样子，有的是无产阶级分子，有的蜕化变质成资产阶级分子。

没有无产阶级观点，对所谓"乱"的问题也就看不清楚。实际上，这次的乱有两种。一种是主要的方面，是把敌人、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的资产阶级的头头、社会上面的资产阶级的头头，把它们打得落花流水，把他们打乱了。这样的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是很好的事情。当然，是两方面对立的斗争，无产阶级这方面也有个别误伤的，

干部中间也有个别误伤的。但这是个别，而且可以保护下来。

没有无产阶级观点，对文化的看法，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评价。只有用无产阶级的观点才能甄别出那些是好的，那些是坏的，而没有这种观点就甄别不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深刻的阶级斗争。这次斗争，首先是资产阶级发起的，然后，无产阶级反击。首先是通过思想斗争，然后逐步进到政权的斗争，以及经济上的斗争。整个斗争中间出现许许多多复杂的现象，但是，辨别那些可取，那些可舍，那些是是，那些是非，只有从阶级的观点上，从阶级斗争的观点上，就是说，从阶级、阶级斗争这一个总根源，才能够弄得清楚。

在我们党内，毛主席是最正确的，是革命的，代表无产阶级的。而刘、邓是错误的，反动的，代表资产阶级的。一个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一个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就形成了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这个阶级斗争，不会是一个短时期的斗争，是一个比较长时期的斗争。**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划时代的著作中早就指出：在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毛主席又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

许多人在不同的程度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方面的倾向和无产阶级方面的倾向。只有毛主席这种最高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准的人，才能排斥、克服、肃清资产阶级的这一面。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准稍微低一点，在自己脑子里面，就多多少少还存在着这两个方面的斗争。推翻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政权是在较短时间可以完成的。推翻它的所有制，短时间也可以完成。可是，推翻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在思想里面的阵地、这是很不简单、很不容易的，需要很长的时间。而这个战线上如果不打胜仗的话，那么，政权方面所取得的胜利和经济方面所取得的胜利，可以前功尽弃，我们一些老革命过去所奋斗来的这些成绩，革命的果实，广大人民所奋斗来的这些革命果实，可以悄悄地被资产阶级偷去了，窃取了，或者明火执仗地把它夺去了。

因此，我们应该在思想战线上展开激烈的斗争，展开持久的斗争，我们才能保证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才能够保住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巩固和向前发展。不然的话，政权要悄悄地改变颜色，或者要发生剧烈的反革命政变，资本主义所有制要重新代替社会主义所有制，地主富农的所有制要重新代替我们现在的人民公社所有制。所以，这一个斗争胜败，是决定中国向何处去，决定中国的命运，也决定影响整个人类的命运。因为就现时说，中国可以说是在世界上起决定因素的国家。对于革命说来，对世界革命说来，现在的中国是一个起决定因索的国家。任何国家，如果在这点上比较的话，无论如何，没有中国的作用大。只要中国不倒，中国不变色，世界就有希望。多数地方都修了、都黑了，我们还可以影响它重新光明起来，重新由黑的颜色变为红的颜色。何况现在世界各地革命力量或者已经起来，或者正在起来，要革命的总是多数，希望我们给予支持。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很重要的大事，关系国家命运，关系人类命运的大事。这是无产阶级进行的非常严肃的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战胜一个阶级，或被一个阶级所战胜的问题。因此，我们要特别加强阶级的观念，阶级斗

争的观念，我们才有劲进行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才有决心来进行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才能够跟得上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间这种伟大的气魄和勇气。不然，我们老是跟不上，而且老是犯错误。本来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可是在新的情况下，重新提醒，那还是有作用的。我们写的座右铭，不是天天贴在那个地方的嘛，背也背的来，但是经常看看总会有点好处，而且今天尤其必要。今天的思想动态，今天的活思想，从上到下，从下到上，都实际上存在着这个问题。因此，我们需要把这个问题重新提出来，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一点。

第二，就是讲讲主流和支流的问题。

毛主席有这样的话："这些同志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应当指出：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这是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不看清楚主流，就会发生迷失方向的问题。任何时候的事情，总是有主流和支流的、总有顺的地方，有逆的地方，有正的方面，有反的方面，不会只是一个方面。可是这两个方面任何时候都不会是绝对平衡的，都不会是半斤八两的，它总是有重有轻，它总是处在变动的中间，一下这个轻那个重，一下这个重那个轻。它不会象机械那样保持平衡的，机械经过过细观察的时候，它也是在变动的，至于其他的东西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肯定是有两个方面，两个方面不会一样，肯定有一个方面是主，一个方面是次。

现在我们看看这次文化大革命到底主流是主要的，还是支流是主要的。当然，主流是主要的。可以说这场阶级斗争中，我们是打了大胜仗，得了大胜利，中国人民的大胜利，人类的大胜利。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总的看法。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就认为，不要怕乱。这次果然经过这个乱出现了很多的好事情。我找了一些同志谈了一下，他们高兴极了，情绪非常之高，他们觉得好得很。经过这一个乱，就把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分子，头目，和四旧，打得狼狈不堪。对他们来说，是真正的乱，使他们遭受惨重的失败。他们会感到是一种惨痛的失败。不经过这样的大的运动，要想取得这样的结果是不可能的，是不能够打倒他们的。运动搞出了很多的牛鬼蛇神，很多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些人如果不揭露、不打倒，他们就要公开推翻毛主席所代表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整个这一套。我们通过一个表面上很乱的形式，把他们打倒了，这是伟大的胜利。当然、假若他们夺权以后，得势以后，革命群众还会造他们的反就是了。可是那时的牺牲，就会比现在大得多。这从表面上看来，好象是乱，也付出一点代价。但是，我们的事业是在向上发展。例如生产，有些地方还上升。抓一下就上升了。今后抓下去，还会大高涨，会出现新的高潮、新的兴旺的高潮、发展的高潮。所付的损失，少数人觉得很大，其实，比起世界各国任何一次大革命都小得不能比拟，也比不上我们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甚至比不上一次小的战役，一场不大的流行病。当然，毛主席是从头到尾强调文斗、不要武斗。所以说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可是，有的同志看到自己的几个熟人挨了一下斗，就觉得天下整个都黑了，就很容易产生这种错误观念。其实，那是一种暂时的现象，而且属于很末尾的现象，很次要的现象。我们看到打倒那一批坏家伙，这就是伟大的胜利啊！如果不打倒他们，将来还要大流血，他们得了势，就会要实行大白色恐怖来镇压革命群众，不知道要杀掉多少人就是了。**正象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提醒我们的："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

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假定那种情况出现，我们革命人民还要用革命战争反抗他们，推翻他们，但那样就还要死好多人。

这一个主流、支流的问题，是很清楚的。

另一方面，不经过这一个运动，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很多好人也看不出来，接班人也看不出来，新的苗子也发现不了。在这一次斗争中间，坏人固然揭露了，斗倒了，斗臭了，斗垮了，好人也涌现出来了。这就保证了今后的百年大计。许多好人，很多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涌现出来了。不然，他们是处在九地之下，压得很低，冒不出头来。打倒了坏人，发现了好人。没有这一场革命，坏人打不倒，好人发现不了。我们的领导将来就可能落在坏人手上。这次革命是最好了，是采取打倒他们的最好的办法：搞红卫兵、大鸣、大放、大字报等等。红卫兵就是捉拿牛鬼蛇神，捉拿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头子的天兵天将，起了很大的作用。当然，起最主要的作用的，还是我们毛主席。还有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党内走无产阶级道路的同志，广大的群众，广大的革命左派。

同时，除了打倒坏人，发现好人以外，还挽救半好半坏，差一点要滑下去的人，挽救了一批干部，使他们悬崖勒马，及早回了头，没有更深地陷下去。经过这场大震动，使这些同志不陷下去。和平生活过了十七年，有些人是变了，有些人也到了边缘上，这个运动，是把为数不少的人挽救了。

坏人打倒，好人发现，中间这部分人挽救过来，这是重大的成绩。我们打倒的那些，不是凭一个宗派的原则去打倒的，而是根据一个政治的原则，根据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反动派，是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毛主席，是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据这样的原则来打倒，或者是发现，或者是挽救。这是有原则的。不管那个山头，只要是站在无产阶级这一面，站在毛主席这一面，我们这一次统统是保的。不管那个山头的，站在反无产阶级的那一面，站在反毛主席那一面，反社会主义那一面，那就是有的要打倒，有的要半打倒。这样，就是解决了很大的问题。这样子，今后所出现的局面就会根本不同，会保持我们的政权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革命的政权，是清除了那些修正主义分子的政权，是能够保证我们思想革命化的政权，是能够保证我们社会主义生产更加发展的政权，是能够保证我们更便于对抗外来侵略战争和支援世界各国人民革命的政权，是能够保证我们镇压颠覆活动的政权。这样的政权，也就能够保证我们更顺利地应付各种困难、天灾或者人事方面变化的问题。所以，在这一方面，胜利是很大的。

同时，在思想方面，就是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一个大的革命，把新的思想——毛主席思想空前地普及，把人们的精神面貌、政治水平，都提高了。毛主席的思想可以说变成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小孩儿都能够讲得出几句毛主席的话来，这是一种很好的气象。思想上的这种变化，是很大的。今后还要继续地坚持下去，把毛主席的思想变成全国人民的行动的纲领，行动的指导，必修的功课，这是保证我们不走错误道路、保持革命到底的重大战略措施。

这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苏联没有进行，因此苏联人民受了大害。伟大的十月革命，到今年恰恰是整整的半个世纪，可是，现在苏联的领导集团不但没有沿着列宁的道路前进，相反地，他们倒退了。还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前后沦落为修正主义国家，成为变相的资本主义国家，成为变相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成为变相的法西斯国家，用最欺骗的面貌来欺骗群众。

我们有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度智慧、魄力、经验、威望，举行了这个史无前例的震撼全国、全世界的大运动，这是有伟大的意义的。不然，我们经过二十八年的民主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和十七年、十八年来社会主义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可以付之流水，付之东流，可以前功尽弃、可以毁于一旦。毛主席所进行的、所发现的、所领导的这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同马克思、恩格斯创造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影响全世界，如同列宁、斯大林建立了在一个国家之内取得了无产阶级的政权和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这种胜利。

我们一九四九年那个时候的胜利是个什么胜利?是夺取政权的胜利。这一次是保卫政权，巩固政权的胜利。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一些国家实现了，可是大多数都保不住。那里被资产阶级用狡猾办法，资产阶级的影响，剥削阶级的影响，外国的帝国主义的影响，自己本身产生的一批资产阶级分子，把政权变了性质，国家变了颜色。阶级斗争是不能以调和的办法解决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条定律，如同数学上、物理学上、化学上的定律一样，是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定律，是不能掩盖的。对于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只有把它揭露，只有把它暴露，只有把它打倒，只有把它战胜。你不打它，它要打你。这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树不动，风总是要吹得你动。这是流传的语言。这句话有道理。其实，我们不是个树、我们应该成风，我们要刮他们的风。当然，他们要刮我们的风，但我们也要刮他们的风。我们刮它十一级、十二级的台风，来摧垮他们。单纯的消极防御不行，要采取主动的进攻。我们过去一段时间的防御是必要的。但是后来这一时期采取主动的进攻是尤其必要的。今后有的时候还可能转到防御，但有的时候还要采取大规模的进攻，或者小规模的进攻。

以上所说，就是：我们对于文化大革命，要看到事情的两方面，要看到那一方面是主要的。如果不看到主流这一方面，只看到自己一些老同事挨点整，就把整个天下都看黑了，那就全错了，那就糟了。那就上了敌人的大当。

看不到主流，就会迷失方向。而且，毛主席已经及时地采取了一些措施，采取了很多具体的政策，来去掉支流中那些不那末健康的东西。我们要看到，不管怎么样，要看到这个伟大的胜利，要欢呼这个胜利，庆祝这个胜利，巩固这个胜利，发展这个胜利。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讲讲军队支援地方的问题。

毛主席在古田会议上教导我们："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毛主席还经常说，我们军队不仅仅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不但要会打仗，而且要会做群众工作。这是毛主席的一贯的教导。从红军时代直到最近。所以我们军队同世界上的一切的军队不同。其他的军队就是个打、就是打仗，其它的不管。我们军队还担负着这样多的任务，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军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队。我们的军队不是单纯地执行军事战斗任务，应该义不容辞地、责无旁贷地来支持地方。军队和地方实际上是一个整体。军队离开地方就不能存在，不能存在，不能存在。地方越搞的好，你军队就越好打仗嘛，地方越搞的不好，你军队就越不好打仗嘛。兵员靠地方，吃的靠地方，穿的靠地方。打仗的时候，封锁消息，切断敌人的电话，都靠地方嘛。侦探敌人的消息，伤兵抬到后方去，都靠地方嘛。所以，不把地方搞好，军队就好不了。在座的同志们有不少是经过长征走过草地的吧，那个时候沿途就是没有地方工作。我们的人，老实讲，给国民党正规军打死的不

多，主要是给地主武装打死的。我们那个部队，过草地这一段，国民党没打倒几个人，主要是没有根据地饿死的。在江西的时候，一个连一百多人，后来一个连就只剩下了二三十个人、十来个人。所以我们必须要搞好地方工作。毛主席有个老办法，要打仗先要创造战场。什么叫做创造战场呢？就是把我们军队分散，以连为单位，以排为单位，到处去打土豪，分田地，帮群众建立党，建立政权，做群众工作，让那个地方变成根据地。变成根据地了，敌人进来的时候，就进入了迷魂阵，我们在什么地方躲着，他们都搞不清楚，结果他们就是草木皆兵，一草一木都变成了红军，即使没有红军的地方，他们也觉得有红军，要拿队伍去对付，有红军的地方，反而没有去对付，结果就遭我们的袭击，他们在整个的战争中都是被我们袭击打败的。我们所进行的人民战争差不多都不是那种堂堂之阵，那样子摆开来打的，而是在群众的掩护之下，把他们打掉的。但有的时候没有群众，我们就困难了，例如，刚才我讲的长征啦，过草地啦。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后，到了那些没有群众工作的地方，又重新吃了苦头。兵没有补充嘛，粮食没有嘛，消息被封锁嘛，被反动派欺骗的少数人还放冷枪，这些，同志们都知道。我们中央苏区那么点队伍，能够抗击几十倍、十倍，八倍的敌人，可是一脱离了根据地，困难就多啦，人家就敢向前冲，我们就怕有伤兵，一个伤兵就几个人抬，士气就不旺。所以，搞好地方工作是个大事情，从军队的观点来说是个大事，从全国来说那更加是大事。

毛主席、党中央很信任人民解放军，搞军管、搞军训、支援工业、支援农业、支援左派，好多重大的任务。这种种任务，光荣是光荣，伟大是伟大，但是，是新的任务。一方面证明毛主席、党中央相信军队，另一方面我们军队责任是很大的，任务是很新的，过去还没有这样子搞过。有些当然搞过了，不同的程度搞过了，但是没有这样的抽出军队去这样子搞。至少十七年来没有这样子搞过。我们一方面固然要勇敢的、负责的、积极的来承担这些责任，来完成任务，但另一方面因为是新的，又是复杂的，所以搞得不好就要犯错误，或者是犯右的错误，或是犯"左"的错误，特别要警惕犯右的错误。全国各个地方都有军队，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实行军管，用了很多干部，十七年来还没有这样干过。这个事情是要看到有一种危险，有犯错误的可能。我们一方面要勇敢执行任务，但是要非常谦虚，非常谦虚，要非常细心。

支援地方，总的方面还是抓革命，促生产。不要只抓革命，不促生产了，把生产停顿下来。也不要只搞生产，把革命停顿下来。我们应该同时进行，而且应该以革命来带头，来挂帅，来促进生产。在革命的期间，当然应该以革命来带头，但是同时我们不能不搞生产。所以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但也不能等量齐观。革命期间要抓住革命。就是将来这个大运动过去以后，也始终要由革命、由政治来领导经济建设。但这不等于说，我们一到地方就只搞革命，放松了生产。生产是不能放松的，生产放松了，会发生非常大的危险，会转过来破坏革命。因此，我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就重要性来说，要把革命摆在第一位，可是就时间上来说，生产的时间应该占得多。

一般的说，生产的时间要更多。文化革命和生产，二者是统一的，但又是有差别的，要分别对待。

地方有各派，左、中、右，要坚定不移地站在左派这一边，而不能站在右派那一边。我们派出干部的时候，要交代清楚，自己本身就应该是很好的左派。你派一些右派分子或者政治上糊涂的人去搞，他一定搞不出好事来，一定不会或者不懂支持左派！所以要站稳立场，还是回到我刚才讲的第一个问题，阶级问题，要站稳阶级立场，站稳这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

立场。这样子的支援，就是好事。不然，可能帮倒忙，那就危险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有很清楚的头脑，不能有点含糊。但是，左派、中派、右派有时搞不清。有搞错了的，本来想支持左派反而支持了右派，所以一定要照毛主席的老办法，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老办法，就是要唯物论呐！要调查研究，搞清呐！

我们支持左派，支援地方，首先应该从思想上支持。现在各个地方搞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个办法，是大家创造的好办法。就是这么办，就要思想上的支持。毛主席思想，党中央的政策，同群众结合起来，变为群众自己的政策，自己的思想，群众自己懂得了，他们动起手来办，比我们包办代替，那就好多了。只要他们知道这一套思想，这一套政策，没有我们去，或者我们走了，他们也完全能够办好！否则，你人在，这一套就在，人走了，这一套也就走了。能够扎下根来的还是思想。所以，要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这是关系我们国家命运的，保证我们国家兴旺的最根本的措施。我们在军队内部固然要如此，到地方上，也要把思想工作这件事当作最主要的事情来办。

刚才讲到了要注意调查情况、弄清情况以外，还要报告请示，碰到重大问题要报告请示，不要以为自己的想法当然是对的。这种想当然，自以为是，常常同党的口径、党的政策差的满远！满远！满远！才不是那么回事情!才不能那么办的!所以重大的问题一定要向上级报告请示，要养成报告请示的制度。现在军一级的同志要办很多事，你们就是要经常向中央报告请示。

不能随便抓人，的确查清了是很反动的头头，不得已才抓起来，一般的少抓。我们已经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我们要掌握这个政权，实行这个政权的专政职能。但是，多抓不如少抓好。几个很反动必须要抓的，一定要断然抓起来。

一般地都不要开枪。总的精神就是不要开枪。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情况，用不着开枪。有个别同志性情急要开枪，可不能开枪！这是重大的问题，要注意报告请示。

我们搞军管的，是革命的“三结合”还不成熟的地方。军管是一个暂时的过渡的作法。因此，一切事情，还是要支持地方的新生力量，左派的力量，把他们支持起来办事情，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整个的工作不能采取包办代替的办法，只能协商，只能帮助，只能临时代管。有些同志可能调到地方去做工作，这是另一回事。在军队干部没有撤回来之前，一定要搞好一个新的班子，搞一个好的班子，不能马马虎虎地走了。原有的班子我想是有五种情况：一种是基本上好的，只有个别坏人；一种全部烂掉了的，那只好搬掉了；一种呢，烂掉一半，那就只搬掉一半就是了；一种呢，烂掉了一小半，那就搬掉一小半就是了；一种是烂掉了大半，那就搬掉大半就是了。总而言之，不能一概搬掉，也不能一概保留。要分清楚五种情况，分别处理。要看具体情况，分别处理。总的原则，就是团结大多数，要很具体地体现毛主席所说团结百分之九十五这样的道理。

这次搞好一个好的班子，是百年大计。政权就是这个班子的问题，班子搞好了，能保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执行，无产阶级的利益就有保证。一个坏班子，就不能够保证毛主席路线的执行，不能够保证无产阶级的利益，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向前发展。所以搞一个新班子，是当前面临着的一个迫切事情。怎么才能搞好一个新班子，是大问题。我们搞军管的时候，要把这个问题，很慎重很慎重地来注意，而不要把这样一个政权问题，轻率地处理。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嘛！你不通过政权，经济问题不能解决嘛！你不通过政权，文化上问题不能解决嘛！那些反动东西就没法打它嘛！所以，一切阶级斗争，是政治斗争，也就是政治，归根到底是政权。这是马克思主义讲的，是毛主席讲的，我们要以严肃的态度来对待。

关于支援地方，现在还没有成套的经验。初步想到这些。

我们要看到，这些任务很大，很重，又新，我们要勇敢负责，但是要很谦虚谨慎，这许多必须注意。当然，应该注意的事，还绝不止我上面说的这些，你们还可以讲许多，工业怎么搞，农业怎么搞，军训怎么搞，等等。我们必须边做边总结经验。这是我们毛主席历来的作法，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

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些。

我总共讲的问题，就讲完了吧！三个问题：就是阶级观念，主流和支流，支援地方。这些问题已经提过，现在只是一提再提吧！三令五申吧！注意又注意吧！无非是起这个作用。

另外，我讲一个单独的零碎的问题。最近我发现有什么林彪同志语录，是学生搞的，一个是一个中学校搞的，另一个是一个什么红卫兵组织搞的，我们就收到两种。另外，我们总政过去也搞了我的一个政治工作语录。我看，不要搞。你们看到的时候，请你们代为没收。总政，我是给他们讲了，我这个意见是雷打不动的，你们不要搞。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思想是全中国人民的思想财富，而且是全世界人民的思想财富。毛主席的话，一句等于我们一万句。我们要以毛主席的思想来统帅全国，来指导我们一切的工作。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根据毛主席和林彪同志三月十一日对青海问题进行调查的指示，经向各有关方面进行了反复调查，青海问题的实质已经基本清楚：

第一，青海省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

第二，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结二O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余人，甚至向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

第三，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蒙蔽群众，所谓"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拥有大批枪枝，并首先开枪，毫无根据。经向在现场的许多革命群众调查，守卫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群众，并没有枪枝。赵永夫等人，派了专门小组进行搜查，至今亦未搜到一支枪。

第四，以上事件同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

根据这种情况，现在决定处理办法如下：

(一)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并由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

(二)除独立师、独立团归刘贤权司令员指挥外，八O六一部队，八一二二部队，二O五部队，在处理青海问题上，也统一由刘贤权司令员指挥。

(三)向群众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二月二十三日流血事件，应由赵永夫和张晓川负责。要为死难的革命群众恢复名誉，给予抚恤。对负伤的群众，要负责进行治疗。因为这个事件而被逮捕的革命群众和干部，一律立即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

(四)受欺骗和蒙蔽的群众，概不追究。群众组织之间的问题，用整风的方法解决。严防坏人挑动群众斗群众。

(五)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二·二三事件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制造的，广大的当地驻军的干部和战士是没有责任的。一切革命群众同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紧密团结起来，坚决打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

(六)着手筹备建立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

(七)赵永夫隔离受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此件除青海外，只在军事系统内传达。青海可在有关部门内部张贴，不许登报和广播。)

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今年三月间，中央召集安徽省军区负责同志、"安徽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代表、持有不同意见的各左派群众组织代表、省市机关干部，举行了多次座谈，并分别作了多次个别谈话。中央对安徽问题，作出如下决定。

一、根据两个月实践检验，安徽"一·二六"夺权没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没有把矛头指向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没有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安徽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个别领导人实行了一系列的错误政策，压制了有不同意见的左派群众组织和革命干部。中央认为，应立即成立以钱钧同志为首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把省的领导权掌握起来。

二、军管委员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政治挂帅，坚决按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办事，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集中揭露和打击以李葆华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执行中央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廿日批转的《重要通告》和中央批转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保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正常进行。要放手发动群众，在工作中走群众路线，不要包办代替。坚决支持各左派群众组织，在左派组织之间不能片面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对于左派组织，要帮助他们克服缺点和错误，帮助他们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要争取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回到毛主席的路线一边来。对于真正的确有证据的反革命分子，才能依法处理。宣布一个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应经过中央批准。严防坏人利用军管镇压群众。

军管会要通过各项工作，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

三、军管会下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的两个班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起来，把工农业生产、财贸工作和救灾工作管起来。

四、立即接管公安厅、公安局，重新选派能够正确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得力干部作军代表，支持和依靠真正的革命派，彻底揭露这两个专政机关的阴暗面，切实进行整顿。要坚决纠正乱通缉、乱逮捕的错误做法。因为对"一·二六"夺权有不同意见被逮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一律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要严防坏人利用专政工具镇压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

五、立即接管新安徽报，要宣传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不准一派革命组织去攻击另一革命组织。立即停止以对"一·二六"的态度作为革命与反革命标准的错误宣传。报纸如不能正常出版，可暂出新华社电讯稿。省广播电台也按同样的原则办理。

六、从过去和现在的情况看，"八·二七"、"八·二七革命到底联络站"、"红革会"、"工人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工人一司、三司等，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这些组织都要整风，双方都着重进行自我批评。有原则上的不同意见，要正常的进行讨论、辩论，不准打、砸、抢、抄、抓，不准武斗。

七、合肥的"红卫军"，是与保字号"军总"对立的，同"八·二七"并肩作战的革命群众组织。但这种组织形式不恰当，应按中央指示办理，这一组织的成员应回到原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不要再恢复这一组织。逮捕于得水同志、通缉程明远等同志，是错误的。

八、压制"安徽省暨合肥市机关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是错误的。应支持省市机关干部起来革命，特别要支持较早站出来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干部。

九、对镇压合肥"红卫军"和于得水同志身死一案，应该查清。可在派往公安厅的军代表领导下，由各革命组织(包括公安厅真正的革命干部)组成调查小组，进行专门调查。参与了逮捕和处理于得水一案的有关人员，不能参加这一调查小组。

论革命的"三结合"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

《红旗》杂志社论

毛主席提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取得胜利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正确地领会这个方针，正确地执行这个方针。

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要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者缺一不可，忽视或者低估那一方面的作用，都是错误的。

经过半年多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充分地发动了群众，涌现出一

大批新起的革命群众的代表人物。广大革命群众，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基础，是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的基础。

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新起的革命群众的代表人物，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是毛泽东思想哺育起来的新生力量，他们体现了革命的大方向。

这一次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斗争，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在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中，必须充分发挥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的作用，必须重视他们的意见，而绝不能把他们当做陪衬，因为他们是广大革命群众的代表。如果不承认或贬低他们的作用，那就是否定革命群众，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排斥他们，把他们当做陪衬，那就不可能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那就不可能是革命的“三结合”。

在一切大革命群众运动中，出现一些缺点和错误，是难免的。必须看清本质和主流，看清革命的大方向，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的缺点和错误，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应该看到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看到他们有许多长处，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对于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则应该满腔热情地、耐心地、循循善诱地帮助他们。还应该看到，许多革命群众组织自己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提出了自己组织中存在的错误倾向和纠正的方法。这是一种可贵的革命的自觉性和创造性。在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同时，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正是革命群众自己提出来的。

归根结底，对待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参加“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的态度问题，就是对待群众、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也是能不能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必须时时刻刻记住毛主席的教导：**“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任何组织和个人脱离了广大革命群众，那就一定不能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半年多来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严峻地考验了我们的干部队伍。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揭露出来了。同时，证明了我们的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那种对干部一概排斥、一概打倒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需要指出，这不能责怪群众。对干部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排斥，一概打倒，这是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那几个人的主张，他们就是这样干的。这种余毒在某些同志的头脑里没有肃清，因而也不自觉地在一定程度上犯过这种错误。

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各个企业事业单位，都有大批的革命干部。就是在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盘据的一些地方和一些部门，也是这样，不过那里的革命干部长期受到压抑罢了。我们必须看到这一点。

革命干部参加“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的作用，必须充分估计。他们应该而且可能在这个机构中起核心作用和骨干作用。当然，只有和群众相结合，在工作中走群众路线，才能起到这种作用。

犯有错误的干部，只要检讨错误，改正错误，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真正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就应该按照革命不分先后的原则，团结他们，安排他们适当的工作，其中许多人还可以参加临时权力机构。

但是，不能把坚持错误、不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不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划清界限的人，强加在群众头上，硬拉到"三结合"的权力机构中来。否则，那就不是革命的"三结合"，那就根本谈不到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那就会出现新的反复，甚至使被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重新上台。

我们必须警惕，有人歪曲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借口"三结合"，搞折中主义，调和主义，合二而一，甚至千方百计地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拉进来。这就是要混水摸鱼，要篡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果实，要实行反革命复辟。一切革命群众，一切革命干部，都必须坚决抵制，坚决反对，坚决粉碎阶级敌人的这种阴谋。

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毛主席号召人民解放军要积极支持广大的革命左派群众，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

经验证明，在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中，有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参加，对于胜利完成夺权斗争的任务，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有了人民解放军干部参加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有了人民解放军的支援，地方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力量就更大了。阶级敌人最害怕人民解放军，最害怕有军队干部参加的革命的"三结合"。他们费尽心机制造流言蜚语，捏造事实，忘图挑拨革命群众同人民解放军的关系，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对于阶级敌人的这种阴谋，必须给以充分揭露和坚决的打击。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举世无双的非常革命化的无产阶级的军队。毛主席说，**"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正因为这样，一切革命的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都信赖人民解放军，都热烈拥护当地驻军的代表参加革命"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从上至下，凡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队代表或民兵代表参加，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大、中、小学）、党政机关及民众团体都要这样做。县以上都派军队代表，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这是非常之好的。军队代表不足，可以暂缺，将来再派。

对于人民解放军的态度，就是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也是区别是不是真正的革命左派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某些地方，由于阶级斗争的情况错综复杂，当地部队的某些同志，也可能在支援工作中，犯暂时的错误。当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真正的革命左派应该善意地采取适当的方式，向部队负责同志说明情况，提出意见，而绝不应该采取公开对抗的态度，更不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否则，就会犯绝大的错误，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为阶级敌人所利用。

人民解放军在支援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已经做出了重要贡献。全体指战员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紧紧地依靠广大革命群众，虚心向革命群众学习，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善于同群众商量问题，深入细致地进行调查研究。这样做，就能非常有力地支援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就能进一步密切军民关系，部队本身也就能在斗争中得到新的锻炼和提高。

"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必须是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这个权力机构，必须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不能是合二而一的、折中主义的。只有这样，它才能有代表性、才能代表广大革命群众和广大革命干部。只有这样，它才能是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才能在最广泛的民主基础上实行强有力的集中领导，才能对阶级敌人实行强有力的专政，粉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和社会上牛鬼蛇神的各种形式的反革命复辟的阴谋。

现在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切切不可糊涂起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在当前，我们要特别记住毛主席的这个教导。

(原载《红旗》杂志1967年第5期)

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

《红旗》杂志评论员

“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许多事实，说明了这一点。清华大学是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某某人亲自掌握的一个典型。本刊调查员，关于清华大学工作组对待干部问题的情况调查，最能说明这个问题。

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几个人，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煞费苦心地包庇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打下去。他们派出大量的工作组，指使工作组，一方面打击广大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一方面打击广大干部，把大批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打成“黑帮”。这一切，都是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抗的，都是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入歧途，纳入资产阶级的轨道。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性的批判，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现在，特别有必要着重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组成部分。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干部问题上，完全是针锋相对的。在干部问题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由来已久的。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几个人，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就实行了一条形“左”而实右的路线，就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就是批判他们的。二十三条指出，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逐步做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对犯错误的干部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重点是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也贯串着这个精神。

可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者，总是反其道而行之，他们顽固地坚持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更加变本加厉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广大群众，打击广大干部，保护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大小小的当权派，最害怕革命群众，最害怕革命干部，

特别最害怕革命干部同革命群众相结合，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几个人，一方面挑动群众斗干部，一方面挑动干部整群众，企图一箭双雕，既整了革命群众，又整了革命干部。他们企图使干部不能站出来革命，使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严重对立。因此，在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的过程中，必须彻底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现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企图把对干部“打倒一切”的罪名，强加在革命小将头上，强加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头上，强加在无产阶级司令部头上。他们装出关心干部的样子，拉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挑拨干部同革命小将的关系，挑拨干部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关系。他们妄图破坏革命的“三结合”，排斥真正的革命干部，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他们自己也梳装打扮起来，千方百计地妄图钻进“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实现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这是一个大阴谋，必须彻底揭穿。广大的群众和广大的干部，都必须提高警惕，不要上当。

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和打击的干部，许多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些同志要勇敢地站出来，坚决支持革命群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集中揭露和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身心地投入这个火热的斗争中去。这样，才能同革命群众打成一片，在夺权斗争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同时，又在斗争中改造自己。千万不要再上《修养》那本书的当。《修养》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脱离革命，脱离政治斗争，闭口不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宣扬唯心主义的修养论，转弯抹角地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提倡奴隶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按照这本书去“修养”，只能是越养越“修”，越修养越成为修正主义。对这本书必须彻底批判，肃清它的恶劣影响。对这本书的批判，也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内容。

(原载《红旗》杂志 1967 年第 5 期)

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

戚本禹

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

——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

一九四九年的十月，朝霞照亮了东方的大地，灾难深重的祖国像巨人一样地站起来了。

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经过无数次的艰苦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获得了全国的解放。

人民大革命的暴风骤雨洗荡着中国大地上的污垢，但是，反动统治阶级并不甘心死亡，

他们在各个领域里继续进行着疯狂的大反扑，阶级斗争非常尖锐。文化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尤其复杂，充斥于文化阵地上的反动影片、戏剧、歌曲、书刊，是配合反动统治阶级向革命人民进行大反扑的重要宣传工具。一九五〇年还在北京、上海和全国其他城市大量放映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便是最突出的一例。

胜利了的中国人民在这种反动文化的大反扑面前，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是进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还是同大肆泛滥的反动文化妥协投降？每一个革命同志都面临着新的抉择和考验。

围绕着《清宫秘史》这部反动影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了一场严重的斗争。这是解放了的中国，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第一次重大的斗争。

毛主席严正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他还说过：**《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周扬和当时的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等，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说这部反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拒绝对这部影片进行批判。

当时，担任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江青同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几次在会议上提出要坚决批判《清宫秘史》。但是，陆定一、周扬、胡××等人却大唱对台戏，他们极力宣扬这部反动影片的什么“爱国进步性”。江青同志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他们却抬出了他们的后台老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黑话，说：“某某同志认为这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江青同志坚持真理、力排众议，义正词严地驳斥了他们这种反动的、荒谬的主张，坚持要批判这部影片。他们不得已，只好敷衍了事地指定一个思想反动的历史工作者，写了一篇假批判、真包庇的小文章。但是，就是这样的文章，他们还嫌“太激烈了”，扣住不发。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文化思想路线上一场重大的斗争，就这样被他们活生生地扼杀了。

一九五一年，毛主席亲自领导了文化思想战线上批判反动电影《武训传》的斗争。一九五四年，毛主席又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另一次重大的斗争，即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同年十月十六日，毛主席曾经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一封信，严肃地批判了党内的一些“大人物”压制新生力量向资产阶级开火，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并且再一次地提出了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的问题。毛主席就两个青年写的关于《红楼梦研究》批判的文章指出：

> **“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

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但是，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毛主席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之后，以陆定一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仍然继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顽固地对抗毛主席的指示。从一九五四年到现在，十二年过去了，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还是一直没有得到批判。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把这个问题重新提了出来。

欠账总是要还的。解放以后一直没有被批判的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一定要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受到革命群众的彻底批判。对抗毛主席指示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一定要在运动中受到革命群众的彻底批判。他们明目张胆地反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猖狂地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必须受到彻底的清算。革命群众一定要把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打倒，一定要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拉下马，让他靠边站。

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一部所谓历史题材的影片，写的是清代末年戊戌变法运动和义和团斗争。它公开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反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任意歪曲历史事实，美化帝国主义，美化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歌颂保皇党，污蔑革命的群众运动和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宣扬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

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永华影业公司摄制的。这是一家反动的电影公司，它成立以后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国魂》，就是借文天祥的幽灵，来为垂死的蒋家王朝招魂。它的第二部影片就是《清宫秘史》。作者姚克，是一个坚持反革命立场的反动文人。他曾经编辑过反动的《天下》月刊，反对中国革命，积极为英、美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效劳。后来，又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并不断写点反动的、黄色的剧本。他是反动统治阶级的一条小走狗。全国解放前夕，逃亡香港。这样一个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文人写出一部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丝毫不奇怪的。奇怪的是那些披着"共产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外衣的党中央宣传部的部长和某几个副部长，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对这样一部极其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如此垂青，把它誉之为"爱国主义"的影片，积极充当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这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在对待这部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问题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究竟存在着哪些重大的原则分歧呢？概括地说，有三个方面的分歧，即：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怎样对待义和团的革命群众运动？怎样对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

帝国主义同中国人民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第一个和

最凶恶的敌人。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在对待帝国主义侵略问题上，被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歌颂为“爱国主义”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完全是一副极端可耻的恐帝、崇帝、亲帝的奴才面孔。

影片对所谓英、美、德、俄、日、法、意、奥“八国联军”的帝国主义侵略害怕得要死，在影片中大肆宣扬恐帝思想。叫嚷什么“中国从甲午之战以后，财力亏损，兵力单薄，……众寡不敌，强弱悬殊”，“外衅必不可开”。大臣许景澄被帝国主义吓得放声大哭。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帝国主义野兽面前，革命的人民不可以有丝毫的怯懦**。但是在电影的作者及其歌颂者们看来，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除了举手投降之外，没有别的出路。——这是赤裸裸的民族投降主义，十足的亡国奴论调！

与此同时，影片又大肆宣扬崇帝、亲帝思想，极力散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公开贩卖卖国主义理论。作者公然通过影片里所安排的帝国主义代理人珍妃之口，欢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说什么“各国一定会原谅皇上”，“我相信各国非但不会伤害皇上，还会帮助皇上恢复皇位，重振朝纲。”大臣孙家鼐也声称：“东西各国的使臣，也都向着皇上。”如果对照一下当时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分子的反革命宣传，就可以看出，影片所宣扬的论调同帝国主义所宣扬的论调简直是同出一辙。例如沙皇俄国就欺骗国内人民说：它“不是在同中国打仗”，“只是在平定暴乱，镇压叛乱者，帮助合法的中国政府恢复正常的秩序。”列宁早在一九〇〇年写的第一篇有关中国的论文《中国的战争》中，就无情地驳斥了侵略者的这种反革命论调。

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力宣扬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的“爱国主义”，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货色呢？原来他们所宣扬的“爱国主义”，就是影片里所描写的光绪皇帝等人那种不惜依靠帝国主义的力量来恢复和巩固他们对人民的统治的所谓“爱国主义”。他们在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之后，还提倡人们去学习那种为了恢复和巩固剥削阶级对人民的统治，而不惜当卖国贼的所谓“爱国主义”，其用心何其毒也！

毛主席教导我们：**“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对于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所谓‘爱国主义’，共产党员是必须坚决地反对的。”**①同样，对于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倡的所谓“爱国主义”（即彻底的卖国主义），也是我们所必须坚决反对的。

影片宣扬的欢迎帝国主义帮助中国“重振朝纲”的卖国主义理论，同美帝国主义的强盗逻辑也是一路货色。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之流在一九四九年曾经操着当年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的同一个腔调，在《白皮书》里大谈什么美国如何“关心”中国，把侵略说成“友谊”。毛主席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友谊**”，**还是侵略？**》等文章中，早已对这种反革命的强盗逻辑，给予了严厉的驳斥。毛主席指出：**将侵略说成“友谊”，是“美国老爷的逻辑。”**但是，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对帝国主义害怕得要命。他们幻想同帝国主义妥协，希望得到帝国主义的“谅解”和“帮助”，他们对毛主席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伟大号召，极端不满，他们大肆吹捧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实际上是公开抗拒毛主席对艾奇逊《白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08页。

皮书》的批判，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猖狂进攻。

十分明显，在全国解放前夕，反动的电影公司和反动文人所以要制作这种宣扬帝国主义可以帮助中国“重振朝纲”的影片，就是要通过电影制造反动舆论，公开鼓吹依靠美帝国主义来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为处于崩溃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出谋划策。影片完全站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上，迎合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需要，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效劳。企图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口头挂着“反帝”招牌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这样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吹捧为“爱国主义”影片，不正是暴露了他们假反帝、真投降的真面目吗？他们爱的是什么国？爱的是帝国主义的国，爱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国，而不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祖国。他们所歌颂的“爱国主义”，正是全国革命人民所要打倒的卖国主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一部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吹捧为“爱国主义”影片，这决不是偶然的。他早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就在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侵略面前吓倒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悲观绝望，在党内积极推行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路线。毛主席号召我们**丢掉幻想，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斗争**，他却大肆散布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和平幻想，公然在报上发表文章，感谢美帝国主义以中国的所谓“帮助”。向美帝国主义乞求“和平”，麻痹人民的斗志。他还欺骗人民，说什么“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已变为和平的、议会的，斗争是合法的群众斗争和议会斗争”，“党的全部工作要实行转变”，“一切政治问题要和平解决”。毛主席说：**敌人在磨刀了，我们也要磨刀。**他却要人民交出自己手里的武装。他大肆宣扬卖国主义理论，认贼作父，心甘情愿地要去当美帝国主义的奴才，说什么：“美国非要在中国找买办不可，我们也可以给他当买办，红色买办么！”买办就是买办，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什么“红色买办”！全是骗人的鬼话。在这种早就想当帝国主义买办的卑鄙无耻的奴才思想的支配下，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成了最适合他们口味的影片。因为影片里所安排的帝国主义代理人珍妃所宣扬的帝国主义可以帮助中国“重振朝纲”的理论，恰恰反映了他们热中于充当帝国主义买办的卖国心理！

“心有灵犀一点通”。影片里光绪皇帝望湖兴叹的一句诗，正好是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光绪、珍妃之流心心相印的写照。在充当帝国主义代理人的问题上，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六十多年以前的地主、资产阶级发生了共鸣，这就是他们要把一部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吹捧为“爱国主义”影片的思想根源和阶级根源。

怎样对待义和团的革命群众运动？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①] 对于义和团的革命群众大造帝国主义的反、大造封建主义的反的革命运动，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是歌颂还是仇视？这是检验真革命和假革命、革命和反革命的一块试金石。

震撼祖国大地的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

---

① 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

运动。这是一次表现了中国人民历史首创精神的伟大运动。当时，几乎整个中国的北方，无论是城市或者乡村，到处都有义和团在进行革命活动。在敌人统治最严密的政治中心北京城内，义和团就设坛八百余所，景山后面的宫墙下，每天都有参加义和团的青少年在操练。

义和团的英雄们，在祖国处于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严重时刻，挺身而出，高举反帝爱国斗争的革命大旗，同帝国主义强盗及其走狗进行了英勇斗争。他们一开始就在大街小巷，贴出各种标语，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反帝决心：

"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

义和团严厉禁止洋货，蔑视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把驻有外国使馆的东交民巷改名为"切洋街"，御河桥改为"断洋桥"。义和团在游行时，经常同市民齐声高呼"杀洋鬼子"的口号，使帝国主义分子听了发抖。有的吓得躲进棺材，雇人吹打着，企图逃出城外。

一九OO年的六月，义和团的革命活动达到高潮，京郊各县的义和团三五十人一队，不分昼夜，一天数十起地涌进北京城内，守卫城门口的士兵，向他们致敬礼，为他们喝道让路。浩浩荡荡的革命群众，头裹红布，腰缠红带，鞋镶红边，手持大刀长矛，在大街上威风凛凛地游行。前门外打磨厂等处的铁铺里，炉火熊熊，日夜不停地为义和团赶制各种刀枪。

当帝国主义侵略军疯狂镇压义和团的时候，义和团的革命群众用大刀、长矛等原始武器同以洋枪、洋炮武装的侵略者进行英勇的搏斗，显示了中国人民大无畏的革命战斗精神。在著名的"廊房狙击战"中，英国海军大将西摩尔率领的一千五百多人的联军，被义和团"直逼火车，持矛猛触"，死伤将近一半，最后狼狈地逃回天津。后来西摩尔胆战心惊地说："义和团所用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全体覆没。"在保卫天津的战斗中，义和团同侵略军进行肉搏战，在火车站一仗，就把一支二千人的俄国侵略军，打死打伤了五百多名。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承认："此次天津华军与西兵苦战月余，西人咸谓如此死战，实为从来所未见"。在杨村的战斗中，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军，被义和团战士打得落花流水。帝国主义侵略军一听到义和团的军号声，就惶恐万状，惊呼："闻此声，可以使人之血凝而不流。"

在义和团运动中，青少年是一支最生动、最活跃的力量，他们在这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震骇中外的"红灯照"，就是当时北方许多地方女青年们的组织。她们很有纪律地自己组织起来，练习武艺，保卫祖国。她们着红衣，戴红帽、提红灯，拿红枪，前方作战，后方除奸，积极参加义和团的起义行列，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表现了中国青年妇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英雄气概！

"红灯照，义和团，亲兄妹，闹的欢，一个心，杀洋官。"

这首歌谣生动地反映了"红灯照"反帝的坚强决心。"红灯照"英勇斗争的事迹，一直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地流传着。他们说，"红灯女儿，一人兵阵，视死如归，于枪林弹雨中，惟恐落后。""中国自道咸以来，沿海防夷水陆各战，望风奔溃"，"得此番小儿女一振疲癃，不特寒众国之心，且壮中原之气。"

义和团的英勇斗争，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和骄傲，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它使侵略者亲身尝到了中国人民铁拳的滋味，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帝国主义侵略军的头子瓦德西为此向德皇威廉报告说："皇上诚然常有瓜分中国的思想"，可是，"不应忘去者，……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

对于这样大规模的革命群众运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热情歌颂的。毛主席在

他的伟大著作中，曾经一再高度评价和赞扬义和团运动的英雄业绩，他把义和团运动看作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重要的发展阶段之一。毛主席指出：义和团战争是反抗压迫者的义战，它同一百年来中国人民历次的革命战争一样，**“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①]；**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②]**“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③]

但是，被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歌颂的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对义和团反帝的革命群众运动却抱着刻骨的阶级仇恨，竭尽诽谤污蔑之能事。影片把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行动，描写为一种野蛮的骚乱。并且尽量地丑化义和团，恶毒地攻击义和团是什么“杀人放火”、“状如疯魔”的“乌合之众”，是什么专搞“邪术妖法”的“无知愚民”。

影片及其歌颂者对义和团的这种恶毒污蔑同帝国主义者完全是一个鼻孔出气。当时美帝国主义头目艾奇逊就在《白皮书》中咒骂义和团是“中国的排外骚动”，是“拳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御用学者也大肆攻击义和团是“无知迷信与暴民歇斯底里的产物”，是“没有理性的行动”，是杀人放火的“拳匪”。

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

真正的杀人放火的匪徒，不是别人，正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据帝国主义侵略军头子瓦德西自供：帝国主义侵略军侵占北京以后，烧杀抢劫，奸淫妇女，破坏文明，无恶不作。帝国主义军队在占领北京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上自宫廷王府，下至民间百姓的财物均被洗劫一空。“曲槛临湖面面开，内官惊看骆驼来。”封建皇帝的宝库颐和园所贮藏的历朝文物，被侵略者用骆驼运至天津，累月不尽。中国几千年保留下来的许多文物，其中包括《永乐大典》，都被帝国主义烧抢殆尽。瓦德西还供称：“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至于帝国主义的走狗对义和团的屠杀和镇压，更是惨无人道。

列宁曾经怀着满腔的愤怒，谴责了帝国主义侵略者杀人放火的罪行。他说：**“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它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试图反抗，它们就像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就在这些基督教徒立功的时候，他们却大叫大嚷反对野蛮的中国人，说他们胆敢触犯文明的欧洲人。”**[④] 而影片及其歌颂者却颠倒黑白，为虎作伥，把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帝国主义侵略者美化为文明的使者，把坚决抗击帝国主义侵略、英勇不屈的义和团污蔑为“野蛮的骚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5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6页。
④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35—336页。

乱"。这是地地道道的汉奸、卖国贼的哲学。

义和团的反帝爱国斗争是同反封建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义和团的战斗口号是："杀洋人，灭赃官。"当时流传的歌谣说："砍洋头，杀官兽，杀尽洋和官，百姓有盼头"。"先夺洋鬼头，后把贪官揍"。这些都是他们提出的朴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口号。他们对封建统治阶级恨之入骨。一九OO年义和团控制北京期间，清朝的在京衙门、亲贵王公的住宅，大多数都被义和团成员把守监视。义和团时常抓住一些罪恶昭著的官吏，特别是对帝国主义奴颜婢膝的官吏，强迫他们到拳坛去叩头焚表，罪大恶极的官吏就被杀掉。

但是，影片却把义和团诽谤为封建统治者的工具。它借清朝大臣赵舒翘之口说："请老佛爷旨，把义和团编为义军"。慈禧太后听了，欣然采纳。就这样把义和团污蔑为慈禧太后的一党，可谓恶毒之极。

在一个短时间内，清朝统治者对义和团采取了欺骗、软化的政策，这个政策一度发生了作用，义和团的一部分成员受了蒙蔽，对清朝统治者产生了一些错误的认识，有些组织提出过"扶清灭洋"的口号。这种情形，一方面反映了当时阶级矛盾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的人民大众对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认识还处于感性阶段。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的认识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发展的。**"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①] 所以，绝不可以因为当时义和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楚，就把义和团污蔑为封建统治者的工具。如前所述，义和团在反帝的同时，"抗清"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就在"扶清灭洋"的口号出现之后，义和团的首领朱红灯还制定"攻打北京"的计划，始终坚持了反封建的斗争。

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大肆污蔑和攻击义和团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完全是出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需要。他们对义和团革命群众的污蔑和攻击，反映了阶级敌人对中国革命主力军农民的刻骨仇恨，反映了阶级敌人对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刻骨仇恨。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唱着同一个调子，为一部反对中国革命，侮辱革命群众的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拍手叫好。他们这样做，不折不扣地充当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革命宣传的应声虫、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立场。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仇恨历史上的革命群众运动，这使我们更加懂得了：在今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为什么要勾结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抛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妄图扑灭毛主席亲自点燃起来的革命烈火；他为什么要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镇压群众，实行白色恐怖；他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

怎样对待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

对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抱什么态度，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抱什么态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8页。

度的问题。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个关系中国革命前途的根本问题上，早已存在着原则的分歧。全国解放以后，这种原则分歧更加尖锐化。怎样对待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这个分歧的一个爆发点，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第一次短兵相接的交锋。在这次交锋中，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一个电影的评价问题上，各自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

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力赞美这部反对革命、歌颂改良的反动影片，其目的是为了请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企图借用它们的名字、口号和服装，在中国宣扬资本主义。

影片歌颂的戊戌变法运动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运动。这个运动是一部分封建统治阶级人物和从封建统治阶级中开始分化出来的一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在革命风暴和亡国大祸的威胁下，从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维新变法的改良主义办法，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

戊戌变法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统治的网罗，在解放思想上起了一些启蒙的作用，这一点我们从来是承认的。但是，我们的这种承认，指的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批判地认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决不是无原则地对戊戌变法运动及其代表人物进行歌功颂德。戊戌变法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们本身就是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统治者，他们改良主义的目的，从来不是也绝不可能是为了人民革命的利益，而是为了更好地剥削人民和巩固他们的统治。他们所要改变的只是旧事物的某些枝节方面，而不是旧事物的质。他们所幻想的只是以渐变的形式，使地主经济逶迤曲折地改变为半地主、半资本主义经济（实际上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并企图以此来阻挡人民革命运动，把革命消灭于无形之中。所以，改良主义即使在当时也绝不是中国人民的出路。

十九世纪的末叶，中国的社会改革已经出现了两条道路：一条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即企图用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的办法通向资本主义。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只能是一条虚伪的、行不通的反动的道路。因为中国没有西欧和日本那样维新改良的历史条件。当时，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中国正在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而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领导人康有为、梁启超，却恰好把维新变法的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身上，他们幻想投靠帝国主义，依赖帝国主义的力量，实现他们维新变法的主张。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引狼入室，加速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过程，而根本谈不到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另一条道路是广大群众起来，用武装斗争的办法进行革命。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走的都是这条道路。由于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这样的革命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是，却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我自横刀向天笑”。戊戌变法运动最悲壮的一幕是一个勇敢的启蒙思想家谭嗣同之死，他的死宣告了戊戌变法运动的夭折，宣告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的破产。而在半个世纪以后，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却还在鼓吹早已破产了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影片极力宣扬“如果要中国富强，必须要维新变法！”还通过光绪皇帝之口，大肆赞扬维新变法，把改良主义吹得天花乱坠，什么“明治维新”，什么“变法上谕”，什么“中国这样改革起来，不到三十年，就可成为世界上最最富强的国家啦！”等等。这是疯狂地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呼喊，为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呼喊，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呼喊，革命人民是决不允许的！

影片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尤其光绪皇帝，捧到了九天之上。说他“为了国家，为了百姓”，“用尽了心机，受尽了闲气”，“只要国事有办法”“身体倒不在乎”。

特别恶毒的是，影片在大肆吹捧帝王将相和美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同时，又千方百计地丑化劳动人民，把群众污蔑为“群氓”。在电影的末场，作者通过被歪曲、被丑化了的村民、村妇的形象，大肆美化光绪皇帝，称颂光绪皇帝是个“好皇帝”，“他是帮我们老百姓的”，“我们都惦着皇上呢！”村民、村妇把鸡蛋、饽饽“献给”光绪皇帝吃。临别时，“民众夹道跪送”。影片还污蔑说什么“老百姓是最听话的，也是最容易满足的”。难道人民群众就是这样恭顺服从、卑贱丑陋的群氓吗？绝对不许污蔑劳动人民！毛主席教导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① 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此歌颂这部美化帝王将相，丑化劳动人民，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动影片，恰恰暴露了他们彻头彻尾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真面目。

特别令人气愤的是，当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了长期的武装斗争获得革命胜利之后，当毛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亲自为近百年来的革命斗争作了总结，批判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宣告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之后，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竟然还把这部大肆歌颂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鼓吹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作为“爱国主义”影片，不加批判地在各地大量放映，是可忍，孰不可忍！

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自从一八四O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之后，进行了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基本的胜利。**”“**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②

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视历史事实，无视毛主席的警告，仍然借着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美化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美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美化资产阶级共和国，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妄图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的复辟。他们所以全力歌颂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就是因为这部反对革命、歌颂改良的影片是他们进行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的工具。他们实际上是为了通过古人来赞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道路，并利用这部影片来迷惑群众，来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涂脂抹粉。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推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3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74—1476页。

翻人民的江山，破坏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使革命胜利的果实落在资产阶级的手里。

围绕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而展开的这一场严重的斗争，绝不仅仅是一部电影的问题，而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修正主义思想的斗争，是资本主义复辟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

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前赴后继，浴血苦战，终于取得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全国解放了，但是解放了的中国究竟往哪里去？胜利的果实究竟归于谁？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用他们的生命和热血所浇灌、生长起来的桃子究竟由哪个阶级来摘？这样重大的问题，不仅在当时，就是在现在都是中国社会各个阶级斗争的焦点。

资产阶级要从人民的手中争夺胜利的果实，他们要摘桃子。他们要刚刚获得解放的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代表资产阶级来摘桃子的人物。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解放以后仍旧日夜梦想着资本主义的复辟，死抱着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不放，无限向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极力想使中国革命半途而废，大力发展资本主义。

毛主席说，**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大唱反调，极力宣扬"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奔走呼号。

就在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的前后，他到处游说，大做黑报告，滥发黑指示，极力颂扬资本主义制度的所谓"进步"和"光荣"，鼓吹"剥削无罪"，"造反无理"的谬论。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①] 他却胡说什么"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太少了。""要发展资本主义剥削，这种剥削是进步的。""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大叫什么："劳动人民不是反对剥削，而是欢迎剥削。""如果资本家多了，剥削多了，那么，我们就越感到舒服。"他还恬不知耻地向资本家说："工人的痛苦就是失业，就是怕没有人剥削，所以有人剥削比没有人剥削好。""工人要你剥削，不剥削人家就苦得很。""资本家也是为人民服务。""你们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利。""剥削得越多，功劳越大，就越光荣。""资本家的剥削是有历史功绩的，这个功绩是永垂不朽的"。他大肆宣扬"剥削合法论"，说什么"赚多少钱都是合法的，多到什么程度，花花绿绿，胭脂水粉、大吃大喝都是合法的。"他甚至学着小丑的腔调向资本家说："资本家先生！我请求你剥削一下吧！剥削我就有饭吃，老婆孩子就能活下去，如果不剥削，就不得了。"

工人不接受他的这一套反动的臭理论，他便污蔑工人："不懂政治，觉悟不高。"并以资本家的帮凶的口吻，恶狠狠地威胁工人说："工人不听话，（资本家）要斗争（工人），这是合法的"。

与此同时，他还积极鼓吹发展农村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肆叫嚷"长期保护富农经济"，提倡"四大自由"（即放高利贷自由、雇工自由、土地买卖自由、经营自由）。主张大力发展"三马一犁一车式的农民"，发展富农经济。胡说什么"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关内难民到东北去，东北的富农剥削他，他就谢天谢地。""雇人劳动，不叫剥削，它增加了社会财富。"还提出雇人耕种土地"没有限制"，"雇工种地是合法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版，第839页。

的，对群众也有好处”。声称“有剥削还可以做社会主义者。”“东北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怕。”企图使资本主义经济在农村中迅速泛滥开来。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人吃人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所唱的颂歌，就连资产阶级的御用学者、形形色色的新老修正主义的辩护士们，也都望尘莫及。

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想的是资本主义，爱的是资本主义，讲的还是资本主义。他所贩卖的那一套人吃人的哲学，完全是为发展资本主义，维护血腥的剥削制度服务的。他的这种声音是吸血鬼和寄生虫们的声音，也是他自己那种肮脏的、丑恶的资产阶级灵魂的大暴露。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我辩解说他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什么“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难道竟有这样疯狂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老革命”？

难道竟有这样猖狂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猖狂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老革命”？

如果真是“老革命”，那么，请问：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解放以后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竭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

为什么你要在三年困难时期，与国内外牛鬼蛇神遥相呼应，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一九六二年还重新出版过去那种不要革命，不要阶级斗争，不要夺取政权，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欺人之谈的大毒草《论修养》？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和推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为什么你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十七年来，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支持下，向无产阶级发动了一个全面性的猖狂进攻，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里放了大量的毒。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化大军，彻底粉碎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猖狂进攻，挖出我国修正主义的总根子，打倒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党、篡国，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保证我国永不变色！

“宜将剩勇追穷寇”。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亿万人民动员起来，穷追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穷追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

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取一切被他们篡夺了去的堡垒，让毛泽东思想占据一切阵地。正像林彪同志所说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大战役，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总攻击**”。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勇敢地投入战斗，彻底批判和肃清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各方面的流毒；大破剥削阶级的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

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前进的道路上是有阻力的，我们一定要克服种种困难，冲破一切阻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绝不能半途而废。

把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插遍全中国，让她永远永远地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胜利万岁！

（原载《红旗》杂志 1967 年第 5 期）

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

现将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发给你们。这个文件中提出的政策性规定，望各地参照执行。

中央强调指出，各级革命委员会，人民解放军各军区和各地驻军，无论在实行军事管制的地区、机关和单位，或者在没有实行军事管制的地方，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政治挂帅，要坚持走群众路线，要保障更好地实际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特别要注意：

第一、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宣布一个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必须经过中央批准。

第二、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或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都看得太严重了。

第三、一个群众组织的个别负责人，证据确凿是反革命分子，或者是犯罪分子，应依法处理。但是，要同这个组织的广大群众区别开来。在取缔证据确凿的反动组织时，也要把为首的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同一般被蒙蔽的群众严格区别开来。不准对群众组织乱加取缔，更不得采取解放初期对待反动党团组织采取登记骨干分子的办法。

第四、对于犯了一些错误，甚至严重错误的革命群众组织或革命群众，应采用整风的方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解决问题，不应该也不允许要群众上街、挂牌子、贴大标语、开大会请罪。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革命无罪”，“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强调群众请罪的做

法，是极其错误的。严禁假借“镇反”名义，镇压革命群众。

第五、坚决地正确地支持各左派革命群众组织，在左派组织之间，不能片面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

中央军委命令

（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

林彪同志：此件很好。

毛泽东

四月六日

毛主席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大力支持左派，这是一个伟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是一个崭新的历史任务。我军广大指战员，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在支左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最近我们检查了某些军区的支左工作，有的做得好，有的做得不好。目前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应当及时引起严重注意。为此，特发布命令如下：

（一）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手续。

（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要做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被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经中央批准。

（四）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只对业已查明特别坏的右派头头，要追究，但应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过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

（五）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应就地深入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

（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动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七）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结合两条路线的斗争。广泛搜集揭露反动路线

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具体材料，印发到连队进行教育，使广大指战员了解他们的反动事实，进行彻底批判，肃清其恶劣影响。

（八）对派到地方上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代政策。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原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是一个混进党内军内的反革命分子，他玩弄阴谋手段，篡夺军权，对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或思想很右的人来主持支左工作。

（九）在支左工作中，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善于采用说服教育的方式，而不应采取简单粗暴和命令的方式。

（十）对业已违反了上述诸条做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今后，坚决按以上各条办事。

这个命令，要在我军所有机关、连队内部用电报，电话迅速传达，广泛张帖。

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关于播放林彪讲话录音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林彪同志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讲话的录音，应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人员和全国红卫兵播放。

林彪同志的讲话，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报告，对于指导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指导人民解放军正确地介入地方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进一步取得胜利，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各省、市革命委员会，各军事管制委员会，各革命群众组织，必须认真组织大家学习林彪同志的讲话，坚决贯彻执行。

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批判旗帜

（一九六七年四月八日）

《人民日报》社论

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凯歌声中，一个新的伟大战役开始了。

我国亿万革命群众，奋起千钧棒，以笔作刀枪，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起了猛烈的总攻击，对他所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他所著的大毒草《修养》，展开了革命的大批判。

《红旗》杂志发表的《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及戚本禹同志所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等三篇文章，吹响了这次伟大战役的进军号。

早在去年五月，毛主席就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样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把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倒、批深、批臭，就必将给予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致命的打击，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推动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斗争，必将带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

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正处在决战阶段。我们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着重批判他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个反动路线的组成部分，彻底肃清它的流毒，把大批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和打击的革命干部解放出来。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干部问题上，从来是针锋相对的。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和十六条都明确指出：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逐步做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对犯错误的干部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重点是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伙同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抛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把大批革命干部打成“黑帮”、“反党分子”，竭力阻挡干部起来革命，使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严重对立。这种情况，今天还在极大地妨碍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

在这场伟大的批判斗争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和打击的干部，要勇敢地站出来革命。执行过错误路线的干部，要立即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一切要革命的干部，都要坚决支持广大革命群众，和他们一起彻底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集中火力揭露和打击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革命的“三结合”，是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里形成的。参加“三结合”的革命干部，是在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洪流中考验出来的。

我们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定要同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斗、批、改任务紧密结合起来。十七年来，正是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文学、史学、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新闻学等各个领域，在党、政、军、工、农、商、学各界，扶植和保护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一小撮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散布了大量的修正主义毒素。在关键时刻，这些牛鬼蛇神总要在他们的后台老板鼓动下，纷纷出笼，跳出来向党发动猖狂进攻。而党内一小撮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一小撮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正是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基干力量。一定要看到，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集中火力斗争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党内一小撮

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是斩断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伸向各个领域的黑手；而彻底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又必将把各单位的斗、批、改提到更高的水平。

我们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彻底清算十七年来以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十七年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党内占据着统治地位。它象一条红线，贯穿在建国以来的历史中。在这条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由来已久，从未间断。十七年来，一条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以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党内进行着尖锐复杂的斗争。这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是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定地引导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

毛主席指出：**“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那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适应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需要，同毛主席的教导唱反调，妄图实现中国历史的大倒退。就是这个人，为资本家剥削喝采，为富农经济叫好。就是这个人，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拚命鼓吹“四大自由”。就是这个人，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主张阶级调和。就是这个人，反对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竭力鼓吹“三和一少”、“三自一包”。就是这个人，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推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就是这个人，为反动的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内向无产阶级发动的猖狂进攻，鸣锣开道。这个人的野心，是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和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也就是要把中国拉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

因此，彻底批判和清算十七年来以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摆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人民面前的一个战斗任务。

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十七年来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只有彻底批判和清算十七年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其在各个领域内的流毒，才能使广大革命群众懂得两条路线斗争的尖锐性、必要性和艰巨性，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更自觉地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特别要深人批判他的欺人之谈的《修养》。这本书，是他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对《修养》这本书的批判，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

《修养》这本书，完全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脱离革命，脱离政治斗争，闭口不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这本书，是要资产阶级“修养”，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这本书，宣扬唯心主义，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提倡奴隶主义。这本书，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按照这本书。舒舒服服地关在小屋子里去“修身养性”，就只能是舒舒服服地演变成修正主义。这本书一版再版，不仅流毒全党全国，甚至流毒世界，害人不浅。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干部由于受了《修养》的骗，中了《修养》的毒，妨碍他们积极投身于

革命的群众运动，盲目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受蒙蔽、受毒害的同志，不要再上《修养》这本书的当了。一定要全身心地投入群众运动的火热斗争中去，经风雨，见世面，在斗争中考验自己，锻炼自己，改造自己。对这本书的彻底批判，一定要联系自己的思想，触及灵魂的深处，大破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粉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套在自己身上的精神枷锁。这是一场破私立公的革命，是用毛泽东思想战胜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革命。只有打碎这个精神枷锁，才能轻装前进，真正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

毛主席教导我们："**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斗争中发展起来，而且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

这一场伟大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就是一场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群众运动。亿万群众在批判这个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过程中，在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散布的修正主义毒素的过程中，一定能够更好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战斗的武器，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

批倒中国的赫鲁晓夫

(一九六七年四月八日)

《光明日报》社论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红旗》杂志发表的《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及戚本禹同志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等三篇文章，吹响了向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发起总攻击的战斗号角！一场埋葬中国的赫鲁晓夫的空前规模的革命群众运动，正在我们伟大的祖国兴起。

毛主席说："**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长期以来，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总是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打着"红旗"反红旗，提出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妄图扭转中国革命的航向，千方百计地要把中国革命引向歧途。

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来，他利用他所窃踞的党政要职，变本加厉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猖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他对党对人民犯下的滔天大罪，真是"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毛主席指出："**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

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系列罪恶活动，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篡党、篡政、夺无产阶级的权，专无产阶级的政。如果让他的阴谋得逞，那末，人民的江山就要改变颜色，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就会付之东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来，在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是十分激烈的。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在每一个重要历史关头，针锋相对地同中国的赫鲁晓夫展开了坚决的斗争，批判他的修正主义路线，掌稳了航船，保证我国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破浪前进！现在，彻底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它的流毒的决战时刻，已经来到了。这是一场空前规模的全国性的群众性的大批判、大斗争。这场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大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修正主义思想的大斗争，是资本主义复辟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大斗争。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大斗争。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和历史上一切反动派一样，中国的赫鲁晓夫，也是不打不倒的。我们必须穷追猛打，打他个落花流水，片甲不留！

要彻底批倒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就必须发动广大革命群众。只有发动广大革命群众，才能使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陷人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才能使他们原形毕露，才能把他们长期以来所散布的大量毒素统统挖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只有发动广大革命群众，才能肃清他们的流毒，铲除他们的影响，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

要搞好这场大批判，首先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必须紧紧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纲，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判以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肃清它在各个领域内的恶劣影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大破剥削阶级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的大革命，是从思想上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的大革命。当前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是一个关系重大的决定性的战役。

长期以来，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在文化领域的文、史、哲、经等各个部门，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包庇和扶植了一伙人，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只有彻底摧跨中国修正主义的总后台，才能把这一批反动的家伙挖出来，才能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伟大历史使命。

中国的赫鲁晓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炮制者。这条反动路线，一方面把大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另一方面，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只有彻底批判这条反动路线，才能有助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思想革命化，肃清反动路线在革命派内部的流毒，实现革命派的大联合。只有彻底批判这条反动路线，才能把受打击的大批干部解放出来，才能更好地贯彻毛主席的唯一正确的干部路线，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革命的“三结合”。

在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大斗争中，特别要批判他的修正主义代表作：《修养》。在一九六二年再版的这本书，是他篡党篡政的总纲领，是他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宣言书，是他炮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理论基础。这本书，不要革命，不要阶级斗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宣扬

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是一株彻头彻尾的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我们必须把它彻底批深，批透!

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进行大批判的最强大最锐利的武器。在当前这场大批判、大斗争的群众运动中，我们必须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更新的高潮，把我国办成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让毛泽东思想的万丈光芒，永远照耀全世界。

革命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少年，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让我们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把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批倒，批臭!

再论在大批判中推进大联合

(一九六七年四月九日)

《文汇报》社论

上海市第六女中革命红卫兵，在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大批判、大斗争中，实现了全校革命的大联合。这又一次证明：革命的大批判运动，可以大大推动革命的大联合。我们欢呼市六女中的革命红卫兵在共同的斗争中联合起来了，我们希望更多学校的革命红卫兵、革命师生员工以及革命领导干部，在当前这场群众性的大批判运动中尽快地联合起来。

市六女中的经验说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当前实现大联合的主要障碍。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护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过关，抛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革命群众。他们还利用剥削阶级的反动血统论，欺骗少数学生，来同另一部分学生闹对立。因此，在一些学校中，学生与学生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长期处于分裂状态。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至今还没有在学校中彻底肃清，它还在各个方面影响和阻碍着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有些革命群众组织之间至今还在打无原则的“内战”。事实很清楚，只有彻底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了它的流毒，才能真正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

在学校中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矛头一致向上，直指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就是他伙同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了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在他的支持下，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利用反动的血统论，毒害了不少青年学生。他是我国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牛鬼蛇神的总后台，是我国七亿人民的公敌。彻底批判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的一系列反动谬论，在大批判中实现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这是当前革命师生斗争的大方向。市六女中的革命学生，开始由于没有紧紧把握住这个斗争大方向，始终联合不起来。有时，人在班级，心各一方，坐不拢、谈不来，甚至互不理睬。通过共同揭发、批判、控诉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革命派学生认识到，自己的敌人并不是原来保守的学生，而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原来保守的学生也认识到，革命派的学生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

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坚决执行者，而自己是受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毒害。无论革命派学生或原来保守的学生，大家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共同的敌人找到了，大方向一致了，在这场大批判中，明辨了是非，弄清了思想，提高了觉悟，相互消除了隔阂，于是就联合起来了。

革命的大联合，只有在共同的斗争中才能实现。大联合，首先需要政治思想上的大统一。这场大批判运动，是一场思想大革命运动。**毛主席说："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在这场大批判中，就是要大破大立。大破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市六女中革命学生积极参加这场群众性的大批判运动，用毛泽东思想这一锐利武器，有力地批判了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为大联合建立牢固的思想基础。对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在这场群众性的大批判、大斗争中，要狠触灵魂，横扫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努力实现思想革命化。通过共同的斗争，在大破大立中实现的大联合，才是真正的巩固的革命的大联合。

有人说，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落实到原来保守的群众组织，落实到班级里的学生。这是一种不正确的想法。批判当然要落实，这个落实，就是指这次大批判一定要同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斗、批、改任务紧密结合起来，同斗争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结合起来，以斩断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伸向各个领域的黑手，同时又把各单位的斗、批、改提到更高的水平。如果把批判落实到过去保守的群众组织，落实到班级里的学生，这岂不是又把矛头向下，又去整群众了吗？这恰恰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出者所希望的，我们万万不要上当。对于革命师生的缺点、错误，可以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的群众。

革命的大批判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又将大大地推动革命的大批判运动。有了统一的革命组织，团结了大多数，步伐一致，火力集中，就大大增强了战斗力。彻底打倒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这是一场硬仗，必须依靠七亿人民团结一致，顽强战斗，才能取得胜利。**毛主席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为了打败共同的敌人，我们一定要赶快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共同进行斗争。

为人民立新功(节录)

(江青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对前一段文化大革命，不要有什么自卑感，从前说是不介入，其实这个不介入，就许多单位说，**主席早就说过："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事实上，有的是从左的方面介入，有的是从右的方面介入。例如，拿从左的方面介入来说，去年二月，林彪同志委托我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这个文艺座谈会的纪要，是请了你们"尊神"，

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为什么这么有威力呢？这是因为有军队支持，他们怕人民解放军。这是从左的方面介入。几个月以来，全军有很多好经验。据哈尔滨的同志说，那里的军队，在去年夏天，就从左的方面介入了。也有的从右的方面介入的，做错了一些事。我想大多数做了错事的同志也是会回头的。我才不相信，天下就那么都一片黑了，有的人就是吹这个黑风。也许我这个自信心太强，我总觉得不会是那样子的。你看，就是农业生产，夏收可能会不错的，秋收，我看也可能不错。因为革命调动了广大人民的革命热情，军队这样子大力地去带头，起模范作用，我看这是解放以来，十几年没有过的。进城以后，我们军队住在兵营里，确实和劳动人民有些隔开了。这次不行了，要从兵营里出来，要从机关里出来，恢复咱们过去的老传统，跟群众结合在一块。这样，有的地方就说，老八路又来啦。可见，我们当年还是和群众在一块多一点，进城以后就隔离开了。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做了许多好事情，从最初开始，以林彪同志为代表，就从左的方面介入了。

此外，我还向同志们呼吁一下，要看到文教战线的重要性，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认识不足。那些有问题的、能力不怎么强的干部，都被放到了文教战线上去，还不说我们包下来的几百万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样，他们的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的东西就大量地泛滥。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就是不大清楚，也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厉害。虽然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和他们交过几次锋，但是，都是个别的战役，没有象这一次这样认识深刻。意识形态——文教战线这个东西，可厉害哪！因为任何一个阶级，无产阶级也好，资产阶级也好，他要夺取政权，总是要先做舆论准备的。这一点，过去我就重视不够，希望军队的负责同志，能真正认真地抓一抓。

这十七年来，文艺方面，也有好的或者比较好的反映工农兵的作品；但是，大量的是名、洋、古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至于教育，那几乎全是他们的那一套，又增加了苏修的一套。所以我们在文学艺术界，培养出一些小"老艺人"；在教育方面，培养出一些完全脱离工农兵，脱离无产阶级政治和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比过去还多了。要是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那谁改得了？攻也攻不动啊！

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程很长。进城的初期，总理给我安排过几次工作，接触了一些事情。后来，就辞职了。我自己思想上，只是就某一点说，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的。那时候觉得挺奇怪，那些香港的电影，就是往我们这里塞，我用很大的力量，想推出去。他们却说什么，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得照顾。当时我们确实是孤立的。

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就是不能和平共处；一想和平共处，它就腐蚀你。大概总理还记得，那时候对他们说，制片方针是对着华侨，你们只要不拍反共的电影，那么我们给你们钱。他就是要钱赚！那个时候，只认识到他要投资，没有认识到他要来毒化我们。后来推出去了，确确实实地推出去了。中间，有几年我害病，为了恢复健康，医生要我参加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这样，我就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问题。哎呀，觉得这个问题就大啦！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的形象。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它反转过来，是要保护或者破坏经济基础的。如果象上面所说的那个样子，它就会破坏我们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大概在一九六二年，香港电影，美、英、法、意……等帝国主义国家的电影，修正主义国家的电影，出现了一大堆。那些剧团可是多啊！如京剧，我是一个习惯的欣赏者，但我知道它是衰落了。谁晓得它利用我们这个文化部，弄得全国到处都是，就连福建那个地方，也有十九个

京剧团。大家都知道，福建话和北京话差别是很大的。结果，到处在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我那个家乡山东、我童年的时候，河北梆子叫大戏。近几年调查的时候，京剧却成了主要的大戏了。山东有四十五个京剧团，这还不讲黑剧团、业余剧团。上海的越剧也跑向全国了。就出现这样的怪事。但是，我们的工农兵，建立了这样的丰功伟绩，他们不表现。他们也不表现我们的长征、二万五千里的老红军，也不表现抗日战争。那有多少英雄啊，他们都不搞。电影也有这个问题。所以我就逐渐地对这个问题有了认识。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彭真拚命保护吴晗，主席心理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同志们如果知道这些，会气愤的吧。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自己搞一篇评论文章，他们都不许。气愤不气愤哪！我们组织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不给发行。当时我觉得，才怪呢，一个吴晗完全可以拿出来批嘛，有什么关系！噢，后来总理对我说，才知道，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可见其难啊！人家抓住这个文教系统不放，就是专我们的政。将军们不要以为这是文教系统的工作，不是份内的事，不管；要知道我们不管他们就管，我们真管，他们还会千方百计地想管。所以我们要抓，真正的抓。如果你们都抓，那就不会出现这个局面了。当然，物极必反，所以就出现了这次文化大革命。那帮人才阳奉阴违哪！两面三刀地尽整人啊。一个戏，主席要改成以武装斗争为主，他就是不肯。为了这个，就要斗很久啊。试问，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武装斗争，能成功吗？我们现在能够坐到这儿来开会吗？我觉得那是不能设想的。在这一方面，同志们的感受大概比我还要深刻。所以，这个文教战线，今后得要很好地抓，抓在我们自己手上。要大胆地选用革命小将。你看，要是没有他们，怎能搞出那个叛徒集团来啊？有六十几个人。他们都占了重要的领导岗位。小将们的这个功勋可大啦！

主席还健在，有些人就可以不听主席的话。在上海的时候，华东局、上海市委里头，可微妙哪。主席的话不听，我的话更不听，但是一个什么人的话，简直捧得象圣经一样的。当时我觉得这是一种奇怪的事情，现在想来，这也不奇怪。有一位旧市委领导人，居然会变化到这样，这我完全没有想象到。上一次开会时，我是全心全意希望他抓工作的，这一点，叶群同志可以证明，伯达同志也知道，春桥和文元同志也知道。可是他死不回头。另一个是个叛徒，变节自首分子，被搞出来了。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姚文元同志（还有他组织的写作班子）写的嘛，有些人却贪天之功，说是他们搞的。

我想，我略微讲这么一点我的认识过程，使大家可以对文教这方面，看出一点苗头。我要着重地向同志们呼吁，除了抓党、政、军和经济之外，这个“文”也得要认真抓。当然要做调查研究，还要有一番刻苦的学习。因为各行各业，都有各自的规律、特点。但是，这也不是难事，只要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了，那末，堡垒总是可以攻克的。几个堡垒已经都攻克了嘛。一个京剧，一个全世界都认为了不起的芭蕾舞，还有个交响音乐，全都初步地攻克了嘛，没有什么难事。这对全世界都是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是垂死的阶级，它表现现代生活，赤裸裸地用腐朽的堕落的东西来麻痹人民，腐蚀人民。倒是修正主义搞一点伪装，很使人讨厌。但是这几年，它也是赤裸裸的了，不再搞什么遮羞布，而是赤膊上阵了。我想，谈我的这个认识过程和实践过程，对同志们今后大力抓文教系统，能不能有一点帮助？

大、中学校都要改革教学制度、教学内容，都要搞斗、批、改，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目前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什么经验。文学艺术也得要改造。我在一九六四年，曾经对文艺界的一些人说过，你们吃了农民的饭，穿着工人织的布，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警卫着国防前线，你们不表现工农兵，你们艺术家的良心何在啊！电影《南征北战》，我抓过，粟裕同志，那个时候，我记得跟你交涉过，关于服装应该怎么样。陈老总，你还记得吗？那个戏虽然有缺点，但是基本上还是个好戏。那个戏，是我具体抓的，是你组织创作的，还改过。忘啦？噢，还记得。

陈伯达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大意）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

林彪同志要我来这里讲讲刘、邓路线问题。上一次的会我已经讲过一回，和康老一块，康老先开头，我继续讲，那次讲话有一个记录，虽然不那么很完全，但基本上可以。我想那个记录可以发给大家，我也不做修改了，即使有些错误，也是不要紧的。许多同志也听过了，没有听过的，看看记录也是可以的。今天，我讲的可能重复一些，但是不准备完全重复。

讲刘、邓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问题，我想讲一下我们党的发展情况，发展历史。

参加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上是两种人。一种人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他们看出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行的，中国革命应当由无产阶级来领导，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以经过民主革命阶段到社会主义革命，由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到共产主义，为最后的目的。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很多党员。另一种人是为了民主革命，为了资产阶级革命到党里面来的。他们可能着重点是在反帝这方面，而反封建还是软弱的。他们就要停在民主革命阶段，而民主革命可能还是一个不彻底的民主革命，他们是拥护的。这是刘少奇所代表的部分党员。因为在我们党内，有带着两种目的的人加入了党，所以就有了两条路线。以无产阶级的代表人、无产阶级的领袖毛主席为代表的、这是一条路线。还有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刘少奇为代表的，这又是一条路线，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我们党

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主要的就是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为他有一套可以欺骗的东西，在党里面蒙混了很久。毛主席说：我们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谁呢？现在就是刘少奇。

刘少奇的东西，过去我也知道不少，昨天和今天又看了他的一些讲话记录，有许多荒谬的东西，是令人吃惊的。我们所说的全国解放以后两条道路的斗争，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毛主席很早就给我们指出，在中国不可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梦想。因为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回到老路上去，就是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道路上去，所以说资本主义的道路，实际上还是老路，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老路。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是批评王明的，同时也是批评刘少奇的。一九六五年初，搞《二十三条》，毛主席严厉批判他的时候，他在个别谈话中说，《新民主主义论》是批评他的。完全不错。在《新民主主论》中，毛主席是这样告诉我们："现在的世界，是处于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在这种情形下，要在中国反帝反封建胜利之后，再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岂非是完全的梦呓？"毛主席在后面还讲了一个土耳其的例子。他说："一九二七年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分子不是曾经高唱过什么基马尔主义吗？然而中国的基马尔在何处？中国的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又在何处呢？何况所谓基马尔的土耳其，最后也不能不投入英法、帝国主义怀抱，一天天变成了半殖民地，变成了帝国主义反动世界的一部分。"就是说，土耳其事实上也变成了半殖民地。所以两条道路的斗争，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不是走毛主席所指出的社会主义道路，那么就是走老路，走蒋介石的道路，走汪精卫的道路。

这一点，在日本投降后，刘少奇赤裸裸地说了。他说要当"红色买办"。红色就是红色，买办就是买办，那里有"红色买办"呢？他要粉刷一下。这不是偶然的。实际上，打垮蒋介石，赶走帝国主义，把土地革命进行到底，经过这个阶段转到社会主义的时候，中国又出现新的买办，刘少奇就是准备当这个新的买办。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他在北京干部会议上讲话，说他在天津同资本家谈话时，说中国只有两个前途，不搞社会主义，就搞帝国主义，再没有第三个前途。你们（资本家）是不是想出了第三条道路，既不搞社会主义，又不搞帝国主义。如果能想出第三条道路来就算你们有本事。其实毛主席早就给我们指出来了，不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走老路。这个老路，不用资本家去想，从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到蒋介石走的道路，就已经说明了。只要是无产阶级领导，只要是共产党领导（这是指真正的共产党，不是冒牌的共产党，不是刘少奇冒牌的共产党），那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如果刘少奇冒牌的共产党领导，那就会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还有什么帝国主义呢，只能是帝国主义的奴才。所谓第三条道路，本来中国的资产阶级讨论过多次了，他们也想找一条第三条道路，可是找来找去，还是蒋介石那条道路。但刘少奇还说是"不搞社会主义，就搞帝国主义"。而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首先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容许"。因为你本来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嘛！其实在日本投降后，美国已经打进来了。美国就是有一套计划，它要和蒋介石合作，把中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而刘少奇那个时候说，就是准备当"红色买办"，就是准备在美帝国主义占领、控制下当买办。那里还有什么帝国主义呢？他还说："照资本主义的方法发展的方向一定要走到帝国主义，变成帝国主义以后，将来中国的原料市场少了"。他说"中国的原料、市场少了"，是根本把毛主席在七大和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完全忘得干干净净了。全世界的市

场，只有中国是最广大的市场，七亿人口的市场。原料，中国也是很丰富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过去帝国主义说，中国不可能成为钢铁的国家，不可能成为煤油的国家，这是完全破产了的，而刘少奇说，如果要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就要到外国去搞原料、搞市场，向人家去抢，那还不得打仗，发生世界大战"？他完全跟毛主席历来的指示、历来的教导唱反调。他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是老年的、腐朽的、反动的而是青年时代，还能发展"。这是他在解放以后讲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当然比欧美的要晚一点，但是它衰老也快，衰老腐败。

日本投降以后，毛主席就很明确地给我们指出："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至于蒋介石呢？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人民抗战的绊脚石，现在这块绊脚石却要出来垄断胜利果实，要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仍然回到抗战前的老样子，不许有丝毫的改变。这样就发生了斗争。同志们，这是一场很严重的斗争"。这是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篇，毛主席讲摘桃子问题时讲的一段话，这是一九四五年八月讲的，而刘少奇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作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报告时，认为中国现在有三种民主力量。出现了奇怪的理论，这可能是华盛顿来的理论。他说："中国人民三个主要阶级要民主，劳动人民、中等资产阶级中间派，一部分大资产阶级要求中国民主。"他在这里没有提无产阶级，只提劳动人民，而劳动人民比较广泛，有工人阶级，有农民，有手工业者，等等。他没有突出无产阶级。他说的"一部分大资产阶级"是什么人呢？大家知道，对于大资产阶级，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分析得很清楚，一种是亲日派的大资产阶级，汪精卫；一种是英美派的大资产阶级，蒋介石。照刘少奇说，英美派的大资产阶级也是要求中国民主的。而且还说"三种人民"，蒋介石也算是人民。毛主席早就说得很清楚，蒋介石是人民公敌，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毛主席在《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一文中说，只要一提人民公敌，"中国人民就知道是蒋介石。蒋介石干了这一切，他是不是人民公敌的问题，是否还有争论呢？争论是有的。人民说：是，人民公敌说：不是。只有这个争论。至于人民群众，这样的争论是越来越少了。现在成为问题的，是这个人民公敌，要打内战了"。这是毛主席讲的话，认为蒋介石是人民公敌已经不成为争论的问题了。但六个月以后，刘少奇却把人民公敌变成了人民。

（**康生**：斯大林那个电报，是错误的。我是经常这么想，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领导苏联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了德国法西斯，德、日、意法西斯垮台，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有功绩的。赫鲁晓夫诬蔑和反对斯大林，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要看到，在战后一个时期，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有右的错误。他当时有一个什么想法呢？他过高地估计了美国帝国主义力量，过低地估计了各国人民、世界人民革命的力量，他有一个政策，就是在各国千万不要引起武装冲突，不要把苏联再扯进去同美国冲突起来。他是这么样一个方针。因此，法共交了枪，法共有四十万武装，整个占领了马赛，交了枪。希腊快打到雅典了，也交了枪。他要毛主席到重庆去干什么呢？实际上也是要交枪。就是要搞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那一套。所以中国的胜利，是毛主席违反了斯大林那个错误政策而取得的。这是毛主席的伟大。如果我们按照斯大林那一套，那就象法国一样，法共总书记多列士不是作了副总理吗，陶里亚蒂不也是副总理吗？后来统统干掉了。这也就是王明那一套。王明是最羡慕那一套的。可惜蒋介石没有法国帝国主义那个气魄就是了。主席伟大，违反斯大林的错误政策，坚持武装斗争，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这不仅对中国有伟大意义，对世界也有伟大意义。中国革命胜利后，据刘少奇讲，斯大林承认了错误，到底是不是

承认了，我现在也还怀疑这件事。中国胜利了，在一九五O年、五一年，印度、印尼、缅甸、马来亚还是交了枪。马来亚有武装交了。印尼有武装交了。他有个理论，说这些国家同中国不同，中国靠近苏联，国家又小，交通又不发达，所以能够胜利，主要是靠近苏联。那些国家不靠近苏联，国家又小，交通又发达，那就不能实行中国的经验。最近我翻了一下斯大林的文件，一九五O年和五一年，他有两个文件是这样说的，印度、印尼、马来亚这些国家不能学习中国的经验，因为他们那里地理环境，各方面条件不同。他还是那么一个想法。过去我认为只是欧洲交枪，最近我才知道亚洲也交枪。没有交枪的就是毛主席。毛主席在《关于重庆谈判》一文中，有一句话说："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这是有极大世界意义的一个战略措施。)

日本投降的时候，毛主席在讲摘桃子的那篇讲话中说："我们当了人民的代表，必须代表得好，不要象陈独秀。陈独秀对于反革命向人民的进攻，不是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结果在一九二七年的几个月内，把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统统丧失干净。这一次我们就要注意。我们和陈独秀的方针绝不相同，任何骗人的东西都骗不了我们。"可是，刘少奇在毛主席回来以后，就作那个"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报告。这个报告，通篇没有说和蒋介石要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个方针，而是要靠议会斗争，提出要解除武装，把我们的军队变成国民党军队。(**王力**：廉价出卖。说只要把军队交出去，美国的美金就来了。) 这完全是一个骗人的东西。刘少奇说："我们参加政府，美国借的二十万美金就来了，复员善后，整年用一点、其余要开工厂，我们要去参加，各种商业、农业亦要参加去搞。"美金不是送给我们的，是送给蒋介石，给我们一点点，用来收买。

总之，毛主席说：蒋介石是人民公敌。刘少奇在毛主席这个讲话以后六个月，他还认为英美派大资产阶级是要民主的，民主革命不是经过战争，而是经过宪法，成立议会，就可以彻底实现工业化，土地改革。蒋介石也搞土地改革，搞工业化，这不是天下奇闻吗？刘少奇那个时候说："有些人要去作官了，中央政府的官"，"国民党各党派也会到解放区来活动，设通讯社，办报纸，设党部，讲统一，希望共产党给民主"。你看，他代表蒋介石来向我们要民主啊！他还说："国民党也会来参加我们的政府，这不简单，与国民党办事不好办，但非办不可。"就是说，非这样作不行了。军队不能够在党领导下了。他认为"国民党的军队会脱离国民党"，可笑不可笑呢？说我们共产党员也要脱离军队。(**王力**：全民国家！) 说"相信国民党的军队能够脱离国民党的领导"。竟有这样荒谬的观点。这说明，他相信国民党军队可以脱离国民党的直接领导，我们的军队也可以脱离共产党的领导。事实上，是国民党要吞并我们的军队。他说，政协会议以后，参加政协会的人，很有风头"，军队"显示不出其重要了"。虽然他也说没有军队出不了风头，可是他又说什么七君子等人出风头，这些人有什么军队嘛？所以说，军队出不了风头了，是政协会议的人出风头了。他说，当时我们党内的主要偏向"是狭隘的左的关门主义"，"使党内党外很多人不相信内战会停止，不相信说国民党蒋介石不打我们了"。你看，这些不相信都是对的，但他却说这是"左倾"。他又说："使那很多人不相信国民党蒋介石能够民主改革，不相信能和我们办民主建国，因而他不相信中国走向和平民主新阶段，他还看看觉得党的工作不必要转变"。这是由革命变成投降，丢掉武装搞议会。这是意大利和法国走的道路。

他还说："觉得军队整编会整掉不去重视合法斗争，把自己限制在小的范围内"。就是搞议会斗争，把军队交出去，这叫做不是"小的范围内"了，这叫做不是"左的关门主义"了！我们军队没有党的领导，那还成什么人民解放军啊！他说："党不直接给你们指示"，"只能简单

的从报纸上，广播通讯社消息，了解党的方向，而不守纪律去做，更没有办法，那会失败的。"守纪律，什么纪律啊？国民党的纪律，不守国民党的纪律去搞，去听这个消息，这样从广播电台，广播通讯社，从报纸上，了解党的方向。他不了解，这么一搞，我们的报纸就根本出不成。可见他还比不上某些党外人士。他说："左的关门主义在党内外一样，有些党外人士比我还左。"那倒是真的。他又说，这些党外人士"偏到一边去了"。就是指他们不相信蒋介石那一套，即上面说的那几个不相信。他还说："我们要说服他们，好好去说服。"就是党外人士不愿意搞投降，他要去说服。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解放战争中，他是根本没有什么作为的。他到西柏坡，按照他的一套搞土改，打倒一切（**江青**：搬石头。）另外一方面，把我们党变成俱乐部。他在西柏坡有一个讲话，有记录。他在讲话里面，不但没有说我们的党是毛主席的党，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并且说我们要改组支部。说我们大家喜欢文化班就搞文化班。我们总支有三百多党员，如果都编入学习班，有的编入高级班，有的编入中级班，有的编入低级班。这就是支部组织的一个好方式。以后就不开小组会，开学习班的会，也就是开党的会。还说，一个月开一次支部大会，可以活泼一点，开一个钟头的会，演两个钟头的戏。（**康生**：法国共产党的一个党员，找了一个漂亮的歌女，开音乐舞蹈会，拿着个表，说你填表加入共产党吧，你加入共产党吧，进俱乐部给你个长年票，不要钱。）他还说，大家喜欢俱乐部，就把他变成俱乐部的会，没有戏班子就自己组织一下。我们很多同志喜欢唱，就把这些同志组织起来，一个月开一次支部大会，又演戏，大家可能要求一个月开两次三次。这样，就引起兴趣了。（**王力**：邓小平就开了一个麻将俱乐部，天天晚上去干。）

我刚才讲的，大部分是解放以前的事。

解放以后，他在天津的讲话，是很有名的了，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那个臭名昭著的讲话，就是他在王光美哥哥家里住的时候，同天津资本家的谈话，总之一句话，就是"剥削有功"。一九四九年三月，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说："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毛主席在这里讲了在全国胜利，土地改革以后，国内还存在着两个阶级的矛盾。可是刘少奇在那个讲话中，全部抹煞了这个矛盾。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里说，对资产阶级要限制。刘少奇说不需要限制资产阶级，而是要限制工人阶级。他的整篇讲话都是批评我们的错误。说我们的错误，就是没有对资产阶级采取投降主义，要限制它。对资产阶级歌颂备至，对工人阶级则贬低备至，说得不成样子。说没有资产阶级中国就不得了。而事实是怎样的呢？在全国胜利以后，没收的工业已经占优势了，占主要的大量的了，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反对限制资产阶级，反对限制资本主义。他也讲社会主义，是和平走向社会主义。他说以后要限制，也讲了一点限制，想办法限制一下，就可以和平走向社会主义。他的所谓限制，是什么性质的限制？是对资产阶级有利的限制，还是对资产阶级不利的限制？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限制和反限制，有斗争，就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刘少奇这样讲，要限制一下，就是说要大量发展资本主义，他的限制，实质是限制社会主义，限制工人阶级。

刘少奇提出，"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要多少时间？他说："这是几十年以后的事，现在很难具体讲，不过时间总会很长不会很短，是十年或二十年，或二十年更多，等到了那个时

候一定要具体地讲。"他给一个资本家宋棐卿（很有名的，参加政协会议后便跑到香港去了，跑到巴西去了）讲，你现在几个工厂，将来还可以发展几个工厂，到社会主义了，还要给你管更多的工厂，还可以加你的薪，你干不干哪？宋说，为什么不干。刘少奇所谓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把很多工厂交给资本家。他还对宋说："你干就好，就是这个和平转变法。"这是转变到资本主义。由社会主义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所谓"和平转变"、天津资本家要摸底，摸什么底，就是摸了这个底，摸到了资本主义的底。

刘少奇说他的政策"重点是联合，不是斗争"。这完全是资产阶级心里的话了。他又说："不只是工人要向资本家进行必要的斗争，就是资本家也要向工人进行必要的适当的斗争。"恰好是资产阶级所想的，要向工人阶级作斗争。毛主席经常说，阶级斗争的学说，不是马克思发明的，这也是马克思自己说过的。但是马克思发展了阶级斗争的学说，认为阶级斗争的发展，必然进到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从刘少奇的观点中，就可以了解到资产阶级所想的阶级斗争是怎么一回事。他看到工人阶级要向资产阶级斗争，就提倡资产阶级也要向工人阶级斗争。他大唱工人和资本家"平等"了，所以工人阶级可以向资产阶级作斗争，资产阶级也可以向工人阶级作斗争。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作斗争。有个工人要求复工，资本家不同意，一个糊涂的工会的同志对资本家说："你叫他复工就复工，叫他不复工就不复工。"这件事不知是真的是假的。但是刘少奇觉得很好。这就是提倡资产阶级专政嘛。

关于工资问题，刘少奇是替资本家说话的，说工人吃个半饱，总比完全失业好些，总比完全没有吃的好些，提倡吃半饱。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底下做工，只能吃半饱。大家知道中国工人的生活，是很苦的。他却说吃半饱比没有吃好，他非常担心资产阶级的消灭。

总之，他全篇讲话，锋芒是对着工人阶级的，是对着社会主义的，他所讲的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是发展垄断资本主义。宋棐卿这一个工厂不够，再发展几个工厂，将来搞社会主义，还交给他几个工厂，还加他的薪水。他问宋干不干？宋说干。但是，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不以刘少奇的话为转移的。宋棐卿看到这个苗头，开了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当时是刘拉进来的），就溜掉了。

康老的意见很对，他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上，历来在党内有两种倾向。如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斗争，这个大家是看得很清楚的。孟什维克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的事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政权是资产阶级的，要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很长时期的发展。列宁在最后一篇文章《论我国革命》中就讲到这个问题，讲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和列宁所领导的共产党，有一个很大的根本分歧；就是当时列宁主张由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而孟什维克说工人没文化，不能搞社会主义。列宁驳斥说，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先搞社会主义革命，夺取了政权，再来搞文化呢！列宁说的是对的。孟什维克的意见是这样的，不是由一个革命阶段迅速地再转变到另一个阶段，而是停顿在一个阶段上，让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然后再搞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是这样主张，刘少奇也是这样主张。是两条路线，一条是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一条是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的路线。（**康生**：从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布哈林、陈独秀、王明一直到刘少奇，还有陶里亚蒂都是这么一个问题。）（**江青**：一脉相同。）陈独秀、刘少奇加了一个，就是民主革命不能深入发展要把中国重新回到老路，重新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一点是不同的，因为俄国是帝国主义国家。（**康生**：这是真正的老修，这种理论出来已经有半个世纪了。）

这是两个阶级斗争的问题。毛主席在摘桃子这篇文章中，批评有些同志把原子弹估计得

了不起，看得神乎其神，指出这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中来的，是从资产阶级报纸、通讯社来的。有两种世界观、方法论：无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和资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这些同志把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经常拿在手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却经常丢在脑后。我们队伍中的唯武器论，单纯军事观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作风，个人主义思想等等，都是资产阶级的影响。对于我们队伍中的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也要象打扫灰尘一样，经常扫除。灰尘是经常有的，刘少奇这个灰尘，是在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才彻底暴露在群众面前，在我们党面前，现在是要扫除这个资产阶级的灰尘了。

全国解放以后，刘少奇对资本主义、对资本家采取这样的态度，那么反对农业合作化，主张单干，这就不足为奇了。他主张单干是一贯的，没有变化的。如果是毛主席的意见在党内通过了，他也举手，那是一个形式。一九五一年，他就批评山西搞合作化，说没有机械化，就不能搞合作化。这也是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嘛，没有充分发展的生产力，就不能搞社会主义。第一次互助合作的决议，就是对刘少奇的意见作斗争产生出来的。毛主席看到刘少奇对山西那个批语，发了很大的脾气，要搞出个文件。毛主席在根据地时，在民主革命阶段，就为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作准备。他提倡互助组，提倡变工队。在中央苏区，就提倡耕牛合作社。在陕北，大力提倡变工，变工是一个互助的形式。经过变工、互助，在一定的时候，可以过渡到合作社。这些，不但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讲了，而且写上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可是，刘少奇好象根本没听过，没有见过，他的资产阶级本能，使他忘记，使他抵抗。刘少奇的这个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的路线，终归要暴露出来的。

这回在文化大革命中，主席写《炮打司令部》这张大字报，下决心把他公开给全党。过去主席讲过多少次，刘少奇是不准备搞社会主义的。我就听过主席讲过多少次。在搞《二十三条》的时候，毛主席发了很大的脾气。因为刘少奇要专毛主席的政。毛主席把宪法和党章端出来，说我有言论自由，党员可以在党内说话。毛主席批评了刘少奇当时在四清运动中的错误。他那个错误是要把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推广到全国，否定毛主席的方针，否定毛主席的工作方法。他在吹嘘王光美经验的时候，公开说毛主席的调查研究已经过时了。这个记录落在我的手里。我和王力同志把这一段改掉以后，他就不发了，当时我感觉到，他是为着这一点不发的。主要是改了这一段，他说这段改了不行，发下去变成严重的问题，不发了。（**江青**：我都听了。）（**张春桥**：各地都印了。）都印了。当时改，是想把他的胡说八道勾掉，结果他不接受。现在了解，桃园的经验是假的。（**江青**：那次他要反教条主义。要是不去像王光美那样蹲点，什么部长都不能当了。）所有中央委员，省委第一书记，都不能当了。这里我要说公道话。康生同志有不满意的表现，有一回说，我一定下去蹲点了。我说，为什么呢？康生同志说，唉！不蹲点，中央委员就当不成了嘛！（**江青**：发牢骚了！）（**康生**：是发牢骚。其实她那个广播，我根本没有听。）事实上，王光美并没有真正蹲点，说起来很可笑，什么同吃同住同劳动，完全是假的，学冯玉祥的办法罢了！冯玉祥请客吃窝窝头、小米稀饭，进去喝鸡汤。（**江青**：彭德怀也是这样！）刘少奇、王光美的这些是老的、腐朽的东西了，可是他在我们党内作为一个新发明。

总之，或者是刘少奇的路线胜利，或者是毛主席的路线胜利，就是说或者是资产阶级胜利，或者是无产阶级胜利。在我们党内，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决定中国的命运。刘少奇错误地估计了他的影响，错误地估计了他所代表的力量，他失败了，破产了，斗争还存在。但是我们毛主席的路线已经取得了胜利。毛主席在解放战争最大关键的时候，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个报告中说："我们自己的命运完全应当由我们自

已来掌握。我们应当在自己内部肃清一切弱软无能的思想。一切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这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而刘少奇相反，他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以为他的王光美、刘涛、刘萍萍和邓小平的女儿毛毛等这几个人，还有几个"联动"的小头头，这些力量大得不得了，而对我们毛主席藐视。他没有想到，他失败这么快。

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列宁死得很早，他没有来得及提出这个问题。虽然他讲过要搞文化革命，但是没有像毛主席所提的这样内容的文化革命，他很早就死了，后来苏联没有搞。现在不管还有什么曲折，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在胜利地前进，因为我们有毛主席掌舵，随时给我们指正方向，纠正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这个革命正在世界历史上开辟一个新的历史。斗争的根本问题，是走资本主义还是走社会主义。从什么问题表达出来呢？从对待群众的问题表达出来，对待群众是什么态度。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说得不少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它反对群众，镇压群众。毛主席这条路线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有的同志们，从那里分别的？我想这个问题，只要到群众里面去就很清楚了。有些是不容易分别的，但是到群众里面去就能够分别了。

不要去搞阴谋，不要去搞自己的块块。有人在组织红卫兵成为御林军。李井泉在四川，搞了一个什么产业军（江青：近卫军）保卫他自己。天津的万晓塘、张淮三组织了什么赤卫军的野战兵团，保卫他自己。不要搞这些把戏。这些东西，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威力下，在毛主席思想的光辉照耀下，都要彻底破产的。这些东西，一时看来力量很大、占优势，但没几天就垮台了。

斗争是反复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决就是胜利，坚持同革命群众在一起，要有充分的信心。现在的形势是清楚的，有一些人一下就夸大拥护他的人有多少，多大，但是真理不在他那边，而是在毛主席这边，是在拥护毛主席的同志这边，所以一击即溃。湖南的捍卫团垮台了。他这个造反派里边有两部分，一部分比较正派的，但是其中有个头头动摇了，在中间转来转去，摇摆来摇摆去，最后摇摆到哪里去？看我们的工作，看群众工作，终归我们可以争取大多数。能够争取大多数，现在我们从整个估计，是获得大多数，不然不能说明我们现在各方面工作的进步。农业方面、工业方面，交通运输方面，现在都有很大的进步。经过文化大革命，人的思想革命化了，一切工作都好做了。

文化大革命中产生一系列的新的问题，要我们重新来研究。我们在各个方面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真正的社会主义模范国家，苏联已经倒退了，已经变成资本主义，在那里搞资本主义复辟。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说，现在苏维埃是世界的模范国家，但是，有可能新起来的国家把苏维埃抛到后边去。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可能变成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主义模范国家。但是我们要经常记住毛主席这句话："戒骄戒躁"。我们文化革命小组做的工作很少，无非是能够说几句话、写几篇文章。我觉得我们应当有这个信心，使我们中国建成为全世界最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经堕落下来了。

这里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在军队的同志可能发生这个问题，不要因为反对我，或者对我有意见，就说他是反革命，反动，这个很危险。为什么主席提出，各省来谈判的，两方面的人都来，你说他是反革命的那一派也来，因为他不一定是反革命。如青海的问题，内蒙古的问题，就很清楚嘛，说他是"反革命"的是真正革命的，说他是革命的其实有个别的是真正的反革命，赵永夫是暗藏下来的反革命，王逸伦也是暗藏下来的反革命。要把自己看成是群众中的一分子，这是主席的思想。毛主席再三告诉我们要以普通劳动

者的姿态活动，不要以官的姿态，官的架子活动。我们现在有十七年的和平环境，的确在办公室办公的时间比较多，包括象我这样的人很容易同群众发生隔膜。发现问题，在工作中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办事，必须在实践中，必须在群众中才能够做到。江青同志她就是深入接触实际，才发现了文艺界一塌糊涂，一大笔糊涂帐。

文艺界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为什么呢？象他们说话或者写文章，现在中国看的人还占少数，看戏的听音乐的看电影的占多数，因为不识字的人也能看也能听。我们要通过文学艺术来教育群众，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业。象邓小平，对香港电影、美国电影有兴趣，这个事在一九六二年主席在北戴河就批评了的。（江青：一九六二年我到刘少奇那里去，我还说，中南海是人家的一块宣传基地。那时我还搞不清楚他，六四年我真正认识了他。）如果我们的文艺阵地让资产阶级占领，让帝国主义占领，让封建主义占领，让修正主义占领，那我们的头脑就要起变化。因为，它那一套习惯势力，比新的力量要大。这就是毛主席再三强调的。列宁也说过，旧的习惯势力非常强大。剥削阶级有几千年历史，经过几十年是不是可以完全把剥削阶级的文艺阵地攻破？我们要用很大的努力。除此以外，教学制度的改革，还有宣传、出版等一系列的工作，还在开头，还在摸索。

关于军队的问题，我就不说更多的话了。昨天我说过，我是你们的小学生，现在我还是讲这句真心话。在座的同志很多有丰富的经验，战斗的经验，但是小学生向先生说说话也可以的。就是说接近群众，懂得群众，又是很容易的，又是不容易的。所谓不容易就是旧的意识经常在我们脑子里起作用。譬如冲军区这个问题，群众没有想到人民的军队会向人民开枪，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嘛。毛主席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那么人民的军队向人民开枪，这是不可理解的嘛。所以，在内蒙古一开枪大家都回去了，不来了。主席告诉我们，群众到军区，要找军队谈判，证明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这是一种好现象，是一种好事。当然啦，这里面出现一些别扭的事情是可能的。但是有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我们人民的军队不能随便向人民开枪，不能随便抓人。我说这个道理是普遍性的吧！昨天我批评一个同志说过，说是我有一件事妨碍他的计划，妨碍他抓人的计划，我就给他说，你要抓人嘛，如果是真正的坏人，回去还可以抓嘛，为什么一定要在大街上抓，这样丑化我们自己呢？回到单位去，让群众去识别，让群众扭送，那不是更好吗？为什么一定要在那里抓呢？

再说一下阎红彦的问题。阎红彦是新交，我一九六Ｏ年在医院开刀，他去看过我，我很感谢他。我无非给他打了个电话，说是听说群众冲了军区，要找阎红彦辩论，不管他那时在不在军区，出来一下就算了。我给他说，出来见一下群众，不要紧的。因为我的普通话讲得不好，我只问了他是不是阎红彦，后来的话是汪东兴同志代讲的，就这么两三句话。第二天早晨他就死掉了，留下一个遗书，说他的死是陈伯达、江青逼死的。我的话完全是好意，不但是爱护军区，也是爱护阎红彦本人，是叫他出来一下，解一下围，见见群众，没有什么问题。他就是不见！为什么我要再提这个问题呢？因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有这么一种人，怕群众怕到这种程度，就是这么两三句话，说是我逼死他的，我是叫你出来见群众嘛，有什么逼的问题呢？你可以不听嘛！问题是在群众运动高潮的面前过不了关，这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抵抗，他从一个共产党员蜕化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但是在群众的威力下边，他没法子活下去了。他不能操纵军队，如果他能操纵军队，我看他是要开枪的。

我说个笑话，我经常接见群众，天天来的那些群众代表我一个都不认识的，比如象北航"红旗"，它的领袖名字，不久以前我才弄清楚，叫做韩爱晶。原先我不知道他是个英雄。但不管怎样，我们要相信一条，毛主席的指示，坏人总是很少的，大多数是好人，相信这一

条，我们就什么地方都可以去，有坏人也可以暴露嘛。

我今天说的，过去也说过一次，这次做为补充吧。

康生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大意）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

林彪同志和军委的同志要我在会议上讲一次话。我对于军队的支左、支农、支工、军训、军管，都没有实践经验。参加这次会议，主要是向解放军同志们学习。既然要我讲话，要我讲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那末，我就把一些不系统的想法提出来和同志们交换意见。

一月二十三日中央关于军队支持革命左派的决定，是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决定。这个决定的第五条指出，必须"在全军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这是一条很重要的决定。因为支左最根本的就是支政治，支毛泽东思想，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支持革命左派，就是要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坚决的斗争。林副主席讲过，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我觉得，军队支左正是我们带着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一个好的机会。林副主席讲，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军队支左就更要在运用毛主席著作上狠下功夫。因为执行毛主席的路线，还是执行刘、邓的路线，这是划分左、中、右最基本的一个标准，我对于毛主席著作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学习是不够的，只是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不系统的意见，提出来供同志们参考，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

前次军级干部会议我讲过，去年十二月毛主席同一个兄弟党的领导人谈话时，谈到了两条路线斗争的本质。当时毛主席指出，两条路线斗争的本质，就是中国走什么样道路的问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进行阶级斗争，依靠群众，依靠无产阶级，依靠党的领导，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就必然要依靠资产阶级，反对群众路线，反对阶级斗争，妄谈什么"共产党员的修养"，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讲，这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存在着的。中国革命几十年来，一直存在着这种斗争。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还存在，就是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整个的过渡阶段，必然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下面我想从几个问题上来谈一谈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

（一）

过去有一种说法，把刘少奇说成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譬如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说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中如何正确，说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是一个模范"。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这个决议，对毛主席的作用有一些正确的论

述，但是在有些问题上是有错误的。譬如对瞿秋白的说法，对刘少奇的说法，是不对的。这个决议不是毛主席写的，作为《毛泽东选集》的附录是不恰当的。征求过毛主席的意见，《毛泽东选集》将来再印行时，这个决议要抽掉。

刘少奇到底是不是一个"白区工作中策略思想的模范"呢？我们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来看一看。毛主席一九三九年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说："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刘少奇是不是白区工作策略思想的一个模范呢？那么就看看在这三个基本问题上，他的主张是什么？

毛主席说："我们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离开了武装斗争，离开了游击战争，就不能了解我们的政治路线，也就不能了解我们党的建设，我们的政治路线的最重要一部分就是武装斗争。""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这是毛主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略思想。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恰恰是背道而驰的。他不是主张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不是主张进行武装斗争，不是主张去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而是迷恋大城市，引导无产阶级放弃武装斗争，在城市工会工作中实行经济主义。一九二六年，他就说过："工会为工人之经济组织"，"今后职工运动之方针，应作各种经济斗争，工人在任何时期都不能离开其经济上之利益，经济问题，工人在所必争。经济斗争的发展，即为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挂帅，这是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共同的一个特点。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中，实际上是实行机会主义、经济主义，放弃无产阶级政治，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挂帅，放弃武装斗争。

再来看统一战线的问题，毛主席说："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是"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毛主席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政党统一战线问题上，一方面反对关门主义，另一方面反对把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的尾巴，反对投降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企图。强调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恰恰又是背道而驰的。他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实行投降主义，放弃党的领导，他不是象毛主席所说的，把统一战线看成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是要把人民的武装交给蒋介石去统一领导。早在一九三六年、三七年，他在北方局白区工作时，就用陶尚行的笔名写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在资产阶级的刊物上发表了的。在这篇文章中，他宣扬投降主义，主张把华北的人民革命武装交给国民党，完全接受了王明的投降主义。因此，王明对陶尚行那篇文章大加赞赏，这不是偶然的。

再来看关于党的建设方面，毛主席说，"党的组织，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的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就是说，要把我们的党建设成为能够进行武装斗争的党，能够保持党的独立性并掌握统一战线的党。毛主席又说："在过去发展党的组织的工作中，虽然中央着重地提出了'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的口号。但实际上是混进了许多投机分子和敌人的暗害分子。""大资产阶级在思想上企图'溶解'共产主义，在政治上、组织上企图取消共产党"。因此，我们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要巩固党的组织、纯洁党的组织。刘少奇的组织路线恰恰同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背道而驰的，他是实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的、招降纳叛的投降主义路线。同志们看到的那份一九三六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几个人自首反共叛党的材料，就是刘少奇实行招降纳叛的投降主义路线的铁证。这正如中央在三月十六日关于这个问题的批语上指出的，薄一波、刘澜

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余人在自首投降出狱以后，由于刘少奇的包庇重用，"长期隐藏在党内，窃据了党中央和地方党、政机关的重要职位"。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才把这个叛徒集团揭露出来，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我们党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这个叛徒集团，只是一个具体例子。在座的刘格平同志知道，薄一波出狱以后，刘少奇又派他到阎锡山那里去，贯彻刘少奇的叛徒路线，把太原第一监狱的一些人同样按照这个办法去自首叛变投敌。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乔明甫，就是一个。过去杨尚昆那个办公厅的副主任龚子荣也是一个。北京这六十几个人，只是刘少奇的叛党组织路线、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的一个例子。

在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中，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个基本问题上，就明显地看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尖锐斗争，长期对立的。这是在基本问题上、原则问题上的对立。所以说，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不只是在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出来，而是很早就存在的，只不过是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更集中更突出地表现出来罢了。

(二)

上面所说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个基本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要解决中国的政权问题，就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的人民政权问题。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在政权问题上，我们看一看刘少奇的反动路线是如何表现的。

从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到一九三九年，民族危机加深，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国民党一直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一九三九年，正是国民党投降反共活动的逆流猖狂的时候，也正是蒋介石宣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毛主席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号召全党全军全民积极投入革命战争，去争取胜利，针对国民党的投降分裂活动和倒行逆施，毛主席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由于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方针，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打退了国民党反党投降的逆流。同时，毛主席号召全国革命青年投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消灭日寇，在思想上和在各方面准备打倒反动的卖国政府。在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毛主席出席了延安的"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在会上，发表了《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著名讲演。在这篇讲演中，毛主席告诉全国青年说："五四运动所反对的卖国政府，是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政府，是压迫人民的政府。这样的政府要不要反对呢？假使不要反对的话，那末，五四运动就是错的。这是很明白的，这样的政府一定要反对，卖国政府应该打倒。"在这篇讲话中又说："现当全国人民奋起抗日的时候，大家鉴于过去革命失败的经验，下决心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并且不容许再有卖国贼、不容许革命再失败。"毛主席告诉青年，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国将来一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毛主席号召青年，必须同工人农民群众相结合，这是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分界线。毛主席说，口头上讲马克思主义，讲社会主义、是不算数的，要判断"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我觉得，毛主席这段话

对于我们今天去支左，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今天支左，是真支左还是假支左，是真夺权还是假夺权，是真实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假实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实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一个重要标准，就象毛主席教导我们的，要看对广大的工农革命群众的态度和关系怎么样。

正当毛主席号召群众打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建立新中国的时候，一九三九年七月，刘少奇为了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思想和革命路线，抛出了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个小册子。大谈什么"思想意识修养"和为人处世的封建哲学，要人们离开当前尖锐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而去作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修身养性。毛主席说，这本书完全是欺人之谈。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到底要不要夺取政权，能不能夺取政权，怎样夺取政权，对于这些基本问题，这个小册子避而不谈。根本不谈夺取政权，不谈无产阶级专政，离开了政治，离开了阶级，离开了阶级分析，离开了阶级斗争，完全是一本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反动的、不触及蒋介石一根毫毛的东西，是一株资产阶级的大毒草。

关于这个问题，这几天报上有很多文章，昨天陈伯达同志也讲过，我不详细说了。但是必须指出一点，在《修养》的许多地方含沙射影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比如他谈到学习马克思、列宁的时候，谈什么没有偶像崇拜，实际上是影射毛主席的。应当说，这个黑《修养》，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为了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九四Ｏ年一月，毛主席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这本名著。我这里顺便说一句，毛主席并没有看过这本黑《修养》，只是在一些场合中听到刘少奇一些谬论。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全面地、深刻地、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基本经验，揭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革命的规律，粉碎了企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梦想，科学地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并且指出了从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这一本书，同刘少奇的黑《修养》针锋相对，一开头就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紧接着就提出"我们要建立新中国"。毛主席说：中国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完结其第一个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这一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著作，明确地规定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和步骤，彻底地粉碎了王明、刘少奇等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动路线，彻底粉碎了他们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路线。把刘少奇的黑《修养》同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两相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路线、谁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谁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

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政权问题就更加尖锐地提到面前来了。毛主席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发表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著名演讲。在这个演讲中，毛主席指出中国存在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他说："从整个形势来看，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是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呢？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这个时期如果有机会主义的话，那就是不力争，自愿地把人民应得的果实送给蒋介石"。毛主席这些话是有深远意义的，是针对党内的投降主义路线而讲的。我们过去学习毛主席著作，总是有些糊涂，不是象林总所讲的那样，带着

问题去学，对林总这句话体会不深。现在把刘少奇那些文件，讲话拿出来，再同毛主席著作中那一年，那一个问题上讲的一对比，事情就非常清楚。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基本原则问题上，的确是明显地对立着的。

毛主席在这一篇讲话中，提醒大家说，内战是不可避免的。他说："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确定了。"他明确指出："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在我们党正准备向蒋介石进行战争的过程中，象昨天总理所讲的，有一个插曲，就是毛主席到重庆去谈判。这个谈判的原因昨天总理已经讲了。毛主席率领代表团到重庆去谈判，方针是很明确的，就是要尽一切可能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内战的阴谋，要揭破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同时也是为了我们争取备战的时间。现在我们看看《毛泽东选集》，毛主席在《关于重庆谈判》这篇文章中指出："国民党一方面同我们谈判，另一方面又在积极进攻解放区。""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毛主席又说，国民党向我们进攻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反击，也是很自然的，"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刘少奇的反动路线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完全相反的。刘少奇在抗日战争以后，害怕战争，害怕革命，幻想和平，提出了一条投降主义路线。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他作了一个《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报告。这个文件，昨天伯达同志作了很好的批判，我不多重复。总而言之，就是在这个报告中大肆散布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幻想，宣扬阶级投降主义，宣扬议会斗争，取消武装斗争，主张取消党对军队的直接领导，把人民的革命武装交给国民党统一指挥。他说："军队也要整编，我们的军队成为国军、国防军、保安军、自卫队，我军的支部党委会、政治委员取消，在军队中是取消党的组织、整编，各党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指挥，统一于国防部"，"我党与军队的关系要作到和国民党差不多。"

同志们，毛主席讲："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刘少奇不仅是交一支枪、一粒子弹，而是把整个军队，整个党都出卖掉了。如果按照刘少奇的投降主义路线去做，中国人民永远不会翻身，永远得不到解放。但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刘少奇的错误路线破产了。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革命的大道阔步前进，终于赢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在政权问题上，那一条是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那一条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三）

中国人民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我国要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呢？在这个问题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路线斗争特别激烈，特别尖锐。

一九四九年三月，毛主席在我们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报告。这一篇报告，最近毛主席还讲到，说看来有一些人对这个报告，对于二中全

会决议，根本没有实行，也根本不想实行。今天必须引起我们进一步的注意。所以，我就想谈一下这个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毛主席提出了要促进中国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各个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明了中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毛主席在这个报告中，特别着重地分析了当时中国各种经济成份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逐步地进行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地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本道路。这个报告，已经形成了我国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纲领。

毛主席在这个报告中强调地指出，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即将成为国内的基本矛盾。毛主席提出这个基本问题到现在，已经十八年了。当时，毛主席说："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他教导我们全党警惕这些不拿枪的敌人用"糖衣炮弹"来进攻我们的危险，要求我们同资产阶级作公开的或隐蔽的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在这个报告中，讲到人民解放军的问题，今天特别值得我们注意。毛主席说："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在国内没有阶级和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特别是在南方各地用北平方式或者绥远方式解决问题的时候是这样。随着战斗的逐步地减少，工作队的作用就增加了。"今天来学习毛主席十八年前的这个指示，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现在，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又是宣传队，又是生产队。毛主席在十八年以前，就是这样信任我们的解放军，相信我们的解放军，依靠我们的解放军。今天又给了我们支左、支农、支工、军训、军管这样极其光荣伟大的任务。我们就要象林总所讲的，要勇敢地去实现这个任务，同时又要谦虚谨慎地来进行这个工作。因为，许多任务都是新的，没有经验。某一个时期，某些同志，某些地区，犯一点错误是难免的。但是，在毛主席、林总的领导下，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军委的领导下，这些错误会立刻得到改正的。

关于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党的生日，毛主席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这篇文章，人们是很熟悉的。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全面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及其对内外的基本政策。毛主席说："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是在我国条件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或者说，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在文章中又强调指出："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人民手中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

为了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了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刘少奇在全国解放前夕和解放初期，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大力提倡剥削，鼓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走资本主义道路。

一九四九年四月中旬到五月上旬，刘少奇带着王光美到天津的那个亲戚王光英家里去，就是刘少奇称王光英为二哥，称王光英老婆为二嫂的那个家里去。在那里，他经常同一些大资本家混在一起，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代表资本家讲话。在此期间，他先后对天津市委、东亚毛纺厂职工、天津国营企业职员、工商业资本家、天津职工代表大会、华北职工代表会

议作了讲话，这些讲话，以及同年五月十九日，他从天津回到北京在北京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提出了一套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纲领。他的主要论点是：

第一，说什么"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少了"，"不是资本家太多了，而是资本家太少了"，"不是私人资本家工厂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第二，说什么工人阶级不是反对剥削，而是欢迎剥削。工人阶级"就是怕没有人剥削，所以有人剥削比没有人剥削好"，"剥削他们一下，他们倒满舒服，如果不剥削他，他们就不舒服，觉得痛苦的很。"因此，要"发展资本主义剥削"，要"多剥削"，"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而且有功劳"，"剥削得越多，功劳越大，"，"这个功绩是永垂不朽的"，"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利"。这些，都是他那些文件上有的，不是我们造他的谣言。

刘少奇为了让资本家多剥削，宣扬应降低工人的工资。他说，"工资太高应该降低，使资本家能够维持赚些钱，使工厂可以发展，对工人对国家对社会都有利"，如果"工资提的过高，……就要发生错误"。

第三，宣扬共产党员和工人要和资产阶级、资本家搞好关系，要向资本家投降。他说："和资本家要搞好一点，不要怕骂投降了资本家"。有人说和资本家拉好关系，就是失掉立场，这是错误的说法"。他还胡说："关系搞好，又不失掉立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

他这一套投降的纲领的结论是什么呢？昨天伯达同志已经讲过了，就是刘少奇自已说的，"今天在中国正是资本家建立功绩的时候，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是年老的、腐朽的、反动的，而是青年时代，还能够发展。"这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也是中国的资本家青年时代的开始。他还说，中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有进步性"，应该让它在提高生产力方面建立"功绩"。他猖狂地说："中国今天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否则将违背人民利益，也违背了工人利益。"这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刘少奇公开反对毛主席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宣言。

一九五〇年、一九五一年，刘少奇在一系列的报告中，不断重复上述论调，并且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口号。一九五一年二月，他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上说："要大大地加强和巩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基础"。同年十一月，他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学习座谈会上，再一次鼓吹"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同年五、六月间，刘少奇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在政协民主人士学习会上，又反复宣扬资本主义剥削"有进行作用，剥削得好"，"工人要你剥削，不剥削人家苦得很"，"社会主义问题是将来的事情，现在提得过早"，等等。在那几年，他是大张旗鼓地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毛主席在二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纲领。

刘少奇不仅反对对城市、工厂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而且也反对农村合作化，反对对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一年六月，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依靠互助组、合作社、代耕队实行农业集体化，实行农业社会主义化，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这是错误的。""不实现工业化，农业就根本不可能实现集体化。"一九五一年七月，他在对山西省委一个报告的批示中咒骂说："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个文件已经印发给同志们了。

在反对农业合作化的同时，刘少奇大力鼓吹发展富农经济。昨天伯达同志已经讲过，在一九五〇年一月，刘少奇在对东北农村工作的指示中就提出，三马一犁一车的农民，"不是富农，是中农"，应该"大大发展"，"在数年后应该发展到百分之八十，其中百分之十应是富农。"他胡说："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是教条主义"。他反教条主义和赫鲁晓夫是一脉相

承的。一九五〇年六月，他在政协会议上所作的土改报告中公然宣称，保护富农经济"是一种长期的政策"，"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中，都要保护富农经济"。他所谓的发展资本主义、保护富农经济的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恰恰是毛主席所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

刘少奇这种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路线，完全违背了全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所以毛主席同这种反动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特别表现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那个讲话中。这个讲话，全面深刻地分析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彻底地批驳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讲话是针对刘少奇的，文件没有印发，我不妨念几段：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且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我们的各项工作，应当遵循总路线，为总路线服务，离开了总路线，就要犯错误。我们必须过渡，把社会主义看作"遥遥无期"是不对的。过渡只能是逐步的。企图"一步登天"也是不对的。

有的同志，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通过发展农业合作化，逐步建立农业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限制和消灭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在这个基础上增加农业生产，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才能巩固和扩大我国的工农联盟。农业支援工业，促进工业化，工业支援农业，帮助农业合作化。这就是过渡时期工农联盟的新的经济基础。手工业的情况也是这样。我们必须对个体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集体化，引导手工业劳动者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有的同志却不是这样看问题，他们有几种错误观点，是必须批驳的：

第一，有同志提出，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的一切事物，一切社会秩序，时时刻刻处于发展变动之中。例如，我们的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年年在变，月月在变，天天在变，不断有新的东西代替旧的东西。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的发展的。

第二，有同志指出，"确保私有财产"。这种提法，当然更是错误的。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在不断前进，农民的个体经济必然要被集体经济所代替，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就生产资料方面说，我们不能永远'确保私有财产'。'确保私有财产'的口号实际上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富农利益的口号。这个口号只能束缚我们自己的手脚，束缚广大群众的手脚。

第三，有同志提出，"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看来没有大的错误，但是不明确，也不符合实际的情况。走向社会主义，就是还没有走到社会主义，只有在向着社会主义的目标走。我们不能在整个过渡时期老是走向社会主义，老是走不到社会主义。事实上，我们的国营经济早已经就走到完全的社会主义了。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提法，

可能使人认为我们现在并不是处于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不能明确认识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责任。所以，这种提法也是不恰当的。

上面所说的是右倾性质的错误。

现在把这个文件看一看，就会懂得当时的斗争是相当尖锐的，是针锋相对的。

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仅存在于建国初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每一步发展，都存在着这种斗争，刘少奇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反动路线，在社会主义前进中的各个时期，都顽强地表现出来。

大家记得，一九五五年，当农村合作化高潮即将到来的时候，邓子恢同志根据刘少奇反对合作化的错误思想，大砍农业合作社。全国砍掉二十万个合作社。为此，毛主席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彻底批判了刘少奇、邓子恢的错误，推动了合作化高潮的发展，并且引导全国人民胜利地完成了三大改造的任务。

一九五六年，刘少奇在党的"八大"的报告中，在有些问题上同苏共的"二十大"的修正主义黑潮相呼应，在相当的程度上，支持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和国际合作的修正主义路线，报告中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说什么"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

同刘少奇的反动主张相反，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二月、三月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都指出："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今天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也正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在三年困难时期，刘少奇配合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进攻，大肆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大刮翻案风、单干风。一九六二年九月，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作了形势、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报告，批驳和纠正了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往后，同志们就更清楚了。一九六四年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刘少奇提出了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相对抗。

在这一次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邓小平提出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实行白色恐怖，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相对抗。今天正是两条路线、两条道路尖锐斗争的时候。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斗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刘少奇的反动路线在斗争中彻底破产。但是，他们并没有自动地退出舞台。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利用每一个时机进行反扑。

所有这些，都说明刘少奇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象一条黑线一样，贯穿了各个时期，在每个时期都顽强地表现出来。

(四)

刘少奇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他的"理论"根据。一九四九年五月，刘少奇在北京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国家生产水平不发达，生产落后，今天不是私人资本工厂太多，而是太少。现在不只是私人资本主义可以存在，而且需要发展，需要扩大。"用生产力不发达和经济落后，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这并不是刘少奇的新发明，而是一切老修正主义、新修正主义共同的反动理论。这种理论，人们叫它作"生产力论"。按照这种

“理论”，就是说，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充分的高度的发展，生产力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平，农村还很分散落后，那么它就不应该也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应该也不可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应该让资本主义充分发展。按照这种“理论”，社会发展只是生产力，主要是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发展的自然结果。生产力高度发展，新社会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生产力如果还没有高度发展，革命阶级自觉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那是没有用处的。这种“理论”存在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从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苏汉诺夫，以及中国的陈独秀等等，没有一个不搬出这种“理论”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他们看不到人民群众的伟大革命作用，看不到改变生产关系对发展生产力的伟大促进作用。在他们看来，在生产水平还没有高度发展的地方，人民是没有资格，也不应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一点，我们查一查修正主义的著作，是到处都可以看到的。举几个例子：

一八九九年，伯恩斯坦就在他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提出这样的思想。一九O九年，考茨基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书中说：“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高度发达的地方，才有借助于国家政权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公有制的经济的可能性。”考茨基在一九一八年所写的《无产阶级专政》和一九二七年所写的《唯物史观》等书中，都一再重复这种滥调。特别是一九三O年，考茨基在一本叫做《陷于绝境的布尔什维主义》的书中，猖狂地攻击列宁领导俄国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诬蔑说，这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是犯了错误，使自己陷于绝境。他狂妄地说，按照我国的条件，根本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俄国发生的革命，只能为充分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而且只有在资本主义得到高度发展后，才有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布哈林、苏汉诺夫以及中国的陈独秀等等，都是继承了伯恩斯坦、考茨基的衣钵，虽然语言不同，但基本思想是一样的。

刘少奇的“理论”，根本不是什么新东西。象昨天伯达同志所讲的，从中国来讲，他是同陈独秀一脉相传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国际方面来讲，他是同老机会主义，同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一脉相传的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反动理论。

为了反对这种“理论”，列宁曾作过有力的斗争，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同这种反社会主义的理论进行了尖锐的论战，彻底粉碎了这种反动的滥调。列宁强调指出，不是什么俄国没有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而是恰恰相反，俄国这个帝国主义阵线中最薄弱的环节，首先能够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列宁总是强调革命对发展生产的伟大的作用，强调改变生产关系对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大作用。他反复阐明，俄国有布尔什维克党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有巩固的工农联盟，有蕴藏着无比的革命创造力的广大工农群众，在取得政权以后，完全能够把苏联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九二三年列宁为批判孟什维克苏汉诺夫的《革命杂记》，写了一篇有名的文章，叫做《论我国革命》，在《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上。这是很短的一篇文章，大家可以看一看，对于批判刘少奇的反动路线、学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帮助。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尖锐地批判了苏汉诺夫之流根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不懂得革命对发展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列宁说：“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究竟在那些书本上看到，说普通历史程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的呢？”列宁引用了拿破仑的一句名言来激励革命群众：“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再见分晓。”

从列宁的文章中，我们就更看到刚才引证的一九五三年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关于过渡

时期总路线的理论，是真正的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从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方面，从夺取政权方面，从夺取了政权后走什么道路方面，在这样一些基本问题上，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也很清楚的看到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两条路线的斗争，最本质的问题，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斗争。大家还记得，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整风的时候，毛主席讲过，延安的整风是一种什么样的运动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与反无产阶级、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这种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继承、保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一条是继承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即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的继续和发展。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遭到了彻底的破产。

（五）

邓小平是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他同样的一直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毛泽东思想。

（一）邓小平恶毒地攻击毛主席，攻击毛泽东思想。一九五六年，他在八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程的报告》中，曾经有这样一个说法，“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个人崇拜是一种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这很明显是恶毒攻击和诬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也是恶毒地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九六一年，他在黑龙江省委汇报会上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同样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他说：“凡是办不到的，不管原来是哪个人说的，站不住就改。顾面子是顾不住的，今天顾了，明天也顾不住。”很明显，这是反对毛主席的，同时也是反对总路线，反对人民公社，反对大跃进的。

（二）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邓小平同刘少奇一样，他在“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说：“现在，除了个别边疆地区以外，我们不但已经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而且已经基本的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同时，七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所有这些，使得我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农民已经由个体农民转变为合作化的农民，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处在消灭的过程中。”一九五八年四月，邓小平在成都会议上讲话说：“革命有两条路线的斗争，现在建设也有两条路线的斗争，现在我国正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但主要是两种方法的斗争……在党内来说，是速度问题，并非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三）攻击三面红旗，鼓吹单干，企图复辟资本主义。一九五九年二月，邓小平在上海工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诬蔑大跃进是“擦粉一尺厚，本来漂亮也就不漂亮了”。一九六一年十月在黑龙江省委汇报会上，邓小平攻击人民公社“超越”了阶段。在三年困难时期，邓小平同刘少奇一样，宣扬“三自一包”，鼓吹单干，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说什么“前几

年还可以看出优越性，这几年不行了，不能吹牛了"。一九六二年七月，他在共青团三届十中全会上鼓吹单干，说什么："不管黑猫白猫，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现在，红卫兵已经画出漫画了，一个白猫，一个黑猫，拉着车子，他在上面坐着。

（四）反对政治挂帅。邓小平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否认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特别是去年二月间，他在薄一波召集的工交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政治挂帅的结果，一定要落脚到生产，落脚到科学实验。"他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所讲的政治挂帅，他要经济挂帅，业务挂帅，政治挂帅和反对政治挂帅这不是一般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同军事、政治同经济、政治同业务的关系问题，不是一种工作安排或工作比重问题，这是一个彻底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原则问题。这个问题，从老修正主义一直到刘、邓是一脉相承的。

列宁反托洛茨基的时候，一九二二年写过《再论工会、目前形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一文中，其中有一句有名的话："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列宁说，政治同经济比较起来，政治是第一位。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起码知识。布哈林说，从政治出发也从经济出发。列宁驳斥说，这是典型的折中主义。列宁还提出工会工作如果不是政治挂帅，我们苏维埃制度就会灭亡。

毛主席在政治挂帅这个问题上，应当说是更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在政治同经济的关系、政治同军事的关系、政治同科学的关系、政治同业务的关系、政治同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的关系等一系列的问题上，都明确地阐述了这个问题。他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在这个问题上，林副主席高度地发挥和深刻地阐明了毛主席这个思想。

在我们军队中，到底是业务挂帅还是政治挂帅，这成为军队中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主要问题。因为在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中，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不会是真空的。任何部门、行业、领域，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必然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挂帅，就必然是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挂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去占领各种阵地，资本主义思想、修正主义思想就必然会去占领。正因为这样，要不要政治挂帅就成为能不能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对于每个同志来讲，就成为能不能永远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战士的问题。

所谓挂帅问题是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挂帅还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挂帅的问题，是毛泽东思想挂帅还是修正主义思想、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挂帅的问题。我们讲的政治挂帅是毛泽东思想挂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挂帅，而他们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的。所以讲他们不政治挂帅，是指他们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挂帅，而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从老修正主义一直到刘少奇、邓小平，都是这样。

一切修正主义者，在军事建设方面，都是反对人的因素第一，反对政治第一，都是宣传唯武器论的。考茨基曾经讲过，在现在枪炮技术条件下，人民群众的武装起义，根本"没有成功的希望"。现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每天在宣传"唯核武器论"，说什么核武器的条件下，人的因素已失去作用了，说我们的民兵"等于一堆肉"，说原子武器可以毁灭人类、毁灭世界，而不是人类能够利用原子科学来为人类服务。罗瑞卿、贺龙等人也就是这种修正主义、唯武器论的代表。他们强调军事技术，搞大比武，实际上就是反对突出政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解放军、我们党同罗瑞卿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修正主义在经济工作中，大肆宣扬利润原则，"利润刺激论"，"物质刺激论"。苏联从城市到乡村，从工业到农业，天天喊物质刺激，利润挂帅，这样就使修正主义泛滥，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理论基础。刘少奇、邓小平也是物质刺激、利润刺激的贩卖者。刘少奇早在白区工作时，就实行一套经济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在工业方面，希望经济部门的同志，检查一下刘少奇、邓小平所散布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

我们在反对刘、邓路线中，必须强调毛泽东思想挂帅。我们的支左工作，首先是支政治，支毛泽东思想。支左、支工、支农，一切工作应当以毛泽东思想挂帅，去反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且时刻警惕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从内蒙古的工作中看到，军队的个别同志有一种误解。革命群众最近提出要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是指的什么呢？这是指的刘、邓路线和坚持刘、邓路线的人在一月、二月的新反扑。但这个问题军队有些同志不了解，以为这是攻击军队，这完全是弄错了。我们的军队是毛主席缔造的军队，是毛泽东思想挂帅的军队，是林副主席直接领导的军队。我们的军队应当同革命群众以及革命组织一起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粉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我们支左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真支左假支左最重要的标准，是真夺权假夺权最重要的标准，是真拥护毛主席假拥护毛主席最重要的标准。因此这个问题，希望同志们很好地注意。希望同志们很好理解。为什么一月二十三日的支左五条中，最后着重讲一条，就是在全军中不是一般地而是深入地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离开这个问题，我们就无所谓支左，离开这个问题，就一定要犯大错误。这一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都是讲过的。我们在这一个时期取得了伟大成绩。有些地方犯了错误，但这不是主流。有些好同志还没有完全把毛主席这个思想掌握好，犯了错误，经过批评教育，是容易改正的。至于象赵永夫那种人，也会在运动中暴露出来。毛主席再三讲过，我们解放军不能因为在个别的问题、个别的时间、个别的地方，犯了一些错误，就灰溜溜的。我们应当执行林副主席上次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坚决地、勇敢地、有充分信心地去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伟大任务。毛主席、党中央，全党相信解放军是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我们相信解放军的领导同志已经有，而且将来更会有这种信心，去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改正个别地方的错误，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张春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大意）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

我汇报一下上海的情况。

上海的形势比较好。革命群众的情绪很高，群众的心情比较舒畅。

出现这样一个局面，我们看，主要是靠两条：一条是靠毛主席，再一条是靠群众。

毛主席对上海的工作，是非常关心的。在每一个关键时刻，毛主席都有指示。上海革命群众每一个新的创造，每一个新的倡议，都是首先得到毛主席的支持。《文汇报》的夺权，上海各造反派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都是毛主席首先支持的。上海

体育学院东方红战斗队写的那篇《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也是毛主席先发现的。好多我们在上海还没有注意的事情，还没有抓到的事情，毛主席就抓到了。

毛主席说：我们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对这样一句话，我们反复地思索过，它包括的内容很丰富。这场大革命收获这么大，代价那么小，重要的条件就是，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有的人说我们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只是讲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我觉得，这只能是证明在他们的心目中，根本不把毛主席的领导算作党的领导，不把党中央的决议算作党的领导。十六条明确规定了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难道这也不算是党的领导？他们既不懂得革命，也不懂得群众，更不懂得我们这场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面的革命。

靠毛主席的领导，党的领导，上海的群众发动起来了。当然还不是平衡的。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也不少。我们的临时最高权力机关，曾经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就是一条影响大的错误。这是群众提出来的，我们同意了。毛主席发现以后，要我们重新考虑，建议把名字改一下，改为革命委员会。在这个过程中，毛主席对人民群众对干部在革命过程中犯的错误，所采取的处理办法，深深地教育了我们。主席明确地指出这个名称不妥当，又考虑到上海革命群众的热情，考虑了什么样的方式解决好。主席反复教育我们，又要改变名称，又要不伤害群众的热情。由于毛主席的威望高，同时主席讲的理由非常充分，非常有说服力，我们回到上海很顺利地解决了。群众不但没有波动，而且情绪很高，说毛主席对这件事情这样关心，对群众的热情这样爱护，非常感动。

如何对待群众运动，这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毛主席多次提出，多次教导我们的也是如何对待群众问题。我想举几件事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件是对安亭事件的处理。

在上海一谈到工人运动，就会谈到安亭事件。去年十一月初，革命工人起来成立革命组织，上海市委不批准，两千多工人就上火车到北京告状。开车不久，铁道部命令，把他们甩在安亭、苏州、南京几个车站上，人数最多的在安亭，工人把这件事叫安亭事件。工人不干，造成上海、南京一线火车全部停开。

对待这件事，实际上有两条方针，两条路线。一条是镇压，一条是支持。

主张压下去的，代表人物就是陶铸和上海的陈丕显、曹荻秋。十一月十一日，我去安亭处理这件事。陶铸给的方针，就是把工人赶回上海，对他们的组织，不支持，不承认。我赶到安亭，同工人代表谈话，劝他们回上海，理由无非是生产要紧啦，铁路不能断啦，等等。这些大道理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没有用。我就心平气和的听，听他讲，究竟是怎么回事。天亮以后，接着开群众大会，一直开到下午四点，干了十六个钟头，工人才答应回上海。

从这个谈判中，我才了解到，工厂里面好多工人被打成“反革命”，来的人大部分是被打成“反革命”的。他们为了造市委的反，就组织了一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开成立大会，请市委参加，市委不参加。开完了大会，要求市委接见一下他们的主席团，也不接见，实在无可奈何了，才上火车到北京告状。而上了火车之后，又把他们甩在这个小车站上，已经三天三夜了，市委一个人也不来。工人越来越愤怒。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按照陶铸那个方针做，工人根本不会回上海。要赶回去，就要镇压。这一批人，已经被打成“反革命”，再加上这次“破坏了交通”，实行白色恐怖，实行镇压，不是理由很“充足”吗？是工人群众教育了我，是毛主席的教导支持了我，使我在重要关

头没有犯大错误。我答应认真负责地解决他们的问题，才说服了他们回上海。十三日，回到上海，同他们的代表继续谈。把情况弄清楚了，交通事故是现象，是结果；工人起来闹革命，才是本质，才是根源。决定承认他们的组织是革命的组织，是合法的组织，只是劝他们，火车中断是不好的，以后不要采取这种手段，没有过多的责备他们。

这样处理，市委坚决反对，说我没有坚持原则。曹荻秋气势凶凶地给陶铸打电话，陶铸立刻支持他。我也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请中央指示。陈丕显有了陶铸的支持，他气势凶凶地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提出质问，为什么要这样做？说中央不是规定工厂里头不成立造反组织，也不成立全市性的造反组织，为什么现在又承认了？你们给张春桥多大的权力？非常凶，接连问了好几个为什么。

陶、陈、曹等等，对学生运动是镇压的，对工人运动又是镇压。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无法理解；工人运动要起来，这是不可避免的。光是学生运动起来，没有工人运动起来，没有农民运动起来，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是不可能的。这是过去历次革命运动的规律。陶铸和陈、曹的方针当然没有得到中央的支持，中央文革、中央常委，最后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支持了上海的工人群众。

昨天看到一个材料，有一位副司令员同志，在当地谈话，破口大骂革命派，说革命派连土匪都不如。说："不管你有几万，几十万，我一个命令就叫你完蛋。"我劝这位同志注意，在我们处理安亭事件的时候，工人革命造反派连几万人也没有，只有几千人，要压是可以压下去的。但是，工人还会起来，把压他们的人打倒。我们决不能以为手里有权，就能压服群众。相反，我们共产党员，只能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支持革命群众的行动。今天上海的局面所以比较稳定，安亭事件处理得比较妥当，有很大的关系。现在，从安亭等地回去的这批人，已经成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的主要骨干，主要领导人。这是一批人，他们把上海的百万工人组织起来了。

市委依靠的是保守派。在他们的支持下成立了"工人赤卫队"。因为是官办的，一个晚上就做了三十万个袖章。很多党团员参加进去了。到十二月中旬，工人造反派有五十万，"工人赤卫队"也有五十万，势均力敌。但是，经过几次大的较量，到今年一月初，"赤卫队"就垮台了。工人造反派成了上海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

上海的学生起来了，工人起来了，机关干部也起来了，农民也开始起来了，他们在革命的斗争中，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十二月二十五日，毛主席谈到这个形势的时候说讲："上海很有希望"。果然，没有几天，"一月革命"的风暴起来了。

全市的夺权，我们在精神上并没有准备。我和姚文元同志一月四日到上海的时候，是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调查员这样的身份去的。不管同工人谈话也好，同学生谈话也好，别的什么话也谈不进去，就是该市委的经济主义风刮得很凶，"赤卫队"的头头们吵着要停电、停水、停交通，给造反派的压力很大。这些情况，我们来以前，知道一些，但是百闻不如一见。火车站搞得真彻底啊！整个火车站没有人管了，车没有人开了，连售票员，检票员都没有了。港口从每天装卸量十万吨下降到三万五千吨。外国轮船从平常停泊二十几艘，拥挤到一百二十几艘。有一些国家故意侮辱我们，把船上的中国国旗倒挂起来。工人也好，学生也好，谈起这些事情来，就非常愤怒，但是不知道怎么办。这时市委已经完全瘫痪了，没有人管了。当时，我们就同车站、码头、水厂、电厂，还有其它的一些要害部门，例如电报局、邮政局、电话局等部门工人革命造反派的负责人一块商量，究竟该怎么办？最突出的问题是，造反派工人坚守岗位，有的已经两三天没有下班，实在支持不住了。而革命造反派的组

织，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单位，包括一些要害部门，革命造反派很少。我们就商定重新调动队伍，把工人、学生调到要害部门去。象火车站，就是由铁路的革命造反派，再加上同济大学六百多学生，把车站管起来了。码头也是这样，从各个方面把革命造反派的队伍调到码头上去，把大、中学校的学生动员到码头上去作装卸工人。开始，有些人耽心，究竟能不能搞好？我们就鼓励他们，大胆地把责任担负起来。火车从来是你们开的，铁路局长找不到了，那有什么办法，我们自己管。

上海的工人阶级表现得非常好，学生表现得非常好，有力量，有智慧，我们作的工作很少，只是开座谈会，给他们出一点主意。比如象《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这样的文件，完全是工人、学生自己起草的，我们一个字都没有给他们改。他们很快地把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当中央的贺电来了以后，"一月革命"的说法才出来了。

"一月革命"的夺权，开头就是这样，后来各个工厂、机关、学校都夺了，有一些夺得不好，多数还是夺得好的。不过，那时候我们头脑里还没有"三结合"，主要的是靠革命的大联合。如果回过头来看，那缺点多得很。最近，有的同志到上海去看了一下，说码头上还有这个那个问题没有解决，甚至责备工人们管得不好。我们向这些同志们解释，你要看到这些工人是在什么情况下上马的。铁路局整个瘫痪了，就是几个普通工人，召集了上海、南京、蚌埠、南昌、杭州等全线的造反派代表会议，发动群众，把整个铁路线的秩序建立起来了。当然，你说这几个工人的水平有那么高，也不见得，毛病也不少，特别是当了权以后，私心杂念也多了，但是他们的功勋是不能抹杀的。应当受到谴责的，是市委的陈丕显、曹荻秋，是那些局长、党委书记，他们放弃了自己的职责，造成了这样大的损失。我们应当看大方向，看主流。

在上海，革命组织犯错误的也不少。就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前夕，一月中旬，上海有个最大的红卫兵组织，叫"红革会"（即红卫兵上海革命委员会），突然发动了对我和姚文元同志的攻击。他们提出了所谓"摘桃子"问题，他们不是从这个阶级摘桃子还是那个阶级摘桃子，这个政权究竟属于那个阶级方面提出问题，而是从个人，从小团体方面提出问题。二十二日同各个革命组织负责人商量，请他们提出新市委、市人委的名单，第二天，街上就出现标语，反对成立上海市委，并指名攻击我是陶铸、王任重式的两面派，是来摘桃子的。当时我们商量过，让他们闹吧，不要管他。因为工人不支持他们，许多学生组织也不支持他们。闹了几天，越来越不象话，我和姚文元同志还是去参加他们的会，受了六个小时的围攻，我们还是耐心地劝他们以大局为重，团结对敌。他们不听，还要开"打倒张春桥"的群众大会。中央文革小组才决定发个电报批评他们。发这个电报以前，我们还反复地考虑了两天，发不发？什么时候发？批评了他们以后，多数人接受了，少数人不接受，又闹了几天。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工人、学生组织要求把"红革会"的头头抓起来，我们劝阻了，一个人也没抓。"红革会"战士起来造了他们头头的反，要开一万人的请罪大会，我们明确表示不要开，战士们是没有罪的，头头们只要检讨了把事实真象弄清楚了，也还是给他们出路。对"赤卫队"那样的保守组织，到现在革命委员会也没宣布他非法，也没有取缔，完全是靠群众斗争把他打垮的。革命委员会只抓了一个人，他是调度所的副主任，是"赤卫队"的一个头头，他利用职权放一列车"赤卫队"上北京，把整个铁路秩序打乱了，这是犯法的。还有些"赤卫队"头头，工人群众抓了送到公安局，留下了很少一部分，正在审查。

我们可能有另方面的问题，即对于真正的反革命，由于种种原因，必须抓的，该抓的，

抓得太少，我们正注意解决。

再讲一个对待干部的问题。

干部问题比较大。几乎所有的部长、局长统统靠边了，甚至连处长，有些单位连科长在内。这当然由于上海市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恶果。市委在开头就利用上海市委过去几年工作的成绩，利用毛主席领导批判《海瑞罢官》时造成的好影响，迷惑了群众，迷惑了干部。又强调"组织纪律性"啊，"内外有别"啊，害了很多干部、好多党团员。机关干部到十二月中旬才起来造反。而且都是中下层干部，人数也不多。所以，要实现"三结合"，我们就面临着怎样把大批干部解放出来的问题。解放这批干部，是干部问题，也是群众问题。究竟实行什么路线呢？能包办代替吗？如果不走群众路线，采取简单化的方式，几个人关在小房子里搞"三结合"，即使把干部搞出来，他们发号施令是没人听的。"三结合"，干部亮相，绝不只是"表态"，而是一个革命的斗争过程。对干部来说，是干部自己解放自己的过程，是一个自我革命的过程，不搞触及灵魂的自我革命，那种亮相是没有用的。对群众来说是重新识别干部，重新鉴定干部的过程。"三结合"，是革命的"三结合"，是革命的过程，斗争的过程，不能随随便便把干部拉在一块就算"三结合"了。特别是有一些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比较严重的错误，不用革命的方法，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我们发动群众讨论这个问题。大家排了队，那些人要打倒，那些人还可以争取。有的想争取也很难。江青同志上次讲话中说到了陈丕显，对陈丕显的争取实在是难啊！江青同志前天也谈到了，直到去年十月，中央开工作会议的时候，江青同志把他找来，对他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叫他回去把工作抓起来。江青同志还诚恳地对他说，我和春桥同志给你当参谋，必要时，伯达同志也可以去上海帮你。这不是对他的很大支持吗？这个人现在才把他看透了。他当着我的面，对江青同志说，唉呀！前一段上海文化革命是曹荻秋主持的，很多重要的事情都没有告诉我啊。其实，上海市委干的坏事，他没有不知道的。有的是他出的主意，有的是同他商量的。这个人搞两面派，专学旧政客的一套。有人说他完全是个饶漱石。（江青：江渭清这位老兄，我也是给他出了不少主意的，叫他到群众中去，说几句就行了，说"我坚决站在你们那边，同你们闹革命"，本来这样就没有事了，但他就是坚决不去，根本不理睬。）江渭清那时完全可以出来的，因为他一开始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坚决地处理了匡亚明问题嘛，他可以很主动，但后来越陷越深，没办法，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要帮也帮不上。陈丕显也是这样的。我一月份到上海，给他谈话，而且把主席说的话都告诉他了。我说，主席说可以火烧，烧一烧好嘛。希望他能经得住考验。但不行。他这个人，我们过去也了解一点，但没有看到他的本质。他一直搞幕后操纵，从中央回去以后，他就搞平衡，今天接见革命派，明天接见保守派，后天接见革命派，再后天接见保守派，所以两派都觉得他不错，到最后一戳穿了，两派都反对他了。上海搞经济主义，罪魁祸首还是他，但他到处推，说这个是马天水搞的，那个是曹荻秋搞的。查来查去，还是他搞的。因为他有个基本的口号，就是："经济上放宽点"。慷国家之慨。而且死不纠正。一月九日，已经发表了反经济主义的《紧急通告》，十一日党中央给上海的贺电发出来了，《紧急通告》写得清清楚楚，所有制不能改变，谁违反要以反革命论处，但他在十一日还签字把老虎车改为国营。十六日他还给"红革会"签发一万块钱的经费。高级干部转移财产的恐怕不多吧？他和曹荻秋都转移了财产。把自己最心爱的手表、金子等转移到主席住的那个地方去。这是犯罪的行为。他到处藏，最后藏到那里，我给他打了电话，这个地方你不能住，你要惹大祸的。怕他不听，又请总理给他打了电话，他才搬的。他们一家吃饭，要大饭店送，每天早点花样不同，每个人的

花样也不能相同。他怕传染病，只要有客人到他屋里去，包括我们在内，客人走了，门的把手要用紫外线消毒。这个人已经完全变了，完全资产阶级化了，总觉得他过去是红小鬼，是老同志，总想挽救他。对革命有利。但到现在毫无结果。

对能挽救的，我们尽量地做工作。比如象王少庸，他是市委候补书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执行得很厉害，但是他态度还好，而且还做了一些比较好的事，一部分群众对他还有好感。我们想从他这里摸一点经验，群众也认为他这个人还能争取，可以试一试看。

我们是这样搞的，首先由造反派一部分同志，给他开小会。因为以前都是开万人、几十万人的大会，有用处，但是不可能细致。开小会，每一件事都落实，那些是你做的？那些不是你做的？为什么要这样做？今天怎样认识？让他在小会上检查，造反派代表批评他，帮助他。慢慢地思想比较一致了，王少庸和造反派都有点信心了，然后叫他到犯错误的单位去检讨。但是，一个人去检讨的时候，他只进行自我批评，在检讨中不好揭发别人。因此群众就怀疑他究竟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了没有？再就是检讨的时候，情绪总是不会很高的，说话的声调也比较低，群众就觉得这个人没有站出来，象他这个神气来领导我们，同我们革命造反派距离太大，结合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考虑，这些干部在斗争中亮相，不仅要进行自我批评，还要能够揭发别人，同刘少奇、邓小平，同陈丕显、曹获秋划清界限，应该使群众、干部都看得见。于是，由革命造反派组织联合召开了两百人左右的电视会，把上海所有的局长、部长、副部长，不管挂过牌子没有，戴过帽子没有，统统找来，工人、学生在家里看电视，搞了许多部电话，你有意见就打电话来。这样，会场内外结合，成为一个揭发批判的会，也是陈丕显、曹获秋检讨的会，先是他们检讨，后是干部揭发批判。这个会开得相当好，解决了好几个问题。一是解决了陈丕显、曹获秋向群众检讨的问题，给他们个机会。但是他们的检讨实在不象样子，这就在全市群众面前彻底地暴露了。群众的电话就不断地打来，会场上的干部也批评他。同时给干部一个亮相的机会，群众就看到干部面对面地同陈、曹进行斗争，看到他们在那里同陈、曹作斗争中划清了界线。开了四个半天，群众就给他们排队，那个人其次，那个人再其次，那个人表现最坏。排队的结果，第一是王少庸，其次是马天水。在这个基础上，再开一次大会，王少庸再作一次检讨，然后，由革命群众的代表、工人、学生、机关干部对他们的检讨表示意见，最后由革命委员会宣布，批准他参加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对他一个人，我们做了近两个月的工作，比较细致。这样看起来好象很慢，但是有个最大的好处，是这种亮相比较可靠，他自己真正是触及了灵魂，进行了自我革命，群众在他的亮相过程中受到了教育，对他也进行了帮助，因此，他是真正站出来了。过了两天，开群众大会时，我们就试了一下，宣布说，今天的大会由王少庸同志主持，一宣布，全场一万多人鼓掌，欢迎他主持大会。他现在说话群众听了，说明群众现在承认了。马天水现在也站出来了，群众也批准了。将来会不会有反复，那是将来的事，但就这一段来看，这是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的比较好的一种方法。不是和稀泥，不是凑合，不是关在小房间里指定几个人“三结合”，而是发动了广大群众、发动了广大干部。

电视大会，我们准备将来一个月开那么一两次。每次都给陈丕显、曹获秋检讨的机会。这对他们有好处，对干部亮相有好处，对群众也有好处。这就是使他们不至于忘记了斗争的大方向，斗争刘、邓，斗争陈、曹，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大方向。

看来上海的局面虽然比较好，我们在思想上还是准备有大的反复。夺权以后，也还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如何把这个革命造反派的队伍带好，是个大问题。这个队伍是个好队伍，是经过斗争考验的。他里边的基本骨干是左派，但是还有大量的中间

派。队伍大了，和初期不一样了，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很容易在队伍内部滋长起来。里边也还有个别的坏人。如果不采取正确的态度，肯定一切，否定一切，都要犯错误。需要认真地来引导他们，边战斗，边整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他们。

要帮助他们，那就是一个感情问题，有一个对他们的态度问题。我和上海路各部队的一些战士交换过意见。问他们，你们对造反派究竟是讨厌还是喜欢？他们说：以前是比较讨厌的。因为他们长期不介人，红卫兵的传单不敢看，是上级规定的嘛，红卫兵给他一张传单，回去马上交给指导员。红卫兵、工人革命造反派有些事，如砸啊抢啊，甚至发生武斗啊，里边包含哪些阶级斗争的内容，他无法理解。上级也从来没有进行教育啊！什么时候才开始变的？他们说，是一月十一日，中央不是给上海发了个贺电吗？那个贺电是四个单位署名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战士们一看，中央军委都署名了，中央军委都支持造反派啊，那我也支持。感情就变了。感情变不变，确实是大事。以前，只看保守派党团员多，成分好，就是喜欢。弄清楚真象，看着造反派可爱了，许多事就好办了。最大的问题还是到群众中去，真正和造反派混一混，一熟，也就懂了。这是不大难的。我们自己也还要继续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到群众里边去改造自己。

最后，提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很多地方已经成立或者将要成立革命委员会。军管，也要准备为成立革命委员会创造条件。如何使得革命委员会真正成为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机关，需要我们做很多工作，全力地支持他们。现在的革命委员会，他们的领导成员，一般的说原来的职位都是比较低的，在社会上原来是不出名的。上海工人运动这么蓬蓬勃勃，作为一个集体的力量，工人造反派是非常厉害的。但是真正政治水平比较高，工人能力比较强的领袖人物，还没有。如何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这是关系能不能培养出接班人的大问题，非常重要。一个地方只要建立革命委员会，这个地方的最高权力机关就是革命委员会了。军队也好，外来的同志也好，上级也好，都要想办法来支持它，树立它的威信。这样，它才能把革命抓起来，把生产抓起来，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

上海的工作没有系统总结过，就我们碰到的问题中，主要讲了一个对待群众的问题，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

历 史 的 铁 证

——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九四九年天津之行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日)

《解放军报》评论员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九四九年的天津之行，就是他猖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鼓励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历史铁证。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那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一九四九年三月，在解放战争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我们党举行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发出了"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号召**。十七年来，全国人民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道上奋勇前进，取得了极其伟大的光辉胜利。

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顽固地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不久，他到天津"视察"时，公然扯起资本主义的黑旗，与毛主席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号召大唱反调。

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教导我们：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反对对资本主义实行限制的政策，鼓吹资本家"剥削有功"，鼓励资本主义自由泛滥。他无耻地叫嚷："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工人要你剥削，不剥削人家就苦得很。""你们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利。"他还给资本家打气说："眼光要放远一些，赚大钱的时候在后头。""我以为赚多少钱都合法！"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反对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作斗争，而煽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作斗争。他胡说什么："中国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本家跑掉了，消灭了，没有了"，"自由资产阶级不是斗争的对象"，"重点是联合，不是斗争"。他对资本家说："你们要和工人斗争，如果不斗，将来你们的厂子被工人斗垮了台，那时你就不能怪共产党不好。"

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教导我们："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反对依靠工人阶级，主张依靠资本家。他胡说什么："工人阶级在一定的时候也可能是不能依靠的"，"不要以为依靠工人阶级是没有问题的"。资本家的"知识比我们多""占有很高的地位"。

我们的伟大统帅毛主席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雄师过大江，天翻地覆慨而慷。国民党统治的旧中国灭亡在即，毛主席、中国共产党缔造的新中国将要诞生。全国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热望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他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出发，为资本主义摇旗呐喊，妄图扭转历史前进的车轮！

他就是这样猖狂地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地攻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他就是这样无耻地吹捧资产阶级，为血腥的剥削制度唱颂歌，敌视和咒骂工人阶级！

他就是这样赤膊上阵，鼓吹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要资产阶级专政，明目张胆地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天津散布的反动谬论，遭到了广大工人的坚决反对，受到了反动资本家的热烈欢迎。当时东亚毛纺织厂的经理、极端反动的大资本家宋棐卿欣喜若狂地说："我发展企业的理想像个梦，一直梦了这么多年，今天才真要实现了。"

宋棐卿的这段话，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言行，作了很好的注脚。党

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做的是资产阶级的梦，说的是资产阶级的话，干的是资产阶级的事。他是资产阶级代言人。他睡在我们身边，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做的是发展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迷梦。他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九四九年的天津之行，说明他早就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设计了他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蓝图。他企图把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几十年来的革命成果，捞到以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手里，他妄图代表资产阶级"摘桃子"，实现历史的大倒退，把中国拉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他是党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总后台，是国内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的总司令。

十七年来，他一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里，配合国内外阶级敌人，向无产阶级，向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猖狂进攻。

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焦点。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要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就必须彻底批判和清算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各个领域内的流毒。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深批透。这是我们当前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战斗任务!

〔附〕　重读刘少奇同志的《天津讲话》

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理论研究室

一九四九年春天，为了适应急速发展的革命形势，迎接全国胜利的到来，党中央在三月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会上，毛泽东同志作了极其重要的报告。全会根据这个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毛泽东在报告中清楚地论述了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他指出，我们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尽可能迅速地将城市生产恢复和发展起来，否则，人民就不满意共产党，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就会站不住脚，就会要失败。毛泽东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份，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

天津解放较早，又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民族资本家比较集中。如何认真贯彻二中全会精神，搞好天津工作，不仅是恢复和发展整个华北地区工农业生产、支援大军南下的需要，而且是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需要，尤其对于取得管理和建设大城市的经验，更加具有重大的意义。

天津解放后，中共天津市委认真执行了党中央关于"原封不动，完整接收，维持生产和生活，逐步改良"的方针，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由于对当时中国经济状况缺乏全面了解，对中央关于民族工商业政策领会得不深，又缺乏管理和建设大城市的经验，在工作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在市委领导和一些干部中有一种"左"的倾向，怕"丧失立

场”，不愿同资本家接触，甚至见了面也不理；对私营企业限制过多过死，照顾和扶植不够；在宣传上责备多，鼓励少。在私营企业工作的工人中，有的对翻身有误解，对工资福利提出过高的要求；有的不遵守劳动纪律，影响了正常的经营管理；有的甚至想搞“清算斗争”、“分掉工厂”。在资本家当中，对共产党普遍存有恐惧心理，害怕“斗争”、“清算”，害怕被国营企业挤垮，害怕“剥削越多，罪恶越大”，有的消极怠工，有的抽资外逃。所有这些，都严重障碍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刘少奇同志受党中央委托，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上旬，亲自来到天津，帮助和指导工作。

刘少奇在天津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内，通过各种方式，接触干部、职工和工商界的代表，认真听取汇报，深入调查研究，针对天津当时的实际情况，发表了多次讲话，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天津讲话》。

他在讲话中，首先指明了天津工作的中心，以及贯彻执行党的城市工作总路线的重要性。他明确指出：“现在接收工作告一段落，当前任务是如何改造，管理与发展这一城市”，“主要工作是在生产方面”。为了完成这一中心任务，必须贯彻执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所制定的城市工作总路线。他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了这条总路线的基本内容，他说：“我们有三个敌人，四个朋友。帝国主义、封建阶级、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这是敌人阵线，这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而工人、劳动人民、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则是我们的阵线”。“发展生产事业也是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之下发展生产，也是要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跟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来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城市工作的总路线，也是管好天津的总路线。

刘少奇强调指出，贯彻执行党的城市工作总路线，最根本的问题是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这是我们党的“基本出发点”，“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他不仅谈了为什么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道理，而且指明了做到这一点的具体办法，这就是必须对工人阶级进行组织和宣传教育的工作，使他们真正成为一支有组织、有觉悟，可以依靠的力量。

针对当时天津存在的“左”的倾向，刘少奇还着重讲了如何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他明确指出，当时斗争的对象、打击的敌人，仍然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资本家自由资产阶级，不是我们的斗争对象，不但不是斗争对象，……相反的是团结争取的对象”。以为“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找不到了，都看不到了！于是子弹就打在资本家头上，这是打错了”。并且尖锐地提出，这样做的结果，势必要把我们的阵线搞乱，“跟党的总路线不符合”。

当然，同民族资产阶级讲团结，讲联合，并不是不要斗争。刘少奇指出，“对资本家又联合又斗争，不是只有斗争，没有联合，也不是只联合不斗争”，但在今天的情况下，我们的“重点是联合不是斗争”。“在政治上要联合他们，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作斗争。在经济上要联合他们发展生产”。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适当的必要的斗争，要以这种联合为前提，不能破坏这种联合。否则，我们就会失去一个朋友，多了一个敌人，这“对工人，对国家，对人民都不利”。

鉴于当时天津私营企业生产恢复迟缓、劳资关系相当紧张的实际情况，刘少奇着重强调了贯彻公私兼顾和劳资两利政策的问题。他说：“政府的方针，是要使国营私营互相合作配合，减少竞争，政府要发展国营生产，也要发展私营生产，这就是公私兼顾”。只有公私配合起来，才能构成一个生产体系，才能好好生产。从私营企业方面来看，“我们要跟他们竞

争，他们一定竞争不过我们，所以他们也愿和我们合作。"可见，实行公私兼顾，不仅必要，而且可能。针对资本家的疑虑，刘少奇还就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剥削的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他说："现在有好些人怕说剥削，但剥削是一个事实。……有这个事实，只好承认。"但在今天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还有一定的进步性；对于资本主义剥削，党的政策是允许的。他要资本家安下心来，积极经营，为恢复和发展天津的生产作出贡献。为了进一步贯彻公私兼顾的政策，他提出，公私兼顾的精神要贯彻于各方面，"从原料到市场，由国营私营共同商量，共同分配"。同时指出，"要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私人利益放在第二位"。对于那些不愿与国家协商的，不顾人民利益的，只顾自己利益的"资本家，要给以适当的打击。"

关于劳资两利问题，他明确表示，这是我们处理劳资关系的一项基本政策。针对一部分工人提出过高要求的倾向，他一方面指出："过去资方压迫剥削工人，解雇开除，引用亲朋，很多的不合理措施，过去是资方一利的，非劳资两利的"，因而工人提出一些过高要求是有原因的。另一方面，他又指出："现在，只利工人不利资本家也是不对的"，必须加以纠正，如果发展下去，必然导致"左"倾冒险主义，这是"工人的自杀政策"。他教育工人不要提出过高要求，自觉遵守厂规，好好生产，让资本家有利可图，使他们能够维持下去。同时要求资本家修改旧厂规，尊重工人人格，尊重工人权利，并在劳资两利的原则下，搞好生产管理。

对刘少奇的讲话，天津市委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根据讲话精神重新部署了工作，制定了改进的措施，克服了"左"的倾向，统一了干部和群众的认识，从而打消了资本家的顾虑，改善了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保证了党的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使天津的生产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截至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底，全市国营企业的生产都已超过了国民党时期的水平，平均产量大约超过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由恢复进人了发展阶段。私营工商业也出现了由衰到盛的新生景象。据天津市工商局材料统计，全市新开业的工商户，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只有二百九十二户，同年九月发展到三千八百户，增加近十二倍，到同年年底已达五千户以上。

事实证明，《天津讲话》符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符合天津市的实际情况，对天津的管理、改造和发展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天津讲话》也确有某些不妥当的地方，由于这是在一定范围内的即席讲话，不是经过逐字逐句推敲的正式文件，有一些话说过了头也是可以理解的。关于这一点，早在一九五四年二月，刘少奇就在党内作过自我批评，说："我对天津当时的工作说过许多话，曾经批评了当时某些对资产阶级的左倾情绪，虽则原则上没有错误，但其中有些话是说得不够妥当的。"这样说是实事求是的。可是，在十年动乱中，却又把这个讲话翻出来，抓住其中的片言只字，无限上纲，把它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黑纲领"，横加批判，在群众中造成了恶劣影响。下面择其要者，予以澄清。

其一，所谓鼓吹资本主义要"无限制地大发展"，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

当时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是立即消灭它，还是允许其存在和发展？这是关系到贯彻执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路线、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原则问题，不容许有半点含糊，当时天津市在贯彻执行七届二中全会路线上，出现了"左"的倾向，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刘少奇才在多次讲话中明确指出："应使资本主义有若干发展"，（他根本没有讲过什么资本主义要"无限制地大发展"）"私营企业的活动范围很大，可以和国营企业平行发展"。这些话与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是完全一致的。他说："今天工人痛苦不是资本主义发展才受痛苦，而是资本主义不发展才受痛苦，在目前中国条件之下，私人资本主义的剥削有若干发展，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于中国是有利的，对于工人也是有利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

样说有什么错呢？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也说过，现在的中国并不是资本主义太多了，"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根据当时俄国落后的情况，引用《资本论》中的话说："生产者'不仅苦于资本主义，并且苦于资本主义不够发达'。"(《列宁全集》第3卷第550页）天津刚解放时，社会上的失业现象还很普遍，单靠国营企业还不可能完全解决问题，所以刘少奇在天津职工代表大会上讲话时说："工人的痛苦就是失业，就是怕没有人剥削。所以有人剥削比没人剥削好。"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恢复和发展私营企业，有利于解决一部分工人的失业问题。当然，我们也应当说，虽然这个话的用意可以理解，但表达不好，容易引起误解，也容易被人曲解。

其二，所谓鼓吹资本家"剥削有功"，"为血腥的剥削制度唱赞歌"。

关于这个问题，刘少奇是这样讲的："现在还允许资本家的存在"，"允许资本家对我们的剥削"，"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以后，资本主义剥削是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是有功劳的"。关于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有功劳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肯定地说过："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共产党宣言》）这个意思并没有错。但刘少奇进一步引申为"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则是不妥当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讲资产阶级起过革命作用，指的是它破坏了封建的、宗法的社会关系，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不是指剥削本身。承认资产阶级有功，不等于承认剥削本身有功。当然，资本主义剥削代替封建剥削，在历史上也是一个进步，但对资本主义剥削的罪恶，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作了很多揭露的。刘少奇在另一处也说："当然罪恶也有一点，但功大罪小"。这和前面所引的讲法就不一致，说明刘少奇对这个问题的说法还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从当时我国实际情况看，党的政策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这也就是允许资本主义剥削存在。因为这样做，既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又有利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但是，过分的剥削，也是我们不允许的，因为这将损害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左"的倾向和右的倾向都是要反对的。刘少奇主要是针对当时工人中存在"左"的倾向，特别是资本家中普遍存在的"恐慌心理"而说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打消资本家的顾虑。同时还应该指出，刘少奇在讲话中还明确指出"剥削是不好的"，虽然"中国工人阶级还要忍受一个时期的剥削痛苦"，但在条件成熟时，就要把资本家财产"变为国家财产"，归工人"管理"，这就指明了资本主义剥削终究要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的必然趋势。

其三，所谓"反对依靠工人阶级，主张依靠资本家"。

看过或者听过《天津讲话》的人都知道，刘少奇在全部讲话中，反复宣传党的路线。对民族资产阶级或自由资产阶级，刘少奇说的是"团结的对象，争取的对象"，根本没有说是依靠的对象。相反，刘少奇特别强调党在革命中"唯一是依靠无产阶级的"，"没有工人阶级，共产党就没有了依靠"。不错，他在讲话中确曾说过："不要以为依靠工人阶级就没有问题的"，"工人阶级也是有不可靠的"。但这主要是针对当时工人中存在"左"的倾向，阶级觉悟还不高，工人队伍还缺乏组织等状况说的。他强调必须组织和教育工人，正是为了更好地依靠工人。如果工人有缺点、错误，不去教育，而做工人群众的"尾巴"，工人就可能靠不住。刘少奇正是从这点出发，对党员干部强调党教育工人的责任。这正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工人运动所应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过去把刘少奇对东亚毛纺织厂经理宋棐卿说的一段话，攻击

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活龙活现的标本”、“千真万确地‘长入’了资本主义”。事实如何呢？我们不妨看看刘少奇究竟是怎样讲的。他在工商业家座谈会上说：“在新民主主义当中，你们这些资本家可以充分发挥你们的积极性，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候，怎么办呢？上次我对宋棐卿先生谈过，我说：‘你现在才只办一个厂子，将来你可以办两个、三个……办八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国家下个命令，你就把工厂交给国家，或者由国家收买你的……然后国家把这八个工厂还是交给你办，你还是经理，不过是国家工厂的经理，因为你能干，再加给你八个厂子，一共十六个厂子交给你办，薪水不减你的，还要给你增加，可是你得要办好啊！你干不干？’宋先生说：‘那当然干！’将来召集大家来开个会，讨论怎样转变为社会主义，大家一定不会皱着眉来，一定是眉笑眼开的来开会。”

问题很清楚，这里主要讲了三点。一是资本家的前途：社会主义。二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式：国家下个“命令”或者“收买”，也就是进行不流血的斗争，采用和平的方式。三是对资本家本人的政策：进入社会主义，只要他把工厂交给国家，还可以发挥他的专长，让他当经理，为国家效力，使他由剥削者逐渐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列宁在谈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采取什么方式和措施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时，曾经说过：“在赎买的条件下文明地、有组织地转到社会主义，那就要给资本家付出较高的价钱，向他们赎买，这种思想是完全可以容许的。”（列宁：《论粮食税》）列宁所预想的方式，由我们中国共产党加以实现，取得了胜利。刘少奇当时的说法，已经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基本上是正确的。

（原载1980年4月21日《人民日报》）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节录）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住地，在伟大祖国的心脏，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中心，在世界革命人民仰望的革命灯塔——北京，今天传出了震动全国和全世界的喜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一个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胜利地诞生了。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是谢富治同志，副主任委员是吴德、郑维山、傅崇碧、聂元梓四位同志。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正式成立，宣告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据点——旧北京市委、市人委彻底垮台了，它宣告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彻底倒台了。这是继毛主席和党中央一九六六年决定改组北京市委之后，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一个新的伟大的飞跃，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把首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为我国人民树立了一个好榜样。它证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解决了当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新课题，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防止资

本主义复辟，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和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创造了新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增添了不朽的篇章。

今天，首都全城沸腾，数百万革命群众浸沉在火热的革命气氛和节日般的欢乐之中。有十万多人参加的在工人体育场隆重举行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是全城欢腾的中心。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到会热烈祝贺，宣布中央已经批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并且作了重要讲话。首都无产阶级和全市革命群众，无限感激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他们热烈欢呼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周恩来同志在讲话中强调指出，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进行了一系列伟大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他说，在这个基础上，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兵小将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通过工人、贫下中农和大中学校红卫兵的代表会议，成立了北京市革命的具有代表性的无产阶级革命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周恩来同志说，你们夺了权，但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在夺权后要充分重视政权的加强和巩固，真正地掌好权，用好权。

周恩来同志强调说，为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目前，就是要带着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更充分、更深入、更全面地揭露和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北京市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并且联系到本单位的斗、批、改。同时，要在这个革命的大批判运动中，进一步加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这是斗争的大方向，必须紧紧地把握住。

周恩来同志说，我们衷心地希望，你们将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遵守毛主席的教导，珍视你们的胜利果实，加强你们的责任感，不断地巩固和发展已经夺得的权力，让毛主席住在的首都永远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手里，永葆青春，永不变色。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中央军委文革小组成员叶群等同志，也参加了今天的大会。

大会在《东方红》雄壮乐曲声中开始。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谢富治同志，代表革命委员会在大会上首先讲话。

大会在"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的热烈欢呼声中，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信》。

北京市革命职工代表会议代表徐铠、北京市贫下中农代表会议代表张桂福，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代表傅崇碧，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代表蒯大富，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代表李冬民，先后在大会上发言。他们共同敬祝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愿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专程前来北京祝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上海、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五个省市

的革命委员会代表团，出席了大会。代表团成员中，有刘格平、张日清、陈永贵、陈琳瑚、李再含、李立、何光宇、潘复生、汪家道、张万春、王效禹、陈雷、王文俗等同志。

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张春桥同志，代表出席大会的五个省市的代表团讲话。他说：

北京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走在战斗的最前列，对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建立了特殊的功勋。

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处在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的斗争高潮中。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正在全国兴起。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对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极大的鼓舞。我们深信，这个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革命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一定能够领导首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继续走在全国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前列，对夺取北京市和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作出更出色的贡献，一定能够把我们伟大的首都，建设成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永不变色，成为全国的模范，世界的榜样。

我们都是毛主席的战士，我们是在一条战壕里向共同的敌人作战。让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指引下，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彻底胜利，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肩并肩地奋勇前进！

接着，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代表团，向大会赠送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五O年亲临黑龙江省视察时，为黑龙江省广大革命群众的亲笔题词的复制品。

今天，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和常委参加了大会。参加大会的常委，有刘锡昌、徐铠、王景瑞、鲁文阁、苗永昆、邓万田、罗瑞华、张桂福、黄作珍、刘绍文、范普权、牟立善、谭厚兰、蒯大富、韩爱晶、李冬民、周景方、刘建勋、丁国钰、高扬文、牛连璧、涂武生。

大会最后在《大海航行靠舵手》和《国际歌》的雄壮乐曲声中胜利结束。

（新华社1967年4月20日讯，载4月21日《人民日报》）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
给毛主席的致敬信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斗争、大批判中，我们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报告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北京

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了！这是您的光辉思想的又一支响彻云霄的凯歌！这是以您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

在这无产阶级革命派最盛大的节日里，我们欢呼，我们歌唱，千万颗红心迸发出一个共同的声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毛主席啊，毛主席！当我们回顾我国革命的光辉历程的时候，千言万语倾诉不尽我们对您的无限忠诚，千歌万曲表达不出我们对您的热情歌颂，浩荡的大海容纳不下我们对您的无限崇敬和无限热爱。

是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缔造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是您点燃了井冈山上的星星之火，开辟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航程；

是您指挥中国工农红军跨过万水千山，实现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是您在永垂史册的遵义会议上，结束了"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奠定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基础；

是您在革命圣地延安，指引着抗日战争前进的方向；

是您统帅浩浩荡荡的人民军队开进北京，为古老的都城带来了春天；

是您在天安门广场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缔造了伟大的人民共和国。

在那漫长的战斗岁月里，在那波澜壮阔的革命征途中，您带领我们战胜了一个个的艰难险阻，闯过了一道道的惊涛骇浪，使灾难深重的祖国从黑暗走向光明，象巨人一样地出现在世界的东方，给世界人民带来了胜利的希望，象一轮红日喷薄而出，照亮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道路。

毛主席啊，毛主席！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您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率领我们开始了新的长征。

是您揭开了旧北京市委、市人委的黑幕，粉碎了隐藏在那里的一小撮野心家复辟资本主义的黄粱美梦；

是您亲自决定广播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是您主持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宣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拨正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航向；

是您英明地发现和热情地支持了威震世界的红卫兵运动，在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红卫兵小将们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建了不朽的功勋；

是您在北京检阅了来自祖国五湖四海一千多万文化革命大军，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

是您在北京发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进军令，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是您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动总攻击，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的伟大战役的进军号。

这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面，这一幅幅惊心动魄的雄图，描绘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灿烂前景，谱写出您的光辉思想的颂歌，书写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雄壮的篇章，开创着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敬爱的毛主席，您教导我们："**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

必须清除这个基地。"旧北京市委、市人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支持、包庇下，把北京市搞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妄图把北京变成在我国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基地。十几年来，他们疯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目睹他们的滔天罪行，我们怎么能不愤怒?！怎么能不造反?！怎么能不夺权?！我们怀着誓死保卫您，誓死保卫党中央的决心，凝集起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向旧北京市委、市人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发动了猛烈攻势。当我们刚刚打出第一发炮弹的时候，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抛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妄图在我们伟大的首都扼杀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了捍卫您的光辉思想、为了捍卫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造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揪出这条反动路线的炮制者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冲破了重重阻力，扫清了层层障碍，斩钉截铁，下定决心：坚决把旧北京市委、市人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打倒！坚决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彻底的批判，把他扔到历史垃圾堆！我们决心把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同彻底摧毁旧北京市委、市人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斗争结合起来，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斩断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伸向各个领域的黑手！

敬爱的毛主席，您教导我们：**"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心不死，妄图翻案；他们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进行反攻倒算，掀起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他们的总后台，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们要牢记您的教导：**"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高举您的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动总攻击，把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他精心炮制的大毒草《修养》批倒，批垮，斗臭，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倒，斗垮，斗臭，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坚决完成您交给我们的一斗、二批、三改的伟大使命，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敬爱的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是您提出来的伟大方针，我们一定要不折不扣地执行。我们一定要把革命放在首位，以革命统帅生产，狠抓革命，猛促生产，掀起一个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高潮，誓夺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坚决执行和捍卫您提出来的革命的"三结合"方针。我们要在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战斗中，在彻底批判他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过程中，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我们要坚决粉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伪装"革命"、妄图钻进革命"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搞反革命复辟的阴谋。我们一定要夺好权，掌好权，用好权。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决战的关键时刻，**您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出了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战斗号召**。这是您对我们的最大关怀、最大支持。人民解放军是您亲手缔造的，林彪同志直接领导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我们要坚决粉碎阶级敌人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阴谋。我们一定要好好向解放军学习，和解放军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大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一切阶级敌人的捣乱和破坏活动，把人民的首都建设得象磐石一样的牢固，象钢铁一样的坚强。

毛主席啊，毛主席！您是我们的最高统帅，您是我们最英明的舵手，我们永远跟着您闹革命，永远跟着您在大风大浪里奋勇前进！谁敢反对您，谁敢诋毁您的光辉思想，谁敢对抗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就造他的反，就把他打倒，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向您宣誓：永远读您的书，听您的话，照您的指示办事，做您的好

战士。我们一定要把"老三篇"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等光辉著作当作座右铭来学，在灵魂深处开展破"私"立"公"的大革命，大夺头脑中"私"字的权。我们一定遵循您的教导，边战斗，边整风。我们要大反无政府主义，彻底克服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念，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新秩序，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把我们的队伍建设成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队伍。

北京是伟大祖国的首都，是世界革命人民的希望和灯塔。在您的英明领导下，我们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信心百倍，斗志昂扬，一定要把北京建设成永远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最红最红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城市，建设成世界上反帝反修的社会主义红色堡垒。

最最衷心地祝愿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江青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

工、农、兵、学、革命干部同志们，战友们，红卫兵小将们：

你们好！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热烈祝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向同志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的敬礼！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北京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新的胜利，起着重大的影响。在召开了工人代表会议、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大学红卫兵代表会议、中学红卫兵代表会议以后，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进一步联合起来，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谢富治同志的讲话很好。我只想讲两个问题：一个是大批判和本单位斗、批、改的关系问题，一个是拥军爱民的问题。

目前全国的形势，总的方面说来是很好的，是大好的。这个大好形势是毛主席领导着我们斗争的结果，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结果，也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支持的结果。

但是形势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是有反复的。这是正常的现象。绝对平衡的事情，世界上是不存在的。没有反复，那是很少的事情。经过反复的较量，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反复的较量、搏斗，才能锻炼我们。没有反复，怎么能锻炼我们。反复，不是坏事。

在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的这个阶段中，应该开展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同时，按各地不同的情况，逐步地转入本单位的斗批改。这个任务是艰巨的。

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代表，是北京市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后台，十七年来，他们在各个方面，提出了并且顽固地坚持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同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我们要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条战线上，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

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插遍各个阵地。

本单位的斗批改，和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工作，是不矛盾的，是可以统一的。对党内最大的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可以有力地带动各单位的斗、批、改。而各单位的斗、批、改，又可以更充分地揭露、更深入地批判党内的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各个战线上散布的毒素。这就要动脑筋，好好地想一想。要好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好好地做调查工作、研究工作。就需要冷静，能够坐到板凳上去商量商量，而不是天天吵嘴，更不是动起拳头打架。

这是极其重要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每个单位，都需要建立革命的领导机构。当然，也有的单位，党的领导、行政领导基本上还好，就不必去夺权了。但是，差不多的单位都要搞革命的大联合，都要搞革命的"三结合"，建立本单位的临时权力机构。如果没有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你如何去斗批改？谁领导？对不对？

同志们想了这个问题没有？有的同学，只想到这里去串串，到那里去冲冲，那个劲头大。但是，搞好本单位、本部门的斗批改，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功。是百年大计！这样想一想，就会增加同志们的责任感！

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也要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和同志们一块，学习同志们好的经验，然后再来帮助同志们。

我们这一年来是共患难、同甘苦的战友。我希望在斗批改这个问题上，同志们好好地想一想。不要转移了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要踏踏实实的驳倒他们。对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也必须进一步深入地进行揭发和批判。

自从毛主席指示、林彪同志坚决支持，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这五项工作，人民解放军投入了大量的力量，干部、战士做了巨大的工作，取得了辉煌的初步的成绩。

对军队，不管是谁，有意见完全可以写大字报、小字报，送给他本人，也可以向上级甚至中央反映。但是，绝不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军队。

革命群众要正确地对待军队，要拥军。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一月二十八号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是正确的，有效的。八条命令的主要方面，是讲群众应当怎样正确地对待人民解放军，是讲拥军的。

军队也要正确地对待群众，要爱民。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现在，四月六日中央军委的十条命令，也是正确的，有效的。十条命令的主要方面，是讲人民解放军应当怎样正确地对待群众，是讲爱民的。

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的精神，是一致的。把十条命令和八条命令对立起来，是不对的，绝不要利用这个十条命令去破坏那个八条命令。如果用这个十条命令去破坏那个八条命令，那就错啦。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一个是怕同志们犯错误，另外怕坏人利用。因此，我们现在特别强调地提出拥军爱民的号召。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

我们要善于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混淆两类矛盾。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包括各个群众组织之间的争论，**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

针，去正确地处理，不能把一些持有不同意见的组织和群众打成反革命，不能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群众组织之间的问题。更不要武斗。

同志们，我们希望，北京市的广大革命群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把北京市建设成为一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红卫兵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新华社1967年4月20日讯，4月21日《人民日报》）

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战友们，红卫兵小将们：

人们盼望已久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现在宣告成立。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筹建工作，始终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进行的。在这全北京市人民欢欣鼓舞的时刻，让我们大家一起，衷心祝愿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今天，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全体同志出席了我们的大会。让我们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向他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筹建的过程中，人民解放军参加了革命的“三结合”，从各个方面给了我们有力的支援，让我们向他们致以革命的敬礼！我们要向人民解放军学习！

上海、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最早实现了大联合，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夺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他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今天，这些省、市的革命委员会的负责同志远道来参加我们的大会，支持我们。让我们向他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感谢！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首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首都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的结果。

北京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是无产阶级最高司令部的所在地。光焰无际

的毛泽东思想照耀着全世界，照耀着全中国，照耀着伟大祖国的首都。但是，被旧北京市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盘踞下的旧北京市委，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庇护和支持下，一贯打着"红旗"反红旗，疯狂地反对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地攻击、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一贯反对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学说，鼓吹阶级调和，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和破坏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包庇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一贯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在工业、农业、财贸、文教各个方面的工作中，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搞资本主义复辟。他们一贯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路线，利用他们近控制的各种宣传工具大放修正主义的毒素，为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在京剧、舞剧、交响乐的革命中，他们百般刁难和攻击江青同志。尤其令人愤慨的是，他们一再抗拒毛主席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长期按兵不动。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又不准北京的报纸转载，也不准发行单行本，还攻击上海的革命同志。他们一贯实行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安插亲信，重用坏人，包庇地、富、反、坏、右分子，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一贯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实行封锁，把北京搞成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妄图把北京变成他们实行反革命复辟的基地。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是骑在北京广大人民群众头上的大恶霸，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旧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头子，经常在干部内麻地吹嘘自己，为篡党、篡国制造舆论。事实上，旧北京市委的主要负责人，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历史上就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投降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

抗日战争初期，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晋察冀边区执行的是王明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投降主义路线。

解放战争期间，他在东北又变本加厉地继续执行王明路线，执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提出的投降主义路线。他反对毛主席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战略思想，反对林彪同志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正确主张。

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国际活动中，也背着中央散布了许多抹煞阶级矛盾，取消阶级斗争，美化资产阶级，美化现代修正主义的言论。他吹捧叛徒铁托和赫鲁晓夫，吹捧某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干了许多投降主义的勾当。

现在查明，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早在抗日战争前，就在狱中自首变节，出卖同志。这个叛徒，后来又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相互勾结，包庇重用一批叛徒，把他们安插在党政军的重要领导岗位上。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们挖出了我们党内的这个大叛徒集团，是一个丰功伟绩。

旧北京市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他们坚持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illegible]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illegible]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这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怕得要命，恨得要死。他们一再玩弄两面派的手法，抗拒毛主席的指示，进行了一系列的地下活动，顽固地反对和破坏文化大革命。正是在他们进行这些反党阴谋活动的时候，他们的黑手被抓住了。首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

钧之力，一举摧毁了“三家村”黑店，直捣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老巢，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发了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字报，及时作出改组北京旧市委、组织新市委的决定，得到全市人民和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大大推动了当时刚刚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但是，改组后的北京新市委的主要负责人，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却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九六六年六、七月间，北京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直接控制之下进行的，他们把北京变成了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基地。他们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保护旧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包庇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斗争锋芒对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到夭折的边缘，并且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流毒全国。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毛主席回到北京，挽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党的八届十一届全会制定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宣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重新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当红卫兵和大串连这类的新事物，刚刚从地平线上冒出来的时候，毛主席就给以坚决的支持。首都红卫兵对全国各地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在北京，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接见了一千多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给了无产阶级革命派以极大的鼓舞和力量。首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发扬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精神，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打退了它们一次又一次的反扑，斗争了党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经过十分尖锐、十分复杂和曲折的斗争，取得了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

上海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掀起了“一月革命”风暴。首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自下而上地开展了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斗争。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和酝酿、协商，分别召开发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革命职工代表会议，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和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基础上，按照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了北京市的临时权力机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同志们，战友们：在我们欢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候，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创举。无产阶级取得统治全国的政权以后，资产阶级的反抗必然要增强十倍，梦想恢复他们的天堂。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们的政治能量还很大，特别是在思想、文化阵地上还占相当的优势。因此，无产阶级能否保持和巩固政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是无产阶级面临的极端重要的新课题。这个问题，所有前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没有来得及解决或者没有能够解决。通过“和平演变”，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了，在苏联和其它一些国家也复辟了。我国从一九四九年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以后，毛主席领导我们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条战线上，同资产阶级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斗争。例如，一九五四年同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一九五九年同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在改变所有制方面，有公私合营，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斗争；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反右派斗争；以及思想文化战线上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适、胡风的反动思想的批判，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的批判等等。这些，都是毛主席亲

自领导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都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大决战，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总攻击。发动亿万群众起来革命，从下而上地对混到党里、政府里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来一次大扫荡，大扫除。只有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样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极其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智慧，有极其丰富的斗争经验，有极其伟大的魄力，才能够发动这样规模巨大的，惊天动地的群众运动。夺权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必然结果。只有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他们的权，罢他们的官，把政权掌握在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这种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运动，和自下而上的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斗争，就是保卫无产阶级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把无产阶级革命推向前进，不仅现在必需，以后也还会有。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同马克思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列宁建立无产阶级在一个国家内夺取政权的学说同样重要，同样伟大。

现在，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掀起一个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群众运动的新高潮。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场大决战。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我国修正主义的总头头。某些地区、某些部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则是他们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基干力量。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当前最重要的战斗任务。我们一定要紧紧掌握这个大方向，充分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进行全面的批判，彻底清算和肃清他们在各个领域内的修正主义流毒。

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后台。我们要以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中心，把旧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倒、斗垮、斗臭，夺回被他们篡夺去的一切阵地。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勇敢地投入战斗，彻底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毛主席教导我们："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我们一定要在这场伟大的革命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中，进一步扩大和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都应该在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判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这个共同目标下，并肩战斗，共同提高毛泽东思想水平。林彪同志指出："我们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同时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革命，也得革自己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个革命是搞不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我们应该在这场革命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中，边战斗，边整风，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克服风头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革命群众组织之间有不同的意见，应该用开门整风的办法，主要是进行自我批评来解决。不应该因为有不同意见而打"内战"，搅乱了斗争的大方向，甚至被敌人钻空子破坏我们的大联合，大团结。我们决不允许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借整风来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派。也不允许保守派借口大联合，来削弱无产阶级革命派，压制无产阶级革命派，甚至吞并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争取团**

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我们一定要团结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对于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的群众，无产阶级革命派不应该歧视他们，排斥他们。要在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耐心地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热情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团结他们一道闹革命。当然，对于反动组织，如"联动"之类，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能同他们联合。对于这类组织和他们的头头，要实行专政，对他们的一般成员，则要分化瓦解、区别对待。

我们要结合这场革命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革命的"三结合"，必须以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为基础，必须在革命群众斗争中逐步实现。那一些干部是革命的"三结合"对象，只能由革命群众来批准，不能自封。每一个革命的干部，都应该积极投入这场群众性的批判运动，积极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揭发旧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彻底同他们划清界线，认真检讨和改正自己的错误，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和考验。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着重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组成部分，支持一切愿意革命的干部起来革命，在斗争中实现革命的"三结合"。这样的革命的"三结合"，就可以防止坏人借口"三结合"，混水摸鱼，反攻倒算，实行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北京市的广大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如吴德、刘建勋等同志，已经开始站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一边。我们相信，在今后的斗争中，他们将能经受考验，得到锻炼，继续为革命作出应有的贡献。

我们要通过这场革命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进一步发动群众，更好地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更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六七年的工农业生产计划而奋斗。

我们要通过这场革命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更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毛泽东思想是在同各各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同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充分利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为反面教员，从各个方面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

同志们，战友们：在我们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时候，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和完成一切任务的根本保证。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是我们的精神原子弹。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毛泽东思想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我们一定要坚决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我们要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插遍首都的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公社，每一个商店，每一个学校，每一个机关，每一条街道，插遍首都的每一寸土地。我们要把人民的首都北京，建设成永远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最红最红的革命城市。

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光焰无际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原载1967年4月21日《人民日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通　　知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

最近，有少数学生和群众又开始到北京和其他地区进行串连，北京的一些学校又派人到外地串连。因此，中央重申停止全国大串连的决定，各地已经外出串连的，应当立即返回。对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问题，应当尽量在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解决，以免影响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运动和生产。

这一通知可以在城乡张贴。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林彪讲话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林彪同志三月二十日的讲话，很好。这个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根本问题，不仅对于军队的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战斗任务，而且对于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现印成小册子，发给党、政、军、民的基层，作为学习文件。

中共中央关于福建问题的意见 (节录)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

五、各革命群众组织之间，有些不同意见，是正常现象。中央认为，遇到这种场合，应

该通过协商或联席会议的途径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暂且搁下，先解决那些能够很快解决的问题。决不能采取粗暴的作法，强加于人，或者对不同意见的革命组织和个人，进行围攻。只许文斗，不许武斗。

六、各革命群众组织之间，不要只看对方的短处，只强调自己的长处。要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用自我批评的方法，克服“私”字，克服“无政府主义”和“唯我独尊”的错误倾向，实现各革命派的大联合。

七、对人民解放军的负责人，有意见，可以提。写信，送大字报，派代表，这些方式都可以，但不要组织群众冲军区。冲军区是不宜的，不对的，但对“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不予追究。

八、福建有个别干部（例如林白）强调所谓“老区”问题。应该把那里的农民群众同这些个别干部严格区别开来。农民群众没有过错，有一批人进城，是被蒙蔽的。那些用经济主义鼓动农民成批进城的个别干部，必须向农民群众承认这种鼓动是错误的。同时，各县人民武装部因为有的地方农民成批进城而擅自逮捕许多人，这是不能允许的，军队有关同志对此要表示态度，消除自己同群众的对立。

九、建议来京的福建群众组织的代表在这里会议结束之后，立即回去，就地解决各种具体问题。

十、鉴于当前福建成立革命三结合的权力机构还不成熟，中央宣布，在那里先实行军管，以利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并责成军管机构按照中央的精神，处理近几个月来发生的事件。待条件成熟时，再成立有广大群众代表性、有无产阶级权威的革命三结合的权力机构。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

一、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把四川省当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等人坚持执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李井泉的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职务，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撤销李井泉的成都军区第一政委的职务。

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成都军区在反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顽固追随者黄新庭、郭林祥的斗争中，表现是好的。成都军区在支援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在支工、支农方面，是有成绩的。但是，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从二月下旬以来，支持了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后操纵的保守组织，把革命群众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等，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大量逮捕革命群众。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同时，擅自调动部队到宜宾，支持宜宾军分区，支持宜宾地委内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在万县军分区，还制造了武装镇压群众的流血惨案。在其他一些军分区和地委，也或轻或重地犯了这样的错误。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

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经中央指出后，成都军区就很快地开始进行改正。五十四军的领导同志，及时作了检讨，行动上也改得快。毛主席在四川的一个文件批语中指出："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

三、由新任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张国华同志、司令员梁兴初同志和前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同志、前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同志，负责组织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张国华同志为组长、梁兴初、刘结挺同志为副组长。筹备小组的成员，应该吸收革命群众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军队其他适当的负责人和经过革命群众同意的地方上的革命领导干部参加。

四、宜宾地区由王茂聚、郭林川同志负责组织宜宾地区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下进行工作。

其他专区和省属市或者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或者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由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讨论决定，报请中央批准。

各专区和省属市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成员，按第三条规定的原则处理。

五、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要对四川全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进行妥善处理，一律平反，一律释放，并且依靠其中坚定的左派作为骨干，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死难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要进行抚恤。对确有证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另案处理。

要帮助革命群众组织恢复和发展。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团这样的革命组织，要注意同红卫兵成都部队及其他革命组织加强团结，不要互相攻击，而转移了斗争目标。各革命组织，都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革命的"三结合"。

六、要响应毛主席号召，大力进行拥军爱民，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加强军民团结，严防坏人挑拨军民关系。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要向全体指战员和广大革命群众宣传毛主席关于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的指示。

七、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四川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在四川省军队内部，在干部和群众中，要对刘、邓、李等人进行充分的揭露和批判。这个批判，要同处理当前的问题和筹备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统一起来。

八、广泛宣传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中央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和批语。这些文件中规定的原则，要严格执行。

九、对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的保守组织主要是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使其中的广大群众觉悟起来自己造反，同个别的坏头头和背后操纵他们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决裂，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要教育受过压制的革命群众组织，按党的政策办事，不要对保守组织的群众进行打击报复，而要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把他们也看做反动路线的受害者。一切群众组织，都只许文斗、不许武斗，不许打、砸、抢、抄、抓。煽动武斗的坏人，必须追究。

十、关于五月六日成都发生的流血事件，中央将作为重要的专门案件处理。对于枪杀群众的凶手，特别是事件的策划者，要依法处理。一切群众组织的枪枝弹药，都一律由成都军区负责收回封存。对各群众组织中受伤的人，都由成都军区负责安排治疗。对死者要进行抚恤。

《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

（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

《红旗》杂志编辑部　《人民日报》编辑部

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

——毛泽东

《修养》一书，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代表作。这本书，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它流毒全国，流毒世界。对它必须进行彻底的批判。

《修养》一书的要害是什么呢？

它的要害，就是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而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就是完全地、彻底地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完全地、彻底地背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马克思在一百多年以前就指出：

"至于讲到我呢，那末无论是发现近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彼此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了这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而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则早已作过对于各个阶级的经济解剖了。我所作出的新东西就在于证明下列几点：（一）阶级的存在仅仅是跟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二）阶级斗争必然要引导到无产阶级专政；（三）这个专政本身不过是进到消灭任何阶级和进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致约·卫登麦尔》（一八五二年三月五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四五二页）

列宁在五十年以前又强调指出：

"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内容是阶级斗争。人们时常这样说，这样写。但这是不正确的。根据这个不正确的观点，往往会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机会主义的歪曲，把马克思主义偷偷地改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因为阶级斗争学说不是由马克思，而是由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以前创立的，而且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可能还没有走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策的圈子。用阶级斗争学说来限制马克思主义，就是割裂和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国家与革命》（一九一七年八——九月）。《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三九八——三九九页）

《修养》的作者，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一切机会主义者一样，从根本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割裂和歪曲。他在这本长达近五万字的书里，虽然也堆积了一些抽象的阶级斗争的词句，但是闭口不谈现实的阶级斗争，闭口不提无产阶级专政。不要无产阶级专政，那

些阶级斗争的词句当然只是骗人的鬼话，当然是资产阶级完全可以接受的。

《修养》于一九三九年七月出版，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多次重印。在几种版本里，根本不谈抗日战争、不谈抗日战争时期的阶级斗争[①]，根本不谈解放战争、不谈解放战争时期的阶级斗争，根本不谈夺取政权问题。这样的《修养》，触动不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一根毫毛，触动不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国民党的一根毫毛。

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52 年版第 529 页）**"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塞维克化，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的，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601 页）很显然，抛开革命战争，抛开武装夺取政权，就根本谈不到党的发展、巩固和建设，谈不到党员的思想改造。可是，就在炮火连天的战争的年代里、夺取政权的年代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要人们忘记武装夺取政权的根本任务去进行"自我修养"。这样去"修养"，岂不是要人们"修"成不干革命战争，不要夺取政权的庸人！这样"修"出来的庸人，绝不是共产党人，而是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人。

《修养》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修订再版，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大加增删，重新出版，仍然是原来的那套货色。在这个时期修订再版、重新出版的《修养》，不但根本不谈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而且仍然只字不提无产阶级专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公然同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一系列伟大著作唱对台戏，公然反对毛泽东思想，要人们忘记社会主义革命，忘记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去进行"自我修养"。这样的"修养"，岂不是让人们"修"成不搞社会主义，而搞资本主义的布哈林式的人物，"修"成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修养》多次重印和再版，都不提武装夺取政权，不提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是偶然的疏忽呢？不是。

《修养》一书讲了国家问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讲国家问题的时候，是绝对不会不讲国家的阶级性质，绝对不会不讲无产阶级专政的。可是，《修养》一书偏偏抛开无产阶级专政，而象资产阶级的御用学者那样，抽象地讲国家问题。

《修养》一书的作者说：无产阶级"能够建立有严格组织纪律的党及国家机关，来和一切腐化、官僚化与堕落现象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不断从党内与国家机关中清洗那些已经在自己的工作中腐化、官僚化与堕落的分子出去"，"而保持党与国家机关的纯洁"。试问，无产阶级怎样才能建立自己的国家机关呢？难道可以不经过暴力革命吗？可以不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吗？《修养》一书恰恰是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根本原理。照《修养》一书作者看来，只要共产党人努力进行"自我修养"，就会从天上掉下一个什么"理想国"来。他梦寐以求的，不是别的，就是资产阶级国家。

一九六二年再版的《修养》，在上面引的这一段话中，特意增加了"建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的国家机关"。这种特意的增加，表明作者对我们国家性质的看法。可是，在这里，在全书，他根本不提对阶级敌人的专政。毛主席说：**我们的无产阶级国家，对于阶级敌人实行专**

---

① 《修养》一书，在一九六二年以前的各种版本里，都没有谈抗日战争。一九六二年的新版中，在"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是统一的"一节里，作为举例，加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一段。

政，“**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修养》一书的作者，把我们的国家，说成仅仅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不向敌人实行专政的国家，这不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宣扬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论，主张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又是什么呢？

《修养》一书用了很长的篇幅描绘“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事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这里一定要讲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共产主义。可是，作者却只字不提无产阶级专政。

“共产主义事业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我们党员到底要怎样去进行我们的事业？”作者回答说：“在那种世界里，没有剥削者、压迫者、没有地主、资本家、帝国主义和法西斯蒂等，也没有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及黑暗、愚蠢、落后等。在那种社会里，人类都成为有高等文化程度与技术水平的、大公无私的、聪明的共产主义者，人类中彼此充满了互相帮助、互相亲爱，没有‘尔虞我诈’、互相危害、互相残杀及战争等等不合理的事情。那种社会、当然是人类史上最好的、最美丽的、最进步的社会。”作者又说：“我们共产党员，应该有人类最伟大的气魄与革命的决心。每一个党员都应该愉快而严肃地下定自己的决心，来担负实现共产主义这种人类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任务。”作者在作了类似种种一连串的牧师式的祈祷和祝愿之后，做出结论说：“我所了解的共产主义事业，就是这么一回事。”在作者的回答里，说得天花乱坠，就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他所了解的共产主义事业，他所主张的怎样去进行共产主义事业，原来就是这样！

这种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是古已有之的。在中国，有《礼运·大同篇》，有陶潜的《桃花源记》，有康有为的《大同书》，在外国，有法国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大批著作，都是这一路货色。

照作者的意见，共产主义社会里，一切都是美好的。一点黑暗也没有，一点矛盾也没有，一切都好了，没有对立物了。社会从此停止发展，不但社会的质永远不变化，连社会的量似乎也永远不变化了，社会的发展就此终结，永远一个样子。在这里，作者把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规律抛掉了——任何事物，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是由对立斗争，由矛盾而推动发展的。作者在这里宣扬了形而上学，抛弃了伟大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三十一页）

列宁说：“**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走别的道路，因为再没有其他人也没有其他道路能够粉碎剥削者资本家的反抗。**”（《国家与革命》（一九一七年八——九月）。《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四四八页）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修养》一书里着重讲了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胜利以后，“还须经过社会主义的长期的改造时代，最后才能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去”。一个稍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人，在这里总会提到无产阶级专政吧！没有，没有，还是一句也没有！可见，他所说的“长期的改造时代”，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他所说的“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

很显然，《修养》一书的作者，有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就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去“进行共产主义事业”。这是对于科学共产主义的彻头彻尾的背叛，这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彻头彻尾的背叛，这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

《修养》一书的作者，不仅自己不提无产阶级专政，而且在引用列宁的两段话时，也把无产阶级专政剜掉了。

列宁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而且不经过持久的、顽强的、殊死的战斗，即不经过坚持不懈、纪律严格、坚忍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斗，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修养》一书的各种版本，包括一九六二年的新版，却是这样引用的：

"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不经过持久的、顽强的、殊死的战斗，即不经过坚持不懈、纪律严格、坚忍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斗，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修养》一书的作者，就是这样明目张胆地拦腰把"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砍掉了。难道这是偶然的疏忽吗！很明白，在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必要的。

另外一段，列宁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消灭阶级不仅仅是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这个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还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对于这种人既不能驱逐，又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长期的、缓慢的、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需要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才能抵制这种恶劣影响，才能使无产阶级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这是它的主要作用）。**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为反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即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的与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在斗争中百炼成钢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战胜强大而集中的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

《修养》一书的各种版本，包括一九六二年的新版，却是这样引用的：

"消灭阶级不仅仅是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这个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还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对于这种人既不能驱逐，又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长期的、缓慢的、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

级内部复发起来。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需要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才能抵制这种恶劣影响，才能使无产阶级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这是它的主要作用）。……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战胜强大而集中的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

《修养》的作者，又明目张胆地拦腰砍掉了"**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为反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即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的与行政的斗争。"连共产党的领导也给吹掉了。**难道这又是偶然的疏忽吗！

《修养》在一九六二年重新修改出版，为什么仍然把无产阶级专政删掉呢？这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反对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要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这完全可以证明，这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对头，他是绝对不能容忍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看到"无产阶级专政"，就一定要把它砍掉。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样无耻地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灵魂的。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而讲什么"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最好的学生"，这简直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莫大侮辱。

一九六二年再版的《修养》，把"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最好的学生"，改为"作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还把原来引用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的三段话全部删去了。这三段话是：

"人们和自然界斗争以及利用自然界来生产物质资料，并不是彼此孤立，彼此隔绝、各人单独进行，而是以团体为单位，以社会为单位来共同进行的。因此，生产在任何时候以及在任何条件下，都是社会的生产。人们在实现物质资料生产时，也就建立彼此间在生产内部的某种相互关系，即某种生产关系"。

"生产底第一个特点就是它永远也不会长久停留在一点上，而是始终处在变更和发展状态中。同时，生产方式中的变更，又必然引起全部社会制度、社会观念、政治观点和政治制度底变更，即引起全部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底改造"。

"只有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才是不可战胜的。"

很明显，《修养》的作者，在一九六二年删掉斯大林，删掉原来引用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的全部引文，完全是为了迎合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需要，反斯大林，也就是反列宁主义。

他为了删掉斯大林，恩格斯也被陪绑，恩格斯也被删掉了。

《修养》一书在多次重印和再版中，根本不讲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根本不提毛泽东思想。这一点，也说明《修养》的作者是假马克思主义者、真修正主义者。因为，在我们的时代，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就是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同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一样，离开了列宁主义，也就是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今年的选举》。《红色中华》，1933年9月6日。）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反其道而行之，不要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把世界上的一切归结为"自我修养"。

"修养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这就是《修养》一书的公式。这个公式，同老叛徒伯恩斯坦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公式一样，都是十足的修正主义货色。

真的没有目的吗？当然不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老叛徒伯恩斯坦一样，有其阴险的、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企图瓦解无产阶级队伍，使人们越“养”越“修”，越“修养”越成为修正主义，在全国胜利以前，他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在全国胜利以后，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妄图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资本主义。这就是他的“修养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这个反动公式的目的。

(原载1967年5月8日《人民日报》)

〔附〕 正气磅礴 大义凛然（节录）

——重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吴黎平

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已经发表四十年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那一本书象这本书那样遭受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如此恶毒的攻击和诬陷。作为当年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的见证人之一，我有责任把这本书发表的真实过程告诉广大的读者。

一

读起这本书，就把我带回到了那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的年代。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伟大的抗日战争爆发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所在地——延安，是全国人民心目中的指导抗战的一盏明灯，许多青年不远千里，从祖国各地奔赴延安学习和参加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他们大批地到了延安，到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经过一个时期的教育，他们中的一批先进分子纷纷要求入党。对于他们的入党要求，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主张采取既积极而又慎重的方针，经过各级党组织的审查，有一大批积极分子被吸收入党。由于中国社会小资产阶级阶层的广大，我们党经常受到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影响。有大批的新党员加入到我们党内，壮大了党的队伍，但同时他们也把一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带进了我们的党内。如何对广大的新党员进行马列主义的政治教育，培养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克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种种错误思想的影响，就成为当时加强党对抗战的领导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三七年亲自有系统地作了关于《实践论》和《矛盾论》的讲演，在思想战线上总结了我们党的历史经验，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提供了光辉的文献。当时，为了实现和加强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还必须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刘少奇同志一九三六——一九三九年领导北方局工作期间，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中，就非常重视共产党员的党性锻炼。一九三九年他由北方局调回中央工作。在延安，刘少奇同志就住在张闻天同志的隔壁，我们住处离他们也很近。刘少奇同志和张闻天同志对党员思想情况都非常注意。张闻天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总的领导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长和延安马列学院院长，他邀请少奇同志到马列学院去讲演，谈一谈共产党员的党性

修养问题。刘少奇同志于一九三九年七月八日在马列学院作了讲演，马列学院没有礼堂，少奇同志一次是在露天讲的，听的人很多，全院学生都参加了。少奇同志讲得很生动，大家听得非常注意和仔细，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对此讲话表示了热烈的欢迎，院内外的许多人都要求把这个演讲整理出来发表。刘少奇同志答应了，在忙中挤出了时间整理成文，交给了张闻天同志。当时，闻天同志是《解放》杂志的主编，我是责任编辑。我收到了少奇同志的文章后，就送给毛泽东同志审阅（当时中央规定，《解放》杂志的重要文章均要经毛泽东同志审阅）。毛泽东同志仔细地看了，把文章退给了我，并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少奇同志这篇文章"提倡正气，反对邪气"，写得很好、很重要，应赶快发表。我接到了信，就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下简称《论修养》）在《解放》杂志上分三次发表了(见《解放》杂志 1939 年 8 月 20 日第 81 期、8 月 30 日第 82 期和 9 月 20 日第 83、84 期合刊)。

《论修养》发表后，各方面反映很强烈，大家要求出单行本。解放社很快就出版了单行本。同时，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报纸、刊物均转载了，也出了单行本。这本书使全党党员得到了加强党性锻炼的有力武器，使全党组织得到了加强党的建设的有力武器。

一九四一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这是一次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当时，中央经讨论决定了二十二个整风文件。《论修养》（节录）就是干部必读的整风文件之一，对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内各种错误思想起了很好的作用。

《论修养》解放前后多次重印。一九六二年经作者校阅，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和内容上的补充，发表在《红旗》杂志第十五、十六期的合刊上。这本书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党的建设继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中，发表了一篇题目叫《揭穿＜修养＞三次出笼的大阴谋》的文章。这篇文章胡言乱语，说什么一九三九年七月，刘少奇首次抛出《修养》这株"大毒草"，是为了"反对抗日救国运动"、是"公开主张向国民党投降"，《修养》是"亡党亡国的投降书"。这真是血口喷人。如果我们看《论修养》这本书中如何洋溢着共产党人为民族为人民为党而坚决奋斗的革命精神；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革命精神；为了党的利益、民族的解放和人类的前途，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生命的彻底的革命精神；那么所谓"亡党亡国的投降书"的罪名不是彻底、完全的诬陷又是什么呢?林彪、"四人帮"一伙还诬陷《论修养》于一九四九年八月修订再版是"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提供理论基础"。这同样是无稽之谈。我们知道，一九四九年八月，那时已经获得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同志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所以，在全国行将完全解放的时候，再一次出版《论修养》一书，对于教育我们广大的党员和干部在进城后坚决抵制资产阶级的腐蚀和影响，巩固和发展全国的胜利，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林彪、"四人帮"一伙诬陷《论修养》一九六二年第三次再版是阴谋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是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宣言书"。他们的种种无耻污蔑，抹杀不了《论修养》的马列主义光辉，全国的党心民心终于作出了符合事实的公正的判断。

三

一九六七年五月，林彪、“四人帮”一伙授意发表了《<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这篇黑文，恶毒攻击《论修养》一书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诬陷它是提倡唯心主义的修身养性、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接着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围剿《论修养》的狂涛恶浪。

林彪、“四人帮”一伙攻击《论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的“论据”是什么呢?他们唯一的论据就是说《论修养》一书“闭口不提无产阶级专政”。这种逻辑是十分荒唐的。这本书是在抗战时期出版的，那时党刊所发表的文章大量的主要的是阐明抗日救国和党的领导的大道理，对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如无直接关系则尽量不提，这是不言而喻的常识。难道能够说，不提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吗?这样说，岂非荒谬绝伦。《论修养》虽然没有直接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字样，但整个精神是贯穿了共产党员要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的革命精神的。《论修养》一书正是对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共产党员提出了不仅要为当时现实的民族解放任务而斗争，而且还要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斗争。《论修养》一书提出的共产党员思想意识修养锻炼的每一个方面，也都是围绕着无产阶级肩负的执掌国家政权、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历史使命这一中心而展开的。刘少奇同志指出:“资产阶级的革命，通常是以获取政权来完成的。而对于无产阶级，则在政治上获得解放，获得胜利，还仅仅是革命的开始，极大的工作还在革命胜利以后，还在取得政权以后”。他在这里把共产党员的修养同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即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和改造整个社会的问题密切地联系起来了。正是由于《论修养》一书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精神实质，所以它不能为林彪、“四人帮”一伙所接受，就是必然的了

(原载 1980 年 3 月 5 日《文汇报》)

〔附〕 真理的声音是窒息不了的(节录)

邓　力　群

林彪、江青一伙和他们的吹鼓手在围剿《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时候，制造了一个耸人听闻的罪名，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呢?

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主题是教育共产党员必须牢固地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其中包括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观察、处理和解决不同时期的革命任务和斗争形式方面的问题，要求共产党员在客观条件和斗争任务发生各种变化的时候，都能够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指导自己的行动。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没有出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字样，在引用列宁的两段话的时候，也确实没有引其中无产阶级专政的词句。从当时我党所处的客观环境和斗争任务、斗争策略来说，不提无产阶级专政，本来是无可非议的。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在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无产阶级革命、分析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问题的时候，提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论断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发表于一九

三九年。当时，我们党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抗日战争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目的是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的民主专政。抗日战争阶段，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降到次要地位，党的任务，是联合除汉奸、卖国贼以外的一切爱国的人民、阶级、阶层、政党、团体，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当时所面临的，根本不是提出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是对争取我国伟大民主革命胜利起了重要指导作用的理论著作。这部比《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晚一年发表的著作，明确指出，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也不应当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严厉地驳斥了这个问题上的"左"倾空谈和恶意宣传。

共产党和它的党员，当然要在运动的现在想到运动的将来，当然要在民主革命中想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但是，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篇文章，只有先做好第一篇文章，才可能去做和做好第二篇文章。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任何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如果看不起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对它稍许放松，稍许怠工，稍许表现不忠诚、不热情，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论联合政府》)。如果象林彪、江青他们要求的那样，在抗日战争时期，也要不顾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党的具体任务，不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大讲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可能有抗日战争的胜利，不可能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胜利，不可能在全国实现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那才真正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背叛。

林彪、江青一伙的吹鼓手们在他们的文章中说，《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几个版本，根本不谈抗日战争、不谈抗日战争时期的阶级斗争，根本不谈解放战争、不谈解放战争时期的阶级斗争。

事隔多年，重新发表旧作，根据实践的检验，对旧作的内容进行修改、补充，是常有的事情。但是，无论如何，总要尊重历史，不能也不应该把著作写作时期没有发生而只是在后来发生的事情，硬塞进去。怎么能违反这样一个常识，不顾历史的真实，让少奇同志在一九三九年的著作中去谈当时尚未来到的解放战争时期的阶级斗争呢?全国解放后，《毛泽东选集》各卷先后出版，其中前三卷都是解放战争以前的著作。在收入选集的时候，很多文章都根据实践的检验，进行了必要的修改、补充。科学所以叫做科学，就是因为它很仔细地倾听实践和经验的呼声。否则，就根本不会有科学。毛泽东同志对自己旧作的处理，充分表现了他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严格的科学态度。如果不是头脑发昏，有谁会要求毛泽东同志把有关解放战争时期的内容，补充到北伐战争、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时期的著作中去呢?

至于说《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根本不谈抗日战争、不谈抗日战争时期的阶级斗争，则完全是捏造。少奇同志是通过十几年来对党内生活、党员状况的观察，提出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的。这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大批新党员所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当时党的建设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他在谈到入党动机问题的时候明确指出，进步的人们因为共产党坚决抗日，能够拯救中华民族，而要求入党，这并没有错。在当时的革命运动即抗日战争中，成为一个积极的战士，是很好的。他同时又指出，一个共产党员的觉悟不应当停止在这样一个水平。他要求这些同志入党以后努力学习，使自己锻炼成为自觉的共产主义者。共产党员应该用共产主义世界观武装自己，应该把胜利地进行抗日战争，作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在抗日战争时期，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

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一致性。少奇同志正是这样把党的建设问题、党员的修养问题，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具体斗争，密切地结合起来论述的，把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密切地结合起来论述的。

在一九六二年再版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少奇同志特意增加了比较长的篇幅，专门论述上面这些问题。他批评了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党内部分同志反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孤立起来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又批评了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党内部分同志反对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政策，使无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庸和尾巴的迁就主义、投降主义的倾向。他指出，这种"左"的错误和右的错误，都是在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不能坚定地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确定革命事业发展的正确道路的显著例证，都是不能正确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的突出表现。

他说，共产党和它的党员必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斗争条件下，正确地解决如何革命、如何斗争的问题，才能争得革命的胜利，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在进行革命斗争的时候，依靠谁、团结谁、打倒谁的问题；谁是直接的同盟军、谁是间接的同盟军、谁是主要敌人、谁是次要敌人的问题；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同盟军，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联合次要的敌人、去打倒主要的敌人的问题；在情况发生变化、需要走迂回曲折道路的时候，及时地改变战略和策略，确定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最有利的方针政策等等问题，都必须运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运用共产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求得正确的解决。一方面，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在进行斗争的时候，必须同广大劳动人民建立密切的联系，同各革命阶级和革命党派建立革命联盟，领导广大劳动群众和一切同盟者同自己一道前进；必须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代表一切革命者的利益，代表本国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也就是说要代表在本国人口中占百分之九十几以上的人民的利益。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在进行革命斗争的时候，不但要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分清界限，而且要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派分清界限，也要同其他劳动群众有所区别；要在革命斗争中始终坚持自己的独立性，不受资产阶级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各种影响；要在革命发展的每个阶级，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

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一年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说，"中国共产党是在复杂的环境中工作，每个党员，特别是干部，必须锻炼自己成为懂得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战士，片面地简单地看问题，是无法使革命胜利的。"他提醒我们，要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同时又要严肃地、坚决地执行党适应当时情况所制订的各项具体政策。既不能因为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而拒绝执行这些具体政策，其中包括保护抗日战争时期社会经济中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使其有一个适当发展的政策，也不能因为执行这些具体政策，接受由于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适当发展而带来的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丧失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述和少奇同志把当时的国内阶级斗争问题和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民族斗争问题密切结合起来的论述，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尽管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论述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战略策略问题、阶级斗争问题、是把无产阶级的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的范例。不正是因为这样做了，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蓬蓬勃勃的发展吗？才保证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吗？如果象林彪、江青及其吹鼓手要求的那样，离开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条件，无视当时中国革命的民族民主革命性质，无视当时阶级力量组合的具体情况，把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

割裂开来，孤立地、抽象地谈阶级斗争，那就势必导致整个民族解放事业的毁灭，势必导致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毁灭。那才真正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背叛。

(原载1980年6月24日《人民日报》)

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节录）

(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

《红旗》杂志社论

京剧革命，吹响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开端。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伟大胜利！

江青同志一九六四年七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座谈会上的讲话，用毛泽东思想阐述了京剧革命的伟大意义，发挥了毛主席的京剧革命的指导方针。这篇讲话，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解决京剧革命问题的一个重要文件。

长期以来，在以周扬、齐燕铭、夏衍、林默涵为代表的文艺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统治之下，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京剧艺术中得不到贯彻。在京剧台上，大量充斥舞着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坏戏，这些坏戏起着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的反动作用。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些反动"权威"的老爷们，仗着他们所窃取的权力和地位，把持京剧界，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把京剧界变成一个水泼不进、针插不入的封建地主、资产阶级独立王国。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京剧界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和一切牛鬼蛇神最大的支柱和靠山，是京剧革命一只最大的拦路虎。长期以来，他顽固地反对京剧革命，宣扬什么"老戏很有教育意义"。他大肆吹捧宣扬叛徒哲学、活命哲学的《四郎探母》，说什么这出戏"唱唱也不要紧，唱了这么多年，不是唱出个新中国吗"他把极力美化封建地主走狗黄天霸之流的《恶虎村》，吹捧为"改得好的剧目"。他甚至向人们推荐下流淫荡的京剧《游龙戏凤》。他伙同前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头，以及周扬、齐燕铭、夏衍、林默涵、田汉、张庚之流，利用旧京戏，进行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活动。

新生的力量终究是要战胜腐朽的东西的。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江青同志的指导下，在京剧界广大革命同志的努力下，革命的新京剧终于冲破了重重阻力，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旧营垒中杀出来了。

京剧革命已经出现了一批丰盛的果实。《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等京剧样板戏的出现，就是最可宝贵的收获。它们不仅是京剧的优秀样板，而且是无产阶级文艺的优秀样板，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各个阵地上的"斗批改"的优秀样板。京剧革命的这些辉煌成就象春雷一样地震动着整个艺术舞台，它意味着无产阶级的百花

已经到了盛开的时节了！这对整个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将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和作用。

京剧革命的胜利，宣判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破产，给无产阶级新文艺的发展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纪元。

京剧革命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高度估价京剧革命的巨大成就，高度重视京剧革命的重大历史意义。看清京剧革命的成就和意义，将大大增强我们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信心。我们深信，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我国文化艺术领域中，将出现一个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崭新的局面，将出现一片百花盛开的欣欣向荣的动人景象。

（原载《红旗》杂志1967年第6期）

中共中央通知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

五月八日，红旗杂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并经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击中了《修养》一书的要害，也击中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要害。通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在一个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大破修正主义，大立毛泽东思想。希望各单位的革命同志，认真地组织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照　办。　　毛泽东　　五月十二日

林副主席已阅。

即送林彪同志审阅后再送请主席批示。这个意见经五月十日扩大的碰头会议上通过，大家都认为在目前，甘肃以实行军管为好。张达志在这次军区会议上检讨较好，而冼恒汉从去年十月工作会议以来，态度总是明朗的，故以冼主持军管会，张主持大军区工作，妥否，请主席批示。

周恩来

五月十一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

中央军委听取了张达志、冼恒汉、詹大南、张忠同志关于甘肃省军区支援甘肃地方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现对甘肃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甘肃省军区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号召，执行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等光荣任务，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二）甘肃省军区司令员詹大南同志，以军队代表身份参加《甘肃省红色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的工作中，有严重错误。主要是在《红联》处理《七一一战斗队》问题上，没有掌握大方向，不做团结工作，轻率地开除了《七一一战斗队》，造成了《红联》的分裂，使甘肃省革命左派大联合受到挫折。在处理这样重大问题上，詹大南同志严重无组织无纪律，不请示报告兰州军区，当兰州军区采取措施加以纠正时，还竟然错误地进行抵制。这是不能允许的。现在詹大南同志已经检讨了错误并决心改正，我们欢迎这种态度。

甘肃省军区广大干部、战士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做了很多工作，甘肃省军区在支左工作中发生的错误，他们是没有责任的。

（三）军队的支左工作，在当地最高军事领导机关统一领导，统一安排下进行。甘肃省军区的支左工作要服从以张达志、冼恒汉同志为首的兰州军区党委的领导，重大问题必须请示报告。要严格组织纪律，不得自行其是。

（四）鉴于当前甘肃省成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还不成熟，中央决定对甘肃省实行军

事管制，以冼恒汉同志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徐国珍(兰州军区副司令)、詹大南同志为副主任。甘肃省军区要全力参加军管工作。

甘肃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兰州军区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揭露和批判以汪锋为代表的甘肃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他们斗倒、斗垮、斗臭。在斗争中壮大左派力量，分化瓦解保守组织，争取教育广大群众，做好革命干部的"亮相"工作，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筹备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取得甘肃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
转发广州军区、湖南省军区报告时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

(一)现将广州军区、湖南省军区报告两件发给你们，望参照执行。

(二)凡犯了错误的必需坚决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前更高。

(三)不要动动摇摇，游移不决。听信老婆孩子从保字号那里带来的错话，信以为真。

(四)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搁下，将来再说。

(五)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通　　知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

为了坚决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有利于学生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更好地进行文化大革命，参加生产劳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决定：

一、实行半工半读的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和职业学校、以及厂矿企业附设的半工半

读的学生，都要回到原生产单位或本校，按照中共中央的有关规定，积极复课闹革命，同时参加生产劳动。

二、厂矿企业附设的半工半读学校，有不少是名义上半工半读，实际上学生全日参加劳动，有固定的生产岗位。对这部分学生，可以根据生产建设的需要，在学生自愿的原则下，并经过群众评议，合乎学徒工条件的，可以转为学徒工，合乎正式工条件的，也可以转为正式工，不愿意转为学徒工或正式工的，可以继续半工半读，以学为主。对于他们的学习条件如校舍等，要作适当安排。关于学制改革问题，原则上应在斗、批、改运动中，放到运动后期去解决。

三、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半工半读学校以及职业学校的一九六六年应届毕业生（一九六五年毕业生尚未分配工作的，包括在内），根据自愿原则，现在即可按原有的分配办法分配工作。分配工作后，应到新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并参加生产和工作。愿意留校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可以继续留校，原来享受的生活待遇，在分配工作之前，暂不变动。

中共中央关于改进革命群众组织的报刊宣传的意见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组织编印的各种报刊、传单，在宣传战线上起了重要的作用。现在，根据这类报刊宣传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如下改进意见：

一、革命群众组织的报刊，应严格遵守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并参照《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重要社论和评论进行宣传。

二、毛主席、林副主席没有公开发表的文章、讲话、批示，都一律不许擅自刊登和印发。中央的内部文件、会议记录和负责同志的内部谈话，一律不要擅自刊登，也不要以小册子和其他形式编印流传。

三、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彪同志直接领导的非常战斗化、非常无产阶级化的军队。报刊上不得公开发表反对人民解放军的文章和报道。对于他们的支援工作有意见，可以向上级反映，也可以当面批评。有的报刊，在中央作出明确规定之后，还发表公开反对人民解放军的文章，这是完全错误的。

四、必须严格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目前，群众组织的报刊泄密现象相当严重，在一些文章、报道中，透露了国防工程、设施、部队调动情况，备战计划、措施，以及经济建设、外交斗争、机要事务等等重要机密。这种现象必须迅速制止。

五、宣传要突出政治。对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要着重从政治上、思想上揭深批透。不要搞《黄色新闻》以及其他庸俗、低级的东西。

六、对国际问题的发言权集中于中央。对于国际上重大问题的宣传，要按照中央的方针政策进行。

七、在宣传报道中，不要传播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马路新闻"，尤其不要轻信和传播

政治谣言。

中共中央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荡涤着几千年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它将和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时，还将要保留历代劳动人民所创造的文化的精华，从而在新的基础上创造出为过去一切时代都望尘莫及的极其辉煌灿烂的新文化。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历史悠久而又富于革命传统和优秀遗产的国家，保存下来的文物图书极为丰富。这些文物图书都是国家的财产，在文化大革命中，应当加强保护和管理工作，要防止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乘机进行破坏活动。为此，对保护文物图书，提出如下几点意见：

一、全国各地革命遗址和革命纪念建筑物必须坚决保护，并且应当保持原状，目前不要进行大拆大改。一定要在宣传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使它们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阵地。

二、各地重要的有典型性的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及雕刻壁画等都应当加以保护。

目前不宜开放的，可以暂时封闭．将来逐步使这些地方成为控诉历代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罪恶的场所，向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三、各地古文化遗址，古墓葬要注意保护，严禁以搞副业生产或其他为名挖掘古墓。地下文物概归国有，出土文物应一律交当地文化部门保管。凡是出土的古代金银器皿各地人民银行不要收购，已收购的应当交由文化部门进行保管。

四、对有毒的书籍不要随便烧掉，要作为反面教材，进行批判。

五、各地革命委员会或军管会应当结合对查抄物资的清理，尽快组织力量成立文物图书清理小组，对破四旧过程中查抄的文物(如铜器、陶器、玉器、书画、碑帖、工艺品等)和书籍、文献、资料进行清理，流失、分散的要收集起来，集中保存、要改善保管条件，勿使损坏。一时处理不完的，可先行封存，逐步进行处理。

六、各炼铜厂、造纸厂、供销社废品收购站对于收到的文物图书一律不要销毁，应当经过当地文化部门派人鉴定，拣选后，再行处理。

七、各地博物馆、图书馆、文管会、文物工作队(组)、文化馆、文物商店、古籍书店所藏文物图书都是国家财产，一律不要处理或销毁，应当妥善保管，并注意经常的保养工作。

在进行上述工作时，要进行保护文物的宣传教育工作。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重要通告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并经中央批准。）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

一、革命群众都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的指示，争取革命和生产双丰收。

二、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严禁打、砸、抢、抄、抓。煽动武斗的少数坏人和情节严重的打人凶手，应该受到无产阶级国家法律的制裁。

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部队和军代表有权处理武斗问题，有关方面必须听从，不得拒绝执行。

三、不准破坏国家财产，不准动用交通工具参加武斗，不准调动人员参加外单位的武斗。

四、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必须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的指示。不许破坏劳动纪律，不许无故旷工。坚决同一切扰乱革命和生产秩序的现象作斗争。

五、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担负起维护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秩序、保卫国家财产、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神圣职责。

六、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四月二十日关于停止外出串连的通知。已经外出串连的北京学生和群众，除经中央特许的以外，应当立即全部反回北京、外地来北京串连的学生和群众，同样也应立即全部返回本地。

本通告自公布之日起生效，并由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分别采取具体措施。

中 共 中 央 通 知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

中央决定公开发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中共中央《通知》，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个文件、是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制定的，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文件。希望各地、各部门，认真组织学习和讨论这个文件，并学习和讨论红旗杂志、人民日报有关社论，结合一年的斗争经验、领会和掌握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推动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进一步向前发展。

伟 大 的 历 史 文 件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

《红旗》杂志编辑部　　《人民日报》编辑部

一年以前，在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下制定的历史文件——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这个文件现在公开发表了。这个文件，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粉碎了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这个文件，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的号角。

去年二月，彭真抛出来的《汇报提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是一个资本主义复辟的纲领。这个纲领的出笼，是彭真修正主义集团由来已久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的大暴露，《通知》揭露了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使这个集团破产了。这是一个突破口。从此，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阵线就乱了阵脚。

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制定的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列宁和斯大林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解决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的问题，解决了在一个国家内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了当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的问题，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集中到一点，还是政权问题：就是无产阶级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而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危害最大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混到党和政权领导机关内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毛主席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中指出：

“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全党必须“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一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证明了毛主席这些科学论断是何等英明啊！

这些科学论断，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路明灯，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指路明灯，是保证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指路明灯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以后，还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上一切阶级斗争是不是还集中在争夺政权的问题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要不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进行革命？这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列宁看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被打败的资产阶级甚至比无产阶级还要强大，时时企图复辟，同时小生产者不断生长新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威胁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要对付这些反革命威胁，并且战胜它，必须在长时期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舍此没有第二条路。但因列宁逝世过早，没来得及在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实际上解决了很大一批钻进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例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之流。他的缺点是在理论上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代社会上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革命的谁胜谁负没有最后解决，弄得不好，资产阶级就有复辟之可能。在他临死的前一年，他已觉察到了这一点，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弄得不好，可能使矛盾变成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充分注意了整个苏联历史的经验，在他的一系列伟大著作和指示中，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中，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正确地解决了这一系列问题。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在二十世纪初叶，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列宁主义的阶段。现时代，又发展到了毛泽东思想的阶段。

毛主席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的集中表现。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把他们那套修正主义货色拿出来示众，彻底批判，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对他们进行夺权斗争，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这是斗争的大方向。我们必须紧紧地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

毛主席在这个文件中所说的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现在被广大群众揭露出来了。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内部的资产阶级的总代表。现在揭露出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一个老机会主义者。在全国胜利之前，他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在全国胜利之后，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要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他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现在查明，彭真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二月提纲》，就是他支持的、也就是他的纲领。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中，他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呢？**他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现在，大家已经很清楚，毛主席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中所说的那种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那种一旦时机成熟，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主要人物，

就是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是一个关系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命运和世界革命前途的头等重要的大事，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成果。全中国的革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一致欢呼这个伟大的胜利。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妄图在中国通过他们的代理人进行颠覆的阴谋，遭到最大的失败。

国际无产阶级专政历史最大的教训，就是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在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里，也发生了这种事情。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正是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动亿万群众，进行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使我们党和国家永不变色的最可靠的保证。这是毛泽东同志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国际无产阶级的最大贡献。

在这个文件中，宣布撤销原来由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包办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这是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措施。

这个伟大历史文件的公开发表，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重大事件。

现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伟大的胜利，但是，严重的斗争任务还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们要进一步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团结最广大的群众，团结干部的大多数。我们要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在需要夺权的地方和部门，把权真正夺到无产阶级的手里来。我们要把大批判运动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胜利完成各单位的斗批改任务。我们要更好地**"抓革命，促生产"**，使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进一步繁荣起来。

党中央号召，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应当认真地学习这个文件。通过学习这个文件，结合目前斗争的新形势，结合一年来的斗争经验，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进一步领会和掌握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原载 1967 年 5 月 18 日《人民日报》)

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文件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

《党史研究》编者按：这是周恩来同志亲自编定的一个文件。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利用一九三二年二月国民党反动派以“伍豪”（周恩来同志的一个笔名）名义在上海各报登载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对周恩来同志进行恶毒攻击，怀有瓦解我党阴谋。为了说明事实真相，周恩来同志于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写信给毛主席，并附送了有关的历史资料。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毛主席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同志在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并宣布：根据毛主席和政治局的意见，要把报告的录音和录音记录稿以及有关文献资料，做为档案，保存在中央档案处；同时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保存一份。但是，当时“四人帮”一伙采取拖延的手法，把此事搁置了起来。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同志病危，需进行手术治疗。在进入手术室前，他拿来上述报告录音记录稿，签上自己的名字和报告日期，同时注明了签字的环境和时间，即：“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现在把周恩来同志编定的文件和有他签字的报告录音记录稿的首页，一并发表。记录稿的题目是邓颖超同志亲自拟定的。

一、毛主席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

毛主席对北京大学6406信箱×××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来信关于“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批示：

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毛泽东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

二、恩来同志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给毛主席的亲笔信

主席批：

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康生、江青同志已阅。

主席：

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到今天才抽出一天工夫翻阅上海各报。江青同志也于昨日转来各件，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的伪造启事，它是先在《新闻报》二月十八日登出的。登后，同天，上海临时中央方面就向申报馆设法，结果，《申报》二十日、二十一日登出伪造的启事，二十二日登了广告处给伍豪先生另一广告启事的拒登回答，大概这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伪造启事的办法。我在记忆中，有通过申报馆设法否认的处置，但结果不明，十六日午间已向主席这样说了。不过我原来将伪造的伍豪启事记在通缉杀人凶犯周恩来、赵容(即康生)之前，现在证明是我记错了，查遍一九三一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后的上海各报，并无另一个所谓伍豪启事，而红卫兵也未发现另一启事。可见在我记忆中的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从电报和来信中知道，也就不全了然了。

现在，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编为大事记送阅，同时，送上报道最详的上海《时报》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月合订本一册，《申报》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月合订本两册，请翻阅。

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

敬　礼！

周恩来

五月十九日夜

【原件附件一】

大　事　记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央开六届四中全会

四月，顾顺章送张国焘、陈昌浩等经武汉人鄂豫皖苏区，顾留汉口被捕，向蒋介石自首。

上海当夜得到消息，中央有关机关全部迁移。

五月，中央决定消灭顾顺章家属十人。[1]

---

[1] 当时，顾顺章的家属掌握和了解我们党的许多机密和领导同志的情况以及中央机关地址。顾顺章叛变投敌后，经过我们侦察，取得了他们准备向敌人告密的可靠证据。他们还给顾顺章写信报告我党中央机关迁移后的新址，对我党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为了保卫党的安全，我们采取了非常措施，将顾顺章的家属秘密处决。对于顾顺章幼女，由我工作人员谭钟玉同志送回家乡(上海宝山县)代为抚养。——原编者

六月，向忠发捕后叛变，处死。有两处机关破坏。

九月，九·一八沈阳被日寇侵占。

十一月，特科王世德(老先生)被捕，供出顾顺章家属被消灭。

十一月二十一日国民党下令发掘尸身，在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村37号，33号，在胶济路，武定路修德坊6号，在新闸路，麦特赫斯脱路陈家巷91号，从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先后掘出男女尸身各八具，共十六人。

报上登出的有：

时报(二十二至二十五，二十七至二十九七天)；

申报(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六天)；

新闻报(二十二日，二十四至二十九日七天)；

时事新报(二十四日至三十日七天)；

民国日报(二十四至二十七日四天)。

登得最详并附照片的为时报。(附一专讯)

十一月底至十二月初

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要启事(全文附)

报上登出的有：

时报（十一月二十九至三十日，十二月一至二日四天)；

申报(十一月二十九至三十日，十二月一日三天)；

新闻报(十一月二十九至三十日，十二月一至二日四天)；

时事新报(十一月二十九至三十日，十二月一至三日五天)；

民国日报(十一月二十九至三十日，十二月一至二日四天)。

十二月上旬周离沪，经汕头，从永定进人中央苏区。在闽西得知十二月十四日宁都暴动五军团起义成功。

二十日左右，周抵瑞金叶坪。

一九三二年一月，王世德发表叛变声明(全文附)

上海登一月十一日申报，其他报未见。

据报，南京中央日报登在一月二日。

一月二十八日，淞沪抗战

二月，十八日起至二十一日，上海报上先后登出敌人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全文附)。号称二百四十三人，并无另一姓名，就此一点，断然为敌伪造无疑。

上海报上登的有：

新闻报(二月十八日，十九日)；

申报(二月二十日，二十一日)；

时事新报(二月二十日，二十一日)；

时报未登。

民国日报未找到。

二月二十二日，申报在广告栏内登出如下启事：

“伍豪先生鉴　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申报馆广告处启”

这种广告处启事，登在广告栏内很少先例，而又在伪造脱党启事登报的同天，当时一望

而知是否认脱党启事的，故未能登出。这想是当时党中央所采取的公开否认办法。

【原件附件二】

周恩来夫妇:

查是案正凶周恩来，湖南人，化名极多，临机而变，共党有名伍豪者，即周也。周为法国留学生，历任黄埔学校教练，东路军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中央委员。妻名邓颖超，曾任共产党中央委员妇运部负责人等职。又国民党方面查有共党中最为凶恶专事杀人之蔡飞，最近因在上海犯绑案拘入巡捕房，业经派人向捕房查问核办。

录自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时报》

【原件附件三】

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要启事

敬启者，顺章于民国十三年受革命潮流之激动，误入共党岐途，数年来参与机密。鉴于该党倒行逆施，黑幕重重，与本人参加革命之初衷，大相违背，不忍糜烂国家，祸害民众，乃于本年四月间自动脱离共党，向党国当局悔过自新。从此闭户读书，以求学识之长进。对于共党任何个人，从未加以陷害。盖顺章只有主义之斗争，并无个人仇恨之心理，此亦政治家应有之态度。孰意共党首要周恩来、赵容等竟亲肆毒手，将余全家骨肉及远近戚友等十余人，悉行惨杀，而顺章岳母之私款七千余元及价值三千余元之田产单据，亦被劫夺以去。似此残酷兽行，绝灭人道，实为空前罕有之惨案。恶耗传来，痛不欲生。现已呈蒙国民政府悬赏两万元，严缉该犯等依法究办外，顺章特另行悬赏缉究，以慰冤魂。如有人能将该犯周恩来、赵容等捕获解案，顺章当赏洋三千元，或通风报信，因而捕获者，赏洋二千元。储款以待，决不食言。伏祈公鉴。顾顺章谨启。通信处(南京)奇望街邮局信箱八号。

录自民国二十年《申报》十一月二十九日至十二月一日，共三天。
《时报》十一月二十九日至十二月二日，共四天。
新闻报十一月二十九日，三十日，十二月一、二日，共四天，字体小于上述两报。
民国日报同年十一月二十九至三十日，十二月一、二两日，共四天。
时事新报同年十一月二十九至三十日，十二月一、二、三日，共五天。

【原件附件四】

王世德脱离共党紧要声明

鄙人于民国十六年加入共党。近两年来充任该党中央特务工作。因见于该党之倒行逆施，贻害社会，而复惨无人道，自相残杀，乃于前月(按即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向国民党悔过自新，从此脱离共党，谨此声明。再者，上月轰动一时之上海掘尸案，其告密之人名李龙章者、实即鄙人之化名。因该惨案确为共党首要周恩来、赵容等所为，而鄙人亦为当时参加杀埋之一份子，自向党国当局悔过自新后，即将该党此宗杀人藏尸灭迹之秘密残酷行为，悉行指出，故有此次骇人听闻之掘尸案发现。特此附带声明，使各界人士得以充分明了共党之罪恶。

王世德谨启

录自《申报》民国二十一年一月十一日

【原件附件五】

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于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

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启

录自《申报》民国二十一年二月二十日、二十一日。

《新闻报》民国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十九日。

《时报》没登此消息。

《时事新报》民国二十一年二月二十日、二十一日。

补注：后经复查，一九三二年《时报》二月十六、十七两日的号外版亦登过此伪造启事。

〔附〕 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问题的真相

周恩来文集编辑组

一九三二年的二月中旬至下旬，国民党反动派用周恩来同志的一个笔名“伍豪”的名义在上海各报登出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借以污蔑周恩来同志、攻击我党。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利用上述伪造材料，对周恩来同志进行攻击和陷害。本文想就这件事情的真相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围绕这个问题所开展的激烈斗争，作一个简要的说明。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因为顾顺章在被捕前是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党的情报保卫机关即特科的具体工作的负责人，所以他的叛变对党中央各机关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在当时形势异常紧急的情况下，周恩来同志挑起了全面负责处理这一事变的重担。他在陈云等同志协助下，以惊人的机智果断，抢在敌人袭击党中央机关之前，采取了一系列妥善有效的措施，经过几个日夜不眠的紧张战斗，就迅速地把局面稳定下来。敌人妄图破坏我党中央机关、逮捕我党中央领导同志的计划遭到破产。

事情过后，同志们怀着极其敬佩和感激的心情赞颂周恩来同志。敌人却因为阴谋的破产而十分恼火，将搜捕的最主要目标集中到周恩来同志身上。一九三一年九月，国民党作出悬赏通缉周恩来同志的决定。同年十一月又以顾顺章的名义在上海各报连日登出悬赏缉拿周恩来同志的紧急启事。但敌人却始终找不到周恩来同志的踪迹，他们的反革命计划又一次成为泡影。敌人便又施出惯用的造谣诬陷伎俩，用“伍豪”的名义在一九三二年二月中旬至下旬的上海各报登出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的假启事（全文见《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文件》附件五)。敌人在这个伪造的启事中，所以用“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启”的名义，不单单是由于搜捕我地下党遭到失败，更重要的是因为周恩来同志是我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党内、国内享有崇高威信。敌人妄图利用这种伎俩，造成我们党内的混乱，瓦解我们的党。正因为它是个伪造的，所以存在着明显的漏洞，虽号称二百四十三人，却除了“伍豪”一个名字外，再没有另外一个姓名。如果真有“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敌人怎么会吝啬到连多一个名字都不肯写呢?!

当敌人在上海各报抛出这个伪造启事的时候，周恩来同志已经离开了上海两个多月，早已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进入中央苏区，又怎么会在上海各报发表所谓“启事”呢?!

当时周恩来同志虽然已远离上海，但是，国民党伪造的启事登出以后，我们党立即予以揭穿，进行了有力的回击。这一斗争是由在上海的党中央领导进行的。在敌人抛出伪造启事的第二天，就用当时在白色恐怖下所可能做到的公开否认的巧妙办法，写了一个实际上是辟谣的启事。这个启事登在二月二十二日的《申报》上，全文如下“伍豪先生鉴 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登。申报馆广告处启。”

这显然是一条很特别的启事。从内容上看，这样的广告处启事，极少先例。照一般情况，报刊不同意刊登某一启事，直接答复本人就可以了，绝不会在广告栏内再这样的刊登出来。再从时间上看，伍豪要登而未能登出的启事是二月十八日送给申报馆的，当时从二月十六日起，《时报》(号外)、《新闻报》先后登出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申报》也在二月

二十日、二十一日连续登载了同一个伪造的启事。二十二日申报馆广告处又发表了拒绝刊登另一个“伍豪启事”的上述声明。这样一种安排，使人一看就会联想到，这另一个“伍豪启事”，是为否认“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而写的，只是慑于国民党的威胁，《申报》不敢刊登罢了。

与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公开报刊以曲折的笔法登出辟谣启事的同时，我们党又在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在上海出版的党报《实报》（代党刊《斗争》第四期）上，以伍豪的名义，登出了《伍豪启事》，驳斥了国民党的种种造谣诽谤。全文如下：

“伍豪启事

最近在各报上看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说了许多国民党走狗所常说的话，这当然又是国民党造谣污蔑的新把戏！国民党的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中国民族利益的事实，这是全中国以至全世界劳苦民众所共见。把东三省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的，把中俄合办的中东路双手奉给日本帝国主义的，使日本帝国主义以至一切帝国主义得以利用东三省与中东路以进攻苏联的是国民党政府；在上海事变中，在英勇的十九路军士兵背后，同帝国主义做买卖的也是国民党政府！所以不打倒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不创造数万万中国工农群众自己的苏维埃政府与自己的武装力量工农红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正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为了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争取中国民族独立解放而斗争！一切国民党对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与我个人自己的造谣污蔑，绝对不能挽救国民党于灭亡的！

二月二十日”

配合登出《伍豪启事》一文，二月二十七日的《实报》上又以《国民党造谣污蔑的又一标本》为题，发表了一篇评论国民党伪造启事的文章，剖析了敌人抛出伪造启事的政治背景和惯用的造谣诬陷伎俩，深刻地揭露了敌人的虚弱本质和凶残狡诈的狰狞面目。现将全文摘要刊载如下：

“国民党造谣污蔑的又一标本

国民党反革命派，在与中国共产党及苏维埃运动斗争中，否认在政治上、军事上、理论上，都受到可怜的悲惨的失败之后，却企图以造谣中伤伪造文件来破坏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欺骗蒙蔽和愚弄劳苦群众！

……

这类‘聊以自慰’‘并以惑众’的无耻的造谣之一，便是本月十六日后，时报、新闻报、申报那批反革命报纸上所刊登下列的广告：

‘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全文见《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文件》附件五，此处从略——引者）

这个文件是敌人在反对自己的政敌之中，所用的最无耻与卑鄙手段的模范之一！

疯狂的白色恐怖，以卑鄙的造谣，假借刑事犯的罪名追逐与通缉伍豪同志（即所谓爱棠村案）。现在却又假借伍豪同志的名义来污蔑伍豪同志（共产党的领袖之一），污蔑中国共产党，污蔑共产国际。难道天地间更有卑鄙与无耻甚于国民党反革命派的么？

中国无产阶级及劳苦群众，坚决的知道：唯一的真正能解放中国民族脱离帝国主义羁绊

与压迫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所指的道路：民众武装进行坚决勇敢的民族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帝国主义。而推翻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中国、污辱中国的国民党政权，是中国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他们坚决相信：在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斗争中，只有苏联是唯一的盟友与兄弟的国家。

伍豪同志将与中国共产党全党党员都一致地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共产国际及中共领导之下，以坚决英勇的打倒国民党的国内战争及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来回答敌人的污蔑与造谣！

如果谣言能救国民党于死亡，则国民党这类混蛋可以不朽，可惜谣言只能证明反革命派之无力与破产，而不能挽救国民党之死亡！"

为了向广大人民群众公开地揭穿敌人对周恩来同志、对我党的造谣污蔑，我们党又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即约请律师代登启事，进行辟谣。在当时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中国律师是难以承办这件事的。我们党便通过一定的关系和渠道，找到了当时在上海开户营业的法国律师巴和，由他在一九三二年三月四日的《申报》上，以醒目的大字标题，登出了《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周少山是党内熟知的周恩来同志的别名。现将全文抄录于下：

"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用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

事务所　法大马路四十号六楼五号"

这个启事，在措词上非常巧妙，既合乎国民党统治区的法律，又澄清事实真相，狠狠地打击了敌人。这是我党进行合法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

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事情的全部情况，康生是一清二楚的。因为他当时就在上海，而且是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对这一点，康生本人在文化大革命前也曾不止一次的说过。一九六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和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他在两个提到所谓"伍豪脱党启事"的材料上，还这样写过：

"这完全是造谣污蔑……，实际上，当时周恩来同志老早已到苏区去了，根本不存在这样事。""当时在上海的同志都知道这样事。"

但是，时隔几年，到了一九六七年的五月中旬，即《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的前后，当林彪、"四人帮"一伙利用当年国民党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这条材料，向周恩来同志进行围攻，社会上掀起反对周恩来同志的逆流的时候，人们却看不到康生有片纸只字的表态。

为了回击林彪、"四人帮"的进攻，周恩来同志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即写信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用充分的材料讲清历史情况，说明当时自己早已离开国民党统治区两个多月，正在中央苏区承担工作。同时把与这个问题有关的历史材料做为附件，一并送上（见《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文件》）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又有人提出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于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对这个问题

作了明确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可是，这个问题并未就此了结，党内外大多数同志并不了解这个问题的真相。因此，周恩来同志于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在中央召集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并宣布根据毛泽东同志和政治局的意见，把报告的录音和根据录音整理的录音记录稿以及有关文献资料做为档案，保存在中央档案处，同时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保存一份，以便党内都知道这个问题的真相，并且避免今后有人利用这个伪造的启事制造事端。但是，"四人帮"及其一伙却采取拖延的手法，拒不执行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再次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同志病危，需要进行手术治疗。当时，"四人帮"仍在横行。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问题仍有可能成为"四人帮"用以进行煽动，实行篡党夺权的借口，因此，周恩来同志在进入手术室之前，要来他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的关于所谓"伍豪启事"问题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他已经颤抖的手，签上自己的名字和报告的日期，并写上了当时签字的时间和环境是"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于进入手术室"之前。(见原件的影印件)。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同志与世长辞，这件事竟成为他老人家生前未了的遗愿。在周恩来文集编辑组工作的我们，有责任公布周恩来同志编定的文件，说明问题的真相，揭发林彪、"四人帮"攻击周恩来同志的罪行，并杜绝今后再有林彪、"四人帮"之类利用这个问题制造混乱。那种妄图以国民党反动派伪造的所谓"伍豪启事"来玷污周恩来同志的阴谋，不过是一种历史丑行。周恩来同志一生光明磊落，对党无限忠诚，对人民极端负责，对敌人斗争英勇坚定，他为中国革命事业立下的不朽功勋，将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心中。

(原载《党史研究》1980年第1期)

〔附〕 "伍豪事件"的前前后后

所谓"伍豪事件"，是三十年代由国民党特务机关炮制，在"文化大革命"中又为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拿来诬陷和攻击周恩来同志的一桩我党历史上罕见的反革命阴谋事件。"文化大革命"中，当江青反革命集团再三利用由国民党特务假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欺骗群众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曾经明确指出此系"国民党造谣污蔑"，周恩来同志作了多次严正的声明，陈云同志根据事实也作了有力的证明，但由于未在党内传达，知道真实情况的人很少。现在，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虽已数年，但流毒未彻底清除，党内外仍可能有一部分不明真相的人，受其欺骗。为了弄清真相，使全党同志从这一事件中受到教育，我们采取郑重的负责的态度根据已经收集到的材料，扼要整理如下。

一、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真相

一九三二年二月间，国民党反动派用周恩来同志的一个别名"伍豪"的名义，在上海《时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申报》等以及国内其他地方的一些报纸上，刊登了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国民党反动派妄图通过这则启事，达到诬蔑周恩来同志和瓦解我党在白区的革命力量的目的。

当时我国的政治形势是：国民党反动派对我革命根据地发动的三次"围剿"，都在红军的反"围剿"中遭到惨败。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家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际，国民党反动派不仅不抗日，反而提出"攘外必先安内"，企图集中力量消灭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他们积极准备第四次"围剿"，同时阴谋一举消灭当时设在上海的我党中央。他们搜捕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这时期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长并主管中央情报保卫工作，他的工作对国民党反动派威胁很大。这是国民党反动派伪造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政治背景。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原为我党政治局候补委员、从事党中央情报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国民党反动派有了一举破坏我党中央的可能。幸而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党员钱壮飞同志等及时向党中央报告了这一消息，周恩来同志得知后，在陈云等同志协助下，立即采取紧急措施，转移中央机关和改变负责人住处，改变党的工作方法，等等，使局势转危为安。六月二十二日，又发生向忠发被捕叛变事件，周恩来同志又采取了果断措施。这样，一再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利用叛徒将我党中央一网打尽的阴谋。敌人深知粉碎他们阴谋的真正组织者是周恩来同志，恨之入骨，乃于九月一日下令"悬赏通缉"周恩来同志等，继而又于十一月底在上海各报刊登《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急启事》，企图用金钱收买叛徒告密。但这些均告无效。于是乃于一九三二年二月刊登出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目的是想在我党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使我党涣散解体。

据曾因逮捕顾顺章而获得蒋介石嘉奖的国民党中统特务黄凯（一九三二年二月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驻沪调查员）一九五三年供称，这个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他和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张冲合谋伪造的。张冲执笔，黄凯派人送上海各报刊载。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五日上午，送到申报馆广告门市部。广告处律师看了后认为，这个启事称二百四十三人脱党而具名只"伍豪"一人，有明显漏洞，"决定十六日暂不刊出"。但二月十六、十七日，《时报早晨号外》首先刊出了这一启事。十八日，《新闻报》也刊登了。十九日，国民党设在上海的新闻检查处派人到申报馆质问为何不登这个启事，《申报》遂于二十、二十一日刊登。《时事新报》也在这两天刊登。

二、当时在上海的临时中央采取了多种措施反击国民党的伪造启事

早在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报纸上刊登这个伪造启事之前两个多月，周恩来同志已经按照党的决定，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他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上旬离开上海，中旬经福建永定进入苏区，十二月底到达瑞金。足见，伪造启事在上海各报刊出时，他已不在上海。当时在上海的临时中央迅速地采取了各种措施，反击国民党的造谣诬蔑。

当时，《申报》在上海影响最大，党和申报馆有一定的关系。二月十八日，党派人给申报馆广告处送去党所代写的"伍豪启事"，以否定国民党反动派的伪造启事。但申报馆广告处律师看后说：《申报》没有刊登《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所以不便刊登"伍豪启事"。

二月二十日，党在上海散发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传单。这一传单由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宣传部署名，题为《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传单指出："最近在时报、新闻报各反动报纸堆

中所登载的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的广告，就是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无耻造谣的一例”。“无论这些狗东西怎样造谣诬蔑，并不能动摇共产党在劳苦群众中的威信！”

二月二十日，《申报》也刊登了伪造启事。因此，党又派同志于当日上午到申报馆询问：已登《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为何不登“伍豪启事”？申报馆广告处律师答称：铺保手续不合，不能刊登“伍豪启事”。几经交涉后，终于在申报馆总经理史量才、顾问陶行知的支持下，同意用广告处的名义在报上公开答复：“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这是当时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国民党反动派的伪造启事的一种方法。正如陈云同志在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三日指出的：“当时临时中央设法登了一个小广告，用报馆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间接说明伍豪有一个否认并揭穿国民党造谣的声明，但因为保人关系，不能登出。用这个小广告使白区和全党同志知道国民党的阴谋，不受其欺骗。”

二月二十七日，在上海出版的党报《实报》第十一期上，刊登了党所代写的另一《伍豪启事》。《伍豪启事》指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国民党造谣诬蔑的新把戏”，“一切国民党对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与我个人自己的造谣诬蔑，绝对不能挽救国民党于灭亡的！”同期《实报》还发表了题为《国民党造谣诬蔑的又一标本》的文章。文章指出：“疯狂的白色恐怖，以卑鄙的造谣，……假借伍豪同志的名义来污蔑伍豪同志（共产党的领袖之一）、污蔑中国共产党。”

接着，党还采取了更加明确有力的公开辟谣措施，以周恩来同志的另一别名周少山的名义，请法国律师巴和代登启事以否认伪造启事，进一步肃清其影响。巴和律师为《申报》常年法律顾问，经付以重金后，在三月四日的《申报》上刊出《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启事说：“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这一启事公开刊登后，便在党内外进一步澄清了问题。

一九三二年二月，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也曾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布告。布告中说：“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于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左右连日登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

据国民党特务黄凯于一九五三年六月供称，伪造启事“丝毫未达预期的效果”，“好久并无人来向各机关秘密自首”。国民党反动派演出的伪造启事这一丑剧，最后不得不毫无结果而终。

三、江青等人企图利用伪造启事诬蔑陷害周恩来同志

由上可见，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国民党反动派炮制出来用以造谣诬蔑我们党和周恩来同志的，这是历史上早已澄清了的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等人却一再妄图用这一伪造启事来诬陷、攻击周恩来同志。

一九六七年夏，天津的一些红卫兵在查阅旧报纸时发现了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当他们知道伍豪是周恩来同志的别名后，于五月十二日将载有这一伪造启事的报纸的抄件送与

江青。江青收到后，不作任何调查研究，采取突然袭击手段，于五月十七日给林彪、周恩来、康生三人写了一封信，把伪造启事的抄件摆在他们三人面前，信中阴险地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这封信实际上是逼周恩来同志作出交待的通牒。面对这个挑衅，周恩来同志迅速地、断然地予以反驳。五月十九日，他在江青的信上写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这一天，周恩来同志查阅了上海各旧报，亲自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并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的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一并送给毛泽东同志。信中说："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的伪造启事"，"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

毛泽东同志看了周恩来同志送去的信和材料以后批："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一九六七年底，北京有一个学生向毛泽东同志写信重提此事，毛泽东同志于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批："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毛泽东同志又在一次谈话中说：象许世友这样六十多岁的人，他都不知道这件事是敌人伪造的。可见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很不容易。"毛泽东同志除了上述两次亲自澄清伪造启事外，还曾经嘱周恩来同志在适当的会议上给同志们讲一讲，录下音，存入档案，使后人了解此事。

江青等人则企图利用伪造启事陷害周恩来同志。一九六七年十月，江青在北京市钓鱼台接见吴法宪等人时说："我这里什么人的材料都有，……这一口袋是周总理的材料。"同一时期，"四人帮"把持下的上海市革委会的《抓叛徒》简报中，列入"伍豪启事"一条。一九六八年五月，上海档案馆的造反派头头刘和德将诬蔑周恩来同志的材料密封起来交给了吴法宪。

周恩来同志注意到江青等人居心叵测，因而曾就此事多次作了严正声明。除上述外，一九六七年十月和十一月，他先后将载有伪造启事的报纸和他给毛泽东同志的信拍照存档。一九六八年一月十日他给江青写了一封信，通知她将有关材料拍照存档的事，信中并说："此事在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凡熟习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为伪造。我在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日谢富治家属记载，谢富治在死之前说："所谓'伍豪启事'是国民党伪造的，毛主席讲过这启事是假的，毛主席和康生等同志早就知道这件事的真象。"现已查明，康生的确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曾先后在涉及这个问题的两份材料上批道："这完全是造谣诬蔑"，"实际上当时周恩来同志早已到苏区去了，根本不存在这样事"。一九七二年二月十八日，他口授了一个记录，出面证实："所谓'伍豪启事'完全是国民党特务的伪造，用来攻击诬蔑我们党和周总理的。"

一九七二年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开始，毛泽东同志要周恩来同志在会上讲讲这个问题，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问题列入了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的议程。参加了这次会议的陈云同志，在六月十三日发言中说："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对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记得是国民党的阴谋。伍豪二百四十几人的脱党声明，是在恩来同志已经到达中央苏区之后"。同一天，陈云同志还写了书面发言，说："我现再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六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同志在会上专门报告了这个问题，再次说明这是敌人的造谣诬陷。

对于周恩来同志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就伪造启事所做的报告，毛泽东同志和政治局曾提出将录音和根据录音整理的记录稿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存档，但是会后却被搁置下来未办。而且王洪文于七月间还叫人从上海档案馆寻找“伍豪的材料”。上海档案馆“查到一份伍豪等人的启事”，于七月十七日报王洪文。王洪文批道：“此件先存敬标同志处，再等一个时期处理，可能中央有指示。”一九七二年冬，上海有人证明一九三二年二月为驳斥国民党反动派伪造的“伍豪等启事”而设法刊登党所代写的“伍豪启事”的情况，启事内容说“报载事实不符，谣传不足凭信”。这一材料被张春桥、徐景贤扣压，不报中央。这些都说明江青一伙的陷害之心不死。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同志病重，在人手术室前他要来了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报告的记录，用已经颤抖的手亲笔在上面签了名，并注明了报告日期。这说明了他对这件事的关切。

周恩来同志一生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英勇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党性纯洁，立场坚定，不能容忍敌人的诬蔑对他的玷污，不能容忍这种诬蔑给我们党带来不良影响。为了保护党的荣誉和捍卫自己的政治生命，他为澄清所谓“伍豪等启事”作了多次努力。经过他的努力、毛泽东同志的说明和陈云同志等的证明，事情已经完全清楚，江青等人企图利用伪造启事的阴谋早已破产。但是，由于一九六七年五月提出这个问题以来，始终没有一个党的正式文件澄清此事，至今还有许多同志不了解此事的前因后果。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国民党反动派的伪造启事曾经在一部分人当中传播，所造成的不良影响至今尚未清除，因此，现在根据历史事实写出这份材料，向全党同志如实地介绍国民党反动派伪造《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以及我党反击国民党反动派造谣诬蔑的经过，仍属必要。这不仅符合周恩来同志的遗愿，也符合全党同志的愿望。

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中 央 文 献 研 究 室
中 央 党 史 研 究 室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原载《中共党史资料》第5辑）

学习《伟大的历史文件》的一个资料（节录）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日）

《红旗》杂志编者按：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指出：“列宁看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被打败的资产阶级甚至比无产阶级还要强大，时时企图复辟，同时小生产者不断生产新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威胁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要对付这些反革命威胁，并且战胜它，必须在长时期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舍此没有第二条路。但因列宁逝世过早，没来得及在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实际上解决了很大一批钻进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例如托洛

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之流。他的缺点是在理论上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代社会上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革命的谁胜谁负没有最后解决，弄得不好，资产阶级就有复辟之可能。在他临死的前一年，他已觉察到了这一点，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弄得不好，可能使矛盾变成对抗性的。”这是非常重要、非常科学的论断。为了帮助读者理解这些科学论断，有几位同志整理了一个简略的资料，把它发表出来，供读者参考。

列宁曾经多次论述过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列宁在这方面的一些重要思想，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他所写的《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向匈牙利工人致敬》等有名的著作中。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长时期内，是不是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对于这个问题，列宁作了肯定的回答。

对于小生产和小生产者，列宁也作了科学的分析。他多次指出，资产阶级强大的原因之一，在于小生产的习惯势力的存在。列宁说：“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六页。）列宁还说：“战胜强大而集中的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二十六页。）

列宁从这些方面着重论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提出要克服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唯一的道路就是强化无产阶级专政。

总之，列宁看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被打败的资产阶级甚至比无产阶级还要强大，时时企图复辟，同时小生产者不断生长新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威胁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要对付这些反革命威胁，并且战胜它，必须在长时期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舍此没有第二条路。但列宁在一九二四年就逝世了，没有来得及在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伟大事业，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捍卫并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实际上解决了很大一批钻进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例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揭露托洛茨基所谓“恢复党内民主”等谬论，是要瓦解党，破坏党的统一，打断党的脊椎骨。

当苏联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之后，即当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召开的第八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了《论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这个报告，正确地总结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同时也集中地反映了斯大林在理论方面的缺点。

斯大林在理论上，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代社会上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他在《论苏联宪法草案》中说：“地主阶级已因国内战争胜利结束的结果而早被完全消灭了。其他剥削阶级，也遭到了与地主阶级同样的命运。在工业方面已没有资本家阶级了。在农业方面已没有富农阶

级了。在商品流转方面已没有商人和投机者了。这样，所有一切剥削阶级都被消灭了。”剩下的“工人阶级与农民间以及这两个阶级与知识界间的界线，是在泯灭着，而旧时的阶级特殊性也在消失下去。这就是说，这些社会集团间的距离日益缩减下去。”“这些社会集团间的经济矛盾是在降低着，是在泯灭下去。”“这些社会集团间的政治矛盾也是在降低着，也是在泯灭下去。”（《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一九五〇年版，第八〇〇、八〇四页）

斯大林还说过：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性质完全适合的实例，便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这里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生产过程的公共性质是完全适合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主义问题》，第八六四——八六五页。）

斯大林在理论上，也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代革命的谁胜谁负没有最后解决，弄得不好，资产阶级就有复辟的可能。他在《论苏联宪法草案》中说：“社会主义体系在国民经济所有一切部门中的完全胜利，现在已经是事实了。”又说：“人剥削人的现象已被铲除和消灭了，而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已奠定为我们苏维埃社会不可动摇的基础。”（《列宁主义问题》，第八〇〇页）。

然而斯大林毕竟是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又经过多年的斗争实践之后，在晚年觉察到了这一点，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弄得不好，可能使矛盾变成对抗性的。

斯大林在逝世的前一年，即一九五二年，发表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他在这本书中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还存在着矛盾。

在斯大林逝世以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这是国际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最大教训。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充分注意了整个苏联历史的经验，在他的一系列光辉著作和指示中，在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中，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正确地全面地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和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划时代的发展。

(原载《红旗》杂志 1967 年第 7 期)

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 (节录)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红旗》杂志社论

一九六六年二月，是一个不平常的二月，是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激烈斗争的二月。这时，在我们党内出现了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一个是彭真的《汇报提纲》，一个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汇报提纲》，是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支持下，从二月三日到七日，在北京精心炮制出来的。这个提纲，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反

革命纲领，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

《座谈会纪要》，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从二月二日到二十日，在上海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反复研究，又经过毛主席三次审阅修改而写成的。这个纪要，是同《汇报提纲》针锋相对的，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文件，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

两个文件，是代表两个阶级的两面旗帜。《汇报提纲》，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猖狂进攻的一面黑旗。《座谈会纪要》，则是无产阶级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动大反击的一面红旗。

两个文件，是从两个代表不同阶级的司令部里发出来的两种号令。《汇报提纲》，是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发出来的反革命号令，它号召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一切牛鬼蛇神，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护他们窃取的政治、思想、文化的领导权和阵地，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而拚死斗争。《座谈会纪要》，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来的革命号令，它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揭露和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冲锋前进。

两个文件，提出两种相反的斗争方向。《汇报提纲》，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革命左派和革命群众，妄图打击左派，瓦解左派革命队伍，保护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充满了恨，对资产阶级右派充满了爱。《座谈会纪要》，则坚持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坚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热情地支持和歌颂群众的革命行动，把斗争矛头愤怒地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长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资产阶级的威风。

两个文件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它们是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的产物。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同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的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矛盾的集中表现，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矛盾的集中表现。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整个时期的主要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座谈会纪要》同《汇报提纲》，就是这个对抗性的矛盾发展到重要关头的产物。

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严密封锁毛主席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的指示。他们公然对抗这个指示，在各种场合宣称，对吴晗的批判，不准谈要害问题，不准涉及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问题，不准谈吴晗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他们打击左派，包庇右派，妄图把这场革命的批判拉向右转，纳入资产阶级的所谓“纯学术”讨论的轨道。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支持下，盗用党中央的名义向全党发出了所谓《汇报提纲》。这时，他们得意忘形，疯狂到了极点。

就在这个时候，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在上海主持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在毛主席亲自关怀和指导下，起草和批发了《座谈会纪要》这个重要的历史文献。这个历史文献，给了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当头一棒，并且用毛泽东思想把无产阶级革命派进一步武装起来。

《座谈会纪要》，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社会主义阶段，文化战线上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化战线上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文艺界在建国以后，“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我们必须“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这就是说，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阶段中，存在着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

争。不是无产阶级专资产阶级的政，就是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对于某些地方、某些部门被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的状况，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因此，必须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钻进党内和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的一小撮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小撮大大小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彻底打倒。

一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我们国家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个一个地被揭露出来，被群众斗臭斗倒。《汇报提纲》，连同它的作者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及其后台中国的赫鲁晓夫，完全地破产了，完全地失败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一些党、政、财、文大权，正在重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无产阶级革命派成长壮大起来，结成千军万马的无产阶级革命大军。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光辉理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得到证实和发展。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这是毛主席对于中国人民，对于国际无产阶级的不可估量的贡献。

(原载《红旗》杂志 1967 年第 9 期)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对××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一、为了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认真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保证革命生产双胜利，根据毛主席关于"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以及"只管工业，不管交通运输，是不对的"等重要指示，特决定自即日起对××部（委）实行军事管制，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军管会）或军管小组，任命×××为军管会主任或军管小组长，×××、×××为副主任或副组长。

二、军管会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政治挂帅，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各项方针政策，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放手发动群众，集中力量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结合本部门的实际情况，进行斗、批、改，肃清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切影响，挖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根子。

三、军管会应当坚定不移地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首先要从政治上支持，帮助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提高思想、政策水平。在同时存在着两个或更多左派群

众组织的情况下，要帮助他们认清主要敌人、抓住主要矛盾，协商解决双方的争论，共同对敌；对于那些受蒙蔽而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应该耐心地教育他们同幕后操纵他们的坏人划清界限，热情地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来。这样才能够发展和状大左派队伍，争取、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建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

四、军管会在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对部（委）的各项工作实行统一领导。部属单位无论是否实行军管的，均受部军管会的领导；分散在各地的单位，同时受所在地革命委员会或军区的领导，但有关生产运输调度业务，必须服从部军管会的集中指挥。

五、军管会下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的两个班子，把革命放在首位，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革命统帅生产，建立革命的新秩序，掀起生产的新高潮，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六、实行军事管制后，对外活动如需要以行政首长名义签署或接洽的，仍按过去规定办理。行政首长已经撤职或停职的，应由上级指定适当人选以代理人名义出面。

七、军管会的工作人员应当成为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模范；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向群众学习，先当学生、后当先生；加强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努力做好群众工作，充分发扬民主，进行四"大"；工作中走群众路线，遇事同群众商量，反对包办代替、强迫命令。

八、实行军事管制以后，各革命群众组织和全体职工、干部应当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破"私"字，大立"公"字，促进思想革命化，坚守岗位，努力工作，向一切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各革命群众组织和全体职工、干部应当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自觉地服从军管会的领导，如对某些问题有不同意见，可以随时提出批评、建议或向上级反映，但在军管会或上级未作出新的决定以前，仍应坚决执行。

本决定应向××部（委）及所属单位全体职工和干部传达，并可在内部张贴。

军委发电：

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已经看过，经过中央文革军委党委、军委文革小组讨论通过。

中 央 军 委、军委文革小组
关于目前军队院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处于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革命的大批判的高潮中，军队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一片大好形势，为了胜利地完成一批二斗三改的历史任务，根据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中共中央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精神，结合军队院校的具体情况，特作

如下指示:

1、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当前必须更高地举起革命的批判旗帜，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按各单位不同的情况，逐步的转入本单位的斗批改，把本单位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倒斗臭，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深批透，改革教学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军队院校的党员、干部、教职员工都不要外出串连，已经外出串连的，要迅速返回本单位，进行斗批改。

2、为了完成斗批改的艰巨任务，必须建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凡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已占优势，并且实行了革命的大联合的，应该尽快地建立有革命学生、革命教职员工、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行使在本院的领导权力，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没有占优势的，应该通过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批判和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壮大左派力量，积极创造条件，实行革命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有些院校党的领导，行政领导基本上还好，不需要夺权的，也应根据三结合的原则，充实和加强领导班子。

3、院校干部大部分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和钻进干部中的阶级异已分子只是少数，犯有错误的干部、包括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在党和群众的教育下，大多是可以改过来的。

无产阶级革命派应当帮助革命的领导干部站出来，对犯错误的干部应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给他们检讨亮相的机会，鼓励他们放下包袱，站出来工作，将功补过，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犯有错误的干部必须认真检讨错误、确实改正错误，以取得群众的信任。

4、中级指挥、技术、医务学校，根据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应逐步做到一边闹革命一边上课，上课要和文化大革命紧密结合，主要是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党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并以一定工作时间学习一些专业课程。

5、在运动中必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边战斗边整风，要引导革命群众组织自觉地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打倒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念、主观主义、个人主义，认真提倡文斗，反对武斗，不断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

6、各总部、各军种、各兵种，应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加强对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要政治挂帅，到群众中去，加强调查研究，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旗帜鲜明，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左派组织之间的分歧，应该帮助他们通过整风，实行革命的大联合，不能片面地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对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领导上和左派组织都要耐心地作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欢迎他们尽快地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路线上来，要注意抓典型单位，及时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帮助院校搞好斗、批、改。

这个指示的基本精神也适用于军队的文艺体育团体，除第二、四条外，也适用于军队的科研设计单位。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关于成立地专级、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正式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限的规定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关于成立地专级、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正式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限，暂规定如下。

一、关于尚未建立省、市革命委员会的地区的规定：

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地专级由省军区或军审查，报大军区批准；县级由省军区或军批准。

成立正式革命委员会，地专级由军区审查，极中央批准；县级由省军区或军审查批准，报大军区备案。

二、关于已建立省、市革命委员会的地区的规定：

成立地专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省革命委员会审查、批准，报中央备案；成立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省革命委员会批准。

成立地专级正式革命委员会，由省革命委员会审查，报中央批准；成立县级正式革命委员会，由省革命委员会审查批准，报中央备案。

大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节录）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解放军报》社论

毛主席的好战士吕祥璧，为保卫红卫兵的安全，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亿万青年，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阶级斗争的大风浪中，迅速成长为共产主义一代新人。吕祥璧同志就是这一代新人的突出代表之一。

林彪同志说：“我们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经济上的制度，政治上的制度，就必须提倡为公的观念，就是要塑造新的人来建设新的社会，塑造共产主义精神的人。”“这种人是毛主席所说的全心全意

为人民的，完全彻底为人民的人”。因此，林彪同志号召："我们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权威，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一句话，就是要大立毛泽东思想。"

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灭资兴无，破私立公，在头脑里树立起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正是吕祥璧同志所以能够在入伍后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迅速地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最根本的原因。他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的崇高的思想和言行，为我们作出了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榜样。

在头脑里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就要树立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权威，就要树立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全心全意、完全彻底为人民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权威。这是决定着我们每个人是革命还是不革命的头等大事；是决定着我们国家变不变颜色的头等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头等大事。正象吕祥璧同志所说："有了毛主席，才有我吕祥璧；有了毛主席，才有新中国；有了毛主席，才能有红彤彤的新世界。我们每个革命同志，都要象吕祥璧那样，在自己的头脑里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坚决维护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的命令

（一九六七年六月一日）

铁路、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各部门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部门。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铁道、交通系统广大革命职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在狠狠地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同时，胜利地完成了客、货运输任务，保证了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巨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巨大胜利。但是，最近一个时期，某些地区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或极少数坏人的挑动下，出现了一些破坏铁路、交通运输秩序的严重现象。这种现象很不利于铁路、交通部门的革命和生产，必须坚决克服。因此，特命令如下：

（一）铁路、交通运输部门的广大革命职工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坚守生产岗位，努力做好工作，严格遵守劳动纪律，切实保证交通运输的畅通，完成和超额完成运输计划，向一切消极怠工、影响运输秩序甚至中断交通运输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

（二）严禁破坏铁路、交通设施和国家财产，任何人都不准以任何借口无票强行乘坐车船，不准扒乘货车和拦截列车、汽车、轮船，不准妨碍铁路、交通部门工作人员的正常工作，不准武斗，不准以卧轨等手段限制车辆通行。今后凡采用扒车、截车及其他不正当手段来京上访的人员，中央概不接见。

（三）煽动武斗、破坏铁路、交通运输秩序和砸毁铁路、交通设施、运输工具的少数坏人以及情节严重的肇事者，必须受到无产阶级国家法律的制裁。各地革命委员会、军事管制委员会和驻铁

路、交通部门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军代表、公安值勤人员有权根据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公安六条规定负责处理上述问题，有关方面必须听从，不得拒绝执行。

本命令自即日起生效，并可在城乡和各车站、码头广泛张贴。

中国的大革命和苏联的大悲剧

(一九六七年六月四日)

《人民日报》观察家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触痛了苏修叛徒集团的中枢神经，震撼了他们的支离歪斜的"宝座"。

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以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为首的苏修集团，几乎没有一天不对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恶毒的诬蔑、攻击和咒骂。他们发出一连串的胡言乱语，说什么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大悲剧"。

这种现象，难道是奇怪的吗？不，一点也不奇怪。古往今来，凡是真正伟大的革命，都为革命人民看作是欢乐的节日，而被反动势力看作是大悲剧。

当一八七一年伟大的巴黎公社诞生时，马克思称之为无产阶级"最盛大的节日"。而欧洲的君主和资产阶级统治者，则惊呼为"可怕的灾难"。

当一九一七年"阿芙乐尔"巡洋舰一声炮响，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高奏凯歌的时候，全世界无产者和革命人民是感到多么振奋和鼓舞呵！而帝国主义和第二国际的叛徒们却咬牙切齿，胡说什么这是俄国革命的"最后一幕"，是布尔什维克的"专横"和"冒险行动"。

当一九四九年伟大的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时，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又是何等欣喜若狂呵！但美帝国主义却丧魂落魄地叫喊："中国的局面"是"不幸的"、"悲惨的"，是"最不愉快的时期"！

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比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和中国过去历次的革命都更深刻、规模更大的革命运动。这样的一场大革命，激起了苏修叛徒集团和世界上一切反动势力的咆哮、咒骂，岂不是完全合乎规律的现象吗？

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曾经指出，究竟是什么人咒骂俄国劳动阶级第一次创立的苏维埃呢？是"所有的资产阶级恶棍，所有的喝血的匪帮，以及他们的讴歌者考茨基"。

今天的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之流，正是列宁所愤怒地痛斥过的叛徒考茨基的徒子徒孙。他们疯狂地咒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大悲剧"，恰恰是他们的反革命面目的大暴露。

在当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确实出现了一个大悲剧。这个大悲剧不是发生在中国，正是发生在苏联。这个大悲剧的制造者不是别人，正是以赫鲁晓夫及其继承者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之流为代表的大叛徒、大工贼集团。

今天，在列宁主义的故乡，伟大列宁的旗帜被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所糟蹋，所砍倒，修正主义在那里占了统治地位。

今天，在列宁亲手缔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复辟了，社会主义江山改变了颜色。

今天，曾经在列宁的教导下和斯大林的领导下建立了丰功伟绩的苏联人民，又重新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他们在长时期的斗争中以无数鲜血浇灌而获得的革命果实被剥夺了。

今天，曾经被全世界人民看作是世界革命根据地，为亿万革命人民所向往的苏联，那里的统治集团已经成为美帝国主义的头号帮凶，成为世界反动势力的又一个大本营。克里姆林宫上的红星熄灭了它的光辉。

这是一幅多么令人触目惊心的图画啊！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历史大倒退啊！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几乎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权，是被国际资产阶级从外部进行武装进攻打垮的。但是，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现在，日暮途穷的帝国主义，在对社会主义国家从外部进行战争恫吓的同时，而主要利用赫鲁晓夫集团从内部进行颠覆，它们不费一兵一卒，一枪一弹，就在苏联实行了"和平演变"。这难道不是一个极大的历史教训吗？

苏联发生的历史大倒退，使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一个极端重大的新课题，这就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怎样才能保住这个政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怎样才能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个大问题，是所有前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或者没有遇到过，或者没有来得及解决，或者没有能够解决的。

正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天才的领袖毛主席，正是毛主席所亲自领导的史无前例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通过亿万人民的惊天动地的革命实践回答了这个问题。

苏联的悲剧之所以发生，最根本的一个教训，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权被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所篡夺。赫鲁晓夫这个混进党内的蓄谋已久的大野心家及其一伙，在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逝世之后，觉得时机已到，就发动宫廷政变，盗窃了苏联的党权、军权和政权。从此，苏联的政权就改变了性质，资产阶级专政代替了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通过它的代理人实现了反革命复辟。

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吸取了苏联的这个严重的历史教训。

这场大革命，极其深刻地教育和锻炼了中国人民，同时也极其深刻地教育和影响着全世界的革命人民。在中国，在全世界，千千万万的革命群众，通过对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亲身感受和观察，经过比较和分析，正在进一步地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而革命理论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就会迸发出无穷无尽的改造世界的伟大物质力量。

经过这场大革命，一切革命的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懂得，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代，社会上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因此，也就长期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经过这场大革命，一切革命的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懂得，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仍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要巩固自己的政权，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的政权。无产阶级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一个生死的斗争。如果我们丧失警惕，国家政权就会被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所篡夺，无产阶级的政权就会得而复失。

经过这次文化大革命，一切革命的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懂得，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主要来自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来自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产阶级同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里的主要矛盾。这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集中表现。党内一小撮走资

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

经过这次文化大革命，一切革命的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懂得，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同资产阶级进行的阶级斗争，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毛主席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因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如果无产阶级不在思想和文化革命中彻底战胜资产阶级，那么资产阶级就会首先从思想和文化这个阵地向无产阶级进攻，无产阶级政权就仍然可以被资产阶级夺去，劳动人民斗争得来的一切仍然可以毁于一旦。

经过这场文化大革命，一切革命的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懂得，无产阶级大民主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最好形式。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自下而上地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把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揪出来，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批倒斗倒，从他们手里夺权，保证无产阶级政权牢牢地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

毛主席教导我们：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总之，经过这场大革命，一切革命的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懂得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斗争的规律，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规律。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刻地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吸取了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教训，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成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发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列宁和斯大林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矛盾，解决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问题，解决了在一个国家内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毛主席又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了当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问题，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学说的一个极大的飞跃，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即毛泽东思想的阶段。

这样，根据毛主席发现的科学理论所发动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防止了苏联的悲剧在中国的重演，粉碎了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梦想，而且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纪元，开辟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新时代。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于全世界的无产者和革命人民来说，是莫大的喜事，是伟大的希望，是极大的鼓舞，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一曲最激动人心的响彻云霄的凯歌。但是，对于帝国主义和苏修叛徒集团来说，却千真万确地是大痛苦、大灾难、大悲哀。因为，他们的丧钟敲响了，他们的末日临近了，他们的"宝座"快要倒塌了！

在人类历史上，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总要经过曲折和反复。资产阶级革命，是用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尚且如此；无产阶级革命，是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更不可能设想不经过曲折和反复。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苏修领导集团这一伙大叛徒在苏联制造的历史大倒退，也不过是历史上的一个插曲。它是一件大坏事，但是毛主席总结了正面的和反面的历史经验，找到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这样，这件大坏事也就变为一件大好事了。

我们正处在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有了伟

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就一定会把整个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把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这些妖魔鬼怪统统赶出历史舞台。

(原载 1967 年 6 月 4 日《人民日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通　　令

(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

为了维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秩序，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保护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保护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正常进行，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防止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混水摸鱼、乘机捣乱，特发出以下通令：

一、除国家专政机关奉命依法执行必要的逮捕拘留任务外，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抓人，都不准私设公堂和变相地私设公堂。

二、各级党政军机关的档案文件和印章，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抢夺、窃取和破坏。

三、社会主义的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绝对不可侵犯，革命群众都有保护的责任，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侵占，不准砸抢，不准用任何借口进行破坏。

四、严禁武斗，严禁行凶打人，严禁在本单位和到外单位打群架，严禁抢夺个人所有的财物。

五、除国家专政机关奉命依法执行任务外，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对任何团体和个人，进行搜查和抄家。

六、由各地卫戍部队和驻军负责保证上述各条的执行。自即日起，对于违犯上述各条的，都应该严加处理。

对于肇事者和背后挑动者，对于打死和打伤人的凶手，卫戍部队和当地驻军，有权逮捕和拘留，依法惩处。

对于破坏、侵占和抢夺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和个人财物的，都必须追回或按价赔偿。

对于违犯上述各条的团体，分别情节轻重，在一定的范围内通报批判。

七、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成为执行本通令的模范，并协助卫戍部队和驻军进行政治思想工作。

这个通令可在城乡广泛张贴，并在群众中广泛宣读。

林彪观看驻京三军联合演出

(一九六七年六月九日)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以及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谢富治、江青、杨成武、粟裕、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汪东兴、王新亭、邱会作、叶群等同志，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人民解放军驻京陆海空三军革命文艺战士的联合演出。

驻京陆海空三军革命文艺战士今晚演出的节目有大型歌舞《欢庆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舞蹈《毛主席来到我们军舰上》、《向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猛烈开火》，以及男女声独唱等许多丰富多采的节目。这些节目闪耀着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

今晚陪同观看演出的，有驻京陆海空三军负责人萧劲光、吴法宪、余立金、李作鹏、郑维山、李天焕、王宏坤、陈先瑞、张秀川等同志。

参加今晚演出的驻京陆海空三军文体单位的革命造反派群众战斗组织有：海政文工团、军乐队红色造反舰队，空政文工团革命委员会，北京部队战友文工团革命委员会临时筹委会，北京部队空军文工团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第二炮兵星火文工团革命委员会临时筹委会，北京部队军乐队革命委员会临时筹委会，"八一"体工红旗队革命造反队，空军体工队革命造反队，北京部队体工队革命委员会临时筹委会。

演出结束以后，林彪副主席和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等同志走上舞台，和革命文艺战士亲切握手，祝贺他们成功的演出，并和革命文艺战士们一起合影。革命文艺战士个个无比兴奋和激动，高举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长时间地纵情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新华社 1967 年 6 月 9 日讯，载 6 月 10 日《人民日报》)

中央直属文艺系统联合斗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 (节录)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日)

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奏凯歌，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

群众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起总攻击的关键时刻，中央直属文艺系统的数百个革命群众组织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斗号召，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导下，通过革命的大批判，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旗帜下，联合起来了!

中央直属文艺团体、文艺院校、电影、图书、博物、文物系统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一万四千多名文艺战士，今天满怀革命豪情，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齐集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了他们大联合后的第一次战斗的大检阅——联合斗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出席了今天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批判的盛会，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和江青同志对大会表示热烈祝贺。他说："文艺界的革命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端。你们今天的大会，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模范。你们应该继续成为大联合大批判的模范。"陈伯达同志祝革命文艺工作者大联合、大批判及各项工作取得胜利，并向全体文艺战士发出号召："不断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管理自己。"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同志，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文艺组成员金敬迈、李英儒、舒世俊、陆公达、刘巨成，也出席了今天的大会。

中央直属文艺系统各革命群众组织的大联合，标志着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大斗争，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首都文艺战士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战时刻联合起来，抓住主要矛盾，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一革命壮举，必将极大地促进整个文艺界以至于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大批判，推动当前的大批判运动更深入的发展。

(新华社 1967 年 6 月 10 日讯，载 6 月 11 日《人民日报》)

林彪给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信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六日)

近一个多月来，我看了三次演出，每次演出中，都有"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这两个口号并提的情况。我认为"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个口号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必要的。为了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突出毛主席的伟大作用，树立毛主席的绝对威信，不宜提"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只有突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才符合于全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需要和客观实际。今后一切演出、一切会议、一切文件、一切报刊以及其他各种宣传形式都应突出毛主席，不要把我和毛主席并提。盼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今后帮助注意掌握这一点，并希望将我这封信转发到县团级，由他们传达到所有的基层组织和革命群众组织。

《红旗》杂志转载《念念不忘斗争大方向》的编者按语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

《文汇报》连续发表了三篇论无产阶级革命派怎样掌好权用好权的社论。这三篇社论写得很好，问题提得及时、尖锐，道理讲得正确，也很有"杀劲"。本刊特转载其中的一篇，供读者学习。

现在，摆在各级革命委员会（包括基层的革命委员会，例如大专院校的革命委员会、工厂的革命委员会）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为无产阶级掌好权用好权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坚决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南，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正确地认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断地积累经验，总结经验，使革命委员会永远保持鲜红的颜色。

就当前情况来说，关键性的问题是为无产阶级掌权还是为个人、为小团体争权、掌权。这是在人民内部反映出来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只要是全心全意地为无产阶级掌权，就能从经验不多到经验较多，就能从事情办得不太好到办得很好，就能学会不熟悉的东西，就能在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如果是为个人争权，为小团体掌权，那就会被鬼迷了心窍，毛主席的话、党中央的话听不进去，而一意孤行，忘记阶级敌人，而把炮口对准自己的阶级弟兄。这样下去，就会犯方向路线的错误。各级革命委员会对自己的成员中有私心杂念的同志，必须认真地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帮助他们切实地迅速地改正错误。

《文汇报》指出："我们绝对不允许为个人争权。这个罪恶的念头一分也不能有。如果'权'字与"私"字攀上了亲家，一门心思想着'我'这一小团体的'权'，或者'我'的'权'，这就等于眼睛蒙上了黑布，什么也看不见，就要栽跟斗。'私'字迷了心窍的人，往往在碰到不同意见时，就轻易地给对方扣上'老保'、'逆流'、'复辟'等大帽子，并且不分青红皂白地提出要再夺权，发展下去，甚至会去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权，会把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这说得何等深刻，何等好呵！无论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地方，还是正在筹备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都要高度警惕，不要被"私"字这个鬼缠住。这一点，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过程中和夺权以后，对人们的新的严峻考验。

(原载《红旗》杂志 1967 年第 10 期)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对国防工业部、国防科学技术研究院及所属单位实行军事管制的补充决定（试行草案）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对××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完全适用于国防工业部、国防科学技术研究院及所属厂矿企业、科研、设计单位和基建单位的军事管制工作。上述单位是国家重点保密单位，为了确保国家机密，特作如下的补充决定。

一、不是国防工业部、国防科学技术研究院及所属单位和厂矿的革命群众，一律不得前去串连。

二、国防工业部（院）及所属单位和厂矿的革命群众，可以在业余时间，只能在本地区、本部（院）范围内串连，但不得涉及国家机密。特定的机密要害部门和单位，外部门、外单位的革命群众，均不得前去串连。

三、国防工业部门及其所属全体人员，必须提高警惕，加强保卫、保密工作，防止失密、泄密。

中共中央通知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四日）

浙江、江西、广西、湖南、河南、鞍钢、鞍山市来京会谈的代表团同志们并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军事管制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部委：

为了保证各地代表团在京会谈的顺利进行，有利于中央对各地问题的解决，中央要求各地代表团中有争论意见的双方，能够达成协议，保证以下六条能在各地实现：

一、不上街游行。

二、互不打架，互不冲击。

三、不抓人，不扣人。

四、不阻碍铁路、公路、轮船运输。

五、不动员农民进城、拦路、拦车。

六、不夺枪、不开枪。

达成协议后，双方应立即用电话通知回去，保证切实执行。

《解放军报》发表《正确对待两种不同性质的当权派》的编者按语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四日）

昨天本报发表了海军直属机关红联总《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今天又发表了空军司令部红尖兵《正确对待两种不同性质的当权派》。这两篇文章都提出了怎样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待两种性质的当权派，两种性质的“革”，两种性质的“保”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大家认真研究。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决战的关键时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尖锐对立，阵营分明。你不是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就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对待两种当权派的态度也是这样。你对待无产阶级当权派，是反对还是拥护，是革还是保；对资产阶级当权派，是拥护还是反对，是保还是革。这是摆在每个人的面前，必须认真抉择的问题。

你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对待无产阶级当权派，你就必然坚决拥护，坚决保，统统保。对他们的缺点、错误的批评，也必然是同志式的。对待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对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就必然坚决革，有的要打倒，有的半打倒。

你是资产阶级保皇派，你就必然保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保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然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必然拚命地反对无产阶级当权派。

你是无政府主义者，你就必然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不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还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不分无产阶级当权派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问青红皂白，一概打倒。这些人自以为是最彻底的“革命派”，其实，他们把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当权派，就削弱以至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保护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根本违背毛泽东思想的。

如何对待两种当权派、两种革两种保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个立场问题，是屁股坐在那一边的问题。是坐在无产阶级一边，还是坐在资产阶级一边。

我们必须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一切、分析一切。

《人民日报》转载《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的编者按语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划清无产阶级革命性和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的界限，抵制和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这是当前摆在无产阶级革命派面前的重大课题。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地盘缩小了。但是，我们应当充分重视小资产阶级摇摆性所起的严重的腐蚀和破坏作用。

正如列宁所指出："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

列宁指出的这种情况，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必须高度警惕。

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当他们在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抑的时候，也会起来反抗，进行斗争。他们希望革命马上胜利，以求改变自己所处的地位。他们可以参加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有利于革命的积极作用。但是，他们在政治倾向上，又往往表现出左右摇摆，好走极端，华而不实，投机取巧的弱点。他们热中于极"左"的词句和口号，在思想和行动上表现出极端的狂热性和自发的盲目性。而在遭受某些挫折和困难的情况下，又会悲观失望，表现出政治上的右倾和动摇。特别是在掌权以后，他们的地位有了改变，如果忽视了自己的世界观的改造，就会停顿下来，不再前进，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甚至有可能发展到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立，而被阶级敌人所利用。

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革命群众斗争，是一座伟大的共产主义熔炉。革命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是完全可以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在向阶级敌人作斗争的过程中，在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的过程中，不断地得到克服的。每个革命同志，都要在大革命的海洋中学习游泳，努力增强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定性，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坚强可靠的接班人。

《文汇报》六月二十一日发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的社论，及时地提出了这样一个带普遍意义的重大问题，值得大家好好学习。

中共中央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以来，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揭露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长期包庇的叛徒集团，挖出了一批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分子，对于纯洁党的组织，对于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为了更好地进行这项工作，中央特作如下规定：

（一）对一个人作出是否“叛徒”的结论，是一件严肃的政治问题，是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问题，必须经过周密的调查，采取慎重的态度。不要根据不充分的、未经核实的材料，自行宣布某人为叛徒。不要轻易公布材料。

（二）应当把重点放在清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的叛徒。其他历史上有过变节行为的也要清查，但要根据其情节轻重，是否向党交代清楚，是否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起干坏事，以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区别对待。

（三）要把有一般历史问题的干部同叛徒、特务，严格区别开来。

（四）各群众组织不要借“抓叛徒”的名义，进行宗派斗争，互相攻击，转移斗争大方向。

（五）有些群众组织，混入个别的叛徒、特务，应当清查，但别的群众组织，不得借此来打击这些群众组织。

世界人民的大喜事

——热烈欢呼《毛主席语录》在全世界广泛发行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日）

新华社短评

《毛主席语录》在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发行，受到了亿万革命人民最热烈的欢迎和颂扬。这是世界人民的大喜事，是史无前例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

《毛主席语录》在全世界广泛发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毛泽东思想是人民革命的历史火车头。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为世界革命人民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对世界革命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毛主席语录》在全世界广泛发行，给世界革命人民带来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促进世界革命人民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的深入发展。世界人民最爱读毛主席的书，因为它是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

动派的最锐利的武器。

《毛主席语录》在全世界广泛发行，给世界革命人民带来了进行革命斗争的指针。世界革命人民把《毛主席语录》称为“红色宝书”。读了这红书，心里明，眼中亮，认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读了这宝书，方向明，信心足，学会怎样革命，怎样斗争。世界革命人民喜得这红书，就象久旱逢甘霖，雾航见灯塔。他们决心在斗争中、生活中、学习中和工作中活学活用，并且为本民族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作出贡献。

《毛主席语录》在全世界广泛发行，大长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帝、修、反的威风。《毛主席语录》象炽烈的火种，正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心中点燃起反抗的怒火。世界革命人民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就刀山敢上，火海敢闯，敢于打碎奴隶的枷锁，敢于砸烂万恶的旧世界，争做新时代的主人；而一切牛鬼蛇神见了毛泽东思想，就象蝙蝠见了阳光，失魂落魄，胆战心惊。

《毛主席语录》在全世界广泛发行，将使毛泽东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从而唤起世界广大劳动群众，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旧世界发动声势凌厉的总攻击，争取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彻底胜利!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必将插遍全球!

(原载 1967 年 7 月 2 日《人民日报》)

中共中央关于
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

最近一个时期，江西、四川、浙江、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宁夏、山西等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特别是某些省市地县公社的地方武装部门少数思想没有改造好的同志，挑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围攻厂矿、机关、学校的革命群众组织，有的地区还提出什么“以农村包围城市”等的反动口号，组织他们进城镇压革命造反派。中央认为，这种作法是十分错误的，广大革命群众应该识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这一阴谋，同他们进行斗争。

为了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现在规定:

一、任何人和任何组织都一律不准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进城武斗，更不能为了武斗，发动农民制造凶器，发给枪枝弹药。

二、不准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在铁路、公路、水路沿线设置关卡，拦阻车船，破坏交通运输。

三、已经进城参加武斗和破坏交通运输的社员立即返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所发的武器一律收回。

四、对参加武斗的社员所作的各种所谓“优待”，例如工分补贴等等，一律无效，不准实行，因进城参加武斗而造成的伤亡事故、生产损失、误工补贴，一概由挑动者负责。

五、从“通知”下达之日起，犯有上述错误的人应立即改正错误，立功补过，如坚持错误不改，

一再违犯上述各条的人，要严肃处理，其首恶应依法惩办。

这个"通知"应该在生产队向农民群众宣传。

林彪、恩来及文革小组各同志：

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请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讨论一次，发出指示，加以制止。

毛 泽 东

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

中共中央关于建造毛主席塑象问题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

现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转发你们，希望你们认真执行。应当向群众进行耐心的解释：广大革命群众强烈要求建造毛主席塑象，确实是出于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但是，建造毛主席的塑象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每一座塑象都应当保证政治上、艺术上的高质量，傅之千秋万代。这只能由中央统一规划，在适当时机、适当地点建造，才可能做好。现在某些群众组织那种匆匆忙忙的做法，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而且会造成政治上的损失。毛主席七月五日指示："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希望你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加以制止。

此外，各地编印了一些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材料，甚至将别人的讲话、诗词也编进去了。中央重申：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文章、文件、诗词，未经毛主席和中央批准，一律不得编印，不得出版发行。出现这种事情，也请你们加以制止。

江青在接见河南代表时关于"文攻武卫"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应该是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刚才有一位同学讲到，要做群众工作，制止武斗这是很好的，要大力宣传。因为搞武斗的人总是一小撮，如果广大的人民知道了他们的阴谋诡计，揭穿了他们，他们就会象过街的耗子人人喊打。要向群众做深人的宣传工作，这样我们才能胜利。

另外，也不能太天真烂漫了，就是当挑起武斗的这一小撮人在达成协议以后他们的武器还没收回的话，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我记得好象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

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我们坚持毛主席提出的文斗，坚决反对武斗，做深人的群众工作这是一方面。我向同志们建议要做深入艰苦的群众工作、因为广大的群众识破他们还要做一些工作。但是，第二条，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长矛、拿着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这是要吃亏的，革命小将要吃亏的。现在武汉就有这个情况。当然，武汉的革命小将也在采取自卫。同志们，当“百万雄师”以及它的幕后操纵者一小撮拿着那样的武器对手无寸铁的群众行凶，甚至绑架我们的谢富治同志、王力同志，能允许吗？

河南的情况现在在解决，已经达成协议，谁撕毁协议谁就是蒋介石。蒋介石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十日跟我们订了协议，他马上就撕毁了。这样的人我们要揭穿他，河南也不例外。革命小将、革命干部、革命工人同样遭到这样的武斗、围攻。

我今天想看看你们就把这个道理讲一下、第一条，我们有理，真理在我们这边，就是说，毛泽东思想在革命小将、革命干部、革命工人、革命农民这边，不在他们一小撮一边，他们必败！但是，如果他们挑起武斗，不肯放下武器，你们不要天真烂漫，放下武器，我支持这一点。

中共中央关于纪念“八一”建军节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今年八月一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的第四十周年。中央决定，今年建军节，要结合当前国际阶级斗争形势，结合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结合目前开展的对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大张旗鼓地深入地宣传毛主席的伟大军事思想。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最完整、最彻底、最系统、最伟大的军事理论，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学说的最高峰。它是全世界革命人民争取被压迫民族解放和被压迫阶级解放、粉碎一切反动势力的强大武器。正确地宣传毛主席的伟大军事理论，在国外，必将有力地鼓舞和支持亚非拉地区，特别是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等东南亚人民的武装斗争；在国内，也必将进一步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推动当前的拥军爱民活动，更加密切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的关系，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宣传要点：

(一) 宣传毛主席划时代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学说。宣传毛主席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的光辉思想，宣传毛主席人民战争的理论，人民军队的军事思想、军事路线，宣传毛主席的武装斗争，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从而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的道路。

(二) 正确宣传“八一”南昌起义的意义、这次起义是在国民党完全叛变革命之后，是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战胜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条件下，在毛泽东思想引导下，在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理论基础上，打响了秋收起义的第一枪。要大力宣传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宣传人民解放军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在同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中，在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中，锻炼成长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型人民军队。

(三) 宣传林彪副主席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彻底、最模范地贯彻执行毛

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创造性地运用毛主席的战略战术，领导人民解放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发扬三大民主，创造四好连队，把部队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等方面取得的光辉成就和丰富经验。

（四）宣传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坚决响应毛主席关于积极支持左派和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在"三支""两军"中坚决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同无产阶级革命派并肩战斗，为人民立新功。

（五）彻底批判反党分子彭德怀、罗瑞卿的反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揭露他们同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相勾结，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支持和策划下进行篡党、篡军的罪恶活动，把目前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批判运动推向一个更深入的阶段。

（六）宣传人民解放军应百倍警惕，保卫祖国，加强战备，随时准备歼灭侵犯我国的敌人，解放台湾，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

（七）宣传亚非拉地区人民，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正进行着波澜壮阔的武装斗争。几项主要措施：

（一）各报刊隆重发表毛主席关于人民战争的语录。重新发表林彪副主席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二）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

（三）《红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中央报刊发表社论，刊登纪念文章。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对外宣传单位加强对国外的宣传。

（四）部队和地方的文化艺术单位，要适当开展一些纪念活动。

（五）宣传时间，从八月一日起延续到九月初。宣传规模，要比纪念"八一"建军节三十周年大一些。

中共中央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①]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七月二十四日二十时十分来电并所附武汉部队公告全文已经收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人员和百万雄师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四）要向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五）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破坏社会秩序。

---

①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湖北省委、省革委会、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的请示报告》，正式为武汉"七二〇事件"平反。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公告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一、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七月二十日，在武汉市发生了冲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派来武汉处理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谢富治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红旗》杂志第一副总编辑王力同志的住地的严重政治事件。谢富治副总理遭到推打、围攻，王力同志以及工作人员张根成同志和北航红旗的革命小将遭到绑架和殴打。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的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此后，还发生了围攻、殴打、绑架《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记者以及围攻新湖大、九一三等革命造反派的严重政治事件。上述事件，是在部队内和"百万雄师"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进行的。而王任重和陈再道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参加这些事件的干部、战士和群众是受蒙蔽的。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理。一切受蒙蔽的干部、战士和群众，一定要迅速猛省，坚决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二、我们军区领导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尤其是陈再道对上抵制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领导，对下压制打击群众意见。长期地、顽固地坚持错误，以致发展到造成反毛主席、反党中央、反中央军委、反中央文革的"七·二O"叛变事件。陈再道罪责难逃，我们坚决同陈再道划清界限，坚决把他打倒。对我们所犯的错误，我们将迅速作公开检讨，并坚决、彻底改正。迅速地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做好"三支"、"两军"工作。过去受我们所犯方向、路线错误影响的群众和干部，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责任由我们来负。你们应当迅速地觉悟过来，向我们的错误作斗争，坚决地向革命造反派学习，向革命造反派靠拢。

三、立即为"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平反；向曾被拘押的革命闯将朱洪霞等革命造反派的同志承认错误，赔礼道歉，为他们恢复名誉。坚决支持"工人总部"的革命行动，积极帮助其恢复、发展和壮大队伍。

四、坚决支持"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三司革联"、"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等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坚决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我们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的广大指战员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信仰、无限热爱、无限崇拜、无限忠诚。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谁反对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谁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我们就坚决打倒谁，不管他资格多老，职位多高，我们一定和他拼到底。我们是作好了一切准备的。任何反扑都必将为我们无限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工、农、兵革命群众所彻底粉碎！

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打倒王任重！打倒陈再道！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光焰无际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武汉市英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的工农兵，一切忠于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忠于我们伟大的党的事业的指战员们！

近几日来，你们为着保卫毛主席亲自领导、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出非常巨大的业绩。

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

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那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

我们毛主席、党中央为解决武汉问题派出的代表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同志，他们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他们已经胜利地回到北京了。

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够遵循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指导的轨道上前进。

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出现着一个新的胜利的阶段。

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凯歌正在鼓舞着全国。

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涨开始了。

当然，你们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困难。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妄图垂死挣扎，还妄图镇压。因此，你们不能粗心大意，要千百倍地保持高度的警惕。

你们要善于团结一切群众。

你们要善于启发、教育一切受蒙蔽的人。

过去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或群众组织，只要他们一旦觉悟，愿意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都要欢迎他们，并肩战斗。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他们解散"工总"这个革命组织，并且把它打成"反革命"；他们逮捕很多革命组织的群众，也把他们打成"反革命"。这些都是绝对不容许的，应当坚决平反，一律释放。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他们利用"百万雄师"的一些受蒙蔽的群众，用造谣欺骗的手段，颠倒黑白，把他们引入迷路。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

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成的严重政治事件，激起了武汉市的广大革命群众和驻军广大指战员的无比愤慨，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严正谴责，遭到了全国陆海空三军的强大反对。他们已经陷入亿万军民愤怒声讨的汪洋大海之中。

对于策划这一严重政治事件的一小撮坏人和打人凶手，必须立即追查，依法严办。

武汉市的一系列革命组织，工总、二司、九一三、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等革命群众组织，坚决保卫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保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你们做得很对，做得很好！武汉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绝对不是孤立的，胜利一定属于你们，属于广大的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属于我们的伟大的党，属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属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党中央号召：一切受蒙蔽的群众，应该迅速觉悟，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同革命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彻底揭露"百万雄师""公检法"中一小撮坏头头和武汉军区内个别坏人的阴谋活动。

党中央号召：犯错误的人们觉醒过来，只要他们能够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谅解，这种人还是好的。

党中央号召：武汉地区的农民群众，千万不要上坏人的当，不要进城来干涉工人和学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党中央号召：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支持和保卫左派广大群众，同他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武汉事件，对全国革命群众，是一次最生动的阶级斗争的教育，是最深刻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条路线的教育，它必将广泛地动员全国人民的革命积极性，把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

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

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

紧 急 通 告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正当无产阶级夺权和资产阶级反夺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决战的关键时刻，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武汉的代理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百万雄师"和"公检法"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对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猖狂反扑。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了彻底粉碎混进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罪恶阴谋，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赤胆忠心，和党内军内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終于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亲切关怀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全力支持下，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打败了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狂妄的进攻。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于七月二十七日发出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这是对我们武汉地区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特别是对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巨大支持和亲切关怀，是对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一个沉重打击。这封信，是对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是我们武汉地区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行动指南。我们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于这些指示最热烈的拥护，一定要认真学习、大力宣传，坚决执行。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为了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的指示，为了掀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掀起狠抓革命、猛促生产的新高潮，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更加伟大的新胜利，特发出紧急通告如下：

一、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立即掀起一个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的代理人和“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的大批判、大斗争的高潮，把他们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斗倒、斗垮、斗臭。

二、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积极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把革命和生产两副重担勇敢地挑起来，作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作**“节约闹革命”**的模范。

三、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最爱解放军，我们要积极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作拥军爱民的模范，要和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一起，共同担负起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担，一定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四、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牢记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伟大教导。要有胆略、有气魄解放受蒙蔽的群众。受蒙蔽的一般群众，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对他们决不能采取讽刺漫骂、打击报复的态度，更不能抓人，要以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武器，对他们进行耐心、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争取、教育、团结他们，热情地欢迎他们起来造反，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在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基础上，逐步达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把仇恨和斗争矛头狠狠集中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的代理人和“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

五、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从来都是把“百万雄师”中受蒙蔽的群众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严格区别开来的。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我们热情地欢迎“百万雄师”中受蒙蔽的群众迅速猛醒，起来造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的反，尽快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和革命造反派工人一起抓革命促生产。

六、对于那些犯有严重罪行的“百万雄师”中的坏头头，只要他们不再为武汉地区党内、

军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卖力，改邪归正，我们同样给予出路。如果继续与人民为敌，破坏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将给予严厉的打击，并积极协助有关部门依法惩处。

（新华社武汉1967年8月1日讯，载8月2日《人民日报》）

〔附〕武汉“七·二O事件”始末

陈再道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一场震惊中外的事件在武汉地区爆发了。事件发生后，林彪、江青一伙把这次事件诬蔑为“有计划、有纲领、有组织的反革命暴乱”；把我和钟汉华等同志打成“策划‘七·二O事件’的罪魁祸首”，武汉军民遭到了残酷的镇压。

当时，外电纷纷报道：“武汉发生了反毛叛乱”，“陈再道上将曾有效地控制了武汉”。时隔数年之后，我已经出来工作了，一些国外出版的刊物，仍把“七·二O事件”说成是“陈再道扣留了谢富治和王力，发动了一次反对中央文革的‘兵谏’。”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党中央推倒了林彪、江青一伙强加于武汉军民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沉冤十一年之久的“七·二O事件”得到了彻底平反，被颠倒的历史终于重新颠倒过来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作为这次事件的当事人，感到有责任把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人民，有必要详细说一说“七·二O事件”的真相。

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八月间，我因病在北戴河疗养。听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便给林彪写报告，说身体已经好了，可以回去参加运动。林彪很快同意了我的请求。路过北京时，我顺便去看望向前同志，说起了这件事情，徐帅对我说：“你不要以为你那个军区没有问题，‘四大’一搞起来，问题就会成堆的。他（指林彪）是主张在军队开展‘四大’的。”当时我想得太简单，没有嚼出徐帅话中的味道。

回到武汉，短短几个月时间，形势急转直下。到一九六七年初，上海刮起“一月风暴”，全国性的造反夺权达到高潮。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各级党政机关瘫痪了，大批负责同志被戴高帽，挂黑牌，“架飞机”；游街示众，工厂停工，学校停课；连军区机关也经常受到冲击。

“一月风暴”刮起时，我和钟汉华同志（武汉军区政治委员）在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一月二十三日，毛主席命令军队要介人“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为了在新的情况下稳定军队，稳定局势，与林彪一伙坚决斗争，制订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并于当月二十八日报经毛主席批准公布。

会议期间，毛主席作了重要讲话，他对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是反感的，认为这里面“一定有坏人”。并且对我们说，如果碰到这种情况，要退避三舍，使坏人暴露出来。我当时理解，主席的意思是要我们以退为进，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退避三舍、四舍还不行，就要硬一点，就要执行军委八条命令，追究冲击军事机关的坏人。

二月初，我们的会议还在进行中，武汉和南下的部分军内外造反派却强行占领了汉口“红旗大楼”(《长江日报》社所在地)。二月八日，他们用《长江日报》的版面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以下简称《二·八声明》)。这篇声明唯我独革，充满了极左思潮，什么“子弹上膛，刺刀上枪”，“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什么“丢掉幻想，投入战斗，在四面围攻，内外夹击的战场上，看准方向，杀出一条血路来!”……二月九日，他们又在《长江日报》发表社论，说《长江日报》是他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援下”接管的，造成一种武汉军区支持他们的假象。

《二·八声明》出来后，造反派到处冲杀，就连不同观点的群众也要进行批斗游街。二月十一日，他们竟冲击军区支左指挥部，闹得乌烟瘴气。武汉军民对这种打砸抢的行为愤然不满，强烈要求武汉军区对《二·八声明》和二月九日社论表态。军区支左指挥部的干部甚至要“罢工”，他们找到叶明同志（军区副政委），说：“军区再不表态，我们不干了!”

军区党委听取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于二月十八日发表《严正声明》，批判《二·八声明》中的错误观点，并且指出：军区派部队去“红旗大楼”，是为了维持秩序，防止战斗，决不是支持《二·八声明》；至于军内造反派组织在《二·八声明》上签字，只能代表他们自己，不能代表武汉部队，更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个《严正声明》，是武汉军区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表态性文件。发表这个声明，军区党委是慎重的，不仅交给司、政、后机关干部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而且报告了军委文革小组。徐帅当时是小组组长，他同意军区的表态。我和钟汉华同志也看过《严正声明》，认为发表它是完全应该的。

二月底，会议结束，周总理把我和钟汉华同志找去，要我们回去后抓好三件事：一是抓革命、促生产；二是抓好按行业、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三是抓好大、中学生的复课闹革命。总理当时满怀忧虑地说：“季节不等人，不搞好生产，是没有饭吃的。”总理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月十七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八条命令以及外军区执行八条命令的做法，抓了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坏头头和骨干分子（除朱鸿霞、胡厚民等少数人之外，其余大部分都在军委十条命令公布后予以释放）。三月二十一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这些措施，有效地制止了打砸抢抄抓的活动，稳定了局势，保护了大批干部群众。与此同时，军区还成立了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让大批地方的党政负责同志站出来工作，扭转生产形势。以上这些作法，受到了武汉军民的拥护。

冲一冲武汉军区

武汉地区形势的稳定和发展，引起了造反派的不满，也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关注。四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这篇社论，是由首都红卫兵驻《人民日报》监督组成员根据武汉和北航红旗赴汉的造反派提供的材料，于二月中旬起草，经王力修改并下令发表的。据这个监督组成员交代说，这篇社论的用意就是要批判和警告武汉、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因为这些地方压制造反派最厉害)，不要压制造反派的红卫兵。四月六日，林彪和王力、关锋、戚本禹合伙炮制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又经批准公布了。十条命令是针对八条命令来的，命令公布后，江青和陈伯达拍手叫好。

这两个东西一出来，军区很被动，十条命令公布的当天，武汉的造反派就到军区支左办公室贴大字报"挑战"。接着，他们违反中央的有关规定，搞"串校游行"，"杀向社会"，提出什么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和"三月逆流"，揪出"武老谭"，为工总翻案，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武汉军区。

在此之前，我和钟汉华同志于三月中下旬离开武汉，再次到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看到《人民日报》四月二日社论和十条命令，又听说武汉出现反复，我们非常恼火。在一天的小组讨论会上，我发言放了一炮。我说：军队支左是毛主席的决策，我坚决拥护。但为了避免军队犯错误，建议中央文革扩大一点，多吸收一些同志参加，以便给各地派上代表，直接领导三支两军工作，叫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免得搞错。如果这个办法不行，由各地派人到中央文革接受指示也行。总之，既要把支左工作搞好，又要避免军队犯错误。发言记录整理后，秘书同志问我，要不要登简报？我想了想说："登，提个建议嘛"。于是登了简报。"七·二〇事件"后，林彪的几员大将把我的这个发言说成是"公开扬言，妄图改组中央文革！"

四月十七日，秘书同志看到一份传单，印有江青四月十六日在人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的讲话。江青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我和钟汉华同志商量，觉得武汉的情况和成都不一样，问题没有成都那样严重，中央对武汉的情况不了解，应当汇报一下才好。请示总理，总理很快就同意了。

四月十九日，总理在钓鱼台主持会议，中央文革的成员全体参加，听取我们的汇报。江青不知从哪里听说武汉有五万人绝食，问我们有没有这回事，我们说没有这回事。江青马上向我们作检讨，说她听了一面之词，讲得不对。并且解释说，武汉的国民党渣滓很多，撤退时有一两个师的人留在武汉，插在各个工厂里，情况很复杂……。在汇报过程中，中央文革其他成员都没有提出什么不同意见。最后，总理叫中央文革尽快接见一次武汉造反派赴京代表，做做他们的工作，让他们不要再冲武汉军区了。江青当即表示同意，并且让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二十一日就接见他们。但她不参加，理由是她的身份不同，参加接见会抬高造反派的"身价"，我们见江青这么郑重其事，当然高兴。

第二天下午，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江青送来当天的《文革快报》，内容是中央文革驻汉"记者"的"情况反映"，说武汉军区传达了中央文革十九日会议的有关指示，问这些指示是否属实？江青在上面批示："陈再道、钟汉华：这是怎么回事？以势压人，我们不理解。阅后退江青处。"晚上，我们查明情况，立即给中央文革写书面报告，说明我们确实给军区党委常委传达了十九日会议的要点，但传达时作了规定：不准再往下传达。记者听到的，不过是负责支左办公室工作的一位同志列席常委会后，回去给支左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吹的风，仅此而已，并没有用中央文革的名义去压造反派的意思。当然，事情没有处理好，我们有责任，接受批评。二十一日凌晨两点钟，中央文革又派人前来没收了我们十九日的会议记录，同时让来人转告我们，不准再提十九日的汇报，二十一日的接见也已经取消，中央文革不再帮助武汉军区做工作了。从这以后，中央文革"说话算数"，对于武汉军区的请示报告，一概不答复。

大概四月二十七日，会议结束。许多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接到通知，让他们参加"五一"庆祝活动，我和钟汉华同志接到的通知却是："会议完了，没事了，你们可以回去了。

百 万 雄 师

"五一"前夕，我和钟汉华同志回到了武汉。这时，武汉地区各个群众组织已经分化为两大派。军区支左方向的正确与否，是争论的焦点所在。武汉和南下的所谓造反派，提出"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口号，到处挑起事端，制造武斗事件，甚至绑架钟汉华同志，谩骂、围攻和殴打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指战员，给武汉军区施加压力。

这种愈演愈烈的极左行径，激起了武汉军民的极大愤慨。五月十六日，若干群众组织自发地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百万雄师认为：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十七年来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大多数地方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坚决反对"杀向社会"，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坚决反对对干部不加分析，一律打倒。百万雄师的队伍迅速扩大，到"七·二O事件"发生前，已拥有一百二十余万人了，其中党员人数占全市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武汉军区驻汉机关、部队的广大指战员，思想感情也一致倾向百万雄师。我们从内心讲，也同情他们，只不过所处的位置不同，不能公开表态支持他们罢了。

与百万雄师相反，造反派"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自已把自己孤立起来、人数越来越少了。我们从大局出发，仍然着重做他们的工作，采取各种措施保护他们，生怕把这批"文化大革命"的"闯将"搞掉了，交不了差。

六月四日，武汉军区发表《公告》，在肯定支左大方向正确和重申不得为工总翻案的同时，检讨了支左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希望各群众组织在新的形势下，求大同存小异，实行大联合。《公告》发表后，造反派认为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闹得更凶了。百万雄师对《公告》也不太满意，认为我们太软弱了。

卑鄙的手段

武汉和南下的造反派之所以闹得这么凶，完全是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策划操纵的结果。这件事情的内幕，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才初步揭开。

一九六七年三月以后，林彪多次对吴法宪等亲信交代："要把军队一小撮不好的人（即不亲林彪的人），都揪出来烧掉。"哪些人不亲林彪，吴法宪等人心中是有底的。五月份以后，吴法宪根据林彪的意思，先后给武汉军区空军刘丰等人打了四、五次电话，要武空独立思考，不要听大军区的，不要跟大军区跑。

四月份，中央文革派遣大批北京各院校的造反派到外地，以"调查"为名，进行反军乱军活动。北航红旗的几个造反派到武汉后，召集武汉造反派的头头们开会，说什么"武汉的谭震林，中央是饶不了他的。"这个话并不是没有根据的瞎说，事实上，中央文革和武汉的造反派头头就有着直接的联系。林杰、吴传启和戚本禹的秘书五月初先后接见武汉造反派的一个头头时说："武汉问题主要是同军内一小撮的斗争，""这是一场更加复杂尖锐的斗争，""需要把全国的老造反派统一组织起来。""武汉的谭震林是陈再道、孔庆德、韩东山，后台是徐向前。""中央五月十六日要发文件点军内的问题，这是支持你们的，你们要借东风，要激化矛盾。口号要明确，一是要打倒陈再道，二是不要把张体学与王任重分开来提，三是要为工总翻案。"

在中央文革的操纵下，武汉和南下的造反派（多数是年轻幼稚的娃娃们）四处冲杀，致

使两派冲突加剧，武斗升级，惨案时有发生。而这时，中央文革却又倒打一耙，把武斗的责任归咎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六月二十六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来电报："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这份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电报，是康生授意搞的。电报发出之前，中央文革的一个"记者"把电报拿给武汉造反派驻京联络站的头头看，给他们打招呼，说电报是经过康生批准的。"中央"急需有关武汉军区的材料，希望他们大量收集，并且每天向"中央"汇报一次。还煽动说，从电报中完全可以看出中央文革对武汉军区的态度，希望武汉造反派大胆地干，大胆地杀向社会。

"七·二O事件"发生后，林彪在臭名昭著的《八·九讲话》中说，全国各大军区过去有两个不放心，一个是北京，一个是武汉，拿他们没有办法。文化大革命解决了这个问题，通过文化大革命，让各种坏事暴露出来，把各种隐患诱发出来，问题就解决了。在这个讲话中，林彪既表白了他整武汉军区的一贯用心，也供出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行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时所采取的反革命策略。

林彪之所以对武汉军区不放心，事出有因，由来已久。早在延安时期，钟汉华同志负责审干工作，发现叶群参加过三青团。当时，叶群痛哭流涕，林彪也大发脾气，但钟汉华等同志坚持原则，据实给叶群作了结论。一九六四年军委讨论毛主席关于战略方针的指示，我发言说："主席的指示，是一九六O年战略方针（林彪主持制订的）在新形势和新条件下的重要补充和发展。过去的方针，今天看是有缺陷的，当时看也有缺陷，没有主席指示的全面，成龙配套。"我的发言有批评林彪"南放北顶"作战指导思想的意思，因此引起了一场"风波"。黄永胜等人对我进行围攻，硬说我把主席的指示和原来的方针对立起来了，是否定过去的方针，反对林彪。同年，叶群到广州军区搞调查，说什么大比武是"拼凑尖子"，"弄虚作假"，"锦标主义"，"冲击了政治"等等，把大比武说得一无是处。许多同志认为要用"两分法"看待大比武。我也持这种观点，发言说："大比武的成绩是主要的，主席看过大比武，没有说大比武不好。"叶群调查大比武，实际上是为林彪整罗瑞卿同志罗织罪名。我们讲公道话，当然得罪了林彪。一九六五年，林彪到武汉，我因在外检查工作，没有赶回来接他，而黄永胜却专程从广州赶到武汉来迎接林彪。相比之下，我对林彪实在有失恭敬。后来，我听其他同志讲，林彪在武汉大骂罗瑞卿同志，并且有所指地说："你们武汉，有没有罗瑞卿？"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湖北省军区给武汉军区写报告，说要象修韶山那样修林家大湾（林彪的家乡），而且要把路修成能并排通行四辆大卡车的柏油马路。这个报告，我们压了下来，没有批准。说实话，我当时还是好心，害怕帮了林彪的倒忙。

这几件事情，我们没有违反党性，也不是什么非组织活动，但林彪却长期怀恨在心，费尽心机地要"把隐患诱发生来"。当然，林彪整武汉军区的主要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打倒我们，他的主要目的，是要从武汉开刀，为"揪军内一小撮"制造口实，打倒一大批军队的负责同志，扫清篡党夺权的道路。

我是不打倒他的

接到中央文革六月二十六日的电报后，我们立即让两派群众组织选出代表，做好赴京汇

报的准备。七月初，我打电话给周总理说：群众组织的代表已经选好，可以到北京开会了。七月十日左右，总理回电话，说群众组织的代表不到北京了，就在武汉解决问题。我当时不便多问，以后才知道，改变计划是因为毛主席要巡视大江南北，并且要到武汉横渡长江。

七月十四日清晨，总理为主席打前站，乘飞机到了武汉。随同总理来的，有李作鹏和海空军的作战部长。中午，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带着北航红旗四名造反派也由重庆赶到了武汉。主席是晚上到武汉的，随行的有汪东兴、杨成武、郑维山和总参作战部的一个副部长。总理亲自为毛主席打前站，据说是想看看武汉的形势，究竟是不是象中央文革说的那样漆黑一团。另外，想通过武汉军区，做好两派群众组织的工作，促进他们联合起来，稳定武汉的局势，为毛主席横渡长江创造条件。总理还设想，利用主席在武汉的机会，把武汉问题解决好，这对于解决其它省的问题，对于稳定全国的形势，会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七月十五日和十六日，主席两次召集总理和汪东兴、杨成武、余立金以及谢富治、王力、李作鹏开会，听谢富治、王力汇报云、贵、川问题和武汉问题，讨论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主席指示：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放掉朱鸿霞。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要派专人做他们的工作。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会拥护陈再道的。主席还让总理在武汉多留几天，做军区的工作。

七月十五日开始至十八日，总理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同志和驻汉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同志开会，连续四天听取我们的汇报。这个会议谢富治、王力一直参加，杨成武、余立金、郑维山以及李作鹏、刘丰和作战部长们也断断续续参加了。十八日下午，总理做了总结讲话，大意是：军区支左有错误，甚至很严重，但责任由军区主要领导同志来承担。建议陈再道、钟汉华同志主动承认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给工总平反，迅速放掉朱鸿霞，支持造反派。工总起来之后，可能对百万雄师进行报复，这个工作由中央来作。军区要对部队进行教育，群众组织都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总理在讲话中肯定了军区抓革命促生产的成绩，并且为军区承担责任，说我们解散工总，是受了他一次讲话的影响。这个总结讲话的提纲，据说是总理亲自拟的，并且送主席审阅过。当时，我们没有体谅总理的难处，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总理苦口婆心地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因此犯了错误。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为了打倒你们。总理为了消除我们的顾虑，在汇报会召开之前，就告诉钟汉华同志说：主席临动身时讲了，要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

七月十八日晚上，总理要赶回北京，临走之前特地带我们去见毛主席。主席一见我们就问："你们怎么样啊？"我心事沉重又有点气鼓鼓地说："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主席笑着说："这怕什么呀？现在他们一提就是路线错误，谁都是路线错误。"我听主席这么说，心里踏实多了，赶忙回答："要是犯了路线错误，我们马上开大会作检查。"主席说："那可不行，你可不能去开会，你一开会，就下不了台。你就写个东西，到处去发。"并且嘱咐我们：工作要做好，慢慢来，不要着急。首先要把部队的工作做好，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群众组织的工作做好了，思想工作做通了，再来开会协商，解决问题。我对主席说："中央文革有威信，解决武汉问题，希望中央文革能讲话。"王力认为我这是在将他的军，满脸不高兴，气呼呼地说："百万雄师就不听文革的！"主席明白我的意思，说："他们要打倒你们，我要他们做工作，做工作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拥护你们为止。"并且要谢富治和王力开设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群众组织来访，做思想工作，主席说："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你们想一想，一个工厂，这一派是革命的，那一派就不革命？你们相信吗？""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

冲突……。”这段话，也是当时讲的。

大约十点多钟，我们告辞出来，主席把我们送到走廊上，招呼几位服务员和我们握手，对他们说：“再不能打倒你们司令员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接着又对我们说：“他们要打倒你，我要他们打不倒你！”我们和服务员同志握手时，都忍不住笑起来了。

疯狂的破坏

毛主席和周总理到武汉，使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极为恐慌。七月十三日，总理决定到武汉，中央文革不通知武汉军区，却由吴法宪通知刘丰，说夜里有一架一级专机要到汉口机场降落，让刘丰等人作接机准备。专机具体什么时间到，坐的什么人，都没有告诉。飞机降落后，总理见没有人接他，还以为我和钟汉华同志被造反派弄走了。刘丰把总理接到武空司令部后，总理问刘丰：陈再道、钟汉华到哪里去了？刘丰张口结舌答不出来。总理这才让刘丰通知我们，叫我们赶去。总理到武汉，中央文革和吴法宪把持的空军不通知武汉军区，这是极为反常的。更令人奇怪的是，与解决武汉问题和保卫主席安全没有丝毫关系的江腾蛟，也从南京窜到武汉。

李作鹏等人以及总参和海、空的作战部长们到武汉，据说是为了保证主席的安全，是经过主席、总理同意的。这里面有没有林彪的预谋，很感到怀疑。他们在王家墩机场开设了“三军”指挥所，给林彪搞阴谋活动提供了条件。刘丰根据林彪、吴法宪的意思，竟背着总理，私带电台、保密机和总理住在同一幢房子里。七月十六日，谢富治、吴法宪还布置空军那个人召集武空刘丰等人开会，让他们支持造反派，打倒陈再道和钟汉华。

本来，总理是没有打算让王力去武汉的。七月十三日夜里，总理给在重庆的谢富治打电话，叫他第二天赶到武汉、负责主席的安全。和谢在一起的王力听说这一消息，连夜和关锋通话。他们密谋后，王力便硬要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到武汉。总理考虑王力是中央文革成员，造反派听文革的，让他去也好，可以帮助做造反派的工作，于是同意了。但是他们到武汉的当天晚上，就违反总理关于中央代表团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非要上街看大字报不可，而且指定要让刘丰带路。王力在车上问刘丰：“你们空军的观点，是不是和军区一样？”刘丰一时不知怎么回答，空军那个人帮腔说：“有不同意见。”在湖北大学门口，谢富治、王力又有意识地下车和造反派谈话，公开身份。七月十五日，武汉造反派举行盛大游行，欢迎谢富治、王力来解决武汉问题，并把他们称为“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武汉军民包括高级干部一时都被弄糊涂了，他们深怀疑虑：谢富治、王力到武汉，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

在四天的汇报过程中，谢富治和王力一副凶相，态度极为蛮横。凡是不合他们口味的，我们讲一条他们驳一条。谢富治说：你们支保吃左，屁股坐歪了，大方向错了。街上几岁的娃娃都知道三钢三新好，百万雄师坏。三钢三新揪“武老谭”，是把矛头指向当权派，大方向是对的。你们要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不转变，你们自己考虑。我们当时不知道主席在武汉，也不知道主席和他们议了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所以和他们顶得很厉害。记得在他们要我们承认犯了路线错误时，有人插话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韩东山同志当即反驳：“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话不能简单地对下面讲，要说出个道理来。”谢富治听了这话，眼睛都瞪直了，他恶狠狠地说：“你反对林副主席！”七月十六日、即汇报会的第二天，我和钟汉华同志商量，认为他们一定是带着框框上来的，解决武汉问题的盘子早已经定好了，汇不汇报都是一个样。决定起草检讨，反正早晚要用。

谢富治和王力公开身份后，总理无可奈何，只好让他们提前到群众组织中去做工作。七月十五日和七月十六日夜里，谢、王到造反派的据点，登台接见并发表倾向性的讲话，表示慰问和支持他们。七月十七日夜里，谢富治和王力一行跑到百万雄师联络总站。谢富治要百万雄师负责人开个"头头们"的名单。名单开好后，谢把名单装进了口袋，就一句话也不说了(七月二十七日，名单上的十三个人一齐被逮捕，其中八人一直被关押到一九七二年才被批准"保外就医")。这时，王力说："你们在据点里，集中起来搞武斗是错误的！"百万雄师负责人向他解释：我们有厂不能回，有家不能归，是被逼得这样的，一回去就挨打。现在中央代表团叫回去，百万雄师同意，但希望中央代表团和武汉军区召集两派组织谈谈，订几条规矩，由中央派人监督，大家一起回去……。王力说："你提这个问题就是错误的！你们管你们自己，不要管人家嘛！你们怎么管得了人家呢？"百万雄师的同志不客气地说："叫我们单方面回去，等于叫我们投降。举手投降的事我们不干！各群众组织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团也平等对待！"

第二天，百万雄师总站向所属组织传达王力的指示。不传达还好，一传达群众都跳起来了，坚决不同意王力的讲话。

"七·二O事件"发生的前几天，王力还多次和北航红旗造反派谈话，说什么中央要对武汉问题公开表态，百万雄师和四川产业军是同类型的保守组织，搞武斗厉害的头头要处理。陈再道问题严重，一九六七年还在保刘少奇，说刘少奇是人民内部矛盾，支左又犯了路线错误，要公开作检查。武汉问题这么严重还算好的，其它省的问题更严重，主要是军队的问题等等。七月十六日和七月十九日，王力两次把主席在武汉的谈话记录拿给这些人看。这些人不仅把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透露给武汉造反派，而且卖力地兜售王力的黑货，进行煽风点火。武汉造反派则到处张贴大字报和大标语，表明谢富治、王力是支持他们的。

谢富治、王力的倒行逆施，加剧了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引起了武汉军民的极大反感。七月十七日，百万雄师有针对性地贴出大标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下车伊始，哇喇哇喇！""反对钦差大臣！""我们不是阿斗！"七月十八日，标语口号又点出了王力的名字，要他下连当兵，到工农群众中去。

七月十八日夜里，主席和我们谈话之后，谢富治和王力带着刘丰等人，到机场送走总理，随后直接从机场溜到水利电力学院的造反派总部。总理离开了武汉，谢富治和王力更可以为所欲为了。他们佩戴着造反派的袖章，视察据点、工事，慰问武斗致伤人员，并先后在大会上讲话。王力疯狂地喊道：武汉问题一定会解决得最好、最快，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王力讲完话，谢富治又要刘丰等空军负责人挨个"亮相"过去埋怨抓人抓得太少，要"多抓几个造反派"的刘丰，此时摇身一变，说自己是小学生，支左犯了错误，希望造反派帮助纠正，以后要坚决和造反派站在一边等等。

谢富治、王力这天晚上的活动，成为爆发"七·二O事件"的导火线。

第二天，七月十九日，造反派用高音喇叭在武汉三镇到处播放谢富治和王力在水院讲话的实况录音，同时还有王力的"四点指示"，什么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听到这些，武汉军民肺都气炸了。当天，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武汉街头，一篇题为《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深思几个为什么》的大字报，一针见血地提出："王力自窃踞中央文革成员以来，一贯以极左面貌出现，在他插手

的四川、内蒙、江西、河南、湖北、浙江、云南等省，均出现大抓'谭氏'人物，大搞武斗，大流血，大混乱，大破坏，工厂停工，这是为什么？王力是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把王力揪住，交给湖北三千二百万人民，与各兄弟省革命组织一道，进行斗争，挖出这颗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打倒王力！王力从中央文革滚出去！"

一场反击林彪路线的革命壮举即将发生了。

百万雄师过大江

七月十九日，我们按照预订的计划，上午召开军区党委常委会，通过我和钟汉华同志的检讨；下午三点多钟，又在军区礼堂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请谢富治和王力出面做工作。王力开始说他不讲话，但谢富治讲完后，王力又说他要讲话。王力用教训人的口吻说："看来，你们对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因此，我只好象给小学生上课一样，从一年级的第一课讲起。……"王力从一九六五年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讲起，一直讲到六七年军队支左。胡说什么武汉的职工联合会（百万雄师的前身）是陶铸的官办组织，是用来破坏工人运动的。而工人总部则高举"造反有理"的旗帜，点燃了武汉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烈火，要大树特树工人总部。还胡说什么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军区看不到这一点，因此发表《二·一八声明》、《三·二一通告》，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王力滔滔不绝，一直讲到夜里十一点多钟。而这时，百万雄师已经开始行动了。晚饭后，省直机关的干部和独立师、二十九师的战士到军区大院门口，要求谢富治和王力接见他们，回答问题，并且解释清楚，王力到水院的"四点指示"，究竟是什么意思，用心何在？

散会后，我和钟汉华同志送走谢富治和王力，赶到曹家花园（军区招待所）释放朱鸿霞、胡厚民等人，他们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犯了错误，感谢宽大。正是这个时间，百万雄师和独立师、二十九师的战士起来"造反了"，上百辆大卡车和几十辆拉着警报的消防车一起涌进军区大院，他们质问军区，王力凭什么把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又凭什么把几个造反派组织封为"革命左派"？军区支左大方向明明没有错，陈再道、钟汉华凭什么要当"投降派"，承认犯了路线错误？军区机关干部的家属子女纷纷端茶送水，慰问他们，支持他们的正义行动。

事件一发生，军区领导同志即赶到现场做工作，同时告诉王力，说百万雄师听了他在水院的讲话录音后，十分气愤，占领了军区大院，要求谢富治、王力接见他们。军区领导正在做工作，希望中央代表团也采取相应的措施，否则，事态还有扩大的可能。王力听说后冷笑几声，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既不叫醒已经睡觉的谢富治，也不采取任何措施。大约拖了两个多钟头，经北航红旗那几个造反派的再三要求，王力才叫醒了谢富治。这时，百万雄师已经到了东湖宾馆，无法扭转局势了。

七月二十日清晨，我来到谢富治房间，刚刚坐下，百万雄师就冲进来了。他们挤在门口，要找王力。我和谢富治站起来，劝他们到外面去谈。而王力却躲在隔壁房间里不敢出来。我和谢富治到屋子后面的草坪上坐了下来，百万雄师两百多名代表，站的站，坐的坐，围在我们四周。我是第一次和百万雄师"谈判"，谈的结果很好，谢富治答应下午接见他们，他们也答应先回去。王力看见这个情况，壮壮胆子走出来，和我们坐在一起。正在这时，又冲进来几百人，多数是独立师和二十九师的战士，他们在军区大院等急了，愤怒地喊着，要抓王力，并且把我当成王力，上来就是一顿枪托。王力趁乱跑回屋里，百万雄师和部队战士

找到他后，请他到军区大院去回答问题，以免引起更大的混乱。王力赖着不走，北航红旗几个人又大耍造反派的威风，气势汹汹地辱骂他们。他们忍无可忍，硬把王力抓出来，塞进汽车，拉到了军区大院。谢富治有块老干部的牌子，他们连碰都没有碰他一下。总理的住处离谢、王的住处仅隔百米左右，他们连去都没有去；主席那边就更不用说了，当时和事后检查，根本没有丝毫危及主席安全的迹象。这就是所谓的"七·二O事件"的真相。林彪、江青一伙说"七·二O事件"是"陈再道搞兵变"，完全是怀着险恶用心的无耻捏造。

这天上午，主席叫我们把王力找回来。我因有伤，又考虑到主席的安全，因此，留在东湖。钟汉华同志赶到军区大院，和叶明、孔庆德等军区领导同志一起做百万雄师和部队的工作，要他们放掉王力，同时又不能讲出毛主席在武汉，放王力是毛主席的指示。磨到中午时分，钟汉华、叶明、孔庆德等同志设法将王力悄悄地弄出来，转移到二十九师师部的六号楼。六号楼位于小洪山北侧，紧挨着军区指挥所，周围是部队的营区，比较安全。当晚，叶明、韩东山同志准备再次把王力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却发现王力"失踪"了。

就在七月二十日这天，武汉军民一起涌上街头，数千辆大卡车载着工人、农民和驻汉部队指战员，排成四路纵队，浩浩荡荡地进行游行示威。机关干部和学生们的游行队伍，也象江水一样滚滚而过。他们张贴标语，高喊口号：

"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

"王力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罪该万死！"

"打倒王力！"

"中央派人来，王力滚下台！"

"周总理到武汉，王力靠边站！"

"欢迎周总理到武汉！"

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武汉军民连续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高音喇叭反复播放为毛主席诗词谱写的歌曲："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正直勇敢的武汉人民以为，这样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一定能够引起中央的重视，从而采取正确的方针解决武汉问题。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这样的做法，恰恰是林彪所希望的。

危 言 耸 听

七月二十日上午，事件刚刚发生，林彪便亲自写信给毛主席。当时周总理在北京，但林彪不找总理，叶群叫秘书把信送给戚本禹修改，并特别交代秘书要告诉戚本禹，这封信是林彪的意思。戚本禹看了信，觉得"这是大事"，不敢作主，于是找到陈伯达和关锋一起修改，最后，落款又不知怎么签上了江青的名字。林彪、江青勾结一起，派邱会作和张春桥分别乘专机飞往武汉和上海，邱会作临走时，江青交代他说："你的脑袋在，这封信就要在！"邱会作把这封信放在贴身的汗衫内，于下午两点十分赶到了武汉。张春桥也于下午四点二十分赶到上海，安排"迎接"毛主席。

邱会作到武汉后，立即和主席身边的人"商量"，决定把主席转移到上海。五点多钟，邱会作见到毛主席，邱说：林彪、江青派我来送信，叫我把信亲自交给主席。外面形势不好……，林彪和江青担心主席的安全，请主席转移，另给林彪、江青回个信，哪怕几个字也好。主席边看信边笑，将信将疑，走不走，走，到哪儿，到长沙，到上海，还是到南昌？没有下

定决心，延至晚上八点多钟，主席同意去上海。二十一日凌晨两点钟，主席坐空军的汽车，在刘丰等人的"护送"下，绕道前往王家墩机场。到机场后，邱会作再次向主席讨回信，主席问他：为什么要转移？又说：想游泳，现在看游不成了。不写信，你回去同林彪、江青说说，就这么办！林彪、江青给主席的信写的什么内容，从来没有清查过。一九七四年，张春桥在京西宾馆的一次讲话中不打自招地供认说，主席到上海后，一夜没有睡觉，把张春桥等人叫到身边。主席说：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吧？如果陈再道搞兵变，我们走得出来吗？这都是他们搞的，我在那里，为什么不和我通气呢？我想，毛主席对林彪、江青是存有戒心的，如果没有戒心，不论书面还是口头同意林彪的"兵变"之说，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七月二十日，总理听说武汉发生百万军民反对王力的游行示威，即决定重返武汉。下午三点五十四分，总理乘飞机从北京起飞。飞行途中，吴法宪造谣欺骗总理，说王家墩机场不能降落，陈再道派部队包围了机场，要劫总理，同时打电话给林彪办公室说："武汉有几十辆汽车冲进机场，要劫总理。武汉军区有鬼，研究时军区有人参加，要不消息怎么传出去的！请向一零一（即林彪）报告一下"。吴法宪把总理坐的飞机调到离武汉六十多公里的山坡机场降落。总理下飞机时，林彪和吴法宪指使别人以反"兵变"为名，紧急调动的空降部队已经占领了机场，一片刀光剑影。总理不以为然，把秘书和中央警卫团的领导同志以及两个中队的警卫部队丢在山坡机场，仅带着两名卫士，乘汽车赶往武汉。总理到武汉比邱会作晚了八九个钟头，主席已经决定去上海了。

总理一到武汉，就叫孔庆德和牛怀龙同志（独立师师长）把王力找回来。并让孔庆德同志通知百万雄师，派一百名代表赴京谈判，军队代表和造反派代表坐一架飞机（由于林彪插手，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七月二十一日，总理又叫我们去找王力，一心想把局势稳定下来。

王力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原来，七月二十日下午，叶明同志担心再次把王力抓走，不好交差。便叫二十九师政委张昭剑（当时在军区大院）回去，万一情况紧急，先把王力带进指挥所藏起来。

谁知张昭剑为了邀功请赏，达到政治投机的目的，竟哄骗王力说，公检法、百万雄师、独立师（隐瞒了他所在的二十九师参加揪王力的事实）是搞"暴乱"，现在已经包围了二十九师师部，外面的喊声就是抓王力的。

王力吓得屁滚尿流，跟着张昭剑，在小洪山上连滚带爬，一直躲到第二天。

王力在山上对张昭剑说："冲东湖有组织，陆海空三军都有，东湖客舍的警卫队长就是百万雄师。武汉的天不是毛主席的天，武汉的枪杆子不在毛主席手里。军区班子烂了。他们要变天！

尤其卑鄙的是，张昭剑竟然对我们封锁消息。七月二十一日上午，总理叫我们找找王力，我们派人找到二十九师，师参谋长根据张昭剑的交代，只说王力在安全的地方，不告诉他们的具体情况。我们觉得二十九师这样做十分反常，便向总理作了汇报。

刘丰不知怎么得到王力在二十九师的消息，他中午窜到二十九师。一去就冲着张昭剑大骂武汉军区，说，武汉军区这窝子是些什么人？你张昭剑不要奴隶主义！你是听毛主席的，还是听陈、钟的？善于投机的张昭剑说："我听空军的。"刘丰把王力转移到武空司令部，王力要刘丰"采取彻底革命的方针，特别对人武部要采取彻底革命的方针，要创造一个革命的大军区！"

七月二十二日，凌晨三点多钟，王力在李作鹏、刘丰的护送下到达山坡机场。清早，刘

丰打电话给吴法宪，说他亲自把王力接出来，转移到山坡。武汉情况紧张，电话里不敢讲。与此同时，武空也向吴法宪报告，说武汉游行队伍还很多，独立师全付武装，坐着卡车、摩托车，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等等。吴法宪接到这些电话后，都迅即报告了林彪。

这天上午，总理在王家墩机场召集叶明、孔庆德同志和李作鹏、刘丰等人开会。总理让叶明、孔庆德同志住到二十九师，暂时主持军区的工作。并且让他们转告我和钟汉华同志，要赶快表态，争取主动，这样他才好说话。总理还说，武空仍是双重领导，要听军区的话，不能随意表态。总理在谈话中没有责备军区。

但是，总理的话，李作鹏和刘丰等人根本不执行。当天，李作鹏叫海军党委给海军驻汉单位发电报，说"七·二O"是"反革命兵变"，要他们表态"打倒陈再道"，甚至指使在武汉保卫毛主席横渡长江的军舰发表《严正声明》，恶毒攻击和诬蔑武汉军民。《严正声明》杀气腾腾地说："我东海舰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吴法宪和刘丰串通一气，说空军要对"七·二O事件"发表声明，打倒陈再道。总理发现制止，他们不仅不听，还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林彪。七月二十三日，刘丰从吴法宪那里听到消息，马上打电话给张昭剑说："武汉军区问题大了，不是一个陈、钟问题，'七·二O'是林彪派邱会作来处理的，武汉军区有鬼！"张昭剑听了这话，立即宣布二十九师脱离武汉军区，并且扬言要把军区领导同志"统统打倒！"尤其狠毒的是，张昭剑对抗总理的指示，把叶明、孔庆德同志赶出二十九师，以致叶明同志几乎被打死！

七月二十二日下午，谢富治和王力回北京，林彪、江青组织数万人在西郊机场欢迎他们。本来，总理坐的飞机比谢富治和王力坐的飞机晚起飞半个小时，但林彪、江青为了扩大声势，却让总理坐的飞机提前降落，逼总理参加他们搞的欢迎仪式。当天晚上，林彪亲自主持会议，中央文革成员全体参加，听取谢富治的汇报。谢富治汇报后，林彪决定：把七·二O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处理"七·二O事件"分为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以中央的名义调陈、钟进京，看陈、钟敢不敢来，如不敢来，证明陈、钟有问题。第二个步骤，起草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文件，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并且通知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林彪的决定，把总理处理"七·二O事件"的打算全部推翻了。会后，林彪又给戚本禹打电话说："处理武汉问题的两个步骤，第一步和第二步要错开，以免打草惊蛇。但第二步应当马上着手准备，向武汉、郑州地区的群众进行宣传的传单和报刊宣传的材料，现在就应该开始起草，起草好之后，先经中央文革研究，然后再报请主席审查修改，主席批准之后再印发。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普通的情况，而是比较特殊的情况，应当报告主席。为了打击反动的头子，争取受蒙蔽的群众，提高左派的威信，在传单中需要点哪些人和哪些组织的名，也请你们考虑，报告主席。"

关锋第二天对王力说：林彪之所以要采取这样非常的措施，不是为了欢迎你们回京，而是为了毛主席被迫离开武汉。阴险狡诈的林彪，明明是自己胁迫毛主席离开武汉，反过来却把罪名加在我们头上，用主席的名义来打击敢于反对他的武汉军民。

七月二十三日凌晨，中央文革对各地发出"紧急通知"，要各地搞"三军联合行动"（武装游行），声讨"七·二O事件"，开始了一场对武汉军民空前规模的舆论围剿。

进　京

七月二十二日早上，我想请示一下总理，看总理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办。总理住处

负责接待工作的同志说：主席已经走了，总理也离开了东湖。

七月二十三日凌晨三点钟，我们收到了林彪以中央名义调我们进京“开会”的电报。五点二十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三遍播放谢富治和王力“胜利回京”的消息。尽管如此，武汉军民声讨王力的游行队伍还是连绵不断。当二十九师师长率领两卡车战士护送我们去机场时，见战士们佩戴着百万雄师的袖章，振臂高喊着“打倒王力”的口号。一路上通行无阻，顺利地到达了机场。我们到了之后，牛怀龙、蔡炳臣（独立师政委）、巴方廷（武汉市人武部政委）和其他进京“开会”的人也陆续到达，一共是十五人。刘丰这天进进出出，发号施令，已经俨然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了。他规定我们不准离开屋子，并且召集我们的秘书、保卫干事开会，要他们和我们划清界限，对我们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实际上是把我们软禁起来了。

七月二十四日凌晨三点多钟，我们飞抵北京，住进了京西宾馆。总理交代宾馆的工作人员：要严守纪律，注意保密。为了保护我们，总理还下令给京西宾馆增派了警卫部队。但是，林彪、江青一伙，又策划了新的阴谋。我们一到，吴法宪就找到刘丰，对他说：“你们这次要旗帜鲜明，狠斗他们！”上午，北京文艺口的造反派冲进京西宾馆，要“找陈再道辩论”。我们刚住进京西宾馆，造反派就知道了，并且冲了进来，这显然是有预谋的行动，傅崇碧同志派人把我们藏进电梯，熄了灯，让电梯悬在半中腰。总理知道这个情况后问傅崇碧同志，这样保不保险，有没有办法叫造反派退去？傅崇碧同志说，造反派不听我的，我没有办法了，看谢富治有没有办法。总理找到谢富治，要他动员造反派撤出京西宾馆，负责保证我们的安全。总理声色俱厉地对谢富治说：“我不管了，如果他们出了问题，你们去向主席交代！”谢富治一出面，造反派很快就撤走了。总理这天上午还打电话给吴法宪和戚本禹，要他们分别去做三军造反派和文艺口造反派的工作，不要冲击京西宾馆。戚本禹接到总理的电话后，马上打电话给吴法宪，说：“总理的指示不好办！”根本不做工作。而吴法宪则告诉总理，说他接到电话后，找了三军造反派的头头，做了工作，但三军造反派不仅不同意总理的意见，反而要求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等人交给三军造反派批斗。

其实，吴法宪做工作是假的，耍花招才是真的。文艺口造反派撤出京西宾馆后，三军造反派就立即包围了京西宾馆。三军造反派的行动是林彪派叶群到京西宾馆找吴法宪、邱会作、张秀川“串连”布置的，叶群要求三军造反派包围京西宾馆，“插红旗、占位子，静坐游行示威，连续搞它几天。”还要求他们到处张贴打倒陈再道、钟汉华，揪“黑后台”徐向前的标语口号。为了给三军造反派鼓劲，叶群让林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参加三军的游行示威，甚至亲自出马，邀江青、关锋、戚本禹等人到京西宾馆“看热闹”，让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陪同，乘坐几十辆小车围绕京西宾馆游行，表示对三军造反派的支持。

欢迎大会

七月二十四日，我们到京的当天晚上，中央文革根据林彪的“第二步骤”，开会研究关于“七・二O事件”的报刊宣传口径。中央文革决定：一、报刊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字，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点出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会议还决定七月二十五日下午召开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和出席大会的人员名单。会议情况书面报告了林彪。

七月二十五日下午三点钟，离大会开始只剩下两个小时时间了，林彪打电话通知中央文

革，说："我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今天下午的大会，我以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这个欢迎大会，实质上要开成一个示威性质的会，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的瓦解。所以，我觉得参加利多。"江青、陈伯达、关锋、姚文元表示"拥护"林彪的意见。江青和陈伯达说：林彪的意见"十分英明"，请林彪"一定参加"。关锋甚至建议，为了"壮大声势"，应请在京汇报的黄永胜、冼恒汉等人也参加大会，而"住西山的那一位（指叶帅等）就可以不参加了。"林彪对关锋的意见非常赏识，夸奖他说："关锋同志的意见很好，应当壮大声势，并使这个声势扩大到全国去。"果然，这天下午的大会，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老帅没有参加。

下午四点多钟，林彪爬上了天安门，对江青说："武汉问题不单是武汉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又对蒯大富、韩爱晶等造反派说："事情发展到坏的顶点，就要向好的方向转化，从前我们要作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估计最近一个月将是全国矛盾激化的一个时期。"

大会进行中，蒯大富问王力：全国老保行动如此一致，中央有没有黑手！现在是不是到了要解决军内问题的时候了？王力连连点头，回答说："就是，就是。"在谈话中，王力表示对叶、徐两个老帅和南京、福州军区很不满意，蒯大富又问王力：原四方面军的将领是不是都听毛主席的话？王力回答说："有的听，有的不听！"蒯大富还留心观察了林彪，看见林彪对"打倒陈再道"和"打倒军内一小撮"的口号都举手赞成。

第二天，蒯大富和韩爱晶联合召开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两总部会议，传达林彪、王力的指示。清华造反派为了"揪军内一小撮"，成立了"对外作战部"、"军事动态组"和各地造反派驻清华的"联络总站"，准备大干一场，迎接林彪"文化大革命""揪军内一小撮"的"新阶段"。据蒯大富交代，他们当时分析：林彪做接班人，有好多人不服，主要是四方面军的，他们力量大人多。"七·二O事件"就是四方面军的陈再道搞的。林彪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就是冲着这些人来的。林彪""要大做文章"，就是要"揪军内一小撮"，把反他的力量全都打下去，为他当接班人扫清道路。蒯大富等人的分析，完全切中了林彪分裂军队的反革命目的和篡党夺权的罪恶野心。

指鹿为马

七月二十六日上午，我们接到通知，说下午召开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讨论中央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通知称我们为同志，并附有中央复电的全文和主席的批语。批语说："林、周及中央文革，拟复报如下，请酌定。"复电共五条，其中第二条，主席在我的名字后面加上了同志二字，内容是："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毛主席称我为同志，使我深受感动，当时如果没有这两个字，林彪要整死我们是很容易的事情。

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召开。名义上是讨论问题，实际上是斗争我们。会场有意布置过，武汉军区的位置分成三排，面朝会场，斜向主席台。我和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五人指定在第一排"就坐"，但只准站着，就和接受审问一样。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成员、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和各大军区、省军区在京的负责人。整个会议室坐得满满的。

会议开始，谢富治首先发言说："七·二O"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

谢富治讲完，吴法宪发言。这天早上四点多钟，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要他开会之前同张秀川串连一下，发言时一定要"涉及"徐帅，同徐帅划清界限，让徐帅对"七·二O事件"表态，把揪徐帅的"旗帜"抢到手，不要为三军造反派抹黑。吴法宪受到指使，气势汹汹地说：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是镇压革命、屠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是刘邓的打手、干将和帮凶，是刘邓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陈再道同贺龙、陶铸、刘志坚都有密切关系，是中国的苏哈托，是现在的张国焘，是钻进革命队伍里的蒋介石，是解放军的败类。蒋介石办不到的事情，陈再道办到了。陈再道盘踞的武汉军区是个奸贼窝。……吴法宪的话完全是信口胡说，总理三次打断他的话，要他讲主要的，但他仍然滔滔不绝，并攻击徐帅说：徐向前早在二月份就给陈再道打保票，说陈再道不是三反分子，有错误也打不倒。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任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徐帅听到这里，气愤地站起来，说：这个话我讲过，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讲的，如果有出入，可以调查了解嘛！说完，徐帅写了张条子递给总理，忿然离开了会场。据说陈毅和谭震林同志没有发言，也是中途离开会场的。

会上，我申辩说：如果搞兵变，我总不能没有几个人，总不能不开个会吧？说我搞兵变，可以找人对证嘛！吴法宪不等我把话讲完，领着刘丰和几个打手冲过来，抓掉我们五个人的领章帽徽，拳打脚踢，不许我们讲话。会议中间休息时，受到指使的一些不明真相的服务人员对我们进行武斗。总理在休息室听了秘书周家鼎同志报告，气愤地说："真是荒唐！"并且跑着赶了过来，想制止他们，但这时人已经溜掉了。总理后来批评吴法宪搞武斗不对，而江青却表扬吴法宪，说"吴法宪是造反派，有造反派的精神。"中央常委的扩大会议搞武斗，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会议从中午开到吃晚饭，吃过晚饭又接着开，我低头弯腰地站了六七个钟头，实在支持不住。我看见康生坐在那里不讲话，心想，康生年事高，又是文革顾问，和他讲讲，也许能让我们坐下来，于是喊："康老,康老,我是放牛娃出身,六十岁的人了,念我革命四十年……"话没说完，康生脸一变，恶狠狠地训道：人可以变！你陈再道不要摆老资格、不要以为毛主席叫你是同志你就不是反革命了。三十年前张国焘在武汉叛变中央，现在你们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叛乱，这是张国焘事件的重演。说着又逐条解释那个有五条内容的电报，经他解释，我比反革命还要反革命，主席称我同志的意思也完全变了样。康生和江青还一唱一和，说党里有坏人，军队里也有坏人，张国焘、彭德怀、罗瑞卿就是坏人，是解放军的败类。陈再道煽动部队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反对中央、中央文革，也是解放军的败类，是解放军的奇耻大辱等等。林彪的几员大将和江青的几名走卒在会上也极尽诬蔑攻击之能事。所有到会的人都必须发言，表明自己对"七·二O事件"的态度。

按照毛主席的批语，是用不着开这样的会进行"讨论"的。林彪、江青开这个会，目的是要指鹿为马，进行一次政治测验，看看党内军内有谁敢再反对他们的极左路线，谁要是反对了，其下场就和陈再道等人一样，"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阴谋得逞

"揪军内一小撮"是林彪、江青预谋已久的反革命方针，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一月风暴"前夕，林彪就在关锋、王力等人"揪军内一

小撮"的报告上批示"完全同意"。接着，他又让林立果写"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让吴法宪"把要揪的人的名单和材料交给在北京串连的军队院校的学生，由学生们去揪。"他们妄图在打倒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负责同志的同时，再打倒一大批军队的负责同志，把党政军大权统统夺到手。林彪、江青一伙从有意给武汉军区出难题到"诱发""七·二O事件"，就是为了实现"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反革命步骤。

七月二十二日，王力在回北京的飞机上对北航红旗的造反派说："这下子，要抓住武汉事件解决'军内一小撮'问题了。"同一天，林立果之流炮制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署名"红尖兵"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接着，《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声讨"七·二O事件"和"揪军内一小撮"的新闻、社论、评论、文章、图片连篇累牍。从七月二十六日开始至八月二十八日为止，《人民日报》就发表和转载了二十二篇社论，其中有一天竟登了四篇之多，整版都是社论。中央文革还要求新影等制片厂用"最快的速度，最好的拷贝"把《北京支持你》搞出来。八月六日，这部纪录片用专机送武汉首映。所有这些，在我党的新闻史上是从来未有过的。

七月二十七日，林彪、江青一伙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的名义，发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信中说："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开始了！"信中诬蔑我们和武汉人民说："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同一天，林彪亲自主持会议，撤销了我和钟汉华同志的职务。刘丰连升三级，当了武汉军区第一政委。

八月八日，林彪、江青一伙用专机把武汉造反派的头头们和新到职不久的刘丰等人接到北京。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力、吴法宪和黄永胜等人两次接见他们，进行谈话。据他们整理的《中央首长接见武汉造反派代表讲话纪要》，这些"中央首长"说："武汉出现了反革命叛乱，矛盾暴露的充分，武汉军区和专政机构的问题都是在这场大风暴中彻底解决了。""中央对武汉军区、人民武装部，都是彻底解决的方针。武汉的'七·二O事件'是个分水岭，它检验一切组织、一切人的政治态度。""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武汉也要建立一支人民武装力量，由左派掌握，把枪支发给左派。"从七月二十一日开始，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和王力等人还到处发表关于"七·二O事件"的讲话，提出"文攻武卫"、砸烂公检法"和"改组人武部"等其它反动口号，各地小报则大肆宣传，疯狂地煽动"揪军内一小撮"。

七月三十日，蒯大富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召开了一个有各地造反派一百多名头头参加的"目前形势分析会"。蒯大富在会上传达了林彪和王力在天安门上作的黑指示，说：现在要解决军内问题，全国都要注意这个新的动态。同一天，北航红旗的造反派也在武汉传达王力、关锋的黑指示，说文化大革命一年来，地方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差不多都揪出来了，"中央首长"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重心已由地方转向军队，把军内一小撮也揪出来，是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第三个战役"，是两个司令部的最后决战。中央用这么大的决心，这么大的气魄处理陈再道制造的"七·二O事件"就是这个转折的标志。武汉问题的解决，可以说是拉开了序幕，吹响了进军号。八月二日，中央文革接见武汉造反派一个坏头头，要他们向各地派人，介绍和推广他们与军内走资派作斗争的经验。据这个坏头头交代，武汉造反派先后派出了几万人，在全国各地冲击军队，到处揪"陈再道式的人物"。

这场"揪军内一小撮"的反革命浪潮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徐向前、徐海东、王任重、彭绍辉等同志被打成"七·二O事件"的"黑后台"，徐帅和徐海东同志的家多次被抄。许多军队负责同志被批斗监禁，惨遭迫害，甚至连一些公社和大队的人武干部、民兵干部，也被打成"陈再道式的人物"，不能幸免。湖北、河南因为"七·二O事件"大揪"四个一小撮"(党内、军内、公检法内、百万雄师内)，后果就更为严重了。独立师被打成"叛军"，林彪亲自下令取消番号、代号，撤离武汉整训改编。在东湖宾馆多年担任警卫毛主席任务的部队，竟被刘丰、张昭剑等人武装押送到农场。据湖北省委统计，全省在"七·二O事件"以后被打伤打残打死的干部、军人、群众多达十八万四千余人，仅武汉市就被打伤打残六万六千多人，被打死六百多人。如果算上林彪、江青一伙在一九六八年、一九六九年挑动造反派之间进行武斗的伤亡人数，那就更加骇人听闻了。

八月九日，林彪针对武斗升级、"全面内战"的局势，总结出"打"的"四种情况"（好人打好人、坏人打坏人、坏人打好人、好人打坏人)，说什么"代价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是最大最大最大"，否则，"反动的东西就不能暴露"。林彪、江青一伙愚弄和残害干部群众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一九六七年，林彪、江青一伙先刮"一月风暴"，后"揪军内一小撮"，打倒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阴谋得逞之后，他们又借成立"革命委员会"和召开党的"九大"的机会，把一大批死党、亲信和打砸抢分子安插在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在组织上形成反革命帮派体系，从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一场持续多年的空前浩劫。

丢车保帅

中央文革在开会研究"七·二O事件"宣传口径时，康生对"揪军内一小撮"叫得最凶。康生说："为什么不能提军内一小撮?"第二天，也就是七月二十五日，康生告诉王力，说他打电话给汪东兴请示了毛主席（在上海)，毛主席同意开"欢迎大会"，也同意"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八月一日《红旗》杂志两篇煽动"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是关锋主持起草，王力看过以后由陈伯达签发的。八月中旬，毛主席批示，说这两篇社论是"大毒草"。同时还在林彪送审的一份要下发部队的文件上划掉了多处"军内一小撮"的字样，并且批示："不用"，退给了林彪。消息传来，林彪、江青一伙慌做一团。叶群把毛主席退回来的文件，悄悄地锁进保险柜，然后叫林立果给江青写封信，说"红尖兵"文章中"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原来是没有的，后来是别人加进去的。江青和康生则把责任推到陈伯达身上，说社论是陈伯达签发的，主要怪陈伯达。八月下旬，毛主席要追究责任。江青说：不能错误人人有份，不能怪陈伯达。她把责任都推给王力等人。康生更是出尔反尔，赖得一干二净。他说请示毛主席时，毛主席只同意开"欢迎大会"，根本就没有同意过"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揪军内一小撮"是王力等人私自提出来的。就这样，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串通一气，把王力、关锋、戚本禹打成"变色龙"、"小爬虫"，关进了监狱。小野心家、阴谋家罪有应得，大野心家、阴谋家却蒙混过去了。

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期间，江青在广州见到钟汉华同志时，恬不知耻地说"我对不起你，我也是上了林彪的当，他是副主席，他上了天安门，我也跟着上了天安门。林彪当时是想一箭双雕，通过'七·二O事件'，既打倒陈再道同志，又谋害毛主席。请你转告陈再道同志，向他道歉。"江青以为，用这几句话，就可以把她和林彪互相勾结的一段肮脏关系一笔

勾销。但是，历史是无情的，不干好事的人，那怕把自己说得再清白，也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

结　束　语

一九六七年的“七·二O事件”，是人民群众起来反对林彪、江青之流的革命行动，它遭受了残酷的镇压。林彪、江青一伙反革命之所以能够为所欲为，原因很多，但归根到底，是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制度太不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太不健全。经过十年浩劫，我们的党和人民有了血的教训，在政治上成熟起来了，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愚弄人民、残害人民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有了这个最基本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是一定能够成功的！

最后还必须说明一下，我在本文里点到的一些造反派组织，其中除极少数象朱鸿霞、胡厚民这样的坏人外，大多数群众在当时是受蒙蔽的。我希望并且相信，在新长征的道路上，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湖北人民，一定能够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努力奋斗！

（作者是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原载《中国老年》总第1——5期）

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节录）

——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

《红旗》杂志社论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前进的大好形势下，我们以自豪的心情来纪念建军节，纪念我们伟大中国人民解放军光荣的战斗的胜利的历史。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伟大军队，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真正掌握在人民手里的举世无双的最强大的革命军队。

一九二七年八月，在国民党完全叛变革命之后，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战胜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条件下，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九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的基础上，亲自领导农民暴动，举行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秋收起义，创立了井冈山根据地。中国人民开始了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的武装斗争，开始有了一支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

“红旗卷起农奴戟”。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的伟大进军，在中国革命史上和我军的建军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开辟了无产阶级先锋队深入农村，领导农民进行武装斗争、建

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

毛主席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光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天才发展。它不仅为中国人民开辟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而且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指出了争取真正解放的康庄大道。

中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一切反革命修正主义者一样，一贯反对武装斗争，鼓吹议会道路，大搞投降主义。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无耻地吹捧蒋介石是"革命的旗帜"，主张把人民军队交给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去"领导"。抗战胜利以后，他公然主张把人民的军队拱手送给国民党反动派。

毛主席彻底批判了不要人民军队、不搞武装斗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中国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坚持武装斗争的道路，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国家。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毛主席创立了最完整、最科学、最伟大的军事学说。毛主席在古田会议决议和其他一系列的军事著作中，制定了一条真正无产阶级的军事路线。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思想的最高峰。这是世界革命人民战胜帝国主义和一切阶级敌人的最强大的武器。

毛主席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这是中国无产阶级和世界无产阶级用鲜血换来的经验总结。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这个真理正日益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人民、被压迫的民族所掌握。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许多地区的革命人民，正在奋发起来，踢开机会主义的领袖，勇敢地拿起枪杆子，建立人民的军队，开展武装斗争、大造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反，大造以苏共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反，同旧世界进行英勇顽强的大搏斗。

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集中地表现为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资产阶级搞复辟，一定要抓军队，抓枪杆子。无产阶级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粉碎资产阶级复辟阴谋，也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牢牢掌握军队。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还有失去政权的危险；同样，建立了军队以后，仍然有失去军队的危险。如果失去了军队，军权被坏人所篡夺，那么，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所争得的一切，就会全部丧失。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军权，实行反革命政变，就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总代表。彭德怀、罗瑞卿是他在军队里的代理人。彭德怀是个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军阀，几十年来，他一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反对毛主席。在历次两条路线斗争中，他总是站在机会主义方面，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九五三年，他和高岗、饶漱石一起，结成彭、高、饶反党联盟。一九五九年，他又是党的庐山会议揭露出来的反党集团的头子。罗瑞卿也是一个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同彭德怀、彭真勾结在一起，反对毛主席，顽固地执行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无耻地吹捧人民公敌蒋介石是抗日战争的"最高统帅"。全国胜利以后，他们进一步勾结起来，拼命抓枪杆子，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妄图使人民的军队变成反革命复辟的工具。

毛泽东思想是我军的灵魂，是我军战无不胜的指南，是我军永不变质的根本保证。彭德怀、罗瑞卿之流为了改变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为了篡夺军权，首先把矛头指向毛泽东思想。彭德怀恶毒地攻击说"毛主席著作只能作参考，不能作为指导作战、训练部队的指针"。罗瑞卿胡说什么把毛主席的话当作最高指示"不符合我们国家的体制"。他还大肆推销党内最

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修养》，吹捧这本书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要全军干部战士"好好学习"。

彭德怀、罗瑞卿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支持下，在军队里培植私人势力，树立个人威信，招降纳叛，结党营私，里通外国，阴谋篡党、篡军。彭德怀搜罗一小撮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投机分子、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的旧军官等牛鬼蛇神，结成反党集团、反革命的"军事俱乐部"。罗瑞卿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等，结成反党阴谋集团。他们私自封官许愿，拉一批，打一批。他们做尽了坏事。他们力图在军队里搞反动资产阶级的独立王国。这一小撮人处心积虑地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伟大统帅毛主席，反对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林彪同志。

总之，中国赫鲁晓夫在军内的代理人彭德怀、罗瑞卿这些家伙，力图用反革命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一套来改造我们的军队，篡夺军队的领导权。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枪杆子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的国家就要改变颜色，我们就会亡党、亡国、亡头。

在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革命军队的斗争中，在反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彭德怀、罗瑞卿等篡军阴谋的斗争中，林彪同志作出了极为卓越的贡献。

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事实证明，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干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人民解放军要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积极参加大批判，彻底清除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军内散布的恶劣影响。这将进一步巩固毛泽东思想在军队中的领导权，进一步加强我军的政治思想建设，进一步促进全军的思想革命化。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解放军广大指战员，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满腔热情地，全心全意地支援左派广大群众，支援工业，支援农业、进行军管、军训等工作，为人民作出了新的伟大贡献。

有的地方，当地驻军的某些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只要认识错误、检讨错误、改正错误，还是属于认识问题。犯了错误不要紧，改正了就好了，改正了就会得到群众的谅解，就会得到群众的拥护，而自己也就可以从错误中汲取教训，增强免疫力。如果有人坚持不改，那就不是认识问题了，错误的性质也要起变化。

人民解放军、广大革命群众，要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拥军爱民**的战斗号召。人民解放军要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要善于采取各种适当的方式，听取革命群众的意见和批评，不断地改进支左工作。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相信、依靠和爱护人民解放军，全力支持人民解放军的革命行动。对于当地驻军某些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要采取实事求是的、与人为善的态度，帮助他们改正。在支左工作中，军队和革命群众之间的矛盾，要严格按照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处理，而不要无根据地无限上纲，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在毛泽东思想的照耀下，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是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胜利的重要保证。大家都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原载《红旗》杂志 1967 年第 12 期）

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

《人民日报》社论

一年前的今天，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重要日子。

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里写道：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这张大字报，以集中的火力，炮打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张大字报，揭露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在党内，有个隐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张大字报，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进军的号角。

《炮打司令部》这张大字报，使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豁然开朗了。原来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存在着两个根本对抗的司令部。一个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个是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两个司令部的对抗和斗争，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之间极其尖锐、极其复杂、极其深刻的斗争的集中表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曙光从地平线上一升起，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他们的反动阶级本能出发，预感到这场革命敲响了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覆灭的丧钟，他们就拚死拚活地进行疯狂的挣扎。

长期隐蔽在党内的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最危险的敌人。他们打着红旗作掩护，埋伏在毛主席的身边。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妄图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活动，上层下层都有，上层是主要的。最大的危险就出在上层。苏联出现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全国很快就变了颜色。前车之覆，不可不鉴。

隐蔽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是由一小撮混进党的高级领导机关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相互勾结拼凑而成的，他们是窃取实权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他们掌握了一部分国家机器，一部分党权，一部分政权，一部分军权，在很大的程度上掌握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有权有势的头面人物。其他如彭德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文的、有武的，有抓党权的，有抓笔杆子的，有抓枪杆子的。总之他们的手伸得很长，凡是搞反革命政变、推翻无产阶级的政权所

需要的一套，都拼命去抓，抓住不放。对于这样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如果我们无产阶级丧失警惕，麻木不仁,任其存在，听其发展，那就会象毛主席所尖锐指出的,“不要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我们最伟大的天才领袖毛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在我国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的关键时刻，尖锐地、深刻地洞察了党内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全部颠覆阴谋，准确而及时地捉住了他们的反革命黑手。

毛主席研究和总结了我国和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特别是吸取了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惨痛的历史教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下而上地动员亿万群众，揭露和打倒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措施，就是要彻底摧毁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就是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个地区、各部门的代理人，就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最伟大创造和最新发展。

经过天翻地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无产阶级革命派拉下了马。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被无产阶级革命派打得七零八落了。但是，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区、各部门的代理人，他们还在利用力所能及的影响，蒙蔽一部分群众，纠合保守势力，进行疯狂的反扑。最近在武汉地区发生的严重政治事件，就是一次大暴露。

党中央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动员起来，集中火力，集中目标，进一步深入地、广泛地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展革命的大批判。

我们必须懂得，资产阶级司令部在组织行政上的指挥权，已经被剥夺了，但是，他们长期以来所推行的一整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流毒很深，影响很广。如果不把革命的大批判进行到底，以中国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可能死灰复燃，还可能利用他们政治思想上的影响继续地毒害人民群众，与无产阶级司令部相对抗。现在，这些顽固的阶级敌人不是还在负隅顽抗，疯狂反扑吗？因此，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批深、批透、判倒、批臭，这就是给资产阶级司令部最彻底、最致命的摧毁。

我们必须懂得，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战斗，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绝对领导下进行的。这就要求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定不移地紧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紧跟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紧跟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每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都应当在革命的大批判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纳人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真正做到毛主席指到哪里，就战斗到哪里。

无产阶级革命派要联合起来，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团结广大革命群众，为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而建立新的伟大功勋，把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谢富治关于砸烂公、检、法的讲话[1]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

这个文化革命的历史很有意思，在去年，从文化革命开始，一直到今年一月风暴以前，大多数公、检、法机关都是死保当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

那么多的公安机关为什么老是支持保守派不支持造反派？这个根源，要归到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罗、陆、杨，特别是彭、罗。整个十七年来的公安工作，当然不能说所有事情都没有按照毛主席思想办，但相当多的是没有按照毛主席思想办的，这方面没有彻底革命，没有彻底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思想去办。毛主席思想在我们公安政法系统没有占到统治地位，没有树立起绝对权威。所以文化革命一年多了，始终跟不上毛主席思想，不把原来那一套政治、思想、理论、组织方面的坏东西彻底砸烂，就永远跟不上毛主席思想。

有些人迷信公安机关，我才不迷信，无非是搞黑名单、抓人，当然不是所有的公安机关。现在公安机关如果不彻底改变，不把旧机器彻底打碎，要转变过来是困难的，你推翻一层，搞一个勤务组，还是一样。当然我们公安部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林副主席身边，中央文革的身边。

今天讲话用什么小报，非正式的报纸，给下边送一些去。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

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切实保障铁路运输的畅通，现决定派出部分国防军部队担负护路任务。部署如下：

一、任务区分[2]

二、铁路系统已实行全面军事管制，国防军担负护路任务后，对原铁路局、分局的军管会和站段的军管小组，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整或改组，以便更好地实施统一指挥和领导。

为了密切配合，共同完成维护铁路交通秩序的任务，各站段的铁路公安人员，统归所在站段护路部队指挥。

---

① 这是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讲话的节录。

② 这一部分内容从略——编者。

三、担任护路任务的部队，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力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决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广泛深入地宣传和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坚决维护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的命令》和有关方针政策、命令、指示和规定，保证革命和生产双胜利。

四、铁路、交通运输部门的群众组织和革命职工，与铁路、交通运输系统以外的群众组织之间一律不许互相冲击。铁路、交通运输部门的群众组织，除中央特许者外，暂不参加本单位以外的群众联合组织，但可参加本地区的联合的政治活动，如革命的大批判。

外地、外单位的群众组织在铁路、交通运输部门设置的联络机构，必须撤出。铁路、交通运输部门各单位的群众组织之间，也不要互相设置联络机构。

命令的第四条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单独公布、张贴。

已阅，同意。　　　毛　泽　东　　　八月七日下午六时

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

一、湖南省军区党委常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对前段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批评，态度是好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军区打击“湘江风雷”革命群众组织，压制“工联”等革命造反派的错误，军区党委常委刘子云、政治部副主任崔琳等同志应负重要责任。除了军区负责之外，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省军区二月三日关于“湘江风雷”报告所发的“二·四批示”是错误的，“湘江风雷”是一个群众人数较多的革命组织，在大发展中混入了极少数的坏人，造成内部成份不纯，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但是不应该因此否定这个组织。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有责任的。从这里得到教训，未经调查清楚，何必那样匆匆忙忙地根据一面之词发出“二·四批示”呢？因此，中央要负主要的责任。中央相信，中央和省军区在深刻地检查并认真地改正错误以后，将会赢得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和拥护，省军区将能更好地完成“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

二、中央已经决定改组省军区，并将着手成立以黎原、华国锋、章伯森等同志为首的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

三、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基础上加强团结，开展革命的大批判，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工农业生产任务。

各革命群众组织必须警惕敌人挑拨离间、制造分裂、挑起武斗、破坏革命大团结的阴谋；应该开展内部整风，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克服无政府主义倾向，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革

命的大联合。

对于受蒙蔽的群众，决不能打击报复，一定要遵照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积极地耐心地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欢迎和支持一切受蒙蔽的群众起来革命，争取和团结受蒙蔽的群众，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

四、湖南省赴京汇报代表团双方签订的《关于立即坚决制止武斗协议》很好。各群众组织必须认真执行，坚决制止武斗，反对挑动农民进城和工人、学生下乡搞打、砸、抢、抄、抓等活动，严防地、富、反、坏、流氓分子捣乱破坏。

各革命群众组织应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建立群众性的革命武装，保护国家财产，协助解放军维护社会的革命秩序。不管哪一派，今后都不准以任何借口夺取解放军的枪枝、抢劫军火仓库和各种军用物资。

此件看过，照办。 毛 泽 东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

中共中央关于
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

(一) 江西省军区及部分军分区的某些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违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保守派，镇压了革命派，并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切断交通。例如：在南昌，军分区某些人大发枪弹给保守派（联络总站），打死打伤大批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筹委会）。在赣州，军分区个别领导人支持了保守派，对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进行了武装镇压。为此，中央决定改组江西军区，任命程世清同志为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杨栋梁同志为江西军区司令员，并调温道宏同志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原江西军区吴瑞山等同志，应对所犯错误向革命群众作认真的检讨。

(二) 目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支左部队正陆续进驻江西各地。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江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关怀。中央号召江西省的革命造反派、各群众组织和广大群众，高举拥军的旗帜，坚决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江西的支左部队，协助他们完成"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坚决揭露和制止保守组织中个别头头煽动攻击、殴打、绑架我支左部队指战员的错误行为。军区及军分区广大指战员，应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革命利益为重，坚决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立场上，主动地同进驻江西的兄弟部队紧密合作。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检查和改正了就好。要高度警惕一小撮坏人挑动宗派情绪、挑动部队之间的斗争、制造事件的阴谋。

(三) 中央决定着手成立以程世清同志为主要负责人的"三结合"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参加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名单由各方面协商产生，报中央批准。杨栋梁、温道宏，鲁鸣、罗元炘、陈昌奉等

同志，以及黄先、刘瑞森、郭光洲等同志，可先参加筹备小组，并开始工作。筹备小组统一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并为成立革命委员会准备条件。

(四) 各革命组织及江西省广大革命群众，应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下，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对准中国的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准省内方志纯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从政治上、思想上，肃清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保证铁路等交通运输的畅通，保证完成今年的工农业生产任务。

(五)"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委会"及"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总站"双方，应坚决执行制止武斗的协议。各革命组织及群众组织应当进行内部整风，大力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批判和克服一切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思想。参加保守组织的受蒙蔽的群众，要勇于揭露和改正错误，端正方向，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大联合筹委会"方面的革命造反派，对于受蒙蔽的群众，要按照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摆事实，摆道理，进行耐心的、细致的、具体的思想政治工作，热情帮助和欢迎他们提高觉悟，投入革命的行列，决不可采取打击报复、歧视排斥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孤立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革命的大批判中，逐步做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实现以革命派为核心的革命的大联合。

(六) 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条件成熟的地区，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目前首先在南昌、赣州两地，准备研究实行。革命的群众武装，是协助人民解放军保卫国家财产、维护革命秩序、制止坏人杀害左派群众的强大力量。今后，军分区、人武部，决不准以任何借口把枪支弹药发给或变相发给保守派；各派都不准以任何借口夺取解放军枪支、抢劫军火仓库和各种军用物资。

青海高原的凯歌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

《人民日报》社论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下，在亿万革命群众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大批判大斗争高潮中，宣告成立了。这是"一月革命"风暴以来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一个新的伟大胜利。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青海高原上的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

青海省以"八·一八"左派组织为核心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了从青海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经历了激烈、紧张的阶级搏斗的严峻考验。他们高举毛泽东思

想伟大红旗，在青海地区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曾经在一些艰苦日子里，顶着阻力行，迎着风浪上，终于从阶级敌人手中，把党、政、财、文大权胜利地夺了过来。青海省无产阶级革命派，不愧为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钢铁战士。

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勇保卫者，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强大后盾，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最坚强的柱石。青海地区的人民解放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一边，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坚决地不折不扣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切指示，旗帜鲜明地支持和保护无产阶级革命派。青海地区的人民解放军，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青海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曾经出现了反复。这看起来仿佛是坏事，实际上是大好事。因为这样一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更加暴露了，革命方面也表现出来了，阵线分明了。事情的规律往往是这样，在一定的条件下，坏事变成了好事。经过反复，问题就看清楚了，就解决了。矛盾越是充分暴露，就解决得越彻底。青海的事情就正是这样。

青海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证明，只要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就能无往而不胜。

青海的经验告诉我们，坚决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是夺权斗争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保证。青海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中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又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巩固了革命的大联合。这就保证了他们的夺权斗争，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

青海的经验告诉我们，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取得胜利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毛主席说：“**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青海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中形成了革命的“三结合”，又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巩固了革命的“三结合”。这就保证了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为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

青海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大批判、大斗争。这种大批判、大斗争，在推进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的时候不能放松，在夺权斗争中不能放松，在掌权和用权的过程中也不能放松。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青海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充分发挥革命的领导干部的核心骨干作用。在青海省的夺权斗争中，一批革命的领导干部站了出来，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同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他们在革命的大批判中，进一步亮了相。毛主席说：“**老干部过去有功劳，但是不能靠吃老本，要很好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锻炼改造自己，要立新功，立新劳。**”青海省的革命干部，正是按照毛主席这个教导做的。

青海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模范地执行党中央的政策。争取、教育受蒙蔽的群众，帮助他们转变过来，迅速地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这是党的一项重要政策。青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受蒙蔽的群众，不搞人人过关，不搞打击报复。而是以对革命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耐心细致地、一个一个地帮助教育受蒙蔽的群众，使他们在大揭发、大控诉、大批判、大斗争中提高觉悟，反戈一击，共同对敌。

青海的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青海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所开辟的航道上，进入了新的伟大的航程。青海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在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同时，狠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实现思想的革命化。这样，才能为无产阶级掌好权，用好权，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创造出一个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红彤彤的新青海。

已阅，照办。　　　毛　泽　东　　　八月十六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给煤炭工业战线职工的信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你们同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同时，你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在煤炭生产战线上，也取得了成绩。你们不愧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强战士！

正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大决战的关键时刻，一些地方和矿区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甘心自己的灭亡，还在垂死挣扎，他们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蒙蔽一部分群众，挑起武斗，制造白色恐怖，捣毁设备，大搞停工停产，妄图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对此必须高度警惕，坚决粉碎阶级敌人的这个阴谋。

“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十六条”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煤炭工业战线上的革命派，一定要不折不扣地执行毛主席的这个最高指示，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煤炭是工业的粮食。煤炭生产，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到工农业生产，关系到城乡人民生活，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行，关系到实现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决策。煤炭工业战线上的革命派，要以国家主人翁的高度责任感，顾大局，识大体，坚决把煤炭生产促上去。

党中央号召你们：

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批深、批透、斗倒、斗臭。同时，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意见分歧，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四大”的方法和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去解决，决不能用压服和武斗的方法去解决。

正在武斗和停产的煤矿，应当立即停止武斗，恢复生产。离开生产岗位的职工同志，应立即返回原单位参加生产。在矿职工应该热情欢迎他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职工，必须把国家利益、工人阶级利益放在第一位，决不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凡是坚持下井，坚持生产，作出成绩的职工，不论属于那个群众组织，或者未参加组织，都应当给予表扬和适当奖励。

一切受蒙蔽的群众和犯错误的干部，应当迅速觉醒,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同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在“抓革命、促生产”中立新功。

党中央号召你们，坚持“上井搞好革命，下井搞好生产”，坚持“就地闹革命、业余闹革命、节约闹革命”。坚持八小时工作制,生产时间不离开生产岗位，不在生产岗位上搞辩论，不因观点分歧而影响生产，要自觉地遵守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保护国家财产，发展煤炭生产，鼓足革命干劲，多快好省地完成国家计划。

当前，一个以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为中心任务的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正在兴起。煤炭工业战线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职工，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革命的大批判中，积极地推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切实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援下，为夺取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奋勇前进!

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起来!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联合起来!

祝你们在抓革命促生产中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此信可以在煤矿中张贴，并散发。)

走社会主义道路，
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

《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

当代的中国，是世界矛盾的焦点、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

中国向何处去？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不仅是中国政治的根本问题，同时也是关系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问题。

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几十年来，在中国革命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在革命转变的各个关键时刻，在中国共产党内一直存在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一条路线：坚持中国的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行到底，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所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另一条路线：取消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实行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在社会主义

阶段，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就是使中国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的老路上去。这是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一直到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脉相承地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条反动路线最集中的代表。

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决定着中国革命两种截然相反的前途和命运。中国革命，正是在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引下，披荆斩棘，胜利前进的。

这个斗争的本质，就是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斗争的集中点，始终是一个政权问题，也就是由哪个阶级来实行专政的问题。

（一）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民主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纲领的集中点，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纲领的集中点，是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在他的伟大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劈头提出的问题就是：**中国向何处去?**他在这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著作中，全面地、深刻地、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历史经验，科学地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并且彻底地指明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他说：**“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

毛主席严厉驳斥了那种妄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谬论。他明确指出：从中国的国际国内环境来看，如果有人梦想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只能是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依然使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变成帝国主义反动世界的一部分。毛主席痛加驳斥的，不仅是早已臭名昭著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王明，而且也是现在被揭露出来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一个老牌的机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是混入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早在二十年代初期，他的论调就同叛徒陈独秀的论调一模一样。他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派，说什么实行夺取政权，“以中国现在的情势看来，这样幼稚的无产阶级当然说不上马上就拿来实行。既是很远的事实，也用不着说很多的话来讨论它。”(1)

“四·一二”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不久，他又在武汉直接追随叛徒陈独秀，勒令工人纠察队向国民党交出几千枝枪。并且亲自到国民党中央工人部召集的会上，去报告所谓“湖北全省总工会自动解散工人纠察队之意义和经过。”(2)

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以后，他又跳出来，直接攻击毛主席，同《新民主主义论》大唱反调。他竟然吹捧蒋介石是“革命的旗帜”；还说“我以为中国革命能在国民党三民主义这面旗帜下进行，至少是民主革命这一段，要比用其他的旗子顺利得多”(3)。他恶狠狠地说：“我们为什么不说是实行三民主义，而硬要另搞一套呢?”(4)这个老机会主义者，在这里，赤裸裸地暴露出他反对革命，出卖革命的叛徒嘴脸!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美帝国主义利用它的走狗蒋介石，企图把中国变成它独占的殖民

地。这时候，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正在进行着殊死的斗争，这是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政权的问题以更加尖锐的形式，提到了无产阶级面前。毛主席及时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这一点。他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篇光辉的讲演中，指出："**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这个时期如果有机会主义的话，那就是不力争，自愿地把人民应得的果实送给蒋介石。**"毛主席还指出："**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

毛主席在这里批判的机会主义的代表，不是别人，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老机会主义者，在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的历史关头，又一次系统地提出他那反对革命、出卖革命的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路线。他鼓吹"中国革命主要斗争形式已变为和平的、议会的，斗争是合法的群众斗争和议会斗争"[(5)]。要我们党向蒋介石完全交出军队，交出武装，"成为国军、国防军、保安队、自卫队"，在军队中"取消党的组织"，要我们党"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指挥，统一于国防部"[(6)]（按：即国民党的国防部）。他就是想用这一套，向蒋介石献媚，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他恬不知耻地说：要"会作选举运动，要大家投你的票"，"我们成为政府党（按：指国民党政府的政府党）之一，不是在野而是在朝了，有些人要去作官。中央政府的官，一九二七年作过，人家一打取消了，这次作不会一打取消的"[(7)]。这真是一语道破了他内心的秘密！

无产阶级的叛徒右翼社会党人、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考茨基之流，都是以鼓吹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出卖无产阶级的利益，来充当资产阶级反动政权的装饰品和帮凶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他们是一路货色！如果说还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在当时中国的无产阶级已经有了一百二十多万军队，并且已经在一亿三千多万人口的地区内建立起人民政权的时候，还要把人民的政权、人民的军队双手交出去。这种大投降，大出卖，就更加卑鄙，更加恶毒！

正当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抗日战争胜利果实进行大出卖的时候，在法国、意大利就有这样的"共产党"的头头，例如多列士、陶里亚蒂之流，在那里以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胜利果实同资产阶级作政治交易，他们向资产阶级交出几十万枝枪——无产阶级的革命武装，来换取资产阶级国家"副总理"之类的一官半职，成了历史的罪人！在这历史转折的关头，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告诉我们："**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顶住了国际范围内投降"交枪"的逆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派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显示了无限威力。

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军队，正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沿着正确的方向，紧握枪杆子，冲破一切阻力，在革命大道上胜利前进，终于赢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历史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作出的无情判决！

(二)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历史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由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推进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时，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是：刚刚建立起来的新中国，究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斗争，归根到底，是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前夕，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这篇光辉著作中，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

随后，毛主席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讲话中又指出：**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在这样一个新的大转变的时候，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一次跳了出来，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他猖狂地为发展城乡资本主义而奔走呼号。他提出"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的口号[(8)]，胡说什么"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太少了"；"要发展资本主义剥削，这种剥削是进步的"；[(9)]"剥削的越多功劳越大"，"这个历史功劳是永垂不朽的"[(10)]！他主张在农村发展和长期保存富农经济。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已经彻底破产后，仍然提出了一条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路线。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竭力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说什么："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11)]。要花二十年、三十年，时间说法不一，反正要和资本家合伙几十年，先实现工业化，再搞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将来工业化了，工厂多了，出产的东西也就多了，那就要搞社会主义了。"[(12)]总之，"将来到中国的工业生产过剩的时候，就是要搞社会主义的时候"[(13)]。好一个"工业生产过剩的时候"!工业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的特征。这里，一语道破了他发展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事实上，他这一套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正是苏联建国初期被列宁、斯大林粉碎了的托洛茨基、布哈林、李可夫等老修正主义者的"生产力论"的破烂。他根本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和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发展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根本否认工农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他眼里只有那些资本家先生们，一心要依靠他们去建立"永垂不朽"的"功绩"，建设他的"理想国"！

他所说的"社会主义"又是什么呢？请看他下面的这段奇文："现在，在新民主主义当中，你们这些资本家可以充分发挥你们的积极性，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候，怎么办呢？上次我对宋棐卿先生（按：天津东亚毛纺织厂经理，顽固的反革命分子。解放后被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吹捧上天，不久，即逃往国外）谈过，我说：'你现在才只办一个厂子，将来你可以办两个、三个……办八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国家下个命令，你就把

工厂交给国家，或者由国家收买你的，国家一时没有钱，发公债也行，然后，国家把这八个工厂还是交给你办，你还是经理，不过是国家工厂的经理，因为你能干，再加给你八个厂子，一共十六个厂子交给你办，薪水不减你的，还要给你增加，可是你得要办好啊！你干不干呢？'宋先生说：'那当然干！'将来召集大家来开个会，讨论怎样转变为社会主义，大家一定不会皱着眉来，一定是眉笑眼开的来开会。"[14]

妙极了！资本家这只手把八个工厂卖给国家，那只手又从国家那里赚得十六个工厂，这就叫做"社会主义"！当时，一群资本家果然"眉笑眼开"地说："从前共产党的底，一点也摸不到，现在摸到一点底了。"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奴颜婢膝地对他们说："我给你们摸，你们要什么样的底，我就给你们什么样的底"[15]。这真是拱手作揖，送货上门！新老修正主义者不是都说什么要"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吗？这就是一个活龙活现的标本。他们倒是千真万确地"长入"了资本主义！这个"长入"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头号代理人的丑恶面目，不是自我暴露得淋漓尽致了吗？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掩人耳目，也曾经假惺惺地说过无产阶级专政的词句，但是他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假无产阶级专政，真资产阶级专政。

他极端仇视工人阶级，叫嚣什么"工人阶级也是有不可靠的。""不要以为依靠工人阶级就没有问题"[16]。他一笔抹煞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以限制和反限制为主要形式的阶级斗争，公然叫嚷："七八年内不要限制,对国家、对工人、对生产都有利"[17]。大肆宣扬："从原料到市场，由国营私营共同商量，共同分配"，"有钱大家赚"[18]。他还公开号召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作"斗争"，说："你们必须要和工人斗争，如果不斗，将来你的厂子被工人斗垮了台，那时你就不能怪共产党不好"[19]。看，在他的心目中，工人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竟然不是要对付资产阶级，而却要对付工人阶级。他还公然说什么"今天我们不要一个阶级的专政，我们要代表全体人民"[20]。这难道不是彻头彻尾地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吗？

他疯狂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破坏农业合作化，诬蔑带头要求组织起来的贫农不过是破了产的"不能去单干的贫农"[21]；诬蔑要把农业互助组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主张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22]。他伙同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砍合作社，先后砍掉农业生产合作社二十万个。他还恶狠狠地说："什么是放任自流？雇工，单干，应该放任自流，让他都有三匹马一副犁就很好，对于不让雇工不让单干的不能放任，对去干涉有三匹马的不能放任。"[23]就这样，他只许富农有发展剥削的自由，不许贫下中农有组织起来互助合作的自由，妄想把广大的农村变成富农的天下，变成资产阶级反抗无产阶级的阵地。

政权，从来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如果这个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政权不去发展社会主义，却去发展资本主义，不去限制资产阶级，却去限制无产阶级，不去限制富农，却去限制贫农，不去同资产阶级作斗争，却去同无产阶级作"斗争"，从而根本放弃它应有的镇压资产阶级反抗、捍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职能。这样，新中国政权的性质不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吗？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南斯拉夫那样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三）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是不是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究竟应当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还是要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这是一个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没有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在这个历史转折的又一关键时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这些划时代的光辉文献，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科学地、系统地、深刻地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崭新的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毛主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却极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胡说什么：在我国再也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了，“资本家、地主、富农都将进入社会主义”[24]。“以后，革命斗争也没有了，土地改革也没有了，社会主义改造也没有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现在再没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给我们消灭了”[25]。

什么“阶级斗争熄灭论”！完全是骗人的鬼话。这同赫鲁晓夫之流用来篡党、篡国的“全民国家”、“全民党”是一路货色，是对无产阶级专政最无耻的、最彻底的背叛！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要在“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烟幕下，麻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向无产阶级发动猖狂进攻，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个时期，有时在台前，有时在幕后，向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猖狂进攻。在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大肆进攻之前，他就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胡说“没有一种绝对好的制度”，“认为只有我们的制度是好的，别的都不妥当的，那是不好的”[26]。他鼓吹资产阶级的“两院制”，说：“政协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一点上议院、下议院的性质”，“不过宪法上没有规定”[27]。妄图把政协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变成资产阶级的上议院和下议院，这和章罗联盟的“政治设计院”完全是一个调调。在一九五九年党的庐山会议上，他积极支持自命“海瑞”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军阀彭德怀，梦想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当彭德怀的问题在会上被揭发以后，他仍然和彭德怀相策应，在暗地里煽风点火，阴谋把原来准备的会议纪要篡改为一个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反“左”文件。后来，他又公开攻击庐山会议，胡说什么：“庐山会议犯了个错误”，“不应反右”[28]，“反右是不对的”，“搞的全国后遗症”[29]。尤其是三年暂时困难时期，他伙同国内外一切牛鬼蛇神，更加疯狂地大搞反革命资本主义复辟。他恶毒地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叫嚷：我们的经济临近了崩溃的边缘，目前“不是大好形势”[30]，“经济失调”[31]，“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工农联盟发生了很尖锐的矛盾”；并别有用心地煽动说：现在农民的心情“不舒畅”，工人的心情“不舒畅”，干部的心情“也不会舒畅”[32]，等

等。他还大肆叫嚷："要有反对派，人民中间也好，党内也好，要有公开的反对派"[33]，这样来为资产阶级的上台准备舆论。他鼓吹"三自一包"，大刮单干风，说什么"工业上要退够，农业上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34]"社会上产生一些资产阶级分子，并不可怕。不要怕资本主义泛滥"[35]。

在国际斗争中，他鼓吹"三降一灭"、"三和一少"，说什么"就是美国，我们也希望同它搞好关系"，还要同美国"发展友好关系"[36]。他还说什么赫鲁晓夫"不可能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赫鲁晓夫反对帝国主义是"真的"，"我们要同他们联合"，"求同存异"，"共同反对帝国主义"[37]。他公然要缅甸共产党放下武器，说："可以不要这些武器，可以埋在地下，或将部队改编成国防军"[38]；和奈温"合作"，"合作干什么？""搞社会主义革命"[39]。

一九六二年八月，他把他那本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教人越养越修的黑《修养》重新抛了出来，成为当时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的一支"主题歌"！

所有这些惊心动魄的斗争事实说明，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被基本摧垮以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每时每刻都在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活动。特别是三年暂时困难时期，他凶相毕露地打出了"要有反对派"、要走回头路的反党黑旗，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战线，全面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给无产阶级政权造成极其严重的威胁。如果按照他的那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搞下去，在农村，就会出现阶级大分化；在城市，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也会大量出现；广大工人和贫下中农就要受"二遍苦"，重新坠入做奴隶、当牛马的苦难生活；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将彻底破坏，无产阶级政权就要根本变质，历史就将重新倒退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老路上去。这是一幅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一九六二年，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吹起了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全面大反击的进军号。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象一只"秋后的蚂蚱"，一天天走向了他的末日！

（四）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告诉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仍然是政权问题。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丰富的历史经验，针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阴谋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事实，亲自发动和领导亿万革命群众，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此，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入了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一次大决战。

在伟大的历史文件——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中，毛主席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毛主席揭露的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正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以他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十七年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什么不断遭到抵制和抗拒？资本主义复辟的暗流为什么

一阵又一阵地泛起？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暗藏着这样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大威胁，是社会主义江山的最大祸害。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敲响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丧钟。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伙同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垂死的疯狂、进行着挣扎，制订并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违抗毛主席的指示，派出大量的工作组，去压制革命的群众运动。在中国的赫鲁晓夫亲自掌握的清华大学和师大一附中，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把一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他批转北京大学工作组的一期简报，把革命事件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并且要全国仿效办理，制造白色恐怖，围剿革命派，挑动群众斗群众，妄图扑灭这场毛主席亲自点燃起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发表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并且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彻底揭露了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宣告了他一手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宣告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又一个伟大贡献。

在伟大统帅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全国广大革命群众掀起了更加波澜壮阔的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终于把这个党内资产阶级头号代理人和他那伙狐群狗党揪了出来。在全国掀起的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中，他们已经陷入亿万革命军民的天罗地网，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庞然大物"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他自己四十多年假革命、反革命的罪恶历史已经作出了无可辩驳的回答。所有这一切、罪证确凿，铁案如山，能赖得了、顶得住、抗得过去吗？"**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人民的伟大节日。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阳光照耀下，无数面红旗的海洋在激荡，亿万群众在战斗，在学习，在批判资产阶级。毛泽东思想成了亿万群众的粮食、武器和方向盘。他们誓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誓保无产阶级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毛泽东思想把亿万群众团结成一支无坚不摧、无攻不克的伟大物质力量，震撼着旧世界，创造着新世界。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几十年间，统帅着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追穷寇，缚苍龙，起宏图，征腐恶，引导着中国革命的航船，冲过激流，绕过暗礁，乘风破浪，胜利前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崭新的毛泽东思想的阶段。

是毛主席，指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必须毫不间断地把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阶段。

是毛主席，指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对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统治下的旧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

是毛主席，指出了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必须坚持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要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

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整个历史

时期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必须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行到底。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就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方向。毛主席开辟的道路，就是全世界革命人民前进的道路。

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历史的车轮，正在沿着毛泽东思想指引的方向，滚滚向前！

(原载 1967 年 8 月 15 日《人民日报》)

注：

(1) 《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日。

(2) 汉口《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七月五日。

(3) 《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问题》，一九四二年十月十日。

(4) 《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问题》，一九四二年十月十日。

(5) 《时局问题的报告》，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

(6) 《时局问题的报告》，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

(7) 《时局问题的报告》，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

(8) 《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四日。

(9) 转引自《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10) 《在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

(11) 《在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12) 《在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

(13) 《在工商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14) 《在工商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15) 《在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

(16) 《对天津工作的指示》，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17) 《在工商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18) 《在工商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19) 《在工商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20) 《对天津工作的指示》，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21) 《对安子文等人的指示》，一九五 O 年一月二十三日。

(22) 《对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批语》，一九五一年七月三日。

(23) 《对安子文等人的指示》，一九五 O 年一月二十三日。

(24) 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三日同外宾的谈话。

(25) 《在上海市党员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26) 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七日同外国人的谈话。

(27)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在人大常委会议上的讲话。

(28) 《在济南军区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四年七月九日。

(29) 《在河北地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四年七月二日。

(30) 《在第十八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31) 《对中央办公厅石家庄和无锡调查组的指示》，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32)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33)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二月八日。

(34) 一九六二年六月的讲话。

(35) 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二日的讲话。

(36) 一九六三年三月六日同外宾的谈话。

(37)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同外国同志的谈话。

(38)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同外国人的谈话。

(39)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日同外国同志的谈话。

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

——纪念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一周年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

《红旗》杂志社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越来越好。广大的工农兵群众，英勇的红卫兵小将，怀着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展大斗争、大批判，掀起了一个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新的革命高潮。在这个革命的新高潮中，全国人民怀着战斗的豪情，来庆祝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一周年。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最伟大的历史功绩，就是进一步大立了毛泽东思想，确立了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决、最彻底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林彪同志，为全党的副统帅，进一步巩固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击败了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全会的文件，进一步系统地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方法和政策，向全国人民指明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胜利道路。这次会议，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关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命运的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司令部同资产阶级司令部激烈斗争的紧要关头召开的；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临被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扼杀的危险时刻召开的。在这个严重时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毛主席在大字报中说：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

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这张大字报，是最光辉的革命文献，是这次会议的指导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总方针。

《炮打司令部》这张大字报，揭开了党内长期存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斗争的盖子，使全党全国人民进一步明白了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和主要任务。

资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组成的，这个司令部的总头目，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就是他们；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彻底打倒他们。

《炮打司令部》这张大字报，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实质，就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毛主席在大字报中揭露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人却反其道而行之，这里所说的"道"，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里所说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人，就是指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一小撮人组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大字报彻底揭露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丑恶嘴脸、并要全党"深醒"。这是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的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战斗号令。

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内，始终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最集中的表现。要防止我们党和国家变颜色，最重要的，就是彻底摧毁这个暗藏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之下，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特别是经过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之后，资本家虽然时刻梦想复辟，但是，无论那一个资本家，已经不可能挂帅。能够挂帅，代表资产阶级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只能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是资产阶级在党和国家领导机关内部的代理人。党内出现两个司令部之间的斗争，这是必然的现象，是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必然的反映。

社会上的资产阶级还有相当大的势力，但是"鸟无头不飞，蛇无头不行"，它的头就是暗藏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是无产阶级的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不摧毁暗藏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整个党和国家势必有一天要改变颜色。苏联、南斯拉夫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最根本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最严重的教训。

毛主席提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暗藏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我们就是对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这一部分进行革命。从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整体来说，他们是不占统治地位的，但是必须打倒他们，才能巩固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理论，是概括了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概括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而得出来的。

在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长期的斗争中，毛主席看穿了他的狼子野心，看穿了他是我们党的大隐患、大祸害。最近几年，毛主席不断向全党发出警告，我们国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种危险，最主要的是来自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

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一九六五年一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第一次明确地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里所说的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大的一个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一九六五年九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主席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指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毛主席说的中央出修正主义，就是指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通知》中进一步指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这里说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到一九六六年八月，即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时，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面目，已经暴露无遗，以他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表演得够充分了。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毛主席高瞻远瞩，以极大的魄力，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下定决心，发动群众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

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是采取自上而下的罢官的做法，不是采取单纯的组织措施，而是放手发动群众，让广大群众起来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

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伟大的革命纲领。十六条的斗争矛头，就是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十六条贯穿的基本精神，就是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猛烈开火，进行一场真正的彻底的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只有放手发动亿万革命群众，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方法，揭露和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才能彻底摧毁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攻克他们盘踞在一些地区、一些部门、一些单位的反动堡垒，把他们窃据的权力夺回来。

《炮打司令部》和十六条，鼓舞了和武装了千千万万的革命群众，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更猛烈地燃烧起来了。亿万革命群众沸腾起来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下的"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一扫而光，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万炮猛轰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局面。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一年来，在七亿人口的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经过一年的大搏斗，无产阶级打了大胜仗，取得了大胜利。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革命面目，已经暴露在广大革命群众面前。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揭露出来了，他们盘踞的反动堡垒被攻下来了。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革命阵线已经全线崩溃。受压抑、遭迫害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由分散到集中，锻炼成为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在一年的阶级斗争的大风浪中，锻炼出大批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新的人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青年一代在迅速地成长着。

这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伟大成果，十六条的伟大成果，这是《炮打司令部》的伟大威

力，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但是，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摆在无产阶级革命派面前的中心任务，就是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的司令部。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和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坚决支持、保卫无产阶级革命派。

我们必须明白，只有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打倒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才能保证我们党和国家不变颜色，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也只有在完成这个任务的斗争过程中，才能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现和巩固革命的三结合，才能很好地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才能完成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斗争，并且真正能够为无产阶级掌好权。如果忘了这个中心的任务，那就是忘记了毛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教导，忘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忘记了社会主义道路，那就会迷失方向，走到邪路上去。

革命的辩证法是不可抗拒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定要被彻底摧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要取得全面的彻底的胜利。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革命小将们！在纪念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和《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一周年的时候，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创建新的功勋而奋斗！

（原载《红旗》杂志 1967 年第 13 期）

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①]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

《红旗》杂志社论

在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展大批判的高潮中，在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大进军中，《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摘要）》的公开发表，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是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国内外阶级斗争空前激烈的形势下召开的。这次会议的最伟大的历史功绩，在于它粉碎了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篡党阴谋，保卫了党的总路线，保卫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正如《决议》所指出的：“坚决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不但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对于保卫党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保卫党的团

①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等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与贡献。

结、保卫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完全必要的。”

在我国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之后，一九五八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国人民在农村中创造了人民公社这一崭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全国出现了蓬蓬勃勃的大跃进局面，社会主义正气高度发扬，资本主义邪气受到沉重的打击。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伟大胜利，激起了国内外阶级敌人最激烈、最卑鄙、最疯狂的反抗。

在这种阶级斗争形势下，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里面的急先锋彭德怀，赤膊上阵了。他纠集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一小撮反党分子，在庐山会议上，向党发起了猖狂进攻。他还抛出了一个所谓的《意见书》，这个《意见书》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纲领。

彭德怀这些家伙，充当了杜勒斯、赫鲁晓夫之流的应声虫。他们恶毒地攻击总路线，是“‘左’倾冒险主义”，大跃进是“升虚火”、“发高烧”，人民公社“办早了”、“搞糟了”。他们把毛主席领导的几亿人民的伟大群众运动，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他们还叫嚷什么政治挂帅与经济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他们所谓“两者并重”，就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政治挂帅，主张钞票挂帅，搞物质刺激。他们还恶毒地攻击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总而言之，他们就是妄图推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推翻人民公社，对大跃进进行反攻倒算，就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妄图把中国拉上修正主义的轨道。

庐山会议所揭露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彭德怀这一伙，完全是一个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篡党篡军的阴谋集团。

《决议》指出，“来自党内特别是来自党中央内部的进攻，显然比来自党外的进攻更为危险”。庐山会议揭露了彭德怀反党集团篡党篡军的大阴谋，夺了他们的权。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最好的学生、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林彪同志主持了军委工作，使军权更加牢固地掌握在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这就大大地加强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彭德怀一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党历史上历次路线斗争中，他都是站在机会主义方面，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十年内战时期，他反对毛主席的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忠实执行李立三、王明的冒险主义、机会主义路线。

在抗日战争时期，他顽固地推行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取消无产阶级领导权、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他还大肆宣扬资产阶级极端虚伪的“自由、平等、博爱”，宣扬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且无耻地吹捧蒋介石是“领导抗战的英明领袖”。在中国人民同民族敌人、阶级敌人进行生死搏斗的抗日战争中，他用这一套来欺骗和愚弄群众，这就充分暴露了他是革命人民的敌人。

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彭德怀的反党活动就更加猖狂了。一九五三年，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刚一开始，他就伙同大野心家高岗、反革命分子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高饶联盟的实际领袖是彭德怀，他们里通外国，搞两面手法，阴谋篡党篡军。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反党活动，正如《决议》所指出的，“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

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

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毛主席的这段话，极其深刻地说明了我们党同彭德怀反党集团斗争的实质。庐山会议以来的阶级斗争进程，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完全证明了毛主席这一天才的科学论断。

庐山会议上的这场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的一次大交锋。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反党活动，实际上是在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支持和包庇之下进行的。彭德怀的反党《意见书》，也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纲领。彭德怀就是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党急先锋。当时，他们认为有机可乘，彭德怀就恶狠狠地冲了出来，而中国的赫鲁晓夫也亲自打起“反左”的旗子，来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经过一番较量，彭德怀反党集团被打败了。中国的赫鲁晓夫看到形势不妙，就连忙掩护彭德怀退却，并且采取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制造混乱，阴谋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一九六O年到一九六二年，由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背信弃义，对我国进行经济破坏，由于遭受自然灾害，我国遇到了暂时的经济困难。在国际上，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结成了“神圣同盟”，又一次掀起了反共、反华、反人民的逆流。在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那班老爷们看来，天快要塌下来了，神州快要陆沉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时机到来了。于是，他们倾巢出动，煽阴风，点鬼火，鼓动牛鬼蛇神，大造反革命舆论。

美蒋反动派的御用文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座上客吴晗，首先披挂上阵，大喊大叫，替彭德怀翻案。在《海瑞罢官》这株大毒草中，吴晗为彭德怀被罢官鸣冤叫屈，说“将我罢职理不公”，吹捧他是“昂然挺立的英雄”，“顶天立地的大丈夫”、鼓励他“不屈服，不丧气”，“失败了再干”，叫喊“有一日再居官重整纪纲”，就是要为彭德怀进行反攻倒算作舆论准备。

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将彭真、陆定一、周扬等人以及臭名远扬的“三家村”狐群狗党，也鼓噪而起，大肆吹捧《海瑞罢官》，在全国鼓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海瑞精神”，为彭德怀翻案，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在这场反革命舆论的锣鼓声中，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总头目、中国的赫鲁晓夫亲自出场了。一九六二年一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公然替彭德怀翻案。他为彭德怀辩护说，彭德怀的反党纲领“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并不算犯错误”。他恶毒地攻击毛主席领导的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错误的过火的斗争”。在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大力支持和鼓励下，彭德怀在一九六二年六月，抛出了一个洋洋八万言的翻案书，在这个翻案书里，他再一次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同中国的赫鲁晓夫一唱一和。

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战斗号召。全国人民在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伟大理论的指引下，奋起迎战，对资产阶级司令部挑起的这场进攻予以迎头痛击。

一九六五年下半年，毛主席亲自抓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毛主席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

德怀也是'海瑞'"。毛主席对《海瑞罢官》的这一批判，不仅打中了《海瑞罢官》的要害，而且打中了整个资产阶级怀念部的要害。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海瑞罢官》打开一个缺口，揪出了"三家村"的后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揪出了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进一步揭开了党内长期存在的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的盖子。亿万革命群众在毛主席的号召下，直捣资产阶级司令部，挖出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及其在各个战线上的流毒，进行了革命的大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破产了。这是我们党的最伟大、最辉煌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四月，伟大的人民解放军过大江的时候，毛主席写了一首气吞山河壮丽诗篇，其中有四句：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在今天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中，我们重读这首诗，感到倍加亲切。我们要进一步发扬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进一步磨砺革命的锐气，团结最广大群众，彻底清算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罪行，彻底清算中国赫鲁晓夫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罪行，彻底摧毁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全面地、深人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倒、批臭。

（原载《红旗》杂志 1967 年第 13 期）

〔附〕 彭 总 之 死

《解放军报》记者　刘从礼

六年前，一位能征惯战、威震敌胆、功勋卓著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德怀同志，惨遭林彪、江青一伙的毒手，含恨与世长辞了。

彭总是怎样被迫害致死的呢?

大概人们还记得，1965 年 11 月 11 日，姚文元在江青的指使下，炮制出了一篇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反革命黑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硬把一场学术问题的讨论同庐山会议的政治背景联系起来，对历史学家吴晗进行了疯狂的诬陷。于是一个险恶的用心便由此引伸而出——他们要抓现代的"海瑞"。

1966 年 6 月 16 日，江青、康生、陈伯达、关锋、戚本禹一伙共同密谋，诬陷彭德怀"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恶狠狠地提出："彻底消除这个隐患"。诡计已定，戚本禹便出来点将。他经过反复筹谋。给北京航空学院"造反派"头头韩爱晶打电话说：现在开展文化革命，中央文革要你们派学生到四川去把海瑞（指彭德怀）带回北京。

这时的彭总，正担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面对林彪、江青一伙的恶毒阴谋，他毫不畏

惧，每天照旧出发到建设工地，辛劳地奔波在纵横几千里的大三线上，一心想抓住有限的一点工作时间，为人民多做些事情。但是，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一天，一群打着中央文革“圣旨”的学生无情地从大三线将彭总抓走了。

1967年2月5日，戚本禹十分得意地写密信向其主子江青报告：“彭德怀现在已经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内即押送北京。北京的学生已经做了斗争的准备。”接着，康生、陈伯达、戚本禹等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北京高等学校和一些群众组织头头开会，布置批斗彭德怀。戚本禹唯恐对彭总斗得不狠，单独找韩爱晶谈话：“彭德怀反对毛主席，应当要他低头认罪，他要是不老实，得对他厉害点，不能对他客气。”

在江青一伙竭力揪斗彭德怀的反革命叫嚣声中，周恩来总理十分担心彭总的身体，尽一切可能来保护彭总。就在江青一伙派人将彭总押送到北京的当天，周总理得知后，亲自指派人给彭总安排食宿，告诉他们要让彭总吃好住好，并做出了对彭德怀“不许武斗，不许游斗，不许逼供信”等指示。可是江青一伙根本不听总理的指示，肆无忌惮地对彭总加以人身迫害。在北航首次召开的批斗会上，韩爱晶等人如狼似虎地扑上去，连续将彭总打倒了七次，前额打破了，肺部受了重伤，刚强的彭总不畏强暴，硬撑着身子又站立了起来。

批斗彭总的第二天，有关人员曾问韩爱晶：“为什么武斗？”

答：“中央文革小组讲，不要武斗，但对群众不要限制过多，不大武斗即可。”

问：“周总理的指示不是向你们传达过了吗？”

答：“总理的指示是过时的，中央文革是最新指示。”

正是由于江青、戚本禹一伙的支持，韩爱晶等人才敢有恃无恐地对彭总进行人身迫害。批斗会上，彭总经常是光着头，脖子上被挂块沉重的大牌子，搞“喷气式”。有时把他拖到卡车上游街，有时十几双手劈头盖脑向他打来，有的用穿着皮鞋的脚往他身上踢。批斗会一场接一场。彭总浑身伤痕斑斑。下面让我们从《关于彭德怀1967年1月7日至1968年2月17日在卫戍区监护期间的动态》中摘抄儿段，看看彭总遭受到的是多么残忍的折磨：

> 自19日参加斗争会后，食宿大大减少，……进屋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未吃饭，不能吐痰。……经医院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
>
> 26日游街回来后，……两个人从车上把他架到屋里，进屋一直在床上躺着，到二十一时零半点左右，起来喝一碗米稀饭，走动时东倒西歪。二十二时自言自语地说“这么还得了啊，今天打得太重了，手扭得太重太痛，手和胳膊都拧坏了，现在不能动。”
>
> 7月27至日30日情况……经常在凳子上扒着箱子静坐，一坐就很长时间，问他为什么总是坐着，他说：“我睡下那腰疼的很，坐着好一点”……

彭总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哪能经得起林彪、江青一伙长期的折磨，不久他被送进了医院。名曰住院治疗，倒不如说给彭总换了间新的“牢房”。病房门口站着看守人员，门窗紧闭，玻璃全部用报纸糊死，屋内凄凉阴暗，彭总身旁空无一人。在与病魔作斗争的日日夜夜里，彭总没有行动自由，想写信，不给笔；想听广播，没有收音机；想找老同事、老战友、老部下谈谈，不允许；把个曾经驰骋万里的彭总，活活囚禁在十几平方米的黑屋子里，孤身只影，只能喃喃自语，面壁长叹。后来，彭总经过手术，病情不但没有好转，而且急剧恶

化，抢救无效。1974年11月29日我们的彭总含恨与世长辞。

奸贼害忠良，冤案终昭雪。今天，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终于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原载1980年12月7日《解放军报》)

《红旗》杂志发表《怒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投降主义纲领》的编者按语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抛出了一个所谓《时局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在我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决战的关键时刻，迎合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蒋介石的反革命需要，散布和平幻想、麻痹人民的革命斗志；反对武装斗争，主张取消我们党对军队的领导，把人民军队交给国民党；鼓吹走阶级合作、和平过渡的议会道路。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的反动纲领，是中国赫鲁晓夫的假革命、反革命、叛徒嘴脸的一次大暴露。

现在，本刊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海军、第二炮兵部分指战员批判《时局问题的报告》的发言，加以整理选编，发表在这里。

(原载《红旗》1967年第13期)

《红旗》杂志发表《彻底批判复辟资本主义的"三自一包"》的编者按语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三年经济困难期间，阶级斗争极其尖锐的关键时刻，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拚命鼓吹的"三自一包"，就是他伙同国内外阶级敌人向无产阶级发动的一次猖狂进攻。

"三自一包"瓦解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使资本主义自由泛滥。它违背广大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反映了极少数地主富农和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要求。

“三自一包”同苏修统治集团在苏联农村大力推行的那一套发展新富农的政策完全是一路货色；是中国的赫鲁晓夫长期以来鼓吹发展富农经济、疯狂反对合作化、反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革命政策的继续，是他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三自一包”是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

广大贫下中农，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以阶级斗争为纲，高举总路线伟大红旗，煞住了“三自一包”的黑风，击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人民公社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得到了新的跃进，社会主义事业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山东省即墨县兰村公社的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用铁的事实，戳穿了“三自一包”的画皮，打中了中国赫鲁晓夫的要害。下面，是他们的一个批判会的纪要。

(原载《红旗》1967年第13期)

《人民日报》转载《要大胆使用革命干部》的编者按语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

南开大学《卫东》编辑部评论员的这篇文章，提出了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权后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问题。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正如这篇文章所说，大胆地使用革命干部，“是坚持不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个重要标志”。

让更多的革命干部站出来工作，是当前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是加强和巩固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在阶级斗争大风大浪中锻炼出来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是我们革命干部队伍的新鲜血液。但是，应该看到，革命小将在政治上还不很成熟，还缺乏丰富的斗争经验。如果革命小将不和革命干部相结合，那么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得的权就很难巩固。正如这篇文章所尖锐指出的：“如果没有革命的干部，红卫兵小将今天夺了权，明天就有可能丧失政权。”

大胆地使用革命干部，决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而必须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充分地发挥作用。当然，这决不意味着干部都统统官复原职、一仍旧章。应该根据革命干部的具体情况，经过群众讨论，让他们担任适当的工作。无产阶级革命派应当热情地支持和鼓励他们，并且帮助他们改进工作作风，建立崭新的、革命的干群关系。

首都红卫兵对英代办处采取强烈行动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被英帝国主义疯狂迫害我香港爱国同胞的法西斯暴行激怒了的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今晚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且激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

声讨大会严正指出：英国政府竟敢无视我国外交部八月二十日照会的要求，在四十八小时内尚未撤销对香港三家爱国报纸的停刊令，拒不释放被捕的爱国新闻工作者和撤销对爱国报纸以及印刷公司的非法诉讼，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严重政治挑衅。大会指出：中国人民是说话算数的。中国人民决不允许英帝国主义者在香港横行霸道。英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

今晚，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愤怒的口号声震天动地。同仇敌忾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不断高呼："打倒英帝！""打倒美帝！"打倒苏修！""反华的人决没有好下场！""港英必败！""中国人民必胜！""坚决支持香港爱国同胞的反英抗暴斗争！""港英法西斯当局必须低头认罪！"

在会上发言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职工代表坚定地表示：我们对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就是要针锋相对地进行坚决的斗争，不获全胜，决不罢休。发言的人强调指出，中国人民任凭帝国主义欺侮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英帝国主义这只千疮百孔的纸老虎，不在中国人民的眼里。港英法西斯当局对中国人民和香港爱国同胞犯下的滔天罪行、欠下的累累的血债，必须得到彻底的清算！

"香港爱国同胞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神圣权利不容侵犯！"这是声讨大会上最强烈的声音。在大会上发言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指出，从史无前例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照亮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心。港英法西斯当局用各种卑鄙无耻的手段迫害香港爱国新闻事业和爱国新闻工作者，妄图封锁真理的声音，妄图阻遏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扑灭香港爱国同胞反英抗暴的烈火，完全是痴心妄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小将和七亿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是不好惹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香港爱国同胞，是吓不倒，压不垮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必将在香港上空高高飘扬。

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讲话中还向坚持反英抗暴斗争的香港爱国同胞表示崇高的敬意。他们热烈赞扬香港爱国同胞的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大无畏的英勇气概，香港爱国同胞是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英雄儿女。他们指出，香港是中国的领土，香港爱国同胞的英勇斗争表明，香港的命运要由中国人民来掌握。有七亿祖国人民作后盾，香港爱国同胞的反英抗暴斗争必将赢得最后的胜利。

（新华社 1967 年 8 月 22 讯，载 8 月 23 日《人民日报》）

两条根本对立的经济建设路线（节录）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文汇报》编辑部　《解放日报》编辑部　《支部生活》编辑部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怎样建设自己的国家，存在着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

一条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路线，只强调搞物质，搞机器，搞机械化，还搞什么物质刺激。这条路线，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抹煞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照这条路线走去，不可能走向社会主义，而只能走向资本主义。苏联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及其继承人，就是这条路线的狂热的鼓吹者。中国赫鲁晓夫同苏联赫鲁晓夫一唱一和，也拚命地在我国推行这条路线，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坚决批判了这一条修正主义路线，提出了一条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一九四九年，毛主席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就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毛主席在这个报告中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各种经济成份的状况，提出了要“**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逐步进行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本道路。一九五八年，毛主席进一步集中反映了我国七亿人民的坚定决心和伟大智慧，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崭新局面。一九六O年，毛主席亲自总结了大跃进中先进企业创造的经验，提出了同苏修“马钢宪法”相对立的著名的“鞍钢宪法”，确定了五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命**。一九六三年，毛主席又提出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毛主席的一系列光辉指示，指明了建设我们国家的正确航道。这条路线，强调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进行到底，不断地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用革命化来领导机械化，“**抓革命，促生产**”正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发展，保证我们无产阶级的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建国以来，在我国经济战线上，这两条路线一直存在着尖锐、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焦点就是：要不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要不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是不是按照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斗争的实质，归根到底，是搞社会主义经济，还是搞资本主义经济；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毛主席领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从来都把人的革命化放在首要地位。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办法有千条万条，而最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抓政治思想的革命。这一条搞上去了，粮、棉、油、钢铁、煤炭都能上去。这一条搞不上去，什么都上不去。把毛泽东思想传播给群众，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根本保证。

中国赫鲁晓夫却反其道而行之，竭力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污蔑我们国家领导经济建设的办法是“超经济的办法”，提倡“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他恶狠狠地指责说：“为什么非按行政办法管理，不按经济办法管理?”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不属于一定的政治的单纯的经济。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不会是真空的。任何部门、任何领域，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必然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挂帅，就必然是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思想挂帅。中国赫鲁晓夫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而要资产阶级政治挂帅，其目的就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

所谓“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说穿了，这就是让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支配一切，发展自由竞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复辟资本主义。

中国赫鲁晓夫反对政治挂帅，还突出地表现为反对大搞群众运动。社会主义事业是千百万群众的革命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就必须发动和依靠最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要不要大搞群众运动，这是实行不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两条经济建设路线根本对立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赫鲁晓夫，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十分仇恨革命的群众运动，拼命鼓吹“一长制”和反动的“专家路线”。一九四九年，他跑到天津，对国营企业职员说：“你们是国家在工厂中的组织者”，搞建设要“特别依靠厂长、工程师和技师”。一九五二年的一次讲话中，他又说：“建设工业有很多困难，中国是有钱，有劳动力，有机器（在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帮助下基本可解决），就是没有工程师。”他对一九五八年以后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潮更是拼命攻击，大放冷箭，胡说大搞群众运动是“一轰而起”，“只是从那里听了点风，听到了一点不确切的消息，就轰起来了”。

在中国赫鲁晓夫看来，搞经济建设只能依靠少数“专家”，“依靠厂长、工程师和技师”，由他们这些人发号施令，而广大的革命群众只是“劳动力”、是“一轰而起”的“群氓”，只能乖乖地“服从指挥”。他们挖空心思地制定了一套修正主义的办法、条例，处处搞管人、卡人的规章制度，对工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他们这样干，不仅束缚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阻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而且使少数干部、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同工人群众处于对立的地位，逐步演变成为骑在群众头上的官僚主义分子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使社会主义企业逐步变质。

这就是我国两条根本对立的经济建设路线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蜕变必然导致政治上资本主义的复辟。中国赫鲁晓夫多年来在经济战线上鼓吹的一套路线、方针、政策、措施，都是为了扶植城乡的资本主义势力，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企图使社会主义经济蜕化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而经济一旦蜕变，必然会逐步地使我们党，我们国家都改变颜色，在整个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因而两条经济建设路线的斗争，实际上是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两个中国命运的斗争。

我们的无产阶级政党，就是搞政治、搞阶级斗争，搞无产阶级专政的。如果按照中国赫鲁晓夫的主张，一头埋在经济建设里，不搞政治，不搞阶级斗争，不搞无产阶级专政，那么，我们的党，岂不也成了单纯组织经济生活的工具，成了苏修叛徒集团那样的“工业党”和“农业党”了吗？政党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是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世界上哪里有只搞生产建设、不搞阶级斗争的政党呢？所谓“工业党”、“农业党”，无非就是要党成为经济建设的附庸，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庸，成天跟着“利润”的屁股打转转。这个

党的唯一宗旨，就是搞钞票，搞剥削，搞资本主义。这样的党，不也成了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政党了吗？

经济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事实教育我们，必须永远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念念不忘突出政治，任何时候都要把政治放在首位。

（《人民日报》1967年8月25日转载）

很好，照发。 毛 泽 东 八月二十五日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
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经过一年多了。

这个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东到西，从北到南，充分地发动了我国几亿人民群众，大大地促进了我国几亿人民群众的思想革命化。

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人民群众觉醒的威力面前，已经破产了，已经垮台了。

无产阶级的新生革命骨干，正在大量地涌现出来。

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取得的伟大胜利。

这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毛主席亲手缔造、亲自领导和林彪同志亲自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保卫我国国防安全和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支柱。

毛主席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毛主席又说，人民解放军之所以有力量，就是因为他的唯一的宗旨，是"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

现在事实也正是这样。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够顺利地进行，就是因为有人民解放军这样一个伟大的长城。

为着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推向前进，为着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前进道路上取得更辉煌的新胜利，这就需要人民解放军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切红卫兵革命小将和一切革命群众，更亲密地团结起来，这就需要全国各地军民更大规模地展开一个热烈的拥军爱民的运动。

人民解放军是我国人民的子弟兵。人民解放军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血肉相联的关系，是鱼水相依的关系。

因此，人民解放军要尽一切责任，爱护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爱护一切红卫兵革命小将，爱护一切革命群众。同样，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切红卫兵小将，一切革命群众，要尽一切责任，拥护人民解放军。

因此，人民解放军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兵革命小将和一切群众组织，必须根据当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具体情况，制定新的拥军爱民公约。

拥军爱民的公约，必须体现毛主席的思想：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

拥军爱民的公约，必须体现毛主席的思想：人民解放军应当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支持红卫兵革命小将，支持革命群众。

拥军爱民的公约，必须体现毛主席的思想：人民群众必须协助人民解放军搞好"三支""两军"的工作。为着保卫祖国，人民解放军随时在备战中，人民解放军和所拥有的各种武器，装备和物资，是不能侵犯的。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机关，是不容许外部的人进驻的。

拥军爱民的公约，还必须体现毛主席的思想：双方面各自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处理自己发生过的缺点和错误。对待他方面，在必要时也可以提意见，但必须按照毛主席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采取适当的有利于团结、有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双方有问题争执的时候，必须用协商的方法解决。

关于武装革命群众，必须在条件成熟的地方，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弄清情况，通过协商，报告中央批准，然后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不符合这样条件的，除紧急情况、经过中央特许的以外，所有群众组织现有的武器和军用物资一律立即封存，或者上交。

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战员，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严防坏人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对于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必须采取专政措施。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导下，军民紧密地团结起来！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切红卫兵革命小将，一切革命群众，一切爱国的人们，团结起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 央 军 委、中央文革小组
关于掀起拥军爱民运动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中央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是一个具有伟大战略意义的文件。各级领导必须高度重视，以各种方式最快地传播到广大的城市和农村，在一些边远地区和交通阻塞的地区，可用飞机散发，使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作到家喻户晓，在全国立即掀起一个更大规模的热烈的拥军爱民运动。

党中央负责人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发出战斗号令

（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一日举行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央负责同志作了极为重要的讲话。这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关头，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根据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发出的重要战斗号令。

出席会议的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负责同志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张春桥等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出席会议的还有杨成武和李天佑等同志。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谢富治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杨成武、张春桥等同志，代表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作了重要的讲话。

中央负责同志一致指出，当前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面临着空前大好的形势。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反革命阵线正走向全面崩溃，各地的革命运动正在胜利前进。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搞好革命的大批判，集中火力，集中目标，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倒、批臭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并在革命的大批判中，进一步发展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中央负责同志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拥军爱民"和"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所有在外地串连的学生和其它革命群众，要立即回到本地区、本单位闹革命。

中央负责同志指出，一切革命群众必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必须坚决镇压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坚决取缔"五·一六兵团"这个被一小撮坏头头操纵的反革命组织。

出席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的全体同志，热烈地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决心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地进行到底。

（新华社 1967 年 9 月 2 日讯，载 9 月 3 日《人民日报》）

已阅，照办。　　毛　泽　东　　九月四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是林彪副统帅亲自指挥的举世无双的人民军队，是劳动人民的子弟兵。它和革命群众是鱼水相依，血肉相联的。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尽一切责任、爱护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爱护一切红卫兵革命小将，爱护一切革命群众。

毛主席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它担负着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荣艰巨的任务。

中国人民解放军要时刻地警惕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突然袭击，必须坚守战斗岗位，加强战备，保证装备完整良好，作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八月二十五日《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中指出，"人民解放军和所拥有的各种武器，装备和物资，是不能侵犯的。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机关，是不容许外部的人进驻的。"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切红卫兵革命小将，一切革命群众，一切爱国的人们，都必须严格遵守，切实执行。这是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拥军爱民"的号召。爱护人民解放军，拥护人民解放军，这是一切革命群众和一切爱国人们的共同任务，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尤应在这方面做出模范。

各革命群众组织一定要正确理解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正确理解人民解放军的"四不"，在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中随时提高阶级的警惕性，防止阶级敌人利用，防止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挑拨离间，混水摸鱼，严防美蒋、苏修、日本特务和地富反坏右破坏和削弱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和声誉。

为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六月六日通令和八月二十五日《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特再次重申：

一、任何群众组织和任何人，不管是属于那一派，不许以任何借口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不许抢夺军火仓库、军用仓库和国防企业中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不许拦截火车、汽车、船舶上装载的武器、弹药、装备、器材、物资，不许外部人员进驻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机关。

二、军队院校、文体单位以及所有开展四大的单位中，不管任何组织、任何人，更不准抢夺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

三、军队所有机关、部队、院校等单位，不经中央批准，绝不许将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发给任何组织、任何人。

四、已经抢夺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应一律封存，限期归还。

此命令自公布之日起生效。今后如有违犯此命令者，当以违犯国法论罪。

当地驻军在执行上述命令时，首先要耐心地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讲清道理，进行劝阻。如劝阻无效，可对空鸣枪警告，令其撤回。在劝阻和警告仍然无效时，可宣布这种抢夺行为是反革命行动，并采取措施对其少数的坏头头和肇事凶手予以逮捕法办。遇到这些人拒捕和抵抗时，人民解放军有权实行自卫反击。

在海防、边防、沿海岛屿和国防、机要重地值勤的战士遇有人夺枪时，有权自卫反击。

此命令，望各省（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级军管会、各级军区、各革命群众组织遵照执行。

（此件可在各地张贴）

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

同志们好！

我来得很仓促，康老把我拉来了，要我讲几句话。事先没有准备，讲对了的，供同志们参考；讲错了的，同志们批评我，炮轰我，火烧我，都可以。

我想讲一讲形势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现在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对形势，如果孤立起来看，当然在某些地方，个别的地方，存在的问题还是很严重的。但是，形势总应该全面地来看，历史地来看。如果全面地历史地来看，今年和去年这个时候比较，是不是大不相同呀？去年这个时候，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他们在地方上的爪牙，还是相当有点活动能力的。而现在呢，他们瘫痪了，有的被革命小将打倒了。瘫痪本身不是坏事，因为“走资派”不能够让他再动，对吗？不少地方在“走资派”打倒以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其余的地方，中央也正在一个省一个省，一个大城市一个大城市地来解决。有的已经达成协议，问题基本解决了。有的正在解决。象你们安徽省吧，就请了同志们到北京来开会，解决问题。你们安徽省的形势与过去也不同了嘛。以李葆华为首的这一小撮“走资派”被揪出来了，甚至连刘秀山那样的坏人，还有程明远那个叛徒都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同志们，刘秀山这个坏人，我是很早就知道了。只是没有戳穿。我有材料，他是个坏人。刘秀山害怕群众揪他，逃到北京，躲了很久，现在不知到哪里去了。他在背后操纵，可能有些好人上了他的当。要注意，不能够把好人和坏人搞在一块。当然，上了当的人，受蒙蔽的人，要觉悟过来。

从去年到今年，你们看有多么大的变化！现在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正在全国展开，各个战线上都在向他开火。要把他批倒、批臭、批深、批透。我曾经

在一个场合讲过，要做到家喻户晓，使他臭得比当年苏联的托洛茨基还要臭。那样，中国就可以不变颜色了。他执政了很长时间，搞反革命两面派，有一整套的干部路线来保证他的错误的政治路线。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一声令下，小将们立即上阵，一下子就把这些家伙统统揪出来了。

当然，同志们会说，江青同志，你讲的倒容易，我们在那里斗的可厉害啦。同志们！我们也斗的挺厉害的，只是没有武斗就是了。不过我声明，谁要跟我武斗，我一定要自卫，我一定还击，同志们！我不是提倡武斗，你们不要以为我提倡武斗，我是坚决反对武斗的，我是坚决拥护毛主席提出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方针。我说的是，当阶级敌人来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手无寸铁怎么行呢？我是指那种情况。现在我们不需要那样的武斗，武斗总是要伤害人的嘛，总是要破坏国家财产的嘛。为什么要做败家子呢？在这里我要说明，"文攻武卫"不要去掉它的阶级内容，不要去掉它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你们双方不要回去都搞起"武卫"来，戴上柳条帽，拿起长矛来，那就不好了。（康生：现在不单是这样子，还动了机关枪啊！）那更不好。

总的说，我觉得形势是大好的，锻炼了青年一代，锻炼了小将们，锻炼了革命干部，也锻炼了老年一代，象康老。（康生：我这不是天天来请你们锻炼我吗！），同志们，你们不要以为安徽问题复杂，不见得。安徽目前的情况比去年大好，现在的情况比早一个时候更好。过去你们互相之间吵得很厉害，还动过武，现在能够坐下来一起谈了，不是那么气的动武啦，这就了不起，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当然，个别地方还有反复，反复也是正常的现象；各地也不平衡，不平衡也是正常的现象。总的趋势是往好的方面发展。但这要有以下几个好的条件：要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来领导，这是最重要的条件；要有人民解放军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逐步成立地方上的革命委员会，实行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这样才能够进行斗、批、改，才能够保证全国范围的革命的大批判运动。

阶级敌人是不甘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发展的，他们总是要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还有美国特务、苏修特务、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等等，这么多的黑手藏在背后，你们不容易识破。他们以极"左"的面貌或者以右的面貌出现，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绝对不允许的，而且他们也是注定要失败的。目前，拿北京来说，就有这么一个反革命组织，叫"五·一六"。他们人数不多，在表面上也是青年人，这些青年人我看是上当的；少数是资产阶级反动分子，对我们是有刻骨仇恨的，但这是个别的。多数是青年，青年人的思想不稳定，被利用了。真正的幕后人都是很坏的人。你们安徽也有人反对中央嘛，中央的"九条"、"五条"都反对，拒不执行嘛。如果按"九条"好好地办下来，就不致于现在又反复了。但反复也好，你们多来一次也可以，欢迎。

"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对我们一些好人他们都整了黑材料，它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外抛的。你们切不可以上当，你们现在都在北京，难免有人向你们进行活动。（康生：你们有没有派人来收集中央文革的材料？好派答：有，反对派与"五·一六"有联系，还有反对周总理的材料。康生：我说句公平话，你们"好派"也有人到这儿来收集材料的，不要只讲P派收集、刘秀山收集，你们梁守福那一方面也派人来收集，所以，事情要全面地来看。）收集我们的材料，我们也不怕，因为心里没有鬼，怕什么呢！你们去收集吧，你们吃饱了饭没事干，想干这个，不干革命，那你们

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我是不怕的。他们过去就整过我的黑材料，这一次才发现。有一个专案组在上海，去拿材料的时候，说其中有一箱材料是我的。他们没办法，我说拿来嘛，拿来以后我也没有过问。你们看，一大箱黑材料，谁晓得是些什么东西。我们最近发现有的地方成立所谓"特档"（特别档案），专门用来对付我们。所有这些，都是见不得人的小丑所搞的小手法。今年一、二月份，有那么一股子风，从右的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目前这股子风，是从极"左"的方面来反对总理，反对中央。"五·一六"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反革命组织，你们要提高警惕。美蒋特务，苏修特务，日本特务，还有地、富、反、坏、右，他们不会老老实实的，总是千方百计地作垂死挣扎，我们要提高警惕，识别他们，并向群众作宣传，使群众觉悟起来，把那些见不得人的一小撮孤立起来。既要反对从右的方面又要反对从极"左"的方面，来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班子，这个问题值得同志们充分注意。

第二个问题就是军队。早一些时候，有这么一个错误的口号，叫做"抓军内一小撮"。他们到处抓"军内一小撮"，甚至把我们正规军的武器都抢了。同志们想想，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我们能够坐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吗？如果把野战军给打乱了，万一有什么情况，那能允许吗？所以不要上这个当，那个口号是错误的。因为不管党、政、军都是党领导的，只能提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再另外提，那些都不科学。结果弄的到处抓，军区不管好坏，差不多都受冲击了。尽管我们军队有少数同志，甚至个别同志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也不允许这样抓。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是林彪副主席亲自指挥的。请问世界上有没有这样好的军队？你们抢他们的枪，打、骂都不还手，不还口，世界上有没有？所以现在不能上敌人的当，到处乱揪"军内一小撮"。我曾给北京的小将谈过这个问题，他们就有错误。他们跑到外头去大串连，去年是点革命的火，现在又出去，那就是帮倒忙了。说什么揪"军内一小撮"，你们揪不出来，我们帮你们揪。有个别的地方就是这样。这就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上当了。因为青年人喜欢动，而斗、批、改非要坐下来看文件、看材料，然后非动脑筋不可，这个比较艰苦。跑跑颠颠，这是青年人的特性。听说武汉造反派"钢二司"，刚刚翻了身，他自己那个地方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就往全国跑起来了。这个要注意，你们跑到那里去，不了解当地情况，一头栽进去，就犯错误了。还是要相信本地区的革命群众，不能去包办代替。正象我们不能包办代替你们的革命一样，我们只能跟你们商量，支持和协助你们。

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产生了一些不良后果，现在这股风已开始刹住了。那么，同志们会问，江青同志是不是说军队的同志没有错误，我不是这个意思。对军队同志的缺点错误应该给他们以机会，让他们自己作自我批评。你不要光看我们有的老干部犯了错误，说错了话，做错了事，打起仗来他们可很勇敢，很可靠啊。有的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跟不上形势，说错些话，做错些事，只要他想改正，作自我批评，就好嘛。应该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嘛，应该遵照主席的教导，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安徽的情况，我一向都没有怎么摸，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是不是有个军去了以后你们不欢迎呀？（康生：在合肥、淮南有人开始反对十二军，九月二日淮南好派还冲了三十四师师部大楼。）把野战军冲乱可是不好啊，不能开这个头。我们的野战军是好的，军队是好的。你们想想，广大指战员的出身都是贫下中农、工人，他们是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以前是不介入嘛！后来介入了，他们不摸底，有些事办得不对，有些话说错了，这是难免的。你们试试看，换一个位置试试看，犯不犯错误？我所说的是容易犯一般说错话的错误，不是路线错误，这是原则问题。所以对军队不能那样乱冲，不能去夺

他们的枪。有的战士的枪被夺的时候急得哭了，因为他不能开枪。有些战士搞不清楚，以为来抢枪的都是革命群众，因此就叫人家给抢走了。在国防前线，现在要下一道死命令，严禁夺枪，如果有人硬要夺，解放军战士有权自卫还击。中央已经通过了命令。我要是警卫战士，谁要夺我的枪，我一定还击。因为我不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当然，随便开枪是不对的。现在很多地方大部分枪是保守派抢的。有的地方不是夺，而是把枪交给保守派。只有少部分左派有枪。

第三个问题，要逐步地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新的领导机构。目前这股子歪风除了针对着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针对着人民解放军、"抓军内一小撮"以外，就是针对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的事物。革命委员会难免有缺点错误，更难免混进一点坏人，但它毕竟是一个新生的事物，它是在斗争中产生的，是在群众的基础上产生的。现在有这么一股风，又要把中央已经批准的革命委员会全部弄掉，这不是别有用心的人在那里挑唆吗?同志们，你们知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这个事也要警惕。当然，有点反复我们也不怕。

总之，现在形势大好。但在大好的形势底下，要警惕三件事，就是从极"左"和从右的方面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来破坏人民解放军，破坏革命委员会。搞这些破坏活动的背后不仅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有地、富、反、坏、右，还有美蒋、苏修、日本等等特务。我们有材料，这次搞出了一大批，这是小将们的功勋呵！叛徒集团你们知道不知道？很大的特务案子，都搞出来了。有的潜伏了几十年，过去不知道的，这次都搞出来了。所以这次文化大革命的功劳真是大!

再说一下，同志们要很好地警惕这三件事：有人要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人民解放军、革命委员会。我只想提醒同志们，我的意见要是不妥当，请同志们批评。

同志们，我们要创造良好条件，我们要成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派，不要成为张家派、李家派。派性，这是小资产阶级的特性，山头主义，本位主义，无政府主义，严重的无政府主义。我建议你们双方都作自我批评，这个方法好。双方都作自我批评，不是就不吵架了吗！比如你反对我，我就到你那里去作自我批评，然后你当然觉得惭愧，也找找自己的毛病，也作自我批评，这样就可以冷静下来，互相谈谈，互相交换意见。求大同，存小异嘛！大"同"是什么呢?"同"，就是共同性，就是一起闹革命，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站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还是站在"走资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如果你们都是要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个大原则底下，有什么理由不联合起来，有什么理由不团结起来，而闹你们的派性呢？闹派性，我看是不革命，是为自己不是为了人民，不是为了无产阶级。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他就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严格地要求自己，要求自己那个团体，而不是光严格地去要求别人，然后吵架、打架、武斗、抢武器，这样搞就不冷静了，也说不清是非了。是非总是应该搞清楚的，也容易搞清楚的嘛！在你们安徽，现在主要的就是要看你是不是斗争以李葆华为首的"走资派"、斗不斗争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我国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这个大前提是一致的，就是"同"了嘛！"异"，就是不太一样的做法或者看法，那可以保留。我们小组也经常有不同的意见，并不是没有什么争论，但是我们能够在一致的大前提底下把"异"存起来。（康生：一个人对他自己也是经常斗争的。写文章有时候也要改嘛，那就是自己反对自己。）革人家的命容易，革自己的命可难呀。现在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有一个阴暗面，有一个光明面。阴暗的一面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如果不革掉，总有一天会掉队的，总有一天会走到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去的。头脑里的"私"字，个人主义啦，

再大一点小团体主义啦、本位主义啦，一直闹到严重的无政府主义，谁的话也不听。这些人想把我们有良好的组织、良好的政治工作、良好的装备的野战军都要打乱。当然，这不是你们的本意，有坏人，他想达到他的目的，去挑唆你们，切勿上当。要心明眼亮，要冷静，要善于识别敌、友、我。你们现在有的时候连朋友也吵起来了，自己阵营里也吵得一塌糊涂，甚至打起来。你们想想，是分裂好呢，还是搞革命的大联合好？要搞革命的大联合，然后搞革命的三结合，这样才能够有领导，没有领导，革命不好进行呀。

（最后，江青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当读到不许外部的人进驻指挥机关、要正确理解人民解放军的"四不"，防止阶级敌人利用等问题时，江青又作了如下插话。）

同志们：你们想一想，冲击和进驻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机关，把作战系统打乱了，一旦有情况怎么办呢？现在，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怕我们，特别是怕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狗急是要跳墙的，我们不能不防万一。

不要在我们军队的脸上抹黑呀！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不能在他们的脸上抹黑，要爱护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的荣誉。

同志们，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没有？我们援助越南的物资被抢了。是炮弹呀，打美帝国主义的。后来，我们下了个死命令，管你什么派，立即交出，不交出就缴械。这样一来，他们吓坏了，才送回去了。

真生气呀。有人还抢了外国的船。北京还出现这样的怪事：烧了英国代办处。你们知道这事吧？这样的怪事，如果是好人干的那是幼稚；如果是坏人干的，那就是故意破坏国家的荣誉。同志们，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派，那是肯定的。如果是在使馆外头，而不是在他的使馆内部，他作了任何违犯我们国家法律的非法活动，你们都可以有权斗他，把他扭送到公安部门去。但是，你们不能闯到使馆去，不能跑到外国轮船上去。

揭开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大阴谋

（一九六七年九月六日）

《解放军报》社论

今天，本报发表的关于桃园大队"四清"情况的调查报告，揭露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推行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滔天罪行。

这个调查报告，是桃园大队贫下中农的一份血泪控诉书，是中国赫鲁晓夫疯狂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个铁的罪证。

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来的。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十条）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为四清运动规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四清运动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在毛主席制定的这两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件中指出：这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要放手发动群众，重点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毛主席制定的这条路线，就是要解决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革命的极端重要的问题，是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

中国的赫鲁晓夫，他站在被推翻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代表了那些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利益，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这一场伟大的革命，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拚命地反对这场革命。他抛出了一条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全面的进攻。他指派他的老婆资产阶级分子王××到桃园搞所谓"蹲点"，就是要把桃园变成他推行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黑试验场。他还精心地炮制了一个所谓"桃园经验"，大吹大擂，敲锣打鼓，恬不知耻地到处兜售；甚至盗用中央的名义，把它向全国推广。这完全是一个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地篡党篡国的大阴谋。

中国赫鲁晓夫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所推行的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究竟是什么货色，在桃园大队的"四清"运动中，暴露得最彻底。

中国赫鲁晓夫的所谓什么"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就是明目张胆地篡改四清运动的性质，故意掩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转移斗争大方向，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中国赫鲁晓夫的所谓什么"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就是要制造借口，大整干部，大整社员，镇压革命群众，把四清运动引到邪路上去。

中国赫鲁晓夫的所谓什么"扎根串连"，就是疯狂反对毛主席历来主张、历来实行的用阶级分析方法去向社会作调查，疯狂反对革命群众运动，以便他们结党营私，招降纳叛，培植和发展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要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挽救剥削阶级的最后灭亡。

这是一套彻头彻尾不折不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货。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以后，失去了政权的剥削阶级和代表他们的反革命势力，总是要千方百计，利用一切机会，从无产阶级手里把政权夺回去。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全国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总后台，是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在党内的总代表。他所以要推行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其目的就是为了夺取无产阶级的政权，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在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的精心策划下，桃园大队政权落到了坏人手里，他们为所欲为，实行法西斯统治，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处于受打击受迫害的地位。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活样板。中国的赫鲁晓夫还要把这样的"桃园经验"推广到全国。不难设想，他的这个阴谋一旦得逞，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就要出现大倒退，我们国家就要改变颜色，千千万万劳动人民就要重新被推到苦海之中。这是多么危险的情景呀！我们怎能不引起高度的警惕，怎能掉以轻心！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这一场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

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一场极其激烈的大搏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两个司令部之间的一场极其激烈的大搏斗。在这一场大搏斗中，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了，中国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失败了。

事实完全证明：隐藏在我们党内的、以中国赫鲁晓夫为总头目的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无产阶级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他们是一群凶恶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每个重要关头，他们都要跳出来，兴风作浪，破坏捣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他们的命、就是要把他们彻底打倒。不仅要从组织上夺他们的权，而且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只有这样，才能使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大倒退，不致在我国重演。

当前，全国正在展开对中国赫鲁晓夫全面的革命大批判，对于这样恶贯满盈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的黑帐我们必须一笔一笔地清算。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革命的大批判运动，誓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的彻底的胜利！

《假四清真复辟——关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导演的桃园大队“四清”情况的调查》的前言

（一九六七年九月六日）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一九六三年五月亲自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十条），是我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公然提出和推行了一条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毛主席同这条反动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就是同这条反动路线斗争胜利的结果。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了推行他的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复辟资本主义，曾经指派他的老婆、资产阶级分子王××，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搞所谓“蹲点”

王××在桃园搞所谓“蹲点”，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底到一九六四年四月底，先后五个月。在这期间，王××前台表演，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幕后指挥，通过面授机宜、书信往来、电话遥控，从原则到具体，从步骤到方法，从整谁到保谁，都作了精心策划、具体部署。

出村后，王××还两次重返桃园复查。她留下的“巩固组”，又搞了两年零四个月，直到一九六六年八月底，王××在北京被赶出清华大学后，才仓惶撤走。

所谓桃园“蹲点”，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推行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黑试验场，是假四清，真复辟。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煞费苦心炮制的所谓“桃园经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这个黑经验，由王××在北京、天津吹嘘放毒之后，接着，他们又到许多省市兜售。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盗用中央名义，把这个黑“经验”批发全国。这是一个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地篡党篡国、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大阴谋。必须彻底揭穿，彻底批判。

让我们看看他们在桃园究竟干了些什么。

(原载1967年9月6日《人民日报》)

评陶铸的两本书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

姚　文　元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阵阵疾风骤雨，震荡着全中国，震撼着全世界。

形势大好，从文化领域中的大批判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了一年激动人心的战斗，现在正胜利地进入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群众性的大批判。这个大批判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深人发展，是清除修正主义毒素的重大步骤，是动员千百万群众投人斗、批、改的思想动力，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个方面深入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斗争。

放在我们面前的这两本书：一九六二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简称《理想》)，和一九六四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思想·感情·文采》(简称《思想》)，就是我们展开大批判极好的反面教材。它们是黑《修养》的“姊妹篇”，活龙活现地刻划出陶铸这个修正主义者的反动而丑恶的灵魂。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陶铸是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忠实的执行者。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当两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面目被全党揭穿之后，他就成为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伙同他的心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之流，继续疯狂地反对和歪曲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和抵制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招降纳叛，勾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处发指示压制革命群众，支持、包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牛鬼蛇神，妄图用卑劣的手段，掩盖和推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

历史的前进，总是使那些过高估计反动派力量、过低估计人民力量、昏头昏脑地想把自己装成“英雄”的倒行逆施的人物，很快成为令人嗤笑的小丑。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当这位自吹为“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物，在万人大会上，飞扬跋扈地向群众挥拳吼叫“你们如果不相信我，也可以把我搞垮嘛”的时候，他是多么自傲啊！简直要吃人！他是想以此来恐吓群众：谁敢反对他这个“老革命”，谁就要倒霉，而他这个“英雄”是绝对“垮”不了的。但是，历史的逻辑就是这样：谁跳出来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反对广大革命人民，谁就一定要垮台。越是表演得充分的反动派，垮得就越彻底。回头去看，他的自我标榜、威吓群众的丑态，只不过在两面派的脸谱上增加了一道令人发笑的油彩而已。

"我是一贯革命的。"好，我们就用这两本书为主要材料，看一看这个"一贯革命"的人物到底"一贯"跟谁走、是在"革"什么"命"，到底在坚持什么"理想"，在鼓吹什么"情操"，在宣扬哪一个阶级的"思想感情"、在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生活"。

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的"理想"

陶铸是那一"派"？书中鼓吹的"理想"是那一派的"理想"？只要看看他的自画招供就足够了。

一九五五年八月，正当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你死我活斗争的时候，陶铸跳出来拍着胸膛宣布："我们大家都是一派，这一派叫做中国人民派，除了反革命分子以外，大家都要很亲切地团结起来"[1]。"除了反革命分子以外"的"大家"是一分为二的：无产阶级为一方，资产阶级为一方。陶铸恶毒地诬蔑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侮辱人格"，胡说什么胡适的反动思想仅仅是属于"思想方法问题"，"等三十年、四十年"以后"才看得清楚"[2]，很明显，他说的"我们大家"，指的是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胡适之流的人物。陶铸所吹嘘的要"很亲切地"拥抱在一起的什么"中国人民派"，实际上就是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反动派。

在同一个报告中，陶铸还无限同情地说："目前大陆上潜伏的反革命分子的处境是可怜的，心情是痛苦的"，言为心声，一个"可怜"，一个"痛苦"，一笔勾销了反革命分子的可恨和残暴，把他同反革命分子心心相印的"精神生活"，活活地刻划了出来。这样精彩的"表态"，在收入本书时作为"摘要"以外的部分被删去了。

过了两年，一九五七年五月，正当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陶铸立刻在报上写文章大叫大喊，"现在阶级已经基本消灭"，"国内敌我矛盾已经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专政职能要减弱"，要"转"到"领导生产""组织人民的经济生活"方面去[3]。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统统成了一个"大家庭"中的人，无产阶级专政可以取消，只管"领导生产"的"全民国家"即可实现。这种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腔调，完全是一付资产阶级右派头目的嘴脸。

再过两年，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正当社会主义革命进一步深入的时候，陶铸在《松树的风格》中，鼓吹"永不屈服于恶劣环境"[4]；在《革命的坚定性》中鼓吹什么要"面对大海"，经得起"狂风暴雨的侵袭"[5]。轰轰烈烈的大跃进，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英雄壮志，被他叫做"恶劣的环境"；社会主义革命的风暴打击了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以及他们的代理人彭德怀反党集团，他却狂叫"要经得起狂风暴雨的打击。"不须多加一字，反革命立场昭然若揭。

再过六年，到了一九六五年。在伟大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毛主席多次提出了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并且在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中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及陶铸之流，则发狂地反对和抵抗毛主席的这些重要指示。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正当批判《海瑞罢官》刚开始，一场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中国的赫鲁晓夫的生死搏斗迫在眉睫的时刻，陶铸在反革命文艺黑线的喉舌《文艺报》上又一次"亮

相"。他说:"我认为，在现阶段，应当把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任务，摆到最重要的位置上来。"[6]说什么"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公然抹杀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把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叛徒、右派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当做"人民内部"的问题，掩盖他们篡党、篡政、篡军的罪恶，好把钻进党内的一批凶穷凶极恶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统统包庇下来。

什么"一贯革命"? 一贯的反革命! 可以说，每个历史关键时刻，他都公开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社会主义。吹得五花八门的什么"理想"，就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的理想，是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反动理想，是在中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痴心妄想。

请看:

其一曰:"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要用一切办法去保证国家迅速工业化"[7]照这种反动透顶的"社会主义"理论，岂不是工业化了的美国早就实现了"社会主义"了吗? 搞"工业化"，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种"办法"。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依靠突出政治，依靠毛泽东思想所唤起的亿万人民的革命觉悟和革命积极性，使企业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书中反复鼓吹的依靠少数资产阶级"专家"，依靠"物质刺激"，依靠保守派，使企业的领导权为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特权阶层所篡夺。所谓用"一切办法"，就是要用依靠资产阶级的办法来发展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抗拒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尽是挨打的历史，原因就是自己没有工业"[8]。陶铸俨然以一个蹩脚的历史教师的口吻向我们讲一篇中国近代史，当然是颠倒了的历史。从一八四O年到一九四九年，这一百零九年，中国人所以"挨打"，主要并不是因为没有工业，而是因为政权掌握在帝国主义的走狗即从清朝政府、北洋军阀到蒋介石这些卖国贼手里。自从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夺取了全国政权，帝国主义再想打我们，就得先想想自己的猪爪子有多硬。文化大革命越搞得彻底，毛泽东思想越是深入人心，无产阶级专政越巩固，打起仗来就越无敌于天下。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理想。把过去"挨打"统统归诸"没有工业"，这就把那些罪大恶极的卖国贼的罪行统统掩盖了，这就美化了那些在"发展工业"幌子下复辟资本主义的国际资产阶级在中国的走狗，这是同中国的赫鲁晓夫一模一样的卖国主义腔调!

其二曰:"共产主义理想"就是"舒适的房子"，就是"使所有的房间在晚上都亮起电灯，使所有的人都穿上整齐漂亮的衣裳，出门都能坐汽车……"[9]一句话，就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就是享乐主义。什么人给他"吃得好，住得好"，他就可以出卖自己灵魂，而且还可以廉价奉送一顶"共产主义"的帽子。真是最卑鄙的叛徒哲学!"共产主义"的外衣，极端个人主义即资本主义的本质，这就是陶铸所谓"共产主义理想"的定义。照这个定义，美国资产阶级生活岂不是最符合"共产主义理想"了吗?

其三曰:"崇高的理想"就是念念不忘地"想着自己将来成为航海家、飞行家、科学家、文学家、工程师、教师……"[10]家、家、家，就是没有工、农、兵。在这个无产阶级的叛徒眼中，革命的工人，农民，战士，地位都应当摆得很"低"，岂但低，简直应当打进地狱，压在最低层，永世不得翻身。而摆得很高很高以至极其"崇高"的，是那些一大串资产阶级的"家"。"资产阶级参加过民主运动，他们搞工业有知识，不比地主那么腐败"。[11]对了，这就招供出你这些"家"，并不是无产阶级的专门家，而是资产阶级及其在文化界的代表人物。你

所谓的“知识”，就是资本家如何巧妙而残酷地剥削工人之类的知识。陶铸的“崇高理想”就是通过这一批爬得很“高”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实行反革命复辟。今天，一批很“高”的资产阶级“权威”被革命小将拉下来了。

还有一种：伟大的理想，就是所谓要“真正做到大家心情舒畅” 一九六二年，正当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发动了猖狂进攻，妖魔乱舞，毒草丛生的时刻，为了资产阶级能“心情舒畅”，陶铸在《对繁荣创作的意见》一文中，就胡说什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不少人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了”、“一定要发挥劳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12]（按：查陶铸的报告原文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现在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应该给脱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好啊！什么“三家村”，什么田汉、夏衍、吴晗、翦伯赞，什么海瑞、魏征、李慧娘之流，统统“属于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了，他们经过这一番脱帽加冕，不是就可以更“起劲”地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舆论了吗？乐陶陶地“大家很融洽、很舒畅”，不就可以舒舒服服地搞资本主义复辟了吗？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总有一家不“舒畅”，这是阶级斗争的必然。无产阶级心情“舒畅”之日，就是资产阶级倒霉之时，资产阶级心情“舒畅”之时，就是无产阶级痛苦之日。二者必居其一。为资产阶级不“舒畅”而喊冤叫屈的人，只能证明他自己是同资产阶级共呼吸的。

陶铸说：他这种“社会主义理想”是“对所有的人”包括资产阶级“都是有好处的”。社会主义就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怎么会对资产阶级“有好处”呢？所谓“对所有的人都是有好处”的“社会主义”，是假社会主义，是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是布哈林的资本主义可以“长入”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理论，是取消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全民党”“全民国家”“全民社会主义”的反动理论，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伟大胜利之后复辟资本主义的口号。

够了！上述这些材料，已足够使我们看清楚这位资产阶级代理人的真面目。他坚持的是一条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他爱的、想的、颂的是资本主义，他恨的、怕的、骂的是社会主义。这些文章中的“理想”，一言以蔽之，就是要以资产阶级的丑恶面貌来改造国家，改造社会，改造党。

这位人物有一句“名言”：“确立社会主义思想”或理想，就是“起码也要使社会主义思想占整个思想的百分之五十几以上”[13]。人的世界观怎么可以用百分比来计算呢？真是荒谬绝伦。拆穿了，其实是一场十分拙劣的大骗局。这是在告诉资产阶级以伪装的形式出现，把“百分之五十”的语言披上“社会主义思想”的外衣，来掩盖资本主义的丑恶本质。这是最典型的修正主义。这两本书就是用此法写出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说过这样向资产阶级“交心”的话：“资产阶级”只要“学会马克思主义”词句，就可以“眉笑眼开”地“和平进入社会主义”，名、利双收。这就是所谓“百分之五十几”的“社会主义思想”最好的注解。“理想”！“理想”！资产阶级看见这样忠实的代理人，真要感激涕零了。

叛徒加奴才的“精神生活”

你要知道这两本书中宣扬一种什么“精神生活”吗？不须多看，取其“精华”就够了。这就是——国民党的反动哲学加上奴才的“思想”。

陶铸对于国民党的那些极其腐朽反动的唯心论，以及刽子手蒋介石的黑话，是记得很牢，背得很熟的。这些反革命的货色在他“精神生活”中占有头等重要的位置。只有叛徒的嘴巴里才吐得出这样反动的东西。

蒋介石在其反革命言论中说过：“讲到政治的意义，总理已经明白告诉我们：‘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所以‘政治’的意义：就是要达到全国总动员之科学的方法，来管理众人的事，而为整个国家和全体民众谋最大的福利”。[14]

陶铸原封不动地搬过来说：“首先要了解什么是政治。大家大概都知道孙中山先生吧，他说过：‘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就是政治。……我们‘管理众人的事’是为了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就是为人民谋利益的事，讲清道理，使大家懂得道理，心悦诚服地来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作。”[15]

陶铸无耻地说过：他是蒋介石的“学生”。更准确一些，是奴才。你看他这种言论象不象奴才!?

把政治叫做“管理众人之事”，这是资产阶级剥削者的反动观点。没有抽象的“众人”，“众人”在阶级社会里，是划分为阶级的。也没有什么抽象的“管理”，“管理”在阶级社会中，总是处理阶级之间的关系，是哪一个阶级掌握和运用政权的问题。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十分深刻地指出：**“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16]。用毛主席这个观点去分析，政治，就是为巩固或推翻这一阶级或那一阶级的政权而斗争；为保护或摧毁这一种所有制或那一种所有制而斗争；为夺取或维护这一阶级（集团）的利益或那一阶级（集团）的利益而斗争。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因此，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压迫、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斗争，就不但代表了本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而资产阶级为了掩盖它政治活动的阶级内容，掩饰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就把反革命政治抽象地说成是“管理众人之事”，这是从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直到搞“全民国家”的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共同的手法。蒋介石所谓“管理众人”，就是血腥地使用反革命的国家机器去镇压和屠杀广大的劳动人民，把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统治，说成是“为整个国家和全体民众谋幸福”，还要用什么“总动员”去欺骗，卑鄙无耻到了极点。而奴才陶铸搬出这一套，则是要实现反革命的资本主义复辟，取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把为资产阶级及一切反动派利益效劳的奴才行为，说成是“为人民谋利益”，还要用什么“讲清道理”去欺骗，同样是卑鄙到了极点。

蒋介石在其反革命言论中鼓吹什么“亲爱精诚的精神”，鼓吹什么“先知先觉”。陶铸原封不动地用上了：

“我们并不完全否认孙中山先生的所谓‘先知先觉’、‘后知后觉’的说法，社会上是有这种情况的:有些人进步快一些,有些人进步慢一些,只要他有上进之心,终归是可以进步的……”[17]；

“马克思主义者应要求人宽，要求己严……对党外人士不是要求很高，应象孙中山讲的‘精诚团结’……。”[18]

“先知先觉”“后知后觉”的说法是抽去了阶级内容、脱离社会实践的历史唯心论的反动观点。毛主席指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19]那些死不回头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那些累教不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死硬派，并不是因为他们什么“后知后觉”，而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存在即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顽固地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美帝国主义

杀人犯和苏共叛徒集团也并不是因为他们缺少"上进之心"，而是因为他们是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所执行的路线不管有多少花招，只能是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和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服务的反革命路线。无产阶级革命派所以能够冲破重重障碍、突破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沉重的以至残酷的压迫而取得胜利，并不是因为他们"先知先觉"，而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掌握了这个集中了中国和世界无产阶级最高智慧的理论武器，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所以能越战越强，万难不屈，永远保持旺盛的革命乐观主义。今天陶铸吹捧这种反动的唯心论，是要使人们相信资产阶级"终归可以进步"，麻痹人民的革命警惕，帮助资产阶级混进无产阶级内部进行破坏。

陶铸所谓的"精诚团结"，纯粹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语言！同一个词汇，不同的阶级赋予不同的解释。我们偶而也用这个词，那是指在一定革命目标下的团结，为实现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而斗争。我们从来是讲：在社会主义方向下的团结，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然而陶铸所谓的"精诚团结"，却是抛弃原则、背叛社会主义方向、适合资产阶级要求的"精诚团结"！团结和斗争是统一体的两个相互矛盾着的侧面，没有斗争，也就无所谓团结。团结是相对的、过渡的，斗争是绝对的。世界上的事物，总是在发展中一分为二，人们的认识，总是在斗争中发展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20]哪里有陶铸那种永恒不变的"精诚团结"。算命先生挂出一块牌子说："诚则灵"，那是骗人的把戏。蒋介石用什么"精诚团结"掩盖内部的狗咬狗，作为灌输法西斯思想的工具，陶铸则破天荒地挂上"马克思主义"的招牌，用来瓦解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书中还说："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初期之所以能获得胜利，是由于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实行三大政策，'顺应'了当时革命的客观规律"[21]。把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的胜利，不是归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正确政策，不是归于革命人民的斗争，而是统统归于国民党，这完全歪曲历史，颠倒是非，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上说话。把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所换来的胜利果实送给国民党作捧场，这不是叛徒的腔调是什么？

够了！够了！这些肮脏的言论，难道不是暴露出陶铸"精神生活"深处是一个国民党反动哲学的世界吗？

除了国民党反动哲学外，剩下的"思想"完全是黑《修养》中的垃圾。

《理想》一书不是欺骗青年说，什么"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不可分的"，只要装做"把工作做好"，就会得到"重视""器重""赞扬"以至"闻名全中国、全世界"吗？这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吃小亏占大便宜"的投机商的市侩哲学原封不动的翻版。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九六〇年二月接见民建会、工商联常务委员时，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献策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利益就会来。"[22]这句话相当精练地总结了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几十年"做人"的经验，概括了这个无产阶级的叛徒人生哲学的"精髓"。什么"为人民服务"，什么"集体利益"，在他们这一小撮人统统是假的、骗人的，装出来给别人看的，是手段；而捞取"个人利益"、个人权力、个人享受则是真的，是目的，是丑恶灵魂的本质。这是资产阶级反革命两面派混进革命内部夺取权力的诡计。现在用来毒害青年一代，这种软刀子杀人的罪恶我们难道能容忍吗？

《理想》一书不是还欺骗青年说："我们共同的世界观和共同的思想方法""就是从客观实际出发的态度，是就是、非就非的态度"[23]吗？这也是从中国的赫鲁晓夫那里贩来的货色。

在阶级社会中，是、非都有鲜明的阶级标准，所谓“实际”，首先就是阶级斗争的“实际”：你站在无产阶级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还是站在革命人民一边？你站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边，还是站在修正主义一边？你站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还是站在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用抽象的“是非”来掩盖人们看问题时的阶级立场，是出卖灵魂的机会主义者的“共同的”特性。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报告他在天津向资产阶级屈膝跪拜的丑行时，恬不知耻地说：“资本家反映说我们的报纸不好，我说的确有点不大好，我也承认这个错误，……以后应该采取：是就是，非就非，好就好，坏就坏，……资本家有好就说好，工人不好就说不好”[24]。你看他多么“从实际出发”啊！“资本家有好就说好”“工人不好就说不好”，这是多么“公平”的法官啊！这个工贼的“是非”是多么鲜明啊！这个资产阶级的恶奴才对自己的主子的“好”处是多么念念不忘啊！他训斥工人“不好”的那种恶狠狠的神态又是多么清晰啊！而《理想》一书作者对某氏的出卖灵魂的哲学，真是背得熟透了啊！

《理想》一书把“辩证唯物主义”歪曲成“存在第一、思维第二，客观第一、主观第二”[25]。完全抹杀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完全抹杀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飞跃，完全抹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人们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这决不是什么“辩证唯物论”，而是反动的形而上学。无产阶级认识客观世界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按照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去改造客观世界。取消了改造客观世界，取消了革命，取消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奋斗，“客观第一”岂不成了一纸空文！但仅仅这样批判，还是不够的，须知他之所以要宣传这种机械唯物论或庸俗唯物论，就是要宣传一种随波逐流、随时可以出卖无产阶级利益的机会主义，为资产阶级服务。不是吗？资产阶级也是一种“客观存在”，也可以从资产阶级出发，听资产阶级的话，以资产阶级利益为标准，“是就是，非就非”，于是搞资本主义复辟也可以冒充“实事求是”“辩证唯物主义”出现了。拆穿西洋镜，就是这么一个把戏。

陶铸不是还眉飞色舞地向青年说：“世界上有男的，有女的，就会有恋爱”[26]吗？这立刻使人想起中国的赫鲁晓夫一句荒谬的“名言”：“一条牛加一条牛仍是牛……但是一条公牛加一条母牛就形成了新的关系，一个男人加一个女人便成了夫妻的关系。一切东西都必须是矛盾的统一体。”[27]在他们这一伙人看来，人和人的关系就是公牛同母牛的关系。在阶级社会里，人们是按阶级划分的、按阶级关系结合的。男女关系也不例外。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就说过：“饥区的灾民，总不会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这个基本事实，被他们抹杀了，践踏了。他们这种庸俗透顶的语言，不能够损害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一根毫毛，只能反映出他们一伙心目中的相互关系及其“修养”，就是“公牛加母牛”“男人加女人”之类资产阶级的丑恶不堪的东西。君不见大谈“修养”的那一伙人，无一不是腐烂已极的伪君子吗？

书中说，“一个人在几十年的生活中”决定其“成功与失败”，“就在于主观与客观的是否一致”[28]，你在国民党统治下究竟是怎样奴颜婢膝地把“主观”同“客观”去“一致”的，这“几十年”的“成功”中又是怎样同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资产阶级“一致”的，难道还不该拿到光天化日下来吗？

对无产阶级刻骨仇恨的“感情”

一九五九年五月，正当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抛出他疯狂地复辟资本主义黑纲领的前夕，

陶铸在《太阳的光辉》一文中，摆出一付“海瑞”的架式，公开地、恶毒地咒骂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他一面说，人们以“东方红，太阳升”“来形容我们伟大事业的朝气勃勃”，“以太阳来歌颂我们的党和领袖”；一面公然借攻击“太阳“的“过失”，指桑骂槐地说：“当大暑天骄阳似火，晒得人们流汗的时候，人们就会埋怨，说太阳的光和热发射得过份了，而且大家都知道并且也都指出过，太阳本身上还有黑点。”[29]

“太阳本身上还有黑点”。这不是赤裸裸地咒骂我们的党和伟大的领袖吗？在你眼睛里，岂但是“黑点”，社会主义简直就是漆黑一团。用资产阶级的眼睛看问题的人，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他们比瞎子还要瞎。在这位修正主义者看来，“太阳”的社会主义光辉晒得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不了，现形了，“流汗了”，“过份了”，这就是“太阳”的“过失“所在。其实，这正是“太阳”伟大的地方。那些躲在阴暗角落里的牛鬼蛇神、臭虫虱子、细菌病毒，只有让它们见一见“太阳”的光和热，才会死亡；真正的劳动人民，正是在太阳光辉下锻炼得坚强起来的。不晒太阳，不流汗，身体怎么会健壮起来？咒骂“太阳”的“光和热”，其实就是咒骂无产阶级“过火了”，咒骂社会主义、人民公社“过份了”，这是十足的资产阶级的黑话，正好暴露自己是见不得阳光的鬼物。

陶铸不是在《松树的风格》中赞美“松树”“在夏天它用自己的枝叶挡住炎炎烈日”[30]吗？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是抵挡不住的，硬要向光明宣战，只能使自己从黑暗中堕落进更黑暗的地方去。

值得注意的是：一九六五年《理想》再版时，“以太阳来歌颂我们的党和领袖”这句话，忽然改成了“以太阳来歌颂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这真是欲盖弥彰，绝妙地自我暴露出作贼心虚的贼子心肠！你删去“领袖”二字，岂不正说明了，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你写这篇文章和出版这本书时，矛头是针对伟大的领袖的吗？如若不然，何必慌慌张张地删去？你在“党”前面添上“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岂不正说明了，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你写这篇文章和出版这本书时，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了吗？如若不然，何必急急忙忙地添上？心中有鬼，脸上变色，就这样手忙脚乱了。一九五九年五月，陶铸不是在汕头一次报告中大喊“要学习海瑞的风格”以配合彭德怀的进攻吗？看来这个“海瑞”的“风格”并不那么“高”，本事也很拙劣。然而这一改，配合彭德怀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罪行，却是不打自招，铁证如山，无可抵赖了。

一九五九年九月下旬，庐山会议开过了，彭德怀反党集团被揭露了出来，修正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被彻底粉碎了。这位修正主义者在《胜利得来不易》一文中，不得不装模作样地对“一小部分人”的“热衷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31]表示了不满。可是，这“一小部分人”是谁呢？不就有你吗？不正是你在文章中命令报纸上必须“刊登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尽管这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也应该刊登”[32]吗？不就是你热衷于暴露社会主义的所谓“黑暗”“黑点”吗？这是赖不掉的。正因为有他一份，这篇文章中，他对这“一小部分人”表示了无限的同情，说什么“我们提起这些人，是希望他们转变立场，首先把身心都参加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列里来”[33]。这是劝告破了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伪装成“转变立场”，混进革命的“行列”中来继续干反社会主义的勾当。

对无产阶级咬牙切齿的仇恨，对资产阶级无微不至的爱护，这就是陶铸的“感情”，剥去伪装的画皮，站着的就是这么一个恶鬼。

腐朽不堪的"文采"

装腔作势的文风，歪七歪八念都念不通的文字，硬要自封有什么"文采"，真是丑死了！活象那些附庸风雅的土地主，明明一窍不通，硬要摇头晃脑哼哼几句八股调一样。

虽然没有什么"文采"，书中却十分卖力地宣扬了整套整套的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陶铸忠实地执行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文艺纲领，同陆定一，周扬完全是一丘之貉。

一九六O年春，旧文化部夏衍、陈荒煤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开所谓"全国新闻纪录电影创作会议"时，就把《思想·感情·文采》这棵大毒草作为大会文件印发给大家"学习"。可见他们勾结之深。为了反毛主席的文艺路线，陶铸几乎把文艺界流传的各种反动论点，什么人性论、"写真实"论、"创作自由"论、"中间人物"论、"有鬼无害"论……，统统收罗进他的黑店中。下面略举一二，稍加驳斥：

"共产党员是讲感情的……除了反革命分子以外，对一切人都要有感情。"[34]在阶级社会里，只有阶级的感情，没有什么超阶级的感情。这里的"感情"指的是"爱"。"对一切人都要有感情"，就是现代修正主义的"要爱一切人"，就是要爱剥削阶级，爱叛徒，爱奴才，爱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向反动派屈膝跪拜的最无耻的行径。

"要充分发挥作家创作上的自由。作家的笔是他自己的，作家的思想也是他自己的，我们应该让作家独立创作。"[35]这是赤裸裸的裴多菲俱乐部的反革命口号。没有抽象的自由，只有具体的自由。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只有阶级的自由，没有超阶级的自由。一切文艺创作，都是为一定的阶级的政治服务的。没有也不可能有脱离阶级的政治而"自由"的文艺。任何一个人，包括作家，他的思想不管具有何种特殊的形式，都不是什么孤立的"自己的思想"，而是一定阶级思想的表现，是一定阶级的利益、愿望的表现，是一定社会阶级关系的反映。七亿中国人民有七亿种"自己的"思想吗?当然不是，基本上只有两种，一种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即毛泽东思想；一种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即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离开毛泽东思想的什么"创作自由"，什么"独立创作"，就是鼓动牛鬼蛇神"自由"地去攻击社会主义，宣传资本主义，而剥夺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击他们的一切自由，为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勾当服务。什么"创作自由"，不过是死心塌地当资产阶级奴才的一块遮羞布罢了！

"生活是多方面的，不拘一格，不要划一个框框。"[36]这就是那个"反题材决定论"，其目的是在反对"框框"的借口下，反对革命作家努力去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反对努力去歌颂工农兵，反对努力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生活是多方面的"，其实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劳动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的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斗争生活，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反动派抵抗历史前进的腐朽反动生活。我们应当以真正意识到自己历史责任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生活为主体，为方向，为歌颂和描绘的中心，通过这样的典型的英雄人物，来反映我们这个史无前例的英雄时代，来反映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力量和伟大胜利。那些资产阶级的反动腐朽生活，只能作为批判、鞭挞，揭露的对象，决不能作为创作的主要的"方面"。"不拘一格"，总有一格，你心目中的"生活"，其实就是你赞不绝口的《三家巷》中那些资产阶级的下流情绪和靡靡之音，是一些在历史的垃圾堆中霉烂了的渣滓，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文艺作品只要"真实地反映了现实，……我看，它的作用有时也不在社论与报告之下。"[37]这又是胡风"写真实"论原封不动的翻版。任何文艺作品所塑造的形象中，都表现着作者的政治的倾

向性，表现着作者的阶级的爱和憎，没有什么抽象的、旁观的“真实地反映了现实”。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才能够从本质上真实地反映出历史的进程。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反动文艺歪曲工农兵、歪曲现实，则是它们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必然结果。提倡抽象的“写真实”，就是要反对文艺宣传毛泽东思想，反对文艺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抹杀和掩盖文艺的阶级性，替那些美化剥削阶级、丑化无产阶级的大毒草找一个“理论”根据。这已经是资产阶级文艺武库中最破烂最陈腐的货色了。

“可以看好的方面，也可以看坏的方面，……要允许作品中写缺点……不要给人家一个印象，似乎要歌颂人民公社，就要把人民公社说得一下子好得很了。”[38]这就是“暴露黑暗”论，这是毛主席早就痛斥过的“光明与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的反动理论的翻版。我们应当区别生活中的主流和支流。只有抓住主流方面，才能典型地反映出社会前进的本质。支流只能作为主流的一种陪衬，作为表现本质的一种手段，作为全局的次要的侧面，作为前进过程中局部的、暂时的曲折，不能当作生活的主要内容。我们应当以写光明为主，以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即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为主，以反映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震天撼地的英雄气概和斗争智慧为主，以塑造我们时代的工农兵英雄形象为主，而不是什么“好的方面”“坏的方面”一半对一半。写人民公社，当然要充分歌颂人民公社的优越性，难道还需要把各种发展过程中的缺点错误统统罗列出来吗？有一支歌，叫“人民公社就是好”，难道还需要同时再加上一句“人民公社有缺点”吗？夸大、渲染和恶毒地捏造那些局部的、个别的现象，这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进行造谣诽谤的老谱，这位老右派不过依样画葫芦罢了。以歌颂光明为主需要回避矛盾吗？需要回避敌人的挣扎和反扑吗？需要降低冲突尖锐性吗？不需要。社会是在阶级斗争中前进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总是在同资产阶级反革命力量剧烈斗争中开辟前进的道路的，只有通过对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典型的历史概括，才能够深刻地而不是表面地、雄伟地而不是贫弱地把光明、胜利、英雄人物写出来。陶铸的“暴露黑暗”论，将同他黑暗的灵魂一起，被革命人民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

要识别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

从以上的几个方面，人们不难看出，陶铸完全是一个漏网的大右派，是一个修正主义者、是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忠实的执行者和宣传者，是一个混进来的反革命两面派。对于书中贩卖的那一套国民党的反动哲学和其他毒素，要进行彻底的消毒。

陶铸是一个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他顽固地坚持资本主义的政治方向。他极端仇恨社会主义，他日夜向往着资本主义。从政治上、文化上到生活上，他的“理想”都是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他头脑中装满了从叛徒哲学到“士为知己者死”之类剥削阶级反动的世界观。但是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不被揭露，他不得不包上一点革命的外衣来伪装自己。此人极不老实。两面三刀，夸夸其谈，忽而慷慨激昂，忽而转弯抹角，是他的惯常的表演。但是，只要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根本问题上，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照一照，这种伪装就立刻会拆穿，原形就会毕现。这两本书，不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铁证吗？

凡是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都是篡党的阴谋家。他们为了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千方百计用各种阴谋手法扩大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手中的权力，无耻地自我吹嘘。陶铸抛出这两本书，不但是为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

准备，也是扩大他们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权力的一种手段。书中有一篇文章，叫做《西行记谈序言》，这《西行记谈》原来叫做《随行记谈》，就是他带着几个黑秀才"随"着他出去四处游荡，然后他信口开河议论一番，黑秀才们就当作圣旨一样"记"下来，加以修饰，在报上发表。"记谈"，就是"记"他的"谈"话。这样，居然"共得二十七篇"！居然都拿出去发表！居然由他本人定名、作序、题字！这不是明明自己想当"南霸天"吗？《理想》及《思想》，在宣传那些反动观点时，充满了这类炫耀权力的自我吹嘘。他是要用这些"作品"，作为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夺权的舆论准备。陶铸从地方到中央之后，手伸得那样长，向无产阶级夺权的狂热在几个月中暴露得那样突出，不择手段地招降纳叛，收买已被革命人民揭露的坏人，抗拒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打击革命派，以致任何两面派的手法也掩盖不住这种反革命野心。从这个反面教员中，我们不是可以找到识别赫鲁晓夫式人物的一个重要教训吗？

陶铸是一个卑劣的实用主义者。他有一张投机商人的嘴巴。为了推销修正主义，为了攻击和反对所谓"教条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忽而显出极右，忽而装作极"左"，以腐蚀、迷惑和欺骗那些不坚定的中间群众，以保护自己不被揭露。陶铸在到中央宣传部担任领导工作以后，他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的忠实执行者。他竭力反对毛主席《炮打司令部》这张伟大的大字报。他竭力保护那些牛鬼蛇神。可是当群众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他摇身一变，立刻以极"左"的无政府主义的面貌出现，大叫大喊："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是正确的"，"每个司令部都不知是什么司令部……我是主张普遍轰！""任何人都可以反对"！他大大"创造性"地"发展"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看来"左"得出奇，其实是形"左"实右，其目的还是混淆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区别，把矛头引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使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能在混乱声中蒙混过关。什么"怀疑一切"，统统是用来对付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怀疑一切"，就不怀疑他自己；"打倒一切"，就不打倒他自己，你说怪也不怪！？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青年人要猛省过来，反戈一击，切勿上当。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对这类人物，只要用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阶级分析的方法，看一看他们对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态度，看一看他们支持谁、反对谁的政治倾向性，看一看他们的历史，便可以从变化不定的形象中发现一只反革命的黑手。他们越是要掩盖已经暴露的部分，貌似特别"过火"或"公平"，便越是更充分地暴露自己野心家面貌，如陶铸这个修正主义者，明明是贼，偏要装圣贤，明明是极右的公开宣布同资产阶级"心连心"，偏要忽而跳到极"左"的"怀疑一切"。然而矛头却始终对着无产阶级革命派，这就把他野心家的面貌揭露得一清二楚了。

阶级斗争的深入，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迫使敌人不断改变自己的斗争策略。当一种反革命阴谋被识破后，敌人又会使出另一手，交替而用之。然而这些败类是逃不过明察秋毫的毛泽东思想的。在当前胜利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十分注意斗争的大方向。十分注意维护以

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十分注意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统一的作战部署，十分注意掌握政策和策略，十分注意团结大多数，十分注意不让陶铸式的人物从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方面搅乱了我们的阵线。左派犯错误，右派利用，历来如此。在大批判中，通过总结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我们是应当更深刻地懂得这一点的。

《红楼梦》第五回里有一首曲子，叫做“聪明累”，头两句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自以为“聪明”的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在暗底里玩弄了许多“机锅” 一直到陶铸发明的“著名”的“换头术”（即为了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在照片上突出第二号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把他的头像剪下来装到另一个人的身上），可算登峰造极了，但到头来不过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为自己垮台创造了条件。武汉地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是这样一种头脑简单、思想反动的蠢人。玩弄阴谋的人是没有好下场的，广大群众一起来，什么坏事也隐藏不了。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修正主义坏蛋们必然垮台，这就是历史的判决。这一小撮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无论如何挣扎，如何诡辩，决计逃不过这个历史的判决。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滚滚向前。毛泽东思想的闪闪金光照耀着全中国、全世界。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勇敢的，中国的革命的人民是勇敢的。我们一定要把这场大革命进行到底。来自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扑、攻击、造谣、挑拨、来自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种种诬蔑、歪曲、诽谤、叫喊，决不能阻止我们的前进，只能够证明他们自己无比的愚蠢和日暮途穷。同志们，举起双手欢呼这涤荡中国大地的大风雨吧！毛泽东思想是无敌的。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革命的新生事物是不可抗拒的。人们将会看见：经过文化大革命这段伟大而曲折的道路后，一个空前强大、巩固和统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将如巨人般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给予二十世纪的吃人魔鬼们以更沉重的打击。

（原载 1967 年 9 月 8 日《人民日报》）

注：

(1) 《思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 77 页。

(2) 同上，第 61 — 63 页。

(3) 《关于人民内部矛盾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如何正确地处理广东人民内部矛盾》，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及五日《南方日报》。

(4)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 5 页。

(5) 同上，第 20 页。

(6) 《文艺报》一九六五年 11 期，第 3 页。

(7)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 51 页。

(8) 同上，第 45 页。

(9) 同上，第 112 页。

(10) 同上，第 95 页。

(11) 同上，第 50 页。

(12) 《思想·感情·文采》，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 37 — 38 页。

(13)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 49 页。

(14) 蒋介石:《国父遗教概要》,第二讲。

(15)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 42 — 43 页。

(16)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 868 页。

(17) 《思想·感情·文采》,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 21 页。

(18) 陶铸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对广东"民主人士"的讲话。

(19) 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 1 页。

(20)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27页。

(21)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 67 页。

(22) 中国赫鲁晓夫:《同民建会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的谈话纪要》,(一九六O年二月十二日)。

(23)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 68 — 69 页。

(24) 中国赫鲁晓夫:《在北京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

(25)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 69 页。

(26) 《文艺报》,一九六五年第 11 期,第 6 页。

(27) 中国赫鲁晓夫:《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一九四一年)

(28)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 67 页。

(29) 同上,第 9 页。

(30) 同上,第 4 页。

(31) 同上,第 26 页。

(32) 同上,第 11 页。

(33) 同上,第 27 页。

(34) 同上,第 75 页。

(35) 《思想·感情·文采》,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 33 页。

(36) 同上,第 45 — 46 页。

(37) 同上,第 3 页。

(38) 同上,第 46 — 47 页。

照　办　　　毛泽东　　　九月十三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关于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商品,冲击仓库,确保国家财产安全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

最近,有些地区不断发生抢夺国家粮食、现金、各种物资、冲击仓库和拆毁机器设备的严重事件。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违法行为,必须立即严加制止。为了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商

品，确保国家财产安全，特作如下通知：

一、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通令》中所规定的："社会主义的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绝对不可侵犯，革命群众都有保护的责任，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侵占，不准砸抢，不准用任何借口进行破坏。"各地必须根据这一规定，坚决制止抢夺国家和集体财产的事件发生。

二、对于已经发生的抢夺国家财物的事件，要严肃处理。已抢夺的国家财物要一律追回。原物在的，要退还原物；损坏了的，要酌情赔偿；吃掉用掉了的，除按价退还现金外，还要按数退还粮票和布票。抢夺的现金，要如数追回，用于个人生活，一时归还不了的，要分期从本人工资中扣还。

对于参与抢夺事件的受蒙蔽的群众，要进行批评教育，帮助他们认识错误，可以不追究责任。对于煽动闹事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带头抢劫的少数坏头头，以及混进来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实行专政，按照情节轻重，给予制裁，首恶者，必须严办。

三、人民解放军、公安机关、革命群众组织，要对保护国家仓库、金库、物资、财产的安全负责。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冲击、砸抢国家的仓库、金库、油库、冷库、营业场所和生产企业，不准侵占、抢夺和破坏国家的商品、劳保用品、仓库物资和财产，不准外部人员和无关人员进驻国家的仓库、金库和存放物资的场所。

四、对外出串连和从原地出走的群众，要动员他们回去就地闹革命，遵守劳动纪律，坚守生产岗位。已经掌权的革命群众组织，对于其它革命群众组织的职工群众，不得因观点分歧，克扣他们的工资和粮票，已经克扣了的要补发。

五、因武斗而造成停产的单位，从停产时起到生产恢复之日止，一律停发工资。经查明以后，未参加武斗的人员，他们的工资以后再行补发。

六、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广大群众、干部和职工进行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进行保护国家财产安全的宣传教育，造成"保护国家财产光荣，破坏国家财产有罪"的强烈社会舆论，发动广大群众起来保护国家财产，监督和检举坏人。对于保护国家财产有功的群众和职工，要给予表扬和奖励。

在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节录）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七日）

《红旗》杂志社论

姚文元同志的重要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的发表，是彻底摧毁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颗重型炮弹。这篇雄伟有力的讨敌檄文，在全国范围内，推动了革命大批判的深入开展。

革命的大批判，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促进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搞好各

单位斗、批、改的推动力，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重大步骤。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空前大好。当前，最重大的任务是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推动各单位斗、批、改，最关键的问题是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革命的大联合，是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原理。

毛主席最近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工人阶级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坚决地执行毛主席的这个最新指示，做革命大联合的模范。

工人阶级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有共同的敌人，有共同的革命目标。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工人阶级最凶恶、最危险的敌人，是我们的心腹大患。我们只有联合起来，集中火力，集中目标，搞好革命的大批判，搞好各地区和各单位的斗、批、改，才能彻底打倒他们。

在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严重斗争面前，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联合起来共同对敌？我们有什么理由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现在，有些地方，为什么工人阶级内部分裂成为两派，联合不起来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最害怕革命的大联合。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他们就必然成为孤家寡人，彻底垮台。为了逃避革命群众的批判和斗争，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要阴谋，施诡计，挑拨离间，欺骗蒙蔽，操纵利用，制造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

一小撮地富反坏右是不甘心灭亡的。他们总是要施展各种卑劣手段，进行煽动，制造分裂，煽阴风，点鬼火，破坏革命的大联合，妄图达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目的。

工人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但是，它也会受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由于社会上的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以及“怀疑一切”等等以右的或极“左”的形式出现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潮的侵蚀，在工人阶级内部就出现了以小资产阶级派性代替无产阶级党性的现象，妨碍了革命的大联合。

追根溯源，工人阶级内部分裂成两派，是中国赫鲁晓夫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遗留下来的恶果。

只有扫除这些障碍，才能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我们必须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识破和粉碎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克服自己队伍中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潮，在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利用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进行阴谋活动，妄图破坏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所谓“五·一六”集团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这个反革命集团必须予以彻底揭露。彻底粉碎。

工人阶级应该是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派，要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联合起来，而不应该分成这个派那个派，闹派性。派性是扩大了的个人主义，是为了自己和自己的宗派小团体，不是为了人民，不是为了无产阶级。闹派性，闹分裂，就是不革

命，就可能被阶级敌人所利用，走到邪路上去。

目前正在掀起的革命大批判的高潮，必将促进革命的大联合，而革命的大联合，又必将推动革命大批判的深入开展，为各地区和各单位的斗、批、改创造良好的条件。革命的大联合，是当前革命形势的迫切需要，是工人阶级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共同愿望。

在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下，革命的大联合万岁！

(原载《红旗》杂志 1967 年第 14 期)

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动员在外地串连的学生立即返回原单位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中央批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动员在外地串连的学生立即返回原单位的决定”，现转发给你们。

在外地串连的学生应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立即无条件地全部返回原地，集中力量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

〔附〕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动员在外地串连的学生立即返回原单位的决定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为了集中力量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对在外地串连的学生作如下决定：

一、除中央特许的少数人以外，在外地串连的学生应立即无条件地全部返回北京；

二、北京的学生在外地设立的联络机构，应立即全部撤销；

三、希望各地各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军区以及各革命群众组织，帮助动员北京学生立即返回原单位。

四、本决定，也适用于到本市农村、工矿企业、机关和学校串连的学生。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

毛主席批示：照办。　　　　　　九月二十三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关于在外地串连学生和在京上访人员立即返回原单位的紧急通知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一、在外地串连的北京和各地的学生以及其他人员，应根据中央的多次指示精神，立即无条件地全部返回原地、原单位欢度国庆节，并全力以赴地投入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促进本单位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

二、在北京串连的学生和上访人员，要积极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战斗号召，迅速返回原地，同本地区的革命群众一起庆祝国庆节，并坚持就地闹革命，搞好本地区、本单位的革命大批判和斗批改，促进本单位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如确实需要，经中央联合接待室同意，可以留下个别代表在京反映情况，其余的一律回去。

三、北京和各地接待机构（包括学校、机关、军队、工厂、农村人民公社在内）从九月二十八日起，一律停止招待外来串连的学生和其他人员。各地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军区和各革命群众组织，应切实负责动员和帮助到该地串连的北京和各地学生以及其他人员返回北京，返回原地。

四、所有北京学生和其他人员在外地设立的联络机构，以及外地串连学生和上访人员在北京设立的各种联络机构，都应在九月二十八日前全部撤销，各有关单位再不负责招待。

五、北京学生和其他人员在北京各部门、各机关、各军事单位、各工厂和近郊农村人民公社设立的联络机构，亦限于九月二十八日前全部撤销，各有关单位再不负责招待。

六、中央责成铁道部立即组织北京和各地之间的客车专运，务必在限期内完成运送计划。

这一通知可在城乡各地张贴。

毛主席批示：照办。　　　　　　九月二十三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关于取缔私设电台、广播电台、报话机的命令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近日来发现有的地方私设广播电台，播送违法的派别性广播节目，有的地方私设秘密电

台、无线电报话机和报话网，擅自编造和使用密码，进行秘密通讯和通话。必须严肃指出：这些事是违反党纪国法、绝对不允许的。这种做法严重破坏了文化大革命，破坏了无产阶级专政。它不但造成了无线电波的传播混乱，影响了中央和地方电台正常广播，而且严重地泄露了党和国家机密，给党和国家造成政治上的严重损失。其中有一些，就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敌特分子搞的，必须引起我们高度警惕。

电台、广播电台、报话机等，只能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批准后设立的党、政、军的宣传通讯机关，只能反映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利益，决不允许用来为某一个派别服务。它必须严格遵守党和国家的纪律和规定，决不允许出现无政府状态。为此，中央重申：一切私设的电台、广播电台、报话机等，应自即日起立即无条件地全部撤除。严禁私自编造和使用密码。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私设电台、广播电台、报话机等。今后如再发现有私自设立电台、广播电台、报话机、编造和使用密码等事，当以国法论处，并由当地卫戍司令部、警备司令部、驻军或其他军事领导机关执行。

此件可在城乡广大革命群众中宣读。

毛主席同首都五十万军民欢度国庆（节录）

（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日）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十月一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同首都五十万军民一起欢庆中国人民的光辉节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太阳升，大地红。在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的今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今天，亿万革命人民心向红太阳，心向天安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节日庆典和游行检阅。

毛主席最近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回到北京，今天又来到群众之中共庆节日。毛主席和群众永远在一起，群众和毛主席永远心连心。在整个节日庆典和游行检阅过程中，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精神焕发，神采奕奕，不时向大家亲切招手，致节日的祝贺。

同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有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和各方面的负责同志：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宋庆龄、董必武、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谢富治、江青、杨成武、粟裕、戚本禹、叶群。

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台的还有：

张云逸、许世友、黄永胜、韦国清、陈锡联、韩先楚、萧劲光、李作鹏、吴法宪、余立金、潘复生、冼恒汉、李天佑、王新亭、邱会作、郑维山、蔡畅、邓颖超、汪东兴、吴德、傅崇碧；

郭沫若、何香凝、李雪峰、刘宁一、程潜、张治中、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宋任穷、张鼎丞、谭冠三、高崇民、蔡廷锴、李四光、傅作义、滕代远、谢觉哉、沈雁冰、许德珩、李德全，以及李宗仁先生。

今天，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庆祝大会的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还有王首道、王维舟、刘晓、萧克、王震、曾山、罗贵波、帅孟奇、李涛、陈奇涵、陈漫远、范文澜、陈正人、方毅。

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庆祝大会的还有：

人大常委会委员王昆仑、王淦昌、贝时璋、邓初民、卢汉、叶渚沛、史良、庄希泉、朱良才、华罗庚、严济慈、吴有训、张爱萍、陈劭先、陈其尤、陈其瑗、陈垣、邵力子、茅以升、林兰英、林巧稚、罗叔章、竺可桢、季方、周纯全、孟继懋、施复亮、赵九章、赵忠尧、胡子昂、胡厥文、胡愈之、章士钊、龚饮冰、童第周、谢南光、熊克武；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各军种、兵种、院校、驻京部队等方面的其他负责同志，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英雄模范的代表袁子钦、路扬、李静、胡炳云、吴保山、叶运高、金涛、郭天民、张池明、张令彬、罗舜初、刘华清、蔡顺礼、钟赤兵、张震寰、王宏坤、周希汉、张秀川、罗元发、邝任农、王辉球、曹里怀、常乾坤、陈仁麒、李天焕、吴烈、黄志勇、陈士榘、谭辅仁、罗华生、江文、黄文明、李真、吴先恩、陈先瑞、萧文玖、董其武、韩伟、黄振棠、黄作珍、李钟奇、向仲华、刘忠、莫文骅、宋维栻、肖力、王世藩、廖初江、年四旺、王瑞昌、乔喜增、宾若文、于兆田、张春玉、史玉彬、李慎廷；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范普权、刘锡昌、徐铠、王景瑞、鲁文阁、牟立善、苗永昆、邓万田、罗瑞华、张桂福、聂元梓、刘绍文、谭厚兰、蒯大富、韩爱晶、丁国钰、牛连璧、王大宾、李冬民；

中共中央各部门、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袁任远、王良恩、李清泉、曹轶欧、唐平铸、王唯真、杨世荣、黄火星、郝德青、韩念龙、徐以新、余秋里、杨奇清、李震、严佑民、于桑、刘文辉、高文华、朱互宁、兰文兆、吕世英、陈华堂、贺光华、胡兰芝、张元培、阎揆要、周特夫、王素、宋承志、陈德三、王乐天、李良汉、李大同、王云、杨卫群、苏静、赵启民、朱学范、陈挽澜、刘忍、殷承祯、沙千里、樊省轩、范子喻、李东野、张奚若、楚图南、樊九思、郭世荣；

在京的各省、市、各军区的负责人汪家道、张日清、陈永贵、张江霖、刘明乾、马继文、王中山、薛宏福、杜平、梁楫卿、杜方平、吴大胜、钱钧、廖成美、杨广立、李德生、张文碧、刘兴元、温玉成、陈德、李成芳、陈康、张力雄、陈明义、萧思明、孔石泉、陈发洪、任思忠、邱国光、欧致富、龙书金、曾绍山、江拥辉、李伯秋、杨弃、廖容标、王绍渊、康健民、黄经耀、胡炜、秦基伟、左齐、马辉、曾美、陈仁洪、廖鼎琳、李光军、徐信、符先辉、贺明、杨银声、刘俊秀等。

（新华社1967年10月1日讯，载10月2日《人民日报》）

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日）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在这个光辉的节日，我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代表党中央，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中央军委，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向全国的工人

们、农民们、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们，向全国的红卫兵们，向全国的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向全国各族人民，致最热烈的敬礼！向来自世界各国的同志们、朋友们，表示衷心地欢迎！

今天，我们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刻，在国内外一派大好形势下，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的。

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普遍到全中国。几亿人民发动起来了。从首都到边疆，从城市到农村，从工厂车间到工人家庭，从十来岁的娃娃到白发苍苍的老人，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从来的群众运动也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样广泛和深入，广大的工农群众，广大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广大的红卫兵，广大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一年来的斗争中，逐步地联合起来，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他们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把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得落花流水，全面崩溃。

被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吓破了胆的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曾经把希望寄托在这场大革命会把我国的国民经济搞乱。事实同这些老爷们的愿望恰恰相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我们的工业生产胜利的捷报，正在不断传来。我们的农业获得了连续第六年的好收成。我们的市场繁荣，物价稳定。我国氢弹爆炸的成功，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水平。更为重要的是，这场文化大革命，教育了群众，教育了青年，大大地促进了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促进了各族人民的大团结，锻炼了干部，锻炼了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我们伟大的祖国，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大。

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由无产阶级自己发动的第一次大革命。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天才的、创造性的划时代的新发展。

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不但要从组织上彻底地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而且要开展更广泛更深刻的革命大批判，把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倒批臭，使他们永世不能翻身。这种大批判，应当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插遍一切阵地。

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根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牢牢掌握毛主席指示的革命斗争大方向，跟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革命的大批判中，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巩固和发展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要斗私，批修**。斗私，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自已头脑里的"私"字作斗争。批修，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反对修正主义，去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这两件事情是互相联系的，只有很好地斗掉了"私"字，才能更好地把反修斗争进行到底。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用"**斗私，批修**"这四个字为纲，加强对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的思想教育。要开办各种学习班，中央办，地方办，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也可以办，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通过学习，帮助我们的老干部，新干部和革命小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头脑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思想政治水平，为人民立新功。

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抓革命，促生产**"，大力促进我们的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迅速提高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

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开展"**拥军爱民**"运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国内

外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思想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的运动，毛泽东思想一旦为亿万群众所掌握，就成为不可战胜的物质力量，就可以保证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永不变色，就可以使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沿着毛泽东思想的道路胜利前进!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打倒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

打倒以苏修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

坚决支持越南人民伟大的抗美救国战争!

坚决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坚决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一定要解放台湾!

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万岁! 万万岁!

(原载 1967 年 10 月 2 日《人民日报》)

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月七日)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时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最近两个多月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在视察过程中，毛主席对各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

现将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记录稿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组织群众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以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为武器，总结前一阶段运动的经验教训，制定贯彻执行的具体措施，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各地要将贯彻执行的情况报告中央。

记录稿未经主席审阅，不要在大小报纸和刊物上发表。

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

（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毛主席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

毛主席说，有些地方前一段好象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毛主席说，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毛主席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在谈到革命大联合以谁为核心时，毛主席说，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工人，什么打仗，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他们都不懂。

毛主席说，要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向坏人专政的问题。毛主席说，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例如，北京大体就是这样做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政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人。

一个组织里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

关于干部问题。毛主席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有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一时想

不通，还应该给他时间，让他多想一个时候。要允许他们思想有反复，一时想通了，遇到一些事又想不通，还可以等待。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

毛主席说，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

关于上下级关系问题。毛主席说，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

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者会议上讲。

我们现在有的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

关于教育干部的问题。毛主席说，干部问题，要从教育着手，扩大教育面。不仅武的（军队），还要文的（党、政），都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中央、各大区、各省、市都要办学习班，分期分批地轮训。每省都要开县人武部以上各级干部会，一个省二、三百人，多则四、五百人，大省应到千人左右。半年之内争取办好此事，否则，一年也可。

今后，争取每年搞一次，每一次的时间不要太长，大体上两个月左右。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对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同他们讲道理。

毛主席在视察各地的过程中，高度赞扬了广大工农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功勋。毛主席号召他们、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全国都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二日）

《人民日报》社论

最近，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要斗私，批修**。林彪同志说：“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用‘**斗私，批修**’这四个字为纲，加强对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的思想教育。要开办各种学习班，中央办、地方办，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也可以办，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了加强革命队伍的思想建设，普遍举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取得了许多好经验。我们希望全国各地，都象上海那样，充分发动群众，创造出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更多的好经验，好办法。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归根到底，是改造人们世界观的大革命。在这场大革命中，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一直进行着激烈的冲突和斗争。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都在按照阶级斗争的规律，顽强地表现出来。要战胜资产阶级思想，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上来，要使我们在防修、反修的斗争中获得最大的战斗力，就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作斗争。

经过一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每一个革命干部，每一个红卫兵都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取得了许多正面和反面的经验。这就为我们大学习、大总结、大提高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

以"**斗私，批修**"为纲，普遍地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是帮助老干部、新干部和红卫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思想政治水平的好形式、好方法。这是我们党教育群众，教育干部的光荣传统，是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前进的重大战略措施。

我们的老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好的。他们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为党、为人民做了许多工作，立下了功劳。但是，他们中有的人，在和平环境中，放松了自己的学习和改造，不同程度地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同时，他们对于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缺乏经验，很不理解，在运动中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就是要从教育着手，扩大对干部的教育面，给他们以时间和机会，认真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发扬成绩，改正缺点和错误，更好地理解、掌握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鼓励他们放下身上的包袱，大踏步地跟上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

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同时就是要不断地向新涌现的干部灌输毛泽东思想，帮助他们学习和继承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使他们具有民主作风，具有自我批评精神，密切联系群众，密切联系实际，在政治上更快地成熟起来。

对于在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红卫兵队伍来说，也有一个改造世界观的任务。如果不用毛泽东思想去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放松了对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斗争，这些革命新兵，这些革命小将，也就有可能犯错误。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就是要加强对红卫兵的教育。革命干部要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去教育和引导他们。对他们作政治思想工作，主要是同他们讲道理。

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很好地结合一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要学用结合，边学边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通过学习，推动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进一步发展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依靠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互教互学。用整风的方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多做认真的自我批评，把自己头脑中的"私"字狠狠斗掉，把利己主义、实用主义、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无政府主义狠狠斗掉。

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发扬人民解放军的三八作风，不但要做到严肃、紧张，而且要

做到团结、活泼。要有民主空气，允许不同意见的争论和交锋。要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结合起来，使我们的队伍成为一支步伐整齐、生气勃勃的革命大军。

全国都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把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都办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这样，七亿人民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必将推进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四日）

（一）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

（二）各学校都必须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斗私、批修的指示。

（三）一切大中小学校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在教学的实践中，贯彻实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逐步提出教学制度和教学内容的革命方案。

（四）各学校应该遵照毛主席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的指示，要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教学的班、级、系的系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建立革命三结合的领导班子。

（五）各学校的教师和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除了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外，有些人过去犯了错误，只要他们能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就应该让他们站出来工作。

（六）各大中小学校都要立即积极筹备招生的事宜。

（此件在各学校内张贴）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

（一）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利于促进革命三结合的建立，以利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二）所有革命群众组织都应该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经过充分协商，按照不同的具体情况，遵照毛主席上述的指示办理。一切跨行业的组织，都应该在自愿的原则下，按行业进行必要的调整。

（原载 1967 年 10 月 18 日《人民日报》）

中共中央批转林彪“八·九”重要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

林彪同志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的讲话很重要。这篇讲话，运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武器，对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非常精辟的分析、并且对今后文化大革命的领导问题作了重要的指示。

现将这个讲话的记录稿转发你们，希望你们认真学习，切实执行。

林彪同志重要讲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接见曾思玉、刘丰同志的讲话

你们讲了很多情况，我没有你们熟悉。各地区的问题由总理、中央文革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来解决。不同情况有不同的方法。武汉的问题已经请示过主席，坚决按毛主席指示办。

毛主席指示我们，坏事在一定条件下会变好事。武汉事件是很坏的事情，现在变成很好的事情，对全国各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有很大的推动，教育意义很大。这一次把一些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暴露了，把反对革命路线的一方暴露出来，革命的一方，也表现出来了。这里是阶级斗争最尖锐、最激烈、最紧张的地方。

过去我们对个别军区有些不放心，文化大革命解决了这个问题。事物的规律是坏到了顶点、就要向好的方面转。革命的力量总是前进的，反动的力量总是要失败的。某些人不管怎么样反动，总是顶不过革命洪流。隐藏不如暴露，坏人、坏事，暴露出来就是好事，与其包着脓包，不如让它穿头。毛主席指示，烂透了的就可能迅速好转，不痛不痒的就会拖下去。坏人不完全暴露，就没有理由把他打下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得很，已经取得了伟大辉煌的胜利。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靠两个条件：一是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是靠解放军的力量。在这样两个条件下，我们放手发动群众，各种坏事让他充分暴露出来。有了这两个条件，坏事就可能变为好事。没有这两个条件，特别是没有毛主席英明领导、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个条件，是不行的。在毛主席的坚强领导下，才有这个胆略和气魄。现在有毛主席健在，亲自领导，亲自掌舵，在文化大革命中，让各种坏事充分暴露出来好，各种隐患诱发出来好。经过文化大革命，经过乱，经过破，经过革，转化为治，转化为立，转化为胜利，转化为建设。

这次文化大革命胜利很大。真是代价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最大。表面看来很乱，乱是把反动路线搞乱了，把反动阶级搞乱了，把他们都暴露出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倒了。现在不少地区党、政机关都瘫痪了，表面上看来很乱。这个乱是必要的，正常的，不乱，反动东西就不能暴露。我们敢于这样做，正是有毛主席的最高威信和解放军的力量。有这样的条件，不让他们暴露什么时候暴露呢？乱，在毛主席领导下是不怕的。

乱有四种情况：（一）好人斗坏人，应该。（二）坏人斗坏人。这是"以毒攻毒"，是我们可以间接利用的力量。（三）坏人斗了好人，象北京军区、海军、空军、总参、总后就有过这样的情形，好人挨整，暴露了坏人，锻炼了自己，好人吃点苦头，但尝到很大的甜头。（四）好人斗好人，这当然不好，有误伤，有损失，但可以从中得到教训。这四种情况，前三种都有利，只有第四种差些，但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容易解决。

坏人斗好人，好人挨了整，邱会作同志被总后当权派中的一小撮坏人搞了一个多月，几乎被整死。海军的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也是被整。吴法宪同志也是这样。过去你们吃了苦头，现在尝了甜头。如果是坏人整好人就不要怕，顶多就是邱会作、李、王、张、吴法宪那样，要顶住，要沉住气。要看到形势对我们很有利，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个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最有效的措施。只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健在，只要有毛主席的崇高威信和解放军的力量这两个条件，就不怕，坏人一定会受到批判，受到惩罚。就是乱翻了天，也能够拧过来。

各地区的同志有的犯错误,能挽救的还要挽救，现在没有垮台的，都不希望他垮下去。有的干部犯错误，只要能挽救的，就尽量使他不要垮。但是自己应该下决心改正错误。如果自己不下决心改正错误，硬要往垮的路上走，就没有办法。

要不垮，办法有三条：

第一，紧跟毛主席、党中央。向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请示报告，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就不报告中央，不要以为是小事，就自己处理，不要以为自己聪明，就不请示报告，也不要怕麻烦中央。中央是不怕麻烦的，是有这个精力和能力来解决问题的。无论大事小事都要请示报告。总理和中央许多同志都是日日夜夜工作的。可以发电报、打电话，打电话看到的人少，又传得慢，打电报，大家都可以看到，还可以自己坐飞机来嘛，一两个小时就可到，不要自己想当然，自作聪明，自作主张。往往自己以为对了，实际上不对，自己以为差不多了，实际上差得满远。这是我反复要讲的，是三条当中最重要的一条。

第二，紧紧掌握底下的情况，对左派、右派和各群众组织都要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情况。要听取两方面的意见。毛主席说：调查研究是基本功。只有掌握了真实情况，才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第三，现在经过一年文化大革命，左派右派阵线分明，你们绝不能以是否冲军区来划分左派右派，要以拥护还是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以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毛主席来作为划分左右派的根据。要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站在左派一边，站在革命群众一边。不要单纯从成份纯不纯、党员多不多、干部多不多来分左右派，来看问题。阶级成份是必须注意的，不注意会犯错误。但不能唯成份论，主要要看政治表现，看站在什么路线上。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站在哪一边，这是个立场问题，是个首要问题，其他都是附带的问题。对待保守组织的群众要进行充分的政治思想工作，要进行分化争取工作，不要使他们和革命派长期对立，要争取广大受蒙蔽群众过来，使他们站到革命派一边。对保守组织的个别坏头头，要按照毛主席指示的精神，发动保守组织的群众自己起来把他抓出来。要坚决支持左派，把受蒙蔽的群众争取过来。左派本身有问题应强调联合，说服他们不要打内战，不要搞本位主义、风头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这些主义不利于左派，而有利于右派。对右派组织的群众不能简单粗暴地压制。出了问题，出了事情，要报告请示中央，不要急，要慢慢地有步骤地解决，把情况弄清楚了，报告请示中央批准了再办，这是毛主席一贯提倡的工作作风。

现在老实讲，耽心我们同志担负这样重的任务犯错误，对文化大革命不利。现在依靠军

队，军队不犯错误就好，要不犯错误，就要依靠左派，依靠群众，最重要的是请示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犯了错误就要高姿态，早认错比迟认错好，高姿态比低姿态好，改正的越快越好，这样群众就会满意、就会谅解。有错误不认错，遮遮盖盖，拖拖拉拉是不好的，坚持不改正错误是危险的，抗拒的办法是不行的。检讨了，改正了，就主动。部队介入文化大革命，都是仓促上阵的，情况不了解，难免犯错误，错了不认错，就被抓住辫子，错了改了，就会得到群众的谅解，受到群众的欢迎。共产党人要有这种不掩盖错误、勇于改正错误的精神。

过去的革命也是仓促上阵的。北伐战争、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各根据地的建立、土地革命、打土豪、打蒋介石、打日本都是仓促上阵的。经过几十年，农村情况已经熟悉，这些问题都清楚了。革命胜利之后，建立了新制度，进入一个新阶段，发生了新情况，出现了新问题。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全党许多同志过去没有仔细研究过，理论上、思想上准备不足。过去推倒三座大山，搞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一套。胜利后就变了，不知不觉地踏上了新的阶段，就是革资产阶级的命。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的命的命。这种革命，许多同志没有准备，没有认识，只有我们毛主席理论水平最高，在理论上、路线上、思想上、方针政策上高瞻远瞩，胸有成竹，早有准备，或者思想理论水平高的同志有准备，其他一般的同志都没有思想准备。过去我们对农村土地革命熟悉，对资本主义不熟悉，在美、英、法、日等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对资本主义的剥削侵略可以看的清楚，一个普通工人都能够懂得，但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我们过去又是在农村，许多同志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理解很少。假如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那一套旧思想、政策、理论来看今天的革命，就难免要犯错误，就不能理解今天的文化大革命。过去打土豪、打蒋介石、打日本的办法搬到今天，就不能不犯错误。犯错误有两种，一是肯改，一是不肯改。肯改，党和群众就欢迎，不肯改，就将毁了自己。

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对社会主义革命有极其伟大的意义。但是我们很不理解，进入了新的社会制度，作的新的事，脑子里还是老的一套概念。我们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但过去的领导班子，只有以毛主席为首的领导核心才是真正马列主义的，除毛主席为首的领导核心之外，不少人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有的是资产阶级分子，所以犯很多错误，而这种错误，非纠正不行，绝不能因为犯错误的人多就不纠正。如果不纠正，就会不知不觉地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资本主义国家，使我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国家就会变颜色，有些人就会变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是通过文化大革命达到政治大革命。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文化大革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大革命，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政治革命，是政治思想上的大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这个政治上思想上的革命，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不经过这个政治思想上革命，就弄不清楚那些是社会主义，那些是资本主义，自以为是社会主义，实际上变了，变成了资本主义。只有真正理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是把毛主席思想搞通，才能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才能分清左右，分清正确和错误。否则，就会分不清敌我，分不清是非，把右的当成左的，把错的当成对的。今后要在毛主席领导下要好好学习，好好改造世界观，把毛主席思想学习领会通了，就是懂了马列主义，才能不犯错误。

搞好文化大革命一定要靠毛主席缔造的人民解放军。要避免犯错误，就要多请示主席、中央。另一方面，要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要政治挂帅，要学毛主席著作，要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要朝着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前进，不要朝着资本主义发展，后退。

毛主席说，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用毛主席思想挂帅。

部队工作千头万绪，只要大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抓好两条路线教育，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不搞好学习毛泽东思想，不突出政治，就会迷失方向，甚至有的镇压人民，象内蒙一样。总政治部反谭政以后一段时期抓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办了一些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差了，跟不上形势。现在还要想办法，把总政机关改造好。

大学毛主席著作，主要依靠各大军区、军、师、团、营、连。抓毛主席著作学习是个法宝。工作主要是靠各军区，主要是抓好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抓好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要讲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多介绍左派的好处。教育部队正确对待革命左派、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当前要抓大批判，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只有抓好大批判，抓好政治思想工作，把干部、战士的头脑搞清楚，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了，才能完成“三支”“两军”任务。如果部队本身的革命化不搞好，一出去就会出洋相，犯错误。“三支”“两军”，是在地方党、政机关瘫痪了的情况下，要军队去接管，去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有的军队干部参加三结合，有的军队干部要调到地方工作。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但是有很多人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对政权的重要性，对领导班子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头脑不清醒。过去十七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控制着一部分党政机关，文化大革命以来，有的班子垮了，部分国家机器不灵，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领导班子很重要，领导班子就是政权，就是国家机器，过去旧的当权派领导班子垮了，实际上等于这一部分旧的国家机器不适用了。这同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不同，又有相同的地方。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控制的这一部分国家机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这一部分垮了，是好事，垮了没有什么坏处，垮就让它垮。垮了，军队去接管。

我们的领导班子，应该是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走毛主席革命道路的人组成。军队接管不要犯错误，如果犯了错误，就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立即改正。军区、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的干部，要照毛主席指示分期调来集训，重新学习毛主席著作，听取革命造反派的意见。要把错误当教材，来接受经验教训。保守组织中的坏头头也可以调来集训。过去的党政人员思想不通的，也要进行教育。不通，通过教育转变过来的就好，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就欢迎。应该按照主席教导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来对待干部。就是暂时被打倒的人，教育过来也是好嘛。大多数干部是可以争取过来的，思想不通的也可以争取过来，使他们改头换面。经过教育之后，大部分还可以用。能不打倒就不打倒，有些暂时打倒的，还可以重新教育过来。领导班子是国家机器，必须是合乎毛泽东思想的，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不适当的零件就要撤换，让他们受训，允许他们改正错误，继续革命。

刚才讲了，我对情况没有同志们熟悉，我参加的会少，知道的事情少，我说的话仅供同志们参考。大政方针和各项政策主席都有指示，许多问题总理、中央文革都解决了。

一再告诉你们，三个条件，特别是第一条。怕你们犯错误，事情宁可慢些，凡事要多考虑，不要急，拖几天，天塌不下来。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和文革小组其他同志日夜干，希望上上下下都要注意请示报告。

毛主席指示，向坏人专政问题，专政机关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右派组织的群众自己处理。例如北京，大体就是这样做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政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人。在保守组织中的坏头头和坏人，我们专政机关不要抓，解放军不要抓，让右派内部群众发动起来去抓。这样能促进内部分化。

部队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问题，应该请地方左派来当教员，要借这个东风。我们过去就是请贫下中农来作报告嘛。内蒙请保守组织作报告，所以把部队都引到邪路上去了。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
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

毛主席最近提出什么时候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如何准备这次大会的问题，并且指示张春桥、姚文元二同志在上海做些调查。现在把姚文元同志关于他们初步调查结果给主席的一封信发给你们参考，请你们也做好调查，并将调查的结果和你们的意见报告中央。

（此件可发至连队党支部和地方相应的组织）

主席：

这次回上海过国庆节，住了十二天，做了一点调查工作，开了几次调查会，到基层去看了一下，前一时期打得最凶的柴油机厂也去了。一接触群众，学习到很多生动活泼的新东西，深深感到，主席最近所提出的一些重要指示，都是集中地反映了广大革命群众内心的要求，抓住了当前革命运动中最重要、最关键的问题，所以具有无穷无尽的力量，譬如办训练班吧，干部需要，造反派头头也需要。有一个染化八厂，是生产活性染料的，七月份成立革委会，到现在自己已经办了八期学习班，每期一周到十天，学习“老三篇”和其他主席著作，造反派中队委员以上参加，犯过错误的干部也参加，着重解决两个问题：（1）如何用主席思想为指针，做好人的思想政治工作；（2）正确对待群众，团结群众，怎样才能不脱离群众。新干部掌权后，工人主要一条意见就是到群众中去较少了。这样学，效果很好。这种短期学习班，厂可以办，其他地方更可以办。他们一听到主席最新指示，立刻感到真像说到他们心坎里。

调查了几个问题：一、“九大”和党的问题；二、精兵简政问题；三、大批判问题；四、大联合问题。现先将前面两个问题向主席报告，并望指示：

（一）“九大”问题。

在四个座谈会（革委会、红卫兵、工厂和学校造反派党员、军队同志）上，根据主席的指示，征求了人们的意见。我们本以为大家会感到突然，其实不然，造反派中已经在议论了。可见群众心中是在思考这件事的。

什么时候开？绝大多数人的意见，都希望早开，多数主张在明年上半年，至迟不超过明年秋天。

代表怎么产生？是不是要从下而上一级一级选上去？少数同志认为要这样，多数认为不一定。他们说：“过去选举，其实候选人也是上面决定的。经过一年文化大革命，各种人的政治面貌，好人、坏人，看得更清楚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清楚，代表可以各方协商产生，在市、区里开党员大会通过。”“可以先从中央开始，开全国党代大会，有一个纲领，然后才开各级党代会，比较有利。”“毛主席说过，不在形式，而在内容，不在名称，而在实质。”还有些同志提出：“也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开‘人大’。可以和‘九大’同时开，解决刘少奇的问题”。

红卫兵说：“要多一些工人和红卫兵代表列席大会。”“最好能吸收一批工人和红卫兵入党”。

王明选不选？"刘邓陶"选不选？彭、罗、陆、杨选不选？一致说不选。"王明已经是苏联人了，还能选个苏修特务？""叛徒都不能选，这是一条大原则。""刘少奇是叛徒，要进一步批臭，清除出去！"也有人说："恐怕毛主席还是要保留几个反面教员的，那就听毛主席的话，希望不要太多，并且先要批透。"对刘的情况，大家比较了解；对邓有些人不很了解。

党的领导机关怎么办？许多同志的意见是：可以参考革委会的形式，把党、政、军统一起来，革委会中有党的核心，执行市委会的职权。好处是一元化，容易联系群众，减少层次，有利于有力地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有一种意见是：将来过渡到正式权力机构还应分市委、市人委，不然开人代会有困难，容易忙于政务而忽略党务、有些人无处安排。

很多同志主张：在已建立革委会的地方，应当有一个党的领导核心。优秀的造反派头头，可以吸收入党，或经常参加党的核心会议。这种核心，正如主席所指出的，不应主观主义地去建立，也不是自封的，而是在斗争中自然形成的，并且在斗争中发展的。整顿党组织，首先不是从基层，而是从领导机关开始。上海各区、县、局及相当于局级的单位，至十月五日，已经建立三结合班子的共三十五个，委员八百五十六人，其中党员四百五十七人，占百分之五十三。一批较好的党员实际上已被革命群众选进领导班子。有些优秀的革命派实际上起着党员的作用。我认为：这种意见是有一定道理的、可以参考，不知是否妥当？

"一月革命"前，党员参加造反派的很少，一般只有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五。到今年一月以后，一批党员就陆续参加造反派，其数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八十不等。阶级斗争的实际，说明了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必须建立在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战士、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的基础上，才能领导几万万群众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恢复党组织"这个口号不妥，容易曲解为"恢复"原状。应为整顿和改造。刘少奇一套修正主义货色，尚需继续大力批判。重点是：（1）党的性质任务问题。（2）建党路线问题（"生产好""听话"就可以入党）。（3）对群众关系问题。（这是根本问题，一些党员谈到因受黑《修养》的毒害而当修正主义的"驯服工具"，以及文化革命初期又受刘邓路线蒙蔽而压制群众，无不痛恨，有极深感受）（4）民主集中制问题，即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问题。这些都需要用毛泽东思想对刘少奇的那套修正主义观点作彻底的批判。不知这样综合是否对？

一致极其热烈地盼望："九大"前"毛选"五卷能出版；能够有一个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的材料。许多党员（特别工人造反派）希望更多了解党史，了解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怎样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了解某些人物的历史面貌。因为过去都是看《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现在那个东西已经不能用了。

（二）精兵简政问题。

这个问题很迫切。

这几个月中，市革委会人员大量增加。目前，有二十个工作部门，二千二百二十九人。办公室下面就有七百六十三人。这还不包括各革命群众组织的脱产人员。无论如何，这个机构是太庞大了。机构一大，各种坏人就会钻进来，领导干部就会脱离群众，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中，就必须会滋长山头主义。其中有一些部门（不是全部）人员增加正是由于山头主义在作怪。同春桥同志商量，至少要砍掉一半、三分之二以至更多。这个思想工作还是很艰巨的。主席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我们已向领导干部传达了。

关于干部和群众关系问题，精兵简政问题，思想、政治工作（训练班等）问题，继续进行大批判问题，《人民日报》，《红旗》，似需要有专门的社论。主席的重要指示，就在社论中分别引用。不知这样考虑对不对？

一月革命以来，十个月了。造反派的头头，大多数在斗争中逐步成熟起来，学习为无产阶级掌好权用好权，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在市和区，在基层中，我们见到了一大批敢于革命、敢于挑担子的生气勃勃的好干部。但也有一小部分同志开始被宴会、鼓掌、捧场、小汽车所陶醉，个别的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所打中，开始脱离群众，不再那样如饥似渴地去深入群众，做群众的小学生。有一个中学生红卫兵组织，给我们写了一封信，批评了一些头头的“追求名利，出风头，享乐”的坏作风，希望“敲起警钟，来个革命化”。这使我回想起一九四九年进城到“三反”的那一段短短的历史。除学习班外，春桥同志准备开一些小会，进行教育和深入谈心。

怕多占用您十分宝贵的时间。这封信就写到这儿。另两个问题以后再报。选了一份党员座谈会记录，请主席参阅。

致

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

姚　文　元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日

中共中央关于不准地、富、反、坏、右乘机翻案问题的规定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反映，目前有一些地、富、反、坏、右分子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到处申诉，无理取闹，趁机否定过去的罪行。中央重申过去的规定，不准地、富、反、坏、右分子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乘机翻案，个别错案，确实需要甄别的，也要放在运动后期处理。

在押犯人，在劳改工厂、劳改农场的犯人，一律照旧看管，不准乱说乱动。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十月十九日来电请示，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中央认为各地都应当这样做。但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容许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和在文

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改悔的那些人，再过组织生活。党组织应当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解放军报》发表《一切行动听伟大统帅毛主席的指挥》的编者按语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6037部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坚决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为人民建立了新的功勋。他们的经验值得大家学习。

6037部队支左工作经验，最重要的就是他们“跟上”跟得紧，“靠下”靠得近。

“跟上”，就是紧跟毛主席，紧跟毛泽东思想，紧跟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对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一切指示，句句照办，步步紧跟。遇到问题，及时请示报告。

“靠下”，就是依靠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依靠群众，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勤作调查研究，坚信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群众，甘当群众的小学生。

这样，做好“三支”“两军”工作就有了根本保证。

“三支”“两军”工作，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交给我军的极其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在支左中，做出了显著成绩的部队，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犯过错误的部队，要勇于改正，轻装前进，虚心向支左好的部队学习。在同一地区支左的部队，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并肩前进。我们一定要斗私批修，“跟上，靠下”，把支左工作搞得好上加好，决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的期望。

红太阳照亮了内蒙古草原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

从辽阔的内蒙古草原，传来了特大的喜讯。在我国北部边疆、反修前哨，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诞生了！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宣告了内蒙古地区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彻底垮台，斩断了他们的后台老板中国赫鲁晓夫伸向内蒙古的黑手，迎头痛击了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和蒙古现代修正主义的颠覆阴谋。对于巩固我们边疆，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增强我国各民族的团结，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这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内蒙古取得的决定性胜利！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我们谨向内蒙古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战友们，向内蒙古一千三百万各族人民，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最热烈的祝贺！

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内蒙古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亲切关怀和英明领导下，在全国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支持和鼓舞下，同内蒙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复较量和英勇斗争的结果。内蒙古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这场惊心动魄的阶级大搏斗中，无限忠于毛主席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顶黑风，战恶浪，经受住严重的考验。他们不断地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小资产阶级派性，为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创造了良好条件。内蒙古无产阶级革命派为内蒙古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了功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驻内蒙古地区的人民解放军，在关键的时刻，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挺身而出，坚定地、积极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地进行了反对内蒙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 内蒙古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胜利，再一次表明：不管斗争多么尖锐复杂，不管有多大的阻力和干扰，只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就无往而不胜。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毛主席又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内蒙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混进党内的封建王公贵族、牧主、地主、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们长期以来打着红旗反红旗，疯狂地推行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的反动路线，掩盖阶级矛盾，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分裂，破坏祖国统一。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以适应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

内蒙古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再次告诉我们：毛主席关于民族问题的伟大理论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是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唯一正确的指南，是巩固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的可靠保证。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不论哪一个民族，共同的思想基础，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共同的道路，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我们一定要以毛主席教导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正确地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任何时候都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革命的力量总是前进的，反动力量总是要失败的。内蒙古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一个曲折和反复，正好彻底暴露了阶级敌人的面目，大大锻炼了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现在，红太阳照亮了内蒙古草原，内蒙古革命形势空前大好，今后还会越来越好。

在欢庆我们已经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国内外阶级敌人是决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的。他们还会捣乱再捣乱。处在反修前哨的内蒙古军民，必须高度警惕，加强敌情观念，及时揭穿和粉碎阶级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巩固无产阶级的红色政权，巩固祖国的边疆。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以“**斗私，批修**”为纲，更加深入地开展革命大批判，把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内蒙古的代理人批倒批臭、批深批透，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插遍内蒙古草原的每一寸土地，把内蒙古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原载 1967 年 11 月 2 日《人民日报》）

林彪在首都人民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

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朋友们：

今天，我国人民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一道，隆重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

伟大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

十月革命的胜利，冲破了资本主义的黑暗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开辟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新纪元。

自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以来，国际无产阶级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前赴后继，英勇牺牲，进行了一百多年的艰苦斗争，为人类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列宁在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在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中，解决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系列问题，解决了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列宁主义的阶段。列宁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把列宁主义带到了全世界，使世界的面目为之一新。

五十年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把世界历史推进到了又一个崭新的时代。这就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进行大决战的伟大新时代。

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民族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革命的坚强堡垒。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坚持了十月革命的道路，在欧洲竖起了一面鲜艳的红旗。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为全世界人民反帝斗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正在猛烈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队伍不断壮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新局面。

现在，和半个世纪以前相比，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容要深刻得多了，规模要广阔得多了，斗争要激烈得多了。新的历史时代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面前，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问题。但是，归根结底，仍然是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这个最根本的问题。

毛主席说过：**“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真理。

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从来就是集中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以赫鲁晓夫及其继承者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之流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疯狂地反对世界人民革命，公然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实行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这是对十月革命的大背叛。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背叛。这是对伟大的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大背叛。因此，如果不彻底粉碎现代修正主义的猖狂进攻，不坚决起来捍卫伟大列宁所开辟的十月革命道路，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彻底解决如何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问题，无产阶级就不能获得最后胜利，即使夺得了政权，仍然有可能重新丧失政权，象苏联人民那样，被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所统治。

值得我们庆幸的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即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道路问题，已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提高到了更高的阶段。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峰。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就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天才地解决了武装夺取政权的一系列复杂的课题。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国人民经历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史上最长期、最激烈、最艰苦、最复杂的人民革命战争，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政权。

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概括起来，就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在农村中发动农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这是十月革命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新的伟大发展。

毛主席说：**“革命的胜利总是从那些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首先开始、首先发展，首先胜利”**。在当代，由于一切反动统治阶级总是严密地控制着中心城市，革命的政党就必须利用反动统治的薄弱环节，薄弱地带，充分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战争，造成革命的巩固的根据地，以便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因此，依靠群众，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这些都是今天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为武装夺取政权而奋斗时所必须认真思考和解决的历史任务。

毛泽东同志不仅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上，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主义，而且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当代最重大的问题上，划时代地、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主义。

列宁从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一天起，就十分重视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他看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尖锐性、长期性，指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

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这是五十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大的教训。这一严酷的事实，把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突出地提到了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面前。

正是当代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系统地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规律，提出一整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方法和政策。毛主席以他伟大的气魄，高度的智慧，胜利地领导了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极其重大的标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开辟了一条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光明大道。正在同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进行斗争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都坚决地支持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从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中，得到了极大的鼓舞，看到了光明的前途，增强了胜利的信心。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他们费尽心机，咒骂、毁谤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好从反面证明了我们的胜利对敌人的打击是多么深重，而他们只是一群必将灭亡的吸血鬼而已。

世界是向前发展的。反映世界规律的理论也在不断发展。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时代的旗帜。

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个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就能

够经过自己的斗争，得到解放。

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个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就能够经过自己的斗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个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被修正主义篡夺了政权的国家的人民，就能够经过自己的斗争，推翻修正主义的统治，重建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就可以把整个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

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朋友们:

十月革命以来的五十年，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激烈搏斗、并节节取得胜利的五十年。帝国主义制度早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出现，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反映了帝国主义临死前的挣扎。尽管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还会勾结起来进行捣乱，但是，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成主流。历史的辩证法是不可抗拒的。今后，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将会更高地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沿着十月革命开始的道路大踏步前进!

一切背叛十月革命的人，绝对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赫鲁晓夫早就垮台了。勃列日涅夫、柯西金集团变本加厉地实行叛卖政策，他们的寿命也是长不了的。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苏联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决不会忘记伟大列宁和斯大林的教导。他们一定会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下起来革命，推翻修正主义反动集团的统治，使苏联重新回到社会主义的轨道上来。

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朋友们!

我们的伟大祖国是一片大好形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指引下，正在胜利地向前发展。

我们一定要更高地举起十月革命的伟大旗帜，更高地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一定要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成为更加强大的世界革命根据地。

我们一定要更有力地支援世界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我们一定要同全世界革命人民一道，把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我们一定要更加努力地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更广泛地传播到全世界。

这是历史赋予我国人民的光荣使命，是我国人民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全世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一定要建立起来。”**

让我们为实现毛主席的这个伟大号召而英勇斗争吧!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原载 1967 年 11 月 7 日《人民日报》)

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

——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整整五十年了。

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次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变成了现实，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开始了。

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时代开始了。

无产阶级领导的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新时代开始了。

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作了极其深刻的阐述。他指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

"十月革命给世界人民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十月革命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

"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来，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

半个世纪以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旗帜的指引下、在十月革命的光芒照耀下，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十月革命的熊熊烈火已经在整个地球上燃烧起来了。

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象巨人般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七亿中国人民，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自发动和领导下，正在开展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关系到中国前途和人类命运的伟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着阿尔巴尼亚人民，以无产阶级的英雄气概，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在欧洲树立了一面鲜红的社会主义旗帜。

三千一百万越南人民，英勇地抗击着美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为全世界人民树立了反美武装革命斗争的伟大榜样。

老挝、缅甸、菲律宾、泰国、印度、印尼等等国家的人民，正在走上和坚持革命武装斗争的道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正在蓬蓬勃勃地展开。

西欧、北美、大洋洲的无产阶级，正在觉醒起来，投入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本国垄断资本的斗争。

总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荡涤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污泥浊水，全世界革命的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人民，正在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为着创造

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而奋斗。

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人民以革命首创精神，在资本主义统治的黑暗世界里，经过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树起了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在以后的年代里，苏联人民又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取得了战胜白卫军叛乱和十四个国家武装干涉的伟大胜利，取得了粉碎钻进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的机会主义路线的伟大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这一切光荣业绩，都浸透着十月革命英雄儿女的血汗，闪耀着苏联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主义和崇高国际主义的灿烂光辉。

今天，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世界各国革命人民，在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的时候，深深地怀念十月革命的伟大缔造者列宁和他的继承者斯大林。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光荣的布尔什维克党和伟大的苏联无产阶级开创十月革命道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但是，苏联无产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引为自豪的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列宁、斯大林时代那个欣欣向荣的苏联，由于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共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已经改变了颜色。曾经被全世界人民看作光明和希望的强大的红色堡垒，在臭名昭著的赫鲁晓夫和他的继任者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修正主义集团的反动统治下，已经变成了现代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中心，变成了世界反动势力的又一个大本营。

现在，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这一伙叛徒居然厚着脸皮，以十月革命事业的继承者自居，打起"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旗号，进行招摇撞骗。这简直是对伟大列宁的莫大侮辱，对伟大十月革命的莫大侮辱，对伟大苏联人民的莫大侮辱。你们这一伙十月革命的叛徒，有什么资格纪念十月革命？你们只配站在历史法庭的被告席上，接受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亿万革命人民的审判！

正是你们这一伙叛徒，践踏了列宁主义的伟大旗帜，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事业，在"全民党"、"全民国家"的幌子下，把列宁缔造的苏联共产党变成了资产阶级政党，把苏联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所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镇压劳动群众的资产阶级专政，把十月革命风暴中诞生的苏维埃国家变成了修正主义国家，变成了资产阶级国家。苏联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被剥夺了，他们又处在一批卑鄙工贼——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压迫和奴役之下。

正是你们这一伙叛徒，抛弃了社会主义的旗帜，断送了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事业，披着"建设共产主义"的外衣，用资本主义的利润法则和自由竞争代替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原则，把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农庄蜕变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和富农经济。

正是你们这一伙叛徒，在"全民文化"的掩护下，大肆宣扬反动的修正主义思想、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丑恶的"西方文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统治了今日苏联的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十月革命滋养起来的社会主义文化，遭到严重摧残。列宁和斯大林亲自培育起来的共产主义道德风尚，日益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

正是你们这一伙叛徒，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叛了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把"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作为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跪倒在美帝国主义的脚下，同世界上一切最反动的势力结成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反中国的新"神圣同盟"。你们到处兜售修正主义的鸦片，麻醉人民群众，出卖革命利益，破坏革命斗争，使成千成万的共产党人和革命战士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屠杀。

你们这一伙叛徒对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你们是苏联人民最凶恶的敌

人，也是世界革命人民共同的敌人。

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

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被现代修正主义者篡夺了政权，逐步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给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提供了很深刻的历史教训：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还可能丧失政权，无产阶级专政还可以变成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除了防御国内外敌人用武力颠覆政权以外，更重要的，是要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从内部来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走上“和平演变”的道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对无产阶级专政事业的背叛，充当了国际无产阶级最大的反面教员。从这个意义上说，给赫鲁晓夫一个一吨重的“勋章”，他是当之无愧的。

伟大的、英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手毛泽东同志和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七亿中国人民，同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道，同全世界革命人民一道，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对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展开了气势磅礴的伟大斗争，在国际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并一定将继续取得更大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贡献，在于他系统地总结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系统地总结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不但总结了正面的经验，而且总结了反面的经验，特别是总结了苏联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严重教训，完整地、彻底地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个当代最重大的课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划时代的伟大发展。

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巴黎的无产阶级进行了第一次夺取政权的英勇尝试。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一个总结他全部革命学说的著名论断：“**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列宁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解决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问题，解决了一个国家内社会主义能够胜利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列宁主义阶段。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曾经多次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存在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他说：

“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象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

列宁深刻地分析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为什么被推翻的资产阶级还有强大的力量和条件进行反抗和复辟活动，说明了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他指出：

“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较强大的敌人——资产阶级进行的最无畏和最无情的战斗。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

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

列宁还注意到了意识形态领域中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他明确指出：

“我们的任务不只是要战胜资本家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要战胜资本家在思想方面的最深刻，最强烈的反抗。”

列宁的这些光辉思想，这些伟大的科学预见，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对今天一切坚持十月革命道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这一伙现代修正主义者完全背叛了列宁这些思想。毛泽东同志在同现代修正主义者作斗争的时候，在阐明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总是教导我们不要忘记列宁这些话。

毛泽东同志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并且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即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极其重大的标志。

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要点是：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同志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必须**“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发展。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分注意识破“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

部的革命三结合。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上述这些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的观念，天才地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列宁在五十年以前曾经强调指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今天，我们可以说，只有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同时也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继续进行革命的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正是检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试金石。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打开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它的基本经验，反映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进行革命的普遍规律。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开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它的基本经验，反映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中阶级斗争的普遍规律。尽管今后还会出现各种新的问题，遇到各种困难和曲折，但是，由于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就正如列宁在评价十月革命的意义时所说的那样："**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线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

斯大林说："**十月革命并不是单只'民族范围内的'革命。它首先就是国际性世界性的革命。**"就象十月革命并不是单只"民族范围内"的革命一样，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不是单只"民族范围内"的革命，它同时也是国际性的革命。这场大革命，获得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热烈支持。它的伟大胜利，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纪元，在人类发展史上，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先进的革命理论，总是伴随着由这个理论所指导的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而得到广泛的传播的。五十年前的十月革命，曾经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使世界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毛泽东同志指导下的中国革命在一九四九年的胜利，进一步地、大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目。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摧毁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使剥削阶级的各种威风扫地。这一个伟大的群众发动，震动了世界，使世界人民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提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深刻得多了，丰富得多了。

世界革命人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导师和最杰出的领袖，毛主席就是当代的列宁。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使当代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闻风丧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最强大的思想武器。

毛泽东思想的传播，使革命的人们进一步划清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之间的严格界限。现在，人们再回过头去瞧瞧赫鲁晓夫及其门徒在工人运动后院的粪堆上所摆设的那些旧货摊，对于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什么是十月革命的道路，什么是反十月革命的道路，就看得更加清楚了。那些叫嚣所谓"全民党"、"全民国家"，把无产阶级专政抛到了九霄云外去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小丑们，再要用"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旗号去欺骗人民，越发困难了。那些披着马

克思主义外衣的议会迷们，再要阻挡无产阶级起来用武装夺取政权，越发困难了。

现在，世界已经进入了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革命新时代。十八世纪末，革命中心在法国，十九世纪中叶转到了德国，无产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二十世纪初叶，革命中心转到了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随着，世界的革命中心又逐步转到了中国，产生了毛泽东思想。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这个世界的革命中心，变得更加巩固、更加强大了。

毛主席说：**“中国人民一贯把中国革命看作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并且以此为莫大的光荣。”**当前我们正在从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十月革命在新历史条件下的更高阶段上的继续。今天，我国人民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最好的纪念，就是高举十月革命的伟大旗帜，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坚决支持全世界一切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各国人民，并同他们一道，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对各国反动派的斗争进行到底。

毛泽东同志在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时候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就说过：**“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苏联出现的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只不过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段暂时插曲。我们坚信，由伟大列宁和斯大林所教养的、有着十月革命光荣传统的、经过了反法西斯战争锻炼和考验的真正的苏联共产党人和伟大的苏联人民，绝不会长期容忍苏修叛徒集团骑在自己脖子上作威作福。他们正在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同苏修叛徒集团进行斗争。他们一定会在伟大十月革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继承列宁、斯大林的遗志，坚持长期斗争，冲破重重黑暗，使十月革命的红星，重新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真理，是不可抗拒的。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总是要革命的。人民群众总是要胜利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革命旗帜下，十月革命所开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事业一定会以更加雄伟的步伐向前迈进，共产主义必将在全世界赢得最后的胜利。

(原载 1967 年 11 月 6 日《人民日报》)

〔附〕 关于“继续革命”的几个问题（节录）

龚育之

这篇文章，准备谈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批评和革命一词的两种含义。

一

究竟用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来概括毛泽东同志晚年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思想,来表达它同毛泽东思想的区别呢? 《决议》采用了一个现成的、早已提出的概念,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有过一个说法,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康生、陈伯达、“四人帮”的伪造。《决议》沿用这个概念来概括毛泽东同志晚年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合适不合适呢? 会不会把不属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加到毛泽东同志头上呢?

大家知道,康生、陈伯达、“四人帮”利用毛泽东同志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思想,把它鼓吹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扩大它的错误,把它推向极端,并且在它的名义下进行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确实是罪大恶极。但是,如果因此就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毛泽东同志无关,不表达毛泽东同志的观点,那是不合乎实际的。的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提法,在我们看到的所有的毛泽东同志讲话和著作中都没有出现过。1967 年纪念十月革命 50 周年的两报一刊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最先正式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提法,并把它的内容归纳为六条,认为它是毛泽东思想最重要的贡献。这篇社论是陈伯达和姚文元主持起草的。他们归纳的六条,是把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话串到一起,编起来加以解说。其中有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这句话,社论中用黑体字当作毛泽东语录发表,但这个“全面的专政”不是毛泽东同志的原话。这在批“四人帮”的过程中早已揭发出来了。毛泽东同志在《5.16 通知》中所写的原文是“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中的专政”。陈伯达、姚文元把社论稿写成后,送给毛泽东同志看,并且说明社论中关于主席思想六条,作了新的整理。毛泽东同志看了社论稿,认为可用。这之后,社论就发表了。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概念,把它的内容概括为六条,并且称之为“主席思想六条”,既然是毛泽东同志看过,同意过的,用毛泽东同志自已同意过的这个概括,来表达毛泽东同志晚年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思想,应该说是合适的。

二

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同坚持向我们党内和国内的阴暗面作斗争,是怎样的关系呢? 会不会使我们放松这种斗争呢?

《决议》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不断地同它们作斗争。我们必须以极大的决心和毅力,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作斗争,同我们队伍中滋生的压迫群众的蜕化变质分子、贪污盗窃分子等等作斗争。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面临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需要认真地对待,从实践中不断地创造经验,切实有效地加以解决。决不可以放松这种斗争。但是,必须正确地来进行这种斗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在进行这种斗争的时候,必须对实际情况作出恰当的估计,决不可以远离实际、任意夸大,作出危言耸听的主观主义的估计(当然也不可以任意缩小、作出粉饰太平的估计);必须严格划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决不可以混淆是非和敌我;必须依靠人民群众,依靠党和人民的团结,依靠党的正确领导,决不可以借口直接依靠群众而撇开或者反对党的领导;必须凭借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手段,决不可以借口大民主而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法律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章程、原则:一句话,必须采取正确的理论和方法,决不可以再采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不仅没有克服

我们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阴暗面，反而由于对党和国家根本秩序、根本原则的破坏而造成条件，使这种阴暗面大大增长。这难道不是明显的事实吗？

三

“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这几个词本身并不错，批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是不是一定要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口号否定呢？能不能保留它，赋予它以另一种正确的解释呢？

这个问题在三中全会过后不久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讨论过。理论务虚会的总结中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提法，如果按照提出的当时的解释，即所谓‘向走资派夺权’，也就是撇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那么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至于作出新的解释，可以在党内继续研究。”经过反复考虑，现在大家认为，沿用这个口号，给它以新的解释，看来不是一个好办法。因为事情不能只看字面。“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提法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是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而出现的，是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文化大革命”被称为这个“伟大理论”的“伟大实践”）不可分解地联系在一起的。不是人们今天在批评它们的时候，把它们联系起来，而是历史本身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历史本身所形成的联系，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概念具有特定的含义，并由于过去的广泛宣传而“家喻户晓”。现在如果把这个概念同“文化大革命”分开，不顾它们之间历史形成的联系，另外给这个概念以一种新的解释，反而是勉强的、人为的，而且容易造成思想上的混淆。新解释和旧含义搅和在一起，不易划清界限。过去几年中出现过试图着重从技术革命和经济建设的角度来重新解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努力，我自己就曾经这样做过，由于没有同它的旧含义划清界限，这种努力并不能解决问题。这次《决议》没有采取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给予新解释的办法，而是按照它历史上的本来面目来看待它。实践证明具有特定含义的这个理论是错误的，就直截了当地否定它。

四

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还要不要继续举起革命的旗帜，进行革命斗争呢？是不是要把“革命”这个词儿留给历史教科书去专用呢？

这里的问题，是究竟应该怎样来理解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的革命。怎样来理解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的革命。

在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中提出了这样的见解：革命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它的原义和它的转义。必须把这两种含义明确地区别开来，才能澄清围绕“革命”而发生的思想认识的混乱。

什么是革命的原义呢？就是政治革命。我觉得，毛泽东同志有个很好的概括：“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句话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革命的原义。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最后说：“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乔治·桑）”这里区别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历史情况：一种是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社会进化归根到底必然要通过政治革命，即“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另一种是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社会进化不再通过政治革命，不需要也不应该继续采取“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因为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着阶级斗争，这一定

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就是说，还有反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进行破坏社会主义活动的分子的斗争。但是，就社会的基本情况说，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取得了政权，改造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后，已经不存在整个社会的阶级对抗，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即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已经不需要也不应该继续发动"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革命。而"文化大革命"所号召的却正是这样的"政治大革命"。这是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剥削阶级专政的社会历史条件混为一谈。所以，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而"革命"又是在它的原义，即推翻现存的统治阶级的意义下来使用，这本身在理论上、在逻辑了就是荒谬的，在实践上造成了自己乱了自己的内乱。

但是，革命还有它的转义，引伸的含义。比如说，我们要继续发扬革命精神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的而进行革命斗争，我们整个社会还要进行长过程的深刻的改造，落后的状况要改变成现代化的状况，在落后的状况下存在的社会不平等，要在生产的发展中和其他各方面的努力中逐步加以消灭，社会主义还要向共产主义前进，就这些根本的社会改造来讲，我们所要完成的还是革命的任务，要用革命的态度、革命的精神从事这种革命工作，要为这种革命理想来斗争。这当然是必须坚持的，绝对不能动摇的。这是革命的广义，转义或引伸的含义。

这样，革命就有了不同层次、不同范围的含义。如果不加区别，混淆使用，就违背了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用的还是革命这个词，一个时候用的是它的原义，一个时候用的是它的转义，从转义上加以论证的一个命题，然后一下又跳回原义上去运用，就会在思想理论上和实际行动上引起混乱。革命这个词在现实生活中是广泛使用的。严格地指出它的原义是什么，应该在什么范围内使用，它的广义、转义又该怎样理解，把不同的含义加以区分，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继革命的理论"这个提法中的革命一词，不是就其转义、引伸的意义来使用的，它明确地申明过，其含义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在这样的含义上来使用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概念，当然必须否定。我们今天还要继续举起革命的旗帜，进行革命斗争，是就革命的转义、它的引伸的含义、它的广泛的含义，而不是就它的原义来使用的。《决议》在两处地方说明了这种区别。一处是第 (20) 条的第四点，在批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时指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第二处是 (36) 条，专用一条来说明"我们坚决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的错误，这绝对不是说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坚决继续进行各方面的革命斗争"，并且说明了这"各方面革命斗争"的内容和含义。

五

毛泽东同志晚年理论上的错误，与对革命这一概念在不同含义上的交替、混杂使用，有密切的关系。这里可以稍微回顾一下这方面的历史情况。

毛泽东同志的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许多观点，不都是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才提出来的。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开始了酝酿、准备的过程。不过形成一整套论点，并把它付诸实践，以至在我们的国家、在党的政治生活中造成极大的混乱，给人民带来灾难，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间的事情。"文化大革命"前在革命问题上的错误，总的说来，同"文化大革命"相比，还是处于萌芽、酝酿、准备的阶段，在那个时候，从毛泽东同志思想和活动的

整体讲来，错误还是局部的东西。而在“文化大革命”中，错误的理论就形成了，它在毛泽东同志这个时期的思想和活动中就占了主导地位。

我们说，在以前错误理论还在酝酿过程中，还没有形成，还没有定型，也包含这样一层意思，即某种错误观点产生后，并不是一径向着错误越来越严重的方向发展。它是经历了多次反复进退的变化的。

我国革命在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面临着形势的根本变化。以前我们革命是夺取政权。取得政权后还有一个把生产资料私有制变成公有制的革命改造任务。这个革命已不需要推翻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因为这个阶级已经是无产阶级自己），因而，它已经不是最严格意义的政治革命了。但是，就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的改造来说，毕竟本质上还是消灭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当然我们采取的是和平赎买，而不是暴力没收。在这以后，继续进行的革命的含义就发生了变化，变到革命的转义。对新形势下革命的内容、性质和方法要有全新的了解。这是我们党领导革命以来面临的最深刻的变化。过去都是领导搞阶级斗争，搞原义的革命，这以后搞革命就基本上不是过去意义的革命，而是转义的，广义的，不同性质、内容和方法的革命了。如果对这个深刻的变化没有思想准备，沿用过去革命的方法来处理新的问题，我们就会犯很多错误。

1956年秋召开的党的“八大”，对于我国形势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作出了正确判断。毛泽东同志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讲到“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一方面强调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另一方面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根本不同，旧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只能通过革命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这是很正确，很重要的思想，同“八大”的思想完全一致，并且把它从理论上进一步发挥了。这个讲话以后，毛泽东同志南下作宣传，反复向干部讲解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明确指出我国现在处在转变时期，并且把这个转变概括为：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他认为，许多人还不认识这个转变，还企图用过去的方法对待新问题。毛泽东同志这些讲话，实际上已经提出了革命形势、任务的根本变化，革命一词的两种不同含义，我们应该由原义的革命转向转义的革命的问题。当他说“由革命到建设”的时候，革命是指的它的原义；当他说“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说，原义的革命在我们这里已经基本上成为过去，今后的革命是新的、转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就是建设，经济和文化建设，即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

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和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引起了思想的反复。1957年10月，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批评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回到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前的提法，仍然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当成主要矛盾。另外，又提出一个“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概念，接近于回到革命的原义，或者说密切地联系到革命的原义。对主要矛盾判断的反复，引起对革命的两种含义的交互使用的情况。

不过，毛泽东同志并没有就此抛弃革命必须向新的任务转变的思想。1958年初，他写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宣布继1956年获得了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之后，1957年又获得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从而我们的“不断革命”要转到技术革命上去，党的主要注意力和工作着重点要转到技术革命上去。毛泽东同志讲的技术革命，就是经济建设，就是在经济上技术上赶上先进国家的任务。在毛泽东同志这里所提“不断

革命"的口号中，革命一词包含了两种含义，而现在很明白是过渡到它的转义来使用了。

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毛泽东同志围绕革命含义的引伸、扩大和转化，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如：政治这个概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含义问题，对立统一、量变质变、肯定否定规律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条件下是否适用的问题，等等。他第一次明确地把政治的概念加以扩大，说："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是会有的。但是内容变了。"过去政治的基本内容是同阶级敌人作斗争；人民取得政权以后，政治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关系；到社会主义社会、彻底消灭了阶级以后，政治就完全是人民内部的关系。那时候，还会有政治和革命，但是，政治和革命的性质和过去不同了。毛泽东同志在这里，一方面把革命的含义加以引伸，把它们用于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社会历史情况下，另一方面又指出，经过引伸的革命，含义不同，内容和性质都变了；一方面指出对立统一、量变质变、肯定否定这些规律永远地普遍地存在，并且用这些规律来说明新的社会历史情况下的革命，另一方面又随着革命含义的变化，提出了研究这些规律、范畴在新的社会历史情况下的新特点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从哲学上对革命这个概念及其发展和转化的探讨，是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很富于启发性的。

可惜的是，毛泽东同志后来没有能够继续朝着这个正确的方向去进一步发挥他的这个观点。虽然他在六十年代前期在某些时候和某种程度上也曾回到或接近于回到原来的正确观点，但是，总的趋势是，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错误的发展，他对革命一词逐渐不再象他最初提出"不断革命"口号时那样，着重过渡到它的转义上来使用，而是逐渐重新在它的原义上来使用。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文化革命、技术革命"五大革命"的提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的提法，就是把革命的不同含义混在一起。到"文化大革命"，则完全回到革命的原义，发动了一场在新的社会历史情况下只能成为荒谬行为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六

现在人们在探讨革命的两种含义和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革命的性质、内容的变化，提出了一些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

比如：有同志提出了革命由质变阶段转入量变阶段的问题。推翻旧的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和剥夺他们借以进行剥削的生产资料，这是一个剧烈的质变。经过这样的质变阶段的革命之后，在新质的基础上应该开始一个新的量变的积累过程。由量变到质变，是革命；由质变到量变，可不可以说也是革命，即量变阶段的革命？这是对转义的革命的一种新的哲学解释。的确，我们不应该在任何时候都强调质变，只承认质变是革命，而不给质变前的量变的准备和质变完成后继续发展的量变的意义以足够的估计，轻视量变在革命发展中的作用。

与此相联系，还有一个质变形式的多样性的问题。我们不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革命只是量变。但是，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新的质变究竟以什么形式来实现，确实是要研究的问题。这个问题斯大林同志曾经提出过。他认为：不能醉心于革命的爆发形式。在无产阶级已经掌握政权的条件下，革命可以通过新质要素的逐渐积累和旧质要素的逐渐死亡的形式来实现。毛泽东同志也强调过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的问题。这两个论点都没有充分论述，但它们确实给人们打开了一条思路：应该探讨质变形式的多样性问题。既要充分看到量变在革命发展中的作用，也要看到革命的质变的形式也有多种多样，不能局限在一个固定的框框里。同样，否定的形式也有一个多样性的问题。这些都是与哲学概念有关的问题。

从政治学上讲，革命和改良的关系也需要研究。改良不是改良主义，革命和改良不是绝对排斥的。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前，改良是革命的副产品。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改良是革命发展的一种形式。这个问题和新条件下革命的转义有关。此外，《决议》还提出了"转入和平发展时期的革命"这样一个概念。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当然不是和平发展。而这个任务完成以后的革命就转人和平发展。

对于新的社会历史情况下革命的转义，究竟如何展开它的内容，论证它的理论基础，从政治学、哲学上都提出了许多问题。毛泽东同志曾经接触到并探讨过这个问题，提出过一些重要的正确意见，这些意见现在对我们仍有指导和启发。他的失误的经验教训，我们必须认真总结和吸取。

从历史的观点看问题，社会主义还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新事物。社会主义胜利后的革命问题，有待一切革命者认真探讨。我国的和世界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现实，在这方面提出的问题远比已经解决的问题要多得多。研究和重新研究这些问题，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课题。

(原载《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6期)

中共中央、国 务 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关于成立地专级、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限的修改规定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七日)

关于成立地专级、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限，暂规定如下。

一、关于尚未建立省、市革命委员会的地区的规定：

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地专级由省军区或军审查，报大军区批准；县级由省军区或野战军批准，均报中央备案。

成立革命委员会，地专级由军区审查，由大军区批准，报中央备案；县级由省军区或野战军审查批准，报大军区和中央备案。

二、关于已建立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地区的规定：

成立地专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省革命委员会审查、批准，报中央备案；成立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

成立地专级革命委员会，由省革命委员会审查和批准，报中央备案；成立县级革命委员会，由省革命委员会审查批准，报中央备案。

毛主席指示：照办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一、广州军区是中央信任的，他们过去是紧跟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从介入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在某些地方的支左工作中，虽然犯有一些错误，但是，从今年四月以后，在中央和革命群众的帮助下，已有改正，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效。这次所作的《关于在广州地区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态度是诚恳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希望广州军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新功。

二、广州地处边防前沿，美蒋英日苏修特务妄图用各种卑鄙手段进行破坏活动，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广大革命群众和全体指战员应当提高革命警惕性，积极响应毛主席的"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的"九·五"命令，加强军民团结，大力支持军区做好支左工作。

三、中央认为，广州地区双方赴京代表团签订的《关于"拥军爱民"、"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开展革命大批判，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书》很好，符合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最新指示精神，中央同意和支持这个协议书。当地驻军和各革命群众组织应广为散发和宣传这一协议书，并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证贯彻执行。中央高兴地看到，广州地区的革命大联合已经取得初步成果，特别是广大工人、海员和铁路员工已经分别以不同形式，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联合起来了。

四、中央决定建立以黄永胜、陈郁、孔石泉、王首道、陈德等同志和实现了革命大联合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组成的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革命群众组织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直接领导下，要认真学习并贯彻执行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最新指示和林彪同志的十月一日国庆节讲话，警惕阶级敌人从极左方面或右的方面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要"**斗私、批修**"，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夺取广东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
转发江青在北京文艺界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江青同志十一月九日和十二日晚在北京文艺界座谈会上所作的讲话很重要。这个讲话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分析了当前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形势，并对文艺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和今后的任务作了重要指示。

现将这两次会的讲话记录稿发给你们，请组织文艺界、新闻出版界、军队的文艺单位、大中学校各革命群众组织进行学习，并结合各单位的具体情况，认真贯彻执行。

江青同志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十一月九日晚和十二日晚，伯达、康生、江青同志召集中直文艺系统部分单位的军代表和革命群众代表开了两次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还有张春桥、戚本禹、姚文元、杨成武、吴法宪等同志。在九日晚和十二日晚的座谈会上，江青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个讲话稿，就是根据这两次讲话整理的。

我觉得很对不起，很长的时间没有听听同志们的意见，同志们对我们有什么意见，我是能够谅解的。因为同志们不了解我们的情况。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是全心全力地跟同志们一块在搞戏剧革命、音乐革命。这是一个很细致的工作，很严肃的工作，它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个月两个月所能办到的，一个样板，要立起来，不仅内容应该是革命的，而且应该在艺术上也是站得住的，否则，人家就要复辟。这需要很大的精力。对于这个问题，过去我反复地对有的同志讲过。自从进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工作情况变了，我的精力就又全副用在别的方面。所以，你们搞的戏、音乐、电影，我就顾不上看，不能象过去那几年那样，和同志们一起专门闹文艺革命。这一点说明了，同志们也可以原谅。

主席在延文艺座谈会上讲话那个时候，因为我的工作不是做文化工作，在文化界只是打遭遇战。进城初期，我是遵照主席的教导，想为工农兵、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树立两支队伍，一支就是创作队伍，一支就是评论队伍。但是，因为在这条战线上，人家专了我们的政，他们用各种手法不执行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文艺路线。而我们呢，也有一个认识过程，又有一个工作岗位的问题。主席在这方面，那是很注意的！我不过是一个流动的哨兵。只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过程中，才能基本上解决文化界的队伍问题。

在座谈会上听了一些发言，我觉得发言的水平还是比较高的，能够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事实上也是不平衡的，你们能够认识到这个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有的地方搞得好一些，有的地方搞得比较差一些，有的地方看起来是很平静，实质上是一潭死水。针对这

样的情况，不能一律说都没搞好，都要重新大乱。象新影、象芭蕾舞剧团，这是属于捂着的，没有真正地搞好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当然也就不能够很好的搞斗批改、大批判。这样的单位，再乱一下是有好处的。乱敌人！乱敌人！！有些单位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但还没有搞好革命的三结合，就应该在进一步巩固革命大联合的基础上，通过辩论、批判、解决干部问题，搞好革命的三结合，只有这样，才能有力地进行斗批改和大批判。对于有些搞得比较好的单位，革命的大联合搞的比较好，也搞了革命的三结合，那就要全力以赴搞斗批改、大批判。

总的说，是要树立革命队伍。树立队伍在文化界有这样一个问题，阶级成份是比较复杂的。但是，一个人是不能决定自己的出身的，还是可以看表现的。主席教导我们，树立阶级队伍，是要看阶级成份的，但也不唯成份论。大多数青年、革命小将是会跟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走的；大多数干部、党员，也是会跟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走的。这一点，大家应该满怀信心。

搞革命的大联合，最重要的是双方多做自我批评。两个组织都混杂了坏人，最好是不要你这个组织去捉那个组织的人，那个组织来捉这个组织的人，最好是由他自己的那个组织调查研究、自我批评，这样就容易搞联合。否则，每天吵架，这样敌人就容易利用。在这个方面，主席最近有重要指示，同志们也学习了，不多说了。总之，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事情，最好是多做自我批评，少批评人家；要是敌我矛盾，那就要斗倒、批臭。

文艺界是比较复杂的。从你们的发言里以及从你们送给我们的材料里，都可以看到这点。现在搞深搞透了没有？我看没有。因为敌人是很狡猾的，他们有一套一套班子，你搞掉一套，它又弄上一套，所以我觉得对文艺界要作深入的调查研究。

要稳、准、狠——对敌人；对自己，不要老打内战，对朋友也不要老打内战。打内战，就会被敌人利用；敌人有时候就是在背后操纵你们打内战，他就乘机溜了。这一点你们要识破。

新影厂最近搞了一个现代革命京剧的纪录片（叫现代革命京剧集锦）。当然你们是好意，也是花了功夫的，据说你们不是在舞台上拍的。但是对这几个戏的主题思想、它的艺术性在什么地方，你们都没有摸透，就搞了，每个戏搞了一点。我昨天晚上看了以后，觉得不安。你们是不是还能够补拍一点？现在这样子，到全国去放，工人、农民、士兵如果没有看过这个戏，他就不懂了。因为他们不象我们是摸熟了这些戏的。你们不要急着放映，你们讨论一下，看怎样把它改好。

北京京剧一团谭元寿同志，他就很急，说没有搞出戏来，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象过去那样很粗糙地搞出来，那人家还是要打倒我们的。宁愿我们这八个样板戏暂时占领舞台。这八个样板戏就已经把帝王将相、资产阶级赶下了舞台，赶下了银幕。而且在芭蕾舞、交响乐方面进行了改革，虽然还有很多缺点，有许多需要探讨的地方，但这在世界上也是震动的。象芭蕾舞团这次改《白毛女》——《白毛女》我相信一定能改好——由于急躁，搞得就很粗糙，这样是站不住脚的。当然这我有责任，因为我没有很多时间和同志们在一起搞。但是你们自己，是不是应该组织起来，认真地进行这个工作。

这里有一个普及和提高的问题。刚才有人说，要组织小分队下去搞一些片断和小节目给工农兵看，这当然是可以的。不过，现在的中心任务还是斗私、批修，组织革命队伍，否则，是不可能搞出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符合工农兵需要的东西的。斗私、批修是很艰苦的事情，如果有人企图利用下乡下厂的活动逃避它，那就更不对了。这种思想，同志们不一定有，不过应当警惕。一个民族，总要有它自己的艺术尖端，现在的八个革命样板戏，可不可以说是我们民族的艺术尖端？大家知道，搞一个样板戏是不容易的，千锤百炼，总要改二、三年才成。因此，不可能

每一个戏，每一个文艺团体搞的节目都搞成样板。样板是尖端，是榜样、是方向。当然，也不能孤立地搞尖端，尖端总是在普及的基础上出现的、提高的，而且尖端也是要普及的。例如，我们的革命样板戏，就要通过各种途径，主要是通过拍成电影普及到全国各个角落。因此，我觉得同志们还是要安下心来，搞好斗私、批修。这在当前说来，是最重要的、最基本的。

在目前，十一月还有半个多月，十二月有一个整月，春节前还有二、三个月，在各个单位里，是不是把队伍先树立起来，把敌人狠斗狠批，批倒批臭！否则，创作思想很混乱，那就不能搞创作。在这个时期，有的单位要乱一下；有的单位乱够了，就不一定再乱了。有的单位乱一下，乱敌人，不是乱我们，这是完全应该的。把矛盾掩盖起来，这不是一个好的办法，也不正确。我们不怕乱，但是已经搞的比较好的，搞了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就不要再去乱了。这就是说，我们要有分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革命同志、革命小将，既要有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风格，不怕乱，顶得住，受锻炼；又要有脚踏实地的苦干精神，动脑筋，科学分析，克服和排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干扰，真正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还有十七年和五十天的问题。我觉得有些革命小将的见解是很好的。五十天要算，十七年也要算，三十年代也要算！这个根长得很哩！有一个小将讲，有的人只搞五十天，不搞十七年，这实质上是用五十天包庇十七年，包庇三十年代，这个看法很深刻。同时把五十天同十七年分割开来，也就是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分割开来，这也是不对的。当然，对三十年代、对十七年、对五十天，都要一分为二。三十年代，也有以鲁迅为首的左派；十七年，也有一些革命左派；五十天，那就更多了，纷纷起来反抗文艺黑线。工作队实质上是保护十七年、保护三十年代，甚至保护二十年代。有一些青年同志和革命小将，水平比较高，看清楚了这个问题。

关于参军的问题，你们不要着急，现在林副主席已经下命令，请杨成武同志他们军委办事组，挑选几个军、师一级的干部来管这个事情。报告你们这么一个好消息。你们如果一天老是参军呀参军，就忘了别的了。

我今天没有准备，也许我讲的不完整，有的错了，同志们批评我。我就讲这样一点，以后我们再座谈。

（**陈伯达**：我有个建议，江青同志今天这个讲话讲得很好很好！针对我们当前文艺界的问题差不多都谈到了，系统地谈到了。可以把江青同志的讲话录音在文艺界各单位放，北京放，上海放，全国放，大家座谈、讨论，使文艺界工作大进一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关于各级军区机关目前不搞“四大”和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时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必须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斗私，批修**”为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的高潮，进一步促进机关、部队的思想革命化、组织革命化。

人民解放军担负着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国防和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必须时刻提高警惕，加强战备，保持稳定的革命秩序，作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为此，特作如下通知:

一、各大军区、海军舰队、军区空军机关、省军区、军分区和县市人民武装部，目前一律不搞“四大”。已经开展“四大”的，可采取适当的方式结束。这些单位，采取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展整风的方法，分期分批地轮训干部。学习时间每期不超过两个月。

学习班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教育干部。要认真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的重要指示，学习林副主席八月九日的重要讲话。还要学习中央、中央文革领导同志的讲话，以及中央、中央文革有关的指示、决定。(学习文件目录另发)

学习班要狠抓“**斗私，批修**”，充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发动群众对领导提意见，揭发缺点错误，切实整顿思想，整顿作用。

对犯有错误的干部，必须切实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犯了错误的干部，要自觉革命，深刻地作触及灵魂的检讨，诚恳地接受群众的批评教育，彻底地改正错误。个别错误严重不宜于在原单位继续工作的干部，由组织上予以撤换或调整。

对揭发出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分子，应经上级党委批准，有领导的进行重点批判斗争。

对于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符合人民解放军优良的革命传统的规章制度，应提出整改的意见。各级党委要认真研究群众提出的意见，能改的就立即改正。属于全军范围的、报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统一研究，进行整改。

二、军以下部队和各基地以及中央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如总参三部，军区三局、五局、海军、空军的飞行航校，总后各办事处等)，仍坚持进行正面教育。

这些单位要进一步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要深入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的重要指示，学习林副主席八月九日的重要讲话。还要学习中央、中央文革领导同志的讲话，以及中央、中央文革有关指示、决定。

进行正面教育，可以采取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请地方革命造反派作报告、忆苦思甜等方法，提高全体人员的阶级觉悟，要发扬我军三大民主的优良传统，适时召开小型民主会，虚心

听取群众意见和批评，“**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

通过教育，使全体指战员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三、已经批准开展“四大”的军队院校、文艺、体育、科研、医院、军事工厂等单位，必须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以“**斗私，批修**”为纲，开展革命的大批判，集中力量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实现按系统、按部门、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搞好革命的三结合。

各院校要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复课闹革命，积极进行教育革命。

这些单位，必须坚决按照中央历次指示，不准再外出串连和在外地、外单位设立联络机构。对上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有意见，可以送小字报、送材料。

军队开展“四大”的单位，不要干涉和插手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地方群众组织也不要干涉和插手军队的文化大革命。

四、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要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拥军爱民**”的号召，认真做好爱民工作。军队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做出了很大成绩，今后应当戒骄戒躁，坚决相信和依靠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依靠他们的帮助，更好地完成三支两军任务。

某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在支左工作中犯了错误，应该高姿态地向群众做公开检讨，诚恳地听取群众的批评。对被错打为“反革命”的，和处理错了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革命群众组织，要认真地进行平反，切实做好善后工作。

五、关于捉人问题，要认真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除对十六条、公安六条规定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依法惩办外，军队不要随意捉人。对于查有实据必须捉的，须经省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省军管会、省军区批准。

六、全军各单位都要继续进行两条路线的教育，继续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广泛地、深入地运用各种形式，口诛笔伐，声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他们在本地区的代理人，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批倒，批臭。

各级党委和全体指战员，要热烈响应林副主席的号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新功。”要切实贯彻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鼓足干劲，雷厉风行，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

此通知，应立即向全体人员传达，并坚决贯彻执行。

中共中央转发北京针织总厂向毛主席报喜的信和八三四一部队关于该厂问题的报告[①]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毛泽东在报喜信上批示：

看过，很好，谢谢同志们!　　毛　泽　东　　十一月十五日

北京针织总厂革命委员会向毛主席报喜的信，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关于该厂问题的报告，都很好，是体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战略部署的一个典范。现将这两个文件发给全国各地区、各企业、各机关、各学校普遍阅读。请根据具体情况参照执行。

毛主席指示：已阅，照办。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一、中央认为，广西军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这次，军区对“支左”工作中发生的一些错误和缺点所作的检查，是深刻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韦国清同志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但是，他不坚持错误，能够诚恳地检查错误，态度是好的。这个检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已经批准，并且已经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批示“照办”。

安平生、伍晋南两同志在运动中也有错误，他们都做了初步检查，韦国清、伍晋南、安平生三同志的联名检讨，表示愿意改正他们的错误。中央同意他们这个检讨。

---

① 报喜信略。八三四一部队的报告，汇报了他们如何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三条指示：1.下去后要做好宣传工作，要做深入的、细致的、艰苦的思想政治工作。厂子里女工多，要派些女同志下去，便于工作。2.下去后不要匆匆忙忙急于表态，经过调查研究，如果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逐步地把他们联合起来。就是两派严重对立的群众组织，群众也是愿意联合的不愿意联合的只是少数的几个头头。3.要向工人群众学习，不怕犯错误，错了就改。要关心群众的生活，组织个医疗组，给他们看病。

中央希望广西军区和韦国清、伍晋南、安平生等同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二、广西地区两派赴京代表团在京期间签订的《关于广西两派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十条协议》很好，已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批准，伟大领袖毛主席并亲自批示："**照办**"。两派签订的《关于立即停止武斗的协议》《关于全面上交枪支弹药的七点协议》也好。中央同意和支持这些协议。希望广西军区、当地驻军和各群众组织切实贯彻执行。目前广西地区的革命大联合已经取得初步成果，一些对贯彻执行两派协议不力或根本没有贯彻执行协议的地区，应当迅速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执行协议。

三、广西处在援越抗美的前线，越南人民把广西称作是他们最可靠的后方。广西"四·二二"和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两派革命群众组织要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拥军爱民，大力支持军区和当地驻军，做好"支左"和援越抗美工作。两派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提高革命警惕性，严防美蒋特务的破坏活动。

四、中央决定建立由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孙凤章、焦洪光、郝忠云、王斌、伍晋南、安平生同志以及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革命群众组织要按照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正确地对待干部。要对干部队伍作阶级分析，团结干部的大多数，"**要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对犯了错误的干部，只要他们能作深刻的自我检查，愿意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贯彻执行两派协议，革命群众就应当团结他们，帮助他们站出来革命。今后各革命群众组织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下，要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斗私，批修"，开展革命大批判，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把广西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到底。

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

当前农村形势大好。亿万贫农、下中农和城市的广大革命群众一样，充分地发动起来了。他们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斗私，批修**，大大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伟大的革命运动带来了生产的新高涨，今年的农业生产获得了大丰收。农村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进一步深入地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在农村方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其流毒，是当前发展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的战斗任务。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亿多农民的大国。能不能正确地解决农民问题，是关系我国民主革命成败的关键，又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成败的关键。在全国胜利以后，把中国农民引向社会主义，还是引向资本主义，决定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决定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命运。

正是在这样一个头等重大的问题上，解放十几年来，一直存在着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

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

全国解放前夕，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就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

我们的伟大舵手毛主席，为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这是一条消灭农村资本主义剥削，实现农业集体化的路线，是一条彻底完成农业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路线。

而那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十几年来在农业问题上又干了些什么呢？

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前，他竭力保护和发展富农经济，反对农业的社会主义集体化；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又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疯狂地破坏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广大贫农、下中农。他推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是一条妄图在农村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实际上也就是地、富、反、坏、右复辟的路线。

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系统地、彻底地批判中国赫鲁晓夫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是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的。

中国赫鲁晓夫是富农经济的狂热鼓吹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民主革命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一九四九年三月，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国内的基本矛盾就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毛主席还指出："**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

按照毛主席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的思想，即不间断地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思想，在土地改革以后，必须趁热打铁，及时发展互助合作运动，逐步建立农业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限制和消灭农村中的资本主义。

同毛主席这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针锋相对，中国赫鲁晓夫代表了地、富、反、坏、右的利益，立刻跳出来狂热地宣扬资本主义，拚命地反对社会主义。

七届二中全会闭幕才一个多月，这个中国赫鲁晓夫就跑到天津，卑鄙无耻地吹捧资本家，提出了臭名昭著的"剥削有功"论。

全国刚刚解放，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又大力鼓吹发展富农经济。一九五〇年一月，他在对大叛徒安子文的黑"指示"中，胡说什么"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1]。

他针对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提出的对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不能"任其自流"的论点，大唱反调说："雇工，单干，应该放任自流"，"流出点富农来好。"他还宣传雇人种地"不要限制"[2]，是"合法的"，"对穷人也是有好处的"[3]。

他还疯狂地叫嚷："三马一犁一车的农户，在数年后应发展到百分之八十"。[4]。

他在同年六月的讲话中还说，"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是一种长期的政策"。[5]

从这一阵阵吸血鬼的嚎叫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村中资本主义势力妄想吞掉社会主义的那种剥削阶级的贪婪和疯狂。这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的吃人哲学！

什么"剥削是救人"！什么"雇工是合法的"！它"救"的是资产阶级的人，"合"的是资本主义的法。党内头号走资派，如此狂热地歌颂剥削制度，把万恶的雇佣奴役制，描绘得象"极乐世界"一样，他的五脏六腑里装的是什么黑货，不是昭然若揭吗?!

什么"发展三马一犁一车的农户"！稍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广大农村，拥有三马一犁一车的农户，决不是中农，而是富农。所谓发展三马一犁一车的农户，就是要发展富农经济，让资本主义占领农村阵地，使广大贫农、下中农重新沦于被压迫被剥削的悲惨境地，破坏工农联盟，破坏无产阶级专政。

什么"不要限制"！这个头号走资派狂热地赞美富农经济，正是为了"限制"、扼杀广大贫农、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而为资本主义势力鸣锣开道。他叫嚣"不要限制"的仅仅是资本主义剥削而已。这就是他所谓"自由"的阶级内容！

中国赫鲁晓夫为了欺骗群众，竟然颠倒黑白地说："有了百分之七十有三匹马的农户，将来才好搞集体农庄。"(6)

他切齿仇恨地诬蔑贫农："不要认为反对单干的就都是集体主义者"。(7)

这是对贫农的莫大污辱，这是对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的极大歪曲！毛主席指出：广大贫农、下中农有**"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他们过去深受地主、富农的残酷剥削，对剥削制度充满了深仇大恨。土地改革以后，他们的生活虽然比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为改善，但是，许多人的经济地位还很困难（贫农），或者仍然不富裕（下中农），这就决定他们坚决反对单干，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积极要求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他们是党在农村中的依靠力量，是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力军。打击贫农，就是打击革命，就是反对社会主义；依靠富农去搞什么"集体农庄"，就绝不会有一丝一毫的社会主义，而只能是百分之一百的资本主义。

所谓要到"有了百分之七十有三匹马的农户"才能搞集体化的荒谬"理论"，不过是替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剥削加上一块遮羞布而已。要百分之七十、八十的单干农民都变成富农，这完全是骗人的，根本是不可能的。并且谁都知道，富农经济控制农村之日，就是"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农民在地、富、反、坏、右的压迫下重新陷于赤贫的痛苦生活之时。这就是中国赫鲁晓夫对"穷人"的所谓"好处"。

中国赫鲁晓夫把他这套反社会主义的理论，概括成一个否定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8)。

所谓"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就是要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就是要发展城乡资本主义。说到底，也就是要把解放了的中国重新拉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上去。

这个反动纲领，遭到了毛主席的痛斥。一九五三年六月，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针锋相对地指出**这种提法是有害的**。他深刻地指出：**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揭穿了中国赫鲁晓夫发展资本主义的路线的反动本质，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指明了方向。一场几万万农民参加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了！一场更尖锐更剧烈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开始了！

中国赫鲁晓夫是扼杀农业合作化的头号走资派

无产阶级革命党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是毛主席一贯的思想。一九四三年，毛主席就发出了“**组织起来**”的伟大号召，深刻地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

全国解放以后，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在毛主席这条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提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九五一年，山西等地广大贫农、下中农，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提出把互助组提高一步试办农业合作社的要求。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行动。然而，中国赫鲁晓夫却背着毛主席，在一个报告上恶狠狠地批道：“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9]

请看：这个扼杀农业合作化的头号走资派，是多么仇恨贫农、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啊！

中国赫鲁晓夫的这个“批语”，是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极端仇恨广大贫农、下中农的自供状。他竟敢把农业合作化的社会主义路线，诬蔑为“幻想”；他竟敢把现实生活中冲破资本主义势力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诬蔑为“危险”的“空想”。他的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革命立场，在这里暴露得再清楚也没有了！我们简直可以听见他咬牙切齿仇恨社会主义的声音！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看到这个批语以后，以极大的愤慨对这种谬论进行了坚决的回击。毛主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实行农业合作化的极其完整的理论，并亲自制定了党中央第一个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胜利地引导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向前发展。中国赫鲁晓夫的阴谋破产了。

一九五三年，在国民经济基本恢复和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之后，毛主席提出了我们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他指出，**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光辉灯塔照耀下，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热情空前高涨，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面对这种大好形势，党内头号走资派及其同伙，吓慌了手脚，赶忙下命令，叫喊什么“反冒进”，强迫已入社的农民“退社转组”。一些刚办起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就这样被扼杀了。

一九五五年，在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农业合作化的高潮遍及全国。可是，中国赫鲁晓

夫又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机会，再次策划了“反冒进”的罪恶活动。同年五月，他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合谋制订了“停”、“缩”、“整”的反动方针，并亲自批准了大砍合作社的计划。两个多月的时间，全国就有二十万个合作社被砍掉了。

直到现在，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还死不认罪。但是，铁证如山，赖是赖不掉的。中国的赫鲁晓夫百般狡辩，只能更加充分地暴露他顽固不化、恶贯满盈的反动嘴脸。

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了给他反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寻找“理论”根据，从他的老祖宗伯恩斯坦、考茨基、布哈林之流的修正主义垃圾堆里翻出了“生产力论”这个破烂武器。他鼓吹什么“有了工业的国有化，才能供给农民大量的机器，然后土地国有化、农业集体化才有可能。”(10)

他的这种“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理论”，在我们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早已可耻地破产了。他否认作为生产力中最主要最活跃的因素的人民群众的伟大革命作用。在他那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的伟大促进作用等等，都统统被抛到了九霄云外。按照他的这种“理论”，在生产力还不发达的国家，无产阶级和贫农、下中农取得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没有资格也不应该及时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必须先让资本主义发展。没有机器，受资本家和富农剥削也是活该。

如果真的按照他的这种“理论”办事，那就必然是既断送我国的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又断送社会主义工业化。

如果真的按照他的这种“理论”办事、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岂不早就被断送，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岂不早就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了吗？

事情很清楚，所谓“先机械化，后合作化”，不过是中国赫鲁晓夫用来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借口。他的罪恶目的，就是要在我国农村发展资本主义，让地、富、反、坏、右复辟，使广大贫农、下中农去给地主、富农当牛做马。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面临被党内头号走资派扼杀的时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著名报告，接着又亲自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序言和按语。毛主席在这些天才的、划时代的伟大文献中，科学地、系统地、完整地解决了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彻底粉碎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同伙的猖狂进攻。

毛主席高度地赞扬了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以极大的热情歌颂说：**“现在全国农村中，社会主义因素每日每时都在增长，广大农民群众要求组织合作社，群众中涌出了大批的聪明、能干、公道、积极的领袖人物，这种情况十分令人兴奋。”**

毛主席痛斥了中国赫鲁晓夫等妄图阻挡历史潮流的机会主义，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

毛主席深刻地阐明了农业集体化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辩证关系，批判了中国赫鲁晓夫的“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荒谬“理论”。毛主席指出：**“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

毛主席的英明论断，解决了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问题：在工业不发达的国家里，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必须而且可能及时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依靠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促进社会生产力的飞

跃发展；在工业还不能提供大量的农业机械的情况下，可能而且必须调动广大贫农、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先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集体化，发展农业生产，从而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开辟广阔的道路。

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在毛主席的光辉理论的指导下，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了，几万万农民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怒涛，把中国赫鲁晓夫等一小撮妖魔鬼怪的修正主义路线迅速冲垮了，卷走了。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嘴脸在大浪潮中被照得一清二楚。农业合作化伟大的群众运动，以空前迅猛之势向前发展。从一九五五年下半年起，只经过一年多时间，就在全国提前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获得了极其伟大的胜利。

中国赫鲁晓夫是“三自一包”
黑风的总根子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一九五八年，在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国民经济出现了蓬蓬勃勃的大跃进局面，我国广大农村出现了人民公社这一崭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人民公社化的实现，使农业集体化跃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加速了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灭亡。

阶级敌人并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对社会主义在农村的新胜利，恨得咬牙切齿，做梦都在想着复辟资本主义。

就在我国国民经济由于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的破坏和连续三年自然灾害，遇到暂时困难、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掀起反华大合唱的时候，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以为这一下可该“变天”了，于是指挥他们的大小娄罗，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条战线上，向社会主义发起了全面的猖狂进攻。

党内头号走资派大肆攻击人民公社说，“农民这几年从集体经济中间没有得到好处”[11]。在他的煽动下，我国农村刮起了一股“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的黑风。这是他妄图瓦解人民公社，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一次大表演。

他公然叫嚣：“不要怕资本主义泛滥”，“自由市场还是要搞下去的”[12]，“工业上要退够，农业上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13]

对这一点，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发挥得更形象。他说：“只要能增产，单干也可以，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这两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还派出亲信爪牙，四处“调查”“包产到户”的所谓“经验”，妄图搜罗“炮弹”，攻击我们伟大导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假“增产”之名，行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之实，恢复单干，让资本主义在农村自由泛滥，这就是他们提出的“三自一包”的反动实质。

想当初，为了推行“三自一包”，中国赫鲁晓夫发“指示”，作“报告”，多么神气十足！可是现在，这个“修养”到家的“大人物”却居然厚颜无耻地赖账说，在三年困难时期，他“没有攻击”人民公社。

事实俱在，还想抵赖。真不要脸！

中国赫鲁晓夫鼓吹的“三自一包”，迎合了农村中资本主义势力的需要，助长了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为投机倒把分子、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大开绿灯。按照中国赫鲁晓夫

的黑指示强制推行"包产到户"的少数地方，什么"责任田"，什么"分田到户"，什么"产量责任制"等等复辟资本主义的花样，统统冒了出来，严重影响和削弱了集体经济。

在刮起"三自一包"黑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赫鲁晓夫卵翼下的一小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都得意忘形，以为在绝望之中又终于找到了一条复辟资本主义的妙计。他们摇头晃脑地说："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中国赫鲁晓夫极力鼓吹的"三自一包"，是撮合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向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发动猖狂进攻的一股黑风。这是为了破坏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挖社会主义的墙脚，把红色的中国变为黑色的中国。这是替他们篡党篡政作准备的一场资本主义大复辟活动。

无独有偶。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鼓吹的这一套，同赫鲁晓夫及其继任者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之流在苏联农村搞的那一套，是一模一样的。

苏修叛徒集团的头头们大肆推行"产品自由售卖的原则"，下令禁止对市场价格实行"行政调节"。他们宣布"赢利水平应当成为客观上评价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经营活动的基础"。他们一再放宽对"自留地"的限制，纵容私分公有土地。他们大搞分田到组、到户，公然把国有化的土地"从法律上"固定给小组长期耕种，而一家只要有两三个以上的劳动力，就可以是一个小组。

正是在这样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统治下，在苏联的农村，私有经济泛滥成灾，社会主义经济完全瓦解，两极分化日益加剧，富者越富，穷者越穷，资本主义已经全面复辟。

请同志们想一想，如果让中国赫鲁晓夫的阴谋得逞，在我国农村，将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呵！

围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场大搏斗

正当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势力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严重关头，一九六二年秋天，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尖锐地批判了中国赫鲁晓夫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煞住了中国赫鲁晓夫刮起的复辟资本主义的黑风。

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提出了"**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伟大任务，吹响了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全面反击的号角。它如一声惊雷，震撼了一切牛鬼蛇神。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开展起来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革命，是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深入发展。围绕着这场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中国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搏斗。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集中地体现在两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件中，这就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十条）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

按照毛主席这条路线，就是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按照毛主席这条路线，就是要"**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注意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按照毛主席这条路线，**“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

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触到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痛处，打破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美梦。他们见势不妙，就采取反革命的两面手法，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口号接过去，抛出一条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首先跳出来的，就是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这个家伙，一贯和中国赫鲁晓夫狼狈为奸，反对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大砍合作社有他，鼓吹“三自一包”有他，这次又有他。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十条”发布不过四个月，他就急不可耐地炮制出了一个“后十条”（草案），同“十条”直接相对抗。

这个“后十条”（草案），用反革命釜底抽薪的手法，抽掉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这一根本内容，把毛主席在“十条”中所明确规定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丢得一干二净。它打着要划清“具体的政策界限”的幌子，千方百计地为农村资本主义势力开脱罪责，束缚广大群众的手脚，竭力包庇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他假“社会主义教育”之名，把斗争矛头指向贫农、下中农。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抛出这棵大毒草，就是妄图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扑灭由毛主席亲自点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革命烈火。这是他反对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之一。

接着，中国的赫鲁晓夫指派他老婆王××下去“蹲点”，搞了一个臭不可闻的“桃园经验”，恬不知耻地到全国大吹大擂，自卖自夸，并且根据这个“经验”对“后十条”（草案）作了一番加工修改，搞出一个“修正草案”。这是一个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作，是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反动纲领。

中国赫鲁晓夫抛出这条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要阴谋篡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领导权，把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引入歧途。这是中国赫鲁晓夫一场残酷地镇压贫农、下中农，向无产阶级手中夺权的大阴谋。在他操纵的一定地方、一段时期内，在这条形“左”实右路线的毒害下，不少贫农、下中农被打成“反革命”，被夺了权。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伟大成果曾经因此遭到了严重的损害。

中国赫鲁晓夫极力回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大谈什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等等。他玩弄这种“障眼法”，一是妄图使革命人民忘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二是为了把矛头指向广大贫农、下中农，指向广大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以包庇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不被揭露。这是极其恶毒的阴谋。

中国赫鲁晓夫极端害怕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真正发动起来，掌握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就会把他的娄罗挖出来。因此，他拿出国民党的“训政”手段，压制群众，打击革命干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妄图把阶级斗争的盖子紧紧盖住，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走过场”。

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同伙抹杀两条道路斗争也好，压制群众也好，打击革命干部也好，归根到底，就是要把水搅浑，搞乱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目标，打击一大片，以便保护党内的走资派，保护他们自己。

中国赫鲁晓夫这条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一条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纳入复辟资本主义轨道的路线，是一条瓦解无产阶级专政，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路

线。

这条路线一出笼，就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广大革命干部的抵制和反对。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二十三条”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件的发布，宣告了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取得了伟大的成果。农村的资本主义势力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人民公社进一步巩固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进一步加强了。接着而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农村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又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

以“斗私、批修”为纲，把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进行到底

我国五亿农民，紧跟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绕过暗礁险滩，战胜妖风迷雾，沿着社会主义的航道走过了十八年光辉的战斗历程。

十八年来农村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其中最重要的是：

第一、“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农村，由于被推翻的地主、富农不甘心于灭亡，总是企图复辟、由于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由于存在着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阶级斗争一直是非常复杂、非常尖锐的，在每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总是十分激烈的。在农村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中国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就是这种斗争在党内的集中反映。广大贫农、下中农和革命干部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把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必须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它的流毒。

第二、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农村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归根到底，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在无产阶级专政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敌人为了达到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目的，总是要采取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软硬兼施的办法，在党内寻找自己的代理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是广大贫农、下中农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中国赫鲁晓夫是他们的总后台。他在农村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他妄图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阴谋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如果让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篡夺了政权，那就要走回头路，吃二遍苦。

第三、在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结束。巩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同破坏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的斗争，仍然是很突出的一个问题。大搞“三自一包”，就是阶级敌人腐蚀和瓦解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一种重要形式。无产阶级和贫农、下中农必须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力量，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第四、广大贫农、下中农，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在农村中的社会基础，是在农村中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依靠力量。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了实现农村的资本主义复辟，总是坚持依靠地、富、反、坏、右，打击贫农、下中农的资产阶级阶级路线。我们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坚持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使印把

子牢牢地掌握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手中。

第五、“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党在农村“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而中国赫鲁晓夫则要拼命打击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大搞物质刺激，竭力诱发和利用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这是一场争夺对农民的思想领导权的严重斗争。广大农民群众和革命干部，一定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在狠批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的同时，狠斗资产阶级的“私”字，逐步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十八年来，中国赫鲁晓夫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同广大贫农、下中农为敌，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遭到了彻底的灭亡。他那一条对抗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正在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农村中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定要进行到底。广大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按照毛主席指出的方向，进行到底。

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祖国的农村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原载 1967 年 11 月 23 日《人民日报》)

注:

(1)(2)(3)(4)(5) 《对安子文等人的指示》，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三日。

(6) 《给七姐的信》，一九五〇年五月二日。

(7) 《关于土地改革问题》，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四日。

(8) 《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四日。

(9) 《对山西省委“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批语》，一九五一年七月三日。

(10) 《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一年五月七日。

(11) 《对下放干部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七月十八日。

(12) 《关于禁止商品“走后门”问题的指示》，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13) 一九六二年六月的讲话。

江青在北京战斗工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问同志们好！这两天座谈会，听得虽然不是太多，但是学到了不少东西。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共产党员离开了群众，就无所作为。好多创造性的东西都是从群众那儿来的，特别是从革命造反派那里来的。

大概是去年冬天跟今年春天，我们在这儿和工人同志座谈过，总的我觉得，工人同志的精神面貌和以前大不相同了，目前形势，听大家讲的是一片大好，这表现在许多方面，突出地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了，都开办了毛主席著作学习班，一般地办了三期，有一个厂（铁路大厂）办了十一期。办了学习班，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了自己的头脑，这样整个形势很快就好

转了。有许多工厂增了产，很好地完成了生产任务；有一些单位由于武斗，生产受到影响，有些下降，目前也逐渐恢复了；个别地方、个别单位不好，那是很少数的。象刚才这位女同志讲的第一机床厂，他们那里经过一个反复，这是比较少的。另外，京西煤矿，大概只有门头沟一个矿是比较差的（**康生**：那里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思想问题，是要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那个地方比较差，可能有许多原因，其中主要的一个原因，恐怕还是康老讲的，是个政治问题。因为那种老厂、老矿，有国民党、会道门，等等。不过，这是在一片大好形势里头，极个别的。还有的个别地方形势不好，主要是由于无政府主义在那里作怪。第一机床厂和另外一个厂的同志，都讲了无政府主义的危害。无政府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采用种种的方式来腐蚀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其中之一就是无政府主义。在当前来说，无政府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主要表现，要向它作斗争。工人阶级是先进的阶级，是革命的阶级，要勇于向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什么时候都不能忘本。象煤矿工人，在旧社会是很惨的，旧社会的煤矿惨无人道。现在煤矿工人最低的工资每天两元多，生了病，受了伤，还由国家负担着。有的人看不到这一点，不上班，不干活，还要拿工资，有一点小病就不干工作，这就是忘本了。还有些群众组织的头头，掌了权后，脱离了群众。所以要**斗私、批修**，要向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还有人不仅不干活，不上班，而且还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更是绝对不容许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坚决地积极地和这种人作斗争。

刚才我听到有人说，三十岁以上的党员就比较保守了。我想，年龄不应该是保守的原因。我们的毛主席已经七十多岁了，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所以，年龄不是保守的主要原因。保守的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三十多岁还是青年人。我到现在还不服老。我不是说我人不老，而是说我的精神状态，我觉得还是很年轻，我跟同志们在一块，觉得更年轻了，即政治上感到年轻了。

在这大好形势里头，我听来听去，是军队起了重要作用。表现不太好的第一机床厂，发生反复是因为没有经过军管，他们现在要求军管，我们准备同意。军队“三支”“两军”，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军队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由宣传队、军管到成立革命委员会，在整个过程中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最近又都开办了毛主席著作学习班，因此，使得群众的政治思想水平大大地提高了一步。同志们在会上发言的水平都是比较高的，讲理的，心平气和的。这一点，我觉得大学生、中学生都应该好好地向工人同志学习。（**谢富治**：讲得对！讲得对！**周总理**：对！）（群众热烈鼓掌，学生呼口号：“向工人阶级学习”）很对！大学生、中学生、知识分子、必须好好地向工人阶级学习。历次革命运动，初期总是学生先起来。但决定革命运动命运的从来不是学生，而是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领导下的贫农、下中农。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不仅要带头，而且要左右革命的形势。我们建议，红卫兵小将不要干涉工厂的事好不好？

此外，在同志们发言里，还有一个很突出的问题，也是值得学习的。就是同志们讲，在整党建党过程中，要突出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这一点，我认为也是水平高的。因为，如果不把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搞清楚，那么，目前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就不清楚。怎样整党建党，怎样解决党群关系等一系列的问题，同志们都可以回去再讨论，讨论了可以给我们提供材料，我们也在研究这个问题。（**总理**：有个单位已拿出个大致的意见来了。）北京市运输公司修配厂的同志讲的关于整党的那份材料，讲得很好。在整党建党的过程中，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都要逐渐地清理队伍，有党内，也有党外：党内的，就是要清除叛

徒、特务及犯了严重错误死不悔改的人。铁路大厂的同志讲的那个“三开”，就是日本时代吃得开，国民党时代吃得开，共产党时代吃得开，可他还是共产党员，怪不怪？这事情是很怪的！党外的，有什么国民党，什么会道门，如一贯道。这里头的人，对一般的当然可以教育，但对它的骨干分子，特别是有现行活动的，我觉得应该坚决处理！对那些不老实的地、富、反、坏、右，也应该坚决处理！当然要由群众监督改造，由群众来处理，不是专门靠政府这个专政机关。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因为一整党，一搞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一搞斗、批、改，就会涉及到人的问题。

关于斗、批、改，要从工厂的基层单位搞起。人浮于事，脱产的行政管理人员太多，参加生产的人少，这个情况不允许再存在了。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一定要改掉它。基层的工厂、企业一改好，一两千人的中央大部也就存在不下去了，不精简也得精简，不改也得改。同志们在改的方面也谈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希望同志们继续试验、创造、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提高。

我就讲这么一点，供同志们参考，错了的，同志们批评。

中央关于对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中央《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下达后，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共产党员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一致认为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远见，是关系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许多部队、机关、学校、工厂、农村都进行了热烈的座谈和讨论。现将征询的第一批反映通报如下，望各地继续征求意见，上报中央：

（一）大家提出，“九大”的最根本任务，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就是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总结“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特别是总结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总结历史上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修改党纲、党章，整顿和纯洁党的组织，选举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中央委员会。

许多同志迫切希望，召开“九大”前出版《毛泽东选集》五、六卷；出版两条路线斗争史的纲要；修增出版新的《毛主席语录》，把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重要指示补上。

许多同志建议，“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中，进一步提高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

（二）要以毛泽东思想建党和修改党章党纲，彻底批判和肃清刘、邓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流毒。“八大”的党纲、党章和刘邓在“八大”的报告没有突出毛泽东思想，没有体现时代的特点，存在着许多修正主义观点，必须彻底加以批判。“九大”的新党纲、党章，一定要突出毛泽东思想，一定要贯串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

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红线，一定要充分反映毛主席在党的建设方面对马列主义创造性的、划时代的新发展。"九大"应该成为党的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

有些同志建议中央现在就成立新党纲、党章起草委员会，在"九大"召开前，把党纲党章草案发给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讨论。

（三）建议总结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我们党从建立以来，一直就进行着两条路线的斗争。特别是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规模更加壮阔，斗争更加深入，意义更加重大。"九大"要大讲特讲党的历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并加以总结。要编写一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的材料，要编印毛主席有关这方面的论述，用以教育党员和干部，帮助大家正确了解党的历史，了解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怎样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了解毛主席在我党建设上的伟大光辉作用。有的同志建议中央作出新的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代替有错误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四）建议整顿党的组织，改革领导机构，以保证党的纯洁性，使党组织成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队伍，成为能够领导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有的同志说："恢复党组织"的口号不妥，"改造党组织"的口号也不妥，叫"整顿党组织"比较合适。整顿党组织的工作，有的建议"九大"以前进行，可以同为召开"九大"的准备工作结合起来；有的认为等"九大"开后，根据新的党纲、党章再进行整顿较好。

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应当根据中央指示，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组织生活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斗私，批修"，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的党员要作自我批评。要提高党员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审查党员，为召开"九大"进行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讨论中普遍建议，为了纯洁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应当发展一批，清洗一批。把那些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考验的优秀工人、贫下中农、革命战士和革命知识分子吸收入党，以增加党的新血液。把隐藏在党内的叛徒、特务、自首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统统清除出去，以根绝隐患。

不少同志很关心共青团的问题，希望"九大"就此作出决定。

（五）建议用毛主席关于接班人五个条件和林副主席关于选拔干部的三条标准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中要老、中、少三结合，名额应比"八大"多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一批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有才能的新生力量应选入中央委员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揭露出来的叛徒、特务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能再当中央委员。如果中央委员会要留"反面教员"的话，第一，"只能很少很少"，第二，必须是"认罪好改造好的"。"刘、邓、陶、彭、贺、彭、罗、陆、杨、王明之流绝不能留在中央委员会里。""政治局特别是常委中，不能有反面教员"。同志们表示，要不要留反面教员，毛主席会考虑，我们坚决听毛主席的话。

（六）关于"九大"开会时间，多数同志建议明年秋天国庆节前召开。"九大"过后接着开"人大"，把刘少奇罢掉，解决国家主席问题。这样，明年国庆节上天安门的都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的提出如形势发展快，可以明年上半年开。

（七）许多同志建议"九大"规模要大，人数要多，"开个万人大会，坐满人大会堂"。代表中要体现三个"三结合"，即：军队、革命干部、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工、农、兵三结

合;、老、中、少三结合。要多选一些部队、工人、贫下中农和红卫兵的代表参加大会。

刘、邓、陶、彭、贺、彭、罗、陆、杨能不能选为代表?一致认为不能选。"要让这些人当代表，下面百分之百通不过"。"对这些人不是选不选他们当代表的问题，而是讨论对他们进行处理，把他们清除出党的问题"。"王明是特务、叛国分子，死不悔改，不仅不能当代表，而且应开除党籍、国籍。"

代表产生的方法，多数同志主张采取自上而下，上下结合，内外结合，各方协商的方法产生。中央了解的，由中央提名，交下面讨论通过；中央不很清楚的，可与地方协商，上下结合，内外结合产生；部队系统由于党的生活一直保持正常，仍可采取自下而上地选举产生。但不管采取什么方式，有一条原则是不能动摇的，那就是一定要选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党员当代表。

(八) 关于大会的开法，多数同志认为采取由上往下开的办法较好。先开"九大"、制定新党纲、党章，再开各级党代表大会，这样，"上面有纲领，下面有方向"，"可以保证地方党代表大会的质量"。

(九) 大家提出，一定要坚决贯彻毛主席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党和国家相同的机构可以合并。层次重叠、人浮于事的现象必须改变。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机构一定要精干。这样才能克服官僚主义，有效地反修防修，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和工作革命化。

中　共　中　央
中　央　文　革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此件可发至连队党支部和地方相应的组织)

很好，照办。　　毛　泽　东　　十二月一日

中共中央批准天津市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

(一) 中央认为天津驻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坚决执行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央是满意的。在天津某些支左工作中，虽然犯有某些缺点、错误，但是，从今年四月以后，在中央和广大革命的群众帮助下已经改正。肖思明、郑三生、杨银声三同志这次所作的"关于在天津支左工作中所犯的错误的检查"态度是好的，诚恳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九个多月中，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推进了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革命的大批判，作了很多工作。他们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四月以后已经有了纠正。中央同意郑维山、解学恭、肖思明三同志的报告。

(二) 天津市是我国一个重要的工业城市，长期受帝国主义的影响和中国赫鲁晓夫最大

走资派和他的代理人万晓塘、张淮三反党集团的影响。他们结合美、蒋、日、苏修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妄图用各种卑鄙手段进行破坏活动，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对此，广大革命群众和全体指战员应当提高警惕性。要坚决同上述敌人作斗争，加强革命群众之间团结，加强军民团结，积极响应毛主席的"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希望天津市的人民解放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群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新功。

（三）中央同意天津市双方赴京代表团签订关于"立即、坚决、彻底制止武斗"的协议，和"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是符合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精神的。当地驻军和革命群众组织，都应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证贯彻执行。

（四）中央同意天津市广大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筹备小组的意见，立即成立天津市的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以九十七名委员组成，并由解学恭同志任主任、肖思明、郑三生、江枫同志任副主任。

中央祝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思想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关于确保铁路运输物资安全的通令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日）

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空前大好的形势下，全国铁路运输系统的形势也是一片大好，广大革命职工热烈地、认真地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斗私，批修"为纲，抓革命，促生产，正在掀起运输生产新高潮。但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千方百计地企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铁路运输。近来，在某些地区发生了盗窃、抢夺铁路仓库、货场和火车上运输物资的事件，对国家财产造成重大的损失，还有的盗窃危险物品，对人民生命造成了威胁。这种严重的违法行为，必须坚决制止。为此，特通令如下：

一、铁路运输的物资，关系到国家经济建设、国防战备和城乡人民的生活，必须确保其安全，任何群众组织、任何人都有责任保护，不得侵占和抢夺。更要严防敌特、内奸和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破坏和盗窃。

二、对于盗窃、抢夺铁路运输物资的盗窃集团，盗窃犯，必须发动群众坚决破获，逮捕首犯，并按情节轻重给予惩处。对敌特、内奸、地、富、反、坏、右分子，惯盗犯和情节严重的首恶分子，要依法严办。所盗窃、抢夺的物资，必须一律追回。原物用掉、卖掉或毁坏的，要赔偿。

三、铁路、交通运输系统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军管会、当地驻军，人民解放军护路部队及公安机关，和各革命群众组织，必须保护铁路畅通，保证运输物资的安全。要广泛深入地宣传中央九月十三日"关于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商品，冲击仓库，确保国家财产安全的通知"中的有关规定。对铁路运输物资，应采取严密的保护措施。遇有抢夺、盗窃运输物资者，应坚

决制止，并有权拘留进行处理。

四、各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和铁路系统的革命职工，必须提高革命警惕性，监督和检举坏人，同盗窃犯和抢夺运输物资者作坚决的斗争，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公安人员，保护运输物资的安全。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日）

毛主席最近对浙江如何正确对待红暴派问题，作了重要的批示。

毛主席说："**浙江的红暴，与湖北的百万雄师不同，是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有许多群众，似宜以帮助，批评，联合为原则。**"

毛主席的这个极其重要的指示，对于各地的工作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目前不少地方都存在不同于百万雄师的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应当对他们采取正确的政策，即毛主席提出的帮助，批评，联合的政策，而不应对那些组织的群众采取施加压力、绝对排斥的政策，才能有利于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应当组织有各派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斗私，批修**"为纲，大力帮助他们学习毛泽东思想；批评他们的错误，并促进他们自觉地改正自己的错误；同时大力推动他们同其他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共同进行革命的大批判，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在革命"三结合"；领导机构中保留他们一定的名额。采取这种政策将有利于团结大多数，使还没有建立革命领导班子的地方，能更迅速的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使那些已经成立临时权力机构的地方的革命政权更加巩固。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矛盾论》）只有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帮助，批评，联合的方法，才能够正确解决同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这类性质的矛盾，而用高压、排斥、一派单独夺权等项方法，则是不能解决此种矛盾的。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特务、叛徒等坏人用种种方法破坏革命大联合，挑起武斗，则必须保持警惕。望同志们对毛主席这个最新指示细加体会，坚决执行。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
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
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日）

现将《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发下，望你们征求意见，并于元

旦以前将意见报告中央，以便再作修改。

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

党中央"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组织生活的批示"下达后，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反映很热烈。一致认为毛主席和党中央这一指示非常及时，非常英明，是对广大党员的最大爱护和关怀，是全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

（一）关于用毛泽东思想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问题

同志们提出，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绝不是恢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以前的老样子，老一套。而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来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彻底批判刘邓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把我党建设成为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能够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是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所必须遵守的最根本的原则。

（二）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过程中的思想工作问题

在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过程中，一定要做好党员和非党员中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同志的思想教育工作。同志们建议：(1)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提高思想觉悟，解决思想问题。(2)广泛发动群众讨论，虚心听取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意见，改善党群关系，彻底打消党员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怕党员报复的思想。(3)有的党员犯了错误，必须以"**斗私，批修**"为纲，认真进行自我批评，取得革命群众的谅解。

（三）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组织的条件、范围和政策界限问题

具备什么条件的单位才能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多数同志认为，根据中央指示，凡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或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单位，可以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那些人不应再过党的组织生活

(1)"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悔改的那些人"，不应再过党的组织生活。

(2)对有叛徒、特务嫌疑而未作结论的，绝大多数同志意见也应暂缓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待问题查清后，再考虑是否恢复。

(3)凡是犯有严重错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表现不好，革命群众意见很大的党员，在他尚未承认错误，尚未向革命群众检讨并取得革命群众的谅解以前，暂缓参加党的组织生活。

吸收新党员的条件是什么

综合大家的主要建议如下:

(1)建议以毛主席关于接班人五个条件和林副主席关于选拔干部的三条标准为根据吸收新党员，注意阶级成份，但也要看思想政治表现，看是否忠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2)根据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表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冲杀出来的、经过运动考验的、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可以吸收入党。

(3)要吸收那些朝气蓬勃，富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勇于在阶级斗争中冲锋陷阵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入党，特别要注意吸收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先进分子入党。要彻底批判“驯服工具论”，彻底批判吸收党员只根据什么“听话”、“生产好”、“业务好”等等，而不重视无产阶级政治思想、革命大节的刘邓修正主义建党路线。

(4)目前有一批预备党员未转正，有的够条件已超过预备期的可以转正。

清除党员根据什么原则

(1)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统统清除出党。

(2)死不悔改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清除出党。

(3)死气沉沉，不起作用，毫无革命干劲，不配为党员的，或开除出党，或劝其退党。

(4)长期作预备党员不够转正条件的，取消预备党员资格。

(5)有些单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根据群众要求开除了一些党员，凡符合上述条件的开除出去，不符上述条件的，经过教育，并取得革命群众谅解的，应恢复其党籍。

(四) 关于建立党的核心小组问题

关于党的组织领导问题，大多数同志主张在革委会中建立党的核心小组来领导；基层成立支部和小组。

核心小组必须采取自上而下、上下结合、内外结合、充分酝酿、反复协商的办法产生，并报上级审批。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关于今冬明春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四日)

(一) 经过一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农村中广大贫农、下中农进一步发动起来了，夺得了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当前农村形势大好。只有一小部分受灾严重地区和受走资派及地富反坏右控制地区的情况不好。

(二)今冬明春农村基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继续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即十条的原则进行。斗争的矛头要始终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他们在各地的代理

人。必须坚定地依靠贫农、下中农。必须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不要派工作组去指手划脚，学生、工人、市镇居民、机关干部，都不要去串连。农民也不要进城串连。必要时，可由人民解放军组织少而精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三）县、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等单位，要普遍地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广大社员、干部和民兵都要参加学习。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以"斗私、批修"为纲，进行正面教育。要深入地学习"老三篇"，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要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中国最大的走资派所宣扬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剥削有功"、"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桃园经验"等等反动谬论，他们对干部实行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罪恶阴谋，以及他们进行的其他反革命资本主义复辟的罪行，揭深，批臭。同时，要把学习班内的学习，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

（四）要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要学大寨的经验。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巩固集体经济。要节约闹革命。要反对投机倒把，反对贪污盗窃，反对分田到户，反对闹单干。大破剥削阶级的四旧，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农村人民公社现有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关于自留地的制度，一般不要变动，也不要搞捐献。

（五）在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基础上，解决县、社两级的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问题，组成县、社的革命领导班子，以更好地领导生产大队、生产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生产队一般不搞夺权。在需要夺权的生产大队，应当坚决依靠贫下中农，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用改选领导班子的方式解决。应当肯定，农村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六）革命群众要提高阶级警惕性，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不准地、富、反、坏、右分子反攻倒算，不准他们在群众中造谣挑拨和破坏。受走资派及地富反坏右控制的地区，必须把领导权夺到以贫农、下中农为主体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来。

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山头主义，坚持文斗，防止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其他坏人挑动武斗，挑动群众斗群众。

（七）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十条，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是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制定的。根据这两个文件进行的四清运动，有伟大的成绩，必须肯定。四清运动遗留的某些问题，可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解决。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关于认真学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论教育革命》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七日）

现将《毛主席论教育革命》这一极其重要的文件发给你们。这是我们进行无产阶级教育

革命的伟大纲领，这是我们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等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无比锐利的武器，这是复课闹革命的根本指针。它不仅对于大、中、小学校的教育革命，而且对于各条战线的斗、批、改，都具有十分巨大的指导和启示作用。

“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天才的、创造性的发展。对于破除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建立无产阶级的教育制度，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这个文件中，对于无产阶级的教育路线、教育方针、教育制度，直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等的改革，都作了极其深刻和精辟的分析，处处闪耀着毛主席唯物辩证法的天才光辉。望你们接到这一文件后，立即在学校中掀起一个学习和执行这一文件的群众运动，按照毛主席所指出的方向，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大大推进一步。各报刊也应以此为指针，组织有关教育革命的理论批判文章及宣传报道。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
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正在展开一场群众性的修改党纲党章的运动。他们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以三种形式结合进行：(1) 组织了市一级的修改小组；(2) 分别到工厂、机关、学校、商店、公社、连队、街道选择一批点，组织了几十个群众性的修改小组，为市的修改小组提供参考性的修改稿；(3) 市一级的革命群众组织和驻沪三军自己选择一批基层单位，展开修改党纲党章的讨论，广泛听取和集中群众意见。这种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通过修改党纲党章的热烈讨论，大立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大破刘、邓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大大提高了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无产阶级觉悟，有力地推动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成为恢复、整顿和重建党的组织的思想基础。中央认为：凡条件可能进行这项工作的地区，都应参照上海的经验，组织党纲党章修改小组和群众性的讨论，集中群众意见，提出关于修改党纲党章的方案，并于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日以前将修改草案上报中央。目前还不可能全面进行这项工作的地区，也可组织一些力量作重点调查研究。这是“九大”的一项重要的准备工作，望你们接到通知后，认真讨论，并将你们的部署电告中央。

北京针织总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体现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战略部署的典范（节录）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

八三四一部队支左人员在六月二十六日进厂以后，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在支左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以下原则：

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做深入的、细致的、艰苦的思想政治工作。

不匆匆忙忙急于表态，经过调查研究，如果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逐步地把他们联合起来。

向工人群众学习，不怕犯错误，错了就改。关心群众的生活。

他们牢记毛主席“**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的教导，在支左工作中狠抓根本不转向。他们认为：支左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的头脑，大树特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绝对权威。支左人员，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支左过程中，事情千头万绪，情况千变万化，抓住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一条就抓住了根本。他们坚信毛泽东思想的无比威力，坚信广大群众最听毛主席的话，不管碰到多少困难，不管出现多大的问题，都坚定不移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引导群众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解决问题。他们用最大的热情，又快又深地、不折不扣地把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号令，传达到广大群众中去。他们组织广大革命职工以“**斗私，批修**”为纲，联系思想，联系阶级斗争的实际，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他们进行了深入、细致、艰苦的思想政治工作，把毛泽东思想送到车间，送到宿舍，送到广大职工及其家属的心坎上。

全厂广大革命职工在支左部队帮助下，进一步掀起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他们积极布置学习环境，大造学习声势，建立和健全天天读等学习制度，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职工们上班前站在毛主席像前，学习毛主席语录，向毛主席请示，下班后向毛主席汇报，生产中抬头便见毛主席语录牌，交班时交毛主席语录，随时随地用毛主席的教导指导自己的行动。广大革命职工大学大用“老三篇”，改造世界观，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他们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最新指示，深刻理解和掌握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方法和政策，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工人们歌唱道：“工厂变成了毛泽东思想大课堂，心中升起了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八三四一部队支左人员，遵循毛主席的这一教导，一进厂就十分重视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引导广大革命职工团结对敌。他们坚信：各派革命的群众组织，都是要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的，只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他们便可以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逐步地联合起来。

（原载1967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

毛主席关于绝对权威的批示和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林、周、中央及文革各同志:

(一) 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二) 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三) 党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寿，应通知全国重申此种禁令。

(四) 湖南的集会应另择日期。

(五) 我们不要题字。

(六) 会议名称，可同意湖南建议，用第一方案。

以上各点请在一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为盼。

毛 泽 东

十二月十七日

我们完全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十二月十七日对湖南省革筹小组报告的批示，现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认真学习，坚决照办。

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就提出，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希望你们严格遵守执行。

关于毛主席的塑像问题，中央在今年七月十三日已有重要指示，希望你们认真贯彻执行。

中 共 中 央

中 央 文 革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毛泽东选集》今年出版八千万部（节录）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在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空前大好形势下，我国今年出版八千万部《毛泽东选集》的计划已经提前胜利完成。这一辉煌成就，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今年，我国出版的毛主席著作数量之多，发行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截至十二月二十日，全国已经出版汉文版、少数民族文版和外文版《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八千六百四十多万部。这个数字等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十五年出版数量总和的七倍半。与此同时，我国今年还出版了《毛主席语录》三亿五千万册，《毛泽东著作选读》四千七百五十多万册，《毛主席诗词》五千七百多万册。大量红彤彤的毛主席著作，由我国发行战线上的广大革命职工，以最快的速度送到全国亿万工农兵群众手中，发行到全世界一百四十八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地满足了全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迫切需要。

（新华社 1967 年 12 月 25 日讯，载 12 月 26 日《人民日报》）

中共中央关于江西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中央同意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日的报告。

中央同意成立江西省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由一百四十九名委员组成，其中程世清、杨栋梁、文道宏、鲁鸣、罗元圻、陈昌奉、黄先、刘瑞森、郭光洲、丁士采、于厚德、许洪云、李鹏、于德馨、万里浪、蔡松龄、涂烈、汪桂荣、吴才枋、陈全生、周升炬、蔡方根、张行阳、龙标桂、刘剑秋、王萱春二十六人为常务委员，并由程世清同志任主任，杨栋梁、黄先、于厚德、万里浪同志任副主任。

中央祝贺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中央希望，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将与江西省的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群众一道，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新功。